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十二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们编印了这套资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共十四册（序号19—32)；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三册(19、20、21)；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三册（22、23、24)；"文化大革命"时期三册（25、26、27)；实现历史性转变时期三册（28、29、30、）；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二册（31、32）。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汇编时，保持了文件的原貌，未作改动，如需要引用，请查对原文。本资料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

为反映历史发展的逻辑，便于从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上研究问题，所有资料都按时间顺序编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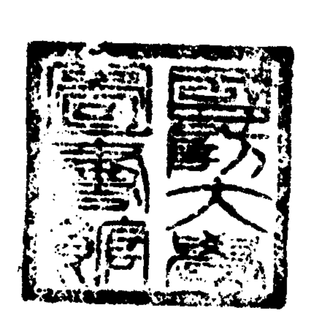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张天荣、何理、肖甡、胡庆云、林蕴晖、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整个资料的选编。

第22册由丛进选编。

资料的印制，由魏政、李浚具体经办。

刘星星参加了资料的汇集、整理。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录

一　九　五　七　年

一 九 五 八 年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政治局通过）

一

一九五七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经济发展，不但要保证完满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且要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准备巩固的基础。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七年大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一九五七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收支计划的顺利实现。

增产节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为了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不仅需要由政府作出正确的计划，而且主要地需要人民群众进行积极的努力。因此，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在一九五七年，开展这一运动尤其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五六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表现了巨大的高涨。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四年累计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百分之八十·五。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超过原定一九五七年指标的百分之五。农业虽然遭受严重灾害，但是粮食、油料、糖料、烤烟等仍然超过了一九五五年的产量，其中粮食、烤烟等并且超过了原定一九五七年的指标，棉花产量仍然保持了一九五五年丰收的水平。工人职员的收入比一九五五年有了比较多的增加。除灾区以外，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全国各阶级的广大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他们对于自己所取得的胜利表示满意。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九五六年的迅速发展，说明反对右倾保守观点的斗争是必要的。

对于一九五六年工作中的这一切巨大的成就，必须给予足够的估计。对于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必须加以珍惜和保护。否则，我们就将犯严重的错误。

但是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也有进展过快的缺点，并且在计划执行的某些方面放松了应有的控制。首先，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过高，摆的摊子过多。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钢材、木材等建设物资生产增长的速度，也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这一情况，使一九五六年物资的供需之间和现金的收支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平衡的现象。事实证明，这样的发展速度是不能够继续的，不作适当的调整就不可能克服目前经济生活中那些不正常的状态。其次，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一九五六年原计划增加职工八十四万人。但是由于中央放松了控制，据九月底统计，实际达到人数比原计划多增加了一百二十多万人。同时，高等学校、中

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技工训练班，也招收了过多的学生。人员增加过多的结果，不但使企业的工资开支和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过多，而且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城市人口增加过快，城市建筑的需要也增加过快。第三，一九五六年提高了全体职工的工资标准，一般地说来这是完全需要的，但是由于同时增加了过多的职工，并且过多地扩大了职工升级面，不适当地支付了一部分福利费用和奖金，一部分人员的工资也增加过多，这就使工资总额和福利开支增加过多过急，据估计这项开支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约达二十八亿到三十亿元。此外，一九五六年所发放的农业贷款，大部分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并不必要，以至贷款的增加也突破了原定的计划，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二十亿元之多。因此，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就大大超过了消费物资的增长，造成了市场上特别是城市中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局面。

除了上述的严重缺点以外，一九五六年的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事实，对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消费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以及财政的收入，也有不利的影响。

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一九五六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一九五七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二

从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所发生的问题中认真地吸取教训，统一全党同志的思想认识，是顺利地开展一九五七年增产节约运动的必要条件。

一九五六年的经验证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不但决定于国家的财政力量，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建设物资的供应力量。建设物资的生产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积极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的速度仍然有一定的限度，不是单纯地由主观愿望所可以决定的。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过大，正是因为在编制和执行计划的时候，过多地偏重了需要，而没有足够地考虑建设物资供应的可能。而且由于在考虑建设需要的时候，往往脱离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盲目追求现代化，贪新贪大，不注意物力财力的精打细算，不注意投资效果的充分发挥，从而更加扩大了建设需要和物资供应之间的矛盾。为了避免在今后重复发生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建设物资供应能力的危险，各个年度基本建设规模的确定，不但要充分考虑投资的可能，而且必须有建设物资的确实保证。对于某些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需要的物资，在分配的时候，应当首先使人民生活最低限度所必需的物资得到供应，然后按物资的多少，确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

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又证明，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主要决定于消费物资的供应力量。如果仅仅增加工人的工资，增加对于农民的贷款，或者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能相应地增加消费物资的供应量，那么，就必然造成市场的紧张，甚至造成物价上涨，因而也就不能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适当地改善人民生活是必要的，而要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积极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是农业的发展速度有一定的限度，轻工业的发展又主要决定于农业的发展，因此，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只能是逐步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距离不要超过正常的限度，以免引起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

除了以上两方面的教训以外，目前的情况还表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中铺张浪费的倾

向，虽然经过了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的打击，但是在过去三年中又有了新的滋长。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求我们对行政费用和管理费用实行最大限度的节约，以便不断地降低这些费用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而使每年能够有更大量的资金用之于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这不但在经济上是必须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必须的，因为不如此，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就会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中央历来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所曾多次强调的。但是由于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一九五五年反浪费的重点是在纠正民用建筑的造价过高方面，因此，不少同志对于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仍然没有深刻的认识。相反，在有些干部中间，在最近时期还滋长了爱排场、好享受、计较名誉地位、只能升级不能降级、只能为官不能为民、不愿亲自动手、不肯精打细算、不能艰苦朴素、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不爱护国家财物的情绪和作风。这种趋势如不加以纠正，是极端危险的。因此，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除了在经济上的任务以外，还必须负起政治上的严重任务，这就是要坚决地纠正许多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组织庞大、人浮于事、工作松懈的现象，坚决地纠正一部分工作人员待遇过高、生活特殊、铺张浪费的现象，并且采取适当步骤，坚决地消灭在一部分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行为，借以使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巩固起来。

三

为了缓和目前经济生活和财政收支的紧张局面，必须适当地调整一九五七年度基本建设的规模，并且根据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照顾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等方面的要求，具体安排一九五七年度的基本建设计划。

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对于原定在今年开工建设的项目，应当进行具体分析，重新排队，把那些在今年和明年都有可能和有必要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把那些今年虽有可能施工、但是明年没有可能继续施工的项目，从年度计划中取消，把那些需要建设、已经设计、但是目前限于物力和财力、还不可能施工的项目，列为预备项目。同时，对于去年已经施工的项目，也应当进行排队，把那些在今年还有可能和有必要继续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把那些今年没有可能施工的项目，推迟进度、缩小规模或暂时取消。对于这类推迟进度、缩小规模或暂时取消的项目，必须妥善地安排多余的人员，合理地利用和注意维护已经建成的厂房和其它建筑物。

各部门和各地方对于列入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新建和续建的项目，特别是那些新开工建设的项目，在不妨障建设进度和生产发展的条件下，应当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审查设计文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克服某些项目的安全系数过大、建筑标准过高、经济技术定额过宽等缺点，以尽可能地减少物资、资金和人力的耗费。对于那些没有列入一九五七年计划的项目，应当组织必要的设计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抓紧时间，实事求是地进行全盘的审查，使这些项目的设计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更加合理。对于改建和扩建的项目，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设备和建筑物，切实纠正盲目地追求先进水平而任意废弃旧设备旧建筑物的偏向。

在一九五七年，除了十分迫切需要的职工宿舍、学校校舍等以外，一般的民用建筑物应当一律停止建设。军队营房除少数必需的以外，大部分也应当停止建设，一九五六年已经开始建设而还没有完工的民用建筑物，必须经过国务院有关单位和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以后，才允许续建。不论是新建和续建的民用建筑物，都应当根据适用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适

当地降低建筑标准，纠正那种在一九五六年又重新抬头的追求豪华和标准过高的偏向。国家建设委员会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分别拟定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民用建筑物的标准，经国务院审定以后予以公布。任何部门、任何地方和任何单位的建筑，都只允许低于这个标准，不允许高于这个标准。

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目前存在着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求新过急的严重现象。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各省、直辖市应当重新审查所有改建城市和新建城市的建设方案，适当地节减和合理地使用城市建设的投资，首先解决人民和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坚决地纠正上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不良偏向。今后旧城市的改建和扩建，应当在原有基础上逐步进行，充分利用原有的建筑物、道路和其他公用设施，尽量不拆城市原有房屋，严禁不必要地和过多过早地拆除民房。应当制止那种把大城市和附近的中、小市镇连成一片的做法，制止在离原有城市很远的地方修建医院、学校、办公场所等等的做法，以免增大附属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费用。新城市的建设，应当照顾到当地农村的生活水平，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和建设标准，并且尽量少占耕地。

在一九五七年施工的所有单位，应当认真改进管理工作，依靠全体职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完成工程的进度，严格节用建筑材料，努力降低建筑成本。中央决定全国所有施工单位在一九五七年必须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至少降低建筑成本百分之五。

四

在工业、农业的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在原材和市场允许的范围内，一切工业企业都必须为增加产品的数量和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而斗争，继续坚决反对和防止那种认为增产已经"到了顶"的保守倾向。

冶金、燃料、电力、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等原料工业部门，应当尽可能地提高生产指标，并且深入发动职工群众，开展劳动竞赛，从提高技术、改善工艺规程、改进定额、改善管理制度等方面，寻找增产的有效办法，推广先进经验，采取最能见效的技术组织措施，尽最大的努力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为了迅速地增加金属和燃料等的生产，应当在通盘考虑大、中、小型厂矿的经济效果之后，抽出适当的物资、资金和工程技术人员，并且根据资源等可能条件，积极恢复和适当扩充原有小型的煤矿、金属矿、炼铁厂、水泥厂和电站；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新建这类的小型厂矿。对于这类小型厂矿的恢复、扩建和新建，地方工业部门应当加以充分注意，有计划地进行。

原材料的节约是一九五七年工业节约的主要任务。机械制造、化学、纺织、食品、造纸、医药等制造工业部门，必须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大力降低原材料消耗定额，建立和健全材料管理制度，并且加强企业之间的协作，以减少原材料的耗损而增加生产。机器制造部门尤其应当注意金属的节约，并且注意制造为社会所需要的零星产品、部件和零件。

所有制造部门都应当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广泛采用代用原料，充分地利用废料，开辟新的原料资源，增加生产。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提高技术，合理利用原料，消除浪费原料的现象，努力增产为人

民群众需要的日用消费品。

原料供应部门必须努力收购工业原料，尽量满足生产企业的要求。努力完成收购棉花的任务，对于一九五七年的轻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有重大的关系；有关的各地方党委对于这个迫切任务必须抓紧时间，认真负责地加以完成。在原料缺乏和生产任务不足的某些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中，应当抓紧时间检修机器，多招揽机器修理、农具修理和其他人民生活用品的修补业务，并且可以试制一些用料不多、费工较大的优质优价的新产品。某些接近农村的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在农忙季节还可以支援农业生产。

不论是原料生产部门或加工制造部门，也不论是生产资料部门或消费资料部门，它们在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的时候，都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次品率，减少以至消灭废品。各部门和各地方应当对所属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出具体的要求，并且规定制度，严格检查，保证实现。

增产和节约都必须防止各种不正常的办法，例如只顾数量、不顾质量，只顾生产、不顾安全，或者放松设备检修、浪费资源、忽视均衡生产等等，坚决避免任何名义上是增产节约、实际上反而造成巨大浪费的现象。

某些地方不适当地合并公私合营工厂，不仅妨碍了生产的增长，而且造成了多方面的浪费。因此，凡是现在还没有合并的公私合营工厂，不要勉强合并；凡是合并得不适当的，应当加以调整。不宜于统一核算的分散的工厂，应当采取各负盈亏的办法。应当恢复这些工厂原有的产品品种，协作关系和供销关系，并且纠正盲目扩大管理机构和随意增加非生产人员的现象。

在农业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初步巩固的有利条件，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继续开展农业增产运动，为积极争取一九五七年的丰收而斗争。各级党委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十一项指示，并且根据一九五七年一月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关于农业工作的讨论，根据当地一九五六年发展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具体指导。应当推行去年行之有效的各种增产措施，发展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发展畜牧业和农村副业的生产，发展土特产的生产，以争取农业生产的全面高涨。

进一步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顺利推行各种农业增产措施以增加农业生产的决定性的环节。各级党委应当组织足够的力量，由负责干部亲自领导，深入农村，发动广大群众和合作社干部检查上一年的工作，发扬民主，肯定成绩，纠正错误，调整社内外的关系，认真实施社员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提高他们办社和增产的积极性。应当切实帮助合作社干部作好一九五七年的增产计划和各项生产准备工作。去年许多合作社发生过不计算成本、浪费劳动力和浪费资金的现象，在今年的工作中应当加以克服。

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继续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应当提高社员和干部爱护公共财物的观念，反对贪污、浪费和不关心公共财物的行为。应当加强经营管理工作，在生产上做到精耕细作，精打细收；在基本建设上做到合理使用资金和贷款，充分发挥投资效果；应当合理地组织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使合作社的集体经营和社员的家庭经营形成正确的分工合作，发展多种经济。

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邮电各部门，都应当采取切实的措施，提高设备和人员的效率，加强调度工作，以增加运输和通讯的能力、运输各部门还应当努力节约燃料的消耗。各

托运单位应当加强计划性，改善物资调拨制度，平衡季度之间的运输，克服各种浪费运输能力的现象。

各个商业部门必须继续努力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应当按照商品流转方向，减少流转环节，合理调整批发和零售的机构，通过最经济的路线输送商品，克服商品调拨中货不及时和迂回运输等缺点。应当简化统计、财务和会计等方面的制度，精简非业务人员，充实营业人员。同时，应当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行各种合理的有效的办法，保持商品的质量，减少商品的损坏，特别是减少鲜活商品的损耗，减少以至消除商品在储存、保管、包装和运输中的损失和浪费现象。

五

在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大量节减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善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且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

第一，所有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必须严格控制人员编制。一九五七年劳动计划中规定增加的人员，只能在原有人数以内统一调剂，一律不准自行招收。各部门的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各企业附属的技工训练班所需要的新生，只准首先在现有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多余人员中招收。如果确需另外招收新生，必须由劳动部审查批准。地方企业单位所需要的初级技术人员，应当从中央各部门所属技术学校多余的毕业生中调配。

第二，认真执行精减上层、加强下层的方针，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无论是行政单位、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管理机构，都应当进行精简。但是在精简机构的时候，对于被精简的人员，必须作好安置，否则不允许裁减。为了精简机构和改进工作，各方面业务的主管人员，应当按照业务的分工，分别地深入下层，调查机构庞大、手续繁多、办事迟缓的实际情况，亲自了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给下级机关和基层单位所造成的困难和恶果。同时，应当普遍发动所属单位的职工群众，认真讨论简化手续、减少表报、提高效率、改进工作的有效办法。然后由主管单位根据调查结果和群众意见，进行综合研究，拟定调整机构、合理使用人员的具体方案，加以实施。

第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一九五七年除个别调整以外，一般地不增加工资，也不提高级别。一部分人员工资过高的，应当适当予以降低。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应当大力地提倡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企业职工的附加工资和奖金，机关人员的福利费开支，都必须进行整理，凡是标准过高的，都应当适当降低；凡是不合理的，都应当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加以废除。各部门和各地方自定的有关职工的工资、福利和奖金等制度，有关技工学校学生的助学金制度，应当一律报送劳动部统一审查整理。

第四，加强经济核算，降低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费用。各部门应当会同工会组织研究如何吸引广大职工来监督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中降低管理费用的办法和制度，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并且提出普遍推行的方案。所有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都应当改善经营管理，节减事业费开支，节约流动资金，并且克服物资的损失和浪费的现象。

第五，对于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集体消费，应当有系统地加以节减。为此就必须严格地节约行政费用，降低供应标准，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特殊供应办法，

停止购置家俱、汽车和自行车等用品，整顿和减少各部门和地方的内外刊物，减少办公杂支，除特定场合外严禁请客、送礼，并且克服在开会方面、文娱活动方面以及对外活动方面的浪费现象。凡是市场上供应不足的商品，对于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供应，应当分别情况加以调整。例如煤炭、纸张、副食品等，应当大大地降低供应标准，公用布匹则应当停止供应。

第六，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储蓄和认购公债运动。这是减轻市场供应紧张的重要方法之一，应当大力地号召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积极进行。

第七，努力节约粮食。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在一九五七年，平均每人每月应当节约一斤粮食。同时，应当在城市和农村的人民群众中提倡粮食的节约。

六

一九五七年增产节约运动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各单位有关增产节约的方案、具体措施、各项制度和方法，都应当由负责人员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动员，有领导地组织广大群众酝酿讨论，做出决定，并且由群众监督实行。

动员群众的中心问题，是要使群众对于增产节约的斗争不但充满热情，而且充满对于前途的信心。由于一九五七年的建设规模将要有所调整，在经济生活中将遇到某些暂时的困难。例如，某些基本建设单位多余的工人需要安排，某些工厂不能充分开工，市场的供应还会继续紧张，等等。必须向群众进行有系统的解释工作，指出这些暂时的困难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建设初期是难以避免的。同时必须指出，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胜利，许多生产指标和建设项目提前完成一九五七年计划以后，为了巩固这种胜利，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行，一九五七年的建设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适当地放慢一些脚步，是完全必要的。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要告诉群众，从整个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七年仍然是向前发展的，而且发展速度仍然是快的。在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的胜利将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工农业生产将继续增长；物资的供应将相应地增加；财政的收支将恢复平衡；除了少数指标以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超额完成。目前工农业生产和市场供应方面的一些暂时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一面增加原材料的生产，一面节约原材料的使用，那么，原材料的紧张状况就可以好转。只要我们控制职工人数和工资的增长，节减集体消费，开展储蓄运动，市场的紧张状况就可以好转。现在许多地方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开始收到成效。一切增产节约的好经验，都应当大力地加以宣传和推广。只要我们坚持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现在经济上的一些困难情况，在几个月以后，就一定可以有显著的好转。任何忽视成绩、夸大困难的倾向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全党同志应当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开展一九五七年增产节约运动，全面地完成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积极奋斗。

中央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党组、各省市党委和军委根据这个指示，结合实际情况，作出本部门本地区增产节约的具体方案，在三月底以前报告中央。方案中应当包括开展运动的办法、步骤和增产节约的初步指标，鉴于过去增产节约运动中财务混乱的情况，责成财政部研究制定有关增产节约的财务计算办法和各种财务管理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这类事件在最近时期发生得比过去为多，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决不应该认为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说来，在人民推翻了共同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我国人民已经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团结。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整个地说来，存在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建树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前进的响导。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根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一般是拥护他们的领导者的。但是这不是说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没有矛盾。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但是从根本的性质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属于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经验证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一般地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採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事实上，凡是我们的工作作得较好、对群众的联系较好、群众的觉悟较高的地方，这类事件就很少发生。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

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从全面的认识出发，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从最近情况看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至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为了从根本上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而在发生事件后避免采取错误的方针和办法，中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引起全党注意和统一全党认识的必要。

（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为了使人民内部矛盾能够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得到解决，必须及时地了解和正确地处理群众对领导的意见和要求。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不但不注意去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在群众向他们提出意见和要求之后，也是拖延敷衍，不去积极解决那些必须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甚至采取欺骗办法和压迫办法。这种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坚决克服。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的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工厂和学校中扩大民主，是依靠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的步骤。

在工厂方面，应该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党委应该领导工会、青年团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并且领导和督促工厂行政部门正确地、迅速地处理和给群众以答复。各地应该在企业中积极试行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它的职权大致可以初步拟定如下：

（1）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且提出建议。

（2）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

（3）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领导人员。

（4）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的时候，可以向上级管理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

党委必须正确地处理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同本单位群众的局部和暂时利益的关系，应该正确地表现职工群众的意志，又要力求使它不致作出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决议，如果职工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是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纠正。

在学校方面，虽然不能由学生会和学生代表大会执行监督的任务，但是学生会、教职员工会，青年团组织和党的支部会议都应该能够充分地自由地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在有民主党派的学校，应该尽量吸收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并且注意随时征求他们关于改进校务的意见。力使听取群众意见的方式成为固定的制度，各学校可以在教学期指定一定的时间专门的让学生和教员提出意见。对于群众所提的意见，学校行政当局和党委应该迅速加以讨论，迅速给予答复。凡是应作而又可能作的，应该接受执行；凡是不应作和不能作的，应该向群众公开解释，不要随便许愿；凡是自己不能解决的，应该向上级报告请示。

上级组织在调查工厂学校情况的时候，除了听取行政当局和党委的意见以外，必须注意

听取职工、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职工和学生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推派小型的代表团到任何上级组织去请愿，或者向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员请愿，应该认为是完全合法、完全正常的行动，不得作为"闹事"看待。

（三）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思想政治教育近年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不少官僚主义的领导者在工作中不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不作群众工作，不了解群众的情况和情绪，单纯依赖行政力量的强制和物质利益的刺激。我们必须彻底地批判和纠正这种官僚主义态度，切实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密切地注视群众的思想动态，认真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

由于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应该针对这种情况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群众深刻了解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准备实现共产主义，而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的，就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应该通过生动的事实教育群众，使群众觉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一般地说来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落后，不可能在短期间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求得解决。本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高级机关的领导人员都必须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为群众所关心的当前问题。在这些讲话中，必须采取老实态度，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满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许愿，使群众在诺言不能兑现时感觉失望受骗。应该把困难的情况、原因、性质和解决办法告诉群众，领导和动员他们共同克服困难，使他们对困难有准备，对前途有信心。应该使群众了解，我国目前还处在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渡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干部经验有限，人民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认为在全国解放后的短短几年内，什么事情就都可以做得十全十美，社会和个人的各种需要就都可以完全满足，这纯粹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幻想。而且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生活也仍然会有困难，工作也仍然会有缺点，人民内部也仍然会有矛盾。但是这种困难和缺点本质上不同于剥削制度，它们是完全能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不同于敌我矛盾，也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为了便于教育和动员群众，为了加强同群众的团结，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

经验证明，尽管很多工厂和学校的条件都有困难，工作都有缺点，但是只要领导人员注意发扬民主，注意及时解决群众中的迫切问题，注意思想政治工作，这些地方的群众的意见就比较少，闹事的现象就更少。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群众是信任和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他们是愿意为了将来的理想而忍受暂时的困难的。如果各个单位认真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加强教育，我们就一定能够避免罢工罢课等类事件的发生，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就一定可以不断地巩固起来。

（四）但是如前所说，在全国的领导人员中，不愿意接受教训改变作风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有的。他们既不联系群众，又不给群众以享受民主权利、按照正常方式提出批评建议的机会；群众中有了问题，他们既不解决，又不解释，甚至取采种种错误办法对待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把群众逼到非闹事不可的地步。因此，就全国范围说来，少数的罢工

罢课和群众性的游行请愿一类事件的发生还是完全可能的。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应该是：（1）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第一，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有些理由不充足、有违法行为的群众闹事，固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因为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如果群众中有坏分子从中煽动，也可以使这种坏分子在斗争中暴露和孤立。至于理由充足、没有违法行为的那些群众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从根本上说来，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2）因此，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但是除了发生重大破坏行动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得捕人，不得以军警包围或者以其他方法使用暴力。（3）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作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判。既不要因为群众闹事就不承认他们的合理要求，使闹事的原因继续存在；也不要因为群众压力就接受不应该接受和不能实现的东西，或者使闹事者特别占了便宜，给他们以别人在同等条件下所不能得到的待遇。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4）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凡是犯了错误的都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但是一般地不要挫伤广大群众的情绪，也不要挫伤好干部的情绪，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办理。

在群众闹事的问题上，党委和党员应该遵守以下原则：（1）无论行政负责人是否党员，党委对于行政方面的意见都应该用正常的方法提出，并且应该向群众宣传按照民主集中制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提出和解决问题。党委和党员个人都不允许主动地领导群众用闹事的办法反对行政当局。（2）在群众已经非闹事不可的时候，党委应该指定一部分党员甚至全体党员参加，以便掌握领导，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不使群众被坏分子引向错误道路。党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真正合理的要求。而不要为官僚主义分子的恶行和上级的错误措施辩护。但是党员不应该提出无理的要求，如果群众中有人提出无理要求和反动口号，应该加以批评和驳斥。（3）党员在群众闹事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随时向党的领导机关报告请示，按照领导机关的指示行动。如果违犯纪律，应该分别情况，慎重处理。一般地着重教育，除情况特别严重者外，不要轻易开除他们的党籍。以上原则也适用于团委和团员，但是对于团员错误的处理要更加从宽。

（五）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委、县委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illegible]

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

（六）为了总结经验，取得教训，各地应该将最近时期所发生的各种罢工罢课游行情愿等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处理情况写成材料，加上评论，发给干部阅读讨论并报告中央。

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处理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生闹社退社情况的简报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去冬以来，在我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十二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二七八个高、初级社，七百多个生产队的范围。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来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牲畜的饲料饲草等公共财产；有的社员殴打社干、乡干和工作组的干部，闹得较严重的有永城县的苗桥、回村、双桥，民权县的浑子，虞城县的寓贤、袁寨，商丘县的刘口和临汝县的杨娄、古城、双庙、高沟等十余个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据不完全统计，共殴打干部六十三人，拉走牲畜四九一六头，私分社内粮食十二万五千余斤，种子二万四千余斤，饲料二万五千余斤，饲草二十五万余斤，油料三百九十多斤，农具二百多件，柴火五万二千余斤。参加闹社的人，一部分是过去有轻微剥削、有副业或其他特殊收入，而入社后减少了收入的上中农；一部分是劳力不足或缺乏劳力而生活困难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还有少数是过去从事小商小贩或其他职业，因自由市场开放后而要求从事其他活动的人；还有个别的是好吃懒做或出身不纯的人。而且闹社退社的事件大都发生在边沿地带和工作基础差的地区。闹社退社的开始，一般是由于向社要求处理个别经济问题或分配中队与队经济不平衡等问题未能合理解决而引起的；也有的是减少收入的上中农和劳力少、生活困难的户，由于他们的困难未能很好解决引起的；还有的是社、队中个别党、团员或干部思想落后，工作消极、躺倒不干、处理事情不公或有贪污盗窃行为而引起的；也有的是由于社内有问题，但未得到解决，或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派矛盾或被敌人和坏分子插足进来挑拨活动而引起的。闹的方式，一般是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串连，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而后壮年也参加；先几个人、几户，而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的范围内；也有的是先初级社后高级社。由于闹社退社的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生产，使闹社的社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局部地区影响了社会秩序。临汝县老连社，元月时小麦才种40%，干部和社员对合作社的优越性动摇了，有些社干部对领导办好合作社失去了信心。民权县浑子乡，元月间因闹社使

生产停了一个多月；虞城县寓贤乡，元月间冬耕地只犁到18.6%，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好喂，丢了没人管，七天死牛十一头，丢失小牛八头

部分地区发生社员闹社退社的主要原因，是实现高级合作化后，广大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由敌我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各级领导和农村工作干部对这种新的形势认识不足，加之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在建社时工作粗糙，建社后政治思想工作跟不上，对建社遗留和分配中的问题未能及时认真地帮助解决。尤其对部分社员的困难解决不够。这些问题，在进行年终决分工作时，都集中地暴露出来。其次是转高级社时间不长，干部还缺乏管理集体生产的经验，生产没有计划或计划不周到不全面；劳动管理混乱，工分不平衡，定额不合理；财务开支大，开支乱，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现象严重；农具丢失、牲畜饲养管理不善等严重现象未能及时解决，致使社员对办好合作社和依靠社发展生产有了怀疑和顾虑，再加分配时有些社员减少了收入，这就使这些人产生了闹社退社的思想。再次，部分社工作基础较差，干部较弱，贫农的优势不巩固，党、团组织形不成领导核心，起不到应有的骨干堡垒作用。甚至有少数干部作风恶劣，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多占，打骂社员，严重的脱离了群众。这也是促使社员闹社退社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四，有少数人阶级观念模糊，认为地主、富农都入社了，成了一家人了，放松了对地主、富农的管制和改造。而地主、富农分子和坏分子的造谣挑拨，破坏活动也造成闹社退社事件的发生。

闹社退社问题发生后，由于各级党委领导的重视，及时派人调查研究和积极的进行工作，部分地区闹社、退社的局面已经扭转了。闹社的不闹了，退了社的回来了，垮了的社又恢复起来了，并在处理闹社、退社过程中还吸收了一批单干农民入了社。现在这些社的生产秩序也已恢复正常。从这段处理闹社退社中，我们初步获得的经验教训是：

第一、加强闹社地区的领导，是解决闹社退社问题的关键。闹社之前普遍存在麻痹观念，闹社问题发生后，由于存在有官僚主义，事前不了解情况，随着又产生了惊慌失措，因而对闹社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合作化的规模太大了，甚至有个别的怀疑合作化制度是否有优越性产生了埋怨情绪；另一种不深入了解情况，认为发生闹社退社的完全是上中农的自发势力，资本主义思想，或者是敌人的挑拨破坏，产生了急躁蛮干情绪。各地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一般强调了思想发动，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批判了上述两种偏向，领导亲自动手，并抽调干部，组织了较强的力量，深入闹社退社的农业合作社。广泛地宣传高级社的政策和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了解社员的真实思想和要求，帮助社干部分析研究，正确认识社内情况，找出发生闹社退社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正确加以解决，凡是这样解决的社，工作进度都很顺利。如民权县委派了十个干部到闹社严重的泽子乡，这样帮助工作后，不仅退社的回来了，而且七个高级社又扩大三百一十户，十六个初级社并升为高级社后，又吸收三百二十一户单干农民参加了社；现在全乡只有二十八户单干农民。社内的生产已普遍搞起来，社员们都在积极积肥追肥、锄麦耙麦。每日劳动出勤率达到59%。事实证明，高级合作化是有无比的优越性的，当前合作社内的问题，主要是社员内部的问题，只要能正确认识，并采取正确方法去对待、处理，合作社就可以办好的。但有的乡、社，由于对发生闹社退社的问题认识不清，因而采取了错误的办法来对待。民权县顺河乡的干部就是这样，他把闹社退社的农民认为是敌人，又加以破坏社会主义的罪名，打群众九十六人，农民teen胜斌被打后吐血而死，朱世明被逼自杀。这样虽然闹社问题被压下去了，但社员的情绪普遍低落，无心生产。也有的社对发生闹社退社问题束手无策，已退社的退了，闹退社的还在闹。中牟县

有闹、退社的到乡、到县、甚至来省跑了七、八趟，仍未认真处理。

第二、划清是非界限，提高社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是解决闹社退社问题的重要因素。在这次解决闹社退社问题时，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工作方法。一种是群众路线的方法；一种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方法。实行前一种方法解决的是：首先召开了党员大会。整顿党的组织，提高党员认识，然后召开扩大干部会，从党内到党外总结合作化的优越性，进行党的革命目的和两条道路的对比教育，通过联系实际。采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找出缺点，提高党内外干部思想觉悟，加强全体党员团结，树立党员干部积极工作的信心。在此基础上，组织干部深入群众进行座谈访问，了解社员思想和要求，根据各种不同人的思想情况，分别召开小型座谈会、代表会和群众大会，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讲解合作化政策，表明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办好合作社的决心，一方面要批判拉牲口、分粮食、打骂干部的错误行为，提高社员觉悟，另一方面也要发扬民主，让社员提出意见。对社员的正确意见加以接受；错误的意见让干部和社员共同讨论，划清是非界限，从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树立办好社信心和决心。虞城县寓贤乡的一些社，通过这样方法，并依靠贫农串连，恢复了一个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三十九个生产队，有三百四十七户表示不再退社，并把牲口自动送回社里。永城县马桥乡实行了后一种办法，专门召集闹社退社社员开会，并采取捆绑、吊打、管制、扣押、罚跪等办法。这样虽然出社的社员又强迫入社啦，拉走的牲口又送又来啦，但群众怨声不息，反映"政府的政策变了"，个别社员准备暗暗逃走。这一教训必须记取，而且必须做好善后工作，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第三、贯彻互利政策，解决具体问题，解决社员的具体困难与合理要求是很重要的保证。中牟县，在解决社员闹社退社时，主动的修改了处理经济遗留办法的措施，重新由社和社员进行协议，并对减少收入后生活有困难户，进行了适当照顾，社员很满意。该县西春岗社在年关前后，除给社员分副业生产款一千三百元，发放救济款二百五十元外，又用盘仓清帐的办法分给社员小麦一万一千斤，杂粮九千九百八十七斤，社员过春节时不仅吃到了饺子，而且都有零花钱。虞城县寓贤乡，并对退社社员拉走牲口时期吃的草料，喂牲口用的工数和积的肥，都酌情给予了适当的报酬；对拉走后卖掉或死亡的牲口，也用合理办法分别作了处理，社员反映很好。总之，在解决闹社退社问题时，抓住解决具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灾区社更为重要。

第四、抓好当前生产工作，组织社员生产，安排好社员生活是解决退社闹社问题的中心关键。有不少社在处理闹社退社问题时，一方面抽出干部解决闹社退社的具体问题，一方面积极进行生产整社工作，制定了社的生产计划，实行了包工包产，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同时还帮助社员订出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的计划。这样，没有闹社退社的社员解除了思想顾虑，大家齐心了，生产积极了，情绪稳定了；闹社退社的，经过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问题，同时回看到社的生产有发展前途后，也自觉的忏悔，有的甚至自动向社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再闹出社了。

第五、加强农村专政，也是处理闹社退社问题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虽然在实现高级合作化后，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由敌我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必须认识还有一些反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对农业合作社的破坏活动还是有的。有个别的虽已摘掉地主帽子，但反动思想仍然是有的，有机会就活动。因之，他们在上中农闹社退社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不能不进行破坏活动的。所以，在部分社员发生闹社退社时；必须提高警惕，揭发敌人散布的谣言，号召群众检举，深入调查了解，严惩有现行破坏活动行为的反革命分子，以保卫

农村安全的生产秩序.

目前，闹社退社问题已基本上解决. 但是，必须认识，由于闹社退社的损失和对生产的影响，给春耕生产带来了不少困难；而且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高级合作化才刚刚一年，不少地区还没有办社经验. 各级领导都还存在有程度不同的官僚主义，干部作风也不是一下就能转变好. 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由敌我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因之绝不能以此而满足，今后闹社退社的问题还有可能发生. 我们必须加强工作，时刻警惕，认真地进一步总结闹社退社的经验教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和工作中的缺点，争取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巩固下来.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

我们的党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的结果.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 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 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 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 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 因此. 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二）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 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

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关于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本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阶、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关于这一方面学习的计划，将来另行规定。

（三）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四）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历史上长时期是同工农兵群众同甘共苦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有许多同志在这一方面是退步了。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

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应该先从党内的少数人员作起。这种体力劳动，那很怕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规定一些具体办法，中央将另作专门指示。

（五）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各单位应该组织领导小组，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抓紧领导。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转自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观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

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但是，在报导中，有三类言论必须加以领导和控制，即：（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其中包括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以上各点，请即召集党报负责同志加以布置，至要。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关于如何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问题，中央在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两次指示中已经告诉你们。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中间分子的批评，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处

的，但大多是侧重批评方面，而正面的言论还较少，特别是由他们出面来驳斥右翼反动言论的更少；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时不讲的方针。因此，在最近的报纸上，很自然地表现为批评、不满甚至谩骂的言论占了主要的篇幅。这在前一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报纸这样报导的时间过长、分量过大，特别是正面言论太少，是不利的。为了"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五月十六日指示），各地党委必须根据本地运动的发展情况，切实加强运动的领导。为此，中央提出如下各点，望加注意。

（一）各地党报的报导方针，应该是：甲、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但是右翼分子言论在报上所占比重应逐步缩小，特别是那种一般性批评和谩骂的东西，更应少登或不登。乙、特别注意登载中间分子那些比较公道的、批评右翼分子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这种言论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丙、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宜过多，特别注意登他们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不要登他们那些没有说服力和火气太大的，特别是"乱扣帽子"的东西。丁、应该登载关于改进工作的事实报导，并且告诉同志们怎样去改进工作。戊、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二）根据上述的党报宣传方针，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应该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发言，特别是某些中间分子的发言，以便据以报导。

（三）为了避免因力量分散、照顾不周而出乱子，目前运动的方面千万不要太多。在最近期间，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到处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因为工人、学生一经发动起来，就会提出许多具体要求，没有很大精力是处理不了的。因此，在报纸上，目前不应挑起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不要登载对经济政策、工资政策的争论。如果发生了工人、学生闹事的事件，应该采取说服教育、合理解决的方法，迅速处理下去。

（四）关于工厂、学校领导机关的整风，也要作适当的安排。大专学校应该结合当前党外知识分子的批评运动进行整风，并且要适当地注意听取学生的批评（要注意掌握分寸）；但是在中等学校和小学校的整风运动，暂时就不宜同时展开，等到大专学校告一段落之后再去进行。工厂的整风，目前就可以逐步开始，但可先在一部分厂矿中进行，也不要一下子同时展开。一个工厂的整风时间，可以放长一些，并且分段进行，例如先在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范围内进行，而在工人群众中则先做一段政治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工人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不是为的整所谓落后工人，如果这样做，那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五）这一时期，由于党外人士的尖锐批评，而我们的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又还没有表示意见，使得一些基层单位的党员干部感到惶惶莫知所措，有些同志甚至感到有些冤屈。这种情形应该引起注意。事实上党外人士的批评，大多数确实讲得很对很好，对我们党和党员有很大的益处；但是不是所有批评都是对的。我们对于对的批评应该接受，并且要研究切实的办法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对于那些错误的批评，也将在适当时候加以答复。在这些批评中，确有不少是我们下级领导机关或者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毛病，应该告诉他们善于

从这些批评中取得教训，借以改正自己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错误；但是也确有许多事情是不应该由下级领导机关和基层干部去负责的，特别是过去那些大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中所犯的毛病，有许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责任应该是由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去负的；至于那些国家制度上的毛病，更不是下面同志的事。上面这些道理，请各省市党委召集基层干部的专门会议讲清楚，使他们心中有数，以便虚心地听取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团结党外人士大多数、改进工作，孤立右派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对于确实可靠的党外左派干部，也要适当地打个招呼，使他们心中也有数）。

（六）五月十四日中央告诉你们，在报纸和宣传上必须注意控制的三点（即关于市场物价、外交政策和肃反具体事实的言论），仍望随时注意检查，不要在这几方面出毛病。

以上各点，请你们结合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两电一并研究执行。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一九五七年五月）

《人民日报》编者按：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在报刊上，很多党外人士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以及对党和政府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党组织更应该继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只可以邀请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而且还可以采取个别谈心的办法，更充分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五月八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对统战工作提出意见，这是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顿作风的好办法。

五　月　八　日

从党在去年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到底还有那些问题？在我们全党即将展开整风运动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希望我们通过整风解决那些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问题？这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今天下午邀集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的中心议题。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先后就召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近年来检查党的统战工作的状况、当前党派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李维汉部长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

平杰三副部长说，从去年三月到目前检查的结果来看，各地执行统战政策比以前有了进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比从前有了很大改进；各民主党派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关于宣传民主党派的活动方面也比过去作得多一些，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很多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强联系和帮助的问题，基层组织的党派关系问题等，都须要加以研究。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副主席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发言。

章伯钧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曾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会上，有人说：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章伯钧说：有人说：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员人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章伯钧说：有人认为：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没有下文，没有交代。如去年统战部无准备地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再如一九五〇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章伯钧还说：民盟中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得不够。有人认为，民盟中央"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方针无独立见解，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还有人认为：统战部单靠开会提意见不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深入访问一下，个别交谈。深入访问时，不要只找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还要找找下面的人。

许德珩在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许德珩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他说：首先干部问题在九三学社总是很难解决，需要调来的人不能来，在职干部不安心工作。从去年到现在统战部只介绍来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到现在还在动摇。三年前曾介绍来一个青年人，后来走了，他说他是学历史的，非走不可。再有一个问题是：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其中有些人，就要求退出原来在社中担任的工作：南京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和杭州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我们就想：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既然是长期共存，无论如何要有人来搞工作，无论如何要有组织成员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敢检查统战工作。如何解决呢？许德珩说，现在我们呼吁统战部帮助，也就是带了病，请统战部给药吃。他还建议恢复双周座谈会，解决"一道墙，一道沟"的问题。

陈铭枢在谈到高等学校中的各种组织的作用时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还说，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但是，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只是党组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注意，对于一些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同党外的负责干部共同商量。他在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时说，党员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立场，但是如果“用非所长”终究不能成为“俊才”。因此，他希望党对学校中的领导人，能够做到“用其所长”。最后，他谈了如何密切党的领导干部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说，他曾经参加某中学校的党员与非党人士的谈心会，感到很好。他希望今后能够树立起党员与非党人士交谈的风气，消除彼此关系冷冰冰的现象。同时，他希望全国政协能够恢复双周座谈会。

章乃器发言时说：共产党不干涉民主党派内政与互相监督如何结合？这个问题要研究。我认为民主党派可以检查统战部的工作，统战部也可以检查民主党派的工作，民建就欢迎统战部检查。接着，章乃器批评了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他说：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认为党要明辨是非，否则，就不能达到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他说：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对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谈到这里，章乃器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还批评了民建内部的宗派主义活动，他说，这种宗派主义是有形无形存在着，有些人摆出党员的架子，好像代表共产党在执行领导。

在谈到对工商界的宣传教育工作问题时，章乃器认为这方面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很严重，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中的教条主义就不少。这篇社论对于工商界积极的一面讲了，对于消极的一面讲了三点：消极自卑，违法乱纪、盗窃资财，骄傲自满，这三条究竟那一条是主要的，很不鲜明。有人对我说：私方违法乱纪、盗窃资财的百分比绝不比合作社、国营工厂来得多。说工商界消极自卑，也不能完全怪私方，还要看公方是否创造了条件。其次，文章中片面强调要服从公方领导，这也有问题，如私方当正厂长，片面强调服从领导，就必然有职无权。还有，文章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因此，他认为，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对工商界消极的一面，要弄清哪些是主要的毛病？哪些是次要的毛病？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十多人。

五 月 九 日

下午座谈会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

胡子昂说，在目前形势下，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需要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不是紧密而是相对的疏远了。比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党没有与民主党派共同研究一套如何进行互相监督的具体措施，原来有些地方对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帮助，现在反而一概不管了。胡子昂建议从组织联系的角度上，建立一套有关工作关系和工作方法上的办法和措施。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认为自己是被改造的分子，怀有阶级自卑感，怕"放"、"鸣"出来的东西不被重视；更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有的同志说，我们对有些政策不是没有意见的，工商界可"放"可"鸣"的东西是不少的，但有人说，政策不能争鸣，又有人说，政策可以争鸣，但不可以公开。

胡子昂还分析了民建内部的矛盾，更具体地说，就是民建内部对目前工商界的估价问题。他说，从各方面反应的资料看，目前对工商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一种认为工商界在企业合营后，经济基础已起了根本变化。因此，在合营企业里，只有合作共事关系，没有什么阶级关系，也谈不到有什么消极的一面。他们认为对工商界要采取多鼓励的方法，工商界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如果强调有两面性，就会增加工商界的自卑感，越发束手束脚起来。另一方面的意见是，工商界同志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下，觉悟不断提高，其中许多人已具有了"闻过则喜"的精神。因此，对他们的成绩加以鼓励，对他们的缺点提出批评，不仅不会影响积极性，相反的，可以提高他们和加速他们的改造。胡子昂认为，应该把这两种不同意见，公开地让大家争鸣一番。

胡子昂直率地批评了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许多地方党群关系尚有距离，表现为"敬而不亲，亲而不密"。有人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像有一堵墙，一道门槛，这堵墙，这道门槛虽然不一定很厚、很高，但是，不应该存在。胡子昂并举例，如几个党员在一起谈话，有一个非党人士进来，谈话便马上停止，非党群众对于党员也有这样情况。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有人认为，目前有些企业的党组织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均先行一步，并有一套文件，这是好的，可使党员事先心中有数，但是，私方负责人会在工作上受到影响。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胡子昂说，民建干部存有"三不管"（政府不管、工会不管、统战部不管）四不像（不像民主人士、不像工商界、不像机关干部、不像工人阶级）思想。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解决这些问题。

陈其尤发言说，机关中民主党派的成员肃反时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陈其尤认为，是不是因为不信任？还是因为把民主党派当作一个与它的组织成员不相关的机关？但是无论是什么理由，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保密问

题，而是是否守法的问题。陈其尤还提出：国家的民法、刑法应及早制定并切实遵行。

陈其尤还认为：致公党很少有机会参加北京市一级的活动，市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致公党的代表，市政治协商会议没有致公党的委员，市一级的其他各种政治活动也没有致公党参加，据说因为致公党现在还没有北京市一级的机构。陈其尤认为没有市一级的机构，并不等于没有工作可做，更不等于不要参加政治活动。

为了接待华侨，陈其尤认为应该给致公党一所比较像样的房子，目前，致公党党部的房子，实在不够用。致公党的房子原是北京办事处时期九个人编制时用的房子，现在中央编制比过去增加了几倍，不够用的程度可想而知。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时，陈其尤建议：民主党派对其有关的政策方针、资料应该有所了解。否则无所准备而监督，也无所准绳而开展工作。但是，陈其尤同时认为：我们不是要求参加所有的会，获得国防机密资料，而是对我们的工作有关的会，应请民主党派参加。

王昆仑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权机关中是否发挥了作用的问题，作了发言，他举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情况为例，指出这方面的三个缺点。在发言中，批评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他说：民革同志反映：人大常委会了解情况少；具体讨论少；个别接触少。由于常务委员对国家情况不了解，常委会在讨论议案时，往往是临时讨论，这样讨论起来就有困难。

有人说：为什么重大议案拿出来讨论时，尽是民主党派发言，共产党员却不发言？是否是先讨论好了，再告诉我们的。还有人认为：国家重大的方针、政策，一次会上就通过了，这样发言流于形式，应该先开小会讨论，以后常委会讨论。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王昆仑认为：在政府机关中有的民主党派成员是有职有权有责的，但也有许多人是有职有责而权不够的。有人批评民主党派有作客思想，他认为应进行具体分析，看看是不是把我们放在主人位置。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把所有意见拿出来，大胆地批评共产党。在谈到对统战部的意见的时候，王昆仑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但是也有人说，"上"是不是都统够了，还成问题。中、下情绪不安，愿到机关去，不愿作党派工作，主要因为统战部不重视他们，因此，他希望统战部同志应该多和他们接触。王昆仑还提出房屋困难问题。

接着发言的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他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对座谈会上已有的许多发言，都有同感。希望今后每两周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但是，单是这样的座谈会还不够。还应该定期地召开党务工作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员可由各民主党派自行决定。统战部可以通过这样的座谈会，了解各民主党派在党务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以便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然后他谈到，过去的统战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比如，在农工民主党建立组织，分清敌我，整顿党务工作中，统战部就给过不少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都起了团结和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但是，统战工作也仍然有许多作的不够的地方。他希望统战部今后能够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思想领导问题；二、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在发展组织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发展组织的方向问题；三、帮助解决民主党派间的是非问题和民主党派领导

层的团结问题；四、帮助各民主党派办好光明日报；五、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房子和干部待遇问题。

谭志清发言说，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人员，希望民建会的干部在工作、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能与其他机关的干部机会均等。有些现象，使得民建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感到在民建作党务工作，不如在政府机关有前途、有熬头。这种现象，与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甚至也不统中的现象有关。比如，统战部对于民建机关中的处长级干部，就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在工作中有不少困难，比如，民建现有一百四十个地方组织，其中直辖单位也有二十多个，他们遇有困难问题不能解决时，不断向民建中央写信要办法。因此，希望统战部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并且能够成为他们同中央各部，比如中宣部之间的桥梁，使他们能够知道一些在刊物和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给他们一些作好工作的本钱。

闵刚侯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民盟干部在学习以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考虑很大，有些同志说：民主党派是"万岁"干部是"万死"。还有人提出：民主党派处一级干部究竟相当于政府那一级？闵刚侯还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作了批评，他希望统战部今后多联系一般干部。

• • •

会上，因为很多人士都提出了举行双周座谈会的意见，根据李维汉部长的建议，各民主党派都推举出代表，拟于日内共同商讨有关实施方面的具体问题。这些代表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谭志清、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广平、中国农工民主党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严希纯、九三学社茅以升等。召集人是罗隆基。

五 月 十 日

今天下午，继续举行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务委员楚图南，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曾昭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等。另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因病未能出席，作了书面发言。

邵力子在会上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邵力子谈到，半年来，中央统战部和各地统战部门对民革的社会联系工作做了许多帮助，联系对象多了，民革会员也发展了不少。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中，有许多人需要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民革不加以联系，政府也应予以解决。怎样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他举一个例子说，可不可以考虑从扫盲工作中解决。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如能担任扫盲教员，每月取得一定的报酬，生活、职业问题解决了，也对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分责任。

第二个问题，邵力子谈的是党政关系。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

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第三是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说，互相监督，过去也曾有的，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监督，首先要有人。在政策、方针执行中，下面的问题多。可是民主党派在下面很少有组织。邵力子主张民主党派如果发现甚么地方有发展对象，就写信向当地政协联系。参加民主党派的新的成员的教育工作，由当地政协来负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民主党派都需要发展地方组织，而是有条件的才去发展。

罗隆基发言说，昨天有人提到，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这种论调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呢？这是因为，自从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理论宣传还没有跟上去。所以现在，只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足够的估计，而国内的许多人士，以及许多外国朋友，还是估计不足的。他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如果没有民主建国会这个组织，就未必能进行得这样快。民革对和平解放台湾做了不少工作。对于这些事实，他认为要多作宣传。

他在谈到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时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他认为，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因此，他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他说，这是民主党派有名有实，要使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例如，今天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科学规划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参加会议，周总理说，各民主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应该参加。另外他谈到，要想使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党政分工就要明确。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他认为，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过去的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可能也有些偏差。现在，李部长说“矫枉不怕过正”，会使各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因此，这个问题还应再作讨论。另一方面，要讲平等、独立、自由，也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现在有些制度、规章，有碍于平等、独立、自由的实行和民主党派使用的发挥。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检查、修改。

史良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认为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她认为，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那个阶级的思想意识仍然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

存在，这就需要民主党派存在，继续进行工作。如果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觉悟都提高了，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民主党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大家思想都改造得很好了，将来共产党也可以消灭。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接着，她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她说，只有一点不大好，就是我常常由于相信党而产生依赖思想，认为党决定的都是对的，而不能独立思考问题。现在党提倡独立思考，大家就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从不同的角度独立思考问题，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不能理解为只是民主党派对领导党的监督，这也是不平等。要平等，就得互相监督。讲权利义务是相对的，不能只有权利不尽义务，民主党派有监督的权利，也有被监督的义务。

史良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更加团结。

李维汉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他说，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楚图南就民主党派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作了发言。他说，民主党派成员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并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原因是一方面民主党派本身对成员的教育不够，另一方面是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希望统战部研究解决。

过去民主党派成员在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中起过作用，今天，向科学进军也要发挥作用。但是因为和党委的宣传部门、政府的文教部门联系不够，有些方针、政策问题不能及时了解，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民主党派的组织作用。这种情况在北京还较好，在地方上就差了。希望今后能够和这些部门挂起钩来。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专职干部，虽然统战部由中央到地方对他们都作了安排，如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但是对他们的培养、提高做得不够，不仅是待遇问题。希望能够给以适当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能够提高，能够同各方面取得联系。不要使有些在民主党派组织中工作的同志觉得自己工作做了，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知道，是做的“黑市”工作，因而不安心工作。

王绍鏊说，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

他随即分析这座墙起来的原因。这原因，是因为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的语言不同、语言不同，就容易发生问题。如有人把汽车司机喊作汽车夫，就可能引起误会。因此他说，与党外人士合作，首先要懂得他们的语言和习惯。遇到象上面一类的误解，党员应该诚恳地告诉对方，以后就会改正的。但是有的党员不这样做，对方说错了话，不帮助纠正，反而记在本子上，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都搬出来整人。虽然其中可能有的话有思想问题，但大部分都是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带来的。他说，语言习惯不同，在共产党内也有，如从延安来的和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有时就不完全一样。上述情况，遇到性情急躁的人，就会更糟。性急的人，

党内和党外都有。因此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两方面的人。这一点很重要。语言习惯看来事情小，但是影响大。

曾昭抡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本身还没有作好工作，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某些制度还没有改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他谈到，过去讨论国家体制问题，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各个方面的体制，在各个方面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也都参加讨论过。但对这样大的问题，民主同盟中央却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他觉得，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他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意见。

第一个意见，他认为，三反和肃反斗争，成绩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但是也由于有一些缺点，发生了不少副作用。"三反"斗争中的副作用，到现在五年了还没有完全消除掉。政府是不是想办法加以消除，这会有利于统战工作的。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容易反映到上面来，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因为没有组织系统，反映上来就不容易。曾昭抡说，这算不算统战工作中的一个漏洞？他建议今后要给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意见的机会。

陈铭枢最后发言。他谈到，文教界的党员负责干部，有的用非所长，这种情况特别在高等学校中为严重。他希望能够深入调查一下，给他们重新调整工作。他认为现在整风期间，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的作法，从全国范围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十日的书面发言如下：

维汉部长：关于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我在政协会议上已经发了言，其中我的建议四点，即（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这四点建议，希望你加以考虑。其他没有什么意见。

五　月　十　一　日

今日继续举行座谈会。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另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

王一帆首先发言说，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认为不仅是民主党派加重了责任，而且统战部同样加重了责任。但统战部的指导思想，过于强调了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平等，以致应该管的未管，应该做的未做。

一年来，领导党和统战部都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还有不少问题。我以为这是由于统战部的工作方法不对头，没有很好根据各民主党派的特点进行工作，在实际工作上还有很多不符合需要，工作不深入。如长期共存方针，就未很好地和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商量。当然我们自己也未主动。另外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解决房屋和经费问题。

对于某些机关不重视统战工作的情况，王一帆也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单位的兼职统战委员，对统战工作不重视、不热心，严重的简直形同虚设，没有起作用。有些机关，当学习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统战工作的讲话的时候，对统战工作就比较重视，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领导上也保证要改进工作，但事过境迁，又把那些意见和保证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些情况不知道统战部了解不了解？

最后他说，毛主席说党内有90%的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认为应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扩大群众的民主生活和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来提高大家的认识，搞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熊克武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的时候说，这是职责划分和有关制度建立的问题。应该确立合理地分工负责的制度。应该看到那种以人为转移而有权责和无职责的现象，会使宗派主义滋长和发展。他说，其实我们已经有最好的制度，这就是分工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制度。为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制度呢？这需要检查。他谈到，职和权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既然使他有职，有什么理由不使他有权、有责呢？如果是由于政治信任的关系，那末不但有权有责需要考虑，就是使其有职也应慎重。他还谈到，没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人，就不应使他在其位，具有优越才能的，使其在其位，就不应使他"不谋其政"。这是关系人事制度是否健全，人事安排是否妥当的问题，尤其关系国家机构能否正常地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他说，搞好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解决上面这些问题是不容或缓的。

熊克武说，解决有职有权有责问题，也是"拆墙"、"填沟"的工作之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近来又通过对统战工作的检查，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已经大大消除，但还不是融洽无间，仍然要作进一步努力。他还举出了重庆市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关系不协调的两个例子。他认为隔阂是来自双方。因为彼此间思想不对头，作风有问题，因此应端正思想，改进作风，加以纠正。他说，这次整风也会引导党外人士加强自己的学习。他还建议民主党派尽量鼓励成员在自愿原则下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他还提出了关于健全法制的意见。他说这不仅有关肃反工作，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法制不完备，政策方针的宣传不够深入，不但人民群众对某些事务感到模糊，就是有些领导人有时也免不了表现出无所适从。他举例说，有一个人在三反时被捕了，至今还没有明确宣示处理情况。他说，这个案件使人民群众发生了模糊的认识。假如法制完备，有了法律依据，不但不会使人发生这样模糊的认识，并且能教育他们辨明是非，分清敌我。

千家驹谈了几个问题。

一是有职有权问题。他说，各机关存在程度不同的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现象；有职有权的也有，但是少数。一般说，如果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水平高，有民主作风，非党人士权就多一些；如果党员作风偏狭，宗派主义情绪严重，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就突出。高教部和教育部住在一个院子里，据说情况就不同。几年来，党中央和统战部一再强调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虽不能说没有改进，但为甚么问题仍然存在？他认为，除去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思想没有贯彻以外，还有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制度来保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来制约党

员的大权独揽。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党委或党组应该通过行政而不是直接布置工作。他说他所在的机关情况比较好，因为他列席参加党组会。

另外，他谈到，在机关工作的许多非党人士，不能掌握全面情况，许多会不能参加，许多文件看不到，因而无从发挥力量。党内文件、党内会议，非党员自不应阅读、参加，也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问题是有些行政系统的会议也常限制非党员参加，文件也是如此，总是"宁严毋宽"。其实有些会议并非党内会议，但党员有机会参加，而非党员就没有机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也是制度问题。

第二是关于提拔干部的问题。他说，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对非党知识分子进步性估计不足。非党员工作能力强，水平高，很少能发挥所长，更少提升（高级民主人士受到照顾者例外）。党员干部品质较高，政治可靠，这是肯定的，但过于着重这一条，不看工作能力，也不公平。甚至有个别党员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低。靠政治好，不解决问题，会给工作造成损失。这样用人不是用人唯能，或用人唯贤。这种情况，机关里较严重，科学技术界较好。接着他说，对政治情况复杂的人，自不应重用，但一般的都是政治进步，只因为不是党员而不受重用。

第三个问题是，他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服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这是不对的。

第四，千家驹认为在"三反""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账。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积极性在长期内不能恢复。千家驹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这种情况。

最后，千家驹批评了经济学界中个别党员同志的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认为这种作风应加改变，以团结广大的中国经济学者。

黄鼎臣在发言中，首先要求统战部对致公党的工作作更多的帮助。他说，致公党的工作对象是海外华侨，工作上有特殊困难，因为涉及到外交、侨务、财务、文教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很多，没有统战部的帮助，工作很难做好。他希望政府在派出国的贸易、文化代表团时，能考虑选派一些致公党中条件适合的人参加，以便他们在华侨中开展工作。他还说，致公党是小党，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很少，不能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很多华侨回国后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很多海外华侨都以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多少来衡量致公党在民主党派中的地位。有些参加了国家机关工作的致公党成员，现在也感到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参加致公党的活动和工作。

对于机关中的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黄鼎臣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组或党委对保证机关任务的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但是，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情况虽然有些改变，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会议，共同研究决定问题。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这样仍然只有党员可以看到，下面的非党干部就不知道。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

最后，黄鼎臣提到专家参加国际活动的问题。他认为过去有关部门选派专家参加国际活动，老是限于少数几个人。这样做影响很不好。虽然有关领导上主观意图是从工作出发的，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宗派主义，使许多不能参加国际活动的专家有意见。他主张把面放宽一些。

杨逸棠发言中谈到，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不仅一些一般党员认识不清，就是一些机关的党委负责人也认识不清。他举了一件事实。在湖南，有一个农工民主党党员，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她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后，她丈夫就提出要离婚，并且说：你为什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你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后来事情闹到机关的党委书记那里，谁知党委书记却说：你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吧！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有职有权问题，主要还是对民主党派的认识问题。虽然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双方可能都有责任，但主要还是领导党的问题，"因为是领导党嘛！"

杨逸棠还谈到，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对象多是知识分子。这样就发生了互相争取对象的矛盾。上海、重庆、长沙……等地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他提出，统战部应该帮助考虑各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重点，以便解决这种矛盾。

蔡廷锴说，他愿意提供材料，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但是，他下乡视察时，看到在县里和乡里同中央不一样。有的乡干部没有文化，不知道统一战线政策，也不知道我国有多少民主党派。有的地方宗派主义非常浓厚，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却被放在一边。他还说，在县里，权力集中在中共县委，而县人民委员会的权却很小。

蔡廷锴还谈到了民革联系社会人士工作中的困难，以及关于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问题。

冯宾符说，民主促进会是一个以中学教师为重点的党派，从大多数成员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地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但他们在精神上和内心里似乎还要求有所寄托，"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在许多成员的思想中还很深。他们上下探索"知己"使自己的魂魄有所安。他说，据我看来，这些人有很多愿意引共产党为"知己"的，因此，对于某些党员生硬的作风，冷冰冰的态度是特别敏感的。他希望针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来帮助他们会有更大的收获。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做好基层组织工作。他说，近来有些会员感到加入民进组织以后，与入会前好象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得到更多的帮助；个别会员反映，长此下去要退会了。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解决这个问题。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黄药眠还对统战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统战部接触面不广，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批评以后依然未改，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

神气。其次，统战政策到了省级就很难推动。有些党员对于统战政策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庸俗。第三、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缺少关心，缺少教育、培养、提升的整套计划，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 黄药眠建议：（一）现在形势改变了，许多过去的做法都应该加以重新考虑；（二）共产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应订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三）有些机关单位，如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行政领导放在共产党的与非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上；（四）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各机关单位应有一定的地位；（五）在党所指示的方针下，党与非党应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赛，有功则赏，有过则罚. 有能力的应升迁，无能力的、不称职的应降级。

李纯青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几点希望. 他说，最近我们决定要发展组织. 打算在天津、南京、武汉、福建四个地方建立新机构. 希望得到有关地方统战部的帮助. 他又说，几年来，从日本回国的华侨有几千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台湾同胞. 他们的家庭、亲戚、朋友都在台湾，不回台湾而回大陆，这是热爱祖国的表现. 台盟准备在台湾籍华侨中发展组织，进行工作。希望得到侨委会的帮助. 从去年开始，有些台湾青年逃回大陆来，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希望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安排他们的工作，给予温暖的照顾.

李纯青最后说，过去台盟提到统战部的问题，往往一拖再拖，排不上日程. 我不敢说统战部有官僚主义，因为台盟的事太小了. 不过 在统战部看是小事，在台盟可是大事. 希望统战部同志思想上不要看不起台盟.

五　月　十　三　日

今日下午座谈会继续举行. 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 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 另外，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严信民首先发言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就是解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平等的问题. 因为“共存”和“互相”就有平等的意思，只有居于平等地位，才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才有责任感，才能发挥积极性，好面子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看起来，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 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尽管民主党派内部有进步也有落后，但在社会上，在机关、学校，甚至大多数共产党员（更不要说青年团员），都认为民主党派落后，都瞧不起，处处歧视. 比如我吧，我是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之一，但几年来我从未介绍过一个党员，也从未在机关里提过农工民主党，苦楚可见. 当然，民主党派本身有政治思想性不强、组织不健全、干部条件差等弱点，可是它代表性大，高级知识分子多，做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要.

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 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派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象个样子. 否则，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 过去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帮助不少，但在事务上的帮助多，对民主人士上层人物照顾多，对思想上政治上关心少. 而且统战工作的面很窄，只听少数人的话，多

数人的话很少听。如我自己思想就不够开展，有问题也有意见，但统战部从未单独和我谈过，只有一次李部长和我谈过一下民委的工作，其他个别交谈思想情况就没有了。我个人曾向徐冰、于刚、汪锋等同志要求过个别谈谈，当时他们都答应了，但以后就没有下文。

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战部门都多关心一些，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不要怕“干涉内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由、平等”，而要多帮助。我觉得今天多帮助，就可以为以后大放手、少帮助创造条件。当然接受帮助是自愿的，谁不愿意也无强制之理。

应该尽可能地多给民主党派一些本钱，有关理论、政策、时事的文件、党内学习参考资料，也给民主党派一些。还要多给些机会参加些报告会等，以帮助民主党派人士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过去有些活动民主党派也参加了，但人数总是限制得很少，如前不久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农工民主党中央就没有一个人参加，而我们有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倒参加了。

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和它工作对象的单位建立经常性联系（如农工民主党就可以和文教、卫生部门），多参加一些有关的会议，得到一些有关业务部门的政策、思想问题的有关资料，以便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这个问题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当做政治任务看。

王之相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加强联系问题，他认为过去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相互之间的联系都很不够。譬如，拿最近比较大的问题——整风来说，自从党中央颁布了有关整风的指示以后，我们九三学社的干部问我：我们是否要整风？我说：这个问题要看领导上的指示。他认为象这样比较重大的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事先应该有联系。如何联系呢？王之相认为：这次会上决定恢复双周座谈会，很好，今后类似这一类的问题可以通过双周座谈会联系。王之相还表示赞成建立经常性的党派工作座谈会等制度，他并且希望各省市如有条件也可以这样做。

王之相还说：现在很希望领导党要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多加帮助。

王之相还提出了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干部非常困难，编制不足，尤其是组织发展了两倍，干部还是照旧，希望统战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联系，帮助我们解决。

李伯球在谈到有职无权问题时，认为：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为什么会有职无权呢？往往是因为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有矛盾。为什么会发生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矛盾的问题呢？一般说来，是因为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思想，如果说宗派主义产生在阶级感情上，不同的阶级出身带来不同的阶级感情，共产党员长期向敌人作斗争，因而有这种宗派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绪经过长期合作共事，互相了解增加了，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李伯球认为：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这种特权思想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党中央教育党员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共产党员要解放全人类，没有特殊权利，只有更多的义务”，可是，许多党员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的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这样问题就严重了。他还举了这样的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批评他，未经大家讨论，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李伯球认为：这主要因为这位党员不尊重集体领导，特权思想在作怪，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最具体的表现。因此，他说：要能做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除建立一些制度保证具体领导以外，还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整掉这些特权思想。

李伯球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宣传统一战线政策，过去对这一政策宣传不够，许多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工作。如有一次已故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到广东乡下去看望一位烈属，事后，当地乡干部还问这位烈属，你为什么同农工民主党的人往来？我在一九五四年往四川劳军，有人介绍了我是民主党派，当地的人差一点不把我当慰问团的团员看待，后来，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李伯球还希望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地方的卫生机关加强和农工民主党的联系。他说：农工民主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帮助中西医的团结，帮助中西医提高水平。我们同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合作得很好，但是，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医药卫生组取不上联系。李伯球认为，政协最不重视党派活动，没有发挥统一战线的最高作用了。关于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李伯球认为：过去统战部的工作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统战内部关系变了，应该改变过去的工作方法，代之以新的工作方法，对民主党派多从政治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多进行帮助。现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完全平等、独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人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有人说，过去的作法都错了，现在应该强调独立、自由、平等，不愿接受领导。李伯球认为，这两种意见虽然形成矛盾，但可以通过讨论加以解决。要在扩大民主生活中，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体现自己的政治意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李伯球最后希望统战部关心和培养他们的一般干部。

张奚若说，我要讲的是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关于整风要整的三大毛病，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来源。首先谈谈主观主义。党员的理论学习比党外好，接触实际也多，为什么主观主义还这样多？我的分析是：一、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这当然不是指的一切都不够水平，而是跟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水平。而不少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知识水平确是太低；二、经验不够。经验是有的，不幸的是情况变化快，工作条件变了，旧的经验常常用不上；三、情况太复杂，矛盾太多，根据他们那样低的水平，不够用的经验，要应付这样的环境，就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主观主义就更难免；四、任务太多、太紧。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办？有些干部就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天才去琢磨，这一琢磨就琢磨出个主观主义来了。

接着，张奚若谈到他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他说，既有上边所说产生主观主义的背景，干部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提前完成，怎么办？在实践中他发现行政命令是个"好"办法。官僚主义有好几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是事务主义，不抓方针政策。这种官僚主义当然不好，但我以为"其志可嘉"，比不辛辛苦苦的好。另一种是马马虎虎的官僚主义，这当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没有办法，只是马马虎虎；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马马虎虎，更要不得。

宗派主义，一方面是对党外人士，一方面是对群众。对党外人士，八年以来有其历史背景，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正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些党员对群众，当非请教、合作不可时才请教、合作，不然，就拿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哲学来用一下。这样久而久之就脱离群众。

张奚若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主义外，还有一个教条主义。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

是，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多工作没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对于这几个主义的来源，我总结起来是由于：许多党员居功而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够，旧经验不能用；任务又多又紧，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靠三大主义办事了。先拿教条主义武装起来，再拿行政命令执行教条，拿宗派主义保护教条。

张奚若又说，党外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起些作用，但是，如果要帮助得好，共存得好，各民主党派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不然，跟都跟不上，老掉队还能监督、帮助吗？古人说“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袁翰青说，刘少奇在共产党“八大”的报告中曾谈到民主党派对他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应该起三方面的作用，即：代表、联系、帮助改造。九三学社在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够，但联系和帮助改造还做了一些，如何代表成员的利益和要求就做得很少了。作为一个党派而不能代表它的成员的合理要求，所起的作用就大大不够。这点九三学社本身要负责，但统战部的提醒也不够。今天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要求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但民主党派不能代表和支持这些要求，最近医药卫生界有这样的反映：“做医生的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只有不是的医生，没有不是的病人”。民主党派在处理这类是非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把责任放在自己的成员身上。这就不能不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组织没有给他撑腰。还有，一般人对“代表”的看法，仅仅理解为是要考虑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知识分子要求的是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制度，而不是地位。

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看法有些一般化，对各民主党派的特点了解不深，因此，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进行深入具体的帮助。

近来，民主党派成员反映兼职过多的颇不少，九三学社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兼职过多。民主党派是否可以有权帮助它的成员减少兼职工作？

除了以上问题以外，袁翰青对这几天大家反映民主党派的干部不安心工作的问题，和认为民主党派是“养病延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在民主党派机关中做工作，九三学社有些同志就认为很有意思，很有兴趣，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不安心工作。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各民主党派自己进行教育，一方面要造成社会舆论，人民日报能不能写点社论，说做民主党派工作、做人的工作很重要。也可以写写“民主党派应当代表他的成员反映合理要求”的问题。他又说，对于“带病延年”的问题，我的体味不是如此，各民主党派正是青壮有为的时期。比如九三学社社员去年就增加了五倍，怎么能说是“带病延年”？尤其到下面看看，各省的分支机构劲头大得很。因此，我说，这四个字不符合全面情况。

吴研因在书面发言中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时提出：这里面也有称职和不称职的问题存在。如果称职，自然应该有权，如果不称职，那就只好无权无责了。不过，我认为不称职就不应该让他有职，如果不称职又让他有职，又不把权交给他，或者把权交给他，他也掌握不了，这都是不好的。另一种情况，有些本来还称职的人，如果无权无责成了习惯，一旦把权交给他，要他负责，怕也好像缠久了的小脚，一旦开放，也不能像天足一样大踏步前进。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吴研因认为最好把职调整一下，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如果说，有些民主人士 对国内和国际有些作用，不能

不特别照顾，我认为这在解放初期是说得通的。但是，现在解放已久，有许多向来无名的人才，已经在台上显露头角，为国内或者国际所知名了，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总而言之，原则上民主人士和党员应该平等待遇，不论是谁，称职的就让他有权有责，不称职或者不能掌权负责的，就让他无职。否则民主人士被优待，总不免令人不安心，甚至有不平等的感觉。

关于统上和统下的问题，吴研因认为：统上，统代表性人物，当然是对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怎么能个个去统呢？作战要"擒贼先擒王"，统战要"统下先统上"，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要注意行行有状元，把各行的状元统起来，不要把别行的状元当这行的状元来统，。例如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他们也有状元，如果把大学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们的状元，就是张冠李戴，他们是会有意见的。因此，我主张对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要发掘他们的状元，把他们的状元统起来，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是统了一些的，但是，统得太少了。尤其是在农村的，不但没有去统，甚至由于区、乡干部没有文化，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还在走相反的路，歧视、打击他们。因此，今后必须对区、乡干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把情况改变过来。

关于人事安排问题，吴研因批评了人事部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认为许多问题都是由于人事部门存在这些毛病而引起的。人事工作很难做，不能粗枝大叶，但是有些人事部门却做得很不好，例如把英文文学专家，分配去做普通图书馆员，把学航空工程的，分配去当汽车公司售票员……有人称它为"乱点鸳鸯"，真是十足的官僚主义，他们还强调服从分配，不顾风土人情，夫妻关系；强调干部要在岗位上培养，不知道有些太不成话的干部，培养了好多年也难成材，并且，还耽误了机关工作，这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人事部门存在这些主义，所以往往由于安人事排不当，严重妨碍了统战工作。今后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要做好人事工作。要做好人事工作，对人事部门整一下风是必要的。

五 月 十 五 日

今日下午继继座谈。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

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寅初认为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他说：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还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谈到这里，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发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

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马寅初还回顾了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我在那里教了十六年书，那时先生讲课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一年的功课不讲完，也无人过问，考试出几个题目，也不来监考，学生考试等于是抄书。现在不同了，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有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这都是党委制的好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马寅初认为：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么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就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马寅初得出结论说：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但是，马寅初同时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他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还谈到：过去学校里的老教授上不了台，现在，一批评就翻过来了，说青年助教是教条主义，不相信他们，甚至连苏联专家也不相信；老教授事情又多得很，要进行科学研究、带研究生，有些人还要脱产编书，那里有功夫去上课，将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大了。不但在北京大学如此，在上海更成问题，过去说向工人阶级学习，现在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甚至还有人说：工商界定息要定二十年，这种倾向不好。谈到这里，马寅初再次说到：所以墙要从两方面拆，单拆一面是不行的。共产党整风就是拆"墙"，虽然现在新党员增加了，这些新党员整风恐怕不及经过斗争的老党员来得容易，但是，他们有英明的领导，还是可以整的。各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整风，虽然没有共产党容易，但是，他们有组织机构，也还容易整，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连个机构也没有，像汪洋大海一样，谁去整呢？被整的是谁呢？谁说话最有威信，可以使被整的人信服呢？怎么整法呢？也就是怎么拆墙呢？都是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会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要记者加上这样一段：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党派我在二年前就主张取消，但是，兄弟党不同意。现在我希望青年别加进去，这班老头儿死光，无党派这个党派也没有了，否则要"长期共存"，就更糟糕了。

陈铭枢在马寅初发言后补充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学校中的党委制如果取消的话，就要加强统战工作，就更有必要在有领导下的民主这个原则下组织校务委员会。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他还说，机关中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因此，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沈雁冰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这三者实在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又如：由于宗派主义者，常常又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沈雁冰还说：统战工作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统战部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并没有减少各方面的宗派主义。其原因何在呢？就人事安排来说，事实证明：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以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滋长了、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例如：不少专家就

因为安排给他们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以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又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沈雁冰还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接着，沈雁冰谈到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的经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特征是：（一）只抓小事，事必躬亲，而昧于全局形势；（二）只顾到眼前的，没有考虑到将来，这是昧于全局的必然结果；（三）忙于油、盐、酱、醋的安排，忽略了思想领导，这在文教部门尤为显著。这种官僚主义最可怕，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沈雁冰认为：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最后说：总而言之，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然而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尽管了解某一业务的情况，知道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但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就会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因此，沈雁冰期望在整风中，切实检查一下所有的各种方式的学习制度，包括政治思想和业务的，彻底改变那些徒然耗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沈雁冰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刘清扬在发言中说马寅初说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我觉得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我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大家前几天提到的有职无权问题，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都反映普遍地是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因为，我向来是有意见就提的，当然这也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但是，我能不能认真行使自己的职权呢？这倒成了问题，因为兼职太多了。我自己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每年光开会、视察就要花去好几个月时间，我本身所担负的红十字会工作就没法作，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觉得兼职过多对个人是个消耗，对工作也不利。因此，我希望在人事的安排上，并不必要安排太多的职位，才能使人满足，主要的还是要叫他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工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他的力量。

有些人并不自愿成为官僚主义者，但环境竟逼得他在各方面造成了官僚主义。如我到红十字会工作两年半了，虽然我们会中的干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都想作好，但是由于工作上得不到党政的支持，如工作计划方案问题，已有三、四年之久不得解决，先提到卫生部，后提到国务院至今还未批下来，这就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因此，我们会里党和非党干部对自己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都很有意见。我们认为领导不重视群众团体，因此使我们好像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有积极性也无从发挥，工作不能开展，这能算是官僚主义吗？

刘清扬接着说，我要站在妇女立场代表大家反映些意见。有些妇女干部向我说，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人提意见，就是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对统战政策来说，有人说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人，不关心中下层，在妇女来说，是统男不统女，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周密。如我们妇女联谊会从解放前后，地下和地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妇联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都是知道的。但在领导上，既未给以关怀和鼓励，至今我们极少数的脱产干部，始终是黑干部，并无正式的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干部们有时说，我们不也是为国家工作么？我们既无人关心工作的成绩，反而有时还被有组织领导的街道妇联看不起，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

刘清扬还严肃地批评了在婚姻问题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她说，在河北省有的农业社设法培养了一些女拖拉机手，但是她们同驻在当地部队军官结婚后，就不当拖拉机手，脱离了生产，住到部队里去。她们穿上皮鞋和丝绸衣服，坐汽车回家。这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间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刘清扬说，这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倒退的现象。

河北有些民盟同志向我反映了些情况和意见。如有人说，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因此，基层党委负责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如唐山某一学校党员副校长说："我懂了民主党派的情况，今后来竞赛吧，你们干好了，我们就让你们搞了。"他这样一讲，该校教员就不好再加入民盟了。又如唐山铁道学院本是统战工作的试验重点，但实际党和非党还是貌合神离。如七个党委同志，对教学改革、拟订教学大纲等，由于他们不懂，就不免常说外行话，他们又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于是造成矛盾，党群关系就搞不好。比如有的党员同志搞满载超轴五百公里是内行，但叫他搞大学教育，他和高级知识分子无共同语言，当然很困难，知识分子也无法和他们谈心，于是就形成鸿沟，格格不入。民主党派要想帮助作出点事来，也需要一步步试验，不敢说出来和做出来。党的方面对民主党派也不敢多管，怕侵犯他们的独立，因此，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

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

梅龚彬在会上谈了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革各级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首先，关于合作共事问题，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他认为共产党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

关于就业安排问题，梅龚彬说，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有职无权；第二、有名无实；第三、无名无实。他说，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

梅龚彬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必兼任，应该分开，使安排的面较广一些。他认为今后各级人事安排应不限于资历老的人，应照顾资历虽浅而工作有成绩的人。

梅龚彬还批评了一些报纸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宣传报道不够重视的缺点。如报道民革二中全会会议的稿件，人民日报只登在第四版上。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党委的关系问题，梅龚彬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任务是代表成员利益和发挥监督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的许多工作不能与闻其事，这样就无法实现它的任务。梅龚彬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接受领导是接受政治领导，如果在基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分别报告上级，协商处理。

梅龚彬还谈到民革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他说，民革的干部要求统战部今后更多地给他们以帮助。中央的中层人员还希望有参加各项会议和视察的机会。梅龚彬还要求改变过去民主党派中央副部长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的情况。

最后，梅龚彬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关于改进党与非党关系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克服各级党员干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以正确解决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

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座谈会将于十六日继续举行．

五 月 十 六 日

座谈会今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黄绍竑，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金芝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在此以前，座谈会已举行了六次．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黄绍竑首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就是领导的方法问题发言，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以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策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第二个问题，黄绍竑谈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

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黄绍竑还谈到：在制度上要注意哪些问题，他首先谈了兼职问题，他说：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其次，他说：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要制定哪些法律呢？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也值得学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绍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他认为（一）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二）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在党群关系之间，为什么会有墙有沟？陈叔通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由于对非党员有气不过，看不起和惹不得的情绪。陈叔通说，尽管党对党员一再进行了教育，说明党员只有

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不能以功臣自居，但是有些党员总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之，看不起非党人士。怎么叫惹不得呢？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些好。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因之，为了推翻墙，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那样，非党员就比较容易伸出手来。

陈叔通提出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那一方面大。另一个是检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他认为，一般说，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非党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他认为，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了；并且有的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应忽视。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乡上，就受不了。诚然，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

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陈叔通又说，解放几年来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有些东西我看值得怀疑。比如"矫枉必须过正"，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此是搞不起来的。但是是不是永远都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虑。

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如果不克服困难，我们的国家不会有今天，今后也仍然要克服困难。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个拥有六亿人口的落后的大国，无论从人民需要或国际情况来看，都还有很多困难，不克服如何办？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都叫人克服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饿着肚子讲大道理就不行。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你去克服困难吧！

陈叔通最后提到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开始看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作。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我认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严希纯主要就党与非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有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是，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合作共事方面会发生许多问题呢？我以为，第一，许多党员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不懂得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和作用，不了解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如我们国家计量局有四个正副局长，我是一个副局长，每次人大、政协送来给局里的文件，负责办公室的高级党员干部总是批给我和另一非党局长看，而不批党

员副局长看。由此可见，他们不懂得党在延安时的三三制以及政协、人大等都是党的很重要的工作，也可见他们不懂得统战工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什么意义。第二，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第三，许多党员把今天机关中的党组的作用与过去对敌斗争时的"党团"的作用看得差不多，不了解那时党还在地下，"党团"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对敌斗争的胜利，而今天则党已是执政党，党组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是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而国家政策的执行不能只依靠共产党员，还要依靠广大的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都是一家人。党组的负责人不能什么问题都去干预。这种事事干预的情况，在科学部门尤严重。

接着严希纯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批评了有些机关只是在形式上尊重了党外人士的职权，让民主人士参加了党组会议，但实际上还是不尊重人家的职权。他说：如我在国家计量局工作两年多了，虽然也参加了党组会议，但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和争取科学技术人才的问题，始终未被重视，未经仔细讨论。又如我在科学出版社当副社长时，该社的工作主要是出版自然科学的书刊，但也有极少一点历史考古方面的社会科学出版工作。当时，自然科学部分非常缺人，但组织上却派了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年青党员去负责这个社会科学部分。但这个年青党员不懂古典的东西，有时竟把书刊上应写古体字的改成了现在的字体。他还自作主张不买我批准要买的古书，又在我不批准一个青年团员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译文时，在别人面前说我何必如此认真。这是把党员看成万能而对党外的负责人的职权却很轻视。有些党员自高自大，瞧不起民主人士，我还见过很多男女双方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而造成不能结婚，结婚了而离婚的悲惨事。

对在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他说，机关中的党组是应该继续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运用得不好。

他批评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说，依照经验，工厂或工程工作上，除了领导人之外，应有一个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的地位很高，在技术上可以有决定权。现在也应这样做。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应该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他们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如何使专家们敢于负责呢？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不利的。

严希纯还对随便推广先进经验的盲目性提出了批评。他说，推广竹筋混凝土代替钢筋，我很耽心，听说有些地方已用竹筋造三四层楼的房子，幸而最近国务院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北京市因为需要，铺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都翻浆，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最后，他说人事部门管得太多，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不重学术，例如选派出国留学生，不管能否完成学习任务，只要政治条件好就选派出国，以前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但是这种做

法，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最近选派八个人，还是政治第一。这是很大的浪费。他还谈了一件事，说明我们干部误会了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精神。某机关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后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被领导上发现，竟叫他当众检讨。对于有些尚未制定的法律如民法、刑法、国家计量条例等，他也希望能够尽快制定公布，以便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能有所遵循。

严希纯希望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注意国家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并要多注意北京以外的机关学校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还希望统战部注意请有关部门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问题。

叶笃义就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问题、民主党派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等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是一个事实。为解决这个问题，虽则已经确定建立各党派事务座谈会的制度，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问题，不是通过座谈会和晚会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使他们从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能够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的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否则，民主党派要自己拟一套干部制度，不仅很困难，并且不必要。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他认为今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方面，多是被动做的，今后应该主动地展开国际活动。比如以政协名义同兄弟国家的祖国阵线、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建立友好往来的联系，介绍我国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想法。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大会代表），

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地位的高低。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另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可是当了人民代表、政协代表，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的人虽则参加了政治活动，但是实际上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业专职，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的内容。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他们过去有成就，是有名望的，也同本行本业的群众有联系，但是，目前已不是站在本行本业工作的第一线上。可以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第一线上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金芝轩首先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群众、民主党派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等等许多问题，也都是属于对不上口径，排不好位置，分不好前后等等分配问题。分配是合理的按比例统筹安排，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金芝轩谈了司、局长以下一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意见。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他说：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能力，在政策方针上要依靠党员同志。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我和我所接触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样的主张和意见。关于党员领导一个组、科、处、司、局等等，也没有原则性的意见，问题是什么样的党员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以及怎样使得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各得其所，合作共事，因此这也是分配问题。在分配问题上，觉得有宗派主义。以企业为例：厂长是党员，谁也没意见，由于目前有以党代政的习惯和必要，非党人士谁也不愿当厂长，问题在于这个厂长能不能为搞好企业来作统战工作。现在许多地方有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为了在政策方针上帮助总工程师，可以加设一个副厂长，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有这样的情形，有党外人士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工厂，往往一定要提拔一个比他水平低的党员来任副厂长，也有一个党员不必兼总工程师的而一定要兼任，而让总工程师担任副总工程师，像这样做法，开明的厂长也不同意。问题多的是科长一级，许多科长都不如科员，如让党员处长任科长，问题就少些。这种情况，要不是党员提拔得太快，就是非党同志提拔得太慢。

第二，使用与信任问题。他说：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因为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像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

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第三，培养与提拔问题。他说：对党员来说，培养上有些要求多，布置多，具体帮助检查少的情况，在提拔上也没有充分研究。有些党员不该提拔的提拔了，就会脱离群众，没有研究他能否胜任。应该选择一些年青人长期培养。对党外人士的培养教育是不够的，并不是当作自己子弟来培养教育。有人说养牛吃牛奶，也要给他吃草。这草不光指的物质上的东西，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说来，重要的还是提高业务知识的草。有的知识分子反映，他工作得愉快，业务有提高，他对唯物辩证的课是学习的，而且还能常常联系实际。有人举一例子，据说广州有一民主党派与科联联合举行自然辩证法和长江大桥的讲演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行动是重视的。能在学术活动中进行一些思想改造的工作，收效很大。在敌我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要提拔知识分子或者有困难，以前干部工作作得不能令人满意，希望以后对具体人物多作些具体分析、研究工作。以前不是不能作，而是没有作，所以这方面意见比较突出。在评级评薪上特别是去年工资调整中，好事作得没有好结果，有些人认为主管这个工作的部门不是有"三大主义"，就是在三大主义中钻不出来。

金芝轩还认为：青年干部的教育问题很多，他们随身带来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供给制思想，到了机关闹情绪，谁也没管。党外人士也不敢管他们，这样就培养了他们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是贻误国家子弟的。

金芝轩特别提到：过去银行、外汇、外贸部门有许多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很好用起来，我们的银行有许多方法大家觉得不方便，是要人人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人人服务。外汇、外贸都是对外工作，有特别知识，这些人是有有用的知识的。

第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问题。他说：这次整风，希望党外人士也要真正从团结愿望出发，要和风细雨，细水长流，随整随改。不要光打"春香"，也不要先查小姐，而应该从中央各部的老夫人——共产党员的正部长开始。因为这些同志资格老，水平高，有一套，是当家作主的同志，中央指示他们有时可以具体补充布置得更好，但是有时也能打些折扣，有的也想四平八稳，皆大欢喜，中央很少检查他们，下级也不敢提批评。正部长要是民主人士，也应该帮助党员副部长进行检查，也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他说，部长同志是国家栋梁，国家的大柱子，关系重大。马寅初对北京大学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是他要能彻底些，最好能帮助高教部部长也包括我们民进几位中央部的副部长同志在内。

司局长以下的党外人士有这样想法：不要在下面刮上八级风，到了部长就风平浪静，而是希望和风细雨渐渐往底下吹去，慢下结论，来一个春风吹得百花开。

第五，"统必须通"的问题。他说，通就是对上了口径。对上口径要安排，在安排之前先要统盘筹划一下，初步确定可能性与现实性。统筹安排，在我们这一行叫作出总平面图。要作出最粗糙的总平面图，首先要对统筹的各部口径有个大致的数。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实践多于理论的人，这些人要求思想改造，更重视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术性活动，所以如我上面所提广州事例，通过学术活动进行思想改造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团体，各专门学会，一向没有被重视，统战部要找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口径，在这种团体就能找到，而且这些团体也能提出部分意见。

陈铭枢在今天的发言中，首先申明说：昨天我说"民革没有'墙'可拆"那句话不完整，我要求撤回它。因为我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员很少，没有形成墙而说的，不是说民革

本身没有墙可拆。

接着，他就昨天听到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到沈雁冰同志发言中有：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去年冬天我访问了北京若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们说：今年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在评级时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对老教授们说："评级以德为主（进步），才次之，资是参考。"对青年教师说："评级德不必论，才为主，资次之。"同一个指示，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大笑话。

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为此，我认为德才资三者不仅应从联系来看，而且应从统一来看。

他又说，昨天又听到刘清扬同志发言中有：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她并认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这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至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碍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

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 • •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最后说，到今天为止，座谈会已经开了七次，有三十六人发了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座谈会接受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的建议，推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把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在政协常委会上作报告。

（综合5月9日、10日、11日、12日、14日、16日、17日《人民日报》）

（原载《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1号）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举行座谈会

（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月）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休会四天后，于今天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林汉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德全、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刚从浙江来北京开会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范尧峰，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有经常的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象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邵力子说，我并不是想同章伯钧先生辩论。当然，在百家争鸣的时期，争辩也是可以的。不过，我的用意并不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情况，使今后的讨论少浪费时间。我是

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出版、印刷界的人士都会举行过多次的座谈会。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并且也交地方政协讨论过。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说政协没有讨论不好这样讲。在过去征求意见时，伯钧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是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政协开会讨论时，或者没有来，或者来了没有注意听，或者听了没有发表意见。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放箭要放准，要有的放矢，不要乱放。说文字改革问题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是乱箭。

罗隆基接着说，我也是民盟的，我不是阐宗派替伯钧先生辩护，但我要补充说明一些情况。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把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人。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

许广平在发言中，首先批评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她说，民进是个小党派，又是分工做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两“小”加起来，就很自然的引不起领导党和社会上一般人士的重视。如有一次我们要开会，事先通知统战部，争取领导党的帮助，但得到的回答是：某大党要开会，没工夫照顾你们。这样，我们就只好延期。她要求共产党对大小党派一视同仁。

由于民进的成员是中小学教师，地方上很不重视，甚至对民进究竟是搞什么的也发生了疑问。光明日报登民进的消息也最少。因此，使我们在工作上遭受到不少困难。如房子问题，在民进就更为突出。民进总部和北京分会挤在一起，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人员编制也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干部忙不过来，不能很好的开展工作。经费也是一减再减，其实我们在造预算时已是窄打窄用，一再削减以后就使得我们连必需的经费也感到困难。

接着，她又说，有人认为民进是个小党，比较简单，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民进是个知识分子的党派，不能说没有问题。民主党派如何发挥创造性独立性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做。我们也就只好收起来不做了。我以为象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做一些。

统上不统下的问题，许广平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基层单位对民主党派确实不了解，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我们民进武汉分会成立时，很希望报馆派记者去参加。报馆工作人

员说：你们开什么会？我们没有时间参加，再三联系无结果。最后经过我们的秘书长亲去报馆找负责人，才派了记者去参加。又如在北京某校开敬老会时，党、团、工会、行政、学生会、班代表都讲了话，最后才轮到民进。因此，民进成员有自卑感，也不舒服。会员并不是要争先后，但是也要适当安排。

许广平还说，几年来，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是做得不少，但是，对一般知识分子则很差。不仅有职无权，还感到职位不恰当。中小学校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被提拔。一般人士对中、小学教师尊重不够。北京某校不守纪律的学生多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等到学生发生问题了，这些干部就责备教师，有个学校的学生家长甚至到学校里抓住教师的衣领斥责，沈阳有一个教师甚至因此被带上手铐。很多青年不愿当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教员更重要的是要求多从政治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培养他们。当然应该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和生活上的保障，但不是一分一毫的算，什么都给钱。有些地方改卷子有改卷子费，观摩教学有观摩教学费，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许广平还谈到，高级知识分子要求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中学教师则无保证，也无具体方案。许多中小学教师任务过分繁重，女教师无暇管理家务，教育别人的人，无法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忙乱不堪，这不但会影响健康，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也无暇顾及，以致有些学校发生偷窃现象。

林汉达说，我刚视察回来，把下面的情绪反映一下。现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得很热闹，但是中小学教师、扫盲教师却不敢鸣、放。主要是有顾虑。有人反映：我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我相信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但总会吃亏的。现在正当精简，谁知道会不会被精简出去。

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被重视，这种情况很普遍。有人说小学教师好象低人一等，想不到比小学教师更低的还有业余教师，业余教师是低人二等。有个扫盲教师不敢让他的老婆知道他是扫盲教师，害怕她要离婚。这次我在上海跑了好几个厂，发现党团员也不重视业余教育，从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有人反映："群众是优秀生，团员是补课生，党员是留级生。"为什么会如此，是不是业余学习同生产有矛盾？不是，主要是安排问题，领导上不重视，学习时间就没有保证。

统战部门偏重大党，对小党不重视。共产党内至今有些人不知道民进是作什么的。如果考一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政策，我看民主党派会及格，共产党员未必能及格。

这次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开了二省一市的座谈会，一共开了八天，而且开得很好。但是只有解放日报报道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都没有登，人民日报我们根本不敢希望。民盟开了三天会，各报都去了。大党开会三天，大登特登，小党大鸣大放也不管。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一九五二年把祁建华一捧捧到天上，好象仓颉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

扫盲工作，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做得比较好，一九五六年有冒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

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那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说一九五六年扫除文盲九百万人，其实这是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的成绩，一九五六年的要到一九五八年才能看到成绩。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接着林汉达谈到业余教育的课本和教材问题。他说，工农业余学习，每周要保证六小时、八小时，采用正规学校的课本，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教育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办。这个决定事先我并不知道，但是检讨还得我作，因为我是业余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就得检讨官僚主义。课本、参考书都成问题，为什么？因为命运掌握在新华书店手里。新华书店只供应中小学，而不供应业余学校，给那里多少就是多少，不给就是不给。如果不只有一个新华书店，而且有一个"华新书店"，那会好一些。

区里的文教助理，人家都说他们是文教不理，教育科是不务正业科，原因在于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不重视文教工作。地方上还有歧视和侮辱业余教师的现象。有人说："有饭给扫盲教师吃，宁可给狗吃。"上海市有人反映业余教师是三不管的工作人员。这是从中央、包括教育部到地方都不重视的结果。但是业余学校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单是上海就有八十九万业余学校的学生。我们不光替中小学教师呼吁，还要替业余教师呼吁。现在上海的报纸已经在替业余教师说话了，北京还没有。这种不重视业余教育的情况如果不转变，对社会主义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

李德全发言说，卫生工作同六亿人民甚至在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人都有关系，大家对这方面的缺点有意见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卫生部也有三个主义。在生活福利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宗派主义的缺点；公费医疗是主观主义的。它是在供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们没有量量人力、物力，也没有考虑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不爱惜国家财产，因此，过早实行这个制度，会给国家带来损失，产生浪费现象。同时，这也是个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据说，苏联的工作人员现在看病还要自己花钱买药。他说这个错误首先是卫生部门的错误。接着李德全批评了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表现在，苏联有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并不一定实用的，但也硬搬、硬学。官僚主义表现在，我们同高级知识分子联系不够，在工作中，没有更多地请教他们，常是从主观出发地决定问题。如医院的组织、制度，应该同办医院的人商量；办医学教育，就应该同医学教育的专家商讨，但是我们过去作的都不够。从我们部来看，下面有干部反映，部长和他们联系不够。从这里看，我认为党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适时的。大家都把问题提出来了，也有改进的愿望。但是能否都解决，还要看客观条件。

根据以上各点，她希望各方面帮助卫生部：一、解决公费医疗制度中的问题。二、医学院学习年限，可否改为六年制？也请大家考虑。三、在学习中医的问题上，怎样安排得适当？现在因为我们安排得不够合适。有的中医说，他们只是一朵好看的纸花。

最后她提出两个问题。她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受到教育而很少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我们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仍有问题。有人对于那些在革命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女干部，有那么一种想法：你们回家去吧。她希望给予这些女同志一个提高文化的机会，使她们好好工作。

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她说，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帮助过我们，这是我亲自看到的。解放以后，苏联的帮助就更多了。单从卫生工作方面来看，一九四七年，东北发生鼠疫，多

少人患病！人们一提鼠疫，谈虎色变，六亲不认。解放初期，察、蒙地区发生鼠疫，怕传染开来，铁路交通断绝。当时苏联应我国政府之请，立刻派了专家工作队，在两个星期内就扑灭了鼠疫。这说明，苏联一直是帮助我们的，苏联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学习苏联是正确的。苏联显然也有些前进中的缺点，但是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搬用不当，而一下子把他脱出去。说到这里，李德全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对于学习苏联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应该向他学习，但是在学习时，要合乎我们的客观情况，不要把一条腿当成一棵树。

范尧峰书面发言说：我从浙江来到北京开会，看到北京的政治空气，真是一片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景象。我看到社会主义民主高潮出现了。在下面工作了两年，一到北京，觉得北京的太阳比下面温暖多了。因此我愿以一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的身分，不搁圈圈，主动地以书面参加座谈，以尽我的责任。提出三点建议：

一、中央统战部的眼睛要多多往下看。统战工作何等重要，尽人皆知。大家说过，统战部过去有"统上不统中"、"统上不统下"的缺点，我要补充三条，还有"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的毛病。这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映。建议今后上中下老少新旧男女全面地统起来。因为中下面最广，潜力最大，中年壮年正是有为之年，旧同志关系深，不统不会见怪，统统对工作大有好处，目前一般人确有这样的感觉："相府门前七品官"、"侯门深似海"，要见领导同志真不容易，其原因我想有二：一是领导本身，一是下面的风气造成的围墙。如我到浙江二年，还没有正式见过省领导同志（仅是听报告开会的遥见），建议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多多到下面视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二、让民主党派人士在各项工作上尽量多负起责来。我的看法民主人士一般都有了"职"，问题便出在"职"、"权"两字上，情况很复杂，问题的根本在于"职、责、权"三者的统一。而其中的关键则是让他们在工作上象党员一样都负起责来，负了责，怎会无权？目前的问题是有些党组织和党员不大肯让非党人士多负责，好象只有党员才会负责做事，非党人士负不起责，有个同志打比喻，好象把我们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没有责，是不会有权的。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主张让能负多少责任的人做多少事情，能负多少责任的人便行使多少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事制度。

三、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的处理要依靠发动群众。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很多，而且很复杂。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作用很大。譬如章乃器同志提到民建会的内部矛盾，那就更复杂了。这次路过上海，听到几位中委同志说起，上海民建会整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蹋班"代表，（意思是一切落后于客观形势与要求）。上海是民建工作的重点，为什么会一切"蹋班"呢？我认为是内部矛盾还未引起足够的认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会处理内部矛盾，这对民建会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是很大的。

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了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有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有人说，目前还只有四、五级风。为什么呢？他说：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李毅认为：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

深入，聚而歼之"。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有人说：能不能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李毅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鸣、放的空气很难形成。一定要反对打击报复，对于打击报复者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风气。

李毅还谈到：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他说：九三学社的成员都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根据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调查和最近各地高等学校非党人士提的意见，这个问题在许多学校里没有解决。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政策路线问题，是高等学校一切矛盾的根源。李毅说：有人说：某院长的领导思想是：老干部加苏联专家就可以办好高等学校。从最近的报纸上看，很多高等学校都存在着突出的青年路线，就是说：依靠青年党、团员、积极分子办好高等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观点"。在过去几年中，主要的任务是把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大学改造成为新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以生产斗争为主，这种作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主要是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即主要是生产斗争的问题，如果再强调依靠青年，就是错误的，而且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李毅认为：在今天，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和较多的办学经验的专家学者们在办学中没有发言权，只看见少数小伙子指手划脚、调兵遣将的局面是不正常的。究竟应该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呢？李毅明确地说：办好高等学校，必须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高等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方向，没有专家、学者参加领导，就不能提高学术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尊重专家、学者的空气很稀薄。他建议：在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办好高等学校，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指导思想下，来考虑修改目前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李毅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说：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章先生认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斯大林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我认为章先生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党的方面来说，这样说很具体，也相当深刻；但是，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墙"和"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前，墙更厚，沟更宽，可以说是铜墙铁壁，深沟高垒。几年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党与非党的墙不是更高更厚了，而是薄了，低了，沟不是更宽更深了，而是窄了，浅了。从局部看，由于在几次运动中的偏差，和部分党员特殊思想的发展，使一部分非党人士和党的距离不是近了，而是远了。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总的情况来看。党员的不健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缺点，是造成墙和沟的重要因素。解放以来，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初期，我和一位党员共事，这位同志有点特殊感，不到半年，关系就弄得有点紧张，有"墙"和"沟"。以后，我和另外二位党员共事，这两位同志很虚心，彼此关系搞得很好，工作也愉快，就不感到有"墙"、"沟"存在。以后又和另一位同志共事，这位同志的特殊感更重，"墙"、"沟"又有了。但是，李毅认为：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非党人士学习、改造情况，和"墙"

“沟”的存在与否也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回忆了一下，七、八年来，起初，我同党员共事，意见很多。以后，领导上派我下乡调查，自己思想进步了，有了改变。回来后，双方关系就有了改善。再如北京某公私合营企业，原来一位姓倪的经理和工人之间关系很坏，工人叫他“赤佬”。后来他经过学习，工人就叫他“资本家”。后来，他主动争取合营，当了经理，更有进步，工人叫他“倪经理”。高潮以后，他又经过学习，放下架子，联系群众，积极搞好企业，工人感到他和公方代表区别不大，叫他“老倪”。从这个例子，李毅得出结论说：可以肯定：企业的改造和个人思想的改造对于消除“墙”和“沟”很有关系。所以，我认为：目前“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党员和非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党和非党双方的思想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必要的制度加以保障。

李毅还说：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对于如何估计成绩和缺点的问题，黄绍竑先生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难免的，这已成为公式。我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成绩，也不夸大缺点，有一分成绩，就说一分成绩，有一分缺点，就说一分缺点。强调成绩，会使人自满，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心，造成是非不分，影响干部的团结，可以回忆一下，去年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黄绍竑声明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座谈会到今日为止，已经开了九次，前后共有五十二人作了发言和书面发言。这些发言，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对某些问题，会上还展开了争论。在这些意见里面，有不少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加以正确地对待，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读者，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今日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周建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劭先、王昆仑，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严景耀，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

周建人今天第一个发言，首先他表示了对成绩和缺点的看法。他说，中国解放以来，短短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缺点当然也是有的，光有成绩毫无缺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缺点需要把他暴露出来，才能设法纠正，但也不宜过分夸大。我很赞成昨天李毅同志的话，应该实事求是地估计缺点，夸大缺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

接着，他谈到机关党组织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共产党是领导党，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作领导，今天全国人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有些机关里的党组织事情管得过多了。因为党管得太多，党外干部发挥积极性和智慧的机会就会减少一些，对于工作不利。如果管得少些，放手一些，有好处，可以使党外干部努力学习，负责把工作做好，于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利。这并不是不需要党的领导，并不是必须管的也不管，党的领导肯定

要，谁也不怀疑。

机关工作中主观主义当然会有的，考虑和决断一件事情，当然多少含有主观主义成份，毫无主观成份的纯客观是很少可能的。但如不细细思考，过于片面或不适合当前实际，就成为主观主义的看法，这在工作上的损害也是很大的，所以应该克服。

关于统战工作方面，周建人说：现在流行着"统左不统右"和"统上不统下"二句话。统左不统右，我却看不出来，因为无论中央或地方，分明把年纪比较老的、思想多少有点右的人也团结在一起，我不觉得有不统右的事。至于统上不统上，表面上是有一些的，例如统战部有事与民主党派商量时，一般总是找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来谈，从不找基层成员来谈，这好象有些统上不统下了。不过要把基层组织的成员都找来，事实上也不可能。我以为造成这种现象与民主党派内部工作做得不好也有关系。如民进内部负责人很少与基层通气，我自己就很少和基层组织成员联系，多少有些隔膜。因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基层不大通气，有些隔膜，下面就会以为是统战部"统上不统下"了。如果民主党派内部很通气，这种情况就可以减少些。

讲到思想教育的问题，周建人说，我感到每个人除出生的阶级、家庭情况及生活过程中的遭遇不论外，工作的好坏总与头脑里的思想有关联。各种行动都可以追溯出一个思想根源来。任何行动，做或不做，或怎么做，都须经过思想，由思想来决定。因此，学习就十分必要了。学习范围很广，思想上的学习就是指思想教育。目的就是改造思想。改造思想可称为洗脑筋或称为换脑筋，说脱胎换骨也无不可。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不免带有旧的思想体系。带有旧的思想体系倒没有什么奇怪，如果一点不带来倒是很奇怪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但前一阶级的思想与后一阶级的思想有差异。小资产阶级的享受欲比资产阶级小些，剥削思想也较少或竟无有。因为资产阶级分子本来具有剥削思想的特点，享受的欲望又大，所以改造起来，工程比小资产阶级要大些，因此，把资产阶级分子的彻底改造比喻为"脱胎换骨"，我想原因就在此。

对于如何拆墙问题，周建人说，王绍鏊老先生认为，拆墙须从两面来拆，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的妙法。我相信不从思想上来搞好团结，团结总是表面的。他又说，学习改造不是唯一的、万能的。例如接近工农群众、参加体力劳动等等都能影响思想，使之发生变化。但学习也不得不说有极大的作用。不过，作用的大小又须看学习者自愿的程度如何而定。进一步说起来，就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也还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不过，工作虽然艰苦，用处却是极大。比方说，一个管理总务或是财务工作的干部，如果他的思想已经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已经懂得马列主义，已经相当地了解社会主义前途，与一个未经过改造，习惯于旧社会里给富家当账房先生的人比较，其工作作风与工作效果，肯定是大不相同的。要把社会主义迅速顺利地建设起来，我觉得改造思想非常必要。

最后，周建人谈到前天会上争论得很热烈的文字改革问题。他说，听到大家谈到文字改革的问题，我对它很有兴趣，愿意说明一些情况。解放前许多人就提起过文字改革的问题；解放后，北京曾开过一个文学界的大会（会名已忘记）就提出过一个建议。后来又成立了一个研究文字改革的委员会，是由吴老（吴玉章）主持的，我也签了名。并且听说马老（马叙伦）、郭老（郭沫若）、沈雁冰部长，都曾同毛主席商量过这个问题。简化汉字方案出来

时，我正在出版总署工作。听说一九五五年曾分发二十万份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去年又交地方政协讨论过。其实，汉字简化问题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存在。记得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有人提出过。

至于拼音方案，吴老曾作过报告，仅仅是注音，为推广普通话并便利扫盲之用，并未提出代替汉字。注音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在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过。拼音字母将来是否将成为通用文字，这是将来的事情。不过早先鲁迅先生是曾主张用拼音文字的，因为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当时没有人反对他，因为鲁迅自己读了许多古书，别人不能抓住这一点批评（别人提过曾遭反对）。今日在人民群众里面，赞成用拼音文字的当然有，我便是其中一个。不过，并不是要废除汉字。汉字要学还是可以学，古书还是可以读，汉字不会废除。我以为将来是有此可能的，因为拼音文字实在大有便利。最后我再说明一句，可是吴老的报告中却并不曾提出过这话。

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过去的关系到底怎样？对民主党派的帮助够不够？**陈劭先**在发言时，首先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他说，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过去没有什么错误。民主党派的巩固和发展，民主党派成员的进步，都是同统战部的帮助分不开的。前几年，凡是有关民革的问题，统战部都邀请民革的负责人去研究、商量，对民革帮助很大。统战部的同志也常去民革和我们作个人接触，谈谈对工作、生活的意见。这些做法都很好。但是，近一年来，统战部为了怕干涉民主党派的内政，对我们的帮助也少了，关系也疏远了。我认为民主党派内部有了问题请统战部帮助、指示，并不等于干涉内政。因此，今天我要对统战部提出几点意见。首先希望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要指导、帮助。因为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在共产党方面也必须要克服三大主义。

对于民主党派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房子问题，人事问题等，陈劭先也希望统战部能帮助解决。

陈劭先对统战部的第三个希望是：希望统战部在可能范围内能在党政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制定之前，事先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他说，有些事情民主党派往往在登出报来后才晓得。事先不了解情况，如何进行监督？事先征求意见，民主党派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当然，属于机密方面的问题，又当别论。

最后，陈劭先希望统战部能够同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包括私人接触在内），和大家多来往，多联系，不能因为怕干涉内政而不来往，越来越疏远。

除了对统战部的四点希望以外，陈劭先还谈到三大主义的问题。他说，三大主义是互相关联的，但危害最大的是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牵涉的面最广，与全国人民有关。如果在工厂、农村官僚主义严重，就会引起工人农民的不满。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要做好工作，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就要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就能使我们的政权不断巩固。

接着，他又谈到宗派主义。他说，宗派主义的危害也不小。虽然共产党一贯痛恨宗派主义，在延安就反过，今天还在反，但是干部中的宗派情绪仍然不少。有些人看不起民主人士，独断独行，就易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去年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事先细心研究，和民主党派研究，就可避免许多损失。

近来报纸上所揭露出来的事，不仅有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我想中共中央也不一定都知道。现在揭露出来，有助于矛盾的解决，我们人人都应该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昆仑在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希望，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也反映了民革若干成员的意见。

第一点希望是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过去民革和各民主党派一起，曾参加了国家事务，可是，还不够充分，希望今后凡是宪法范围以内的国家大计，不仅事前建议，事后批评，而且要做到参与他们自己职权内的决策、执行和检查。民革成员大多数是军政人员，现在大多数在国家机关做政治工作，在文艺方面也许放不出多少美丽的花朵，在学术方面也许不能一鸣惊人，可是应当在政治工作上多发挥力量，共同负责，当家作主，大家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王昆仑声明说：尽管我们提出许多意见，指出许多缺点，其目的是在于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民革有一位老同志说："如果过分发展了分庭抗礼的思想，甚至动摇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认识，也决非国家之福"，这句话说明了我们尽管或多或少残存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可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我们要唱对台戏，可是并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我们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不是在野的反对派，国家工作有缺点，我们也有一部分责任。只有是这样的立场观点，才能够充分参加国家事务，才能够向领导党进行监督和批评。

谈到这里，王昆仑附带提出几个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职的能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发挥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无职的军政人员和一般社会人士能分别情况得到适当安排和就业与救济。第三个问题是：民革自己机关的干部首先应当自己多加关怀、培养，使他们发挥力量，安心工作。但是，物质条件不足，今后仍望政府予以可能的帮助。第四个问题是：对肃反，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希望深入进行检查。凡是某些人在那里受到错误的处理的，在弄清楚以后，就在那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但是在组织上、在思想上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划清敌我，如果的确是反革命分子，决不替他呼冤，决不替他要求平反。

第二个希望是：共产党要继续帮助民革团结进步，帮助民革在所联系的群众中起带头作用。民革同志不少的人在解放前由于或先或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才能从长期的分散和失败中把力量集中起来走向胜利。解放后，民革、民联、民促和第四方面四个方面合成一个今日的民革，几年来组织日趋巩固而且发展，去年一年，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联系社会人士，人数达到两万五千多，在内部差不多都忘记了过去四个方面的历史痕迹，团结一致，基本上几乎找不到宗派和对立。他说，几年来民革的发展、巩固，和统战部一贯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几年中统战部怎样为民革创造发展条件，怎样从旁协助我们的团结、进步。希望今后统战部在不干涉民革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尽可能加强对民革的政治领导。

但是，王昆仑说：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努力。例如我们近年来在地方组织中也还有个别的不很团结的情况，就主要靠我们自己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靠民革中央来帮助他们调整关系，一味责备当地的统战部是无用的。今后，民革作为民主党派的组织来看，仍然应当在自己所联系的群众中，先行一步，经常起带头作用，代表自己所联系群众的利

益，帮助他们改造思想，这样才能创造长期共存的条件，这样自然能延年益寿，前途乐观，不会乍暖还寒，花开又落，而是风和日永，芳草连天。

第三个希望是在民革组织中的交叉党员要积极发挥作用。他说：加入民革的共产党员和团员人数很少，但在中央不少地方都有，其中也有个别的人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缺点，总的说来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在团结上起了积极作用。王昆仑认为：这些党、团员既加入民革的组织，在未退出民革以前，一方面固然要遵守党团的原则和纪律，不卷入人事纠纷，不要因为是党、团员就高人一等，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过于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应当心胸坦荡，本着民革成员的身份，发挥积极作用。共产党员和团员要能善于和民革同志合作共事，民革成员更应当向党、团员学习，搞好合作共事关系。

王绍鏊发言说：我在上次发言中讲过，墙是两方面砌起来的，也应该由两方面动手拆。比如我自己就有这种毛病，我们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自鸣清高，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墙的来源之一。我在财政部工作的时候，就不大愿意找薄一波部长，新旧年节，也不去拜年，结果在我们之间就有了隔阂，这种隔阂越来越深。我们应该主动地把这种清高思想去掉。“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的思想。

他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提高了，工资增多了，但这并不等于就使高级知识分子积极起来了。如果不信任他们，他们的积极性还是提高不起来的。据我了解，各厂矿旧的工程师十分之九都有此情况：你不信任我，我何必卖力气呢？

他说，我们的墙是各式各样的，有主观主义的墙、有官僚主义的墙，尤其厉害的是宗派主义的墙，这些墙都各有各的拆法。宗派主义在各个地方也不是平衡的，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就比较轻一些。

据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反映，我们那里的成员对“鸣”和“放”顾虑很大。我对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讲，你们放心鸣放心放好了，只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可以大鸣大放的。我们这是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我们的领导核心，使得中国共产党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我上次讲话说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影响很大，有人说，这是不要我们“鸣”和“放”了。这说明我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的心理。

有人说，苏联是一党专政，我说不是，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我要争鸣，我不能同意有些人提出的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的说法。但是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制度本身是不坏的，而是有人破坏了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各个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也要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的。

叶笃义说，他要从一件小事情来谈“拆墙”的问题。他说，毛主席、周总理讲话的时候，常说“同志们，朋友们”，不论是在政协作报告还是对机关干部讲话都是这样。很明显，同志们，是指在座的共产党员；朋友们，是指在座的党外人士。他认为可以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因为政协成员都是统一战线以内的人，机关干部又都是周总理的部下，称朋友，不确切。他说，“同志”二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一个党之内的；没有相同的组织关系的，不是同志。另一种解释，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人。他说，“美国把我们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我认为很对，因为在统一战线里的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他说，一年前，民主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李维汉部长谈到，对民建会员称同志，民建会员很高兴；称同志，这是因为企业公私合营了，有了基础了。经过一年，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党

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时候，如果取消“朋友们”三个字，对党外人士会是很大的鼓舞。

严景耀发言中，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希望加强对党员的统一战线教育。他说：好些基层同志反映：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他说，下面有些教授因为有顾虑，还是不敢鸣、放。有人反映：大学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还有人说：“在学术上敢争鸣，但是在思想上不敢争鸣。”有些中学教师反映：“大的”“小的”都有人管了，就是我们“中的”还没有人管。在上海有人说了三句话：“贯彻多，研究少；命令多，商量少；要求多，帮助少。”谈到这里，严景耀举例说：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根据以上情况，严景耀建议必须对下面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另外，严景耀也谈到：下面有些单位的统战工作搞得很好，因为共产党的支部能够和民主党派支部遇事商量，发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

严景耀说：我是民进的一分子，我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这四个党派都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常常发生交叉，弄得群众很难应付，不知加入那个组织好。合起来，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大有好处，还可以让许多人解放出来做别的事。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不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也不属于党，对他们的待遇、提拔、培养，没有一定制度，许多人感到前途茫茫，不安心。值得注意。

第三个意见，他谈的是关于扩大民主制度的措施。他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对政府的工作起了监督和推动作用，但还不够。因为他们视察的范围、时间、地区都有限。他建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人代会设立各种常设委员会，比如经济、卫生等委员会，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等参加，对各部的工作进行监督。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

“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说服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却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蔡廷锴书面发言说，今天报载，昨天座谈会有几位同志关于文字改革问题谈了很多，但所公布的简化文字99％我赞同，还有些小意见。例如，“叶”、“箫”二字以字义分析来说，“叶”乃树木附属品，那“叶”改为“叶”；“箫”是乐器改为“肖”字。我接很多朋友来信均有意见，但文字改革委员会未将“叶”、“箫”二字解释清楚。我以为，群众有意见，希望文改会公开解释。

五 月 三 十 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休会七天后，于今日继续举行。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秘书长杨东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宁武，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常务委员朱蕴山。下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革中央

常务委员刘文辉、刘斐，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委员吴研因，民革中央副主席陈绍宽，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许宝驹，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楚波，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李俊龙，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罗子为；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茅以升也在今天的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杨东蓴在发言中，对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意见。他说：民主党派要得到社会重视和党内重视，毫无问题，应该自己从工作中争取，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做好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从思想上解除障碍，使大家了解民主党派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蓴认为：许多地方统战工作所以做得不好，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统战政策，如农工民主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就说是医药卫生工作者，民主促进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也说是中、小学教员，有人甚至以为九三学社是公私合营的什么企业。再比如：民主党派在有些单位发展组织时，竟然遭到拒绝，说：“我们这里已有一个民主党派了”。因此，杨东蓴认为：“要贯彻这一方针，思想教育实属重要。如何进行统战教育呢？杨东蓴提了四点意见：

第一，他说：总结一下三十多年的统战工作经验，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经验，这是根本之图。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说到了统战工作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本书发行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六年中变化很大，应该进一步总结和分析。这个总结分析是科学研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研究，其中有理论、有事实、有历史，还有艺术。要总结得好，必须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上，来说明统战工作的必要性，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作用，以及今后的任务等等。有人说我们是吃团结饭的，吃团结饭不坏，难道要叫我们吃分裂饭？现在有人把历史割断了，孤立起来看现在，我看这三十多年来统战工作的历史还是不能割断的。有了这个总结，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上的阻力就会减少一些。

第二个问题，杨东蓴说：中学我不谈，几年来大学的政治课，起了一定作用，但无庸讳言，也有很大缺点，这就是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毫不相干，而且写好讲稿，逐字逐句念，下面逐字逐句记，对现实生活很少谈到。如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如果给大学生考考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有什么区别，我想，及格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对统一战线政策当然更不知道了。现在高教部正在重新草拟政治课程教学大纲，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把政治课同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并把统一战线政策放在一定的地位。我想这样做，对团结知识分子会有好处，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会有好处。

第三个问题，杨东蓴谈到民主党派有无论坛的问题。他说：有，光明日报就是，另外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都登了许多有关民主党派的文章，现在什么都登也无人审查，这很好，但是还应该加强。如何加强呢？我觉得：光明日报在当前大放大鸣的时候，应该出六版，不应出四版，以便在整风期间，让大家在论坛上活跃些。杨东蓴还建议各机关、学校可设民主党派讲坛，让民主党派有机会讲话，尤其在进行统战政策教育的时候更有必要。如某学校一个同志对统战政策统错了，事情不大，不需要拿到报纸上去，就可以在那个学校里公开说清楚，讲清楚了，也就是进行了统战政策教育。当然，我并不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今天群众水平提高了，可以明辨是非，有人要想哗众取宠，既不能哗众，也不能取宠。这个对台戏怎样唱呢？杨东蓴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这个对台戏是吴铁庵和谭鑫培那样的对

台戏，吴就是学谭，同样是谭派，谭唱什么戏，吴也唱什么戏，我们今天虽然有个论坛，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跟资产阶级的在野党同执政党的唱对台戏是完全不同的。也许讲坛上讲错了，但是，不要紧，讲错了，可以辩论，经过辩论，是非就出来了，这样民主生活就可以更活跃起来。

第四个问题，杨东蓴建议在党内首先进行一次有系统的统战政策教育，他认为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对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会大有好处。

最后，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蓴还提出三个具体意见：第一、他说：统战部要求我们反映所联系的社会人士的意见，但是，反映以后很少有下文，他希望反映上去的问题能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该有个下文。第二、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各个单位，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如会议或座谈会、人事等等，都需要有个制度。第三、下面民主党派的干部对政治待遇很有意见，如参考消息，究竟什么人才能看呢？如某一地方规定十六级的才可以看，而十八级的秘书长反而不能看，这样做，是否合理，值得考虑。

宁武发言中认为，既然是帮助党整风，对于个别有错误的党员，就应该以"诤友"的态度进行批评，而不应该对他们维护。他说，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期望。

他说，一切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党员，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有些党员的个性完全超过了它的党性。因此。他建议党中央要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

他说，据我的观察，凡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强。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差。他认为，现在全国党员有一千二百多万，其中党员的修养和锻炼大有差别。过去的党员参加革命，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全国解放以后的党员则不是这样，他们是愉快而光荣的参加党，只是抱着荣誉感，他们经过的艰苦锻炼比较少，因此，必须对他们加强教育和改造。他还对王明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表示很大的诧异。他说，王明过去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但是，据他知道并未作过什么检讨，他认为这是个性超过党性的典型。

他还谈到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宗派主义问题。他说，目前歧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大专学校中，就尤其严重。有些党员干部，对年老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看法，认为他们来自旧社会，历史不干净，思想有问题，于是摆在那里，既不帮助提高，又不给适当的工作。据我知道，那些年纪从五十岁到七十岁的旧知识分子，只要党和国家了解和关怀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情绪是很高的，知道自己是从旧社会来，带来了不少的旧思想、旧作风，愿意改造自己，愿意在晚年献出自己的所长。当他们不能如愿，而感到自己是在"尸位素餐"时，心情十分苦恼。这也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材，感到人材缺乏；另一方面，又有些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种矛盾主要是由宗派主义造成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陈垣首先谈到教育部的领导问题，他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是高等学校，又与普通教育有关，我们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又与高教部有关，但由于教育部和高教部工作上联系不够，很多事情是高教部布置给高等学校的，有时就没有我们的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好象我们又是大学，又不是大学。有的教授说：我们是中学头，大学尾，在夹缝里讨生活。因此，教育部与高教部必须很好的配合，注意到师大的特殊性质。陈垣还说：关于课程的设

量、比重，有的不很恰当。教育部有时过分相信教育理论的教条，从实际考虑得不够。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陈垣认为，党必须特别加以注意。他认为共产党所以有宗派主义，是因为过去对敌斗争情况随时提高警惕，已逐渐成为习惯，建国以后，对全国干部情况还心中无数，自然要多依靠政治上可靠的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再有宗派主义就会大大影响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等于逐渐放弃各种积极力量，群众会由积极而消极而袖手旁观了。陈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使用干部上必须放手放心，才能使袖手旁观的人，卷起袖子来积极参加建设。

对于老教师的信任问题，陈垣说：由于过去使很多人感到有不信任的倾向，今后要多在这方面作工作。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多年治学的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次次检讨，或在火力很强的群众大会上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却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这是说当事的人，而其他群众呢？由于当时有人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和朋友说的开玩笑的话，就往往被人抓住，说是思想如何，甚至追其动机。运动过后，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和党、团员说话时尤有戒心，知心朋友也不来往了，大有“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的状态，形成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筑起来的。

陈垣接着谈到肃反问题，他说：总的来说，肃反成绩还是很大的，某校的副院长，肃反时被误作为对象，前天他和我说：“我当时确是难过得很，身体健康也差了。但是，今天平心细想，经过这次运动，全国反革命基本肃清，可以安心的建设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我当时虽然吃些苦头，但从结果来看，问题还是弄清楚了，也并没有冤枉我。”他的话使我很感动，我想运动当中，群众发动起来，很多人在大运动里受了伤，如果仅仅说是“在所难免”，未免也是说便宜话，不过能从全国着想，总可稍稍解开这些症结。今天吸取过去的教训，学会如何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会再有误友为敌的错误作法了。

关于整风运动，陈垣认为：目前运动虽然刚刚开始不久，各方面已提出了许多许多意见，揭露了不少矛盾。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再表示让大家大鸣大放，对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再表示欢迎与支持，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登载的高教部接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选派留学生将采取自由报考方式，这种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这次运动的本身，就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

谈到教学，陈垣认为：有些问题要注意，有些年青教师，毕业不过二、三年，上课去按本宣读，就很不好。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实际的教师队伍人数还不能马上充实起来，还不能跟上形势的时候，这些青年教师，勇敢的担负起以他们的力量还不能担负的重担，担负起繁重的教学任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与这同时，也确实有些人，由于自己政治上进步，是党员或团员，课程也开出来了，如果再加上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就骄傲自满起来，老教师也看不在眼里了，觉得他们落后，认为老教师教的东西是唯心主义，只有自己才是最掌握马列主义的人，自然就不会很好的虚心的向老教师学习，所谓新老关系也逐渐不好起来。

陈垣还谈到党群之间的“墙”的问题，他说：虽然有“墙”，但我看不是历史上的万里长城，第一因为城里城外不是敌对的双方，第二也并不是蜿蜒万里不断，而是断断续续，有高有低，有厚有薄，而且有些地方是没有“墙”的。我觉得既然各人处境不同，看法不同，

接触的党员的作风也不同，是高就说高，是低就说低，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应人云亦云，强求一致。

历次运动，在有些人心里留下一些印象，以为越说得头头是道，越能表示自己积极，据说在肃反运动时，有的单位开会时不说话，就被认为不能站稳立场，不能划清界限，我想这是个别的情况。但是有人却误以为有一说三，有薄说厚，就足以表现自己的错误。这纵然是极少极少的人如此，但也确实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

陈垣认为：批评时实事求是，对于党的整风，纠正错误，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有利的。有时因为爱护党，维护党的事业，谈到工作上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时，自然不免声色俱厉，“疾恶如仇”，是很可理解的。但如果只是漫骂和讥讽，或者无中生有，不能以理服人，对于工作的改进，反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言之无物，持之无理，你让人改正什么呢？所以批评时应作到：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对工作的改进才能真正有帮助。陈垣最后谈到统战工作，他说：党、团员、民主党派成员，都有组织关系，而统战工作对无党派的人应当如何作工作，今后也值得注意。有时某一问题，党内和民主党派分别传达，而无党派人士，感到知道得很少。目前还是无党派的人数较多，恐怕将来也仍然如此，既然要调动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则不但要注意发挥民主党派力量，对无党派的人注意加强连系，也应注意。

张云川在发言中，首先谈到他很喜欢提意见，而且很爱批评，因为他经常说话一开头就提缺点，过去曾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反党，扣了很多帽子。有些关心他的朋友曾劝他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他说，是不是我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优点呢？不是的。只是觉得优点早已存在，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来说。把缺点说出，改正过来，使成绩可以更加巩固，对党和国家都有好处。不过，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象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现在那些过去认为一切都好的人也提缺点了，证明他们过去是看到了缺点但没有说，是否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否从前言不由衷？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

接着，张云川就他所看到和感到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说，我也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党和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造成墙和沟的原因，有人分析是由于党员有优越感、特殊感。他说，这种优越感过去对敌斗争有好处，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在党员思想上变换了位置。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觉得别人是不革命或不配革命，只有自己是真革命、最革命。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种表现。比如在机关里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可是不管吃饭、娱乐，总是党员坐在一起，非党员坐在一起。拆墙填沟如果党员不先伸出手来，非党群众就不好先伸手，怕对方不握没意思。可能党员也有这种顾虑，但党经常教育党员团结群众，因此，主要责任还要党员负。

另外，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他说，造成墙沟，除了这些党员要负主要责任外，还有一些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也起

了很大作用。谁是义勇队呢？他认为就是那些所谓积极分子。他说，解放后，各方面人士风起云涌都集中在共产党的周围，党有责任了解大家，如能广征博采，互相引证，可能要好一些。可是不这样作，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而这些人就假借党的威信吓唬人，无形间就在党群之间打起了墙，挖起了沟。其实，应该瞧不起这些没有改造或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做作，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于是这般人就在群众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但群众怕他们三分，就是民主党派的头儿脑儿也怕他们说什么而迁就他们。看戏因为抹了脸，很易辨别，而有些人作风不正，颠倒是非，又未抹脸，不好辨别。这种情形现在已好一些了，但还是存在，建议统战部注意一下。

第二个问题，张云川谈到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解放以来，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人好象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做官。“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我过去看过《夜未央》，印象很深，跟《真假巡按》差不多，官一层一层的，不管大官小官都站在群众头上。我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只能有职务之别，而不应该因职务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以官自居，大官不愿和小官谈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如不进行思想教育后果很不好。为什么在看戏、吃饭等场合也要官阶森严、官气十足呢？很值得考虑。上行就很难叫下不效。因为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生活悬殊，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

第三是统战问题。张云川说，我很喜欢看水浒，但对梁山泊有些做法搞不通。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原来和梁山泊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不晓得宋江为什么这么重视他，一定要把他拉上山坐第二把交椅，不知是否统战工作？而黑旋风李逵甚至柴大官人柴进也不受重视。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也应加以区别。有些人确实是有真才实学；有些人则是登龙有术，这并不光彩；有些人的声名地位靠吹牛拍马得来的，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是否要照顾？我觉得统战工作统对了一个人会起好作用，统错了还要起副作用。

我思想上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因为司马相如是名人、学者，别人就捧为才子风流，如果是没知识的人，就会说他是拐骗人口。张君瑞与崔莺莺的恋爱也是如此，因为张是才子，崔是佳人，就被认为是风流韵事；如果是贩夫走卒，就认为是和奸通奸。这是不是证明我们每个人思想上还有些不公道的想法？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很值得考虑。

除了以上几点批评意见以外，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因为虽然共产党是革命的主流，但民主党派也是支流、细流，也起了一定作用。

对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张云川也提出了二点建议：一是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二是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直接向政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这些人很难得有反映情况的机会，反映了也不重视，人事部门是否能考虑一下。

最后，张云川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龙云发言中说：此次整风运动，主要反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谓“三

害”，包括教条主义在内。他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他认为这些发言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真正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每次座谈会能够贯彻这一精神的话，他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又说，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甚至顾虑很大。为什么会有顾虑呢？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他说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有此信心，就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因此，他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无关的话，用不着的话少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将来缺点和错误减少得也就会越多，相反，如果把缺点和错误掩饰起来的话，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接着，龙云对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这几次的座谈会，大家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他认为在国家的行政上没有作到分层负责，而是国务院指示一发，等于垂直领导，就一直贯彻到基层，党有党的指示，就成为双轨并行，没有注意业务部门的职权，业务部门也就无法帮助下面，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对问题不暇再加考虑和研究。希望国务院以后多注意监督与考核，凡属业务无论专门与普通，都要主管负其全责。他还认为，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在国家来说是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以致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他举例说，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又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莫明其妙，这种宣传同样说明是一种轻率。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中准备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十分赞成。他说，过去我们国家考取留学生的办法不公道，最近不少人提出批评，昨天报纸上登载了高等教育部接受大家的批评立即加以改进，这使人们的观感为之一新。他认为，今后整风运动如果能够贯彻这种精神，他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

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提也出了批评。他说，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〇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这样是不公道的，以学生来说，像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持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

最后，他对民族干部问题提了意见。他说，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之后，干部缺乏是事实，因此，成立之初，自治区的干部不能不用汉族。这是在所难免，但是现在少数民族的干部陆续培养起来了，应该使少数民族干部有充分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使汉族干部逐步减少，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增加，而且有职有权，真正自己当起家来，达到名副其实的自治。

朱蕴山说：我在南京视察，碰到省市党的方面，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要各民主党派帮助整风，现在机关学校企业各方面，均在纷纷鸣放，已经提出很多意见。我在南京民革座谈会上听到财政局科长陈家振说省市级机关党委对统战教育一般很差，例如建筑工程部庄部长在

干部会上三次提到民主党派，把民革叫做中华革命党，曾给他提意见。他第二次会议还称民革为中华革命党。往下一般党团员总是把民主人士与老弱残疾并提。陈又说党委提拔干部尽是党团员，有一领导干部贪污被揭发，党委叫他在党小组会上检讨一下了事，群众有意见，他答复是怕失威信以后工作不好做。江苏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良骏说，民革成员提意见有顾虑，他说江苏各县有七十多个邮电局长，85%以上是青年党员不懂业务，连一个懂业务的非党的副局长都没有。

地方统战教育是不平衡的，有的不重视，有的也很重视，类如苏州是个古老城市，党与非党同志团结很好，因为统战部很热心帮助，很多老知识分子古典文艺较有修养的人士视政协为老人之家，他们靠拢党，学习亦很起劲。这说明任何地方任何单位能把党的统战教育能够贯彻下去，对于民主党派就不至于轻视，团结工作就可以做得好的。

为什么党中央发动整风运动呢，我想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曾犯了好多次的错误，遵义会议由于毛主席领导，扭转过来，到了一九四二年整风统一了党内思想认识，纠正了歪风，朋友越来越多，得道多助，从此工人阶级壮大起来，因而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近八年来，党又进行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改造，已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新的阶段了，今天执政的党，成为六亿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核心，党的威信，达到最高峰，如果有部分党员，不能执行党的政策，或者思想硬化，仍停留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和近八年来社会主义改造那些阶段，那就不能够适应新的政治任务。钢铁锈了，不重新锻炼是不好用的。因此必须来一次整风运动，这一次整风运动，是个伟大的及时的英明措施，其目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神圣的武器拿出来向社会主义进军，透过这一次运动，预期结果一定是很健康的，他把六亿人民除开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致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将由社会主义直达共产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义的。

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帮助整风呢？我觉得各民主党派过去与共产党患难相处，或先或后都有他历史因素，长期共存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帮助党的整风亦即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经过了曲折迂迴道路，然或先或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已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现更进一步踏上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了，我们一方面帮助党的整风，同时结合我们自己思想改造工作，在这一次和风细雨伟大的运动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神圣的武器，我们边帮边学思想是可以得到提高，我们各方面工作也可以推进一步得到改善。讲到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问题，我在南京曾经讲过，我总觉得墙与沟是双方建筑起来的，我想对党员要求应该高些，他们的责任应较重些。有些墙沟是人为的，有些墙沟可能因工作制度产生的，无论如何，需要大家一齐动手，多鸣、多放，大胆的鸣，大胆的放，将问题一齐摆出来，就是碰到坚固堡垒，边整边改那是不难拆除的。在拆墙平沟的时候，各人看法不同，提法不同，都不要紧，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改进工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些机关学校企业部门发生墙沟很多，是不是把党委从机关学校一齐退出，把公方代表一齐从企业部门退出，那就是拆墙平沟呢？我认为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共产党领导核心那是搞不成的功，有人提出以党代政、或以党代校，工作制度上有些不合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管在制度如何研究，亦只有从调整关系，改进领导方法上着眼，党是建设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加强这个领导核心，推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我对统战部还有几点意见提供出来请予考虑：

（一）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

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我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依我看来不外四种情况，要根据四种情况分别处理。（1）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2）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应根据肃反政策纠正。（3）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4）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白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在纠正错误过程中，肃反运动，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检查呢？我想，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二）有些机关党委对于民主党派不够重视，建议党中央做出决定，明确指示中央机关及各地方各基层党委，认真负责定期召开党派座谈，加强领导，务须贯彻统一战线教育方针，并帮助各民主党派做好工作。

（三）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工资标准比政府机关为低，福利也较差，升迁也较困难，拿民革中央机关来说，在体制上没有处一级的设置，直属部以下的组织，只相当于政府机关的科级，这在调级和提升受到较大的限制，一般的对于民主党派干部也有些轻视，因而很多干部容易产生不安心于党派机关工作，常闹情绪，这也无怪其然，建议由政协和统战部帮助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比照国家机关的人事制度，拟定民主党派管理办法。

另外民革在各地联系的社会人士和失业成员，很多在就业和安排方面承统战部大力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是很感谢的。最近各别地方反映，通过组织排队分别缓急急需解决，请有关方面解决的尚未解决，而有些通过私人路线却先解决，发生不平衡现象，使地方负责人陷于被动。他们希望以后多予联系。

刘文辉谈的是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他说，在过去，各级干部一般都不能很好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又据近来整风中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当普遍。这些不能不侵犯到公民权利。因为基层干部需要的人太多，一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及上层和中层干部，很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再加上有些人的骄傲自满，作风粗暴，以至于违法乱纪，那末，公民权利遭到严重的损害就更不待说。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党和国家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在宪法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条给公民权利提出了有效的保证，也可以说是赋予公民以一种保护权利的权利。但是普通公民处在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之下，是否都能有效地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控告权呢？国家机关对公民权利因干部违法侵犯而受到的损失，是否都依照宪法给予了赔偿呢？他认为事实上还有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损害赔偿，好些机关都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他说，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残酷，根本说不上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但他们的政权毕竟是脆弱的，他们的力量毕竟是分散的，他们的命令不是经常都能贯彻的，好些时间都是政令不出都门，加以社会的组织不严密，因此好些人民在紧急关头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去躲避。他说，今天，不仅是人民政权和旧政权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而

且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的政权表现出无比的坚强，政府的法令随时都得到充分的贯彻，领导的决定每样都做到彻底的执行，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保证，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优越性。他说，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两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遇到国家执行政策的干部，不用说他是违法乱纪，不用说他把人民的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是他体会政策的精神不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老百姓也就吃不消；又因社会的组织十分严密，今天就没有躲避的可能。这时候老百姓应当怎样办呢？只有依法行使控告权了。说到行使控告权，恐怕有些老百姓到现在还不知道，纵然知道，也不是没有顾虑的。顾虑他控告不胜怎么办？顾虑他控告胜了，对方也不过检讨一番，将来借故报复，又怎么办？要控告都还有困难和顾虑，更说不上行使损害赔偿权了。他说，我国民间流传一句老话，"不怕官，就怕管。"基层干部经常和老百姓接触，他们直接左右老百姓全家的利害祸福。因此老百姓的顾虑重重，以致不能主动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样，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能由此越是加深了。

他认为党今后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方面。他并提出三点建议：（一）加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基层去，从思想认识上来解决问题，这是根本办法。（二）厉行革命法制，首先是严格执行宪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保障公民都能充分地行使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过去一个干部损害人民权利，往往是检讨一番就算了事，今后如果给他加上损害赔偿的责任，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将会深刻得多。（三）加强人民代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古语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宪法已经公布三年了，公民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到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民代表有保护选民权利的义务，国家监察机关有贯彻革命法制的职责，党和政府应当加强他们的责任，使他们为保障人民权利而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从多方面想办法来保护公民权利，将大大地有助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

刘斐发言说，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所造成的。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意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些情况，除开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在一般党员干部之间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而且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不然，整风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他说，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关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刘斐在发言中，还曾谈到，在基层组织中发生的很多问题，是同我们的事业发展太快，任务太重有关系的。他说，领导机关时常把很多任务、很多政策，一起往基层堆，他们消化不了、接受不了，发生问题是必然的。

刘斐还曾谈到党在团结、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意见。

他说，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以后团结工作也没有作好，他们有意见。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产生错误之难免。

吴研因发言中说，我们的座谈会在第九次（22日）座谈时，我没有列席，可是我对座谈会的发言，仍很注意。我首先注意人民日报的记载。23日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记载，用特号大字标题，标出"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于是，我就细心地找了一下大家的发言是怎样的深刻。后来看到用二号字排印的小标题，"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才恍然大悟人民日报所谓深刻化是对周建老发言的赏识，他的发言，是强调同意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就是要思想改造。我们没有谁否认过思想改造。帮助党整风，也是学习，也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不过在现阶段，只能强调整党整风，拆墙，拆"三害之墙"。因为现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这好像要在党拆墙时，我们来唱对台戏，就是要自行拆墙，不必帮党拆墙，大有消极怠工之意。毛主席在四月三十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因此，我不同意，民进有不少同志也不同意。

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因为人民日报的态度是如此，所以写了一篇短文，给光明日报记者转给人民日报。那文的意思虽然是针对周建老的发言而发的，但实际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实际是对人民日报有意见。这篇文章是24日写的，25日送去的，到今天没有见登出来。这或者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稿件太多，或者因为不合于人民日报的意思。总之我不理解人民日报所谓的深刻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

最后声明，那篇短文送人民日报，不是一定要人民日报发表。当时认为统战部不再开会了，所以写了书面的意见。如果早知道统战部今天还要开会，那我就可能在会上讲，不必写那文了。

陈绍宽说，我是奉调来京参加国家预算会议的，统战部也给我这机会来参加座谈会，我觉得很荣幸。

我是从福建来的，请让我谈一点福建的有关情况。福建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以备投入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省统战部也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讨论内部矛盾，帮助整风，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前几天才开过，这次会议更加发扬了民主，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都踊跃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帮助党推行整风运动，并提出意见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福建党的同志与非党人

士平时相处很好，中共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同志态度谦和，对民主党派人士时多照顾，通过政协，统战工作做得很好，省政协的主席就是省委书记，政协常务副主席就是统战部长，政协秘书长是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民主党派负责人也都是省政协的副主席，每星期均到会办公，又参加集体办公会议，这说明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时相见面，协商事情，民主党派负责人能与统战部负责人常常见面，遇事商量，彼此就不隔阂。此外，党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也很接近，因为省政协每星期六下午集体办公之后，就有组织教育、文化、卫生、工商业等各部门人士轮流交谈，谈后留餐且有文娱，中国人习惯三杯黄酒就感觉亲密起来，他们的心内困难的话就谈出来了，党和政府能立即解决的，就为解决，较难的亦设法研究解决，这样既可消除隔阂，又能够解决困难，使党、政府与群众上下通气。平时有事就讲，放和鸣都做惯了。党的同志对我更没有什么矛盾和隔阂，并且对我很重视，也很信任，许多重要事情先期都和我协商，对我密切关怀和照顾，不少会议不必党外人士参加的，有时我也被请参加，平时交往，更是亲密，如一家人一样，没有见外，我也没有自外，当我年初患了重病的时候，中共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和负责同志们对我更是十分密切关怀，他们为我好几次召集名医会商诊治，特由上海延请名医专家到福建来，卫生厅长亲自指导和帮同救治，使我得以回苏，这更使我体会到共产党员的品质道德是这样高贵，我万分感激，这个事情所有在省民主党派人士都普遍知道的，非常感动了社会人士。党的同志们平时对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也是很接近，很和蔼的，特别是省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很多的帮助，解决困难，解决问题，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也都发扬民主，遇事协商，省统战工作实在做得好。

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对于人事机构，感到很神密，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假定说这是墙，可以说是比较厚的墙。如何消除这种隔膜，是应该注意的。他还说，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情况，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比如，"汇报全面与否？正确与否？"使人疑神疑鬼。在这里，他举南昌市某被错关过的青年为例说，这些事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是否有人向领导上汇报了不正确的材料，其中是否有打击报复问题。因此，首长以什么态度听取汇报，很值得研究。

徐楚波发言说，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是指责多，鼓励少，以致使中小学教师情绪低落，信心不足。他说这是因为对中小学教师重要性估计不足、重视不够。他谈到北京有的学校要教师给孩子道歉，《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好厉害的七十二条》，都曾使中小学教师情绪受到影响。《人民教育》、《教师报》也不了解教师的痛苦，对教师多所指责，因此许多教师不愿意看《教师报》。他还谈到对教师的使用多，照顾少。如有的地方体育教师平时工作任务很多，星期日都不能休息，但有球类等比赛的时候，买票困难，有关方面也不予照顾。他谈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各界代表都接见过，却没有接见过中小学教师。在福利待遇方面，教师也是较低的。他说四川有的地方的教师的宿舍很简陋，而附近工厂职工宿舍却是高楼，真有天渊之别。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如工人，因此教师愿去工厂工作而不愿留在学校。他说，工资待遇，政治待遇，再加上社会上一般人对中小学教师不够尊重的看法，使很多中小学生不愿意考师范。

他还谈到，各地学校的统战工作作得是不平衡的。有的学校里，党与非党人士处得好，有的学校里，党员有宗派主义。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他们认为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

务，彼此看不起。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这些年青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又是只听他们的汇报。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校少见的。他还谈到，北京有一个学校校长和党支部书记有宗派主义，引起老教师不满。教育局去调查，向学校党支部了解情况，没有解决问题；教师又向北京日报写信，北京日报去人调查，也是向党支部和人事部门了解，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教师给他写了信，他把信转给教育局，到现在一年多了，也没有下落。

李俊龙在发言中，根据他在东北等地区视察十六个院校、两个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若干厂矿企业的情况，提出了高等院校和厂矿中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分七个方面来谈：

一、加强厂矿企业、院校中的统战工作。他说，富拉尔基的一位区长兼作统战部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难得见他一面。富拉尔基是新兴工业地区，城市建设和供应任务很重，很显然，区长兼作统战工作，只能顾此失彼。他说，很多院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作得不够好。但是，群众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因此他希望今后向群众作一些时事政治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不要非限定党员去作，而应该设法多发挥民主党派成员作用。党委今后应该更好地运用民主党派组织的力量。

二、若干新兴工业城市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差，对非党的技术人员注意不够。

三、工会工作不强，工作作得太不好。他说，东北友谊农场的工会只收会费，不作别的工作，文娱活动也没有人管。

四、评级评薪解决了许多不公平现象，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地方在评级时重德多，对业务、资历重视不够。有的老教授，工资评得不如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多。原因之一是有些做人事工作的青年人，工作很努力，但对旧中国情况了解得少，对旧知识分子、旧人员的看法不适当。他认为人事工作是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

五、学校中的等级制度太森严。他说，东北师范大学有的教授见校长要两天以前登记。开晚会的时候，先长（包括科长）后教授，引起教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六、对新党员、新团员要进行统战教育、旧中国知识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他说，很多新党员对旧中国的知识不多，对革命艰苦也了解不多，以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作为骄傲资本。他还认为，现在共产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今后接受知识分子入党不必那样快。有的新党员入党以后，觉得自己是党员，对老教授的态度就变了。

七、他建议高等院校的党委，可考虑由省委领导，而不要由市委领导。同时，他希望今后省委书记、副书记、文教部长多管一管学校，多检查一些统战工作，那样党与非党关系可能会好一些。

罗子为最后发言。他谈的是党与非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又偏重谈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从党与非党的关系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

如何搞好党与非党的关系？他分析现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非党人士有职有权。他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他举他自己的情况作为说明。第二种是有职有部分权。第三种是有职无权。涉及到职权问题的情况是：第一，国家机关是由党组负责，对方针、政策、重大决定，

都由党组讨论。非党负责人是不是有职有权，在于能不能参加党组讨论。有的参加了，就觉得有职有权。有的没有参加，党组决定后告诉给非党负责人，这就使非党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第二，机关行政工作是分工负责制。非党负责人分担的工作，如果下面的党员干部听他的，就会有职有权，否则就觉得有职无权。第三，看文件，参加会的问题。文件有两种，一种是党内的，一种是行政系统的。党内的文件，民主人士看不到，有的也看到了，这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说问题就往往出在这上面。会议也是如此。

他说，这些方面，做法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规定，而往往交给党组去掌握。到了机关，又交给党员个人去掌握，这就变得作法不一致了。他举例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传达作法就不一样，有的单位只在党员中传达；有的单位在某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不分党内外，有的党员没有听到也不满意；有的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达。他说这是制度界限不明确。

他说，党与非党关系，在具体到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党员的责任。他说从前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三个人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个党员，三人相处得还融洽。后来他离开那个单位，但那两个人却闹起意见来。这是谁的责任呢？他说是非不清。

谈到如何贯彻有职有权问题时，他提议：

第一，中共中央要做明确的规定：机关党组开会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是扩大会议，党和非党的负责人员都参加；讨论某项业务时，有关非党负责人也参加。至于保密问题，他说非党负责人是会懂得的。还应规定：各机关必须贯彻分工负责制。这样可以加重非党人士的责任感，也可以推动工作竞赛，推动钻研业务。还应规定：凡属于工作、业务范围的文件，应该让非党负责人看。作了这些定规，党组好掌握，党员容易明确。第二，党组代表中央负责掌握方针政策，推动行政贯彻。至于保证，可以由机关党总支负责。第三，应明确机关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给无党无派民主人士表达意见的机会。第四，机关对非党人士，有的不大注意，有的关心不够，有的老干部警惕性过高，使非党人士觉得不受重视。党对新党员教育不够，说话行动都有不好的地方，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五，民主党派几年来没有检查过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应该检查检查，会对成员有教育作用。第六，在广大党员中进行统战工作教育。第七，非党人士也应在改善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上，作自觉的努力。

他还谈到党员与非党人士交朋友的问题。最后他希望像这次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做法，能够订为制度，定期举行。另外还要定期进行检查。这样党与非党关系就会好起来。

陈其尤在今日上午的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在他的书面发言中，首先谈到关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问题。他认为：要切实贯彻长期共存的方针，使民主党派真正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就应该给民主党派能够共存和监督的条件，而民主党派自己也必须创造能担负起这一任务的条件。

怎样才是给民主党派共存和监督的条件呢？他认为领导党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民主党派需要代表、联系他们特定的阶层和人士，同时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这就要在某些城市建立组织机构，进而健全充实这些机构，才可能正常开展它们的工作。但不管是建立机构或者是充实机构，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主张当民主党派需要在某些城市建立机构时，只要这一民主党派在这一城市中有足够的工作好做，领导党就应给予建立机构的有利条件。当民主党派需要调动其成员（他本人同意）回党工作时，只要他原机关不是非他不可时，就应该给他协助，借以充实民主党派

的机构。这一点过去某些地方统战部如广东统战部是做得很不够的，我曾有一次为了要调动一位致公党的成员回党支援工作，就受过极难堪的遭遇。

第二，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在理论上说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统战部的某些同志）的眼中却不一样。我觉得过去领导党对我们致公党的工作是支持不够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时，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居然没有在政协常委会中占一席位，因此，使我们为了开展一些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少出错误，急需知道某些政协常委会的决定时，也只能从私人朋友方面去打听。这对于致公党的工作不能说没有妨碍。今天这种情况虽然有一些改进，但仍存在着重大不重小的现象，有很多重大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的，但我们仍没有机会能及时地知道，以致我们无法及时正确指导致公党的工作。

第三，应鼓励民主党派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和帮助进行思想改造，现在不少人反映民主党派有自卑感，但这并不是天生就自卑，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由于他们不可能看到足够全面的材料，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较全面的意见。不全面的意见提出来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参考的价值，但却很容易遭到极冷淡的反应，甚至会有被扣帽子的危险，再加上他们碰到了不少共产党员的优越感的表现，久而久之，不能不养成自卑感。

我们希望领导党从组织、政治和思想三方面大力协助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有条件承担起监督作用。

其次，陈其尤谈到要求恢复云南大学的问题。他说，华侨热爱祖国文化，要求子女接受祖国教育，送子女回国升学，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但在目前文教建设还一时不能适应人民对于文化生活迅速提高的需要，出现了今年将有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进大学的现象。其中将会有一部分是在国内高中毕业的华侨学生和国外高中毕业回国报考大学的华侨学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致公党曾向政协建议将原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复校，因为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国外华侨的社会中具有同等的声誉，受到广大侨胞的爱护，许多侨胞都希望恢复暨南大学。希望国家能够考虑这个要求。对于归侨、侨眷的居住和迁徙问题，陈其尤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宪法上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规定，但我们因为物资供应和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关系，不能使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自由膨胀。因此，对乡村居民移城市加以若干限制和管理，这是有必要的。但以归侨侨眷而言，则他们很多是没有劳动力靠外汇维持生活的，他们若离开乡村到城市来，对农业生产力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至于物资供应，与其让他们在乡村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而又容易引起农民不满，倒不如让他们移居城市为好。除以上意见以外，陈其尤还对工资改革和物价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茅以升就"墙"和"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做了书面发言。他说：现在各地都在谈党群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但我看像这样的墙和沟，这几年来，不仅存在于党群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群众彼此之间，存在于各机关之间，存在于各机关与群众之间，存在于业务上的外行与内行之间，存在于时间上的昨天与今天之间。这样多的墙和沟的普遍的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几年之久，是不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严重问题呢？我看不是的。这都是些人工的产物，不是天生成的，仍用原来的人工，是可以把墙拆除，把沟填平的。

茅以升认为形成墙和沟的原因大家说了很多，还可补充以下几点：

（1）工作上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性的。然而就因积极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其间就逐渐地会有了墙和沟。积极性差的，看

到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如人高，一时又学不好，只得遇事退缩，不敢以主人自居，先退为陪客，再退为来宾，真实的思想语言，常年闷在脑中。工作总是要人作的，既有退缩的人，就必然有代庖的人，积极性的差别，也就愈来愈大了。这样，就发生了所谓有职无权，党政不分，有力无法使等等的问题。

（2）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我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有个很大缺点，这就是很多组织机构只有垂直系统而无横的联系，身处其中，就不免时时碰壁。比如同一地方，就可有几个系统的同样工作在进行，而各搞一套，互不关怀，更谈不到有无相通。看到这样的浪费，自顾人微言轻，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袖手旁观。其实，这就是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这样的布，在绷紧时，光彩绚烂，是很好看的，但稍一松手，就破绽百出了。我认为，像这样的组织机构是应当研究改组的。

（3）业务计划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化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订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搜集不易，就很难作得尽善尽美。纵然制订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有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但是，上面订的计划和任务，在下面看起来，就必须要贯彻执行，因而就难免要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就难免有墙和沟了。现在各地常说，上边管的太紧太死，但上边也有必须要这样管的理由。如果在计划中分别轻重，预留伸缩，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我想下面干部就可经常开动脑筋，如何来统一这需要与可能的矛盾了。

（4）机关政令的灵活运用。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新的经验，机关政令必须随着情况变化而不免于更改，这是势所必至的，那种认为政令变更就会影响到政府威信的说法是过虑的。一切政令都是为了人民利益，都是好意，但有时也有“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的片面性，因而，这里面就有是非问题，而且应当有所交代。如果以前是错了，承认错误是磊落光明的，最不应该的，是强词夺理地把不是的说成是，还说这是“辩证的统一”，这就阻塞言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因此，政令是可以而且应该灵活运用的，但必须要有充分根据；不能心血来潮，一时冒进，一时保守，弄得下边兢兢业业，无所适从，这就在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造成墙与沟了。古话说民无信不立，要维持这个信字，确不简单，过去这几年的经验是很值得深切回忆的。

（5）工作干部的组织分配。解放后，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服从组织分配”。这在扫除旧制度的种种积弊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移风易俗，观感一新，确是新中国的新气象。然而，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那才算尽了责任，但实际又不尽然，这就影响了被分配者的积极性。本来，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浪费。我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6）业余时间的有余不足。高级知识分子都说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没有保证，甚至有的科学家说，像这样长期的“不务正业”，中国的科学就要面临危机。但是，同时在各机关中，都有很多的人，工作很少，每天甚至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无事做。像这样有余不足的情况，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积极性，造成了墙与沟。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钱”，如果把钱字改成“工作”，这句话对我们也适用的。必须千方百计地减少时间上的浪费，比如开会，就可用种种方法精简。不论大会小会预先宣布开会散会的准确时间；凡有书面的报告，不用在会上宣读；发言的人，先自报讲几分钟；凡可利用广播传达的讲话，一律不开会报告。

（7）保密要求的无边无际，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免空话。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对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好的无人推广，坏的无法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我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8）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留学就听到有人谈起“共产主义在美国是无法成功的，因为它带来了官僚主义，而这是我们最厌恶的”。在解放初期，我就不由地回忆起这句话。但是，在一九五〇年春，铁道部就在铁道系统中大规模地宣传“铲除铁路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证明了那些美国人制造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从“三反”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可见这个坏作风在中国是相当地根深蒂固的了。它已经根深蒂固到这种程度，就是人无不以贪污为耻，但是谈到自己的官僚主义，就仿佛无动于中，其实是同样地有危害性的。我认为官僚主义就是高墙深沟，必须要穷其根源，逐步肃清。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定出各种规章制度，打破吃干薪、少做事的依赖思想，养成自发奋斗的积极性，杜绝官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

自从各地争鸣以后，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各地各方面所揭露的矛盾有很大的共同性。也正因如此，处理这些矛盾倒很可简单化了。这就需要共产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不但在党内整党员之风，还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教育，分清是非，判明功过，来巩固我们人民民主制度，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断言，通过这次发扬民主的高潮，全世界都可看到党的鸣放方针的正确，整风运动的伟大和中国人民前途的光明。

六　月　一　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今日继续举行。这是第十二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全部结束。在这十二次座谈会上前后共有七十多位民主人士发了言。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其瑗，中国各民主党派中

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于振瀛，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初民、杨明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贺贵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伯昕。

陈其瑗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共产党整风的目的和民主党派如何帮助整风的问题。他说，共产党整风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的目的和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是一致的，除此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目的。只有目的一致，才能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才能实事求是，和风细雨，进行揭发批评。当然提意见应该有啥说啥，好的坏的都可以提。但是，现在似乎有种空气，只许提反面不允许提正面的意见，说"整风吗就应该这样"。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整风应该"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不是要把共产党员整死。

接着他谈到有职有责有权的问题。他说，我这八年来就没觉得自己是有职无权，做报告、看文件、检查工作我都有权，也能够参加党组会。和谢老（谢觉哉）及其他部长相处都很好，也能互相开展批评。不但有这些权，甚至"三反"时我还担任了机关人民法庭审判长的工作，共产党员也可以审。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现在有些人说不是党这一方筑起来的，而是双方筑起来的。这话比较公道。但是这几天就有人批评人民日报不应把周建人的讲话标题标得很大。我觉得这个意见不对，人民日报有它的自由，它应该就事论事，它可以报道反面的，也可以报道正面的，不能只允许它报道反面的意见，而不允许它报道正面的意见。我觉得这种看法就是自己筑墙挖沟了。

当然，党内的宗派主义还是存在的。有些人从前不是党员，今天入了党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这种人只能说是害了幼稚病。年纪大的如果发现青年党员有这种毛病，可以诚恳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我在内务部就常和党员谈话。有些党员作风不刻苦，工作不认真，我们年纪大，又是领导，他们年青，不应该和他们有隔阂，应该帮助他们。当然，对于这样一些青年党员，党是应该加强教育的。对他们不能光讲党的光荣的一面，还应该讲党是如何艰苦奋斗过来的，要告诉他们学习、保持党的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造成墙沟，是不是某些制度也有缺点？比如人事制度。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当了首长以后，他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当然我们应该"举不避亲"，如果首长的爱人有德有才当然可以当人事科长，但如果光凭爱人两字就不好。从前官场中有"裙带风"，今天虽无裙无带，但也应该警惕。据政协社会福利组汇报，东北某厂的党、团、工会、行政干部都是亲戚。这次整风就应整掉这种坏作风。拆墙填沟，当然党应该主动进行，但是，如果民主党派人士只要自己见到党员有缺点，就提意见，帮助党员改，墙沟也就没有了。

关于"朋友、先生、同志"这几个称呼，陈其瑗认为民主人士不必去计较，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和沟，但界限还是有的。虽然在爱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下，党员和民主人士是同志，但严格的说在某些方面就不是同志。称民主人士为先生，未为不可。至于"朋友"二字更不可废，真正能做朋友的，在反动统治时候是不会多的。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多的朋友，在旧社会要得一知己朋友非常困难。

陈其瑗还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他说，现在“科员政治”太厉害，有些司长、局长、处长、科长不管事，靠科员工作，这很容易引起科员的不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某些领导人员不学习，靠老资格吃饭，只管“画诺”。这种作风要反对，领导同志应该学习，熟悉业务，了解自己主管的事情，做好工作。

他还认为学校中党委制不能取消，取消了党就不能通过党委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领导行政做好工作，当然管得太多太死应该改正。对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他希望能坚持下去，不要一阵风，民主党派人员也可参加。

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何香凝的书面发言：

最近统战部邀请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我原来很想参加，但因我近数月来身体不好，医生又劝告我不要多开会，因而未能前来参加，请见谅。我虽未能参加这个会，但我却天天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这个座谈会的消息，也看到了许多各党派人士的议论，香凝对此，不能缄默无言，特写此信，作为我的书面发言。

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我常常说：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伟大的，但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却已远远超过了孙先生的理想，把破残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先进的新中国，是八年来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艰苦奋斗得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也只有他是领导党。但是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成功以来，发展得很快，就难免党员良莠不齐，虽然在基本方向做对了，但仍然不免犯很多缺点和错误。许多朋友们在指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时候，我感到有很多说得很对，我也有同感。但也有一些话，我是不能苟同的。

比如我负责中央侨委的工作，但是我七年多来，强调侨眷生产，对归侨难侨应该组织他们生产自救，发动侨眷向国外亲人写信宣传等等问题，尽管我讲了几十次，但我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前侨委办公厅主任张干承，我是非常不满意的。中央侨委浪费的事情很多。有时有些华侨要来和我见面，即使我声明是人家千里回来，我病也要见，但是还和我挡了驾。侨乡侨眷发生过许多问题，对我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比如有些侵吞、贪污侨汇的事实，起初不让我看报告；后来我看了，并再三催促之后，他们才上报。这些事实，说明了在侨委的党员负责干部中确实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地方。我相信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只能阻碍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是没有好处的。同样的现象，恐怕在其他的部门中也同样的存在。

因此，我赞成整风。既然我们的领导党发生了许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就有责任来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使他们工作得更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将自己更提高一步，也就能更好的教育我们民主党派，共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我希望：第一，我们的领导党的党员要在整风中下决心，接纳各方面正确的意见，来改进工作。

第二，我也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们，要诚诚恳恳的帮助领导党，如果或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回想到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我觉得长期共存应是建立在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但是他的事业时常中断，就是在当时的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和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口是心非的，不遵守孙先生的主张，和孙先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革命阵营里面扩展了很多矛盾，以致使革命遭受挫折。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些历史的教训，是要牢记勿忘才好。

同盟会以来，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中经常是联合革命派，对革命还有犹豫的人进行宣传，反对保皇派。当时华侨和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是爱国的，坚决反对清朝的，孙先生就引以为同志；三点会三合会尽管是非常复杂，但是他们对满清不满，孙先生就说服了他们，共同反清。保皇派不管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他们是要保存清朝皇室，孙先生就反对他。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上了台，孙先生就坚决地和反袁的同志们在一道，同时也不忘记尽量多联合

对袁世凯不满的人们．汪精卫从前是革命派这时侯替袁世凯说情了，因此孙先生就疏远了他。后来孙先生看见军阀政客都靠不住，其时国民党在存亡断续之际，孙先生就下决心联合苏联和共产党，并且也不忘记收容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些人们，但对北洋军阀接近的人，孙先生是警惕的，不轻易信任的。用廖仲恺的话来说：当时革命派，不革命派，假革命派，反革命派的变化，是很大的。冯自由在反对袁世凯的时侯，是革命派；但在联合共产党、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冯自由就从不革命、变成反革命了。邹鲁、吴铁城也是一样，反对陆荣廷、陈炯明的时侯，他是革命派；但是国共和作的时侯，他们就变成了假革命，最后变成反革命了。记得孙先生死后，国民党里面的右派，就组成西山会议派，他们反对国共合作，口号也就只有两条：第一、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就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制造左派，因此也就分裂了国民党了。其实，当时国民党内部确实由左派和右派，用不着别人来制造．我就一贯承认我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我就是坚决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右派就是反对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和执行工农政策的。甚至连民生主义，也有人反对。革命党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今天开始，是古已有之的．在抗战开始的时侯，毛主席的方针，根据我的记忆，也就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自然，每个革命的新旧交替的时期中，昨天还是比较进步的人，今天也可能变成比较顽固的人；反过来，昨天是落后的人，今天也可能变为是进步的人。所以一个革命党和它的朋友联合的时侯，我认为当然应该是联合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保守顽固的力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了．

因此，问题并不在革命党应不应该这样做．问题倒是在于在这个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决心参加革命的行列，当一个跟着潮流走的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自己当一辈子右派呢？

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位，应有决心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全世界被压迫人类及贫苦大众跳出水深火热的苦境，这才是革命的左派．我认为民主党派中，每一个愿意进步的人士，都要努力做一个左派，并且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才好．其次，基本上有爱国良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们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努力地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最近以来，我们各界人士，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经过这次整风，我相信领导党一定会把过去的缺点改善，我们亦已畅所欲言，从此以后，六亿人民大团结，共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富强的先进的新中国，留全世界的后人瞻仰．

我希望在整风中，我们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

长期共存也得有基础才行。辛亥革命以前的共存是反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共存是反帝国主义。现在的共存是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现在的共存，还应该记住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这句话，这也是代表左派的愿望。我们共同的基础是存在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改造我们自己。

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待遇及房子问题。我记得当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存亡危机的时候，和越飞进行了谈判，民国十二年冬决定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许多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如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谭平山等，当时他们加入国民党任中央委员后，月薪也不过三十元，开会也都是跑路，房屋则出七、八元租一间，也在这三十元内开支，他们工作非常刻苦，许多实际工作就是他们做的，很多牺牲了的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支援省港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及商团之乱。现在情况不同了，在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我们各方面建设突飞猛进，可是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是大而穷的，为着发展各种建设，财政方面尚有不少困难，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此我们必须忍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应要求处处特殊，而应共同努力来建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于振瀛对统战工作提了几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如何贯彻团结教育的问题。他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对民主党派上层，只重视团结，而不愿谈教育，这种情况一方面容易使得民主人士上层人物产生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一般群众与这些上层人物之间无形中筑起了一道墙。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中、下层，几乎没有接触。在共产党内部至今统战政策的教育还未能普遍地贯彻到基层组织中去，他希望统战部再一次检查统战政策贯彻情况。

于振瀛谈到的第二点意见是：拆去堵塞民主党派的干部殷切盼望参加共产党的墙壁，以满足他们的进步要求，增加他们的工作信心。他说：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提出以后，共产党为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不仅逐步撤退交叉党员，同时在民主党派机关内部不发展党员（特别是领导者和组织工作者），纵使有个别够条件的成员，也不去吸收，未免使有些人大失所望。他希望领导党采取措施，把这道墙拆去。

于振瀛的第三点意见是：要求党要注意安排在民主党派从事统战工作的专业的领导干部，并协助培养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他说：长期以来，民主党派的专职领导干部从部长到副部长，有的得不到国家应有的政治待遇，他们比照国家机关同等级的人员总会觉得是低人一等的，这样使得他们产生自卑感，因而不安心工作。他建议领导上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于振瀛的第四点意见是：建议统战部要深入了解各民主党派的内部情况。他说，以往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情况一般是有了解的，但是否摸到了真实的底呢？只联络极少数人，被动地听汇报，有时甚至以耳代目偏听偏信。他认为如果不改变这种作风，就会筑起新的墙来，旧墙没有拆完，而新墙又筑了起来。

于振瀛的第五个意见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把民主党派的人士纳入整个国家的人事制度内，借以合理解决现在人事上所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几点具体建议：第一对没有具体职务，而有一定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的人，如部分没有实际职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给以具体工作，使他们能发挥积极性。第二，在了解了干部的品质和能力的前提下，有职的应加信任，使其有权有责；如一时还不善于行使权的，领导上也应切实予以帮助教导；如根本与职务不相适应的，则可予以调动。第三，对党外干部也应有奖有惩，使其能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第四，工作不适当的和级别与工作能力不相适应的，请予调动。

邓初民在发言中说：多年来，我感到统战教育太差，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东西，统战部固然要做统战工作。但是，每个党员也有责任。凡是党内同志在作风上叫人难堪的就不能团结人，就是不会做统战工作。这种情况现在好多了。过去几年当中，我亲身感受到的是：这种情况在下层比较严重；中层好些；中央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同志，态度很难叫人接近，说话锋利，不免近于粗暴，根本不把民主党派放在眼里。他说，前年开政协会议的时侯，他就曾建议周总理要做统战报告，当时周总理就要李维汉部长准备，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作。这并不是说有了报告一切就可以解决了，但这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

邓初民认为，说统战部只统了几个人，不一定恰当。他说，中央、省、和大的市、县都有统战部，问题是人有，但是作统战工作的人态度、作风不一定好。统战就是团结，团结起码要思想、目标一致，这还不是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致，起码社会主义方向一致，但是作风态度对统战工作影响很大。有人一作了官，就有点官派。有些朋友，过去并没有做过好官，那官派不知从那里学来的？这种官派，也就是老爷架子，党内外都有。有人说：解放前亲如兄弟、平起平坐的朋友，现在不能经常接近了，因为他做官了。他认为，在我们今天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在职务上有上下级之分，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我们要关心人，人是最基本的生产力。我们不关心人，不搞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不相亲相爱，没有人情味，那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邓初民说，作风、态度不是基本问题，但影响团结很大。"墙、沟"，都是由此而来的。为什么作风不好？他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些党员脱离群众，实际上就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如果你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只要不是敌人，就要爱他，帮助他，这样就不会脱离群众。他认为要推倒墙、填平沟，必须从这些地方加以注意。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像旧社会的酒肉朋友一样，见人就哈哈大笑，"口里喊哥哥，手摸家伙"。我们要真实、自然地笑、笑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只有人会笑。可是，他说，现在有些人见了我就不笑，板起面孔，为什么？看不起我们民主人士嘛。前几天我在太原时一位党员对我说："你们可以骂人，又不挨人骂；我们不能骂人，还挨骂。"我说："谁叫你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是不光荣的民主人士呢？"共产党领导国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受尽了艰苦，过雪山，吃皮带。岂止艰苦？为了革命，党牺牲了多少老年的、青年的同志，流了多少血！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人士跟着走，虽然流血不多，也同共产党员的血流在了一块。因此前天杨东蓴先生提出写中国革命史时应该带上一笔，我以为是公正的。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还应带头吃苦，不带头就领导不起来。说今天共产党员没有带头吃苦，不是事实。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今天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很好，住的房子、坐的汽车都是很好的。许多党员比我本领大，但是衣、食、住、行都不如我。为什么，就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共产党员，就不能这样好。今天还是党员吃苦在前。

邓初民认为墙沟问题，根本上是作风态度问题造成的。他说，统战工作不光是党有责任，民主党派也有责任。民主党派人士相互来往，就比对党员的态度自然一点。他认为墙沟问题是个别党员、个别党组织的作风问题。如果说墙沟是六亿人民和共产党的墙沟，不符事实。这一点要明辩。墙把、沟说成是六亿人民和党之间有墙沟，那还了得，党如何能领导革

命取得胜利？还领导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看问题要有分析，不加分析批判，笼统地说这说那，就会不自觉地为敌人利用，做了敌人的代言人。因为今天还有敌人。虽然我觉得今天还鸣、放得不够，但我们的鸣、放要有个范围。

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说统生不统死。统了死人，可以教育活人。如果不统死，纪念孙中山、鲁迅的大会就可不必开了。但是，有个死人没有统好，就是陶行知先生。把他一棍子打死了，我是心痛的。陶行知先生是留美的，他的"生活教育"是袭用的杜威的，但内容实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说杜威谈生活教育，陶行知也谈生活教育，陶行知就是杜威；岂不是等于说杜勒斯谈和平，我们也谈和平，我们就成了杜勒斯。陶行知为武训作过宣传，但是他告诉我：反动派不答应他兴学，办育才等学校，他没办法，只好把武训做挡箭牌。他先叫陶知行，后改叫陶行知，他从唯心主义走到唯物主义，从不革命走到革命。他在思想上不是完整的布尔什维克，行动上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得益于他的地方很多。他生活朴素，关心人、关心朋友无微不至。他死的时候，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是哭哭啼啼。他有群众基础。他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别人是向上爬，他是由"高等华人"向"低等华人"爬。就因为批评杜威的"生活教育"和武训传，就把陶行知一棍子打死，我不服。我正打算写一篇纪念陶行知的文章，请全国人民、请党重新给他评价。

杨明轩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例如去年冬天他在广西、广东视察中，发现一些州、县、乡的重大工作，往往都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委员会的讨论和通过，有不少是由当地的中共组织或干部会议来决定实施的。其结果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不能按期召开，人民不能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和政府委员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力，他认为党、政不分问题的存在，是和党的领导不够重视社会主义的法制分不开的。因此他建议党应当加强对党员对全体人民法制思想的教育，并且注意对这方面的工作领导，严格执行已有的法律、规章、制度，逐渐完备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

其次他谈到党外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他说他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区党外人士的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甚至副省长往往具体分工管理的工作本来不多，但是就是这样，还常常有些事情已经办完了，还没有人向他们报告；有些地区甚至办公会议和人民委员会议也很少召开。这样，就妨碍了非党人士工作积极性的发挥这，个问题，我认为实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既不放心非党人士能够把事情办好，又不设法帮助非党人士，结果影响了非党人士的积极性，自己也没有把事情办得成功。他认为只要非党人士能够从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而且能够踏踏实实地埋头工作，把事情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就必然会相信自己，尊重自己。相反，如果非党人士象现在批评的那些共产党员那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骄傲自大，计较得失，当然就不会把事情办好，自然也不会取得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

在谈到拆墙填沟的问题时，他指出要把某些党员的错误，同党的伟大和正确加以区别，不能把个别党组织、个别党员的错误同整个的党混在一起来谈。他认为，所以在某些地方有墙和沟，首先是和某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骄傲自满分不开的，他建议共产党应当在适当时期，发动党内外一起来检查统战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拆墙填沟。仅仅如此还不够，因为墙和沟是会不断地筑起来或者挖起来的，一定时期的集中检查，当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经常的拆墙、填沟则更重要，所以还应该建立制度例如恢复双周座谈会那样，来保证筑

墙、挖沟的事件尽量减少；中央如此，地方也应如此。

他还认为所以有墙和沟的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问题，他认为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在和共产党合作共事中我们非党人士是否都很诚恳相处呢？是否都相信党的正确领导而敢于向不良现象进行斗争呢？他认为还不完全是这样。有时侯非党人士纵然有正确的意见但却顾虑重重，不实事求是地讲出来，象这次讲出的很多意见，恐怕很多都是很早积累起来的。这样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产生了对党的领导的怀疑，有所戒备。因此他同意拆墙填沟，是两方面的事，大家都要来动手才能做得好。

最后他谈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中心问题是共同进步的问题。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只要虚心了，就会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在我国革命中的应有作用而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相信党经过这次整风，这个问题必然会进一步得到解决，民主党派方面首先应当继续加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信念，应该信任党的领导的正确，应该信任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民主党派能够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就必然能够虚心学习马列主义，进一步求得改造与进步，有了进步也就必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和党一道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相反，如果不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不虚心学习，进步是很困难的；如果长期不进步，那将不被人民所爱戴，也将不能向党经常提出有益的意见而给予监督。

邵力子在发言中说，去年党对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很使人动感，对党内外的教育意义都很大。但是，党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还是不多的，这方面的教育还不够。去年清华大学要我去讲演，我看到会客室里有世界伟人的照片，但是没有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今年到一个工厂去，也看到同样情况。如果只挂毛主席像，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挂上外国人的肖像（当然，不是指马、恩、列、斯），而不挂中山先生肖像，我有意见。

他说，去年我到广东视察，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的人介绍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句提到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孙中山先生的讲演陈列。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毛主席全力组织的，但是孙中山先生有篇文章讲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什么不放进去呢？

邵力子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对的。但这只是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列时可以这样提，平常不必这样提。本来，对辛亥革命的这种分析、估计，并没有看不起辛亥革命的意思；但是青年人在学习理论的时侯，有教条主义现象，容易低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绩，以为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反动的，没有意义的。

邵力子举例说：去年我们正在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侯，党报发表的文章当中，提到孙中山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社会主义有各种形式。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算孙中山先生不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在纪念他的时侯这样说呢？这句话，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年轻人就容易误解，以为孙中山先生不值得学习，不值得纪念。

贺贵严在书面发言中说：统战工作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因素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已经做了总结的。谁都知道：统一战线是有团结也有斗争的，而且它还是以斗争来求团结的。这样，革命才得到迅速的成功。不过，提到斗争和团结，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它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还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才能迅速成功的。我知道在抗日战争当中，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上，实施了“三三制”的人事安排，使许多非党人士（包括国民党的和其他党派 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都感到：他们所希望的，共产党已经代做

了，用不着再来要求。只是自己没有一些工作表现，就享有这些成果，感到惭愧。因而每一个人都争取从各方面努力来帮助共产党。这样，革命成功快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三三制"的人事安排，我以为除了表现着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艺术而外，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恕道"。它是从"共产党要我有，也要人家有"的"恕道"出发的，是从推己及人的精神产生出来的。这种"恕道"直贯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我以为"恕道"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侯是极为需要的。因为有了"恕道"就可以和风细雨地对犯有错误的人进行教育，所以说"恕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因为它并不同于对抗性斗争的。所以只要有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时期，它是能够发生作用的。"恕道"原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它是一种"人己"的关系，这在中国的旧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譬如说："推己及人谓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可以成为"人己"的平衡标准。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其中许多地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的看法，其中许多地方也包含着"恕"字的道理。例如，说到信仰自由，毛主席说："你不能强迫人家不信宗教，不信唯心主义。"又说："资产阶级要改造"，同时又指出："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又如：讲到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时侯，毛主席就说："共产党有多长，民主党派就有多长。"这些话都含有推己及人的积极意义。至于中国命革的特点——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点，不采取剥夺的方式，除给与资本家以定息之外，还给与饭吃，给与工作．这就包含着"恕道"。这都是推己及彼，将心比心的道理。使中国的革命工作，无一不深入人心，真是所谓：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革命成功之快，岂是无源之水？！

反观现在要整的三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犯了后面两害的人，是这次意见提得最多的，我现在想对他们的思想根源举出来批判一下．他们的思想中是否还有些"恕道"——推已及人的影子呢？我想是没有的，他们是有己无人的．即使说他们没有看清楚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因素，也不算太过分吧．

首先，讲犯宗派主义错误的人，他在提拔干部的时侯，不在贤能上着眼，而怀着宗派情绪，他不仅眼睛里没有看到别人，也就是眼睛里没有看到革命事业．

其次，讲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错误的人，他们不仅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处理问题，而且也没有推己及人来考虑问题，所以党的许多政策到下面执行上就发生了问题．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我以为还是缺乏"恕道"的这一平凡真理所致．我有这样一种设想：可以不可以在马列主义的理论讲座中，同时批判地谈谈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吸取其中有益于人民大众事业的因素，扬弃它带有封建性质的糟粕，这于革命会是有益无损的．

说到统战工作，更是要把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这只应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来达到统一的目的，绝不应使党员迁就落后来求得统一．不过在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时，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发现非党人士有了错误认识的时侯，对于错误的动机，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给以正面的帮助，才能使人心服．在客观形势已经有了大的发展的今天，还采取不信任和粗暴的态度来对待非党人士的错误，显然是工作已经落后于现实的要求了．王绍鏊先生第一次发言，涉及到统战部对民主人士的态度问题，我是同意的．

徐伯昕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和学习工作；第二是扩大团结面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是认真处理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所反映的意见。教育和学习工作，固然是首要工作，但是认真处理反映的意见更是一项重要工作。

民进去年八月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会前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期间的充分发扬民主，对中小学教育、文化、出版等各方面反映了不少的问题和意见，有的还提供了具体建议，我们都分别送请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根据教育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民进的答复，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教育部研究后归纳为九项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已通知各省、市教育部门列入工作计划，同时组织了调查组分赴六省、市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对其中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已在分别解决，对目前还有困难而只能逐步解决的问题，要我们向大家解释清楚。

这样的答复，一部分还有待于在执行中作进一步的检查，但是这种答复就表现了尊重和认真处理了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是可以鼓舞民主党派帮助党和国家机关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对推动和改进工作是有帮助的。作为党的助手的民主党派来说，也更愿意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但是文化出版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处理得怎样呢，至今音信杳然，石沉大海，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般人民来信都应认真处理，为什么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竟如此忽视呢，这就难免被怀疑民主党派的可有可无了。

我建议民主党派和有关部门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双方有重要会议可以通知派人参加。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必须做到有交代、有着落。

从我切身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工作的联系、关心、帮助不够。当然，我们不能抹杀事实，统战部对我们民主党派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去年八月民进开全国代表大会，那正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不久，许多新的问题摆在面前有待解决，统战部及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由李维汉部长邀得我们中央领导同志长谈了一次，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当前的重要方针任务，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别是鼓励我们要在这次大会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使我们这次会议有了明确的方向。这样诚恳的帮助，对我们开好那次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由此可见，统战部的认真帮助，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有多么大的好处。既然有好处，那末为什么不更多地给我们以帮助呢？正是这一点，就是我要向统战部提出批评的地方。

我说统战部平日对我们联系、关心、帮助不够，主要有两点：

（一）从政治思想上、从工作上帮助我们提高不够，象我上面所说的在开代表大会时给我们的那样帮助究竟最多只有一年一次，平时和我们共同研究问题的机会很少，尤其在现在这大变动的新形势下，在我们民主党派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民主党派内部的一个主要矛盾是成员要求加强思想领导，而我们的领导工作赶不上成员日益强烈的要求，民主党派如何加强思想领导工作，固然要民主党派自己研究改进，更重要的还在党从政治思想方面，工作方面多给帮助。例如这次党开始整风，统战部召开这样的座谈会，约我们来放、鸣，帮助党除三害，这很好，但是关于我们应如何领导我们各地方组织进行工作，以帮助党整风，统战部还没有和我们共同商量，现在我们各地组织和会员积极性都很高，都有愿望要帮助党在整风中发挥积极作用，我想像这样重大的工作，中央统战部应该和我们共同研究一下。

（二）统战部同志和我们民主党派各方面的同志平时接触联系太少了，我们有不少同志对统战工作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们与群众较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希望有机会和统战部的同志多接触，能促膝谈心，互通声气，也希望能把他们所接近的群众的意见直接向统战部反映，但是统战部同志却很少主动与他们接触，这不知是因为统战部的同志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来呢，还是有官僚主义，希望在这次整风中能检查一下。

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应当是发挥党派作用的基地。它的工作能否开展，固然在于组织本身是否健全，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否重视民主党派的基层的作用。因为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机关、学校、企业的党组织就是该机关学校企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尊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给以信任，在工作中真诚合作，充分运用和发挥它的作用，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以民进来说，我以为目前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关系大体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作得好的，党的基层组织一贯重视我们的基层工作，通过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布置中心工作的时候能够主动和我们联系，约邀我们基层组织的代表参加共同研究。向我们说明党的政策方针，对我们提出要求，听取我们的意见，通过我们团结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比如去年有不少单位运用了党派的力量，工资改革工作就做得比较好。第二种情况是彼此相敬如宾，客客气气。表面受到尊重，实际上很少得到经常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第三种情况是不听取我们的意见，也不要求我们配合工作，甚至有所歧视，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议布置工作时，不要民主党派参加，思想上根本没有民主党派地位。认为有民主党派是麻烦。有的学校党员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党对民主党派的"恩赐"，有的怕民主党派提意见，甚至有"天下是我们打的，你怎么能监督我"的说法。这种宗派主义情形是严重的。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但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我建议党对在基层中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行一次检查，把好的经验总结和交流，对那些犯有宗派主义的党员或者党的基层组织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大力加以克服，并且在党的基层组织内经常进行统战政策的教育，以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现象。

六 月 三 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今天下午结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讲了话。

李维汉说：我们的座谈会从五月八日开始到现在，举行了十三次，有七十多位朋友讲了话。大家的讲话接触到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这些都在各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

我们的座谈会已经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成立有关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正在由九人小组进行整理，凡是可以交由双周座谈会和讨论会去研究处理的，都分别移交过去；应该交由其他有关方面研究处理的，也要分别转交过去。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工作中无疑地是存在着的。因为整风刚开始，我们还不可能作出必要的分析、估计和结论。我们还要更多地征求朋友们的批评和意见，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检查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将同时注意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向朋友们请教。

许多朋友提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我们认为应该这样作。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个既定的方针。中共诚恳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监督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有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存在着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各党派之间，尤其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则，互相尊重平等、独立的地位，又能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为依据，实行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就一定能够长期共存得好，长期合作得好。许多朋友批评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帮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够，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和进步帮助不够，对民主党派工作中的某些具体需要帮助不够。我们的同志会重视这些批评的。我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在取得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来改进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

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我们认为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宣告结束，我向朋友们致衷心的感谢。

在李维汉讲话以前，座谈会商讨了建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的问题。大家同意建立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前几次举行的这个座谈会上，曾由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严希纯（致公）、茅以升（九三）、李纯青（台盟）组成九人小组，对在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四十八条意见的处理情况进行检查。在今日下午的座谈会上，黄琪翔代表九人小组对检查情况作了说明。他指出，这四十八条意见，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处理；有几条因为情况发生变化，问题已经不存在；有几条是应当由民主党派处理的。

（综合5月22日、23日、31日，6月1日、2日、3日、4日《人民日报》）

（原载《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

（一九五七年五月）

五　月　十　五　日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出席的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叔通、章乃器、胡子昂、吴雪之、乐松生、毕鸣岐等。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在会上先后有韩志明、马春霖、李贻赞、谢惟安、彭六安、李仲平等六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说：第一，全面合营以后，对私方人员的安排工作做得很不好。上海原来是打算一个月安排完毕的，后来到年底也没安排完，原因是摆不平。有人说过去工商界图利，合营后利得不到了，对名很有兴趣。那些出头露面的人都安排上了，下边就问：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都是工商联的委员？"名"他们是争到了，但不能做实际工作，只挂了个空名，而原来许愿要安排的，至今还没有安排，因此下边有些人就说：我们抬轿子把他们抬上去，就不管我们了。安排人不按工作需要，而是论功行赏。这样作对工商业者本身的改造也没有好处。现在政府提出工商业者改造以企业为基地，这是正确的。但那些骨干分子则不然，他们整天在外面活动，有很多人甚至身兼十几职，开会开个头就走了，这就使他们脱离群众。

第二，有人主张在合营企业里不派公方代表，就可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了。我认为这样作不但对私方人员的改造没有好处，对工作也没有好处。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把握在没有公方代表帮助下把工作做好。在企业里，不论他是公方人员，还是私方人员，只要是他担负了职务，那些经过民主集中以后的决议，就可以交给他执行。执行的好就表扬，执行的不好就教育。而现在有些企业领导人员是私方，犯了错误可以谅解，这是不对的。也有些人一见私方人员工作上犯了错误，就狠狠的批评，一棍子打死。这也是不对的。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现在是五厘定息，我认为工作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应有阶级关系。提阶级关系，不容易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对私方人员也应有奖励有批评，有升级有降级，才能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董事也应给予安排，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问题也应解决。近年来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希望向劳动人民过渡，应该使他们看到前途。

他说，有些省市到上海动员迁厂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吃的好，住的好，但迁到目的地以后，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有个从上海迁到北京的西服店，在上海时他们父子两人每月拿二百多元薪水，就不愿去，北京有关部门说生活有问题可以暂借款，但给他评了个每月七十八元工资，也不准借支了。他们就感到很困难。他认为原来怎么讲的就该怎么做，政府对这个问题应加以处理，否则影响政府威信．

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我们私方人员对有职有权的政策是人人感激的，对党和政府是满意的，但对具体执行的人员有意见．过去，三、四十人的小工厂，私方人员在管理上有余力，现在合并成三、四百人的大工厂，私方人员大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公方又不能大胆使用我们，再加上公方来点主观，党和行政来点教条，工会和团来点宗派，于是有话欲说无地，有言欲发无处的境况就出现了。工作上唯唯诺诺的现象在私方人员中不是个别的。

在提合理化建议方面也有有劲使不出的现象。沈阳被帝国主义统治时间较长，受的压迫较深，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

在公私共事方面，他认为应在党的领导下，从工作出发，开小型的，甚至两个人的、或者公私双方在一起的会议，会议要有争论，有些问题要有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计划会议和党支部召开的有关生产会议等，也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在具体执行工作任务时，要做到具体领导，分工负责，职责分明。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贻赞**说：第一，在北京，公私共事关系问题主要是公方对私方信任不够，所以私方人员很难发挥积极性，公私双方每天在一起，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互不往来，正如俗话所说："麻杆儿打狼两头怕"，公私互存戒心，这样，他们就不能通过互相谈心，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公方业务水平低，使用干部只重政治不重业务。第三，企业内部产、供、销人员扯皮，局与局之间也扯皮，弄得私方人员很难工作．因为他们有自卑感，看到这些情况就更不敢表示态度了．

目前，北京工商界的情况是上层闹名誉地位，中小工商业者愁生活困难．过去工商界有句俗话："有买卖饿不死掌柜的"，现在不同的，生产资料入股了，亲友借贷停止了，去年还可以借支，今年借支紧了，有的部门甚至根本不借．他认为对中小工商业者来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是发挥他们积极的关键．

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顾虑："放"有没有条件？哪些可以"放"？哪些不可以"放"？放到哪一级？是否只在上层代表人物中"放"，中、下层不"放"？在什么地方"放"？放到什么时候？是一阵风，还是经常的？私方人员有不少话要讲，有些话不是上层代表人物所能理解的．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他们怕与阶级本质联系起来，怕以后另一个运动来时，作为批判的典型，批判的根据．这种种顾虑主要是由于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同党员的个人作风也有关系．有些工商界的人反映，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尊重有余，信任不足，和党员接触感到冷冰冰的．

好多年来，各方面对工商联的支持是不够的，从中央一直到直属上级都是如此。例如江苏省工商联的电话费，就不是按人民团体的收费办法收费，而是按私营企业的收费办法收，据说这是邮电部的规定。我认为这件事就反映了对工商联的看法。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的干部可以到工商联去发号施令，对工商联的干部可以随便使用，有些是可以按他们的意见决定。这种情况需要加以改变。

工商联的干部，本来是与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但实际待遇却不同。例如无锡市工商联有四十多个脱产干部，至今没人领导他们的学习，有些福利问题也没有人管，这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影响。

湖南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湖南省的公私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就是不能以诚相见。现在私方人员感到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两顶帽子就是怕人家说不服从领导的帽子、怕别人说不接受改造的帽子。两个包袱，一个是怕犯错误。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有的分不清界限，搞不好就犯错误；二，现在企业大了，自己没有本领，怕工作做不好；三，我们是被改造的，错了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同情，工作中出了错担当不起。第二个包袱是怕挨整。在解放以后五反以前，凡是敢于提意见的都挨了整，现在凡是在公方面前表现唯唯诺诺的人安排的都好；凡是爱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安排的时候也两样。一个苦闷是：工商业者目前的情况是上班在企业，下班就回家，过去旧的生活习惯取消了，但新生活习惯没养成，党团员接近不了，工会也不能接近。甚至有的工人到自己亲戚的私方家里去，公方批评说是立场不稳，弄得六亲不认。有人说公私合营以后亲友间的关系都冷淡了。

他说，造成上述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的。第一，对私方人员尊重不够，有些会议都是党员参加，私方人员有的担任科长副科长，但有很多会都不能参加。在工资改革时，有的专业公司要私方担任小组长，但既未听过报告，又未看有关文件，如何能领导小组？这就影响了私方人员积极性。第二，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第三，待遇不平等，例如福利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个别地区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加班却拿不到。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第四，在人事的安排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了，私方人员的安排，有些是不恰当的，有的有技术却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却安排下车间。一提安排就是政治条件，出身，这说明有关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有几个关系。一个是公私关系，一个是阶级关系，一个是党群关系。搞生产经营、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政治、业务学习等方面，我认为是没有阶级关系的。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方人员应该听取私方人员的意见，当然，过去有些会议上公方人员也听了，但听了以后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听都不愿听。有些私方人员说：不是我们不积极，我们作不了主。我们是小媳妇，"小媳妇难为有米炊"。

他又说，对私方人员不要乱扣帽子，要明辨是非，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有些报纸提到，工商界就是五年睡觉，两年改造，定息后工商界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前年我们来北京开会听了毛主席一次报告，从思想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感激得流泪，听了后我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说出来，这证明讲道理比扣帽子好，扣帽子就不解决问题。他希望公方人员伸出手来团结私方，在生活上也打成一片，要谈心，要什么都谈，才能使人感到温暖，对

工作才有好处。

四川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现在私方人员认为：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这山望着那山高。为什么这样呢？除了思想没解决外，主要是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在一个地区同一类型企业中，有些人工资高，有些人工资低。四川省工资改革前私方人员知道加13%，有的就预支了钱，但后来没达到此数，负债的人很不满意。虽然经过思想教育，有的人知道生活福利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但仍有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政府开了空头支票。当然，工资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的，但是生活有困难的应该帮助解决，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家里九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困难不太大；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他找工商联解决，工商联推给专业公司解决，互相推，才借给二十元。以后又发生困难，找专业公司，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五　月　十　六　日

今天，座谈会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三人。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伯平继续前天的发言。他说，四川工商界反映：有些上层代表人物有意见不敢大胆反映，报喜不报忧。其原因，有的人是从个人利害出发，有的人是不深入下层。所以不能深入下层，主要是兼职太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他希望有些人不要兼职太多。有的人当了副市长、副县长就脱离了群众，这些人应该多搞些工商联工作。他说，有些兼职虽然多，但是真去掉他一些职务他也有意见。他认为对于这些人，可以保存他的兼职，但要确定他的主要任务。最后，他说，统战部的工作的缺点是统上不统下，应有一定的时间比较深入些。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说：关于工商业者的阶级关系，去年大公报曾经鸣过，参加争鸣的文章中多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当时我认为是非对抗性的，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大公报，大公报给我退了回来。既然是争鸣，为什么不让人鸣？大公报说，他们也不敢说是非对抗性的，于是我就只好戴上了"对抗性"的帽子。工商界人士就怕扣住帽子，有意见就不敢提了，就不能发挥积极性。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私方实职人员的思想情况，总的是进步的。但不能说公私、私私之间就没有问题了。去年提出定息七年以后，工商业的中小户对这个问题并不感觉重要。大户的定息虽多，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拿这么多定息有些难为情。有人提出：政府为什么不采取"自愿的办法？人的思想不是一齐改变的，难道到了某一天，可以一起摘帽子吗？毛主席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的瓜不仅熟了，而且快要烂了，为什么还要等？上海李康年提出定息要拿二十年，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思想发展情况不相符，这是争鸣的问题。从我们的思想和子女来讲，我们再也不愿再吃二十年的剥削饭。

有的公方干部作风生硬；有的问题，党、团、工会已经讨论过了，再拿来和私方商量，这是形式。改变对资本家的观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单靠私方可以做到的。要求党大力宣传私方已经改变的情况，向职工说明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对立反抗，不要以为反抗就是进步。目前，有些干部强调阶级仇恨还存在。天津南开区有一个干部在听赎买政策报告时说："不要看资本家合营时表面积极，他们的内心是男盗女娼"。还有个民建会的会员去开会向

公方代表请假，公方很不耐烦的说"你去吧，反正是信教自由"。

有的干的部不尊重私方的职权，公方代表不在的时候，把文件给秘书批办，而不交给私方人员。有的厂保密过严，从事调配不同私方商量。

目前工商界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资本家一般的资金不多，尤其是经营商业的资金更少。在福利问题上，在二千元上下划一道线是必要的。但有了这条线，一切待遇都不同了。如天津规定，二千元以上的资方，所得的定息要拿出50%买公债、拿出10%交互助金，七折八扣，剩下的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私私之间不团结的现象，在企业中仍然相当严重的存在着。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私私之间互有成见，同时公方和党支部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有的公方对私方之间的问题，不闻不问。我们要求公方对私方人员要多进行思想教育。

过去工商联、民建会这两个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使得工商界不满。

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员同志虽然参加了我们的学习，但他们采取了旁听的态度，冷若冰霜。我们要求党员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我们也有帮助。

中央提出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后，统战部对民建会就不过问或过问不多。民建开二中全会时，听说统战部要撤回党员干部。我当时坚决要求党员干部留下来工作。我们要求统战部帮助我们，问题不在撤回党员干部。

他认为目前有少数党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展了严重的骄傲自满、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目空一切，眼里没有群众，站在人民头上压制民主；有的喜欢别人吹捧，好听阿谀之词；有的感情用事，看问题不实事求是；有的好象他一个人就是党，他的话就是党的指示，加上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只听下面党员的汇报，这些党员可以对别人打击报复，他们最有威力。在这种人下面生活的人，也学会了善于体会这样的干部的意图，顺着他跑。

乐松生说，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个别公方还不能放手使用私方人员呢？这是因为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小徒弟是团员，说句话就能听。当然徒弟的话也有对的，但很好考虑私方人员的话也是必要的。我相信，如果能大胆使用私方人员，每一个私方都会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些私方人员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可以为党牺牲性命，跟着党走。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是否信任。共产党员上下不一样，上面还好，下面差。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我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填平这个鸿沟。希望多采用个别谈心的方式，不要怕被资产阶级沾污了。我想，如果公方伸出温暖的手，私方不会不去拉的。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现在有些人拿定息不安心。原因是：一、工商界学习时说："拿定息就是剥削，剥削是可耻的"。民建开会也说拿定息是剥削。所以，有人对拿定息有顾虑。二、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私方人员拿定息，企业里才有阶级关系。他们感到这是一种压力。而且在企业拿定息，要通过公方领取，职工也看到，拿定息好象做了亏心事一样，理不直，气不壮。三、大、中、小户定息多少不同。大户拿一年定息，够维持几年生活。有些小户定息少，不愿拿，但非拿不可，认为是被大户拖住了。中等户也有不愿拿的。四、工商联说："定息和工资不同，拿了定息就应该买公债。"这也是一种压力。

他说，工商界代表人物，如正副主委、正副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作风，有宁“左”毋右的思想。原因是各级工商联都是块块领导，即由当地党政领导，而没有很好地进行垂直领导。工商联要受同级人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有人就认为工商联应受当地政府的具体领导，因而有人说工商联成了政府的“派出所”。组织不独立，工作就不能主动。

他说，对工商界，应该有鼓励、有批评，以鼓励为主。但现在是以批评为主，而且批评得太尖锐。如工商界拿了定息，就批评说满足于“三定”，安于现状。有些人提意见，就批评他骄傲自满；没有意见，又批评他自卑，唯唯诺诺；使工商业者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以致形成工商界对工商联也不说真心话，工商联也“衙门化”了。福州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市工商联什么问题都由党组织决定。我们不敢在工商联面前说话，说对了他们（指党员）说不对，说不对的他们又说对了，于是，我们只好宁“左”毋右吧。

他说，工商界来参加省人代会、省政协工作，大家认为不起作用，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第一，会期不定，一再延期，很长时间才开一次.原因是准备不够，被更重要的会议挤掉了.我认为被挤掉是主要原因.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开省人代会，为什么这时才开呢？因为年终要交账，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开。市人代会也有问题，县人代会更有问题，说增产节约，开会要花钱，就少开会。我认为不能为节约就少开会。每次会议都是讨论过去工作和总结今后的任务，其实事件已过去了一两个月，已经具体化了，还讨论什么？再加上准备不足，所以讨论不出什么。福州市人代会问题更多。一个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灯不亮，米不够吃，课程繁重”。发言以后就受到了批评。我们工商界发言，更容易受批评，因此大家说话都有顾虑。我参加福州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每年开两三次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包括兵役报告、财务报告）和中心任务、人事任免等等。人事任免在三个月前就发表了，还讨论什么？有一次讨论分配公债问题，有一位民主党派代表刚说机关人员少些，农民多些，接着列席的有关局长就进行解释和批评。我们委员有权发表意见，反被列席的局长批评了一顿。他说，这是个法制问题。

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一、工商界为什么不敢放，不敢鸣？一个原因是几年来舆论的压力。资产阶级是被改造的阶级，“是非只因多开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个原因是工商界对方针政策不明确，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他讲到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安徽省安庆市国药总店在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意思是神气起来了）。”这种一放一收的做法，害得私方人员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这说明，要“放”应该给放的条件。再如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另外，我们工商联的某些领导人也学了些教条主义。不管什么问题，动不动给下边戴帽子。这也增加了下边的顾虑。

二、国家法制问题。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它的政策方针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给我们作了很多工作，波匈事件后，我们都觉得党正确，引以为骄傲。但是，政府的法制，任何人也要遵守。我几年来接触到的和看到的，有些共产党员是不注意遵守法

制的。有些会不一定非要党员才能出席，有些会，不问党与非党，需要参加就参加。我是秘书长，在我领导下的党员科长就比我知道的多。他回来是汇报好还是不汇报？我是问好还是不问好呢？

三、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有的工作安排得不适当，也容易使他们产生骄傲情绪。有些人是有代表性，但他不作实际工作，我说把这些人安在政府部门，这是古董。办公厅里是不能摆古董的，古董应当摆在古董店里。如果是旗帜，要有旗杆，挂在外面，让人看见，不要挂在室内。

内蒙古工商联秘书长**郑允命**说，两面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但是，积极面是主要的，消极面是次要的，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个统称。有些党员一提工商界就是两面性。这种片面看法，对工商界不是帮助，而是打击。他说，合营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工商业者有职无权。公私共事关系在内蒙古自治区基本是好的，原因是有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高。但也有不好的，主要表现在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造成私方人员遇事推、拖、拉。企业党支部包办代替，集体领导不够，个别党员独断独行，有些会议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研究的，也不找他们参加，使他们产生顾虑。个别党员态度粗暴，遇事不耐心教育，加重私方人员的顾虑，对工作不利，也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做法。

郑允命说，党员干部有斗争经验，为国家出过汗，是人民功臣，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有的党员过分炫耀自己，工作方法简单。对非党群众，从个人主观主义出发，不敢大胆使用，使私方人员遇事唯唯诺诺。他说，私方人员拥护社会主义，跟共产党走，私方人员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干部只有团结他们的义务，没有排除他们的权利，不信任他们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让他们有职有责。工商业者有话也应该大胆的放，大放而特放。只有大胆放，才能得到更好的果实。

郑允命说，工商界大小之间有矛盾。合营后，又是公私关系，又是阶级关系，当两面人不好当。内蒙古自治区大工商业者少，中、小户多，特别是工业，五百元以下占80%。大户定息七年不变，他们不愿放弃，个别人认为定息二十年也不算多。中等户认为拿定息不符合爱国精神，要，怕摘不了帽子；不要，又怕得不到劳动保护。小户急于要求摘帽子，愿意要"工人阶级"，不愿意要"小资产阶级"。这些中小工商业者觉悟比较高，50%以上要求放弃定息，但是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们说政府把他们的真心当成了假意。他认为这样拖下去是不好的。他说，我们中国国家大，各地气候不同，瓜熟蒂落有早晚，应该熟一个摘一个，熟一批收一批。这样，既满足工商业者的希望，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天津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瓒**说：从一九五三年普选起我就担任副区长，感觉有些苦闷，感觉是在作客，感觉得不到信任。我担任政府工作之后，有人告诉我，今后工作应该知道的知道，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我不知道，但是，这在机关里是普遍的。因此，我工作上就听之任之了。我认为，需要有个规定，谁应该知道什么事，应该按职位来确定。但现在不是按职位，而是按人。

在工作接触中，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使人难堪。例如今年三月份，区里布置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视察的事情，有个秘书给下边起草了个通知，里边有一条"接见代表时要客气一番，茶烟招待、面带笑容"，第二条是"讲究策略"。这种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不是个别的。

从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开人民委员会，是形式主义，只是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很少对政策方针进行细致研究，要讨论的事情党内都先讨论了，党员再参加会的兴趣不大，使委员们感到只是政治照顾，其他问题很少考虑。会议成了形式。一般说来，党外人士对党员是很尊重的，党员也应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应认识我们是六万万人之一，而不是六百万人之一，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是六百万人之一。应当克服这种优越感。

定息七年的问题，大户满意，中户随意，小户不同意。投资不多的都希望摘帽子。小户说：为什么我们要陪大户过七年呢？陈云副总理说："小户投资不多，少数放弃定息，我们不反对，工会也可以吸收"，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这样作的。同时，公私合营了，资方代理人的基础消失了，为什么资方代理人这个帽子还非戴不可呢？戴这个帽子工作上有困难，在企业里工作只是强调阶级关系，压力很大。人事部门一找，就有些怕，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原因就是强调阶级关系。

此外，部分工商界的人士对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意见很多，苦闷很大。从经济上看，合作社是劳动者的组织，但收入比过去减少了。有人说："什么是工作？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是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

吉林省工商联秘书长郑砚耕说，吉林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原因是公方人员有阶级优越感，例如，有一个大车店，私方人员对工作提意见，公方人员就说他不服从领导；私方要想找公方人员当面谈谈，公方人员就说他没有资格。这个问题反映到工商联以后，工商联想找公方人员交换意见，帮助解决，那位公方代表对工商联干部仍强调说："他们（指私方）有什么资格和我个别谈话。"类似这种现象很多，这反映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联的看法，也影响私方人员的改造。他认为在合营企业里应多强调共事关系，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就会造成隔阂。

他说，吉林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最近要公布了。过去私方人员对这件事很关心，抱着很大希望，后来听说调整幅度不大，就不大高兴。

有关工资改革问题，他说，有一部分业者，在高潮前不久，为了维持企业，自动降低了工薪。虽然陈云副总理在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说：工资高的不降，降低的也不提，都不算错……。我认为原则上是对的，但不能以理服人，应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调整。还有部分合作商店，在合作当时，把工薪降低改为借支，但由于分红数字很少，情绪不高。对他们的工薪也应适当调整。

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经常得到党员的帮助，工作很顺利。但是，到省以后二年多，连统战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统战部长从未找我们谈过话。有一次，省八办有个处长到工商联联系工作，临走时告诉我有事常常联系，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也可在电话上联系，可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印在专门的小本上，我们根本没法知道。

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说：现在在公私共事当中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人员的职权否定了。去年下半年开公私座谈会时，有人反映：一个私方副厂长，因为厂里的事给办事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后边挂了几句说："某某同志（工人），要结婚，请从上海带些礼物。"这封信被公方代表秘书看见了，就批评他不该把私人的事情写在公事信里，还说：这是腐蚀工人阶级，一定要他检讨。他检讨了，但是想不通。有许多工商业者，过去要好的朋友，现在也很少来往，原因是怕戴三顶帽子：小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大不小的是"搞小集团"；大的是"阴谋诡计"。这三顶帽子，不得不使大家明哲保身。现在一般工商业

者的生活，只有上班办公，下班抱孩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薄。对工商联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某县搞文娱活动时，要工商联帮助搭戏台，戏台搭好了，工商联的干部也帮助装了扩音器，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工商联的人退出会场"。这种歧视工商联工作的事情并不是少数。在绍兴县，有人说工商联合会的会费是中间剥削，提出要废除。这样下去，工商联的工作如何开展？

广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劳元熙说：党发挥我们的主动性是对的，高潮后，把党员秘书长调走了。可是，在调走以前，统战部没有考虑一下我们非党的秘书长会有什么困难。其实我们工作上有很多困难。过去许多工作多是市委布置，文件都是党内发出，原来的党员秘书长能看到，他走了以后，方针政策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我们提出可否用政府名义把文件发给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做工作只好完全靠自己摸。

广州市安排了一千多人，在试用期间工资是一百三十分，以后长期没增加，我们提过许多次意见，过了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才给增加了五分。安排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各人的特长合理安排。过去的经验无从发挥。一位大学毕业经营药材很有经验的人，安排去卖咸鱼、开发票；一个经营蔬菜的老行家，安排去卖油。我们提出以后，才把卖油的调回来，可是两三个月都没给安排工作。最近又碰到精简机构、冻结干部，看来问题更不好办。有人说：早合营不如晚合营，早改造不如晚改造。这虽是牢骚，但是党政部门也应该考虑，应该先解决早接受改造的人的工作问题。

广西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有些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比如有关改进业务和改进产品质量方面的文件，私方负责人很少看到。我去年到南宁开会，了解到有一种柴煤两用的玻璃炉，我将建炉的图形画好寄回厂，但公方厂长一直没有给负责生产的私方副厂长看。到我回厂时，问私方副厂长对这个炉的构造有什么意见，他说："只看到你寄回来的信，没有看过这个炉的图形。"你说怎不叫私方人员产生自卑感？连文件都不给看，还谈什么有职有权呢？

有些公方代表摆出架子。是不是摆架子就使人对你尊敬？我认为这只有使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七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六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摸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这样，哪里谈得上与公方谈谈生活和学习情况？如果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公方，公方怎样对私方人员教育和帮助？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吗？

有些公方代表，对于企业生产的事情，每天只找党支书、党团员和工会负责同志商量，不同私方负责人一起研究，把私方负责人当成企业外的客人。这就难怪私方人员有作客的思想。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私方人员同意改变，但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当时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这样怎叫私方人员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他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并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的。他说，资产阶级既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又以资产阶级为朋友，那么，对工商业者就要采取帮助的态度，而不应

该采取歧视的态度。为什么有些公方用歧视的态度来对待朋友？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加以检查。

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柯尧放说，大部分专业公司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大部分手工业管理机关和合作社，只抓生产不抓教育。合营企业的党团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在职工群众中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某陶瓷厂公方厂长和私方副厂长一道工作回来，公方厂长买一包花生米和面包，自己吃，对私方副厂长连理都不理。有一个机器厂的工会主席说：工人就是不相信私方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某单位公方代表召集职工开会，工会组长竟不让私方人员参加。这些情况，使私方人员产生消极情绪。

江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修锡说，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上并不是不动脑筋，然而，为什么工作仍然没做好呢？原因是没有好的工作条件，有顾虑。拿我个人来说，我作工商联的秘书长，就有四怕：一怕辜负党的领导，二怕和主任委员搞不好关系，三怕脱离群众，四怕干部调不动。有些干部看不起工商联的工作，更增加工作上的困难。一些县里的基层组织，更不被人们重视。例如某县油脂公司的负责人就曾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同工商联在一起开会呢？言下之意，就是不屑与工商联为伍，这问题我们曾在省里反映过，但得不到解决。有些县竟派工商联干部抬桌子，有的县派工商联干部送信发通知，鹰潭镇甚至叫工商联干部打扫厕所。对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求得解决。

五 月 十 七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三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六人。

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与解决这次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会上决定成立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问题，一个小组研究工商联工作中的问题。这两个小组分别由许涤新、千家驹、孙孚凌、黄玠然、经叔平、华煜卿、谭志清、冯和法、韩志明、田玉璞、柯尧放、谢惟安、胡庆照、李贻赞、彭六安、白瑞西、万景光等十七人组成。他们将在这次座谈会结束后开始工作。

哈尔滨市工商联秘书长崔撼元说：许多专业公司的经理很少到合营厂、店里走走，了解了解。有些干部下去，也只是找公方代表、工会主席，很少找私方人员，这样就难免听来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了。私方人员说："统战工作是两方面的，为什么光听一面呢？"

哈尔滨市工商业者对保留工资有意见，不服气，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

工商联的公方委员、主任委员常不关心工商联工作，开会通知也不到会。大家颇有意见，统战部也很少过问工商联的工作，有些事情可能早已通知党员秘书长，我却心中无数，摸不着底，工作中非常苦恼。

他谈到工商界有些人有消极情绪和自卑感的原因时，举了一个例子：哈尔滨一个漂染厂的私方厂长，患高血压病，但因为是两千元以上户，不能享受劳保待遇，而厂方又认为他有钱，工资也不发给他，为了一家人口生活，他只好带病上班。这样当然会影响他的积极性。

毕鸣岐说：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应该怎样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怎样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来看。

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跟共产党是敌对的，他们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敌对的。今天，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交给了国家。他们的家属为了要求进步，锻炼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凡能走出家庭的都走了出来，参加社会工作

和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思想改造有了这样的变化，若干人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还在留恋资本主义，想走回头路等等。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即使有些小商小贩由于政治觉悟不高，发生一些不法行为，但是他们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把少数人作为一般，把一点作为全面。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改造过程中的污点，但是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也一再呼吁政府对他们加强改造，同时也去协助政府纠正这些不法行为。

社会人士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区别，把手工业者的行为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在报上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一气，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打击，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宗派情绪。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过去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上过历史舞台，也受三重压迫，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我也是被解放出来的一个。我们不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共同性：还有剥削。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特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看见中国共产党具有远大的理想，所以才诚诚恳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同时也甘心情愿地把企业交出归全民所有，跟着共产党走。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一方面也是为了共同实现共产党的崇高目的。我认为这是在阶级斗争中和对人的改造中突出的一点，从这里看到人是可以改变的，不象一些党员干部说的我们本质有劣根性，不可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事，他们的思想斗争过程是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是教条主义者更体会不到的。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说是基本胜利，我说是完全胜利。这个完全胜利，首先是由于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有方，但另一方面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自己积极努力，经过日夜痛苦的斗争取得的。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当然共产党是最伟大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把这段改造的历史丰富地精采地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

至于资产阶级在结束了私人所有制，参加政权和企业管理以后，为什么还有自卑感呢？这种自卑感应由谁来负责呢？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不主动，但我认为政府和企业党员干部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应该消灭宗派主义情绪和作风，应该正确认识新形势的具体内容，要求基层党员干部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应有的评价。在参加政权和共事关系中，不要再以求同存异的想法来对待我们。从心里说，我们不愿再当来宾，我们也是主人，我们是在自己的祖国，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我记得黄炎培主任在一九五三年民建代表会上说过这样两句话："谁是主人谁是客，同在天高地厚中。"那时候，我对这两句话就觉得不太实事求是。今天，我愿把这两句话改为："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几年来，由于党的培养教育，我们之中也生长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芽（虽然不多）。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敲锣打鼓接受改造。因此，我们要党求员同志们欢迎我们参加工作就像欢迎新战士一样，和我们握起手来，紧紧地握起手来。我们既然有共同的目标，也应该有共同的感情。我们从心里渴望温暖，希望党员把温暖的手伸出来，面向我们，把工人阶级的思想带进来，增加我们的毅力和勇气，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之一，本身也是民族资本家，我愿意在党的教育下，号召下，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真实要求。我相信我是党的忠实朋友，我也同样相信工商业者也同是党的忠实朋友。

民建中常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周同善对统战部处理下边意见拖拖拉拉提出批评。他说：今年三月十二日民建会曾向统战部和八办反映地方组织询问工商界加入工会的问题，后来又反映有关定息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下边急待解决的问题，可惜反映上去以后，却石沉大海，至今也没答复。

他说另一种情况是有些问题反映上去以后，答复是得到了，但是不能执行。如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国务院第四、五、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有关私方人员病假工资问题，上级已明确指示，但很久也不执行。

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说：有些行业，在人事安排上没有结合私方人员的技术专长，造成用非所长的情况。箇旧锡矿对原来私方人员——一个日本留学生，安排去赶马，要他树立劳动观念。后来闹到了省里，才另作安排。还有些行业不照顾私方人员的体力条件，把老的安排去做较重的活。如昆明糕点业把原来有技术的私方人员，安排去抬几十斤重的铁锅。

他说，现在私方人员普遍反映工资低，生活安排不好，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有的私方人员看到别人的收入比自己多，政治待遇比自己高，生活比自己好，产生一种不满情绪。有人说："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这个说法也反映了大中小户之间的矛盾。像这样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虽然不多，但问题确实需要解决。

关于定息时间问题，他认为要看具体对象而定。他说有些定息确实太少，昆明市饮食业有一户半年只有七厘的定息，有的行业，一户每季只有四分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对的。

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谭志清首先对目前工商界的情况作了概括的估计。他说，我走了几个省，大家认为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但问题不少，私方人员总感到有些委屈。有的说是做媳妇，有的说是小媳妇，有的说是新媳妇，有的说是孙媳妇。原因是公方作风不民主。公方代表是党员，常常以党代公。在整风中应当在这些方面做检查。例如协商精神不够，对制度不好好贯彻。有些事情事先在党内已经作了决定，才拿到会上来讨论，使人有"真主义，假商量"之感。同时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人事科、计划科、统计科就没有私方人员。对制度的检查也不够。譬如，有职有权问题，李部长已经讲了七年，到今天，成绩是有，但很不够。

关于中小工商业的问题，他认为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最后他对统战部提了一些意见。他说，毛主席把民族资产阶级划为内部矛盾的范畴，需要根据这个精神，检查过去的工作。七年来在统战工作中，宁左勿右几乎成为普遍风气，对统左不统右，统大不统小，统少不统老，大的论功行赏，小的喝粥捞汤，工商业者是有意见的。这一点统战部应该负责。他说，统战部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跟党外人员协商也不够。协商不够，就难免偏听偏信。有些党员的面孔冷若冰霜，总以改造人自居，使大家感到很难接近。各级统战部应对这些干部加强教育。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劈头就提出工商界为什么不敢鸣不敢放的问题。他说，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团体振振有词、生动活泼、理直气壮大放大鸣的时候，工商界为什么小手小脚，似鸣似放呢？原因有四：第一、当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河北省的宣传部门，宣传贯彻这个方针不够，工商界领会不深，不知如何"鸣"和"放"。其次，几年来，党和政府对工商界的照顾是周到的：合营前，企业有困

难，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合营后，私方人员有工作，有定息，有政治地位，一些小意见，提出来就不够朋友，就没良心，别人看来是不是得寸进尺。第三、怕提了意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又怕招来麻烦。他说，过去有个私方人员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个意见一提出，公方人员就把文件都给他批，结果弄得这位私方人员吃不消，血压也高起来了。第四、共产党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如过去的“三反”“五反”，这回又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名堂，是不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呢？

接着他谈到公私共事的问题。他说，现在公私双方同时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划分阶级界线？工商界有人认为只有工作关系，没有阶级关系，还有的说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是不能分开的。他说，千家驹虽然给他们作过报告，也没有解决这个思想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党员认为和资本家说几句话打一些交道就是丧失立场。党员接近资本家就沾上臭味，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对工商联是否要长期存在，是否能成为第二工会的问题，他认为大有研究的必要。将来多数工商业者要参加工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工商联如果成为第二工会，也是少数寥廖。他说，这是用不着唱对台戏的。喊长期共存，喊万岁，倒不如说工商联在一定的时期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这个提法单纯是为了稳定工商联工作者的情绪的话，是不必要的。

他在谈到中小户的苦闷后，对河北省的工业厅、商业厅及工会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了中心工作，有关部门不和工商联配合联系，不重视工商联的作用。工会随便吸收工商业者参加工会，不和工商联取得联系、定县吸收了68.7%的工商业者参加了工会，使那里的工商联会也开不起来。

最后，他对全国工商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北京城市生活太高，农村有意见；中小户工商业者到北京有意见；到东安市场门口一瞧，什么牌子的汽车也有，谁能坐？不全是公家的汽油么！某些人有功劳也不能摆老资格，应当做人民的表率。最后，他说全国工商联、八办、统战部对省工商联具体领导少，要材料，临时抱佛脚，要省里忙。全国工商联对下面的工作检查少，有检查，也是坐上软席火车、坐上飞机到上海、杭州去。省里睡的是木板铺，吃的是棒子面，这些地方就很少去。今后要深入下去，不要高高在上。

五 月 十 八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四次座谈，会上有六个人发了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李国伟。他对计划生产提供了两点建议后，又对工业生产计划和手工业生产计划的平衡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我国人口众多，发展手工业生产是十分必要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解决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使国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设备，来发展重工业。

接着发言的是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这是他参加座谈会的第二次发言。他不同意毕鸣歧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估价的提法。他说：毕鸣歧认为当前有不法行为的，是那些觉悟不高、政策管理不严的自负盈亏户，不是真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代人受过”未免有些委屈。我认为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过分强调资本家交出企业的积极一面，忘掉了资产阶级本质，忘掉了大户也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我认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积极一面，所以才能接受改造。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消极一面，所以就必须改造。这是一个接受改造和必须改造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有今天，能有本事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能

光荣的参加政权，要感谢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很难想像，如果不是共产党掌握政权，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会走到“日出”里潘经理的下场，我认为这是发展规律问题，我不承认是自卑感。敲锣打鼓公私合营以后，我感到的不是掉泪，而是工资开得出去了，生产正常了，劳资关系改善了，工作顺利了，坐轿子的还坐轿子，甚至赔了钱还可以拿定息，我倒是觉着能力不够，毫无苦水可吐。

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个比较有文化有技术的阶级，是中国的财富；但这是就整个阶级来说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限于阶级本质，吊桶老是七上八下，患得患失。就经营能力来说，我们是由盲目经营走向计划生产，是由直线管理走向区域管理，是由家长式独裁走向民主集中；是由大胜大败宿命式的经营走向经济核算制。这一套计划生产、区域管理、经营核算制、民主集中制，以及什么流水作业、技术财务措施计划等等，对我们都是新的。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还专攻过工厂管理这一门课程。公私合营二年来，我感到真是追随一年，胜读十年书。我认为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现在我们听到积极一面，总觉着舒服，甚至就自高自大起来；而听到消极一面，老觉着刺耳，甚至要“分庭抗礼”“取而代之”。说句良心话，公方也够苦的，一方面要完成国家计划，一方面要团结我们做好改造工作。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公式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有的情况不同，有的接受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我认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自我批评”。

他说：我百分之百赞成开这样一个会，大家有鸣有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双方苦闷隔阂是可以解除的。

最后他说，公方代表是撤不得的，党的领导更是不可缺的。因为我们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民主建国会许汉三首先批评了统战部工作中的缺点。他说，几年来，民主党派中是培养了一些骨干分子，这些骨干分子多数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的人逐渐地脱离了群众，还有些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这个账应该算在统战部的身上。他认为，不少参加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修养差，有优越感，批评不得，竟有人说，批评了党员就是反党的行为，反党就是反革命，在共产党员之间，也很少开展批评。这些不好的情况，统战部检查处理得不及时，也说明了有宗派主义。他认为，党与非党之间，有墙，而且也不大平等。他举例说：在某一件事情上，罗隆基曾表示态度说这件事即使周总理答应，我也不肯答应；后来竟有批评他太骄傲了。党有威信，有吸引力，党外人士有向心力，可惜一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向心力却看不到。他在谈到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时说，有两面性是肯定的；不过，许涤新在分析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时候，忽略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工商界长期间形成的思想，企图用速成的办法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如果分析不具体，说服力不大，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最后他说，今后对工商业者的教育，除了组织他们进行理论学习外，还应该多组织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的考察工作，多接触实际，对提高认识是有好处的。

湖北工商联副秘书长宋莲甫举了五个小商小贩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例子，建议政府要积极安排小商小贩的生活。湖北省一些中小企业职工工作时间过长，他建议政府规定轮流休息制度。

中、小工商业者在学习中，对两面性的看法、反映有两种情况：1.他们认为消极一面不

是工商业者所独有．工人、党员图享受、争名利有的比他们还严重些．2.他们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在旧社会是大鱼吃小鱼、是人剥削人的社会．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剥削生活，否则就会被人吃掉．这主要是受大资产阶级影响所致．

他们由于有以上两点看法，所以不承认他们有两面性，认为要有就是大家都有．

我认为他们的第一点的看法，是没有从思想体系上来认识两面性．第二点还有几分理由．但在目前情况下，投机取巧、贪名图利的事实还存在．我认为两面性还是客观存在的．

关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问题，他认为：作为阶级的消极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工人阶级也有．因为中国工商业者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也是为了生活．因此，两面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要有大家都有．他说：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是有道理的．被安排较好的都是上层人物．我们那里有的县把有的工商业者安排去搞文教卫生，是不是因为财经工作重要，不愿分给工商业者呢？这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最后，他建议对于工商联的性质要扩大宣传，中央有关部门的首长要经常下去，最好组织视察组，到省、镇以及偏僻的地方去看一看，多了解了解．他还建议多在一些县设立统战部，多配备一些统战干部．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有人提出，为了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只提工作关系，不提阶级关系．还有人提出，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加重私方人员的责任，不要公方代表．我不同意这种提法．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目前合营企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私方人员拿定息，拿高薪，没有阶级关系，我们就得不到这些．当前不是承认阶级关系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的问题．现在有公方代表，他们多负了一些责任，私方就感到有职无权．可是，公方代表当真退出去，私方人员是否就能把全部工作担负起来，是值得考虑的．大家都知道，公方来了，工人敲锣打鼓欢迎，工人感到自己当了主人，生产起了变化．没有公方代表下厂，私方人员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而且公方代表国家，处理问题考虑几方面的利益，使私方人员和各方面的关系也缓和了．这也是私方人员不能代替的．另外，社会主义企业的民主管理，走群众路线等等，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公方代表要比我们强，我们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以上这些，都说明公方代表制度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至于部分公方代表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和私方人员关系搞的不好，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个人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提出批评，如不接受，可以要求政府撤换他，但不能取消公方代表的制度．不过，也可以在少数有条件的的企业，如工会组织、党组织、民主管理委员会较健全、私方人员政治上较进步、业务较熟练的企业里试点，摸摸经验．

他说，共产党是个很好的党，但是也做了很多蠢事，那就是全部包下来的做法．比如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小商小贩生活困难不是在今天，他们所以早不自杀，高潮以后才自杀，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没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事实上，我们国家这么穷，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又没有给他们自由经营的出路，因此才使他们感到无法生活下去．他说，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不是光依靠伸手向政府要钱，而是要发挥社会力量，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政府要管，但不要管得太死．不要怕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采取各种办法，是可以引导他们走正确道路的．关于工商业者的福利待遇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最后，他说，有人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认为不是统战面大小的问题，因为李维汉部长不能和所有的工商业者一一握手。而是统战政策如何贯彻的问题。有些公方代表开会不参加是不对的。各地政协会议是统战性质的，但也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这些都影响统战政策的贯彻。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他建议在常委外再成立一些专门性质的委员会，解决各类专门问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多负一些人民代表的责任，少兼一些其他职务，不要只是开会发言，举手通过，每年出去视察一次就完了。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在发言中首先对党表示感谢，他说：在党的教育下，几年来，我的几个企业先后合营了，现在我还担任一个专业公司的经理，感到光荣兴奋。接着他对公私关系中有无阶级关系以及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合营企业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他说：近来有不少人提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们私方人员还没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果把私营企业说成是娘家，合营企业是婆家的话，现在娘家的关系是渐远了，和婆家的关系是亲近了。但这并不是说公私双方就没有距离。目前阶级关系是存在的，这种阶级关系不是人为的，而是客观存在。私方人员，要随时随地了解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接近公方。否认阶级关系，就是无视客观存在，这是盲人骑瞎马，是危险的。他在估计武汉市的公私共事关系时说：武汉市的几个大厂子，私方人员是有职有权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些问题的存在，是由于私方人员是否敢大胆负责，对政策领会是否深刻，工作是否深入，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法是否了解等条件决定的。不这样，即使有权也不行。他又说：私方人员在合营以后，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还是存在的。公私双方有矛盾，这也是必然的，否认矛盾的存在，不现实，对解决问题不利。最后他申明，不同意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他说：私方人员受阶级性的限制，经验也不足，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是不利的。有许多工作，私方人员是不可能代替的。

五 月 二 十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五次座谈，会上继续就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工商联内部有没有阶级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继续上次发言，他感到工商界的力量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他说，目前，在武汉有部分工商界上层分子有骄傲自满的情绪，使工商界群众不愿接近；工商界家属互相之间有不少意见；资方和资方代理人之间也有隔阂，资方认为资方代理人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资方代理人对资方也有意见；不同性质的企业组织在一起，人员安排不平摆，互相瞧不起；有些老年工商业者认为新社会与自己无关，遇事也不积极；少数工商业者中有技术的人员，也还未发动起来。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资产阶级本身仍存在两面性，也说明了工商联的工作没有作好，应该进行检查。同时，这种现象和统战工作中的统大不统小、统左不统右、工作不够深入、接触面太窄、没有掌握资产阶级的复杂性、下情没有上达等有关。他举例说：有些工商业者善于察颜观色，看风驶船；有些工商业者就比较埋头苦干，不善于表面迎合；如果不深入，就辨别不了真伪。他说：玻璃本来就有折光，如果再涂上黑颜色，把光线遮掩起来，就会使人享受不到阳光和温暖。他建议把这种黑影玻璃先刷干净，使广大工商界的群众都能看到阳光。

接着，他认为沈阳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在上星期六对毕鸣岐的批评不够全面，他说，毕鸣岐并没有要公方退出企业，更没有提出脱离党的领导.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刊载马春霖

的发言时用"马春霖不同意毕鸣歧的意见，资产阶级离开了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的标题，是不妥当的，这帽子太大了，会使大家不敢鸣。他认为帮助党整风，发言就是真诚的，是出于对党的爱护，如果断章取义，就会非左即右。

接着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他认为党群之间的高墙深沟同国家人事制度以及干部作风有极重要的关系，要拆墙填沟，就要改变国家的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的工作作风。他说：现在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而且多数是青年干部，他们年纪轻轻的，面孔冷冷的，同群众离得远远的，他们学会一套老成持重的样子，却不懂人情世故，我认为这些年青人做人事工作是不适宜的。人事工作应该公开的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却成为机关企业的保密部门，成为一种"特殊"的部门。群众无从监督。人事部门应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只管追查历史，却不关心群众生活，有的人"权大无边，违法乱纪"，使人望而生畏。这样，人事部门就成为群众的"怨府"，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全国工商联的人事部门也不能例外。

因此，他认为人事部门应从组织上、任务上以及工作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一般肃反工作已经结束的机关企业人事制度完全公开，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管党员、团员或群众都要平等看待。第二、人事任免调动要有请示批核制度。第三、人事工作应该让非党干部参加，而且应该让群众有可能进行监督，否则，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次整风，人事部门应该是每个机关的重点。全国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也是有问题的，不要以为"太平无事"。

这时，李维汉部长问全国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黄玠然："你们那里人事部门是不是也都是党团员哪"？黄副秘书长说："差不多吧！我不太了解。"李维汉部长说："回去了解了解，向大家作个交代，"接着又说："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不要都全由共产党员担任。"

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看待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寿墨卿表示对毕鸣岐提到解铃还是系铃人的看法有一点意见。他说：过去阶级之间有仇恨，是事实，这个仇恨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捏造出来的。既然过去系铃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资本家自己，那么现在要改变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观感，主要还在于资本家自己。他认为高潮以来各方面资本家鼓励多了，而对资本家的批评少了。

最后，他谈到阶级关系问题，他肯定地认为在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他说：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立"的关系已经变为"非对立"的关系，今后阶级之间的距离将逐渐缩短，阶级之间的差别将逐渐减少，资产阶级将逐步消灭，但是，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阶级关系仍继续存在，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人们在立场、观点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也还会长期保留着。

他不同意某些人认为工商联内部没有阶级关系的说法。他说：第一、工商联不是单一阶级人民团体，而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这里，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这里不仅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有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所谓公私关系，所谓大、中、小关系，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具体表现。第二、在工商联的领导机构中包含着各种阶级成分的成员。第三、工商联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在社会主义一致的原则下可以同工人阶级利益统一起来，但在有些问题上不仅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目前，职工对赎买政策不够了

解，中小工商业者对于大户的“名利双收”也有意见，而某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为定息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这些都是阶级关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具体表现。可见，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节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否则，它的性质和任务就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三个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季惺。她认为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职私、私私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公私之间、职私之间存在着深沟高垒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作为赎买金的“定息”制度造成的。因为现在合营企业的私方还持有本企业的股票，每三个月还要凭股票在本企业里领取“定息”，这样，纵使不再强调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也是显然存在的。她说：“定息”既然是作为国家赎买私营企业和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支出的一笔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又不管企业是否有盈余都要支付，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由国库支出，一次赎买呢？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者单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企业内部重重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根据以上理由，他参考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五年颁布的工矿企业国有化条例，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这种公债把所有已经定股的合营企业股票收回，然后将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或地方国营地业。公债发行的总额可根据国家的财力，订为六亿至八亿元，不给利息，不上所得税。公债可每半年兑换一次，分为五年或七年还清。她不同意李康年提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她说，赎买给价是照顾性质的，国家财力有限，付给二十二亿是不合理的。而且定息再拖二十年，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中小户也不愿意。但是，她认为李康年的建议精神是可以吸取的。她认为采用国有化公债有以下四个好处。一、“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国营企业中工作完全以公家人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矛盾简化，有利于团结；二、免除现在三个月支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持票人也便利；三、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现在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办法因有定息的支出，和国营企业不一样，福利金、奖励金的提成也不一样，改为国营后，私方不再由企业领取定息，企业经济核算办法和国营一样，便于统一领导；四、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或送给旁人，或交给工商联作互助基金，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大户可以割掉尾巴，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最后，她说：当然，经济上的改造完毕并不等于思想也改造好了，那是另一回事。

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着重对毕鸣岐在五月十七日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估计过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估计过低了，积极方面看得多了一些，消极方面没有看到或者看少了一些。

他认为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里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存在，在合营企业里阶级关系也就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它的两面性也就存在。

他认为现在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说的。许涤新在全国工商联合会发言中就曾指出那些积极和消极面的表现。那些都是事实，并不是把消极的东西硬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那些事实行为无论是积极的消极的都是通过人们的思想来支配的。他说当前积极方面是主流，而且正在上长。这是多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和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努力，在思想上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东西，排除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才取得的。他举例说，当前民族资产阶

级分子中有些人闹不团结，争名夺利，骄傲自满，互不服气，这些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又是什么呢？这些反映在工作中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呢？是推动了工作呢，还是阻碍了工作呢？又如合营企业中，有些公私双方关系不好，难道私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他认为把公私共事关系搞得不好的责任，完全推到公方身上是不公平的。公私共事关系存为问题，正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有人说在工人中也有争名争利甚至贪污腐化等消的极东西，但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质，这也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这是两回事，不应等同看待。

有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表现，这是事实。他特地举出贵阳地区的例子说，所以有这种表现，正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贯彻了团结改造政策的结果。

在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发言以后，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对大家在统战工作方面提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他表示，工商界的中共党员，应把大门敞开，有些问题要进行检查，应该改的立即改进。

最后，李维汉部长提出：有些人在发言中提到目前工商界仍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左的、中的、右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应该怎样看，怎样分析？这都需要进一步讨论。工商联内部有无阶级关系，对这个问题争论也很有意义，希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六次座谈。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的全部人员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咸吉在会上发言，他对统战部、八办等部门没有根据高潮后新的情况给工商联以新的帮助提出了批评。他说，高潮以前的革命是革生产资料的命，当时统战部在政策思想上曾给工商联很大的帮助。高潮以后，革命已深入到每个资本家的脑子里去了，已是革资本家脑子的命了。这时，工商联就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从去年下半年起，工商界的工作都安排了，级别也评了。照理说应该更加安心工作了。但事实却并不如此，有些人总在闹情绪，在一起的时候，总爱谈过去自己得意的事情；拉起对公方的意见，就津津有味；拉起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就客观原因一大堆；背后说怪话，有的人甚至在办公室里吵架。他特别声明说：在高潮以前我们工商联是没有吵架的，而今天要自己发挥独立作用的时候，反而吵架了。这说明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感情特别浓厚。不能设想，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吴咸吉说：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说"有共同的目的就不必再提什么阶级立场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认为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的说法，我也不能同意。这次会上很多人提到阶级关系，意见就很多。为什么这样注意这个问题呢？为什么又这样怕听资产阶级这几个字呢？高秘书长看到党员们去开会就认为"鸿沟"是领导上建起来，为什么这样想呢？这反映了对党的信任问题。毕鸣岐说：交出企业不是简单的，是经过思想斗争的，这话是对的，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但还应加上一句，这就是"今天要挖出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也是痛苦的。"否则，为什么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你们共产党，我们工商界"，在"你们""我们"之间要划一条沟呢？这沟又是谁

划的呢？

接着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个人主义的东西很多，旧的思想没有挖出来，高潮后有些工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很多力量对消了。这也说明思想改造是不容易的。也说明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谈到这里，他深深感到南京工商联党员秘书长离开以后，工商联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他说，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党员秘书长的作用，在工商界的团结没有进一步加强和思想没有进一步提高以前，不应该把党员秘书长调离工商联。

接着发言的是上海市印染工业公司副理李钺卿，他认为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基本原因是在公私关系上。有些人仍以老眼光看待新关系，以老办法处理新问题。他说，有些党员对工商业者的看法是定了型的，认为工商业者就是唯利是图，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随时都会散布毒素腐蚀干部，对社会主义是冷淡的，对企业是不负责任的，由于这种狭隘的阶级成见，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有的私方人员工作很积极，每天都很晚才回家，但是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被怀疑为别有用意；有的公方厂长在安排科室负责人员时，已经将名单送给上级审查，才同私方厂长协商，实际上等于假协商。上海有个旅馆区，办公室的钥匙每个干部都有一把，就是私方人员没有。有些公方人员不但对私方人员不信任，而且还歧视。

他说：由于有些人对私方人员的看法是定了型的，因此对私方人员该表扬的不表扬，该批评的也不批评。上海有个厂有个私方人员每天赌博到深夜，早晨很晚才上班，不到下班时间就走，有时还拉着工人一块去赌博，但是公方厂长也不批评他。

他还提到，有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很多缺点，如用人唯亲，说话无原则，脱离群众，带头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都影响工作的进行，影响公私关系。

最后他说：当然，公私关系没搞好，私方人员也有缺点，但是公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应该特别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党员干部应加强理论学习，不要总用老眼光来看待新关系，用老办法来处理新问题。

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吴秉钧说：现在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中有两重关系，即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这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目前哪个关系是主要的，应明确。我认为目前应以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为主，即以工作关系为主；通过工作关系，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方针，解决阶级关系。

他说：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关系所以搞不好，私方人员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就是由于没有搞清楚这双重关系的缘故。他并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民建重庆市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汉湖介绍了重庆市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和提合理化建议的情况。他说，由于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支持不够，相当地影响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目前重庆私方人员存在着四种顾虑。一、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二、怕职工们误会，把节约说成是偷工减料。三、怕搞不成丢面子。四、怕搞成了自己负不起责任。但最主要的是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

其次，他还谈了增产节约所得的分配问题。

杭州工商联副秘书长闵子说，有些工商业者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弄一些理论名词，搞一套政治资本，去对付公方、吓唬工人。因此，他们在学习方法上是教条主义的。他们看问题的特点是：抓住现象、否认本质，抓住个别、否认全部。有

些人强调中国的特殊情况，对于普遍的经验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他感到目前工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学习到顶"的思想。他说，杭州有个工商业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正在相互转化、互相渗透中，资产阶级分子有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思想一样，在工人阶级当中也有资本主义思想，并且和资本家的思想一样，这就是说你的思想中有我，我的思想中也有你。有人要求定息七年一次发放，这样可以摘掉帽子，也就是说不要再改造了。还有一些人认为资产阶级有技术，是社会主义的财富，在理论上也有一套，似乎各方面都比公方强，比工人强，不要改造了；公私合营企业可以挂上国营的牌子了，公方代表可以撤走了，今后不要再提什么阶级关系和两面性了。这里，反映了资本家有一种实质的东西没有拿出来。因此，工商业者的理论学习如何提高仍是当前的问题。可惜，杭州市委宣传部对工商业者学习却管得很少，而专业公司领导方面对工商业者经常性的学习也不够重视。

目前，工商界有些领导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在领导方面仿佛是"春眠不觉晓"，在群众方面却是"处处闻啼鸟"。这种情况，工商界要负责任，而党与政府放松了思想领导也有关系。高潮以来，对人事安排抓多了，对思想教育抓少了，鼓励多了一些，而必要的批评却少了一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于是有些工商业者就飘飘然起来了。长此下去，对公对私都无好处。

五月二十二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七次座谈。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代表、广东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王伯雄在座谈会上讲两个问题，一是公私合营企业要不要有公方代表；二是工商联要不要有党员副秘书长。他说：有些人认为公私合营企业里有了公方代表就会有公私关系，并且影响企业的发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我要求这些人正视这样一些事实：从企业的发展来看，广州的合营企业有了公方的领导，生产提高30%以上；从公私关系来看，关系愈来愈好，不好的只是少数；从私方积极性来看，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很多人受到了表扬。这个情况说明了公方代表制度的必要性。

假如不设公方代表会有什么困难呢？我看，有很大的困难，第一，职工与私方的矛盾无人解决，私方在今天还是资产阶级，他们跟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是没有距离的。第二，合并的企业私私之间纠纷很多，谁都不服谁，他们互相勾心斗角，排挤打击。有一个厂为了厂的名字，争执了一个月，相持不下，后来经过公方代表的帮助才得到解决。所以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的存在对于贯彻国家生产计划和政策，领导职工搞好私私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取消公方代表，害多利少。

为什么某些私方人员对公方代表会有不满情绪呢？他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私方进步性估计不足，忽视私方的意见，而私方人员也有缺点。过去，合营企业长期以我为主，独断专行；合营后对集体领导不习惯，甚至不满意；其次，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对建立制度觉得不方便；其三、看不起公方代表，认为他们不懂技术，他认为公私双方虽然都有缺点，而解决这个矛盾公方应负主要责任。

谈到正确对待公私关系问题的时候，他说，总的情况是好的，不能因为某些公方代表有缺点就不要公方代表制；这正如不能因为某些私方人员有缺点就叫私方离开企业一样。当然，如果某些中小企业条件成熟，也可以考虑不设公方代表，但，不属于改变这个制度问

题。

他认为目前企业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公方代表问题，而是企业内部的党政分工问题，党支部不要干涉和代替行政方面的工作。他提议要明确职责，如果公方是副职，副职要服从正职。

关于工商联要不要党员副秘书长，他认为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着重要的作用，广东有个党员副秘书长被领导上调走时，工商联就不愿意他走。我们的秘书长在场，可以证明。他说，有些人对党员副秘书长不满，要加以分析，可能党员副秘书长作风上有错误，也可能非党秘书长有宗派情绪。他说：我同意昨天吴咸吉的发言，工商联有了党员副秘书长可以团结干部、贯彻政策，可以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因此，我的意见：凡是有的要保留，没有的可以考虑增设，有缺点的不好的要给以教育。

北京市工商联秘书长李贻赞首先就阶级关系和两面性问题发言。他说：阶级关系是个客观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合营企业内部既有阶级关系又有共事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双重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两面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随着企业生产关系的改变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是主流，消极一面大大减退，这种进步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但由于阶级关系的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性仍然存在，不承认是不合实际的，现阶段的两面性内容主要是：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愿意创造条件为放弃剥削而努力，另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时间还要延长，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但是，应该看到：整个阶级正在分化。有一部分中小工商业者自己本来从事劳动，定息收入不多，毛主席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愿意早日放弃剥削摘掉帽子。望政府考虑逐步满足他们的愿望。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不应该包括这些人在内。

另外还有一部分工商业者在合营后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对企业有作客思想，私私之间存在不团结现象。这种思想虽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但是，资产阶级分子表现特别严重。

有些人居功自傲，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完成，不需要再努力学习了。有些人认为自己交出了企业，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的。我认为这种光荣应该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决不可以引为骄傲。有人说："工人阶级进入社会主义是赤手空拳，资产阶级是带着礼物进来的"，这种说法，好象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光荣，这是万万不可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为革命和建设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是无可比拟的。

一年来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关系是有进步的，但还不正常，有些人还有顾虑，他们怕挨整、怕报复。我认为在合营企业内部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对公私共事关系是有妨碍的。有一部分公方代表，是由企业职工中提拔的，他们的政治水平不高，习惯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一套，对私方人员时存戒心，惟恐染上资产阶级的污点，把共事关系当成阶级关系。私方人员也有自卑感，对工作缩手缩脚，象"大观园的林黛玉，终是外人"的样子，我认为对有成绩的私方应该表扬，有错误应予批评，有关文件应给他们看，有关会议应让他们参加。

接着，他谈了一些关于合营企业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他说，过去人事安排大体是合理的，但是有些学非所用的应该予以调整。应当赏罚分明，有升有降。对于生活福利要逐步做到一视同仁，在劳动竞赛中，对于私方人员和职工应按成绩大小，统一评比。

最后，他谈到向工人阶级学习问题：他说：自从大公报发表了吴金萃"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的文章以后，各地工商业者正在热烈的讨论。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向劳动人民

过渡中，对工人阶级不要用阶级成见去看问题，应该从几年来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来认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就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个别工人有落后情绪是事实，现在他们同样在改造过程中，不能笼统地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归到先进与落后的范畴，资产阶级两面性与个别工人的落后表现是有区别的。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性了，只有一面性，即使承认有两面性也只是与工人阶级一样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改变阶级本质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习工人阶级先进思想和他们具有大公无私、反对剥削、集体主义、善于协作的优良品质。这样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天津市印染公司副理孟羽舞就进一步发挥民建会和工商联组织的监督作用发表意见。他说：在贯彻对私改造的一些具体措施中，党依靠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讨论研究不够。如私方人员的生老病死补助办法和工资支付办法，下边执行得不一致，致使有些私方人员生老病死得不到合理照顾，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民建会和工商联由于不了解情况，又无法进行解释教育。

在会上，他又提出，有些公方代表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合营后并店时，竟采取多数表决的办法，把回民食品店和汉民食品店并在一起，或派回民到汉民饭馆去工作，回民意见很大，影响民族团结。（他说到这里，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插话："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搞很不好。"并请他写个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上海制笔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发言中着重对上海某些公私合营企业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提了意见。

他说，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领导关系条条垂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严重，处理问题简单化，只听职工一面之辞。很多人有话不敢讲。对人事科敬而畏之。这些部门应该是这次整风的重点。

他说，本来人事部门是职能科室之一，应为生产服务，但现在这些部门的人都整天忙忙碌碌不知所事何事。有人讲人事科已成了公安部门的派出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党号召关心人，但这些作人事工作的在企业中却不关心人，使人们感觉不到温暖。他又说，有人甚至把人事科的干部看成"打手"。

他认为这些部门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宗派主义倾向。例如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在合营时，室主任都升了科长，党员都升了处长，而有的私方人员已有二十多年的银行业务经验，却仍只担任科长。成了"用人唯党"。他还说：上海中华造船厂的党员干部把爱人也调到工厂里，简直成了"一尊罗汉，一尊观音"。

他希望中央劳动和人事部门，对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下功夫进行教育；各级人事劳动科室，都应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第五个发言的是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理于熙钟。他是一位年青的工商业者，他在会上着重反映了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现在一般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都迫切要求放弃定息，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但是，提意见没有人管。因此，有的人拿了定息也不愿承认是剥削，他们说："我们自己不愿拿定息，不愿当资本家，偏让我们拿，偏让我们当！"于熙钟说：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我们不愿意老当资本家，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

接着，他又对工商业者的病假工资问题和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职权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病假工资的处理原则以两千元上下来划分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真正有病的人不多，但是这样一划分，惹得多数人惶惶不安。

他不同意有人提出的私方人员有职无权是由于有公方代表存在造成的，他说：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工人之间、职工和私方之间、私私之间非乱不可，打起架来都没人劝。

最后，他代表北京市工商业者对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领导人员提出意见。他说：现在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的领导人员实际上成了职业活动家，他们得到了"名、利、享"，体会不到中小工商业者的困难和要求（连我自己也在内，没有积极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检查起来觉得很可耻）。他们在党的面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想尽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有人说他们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放出鸣声；即使有，也是应付差事。有的上层代表批评我们说："大的闹地位，小的闹生活"，大家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认为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没什么可闹的，生活也没有问题，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对党只听他们的话，也有意见。希望党要注意观察他们之中哪些人是真正为国家、为群众，哪些人是为了自己。

上海三英电业厂厂长朱松龄说：在高潮以后，很多有技术的私方人员，都热望着把自己的技术力量贡献出来，为增产节约多做些事情。可惜有些领导部门对私方技术人员的技术成就采取了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上海大威电机厂有个私方技术人员张忠康曾创造了一种电动中文打字机，打字效率比老式打字机高一倍，但他们厂属于重工业，而这种产品属于轻工业范围，领导上就不许生产。

还有一些单位歧视私方技术人员。他说，有一次他们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到国营厂里交流经验，带工业局的介绍信，不许进，要有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有了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以后，又提出带人事材料才可以。总之遇到"私"字就要倒霉。他要求有关部门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今天，座谈会继续举行第八次座谈。会上有十三个人发言（其中一个是书面发言），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定息年限和撤不撤公方代表等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个发言的是长沙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师道。他说：我认为合营企业有公方代表，不但不会阻碍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原因是一个人的积极性要以思想觉悟为基础，公方代表政治思想水平比私方人员高，看问题比私方全面，可以帮助私方人员提高思想觉悟，和正确地处理工作中生活中的问题。另外，企业中不只是公私关系、公私矛盾，私私之间、职工与私方之间也存在矛盾，而后者常常不是私方人员可以解决的。

他说，当然，有的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不让私方人员提意见，对私方人员提的合理化建议不支持等等。但不是所有公方代表全都这样，而且有些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如有的私方人员不管自己提的意见正确不正确，只要公方代表不采纳，就认为是不信任，这就不对了。因此，他认为不能因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就要求取消公方代表制度。

对于如何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认为首先要加强双方思想教育，其次是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使双方分工明确，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他还建议有关方面结合这次整风，对合营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不但青年工商业者反对，中年和老年工商业者也反对；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客观存在，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是错误的。

他认为合营企业有阶级关系，但是，公私双方都是政府任命的，都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对生产负责，是厂长的就称厂长，是副厂长的就称副厂长。不要分"公方""私方"了。因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有工商联，还有董事会。他认为改变这种称呼，可以减少或者缩小公私之间的距离，可以加强私方人员对企业的责任心，也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上海民建中央委员严谔声首先提出：虽然党早已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但目前尚有不少民主党派的人士对这个政策有怀疑，他们不相信能够长期共存，更不相信能够互相监督。原因是一方面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本身有自卑感。另一方面是下边宣传不够。上海至今还有专业公司经理一级的党员干部不知道我国目前有哪些民主党派。他建议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放在党课中对党员进行教育。

他说，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不是要不要共产党员的问题，而是党员的地位如何摆法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不同于企业，在企业中党员是代表党去领导企业。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共产党员应该在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起桥梁作用。过去有些部门对这种关系认识不够，处理不妥当，如有的在发一般行政文件指示时，只发给共产党员个人，而不发给那个党员所在的单位，这样做法是不恰当的。

他还对公方代表不重视业务学习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千家驹首先声明，我今天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局，而是以私方资格在这里发言的。

过去几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缺点。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是我国新的创造，既无经典著作可以依据，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也无先进经验可供参考，错误难免，但成绩是主要的。这种成绩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也为我国工商界所承认。

今天，我不谈成绩，只想谈谈缺点。举例来说，如对批发商的改造，在今天看来，在工作上是有缺点的，如果做得好一些，对我们更有好处。其次，税务机关的税收政策，在利用限制改造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得税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所得税按规定说，有所得才能收税，而且最高税率不能超过34%；事实上，由于剔除不合理开支，往往没有所得也征了税，而且税局盈余与账面盈余相差很大，选典型、选胖子、不选瘦子，虚盈实税，杀鸡求卵的情况，决不是个别现象。又例如，在执行盈余分配上，许多企业未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二十五条，以及四马分肥的原则执行。许多工作干部往往把政策措施当成客观事物的规律，以主观代替客观。对小工商业者与对待大工商业者，一律看待，有些明明是劳动人民，强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对职工、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职员及青年学生的献股，不问其是否出于自愿，是否本人确实进步，生活来源确不依靠股金，除共产党员外，一律均不接受（最近才稍稍开了一点门，个别的可以接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干部在执行政策时，有"宁左毋右"的思想，他们认为左了不过发生偏差，右了丧失立场，甚至工商行政干部明知偏左，也不敢说。这是相当严重的思想问题。诸如此类等，今天不是检查政策，可以不多

谈。

我今天想谈的，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两面性，公私共事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赎买政策应如何理解等几个问题。

其一，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否存在以及两面性应作怎样解释的问题。首先应问资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经完全消灭。我认为八大文件中说，资产阶级"处在消灭过程之中"不等于说已经消灭，如认为已经消灭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国家每年还要付出一亿多元的定息，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非任何人主观的产物。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客观存在，则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否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呢？这是不可能的，有物质基础就有上层建筑，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意识。而且即使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也不等于说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不再存在了，因为思想落后于实际，这是一般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两面性是与工商业者的两重身份相适应的（在未有两重身份前，也已有两面性，但两面性的内容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一面并不包含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就包括社会主义因素了。当全行业合营后，社会主义因素大大增加了），全行业合营后，一方面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基本上他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就这一意义说，他已经是一个劳动人民了；但另一方面，他与一般的劳动人民还有所不同，他拿定息，还有生活上的种种照顾（如高薪不减，病假期工资发50%—70%等等），因而还保留资产阶级的身份，这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资本家，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工人阶级思想，也有资产阶级思想，这两种思想不断斗争，工人阶级思想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他们的思想状态。这种两重性是两面性的根源。应该承认：工人阶级的一面正在发展扩大，资产阶级的一面不断缩小以至消灭，最后成为一面性，这是它的发展趋势。但不等于说：现在已没有两面性了。毛主席说，如不承认两面性，是形而上学观点，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如果胜利，则学习任务没有了……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所谓形而上学观点即唯心主义观点。两面性是什么？归根结底，仍为社会主义一面与资本主义一面。

所谓资本主义一面，即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我们指他们还留恋资本主义是指思想情况，不是指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这一点他们是明白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一点也不留恋资本主义呢？我不是工商业者，不能代表他们来答复。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即学习马列主义，但现在有时看到排队买东西，产品质量降低，或其他种种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也不免想到只要有钱，在资本主义社会想要什么有什么。这种想法虽一瞬即逝，虽明知其为错误，但不时要冒出来，可见留恋资本主义，犹如"见猎心喜"，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工商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有朋友说："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孙晓村同志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我认为，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是指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来说，并没有错，应该如此，这样提法有什么不好呢？

毕鸣岐同志说："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这种思想斗争，思想变化的情况，是很多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的确，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企业是经过

艰苦的思想斗争，这是他们接受改造的明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设想放弃之后，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时，不再存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留恋之感，所谓“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不是这种心情的表现吗？同时，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所谓消极一面，即指资本主义一面，它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各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肯定是存在的。仅就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这一点来说，不就是消极性的一种表现吗？自然，同意李康年的主张的，在工商界中占很少数，这也证明消极性一面今天已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不能说这种思想仅是李康年一个人的主张。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吃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这我在后面谈赎买政策时还要谈到。除此以外，例如对于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等等。消极性表现形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而且工商界各人存在的程度也不同，但总的观察，从大量观察，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总还是存在的(虽然它正在逐步缩小之中，这还需要续继教育)，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既有此客观事实存在，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承认有利于改造，还是不承认有利于改造？我认为还是承认好，这不仅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有利于改造。不承认等于讳疾忌医，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

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是否一回事呢？不是一回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来自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本质和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即对社会主义许多新鲜事物还不习惯，还有抵触情绪，还留恋旧时对企业可以专断专行，过着富裕的剥削生活……等等，总之，来自资本主义的一套。工人阶级有没有落后一面呢？肯定是有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庞大，不少农民流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农民所具有的保守性，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也带入工人阶级中；同时他们还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保守一面决不会是留恋资本主义，决不会是再想替老板做工。所以工人阶级的落后保守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性质是有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

有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好象说工人阶级缺点多得很，如不爱惜公物，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私自利……难道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可是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却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我认为应该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纪律性，革命性的优良品质，应该学习他们自食其力的劳动习惯，应该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学习社会主义。学习工人阶级就是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显然这是以局部代替全面的片面性观点，为什么不举出一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高贵品质做例证来学习呢（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对于某些工人所表现的缺点，我们应该进行教育，站在工商业者立场，就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相互教育，而不是说：“你看，工人群众也有这些缺点，你要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难道这些缺点也要向他们学习吗？”这样出提问题，如深入一层去分析，不正是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一种表现吗！

二、公私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事实存在，不能否定它不存在，主观否定存在也不等于客观不存在。如不存在阶级关系，那就根本不存在公私、工私关系问题了。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一些公私问题也变成无的放矢了。既有此事实存在，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我认为承认好，承认矛盾存在才能解决矛盾；否认矛盾存在，更不能解决矛盾。目前有些工人对赎买政策认识不足，对私方人员采取不正确态度，这是一个教育问题，不是否认阶级关系即可解决。应该承认：劳资双方过去有墙，全行业合营后，这道墙已缩小，正在拆除过程中，但还没有完全拆掉。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不能设想，百年冤仇一旦可以解开的。我们能否认资本家过去没有剥削过、压迫过工人吗？没有打骂过工人吗？且不说解放后是否对抗性问题，至少不能硬说解放前也不是对抗性的吧！劳资双方长期以来是死对头，今天要变成好同志，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我们工商业者必须有最大的耐性，不怕碰钉子，从工作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对民族资本家的观感，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

第三、是关于赎买政策问题。李康年提议赎买应有二十年才够本，这根本不了解赎买政策的意义。赎买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不是修正马列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采取没收政策，我国历史条件不同，采取赎买政策，方式不同，目标则一。在马列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生产资料是剥削所得，为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指整个资产阶级说，非指个别人说，个别分子可能是劳动积累来的，但经过若干年后，亦早已收回原投资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可没收，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应该认识，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天生属于资本家的，而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被资产阶级所掠夺去的，现在是物归原主。宪法上保障资本家所有制，但又规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证明在人民中国，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付给定息，其目的在使资本家可以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就这一点说，定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工商界朋友却曲解了赎买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赎买是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由国家分期还清，既然赎买就要赎买到底，否则不如干脆说是没收。李康年提议二十年，还有的说“我们拿定息是共产党要给我们的，是维持政府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这些思想完全都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把自己过去学习过的东西也否定掉了。

其次，赎买从什么时候算起，我认为应从一九四九年算起，私营企业条例是赎买（虽然有些企业未贯彻），四马分肥也是赎买，定息也是赎买。从私营企业条例到定息七年（一九四九——一九六二年）共十四年，这十四年中，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如果一个个企业来算，是很困难的。赎买还应把高薪、董事领的干薪等等计算在内。总的来说，经过了十四年，生产资料赎买大体上差不多。政府说七年之后还可以拖个尾巴，这也是从政治上说（不是算细账，算细账不合理，也不可能），即指某些资本家如生活

还有困难，可以拖个尾巴，其目的也在于使他安心改造，不必忧虑生活。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而不是欠了他们一笔债，非还不可。自然，这种安排也不仅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为着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利益。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65%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赎买应自一九四九年算起），而且对工商业者来说，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了。

最后，我想对工商联工作提一点意见。工商联过去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如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团结教育资本家，接受改造，组织学习及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等等，对改造工作起了一定推动作用，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上，特别在代表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是非常不够的。上层领导人物脱离群众，有话不敢说，不敢争，这当然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全责备工商联，但工商联没有能真正代表工商业的合法利益讲话，领导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同时在全国工商联机关内还有个别党员干部有严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从未认真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还提了级，对党与非党干部赏罚不明，是非不分。这些都证明工商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严肃处理。

过去工商界顾虑重重，不敢公开表示意见，通过这次争鸣，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是好现象，希望工商界朋友打破顾虑，继续鸣放，尽量对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意见。要真正做到争鸣，就要展开争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有些意见，貌似为资产阶级争合法利益，如否认两面性和主张定息二十年，实质是对改造不利，必须加以批评，这样才对改造有利，对工商界有利。

第五个发言的是天津市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王金标。他着重反映了天津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天津青年工商业者有90%（包括我自己）不同意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他们非常愤怒，不愿意多扣十三年的帽子。

他说：天津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对放弃定息的要求很迫切，原因是解放几年来，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全行业合营后，他们中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生活有了保证；他们知道自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时间是很长的，不愿当资本家被人歧视。但是，他们这种诚恳的要求不但没有人支持，还有人说他们是假积极，想钻空子，享受劳保，有人因此对政府不满，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他希望政府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要求，制定一个标准，怎么样的才可以摘掉帽子，以便使他们有努力的方向。

他说，公方代表撤不得，撤出去是可怕的，不撤虽然有矛盾，但撤出以后矛盾会更多，私方人员会更没有办法，更加苦闷。他认为公私关系不正常，只要双方都采取积极态度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他对目前合营企业公方代表出去开会时间过多，无暇掌握生产等问题提了批评。

北京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萧心一的发言，主要是反映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工作关系问题。他认为目前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分工不明确，工作内容有重复，造成互相抢人、抢工作、抢时间，双方力量相互抵消；而民建会的骨干分子由于常常被工商联拉走，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以致使干部不安心民建会的工作。他要求统战部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武汉市民建副秘书长金斌统谈了自己对于赎买政策的认识。他说：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因此，工人要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手中取回是理所当然的。有人把赎买当作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来理解，显然是不适当的。

他还批评了统战部不关心不重视民主党派的干部，使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像状态。他还反映某些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工作没有得到适当安排。

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说：目前资产阶级两面性还是存在的，积极一面是主要的，消极一面是次要的。消极的具体表现：动摇、软弱、怕批评，看风使舵，患得患失，个人主义浓厚，留恋豪华生活，希望定息二十年，等等。但是，几年来我们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例如学习出勤率到达90%以上，先进分子先进人物日益增加，有些人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竞赛，更加热爱祖国等等都是积极的表现。在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形势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而不是阶级斗争，可是，人们的思想常常被旧的理论观点所束缚，习惯于用过去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今天的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

谈到进一步加强对私改造问题，他认为除了以企业为基点外，应加强对工商联在这方面的工作。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资产阶级过去那段历史很长，想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改造得和工人一样，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人都说现在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为什么还不摘？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可以先摘，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可以慢一些。他认为这样看问题不全面。瓜熟不熟不能只看颜色，还要看味道是香是甜，好了人家才会要。有人说"熟了不摘就要烂了"。我认为，如果没熟先摘有危险。他认为公方代表不应撤出，这对生产不利，但是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是否每一个小企业都派一个公方代表也值得考虑。

杭州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姚铭鼎着重对目前资产阶级进步性的估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过渡，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剥削者的地位，还保持着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向往社会主义，但又留恋资本主义；二、承认资产阶级必须消灭，但联系到切身问题时，又有惋惜情绪；希望摘帽子，又怕思想改造；三、表示愿意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也有取得工人阶级光荣称号的愿望，但又看不起工人阶级和公方代表；四、有技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但又不愿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高潮以后，资产阶级有一定的进步，但不能估计过高，过高会麻痹自己，会使自己迷失方向，对工作对改造没有好处。

第十一个发言的是民建会江苏省工商研究处处长惠无疆。他认为现在撤出公方代表未免太早了，条件还不成熟。

长沙北工商联副秘书长戴德嵩说：工商联是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七年来工商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许多单位认为工商联没什么作用，是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对工商联任意发号施令。长沙市委统战部在一定时期有一个教育计划，从来不发给工商联。我们看不到改造措施的文件，只好照报纸办事，报纸没登，我们就没有办法。向统战部提出意见，统战部说：今后一定让你们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到文件，这就是说把工商联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待。统战部对工商联都有不正确的看法，别的机关更不用说了。有的高等学校认为工商联是资本家组织，不准工商联干部投考。他认为，这次整风应该好好检查统战方针执行情况。

接着他说：公方代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公方代表在企业里的作用很大，不少私方代表进步很快，这是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分不开的。今天有人主张撤出公方代表，只是仅仅从他们本身具体条件出发，认为有公方代表在，公私关系就搞不好。他

认为这不能作为取消公方代表的依据。有些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不明确本身的任务，一来就乱抓、又抓得死，好像什么事非他不行。较多的公方代表没有帮助私方进行改造，私方人员有问题总是交私方代表去处理。现在许多企业形成公方代表管职工，私方代表管私方人员。但是这都不能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全国工商联丘庆铭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内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共事关系，但其中仍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

但是这与私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不同，同高潮前采取"四马分肥"办法的合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也不同。不承认合营企业内部仍有阶级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不去进一步观察目前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也不利于工作。

他反对定息二十年的主张。他还说，目前有一部分人不考虑人的改造，只是设法从速摘掉帽子，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关键在人的改造。因为即使阶级消灭，如果人还没改造过来，阶级矛盾还会存在。

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帮助公方代表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而工商业者也要进一步靠拢党，主动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他又说：我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存在的说法，更不同意认为工商联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社会经济成份与社会阶级混淆起来，把问题复杂化的看法。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没有谁剥削谁的关系，也没有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它内部还是有矛盾的。它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它也反对违法行为。如果认为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解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就会使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发生根本变化。

（未完待续）

（综合5月16-19，21-23、25日《人民日报》）

（原载《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

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很好，很值得仔细看一看。

请你们也照江苏省委的办法：1、冷静地分析一下夏收前后的农村形势，认真地分析一下农村人民闹事的原因。2、根据你们的分析主动地去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便防止人民闹事事件的发生；3、总结一下正确处理人民闹事的经验，

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对待人民闹事，既不能片面地迁就许愿，也不能采取粗暴态度，应该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辨明是非，达到干部与群众在更高基础上的团结，以利生产。4、教育干部，认真地对待群众用各种方式提出的意见，如人民来访、告状等，使那些问题在酝酿阶段就得到适当的解决，坚决克服推延、拖拉等官僚主义作风。同时也要抓紧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向群众说明闹事会使生产受到损失的道理，有问题最好是用提意见的办法求得合理解决。

中　共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

附：　　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

各地、市、县委并报中央、上海局：

今春以来，全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人民闹事，最近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二〇〇〇多人到县里请愿，现在还未完全平息。目前，农村正当青黄不接之际，灾区春荒尚未安度，少数地区且已发生夏荒，各地都有部分农民缺粮缺钱，生活困难；有些落后社还很不巩固；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十分紧张；经营管理不好的社，社员有自己收麦和收麦后单干的打算。当前又是夏季农活紧张繁忙的时节，农业生产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全年的丰歉。在此关键性的时机，省委认为有必要大喊一声，唤起各级党委的严重注意：如不结合夏季预分，抓紧解决农业社当前的重大矛盾，防止和正确处理人民闹事，在某些地区不仅会贻误全年的农业生产，而且会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招致工作上的长期被动。因此，及时地、冷静地分析夏收前后农村形势，在搞好夏收夏种、夏季预分的同时，总结人民闹事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当前农村中的人民闹事问题，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应该成为当前农村党委整风的首要内容之一。

我省从秋收决分以后，农村人民闹事及其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闹退社。以中农居多，一般占闹退社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十。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减少了收入，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不能如期归还，或是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的歧视等等。

（二）闹分社。一般是在大社中发生，主要表现在穷村与富村、队与队的关系上：富村和产量高的队因为把村内、队内多余的土地、农具、牲口、粮食调走，感到吃亏；个别的因为村与村间历史上有嫌隙，或干部闹宗派，难以相处。

（三）闹粮食。以缺粮户、困难户为主。其中有的原来留足了口粮，因为去年夏收以后多吃了一些，或者因为多养了几头猪，或者因为经营副业用了一些，因而缺粮。有的地方少数真正缺粮的闹供应时，不缺的也跟着闹起来。

（四）闹救济。主要发生在灾区，除了真正有困难的以外，常常因干部分配救济款不公平而闹起来。

（五）闹干部作风。多半是因为账目不公布，社员怀疑社内有油水，怀疑干部贪污，有

些是因为社干乱扣大帽子，骂人、打人、绑人，贪污、腐化等等。

（六）乡与乡、社与社、农民与渔民之间，因水利、积肥、捕鱼纠纷和争夺养鱼水面而闹事；有的因农民进城抢粪而闹事。

（七）干部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抓赌、拆庙、打菩萨等引起闹事。

（八）有些闹事是过去闹了没解决问题又闹起来的。农村人民闹事的直接原因，虽如上述，但闹事的最后形成，归根到底还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不够。除了个别例外，闹事都有一定时间的酝酿过程，开始时仅是少数社员有某些要求，或对某些干部有意见，如能及早发现和适当处理，闹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由于干部或者是根本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的要求置之不理，长期拖延；或者是上下左右推来推去，谁也不负责任；或者是谁要粮要钱，多少给一点，企图"糊"过去，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引起更多人来要；最后往往是用压服办法，捆绑群众，送乡送区，以致激起群众公愤，由"文"闹发展到"武"闹，由小闹发展到大闹，社里不解决问题就闹到乡，乡里不解决问题就闹到区和县。

农村人民闹事，有的态度很坚决，提出"有马同骑，有祸同当"，订出退社后互助互济解决困难的办法；有的则不很坚决，常常由妇女、儿童出面吵闹，青壮年男子很少参加。闹退社事件中，社员牵回自己的耕牛，分掉社里的种子，在自己田里种庄稼，是常见的事。参加闹事群众的成分，一般都是中农、贫农，有的社闹事时提出："我们要的是基本群众，不要地主、富农。"闹事中比较坚决的多为富裕中农，地主、富农、被管制分子等反而看风色行事。主持闹事的往往是一些复员军人、撤职干部和其他敢作敢为的人，许多闹事有党员和干部参与领导。

从干部对待闹事的态度来看，一般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束手无策，害怕群众，东躲西蹓；第二种，一面向群众迁就许愿，一面向上要粮要钱；第三种，以粗暴态度对待闹事群众，说群众落后、忘本、没良心，是"资本主义思思"，是"破坏社会主义"，甚至捉人，关人，鸣枪恐吓，企图压服群众。

事实证明，以上三种办法不但不能平息闹事，反使事态扩大，越闹越烈。纵然一时平息，还会再起。

第四种，是及时地、正确地处理闹事：

（一）上级主要领导干部亲临现场，直接与群众见面。因为发生闹事的地方，乡、社干部与群众之间矛盾比较尖锐，不容易把问题处理好，上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现场，便利于当地干群关系的调整，同时仍然要依靠当地组织和群众，弄清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领导干部自己掌握了处理人民闹事的经验，也就便于以实例教育下面干部，使他们学会怎样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二）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冷静地分析情况，辨明是非，凡属乡、社领导上要负责的，乡社干部应该在群众中公开检讨认错，取得群众的谅解；有些责任要上级领导机关担当的，上级领导机关也要实事求是地担当起来；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已为群众所唾弃的干部，应予严肃处理。凡属群众中的缺点和错误，也要讲清楚。既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又要达到团结群众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解决群众中的实际问题。对生活确实困难的群众要适当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粮食供应不合理的要迅速加以调整，账目混乱的要限期清理公布，社的规模过大不便于经营的要适当地分小，执行互利政策有毛病的要进行纠

正，对于不能解决或者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应该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摊牌，讲清困难，说明道理，不可随便许愿。

（三）迅速组织群众投入生产，因为搞好生产是群众经常最关心的迫切要求，干部以身作则带头生产，对社的团结有很大作用；要注意做好闹事的善后工作，认真处理遗留问题，做到使群众所提的问题件件都有交代。

（四）闹事中如确已发现个别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决不能过早地处理，而应在事件平息以后，群众觉悟已经提高，是非已经十分清楚，坏分子已经完全孤立的情况下，才加以必要的处理。

根据我省农村人民闹事的经验教训，各级党委必须抓紧对广大基层干部，讲清两类矛盾的划分，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农民群众要进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和爱国、爱社的教育，克服过去片面宣传所产生的一步登天、过多过快地改善生活的思想。各级负责干部应该参加体力劳动，了解群众疾苦，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增进干群之间的情谊。对基层干部必须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挺起腰杆来领导生产整社，对于有错误的干部应该引导和保护他们自动"下马"，对个别违法乱纪的干部要严肃处理。必须加强对落后社的领导。必须严禁强迫单干户入社和对退社农民的歧视行为。下放干部和下去帮助工作的干部，在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应该以身作则，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特别要指出的，不论何时，我们都要抓紧搞好农业生产，这不仅是广大农民的根本要求，是进一步巩固合作社的关键，也是解决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办法。当前农村各级党委，只要把夏收夏种和夏收预分搞好了，把生产搞好了，把已经发生的人民闹事正确处理了，抓紧逐步解决农业社内外的重大矛盾，农村各级党委的整风也就有了重大的成绩。在整风中不钻研文件、不揭发错误是不对的，但关门整风更是不对的，而且是危险的。

以上指示，希各级党委研究，如有不当，请中央、上海局指示。

中共江苏省委員会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续）

（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月）

五月二十五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九次座谈．会上有八个人发言，三个人提出书面意见．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我们才从上海、无锡、南京视察归来，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也应该"鸣"一下，可是我的"鸣"，主要是"鸣人之所鸣"．

"鸣"是和党内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的．我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提出意见以前，先说一下我对整风运动的看法．

我在一九四五年从重庆到延安，见了毛泽东主席，临走的时候，他曾经向我征求对延安所见所闻的意见．我答：现在很好，我想，"很好"之上又加个"现在"，对方应该有所刺激的．因为我所亲眼看到的，任何事业，初办时吃尽艰难困苦，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后来环境好转了，骄傲了，懒惰了，不团结了，最后是失败了消灭了．我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性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才不致于象你所说的演变．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我们小组从南京回来，恰好在车上碰到盛丕华同志．闲谈中间，他说："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这句话妙极了，越想越有道理．我们年轻的都种过牛痘，年老的也许种过土痘．我的手为什么曲而不伸呢，就因为土痘的毒没有很好发泄．我尝过不种牛痘的苦！一个人生下来应该及时种牛痘．帮助党整风，等于帮助亲爱的人种牛痘，有痘毒在内而不种，结结一定是浑身满面"天花乱坠"．这几年来，我对党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拥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差，我是常常毫不客气地以"诤友"自居，来对党提意见．这次我到上海、无锡、南京三个地方视察，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如何要承认．但是，同时也发现了不少缺点和毛病．现在且就我们工商界同志所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拿出来说一说．

第一、我们工商界同志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

就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来说，一般还是正常的．我们这次视察，采用开矿下钻的办法，在上海看了四个厂，在南京看了一个厂．其中有些工厂搞得特别好．例如我们在上海曾经参观过有代表性的震旦铁工厂、上海机床标准零件厂、美光织造厂和华成电气厂．这四个厂的公私关系都比较好．因此，在生产上也都有较好的成绩．在南京，我们也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大同被单厂．这个厂在南京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就"公私共事关系"来说，可以认为比

较突出地良好。由于"公""私"关系好，生产水平因此也很迅速地提高。一九五六年总产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44.9%。质量也有显著的进步。就我们所知，大同被单厂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方法，有这么几点：一、公、私双方的职责划分得很清楚，私方有了一定的职责，就可以主动地发挥积极性；二、重视对私方人员的教育工作，同时也重视对党员对职工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赎买政策的教育；三、能充分发挥民建支部和民建会员的作用，组织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基地来对私方人员进行改造。

这三种办法，别的工厂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有些工厂搞得不好，因为所采取的办法和上述方法相反。例如一、分工不明确，私方人员没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对私方人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二、只片面地对私方人员进行教育，而对党内干部或职员群众很少进行教育，管了一面，丢了另一面，双方的关系因此就搞不好；三、不重视发挥民建的组织作用，不懂得在私方人员中培养骨干分子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而在这三种缺点中，最严重的乃是第一点，即对私方采取歧视的办法。

我在这上边看出一条似乎可以认为规律的，就是在企业中间，凡公私关系搞得好的，如没有特种因素，生产一定搞得好；而相反地，如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因此引起了私方人员很大的反感。无锡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可见这个厂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方的歧视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这样的事情，我也碰到过。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关系搞得很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后来，有两位青年党员同志说不能挂，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当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尽忠于党，很难责怪他们，因为教育不够，所以思想偏到一方面去了。另外，对于人事制度也是如此。目前有好多公私合营厂的私方人员，不论是正厂长也好，副厂长也好，差不多对于厂内的人事任用，都完全不能过问。这就大大地使合营厂的人事任用、干部考核带着片面性，这是很不好的。一般私方人员不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原因就为人事大权由党方单独掌握，如果得罪了党，隔了一时，掌握人事的只须轻轻地把你一调，调到你所万不愿意的职位上，使你一点没得办法。去年，我接到一封人民来信，要求调动工作。信写得文理通顺，我把他的信转到江苏省教育厅，该厅不加思索层层下转，结果，他所在的单位竟因此把他调去扫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到农村当教员去了）。——以上这些对私方人员所采取的歧视办法，党和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加以纠正。我建议这些人事机构可以由党、行政、工会、民主党派合组委员会来共同负责。我从报纸上看到李维汉部长主张对工商联内部人事问题不应由党包办。这是非常好的主张，可以推广开去。

第二、眼前我们值得大大关心的又一问题，是工商界中下层的生活福利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有些工商界同志们的生活的确是很困难的。他们顶了一个"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生活却相当艰苦。有些人的定息少到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可是他们却因此就不能享受

"劳保"。他们虽然也愿意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可是由于有顾虑，还怕一旦病倒的时候，反而要减扣工资，所以总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我认为，对于这些已经在实质上是依靠工资劳动维持生活，而同时在工作上又有积极表现，在思想上已有显著转变的"私方人员"，政府应当提前考虑他们的"摘帽子"问题。这点愿向政府郑重建议。

至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我所知，贾拓夫同志老早在今年三月间对工商界同志作了决定。可是我这次在上海、无锡、南京，特别是在南京视察时，已是五月中旬的末了，工商界同志们却普遍地还在为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苦恼。我们查问的结果，才知道贾拓夫同志虽然早作了决定，可是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却并没有趁早把这个决定用公文下达，也没有把这个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以致引起了工商界的普遍混乱。希望以后各部门的所有和人民生活有关的命令、通知，最好全文在报上公布。最近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卫生部提倡避孕的通知，仅仅作了摘要发表，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全文，如果能全文刊登就好了。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我认为今后党和政府实在有改变这种作风，切实注意关心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的必要。

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充满着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解决，所以在如何使工商界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一点上，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阻碍。就我所知，眼前绝大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进步都是很迫切的。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切实地改进了所有工作上的缺点，克服了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么，我相信工商界同志们的积极性一定还能同得到更大的发挥！

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象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共产党种"牛痘"。种牛痘这一个譬方，是很正确的。如果它身体中间没有毒素，种下去的牛痘不会出的。这还不是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个人相信：眼前虽然有很多党员在作风上有官僚主义、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毛病，但从整个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就看这一次整风运动吧！这样广泛地让大家"鸣""放"，同志们！不问古今中外，还能找出那个空间，那个时间，像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中国，不但允许大家"鸣""放"，而且要求大家"鸣"啊！"放"啊！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认为伟大吧！我很反对某些人看法：说人家好，简直有百是而无一非；到翻过来的时候，又是有百非而无一是。

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发展。我们工商界同志们在这次伟大的党的整风运动中，完全没有理由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同时，放松对于自己的改造。

我还要谈种牛痘。牛痘是人人要种的，没有例外的。而且隔了一年二年还要种，直要种到没有反应，就是"无则加勉"为止。我想从婴儿长大起来的人，没有不懂的吧！怎么党员被整风，我们不要自我改造呢！相反地正因为我们要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就更应该虚心地向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学习，认识我们自己的阶级本质所带来的局限性，进一步地在"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努力。

我们民建会过去在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上，以及帮助党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

题上，都没有把工作做得十分足够，这些我们要坦白的。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地努力。在这一点上，也希望中央统战部不要放松领导。我们民建会如果在思想上、在组织上有错误，党还是应该"当仁不让"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实行"互相监督"，我们在批评党了，我监督你，为什么你不监督我呢？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做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同志们！牛痘人人要种的，共产党在种牛痘了，千万莫忘记自己种牛痘。

黑龙江省工商联秘书长**麻新泉**就民族资产阶级到底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有人认为不要再提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了，也不要再划什么阶级界限了，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工人阶级只有共同之处，没有差异之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求同存异的问题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是国家主人，可以和工人阶级共分天下，平分秋色，并驾齐驱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不需要工人阶级领导，这对工商界的进步是危险的。还有的人以交出了企业作为资本，来向党讨价还价，夸耀于人。当然资产阶级能交出企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不能因此就骄傲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并非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于国内国际的影响和政府一系列的安排改造措施，在社会上造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才把企业交出来的。我认为是外因起了主导作用。有人说"甘心情愿"把企业交出来，倒不如说"不太勉强"更为确切。

他认为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只不过在全行业合营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成为主要方面，而消极方面也与以前有所不同罢了。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人不是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三心二意，甚至对社会主义还有抵触情绪。有人认为企业不是自己的了，就产生了松劲情绪。有的说："厂长厂长，床上一躺，半月借薪，月末开饷"。有些人认为合营后有三不自由：一，花钱不自由；二，按时上下班，人身不自由；三，经营不自由。还有些人盗卖物资，造假账、开假发票，私收账款等等。尽管这些人是少数，但毕竟是出在我们工商界，又和我们的阶级本质相联系，因此，认为和工人阶级没有差异之分也是错误的。

李部长提出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要不要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要，不能撤走，若撤走对工作不利。在不少市县中，党员秘书长或秘书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对主委的职权尊重不够，有些包办代替的现象。有的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单独作主行事，像要在市联会员代表大会上聘请几位工商界兼职的副秘书长，这样有关人事的重要问题，事前不和主委协商，直到他在大会主席团的准备会上提出名单时，主副委们才知道。也有的县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开工商业者会议，事前不通过主委，到开会时写个报告材料，临时叫主委念一下，结果主委不愿意当传话筒，就没给念。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少数市县工商联中还存在着。我认为党员秘书长应当很好地按照工商业联合会的章程规定，在正副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处理会务，尊重主副委的职权，并且认真地发挥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应该承认，非党秘书长有他不可代替的作用，党员秘书长也有非党秘书长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党员秘书长撤不得。

上海前先施公司副经理、民建委员**黄祖康**说，我是一个归国华侨。华侨历来就是热爱祖国的，由于过去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把在艰苦工作中所挣来的钱，汇回来办实业或买房子，希望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安居乐业。因此，每年的侨汇一直是很可观的，最近上海成立一个华侨投资公司，虽然时间不久，但汇回来的侨汇数已经不少，对祖国的建设有一定贡献。

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一方面争取华侨投资，另一方面在合营后，又把解放前华侨投资的企业并掉了，这对争取华侨投资是不利的．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例子：上海南京路有一家中国内衣公司，是二十多年前华侨投资的，合营后，有关领导公司把这家公司并到北站区，连牌号也去掉了．这个公司有两个经理，一个在檀香山，一个在上海．如果在上海的经理将这件事情告诉国外的经理，那末就可能引起华侨对于向国内投资的顾虑．

另一个例子：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先施牙膏厂，共有三个厂，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产品远销南洋、新加坡等地．但在合营以后，把先施牙膏厂并掉了，厂名也取消了，先施牙膏也不生产了．

他说，我并不反对并厂并店，只要希望在合并的时候，要考虑到华侨的观感，不要引起他们对投资的顾虑．我建议政府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照顾华侨投资的特点．

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崇林说：在机关、企业、学校中，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现象相当普遍．我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由于不了解全面情况，开会时很难发言．每次开会半天，讨论问题很多，这些会实际上是走过场．有些事情，做完了才在会上追认．有时党员委员不来开会，因为会上要讨论的问题党组早决定了，不来也没关系．我当公用局局长，要人事科汇报肃反情况，他们不汇报．我召开过一次关于缆车安全问题的会议，决定了一些安全措施，至今也未办．要是我是党员，可能就办了．我认为，从“设计”到“施工”，从“编导”到“彩排”，民主党派都应参加，这样非党人士才能搞好工作．周总理在重庆作报告，资本家的人民委员就听不到．重庆公用局党员干部有宗派主义，有特权思想，提拔升级都是党员占先，非党干部很难得到提拔．公用局非党干部冯克熙，水平高，有能力，干了好几年还是个计划科长．我是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委员，正副主任是党员．这个委员会从未开过会，我提了几次意见也不开，可见对非党干部的意见不重视．

他说：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很多党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看不到党外人士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党政不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我怀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否恰当．重庆市有些工作也是党政联合发指示．这种以党代政的做法，会给人以错觉，好像行政单独发的指示，就不是重要的工作．

他批评重庆市统战部对民建会干部的配备、支持、协助不够．他还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男不统女，接触面狭，了解情况不全面，对人的安排有时就不够妥当，有时反映问题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他说，重庆市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现象也很严重．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是“信任不足，支持不力，使用不当，关怀不够，分工不明；私方人员关不倒火（即做不了主），公方人员点头作数．”他说绝大部分私方人员是愿意继续接受改造和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的，但有的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支持，有的人不能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看不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文件．有的公方代表和支部书记管的事太多，使私方人员无事可做，在群众中毫无威信．有的公方代表、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民主作风差，协商时，真主意，假商量，摆出一副改造者的面孔，使人望而生畏；作风粗暴，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偏听偏信；对私方人员缺点错误过分挑剔，但自己有错误不检讨．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家属参加生产，没有一视同仁．如民建会会员于坤裕的爱人在明亚机器厂超额完成任务，没受到表扬，有人提意见，公方代表说：“要站稳立场，还是不表扬好．”

他认为党与非党人员之间确系有墙有沟，现在是拆墙填沟的时候了．他建议：一、今后

用人要根据德才的标准，不分党派、阶级成分，大胆使用，对党与非党干部提出同样要求，不称职的都要撤换。二、不要党政不分，不要以党代政。三、在合营企业中，订出公私共事制度，信任和支持私方人员。四、对中、小户放弃定息、加入工会问题、以及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龄问题、病假工资问题、资方代理人问题等，都要有明确的办法，才能各得其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五、要加强党内外的统战政策教育，宣传民主党派的作用，党员与非党员要交朋友。六、有些制度，如保密制度、会议制度等，要根据新形势作相应改变。他很同意安徽省委在整风计划中规定的机关、团体，企业讨论政策方针的时候，请民主党派有关人员参加的意见。

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湖南工商业者最近讨论什么事情什么原因阻碍了工商界的积极性的发挥的问题。

他说，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提拔干部上，党员不懂业务也提拔得很快，而非党干部却得不到提升；党员有特权思想，不遵守制度，评奖不公，不愿接受批评，党员犯了错误，不公开处分；党员对别人不信任，遇事不同非党员商量，不重视非党员进步；党员与非党员互不往来，看人说话，分别对待，等等。他说：这些缺点所以发生，往往跟上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缺点是分不开的。比如今年一月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召集副职以上财经干部会议，布置一季度工作的时候，手工联社公方在通知上批明要私方副主任去参加，可是私方副主任到会场以后，有人就要他退出会场。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强调阶级关系，不信任和支持私方，以致私方有职无权。又如有些小企业主生活困难，特别是在合营企业中的私方死后，家属生活无着，也没有得到解决。病假工资没有规定。有人要求摘掉帽子也没有被重视。

讲到工商界中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认为工商界中的矛盾跟一般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样，但又有它独特的矛盾，即阶级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和定息问题上。

第一，公私关系的矛盾，已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公方代表的问题上。

有人说：现在的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企业了。因为人权、财权、经营权已不属私方，盈亏与私方无关，只有一点定息，再把它叫做公私合营，就是教条主义。

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虽然私方的三权没有了，企业利润的小大同私方的关系也少了，但这只是私的量的变化，还不是质的变化，只要有一点“私”的量存在，就仍有“私”的质存在，就不能说不是公私合营了。这一点“私”是什么呢？就是私方所得的定息。定息是根据私方在企业生产资料的定股来的。如果说有定息而没有私方，那末定息又是谁拿去了呢？既有私方又说不是公私合营，那末是谁同谁合营呢？

有人说，私方交出了企业，没有剥削工具了，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关系存在，也不需要改造了。

我认为不能这样说。首先，要弄清阶级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资产阶级还拿定息，定息是剥削性质的收入，因此，有定息存在就有阶级存在。从具体的人来说，谁有剥削收入，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那怕他的工作岗位不在原企业，甚至不在合营企业，而在国营企业，在行政性质的局，在政权性质的人民委员会。一句话，阶级存不存在，谁是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以是不是公私合营，是不是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作来划分，而是以剥削收入的有无和多少来划分，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说服人。

其次，关于改造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改掉资本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思想问题，不能以阶级结构、基础及工作的变化来衡量。即使放弃了定息，没有了剥削，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改造还是需要的。因此，我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的、长期的工作。民主党派、工商联"万岁"，就是因为有这一个改造任务。提"万岁"，不是奉承你，使你开心，也不是笼络你的假心肠，而是向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大任务。就是说，前面的路还长着啦，不要急于下马，还要加油干。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要求大家共同负责，长期负责干下去。

有人说，要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把企业搞得更好，就要撤出公方代表。

我也不同意这个意见。企业既然是公私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但必须注意要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使企业搞得好）。合营企业不仅有公方，有私方，还有工人，撤出了公方代表，即使解决了公私矛盾，但是还不能解决领导和工人的矛盾。所以，从合营企业要求来看，我认为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它的成员有政府派来的代表，即现在的公方，有工人，有干部和私方。主任或主席由公方代表当，因为他是代表公有制的，即代表全民利益的。委员会有一套制度，照制度办事。有人说这样会不会削弱党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呢？会不会放松对私方的改造呢？我看都不会的，相反的会加强。

对领导问题，有三种看法：一说，所谓领导就是事事都管，而且非我点头就不算；一说，谁对某一件事提出一个意见和看法，即是包办，即是领导示意，即是真主意假商量（当然也确有如此的）；一说，有事和群众商量，接受了别人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放弃领导。这是从事务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来看领导问题。

我以为，真正的领导，就是发扬民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完成计划。所以，领导不仅不怕群众，相反的要找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正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最好的组织。私方人员的思想，只有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通过有职有权有责的具体工作，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若干经验教训的反复锻炼，才能改造好。

第二，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还有人提出发赎买存单或公债券，由银行发款。长沙工商界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意二十年，多数不同意，但绝大多数认为用存单方式由银行发款为好。

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李康年提出要定息二十年，他有自由，但不能用存单方式或公债方式，也不能由银行付款。为什么？我认为：大家都承认赎买政策是对的，但每每在口头上承诺了，转一个弯又想不承认了。

赎买就是承认生产资料、资本，实际是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不愿强行拿回去，而愿意出钱给我们，所以叫赎买。

工人阶级的东西为什么到了我们手里呢？是我们剥削来的。剥削是不光荣的，可耻的。这点大家同意，但是有些人可能说定息不是剥削，湖南就有人这样说。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人家只要问一句话："定息既不是劳动收入，那么，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回答不出。有些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去拿定息，于是就想变一变，穿上另一件外衣，如存单、公债等等，像其他存款的人一样到银行去拿。

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他有这个自由。国家现在还没有法律说定息几年，那就可长可

短，各人可有发表意见、提出要求的自由。我看这是各人对赎买政策的看法和觉悟不同的问题。何以说对赎买问题看法还各有不同呢？可以举例说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国务院规定按困难情况、病假长短，定为50%到70%，不管非会员，不管工龄。这件事在长沙就伤了脑筋。叫私方病假工资少，是我们；现在说伤脑筋也是我们。问题在那里？问题在于，长沙工人实行劳保条例的有四万多人。病假工资，是会员的六月以内领60%到100%，六月以上领40%到60%，都要算工龄，非会员对折。只实行劳保合同的有五万多人是会员的，病假工资为40%到80%，不算工龄，非会员对折。此外还有无劳保合同的约二万人。以实际劳保合同的工人中的非会员来讲，病假工资只有20%到40%。就是说，最高只有40%，抵不上私方的最低数50%。实行劳保条例的非会员，只有30%到50%，最高数等于私方最低数。难道非会员的工人还抵不上资本家么？同在一个厂工作，彼此相处，待遇不同，请问如何处得下去？市人委和统战部、工会和我们商量，国务院这个规定不执行是不行的；要执行，又要看到这样做会使阶级关系更不好，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更不好，从资产阶级着想，政治上是很不利的。我们商量好久，结果只有一条赎买政策大道理来向工人说服。难道除了这一条，还可以说出其他理由吆？在私方人员是不是想到病假工资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打不打收条呢？假如这个座谈会里还有工人，就不能只由我们讲话。难道他们就不怕病了无人理吆？当然也可以说："他们的病假工资也加上好了"，问题在于企业支持不了。现在还有不少企业连劳保合同都不能执行，如长沙建中织布厂，会员连30%病假工资也没有。所以说，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然矛盾会更加尖锐。

末了，对定息问题，我不反对别人要二十年，但要求别人不反对其他的人不要；要求政府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要的就发，要放弃的就接受。这样，大中户就各得其所了。如果要了，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不能以阶级成份看人"，那是不足以服人的。这里我还要说明两点：一、定息是剥削性质的，因此它是阶级关系和鉴别谁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志；二、定息是根据企业资金定股来的，因此，要列作企业经济核算的支出，要在企业里发，不能作存单，不是公债，不能由银行付款，那样做会模糊事实和是非。

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一个根子。就是说，定息是根据私营工商业者在企业的资本来核算息金的，因此，它既是剥削，又不能和金蝉脱壳一样脱离开企业。也因此，还是有私方的存在，有公方的必要；有阶级存在，有改造的必要。但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后，与过去的公私合营不同了。在新情况下要有新的观点，新的办法，才能把企业搞得更好。

重庆市工商联代理主任委员温少鹤在会上反映了重庆工商界对公私共事关系、思想改造、定息及加入工会等问题的意见。他并提出了下例几点建议：

（一）在公方领导下，建立企业行政的集体领导，实行行政负责制。企业的政策方针由公方领导，公私双方的行政负责人按行政职务各负其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二）中小户工商业者要求放弃定息的问题，只要条件成熟，应当个别的加以解决，并应责成合营企业的公方负责办理。资方代理人只要条件具备，也应该让他加入工会。

最后，他要求工商联继续帮助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继续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生活中的困难。

苏州市民建工商改造辅导处长吴家荪对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是否需要公方代表制度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前私方人员对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的积极性，本身还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才能，一般都想搞好企业。但是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有不少私方人员由于薪水已定，明哲保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偶然还会出现怀疑和动摇态度。在这个思想状况下，他们是不能担负双重改造的领导责任的。

合营企业要以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改造企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针，私方人员更缺乏这种能力。

从当前客观条件来看，公方代表制度已受到全体工人阶级的拥护。合营后，工人热烈欢迎公方代表下厂，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今天要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必须考虑这一方面情况。

同时当前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不等于说完全解决，工人对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残酷剥削的印象还很深。虽然工人阶级大公无私，从社会主义长远利益着眼，不念旧恶，但是阶级感情，不是马上就可以迅速转变的。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私方人员主动努力，通过工作积极缩短双方距离。我们不能忘记在合营前，企业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劳资纠纷，今天所以劳资关系较好，相安无事，一方面固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另一方面，也由于企业中有了公方代表，使公私关系掩盖了劳资关系。我们能否设想，取消了公方代表制度，就能保证劳私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发生矛盾的时候，再请政府仲裁，再请公方代表回厂，不是更麻烦？

从以上情况来看，目前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对生产、对企业改造、对私方人员的改造都是不利的，公方代表制度是有利于双重改造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提高公方代表的思想水平和能力，一方面在于发挥企业的集体领导，既发挥公方代表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又能发挥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研究企业中集体领导制度倒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切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健全民主管理委员会，加强监督。

现在不能撤出公方代表，那末将来是否可以呢？也就是将来是否可以让私方人员全部担当企业的领导责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否则，就等于说和平改造不可能。如果将来不可能撤公方代表，那是执行政策有问题，即没有把私方人员思想改造好。私方人员改造到什么样程度才算好呢？我认为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对社会主义有无限的坚定信心，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仅不动摇，而且协助党克服困难，这也就是在思想意识方面，对社会主义只有积极的一面，而没有消极的一面。二、与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就是在企业里只有一种同志关系，没有阶级关系。三、具备按社会主义原则领导职工群众的能力。

吴家荪说：有些工商业者，甚至是积极分子，为什么提出现在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呢？我认为这正是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正常的反映（如对私方信任不足，关心不够等）。具体表现如下：

这些人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本身就带有积极因素，即表示他们敢于担当企业中的生产经营责任。看不到这一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犯错误。有些关起门来研究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不能体会私方人员的苦衷的，因而认为是消极性的滋长，或者是私方人员的轻狂、夸大和不要社会主义等等。因此，在肯定当前不能取消公方代表制度的前提下，必须满足私方人员要求有职有权的合理要求，这样才有利于双重改造。

最后，他建议：一、所有公方人员必须信任私方，让私方有职有权，消除一切人为障碍，充分给以工作上的条件，通过工作实践改造私方。今天指出公私合营企业中存在两重关系，为的不是要永远保存两重关系，而是更快消除两重关系。为了推动和督促公私双方贯彻以企业为基地进行双重改造的方针，建议市、县成立公私关系检查委员会，或者公私合营企业业务改进委员会，以党为领导，吸收公私双方代表以及民建会一起，负责协调公私关系，检查企业统战方针执行的情况，调动私方人员的一切积极因素，推动改造工作。二、在生活、福利等方面，对私方人员进行适当照顾。希望在疾病医疗、病假工资等方面适当由二千元的界限提高到五千元。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孙孚凌建议，在不违背政策的原则下，公私双方意见有分歧时，不管正厂长是公方还是私方，都应听从正厂长的意见。

他认为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不可能实行，也不应该实行的。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王达夫**在书面发言中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不断增长，消极性不断减少，但消极一面仍然存在。消极的一面，已经不是利用生产资料在经济方面的不法活动，而主要是表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患得患失，只看到自己是“财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骄傲自满，放松改造；有些人对定息七年还不满足，想要延长到二十年；对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优越性认识不足，而习惯于资本主义的一套；争名夺利，私私不团结。所有这些消极性，虽然在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之下，逐步减少，但仍然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所产生的，因此，否认消极性，认为“改造到顶”的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会长期存在，还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思想改造。

四川省工商联组织组长**李忠义**在书面发言中说：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是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或聘任的，党员是他个人的政治身份，他的职务是工商联给他的，不是共产党给他的，他在工商联的主张、建议，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是代表共产党的意见，他应当接受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领导，遵守工商联的制度。因此，我认为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在工商联应当是居于工作人员的地位，同其他工作人员是一样的。

不可否认，有的党员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共产党派到工商联来的钦差大臣，骄傲自满，独断专行，在工商联至高无上。但应当指出这是缺点，工商联应同对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不要”的办法。

现在反映的党员秘书长的缺点：一种是没有把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搞好，即是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一种是在工作中包办代替。我认为，凡是关系问题，两方面都有责任。一般来说，关系没有搞好，党员秘书长负的责任应当多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了。否则，假定有人问，“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或非党员秘书长中，也有把关系没有搞好的，未见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没有把关系搞好，为什么就主张‘不要’呢？”至于包办代替，当然是缺点，但这是在做工作中的缺点。社会主义改造是新的工作，没有成熟的经验，在工作中难免不发生缺点。何况存在这些缺点的只是少数人，而且有的已改正了呢。

因此，我不同意有人所主张的“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

他还举了几个事例，说明党员秘书长在下面是受欢迎的。

四川绵阳专区十五个县，工商联的秘书都是党员、团员，大多数同主副委的关系都搞得好，不大好的只有一个县。重庆市、宜宾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也搞得很好，重庆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调走时，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都曾一致挽留。四川省工商联也有党员任副秘书长的，四年来，他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之间关系很好，尊重主副委的意见，尊重非党员秘书长的职权，一切事情协商办理，统战部找工商联研究、布置工作，也是找主副委同秘书长，并不直接找党员秘书长而迈过主副委一这层领导，因而，关系既搞得好，工作也很顺利。

上海提篮桥区舟山路有兴面馆的私方陈炳煌在书面意见中，反映有些小户生活困难，原因是合营前，为了克服企业困难自动减了薪，合营后工薪没有恢复，定息又少。他要求政府帮助解决。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十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河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吴韫山、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民建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继圣、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他们继续对于公私共事关系、赎买政策、两面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盛丕华首先发言，他说：

我这次从上海到北京来，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朋友问我："解放八年了，从各个方面都听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好的，我自己的体会也是如此；为什么到现在报纸上只看到全国范围内对党和政府指责偏差、指责缺点错误，究竟从前讲好的错了呢？还是现在讲不好的错呢？"我说，话不是这样讲，共产党和政府八年来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在伟大成就的同时，并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为了要使今后工作上避免错误、减少缺点，因此党和毛主席提出整风运动，要求党外人士对党提出意见和问题；这正是党和毛主席的英明远见，是增高党的威望和人民对党的信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础今后是更加巩固了。这真正是一件全国团结的大好事，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魄和力量这样地做。通过党的整风，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更向前推进一大步。

我现在谈谈与工商界有关的四个问题。

首先，我要谈一谈关于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和我一个不成熟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许多地区反映出公私共事关系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上海也是如此。从许多私方人员向工商联、民建会反映的情况看来，公私共事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方人员的职权问题，他们感到自己的职权没有得到公方代表和职工足够的尊重和支持，感到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原因，就是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制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李维汉部长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会上发言中曾经提过一条很好的意见，他说：要保证党外人员有职有权，关键在于同党外人员认真地实行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遗憾的是，李部长这个意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得到有效的贯彻。在许多公方代表、职工和私方人员头脑中仅仅有着一个合营企业应受公方领导的笼统概念。至于在合营企业里党和行政的关系，公方代表领导与企业行政领导的关系等具体问题，则都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形成了私方人员束手束脚不敢大胆负责，也导致了职工的请示汇报集中于公方代表一身，造成了公

方代表的包办代替。许多私方人员曾经反映他们的苦闷说："多做了工作，怕被说成是争夺领导权；少做了又怕被批评为不负责任，觉得进退两难。"这种矛盾现象，在私方代表担任正职，公方代表担任副职的企业里，尤其显著。

面对着这些矛盾，有些私方人员怀疑起公方代表的制度来了。提议撤销公方代表或者取消公方代表的意见。在我看来，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为了保证企业向社会主义过渡，帮助私方人员进一步接受改造，目前在一般公私合营企业里保持公方代表的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关于这一点前几天好些同志已作了专题发言，我不再多讲了。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把李部长在八大会上的发言积极贯彻的问题。我认为今天应该迅速作出决定，把合营企业里的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开来，凡是重大问题，原则性问题的决策工作，应由企业的党、政（包括私方行政人员）、工、团建立适当的会议制度，在党和公方代表统一领导下，集体作出决定。至于决策的贯彻执行以及日常事务工作，则由企业的行政部门按照行政的职别办事，不再分公方或私方。这种把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的办法，一方面依旧保证了公方对企业的领导权，一方面可以严格贯彻按职办事分工负责的态度。消除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的现象，使私方人员可以有职有权有责。我这个意见未经过成熟的考虑，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其次，我想就有关中小型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的问题，提供一些个人的看法。

中小型工商业者在工商界中大约占90%，是绝大多数，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和党政负责同志都曾作出正确的估计，认为中小型工商业在全部工商业中是不可缺少的，中小工商业者也是国家的财富，也应该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安排在适当的地位。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给工商业者在合营企业或在国家机关里安排工作，维持原有的薪给报酬，工资改革后，低薪的且有增加，又在七年以内使他们有定息可拿，为的是使工商业者安心接受改造，发挥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但是，目前中小型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生活有困难，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矛盾与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党政负责同志关心他们，曾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但是，在贯彻执行中，拖拉推诿的现象是有的，他们对于政府是有意见的。如参加座谈会很多同志提起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不少人反映：工资改革后，福利、借支取消了，"减的多，加的少"。生活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在这个问题上耽心事，闹情绪，这就不能不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生活问题而外，最为中小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关心的，就是摘帽子的问题。试想有这样一些小户私方人员，职位低，工资少，家庭负担重，他们在车间、科室里与工人群众一道从事劳动生产，而拿到的定息，只不过够买几包香烟，有的一个钱的定息也拿不到，在阶级关系的处理上，也要他们戴起资产阶级的帽子，在福利待遇等方面，受到差别的待遇，他们的心情怎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于摘帽子问题，毛主席和党政负责同志去年曾说过在一二年内，由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中小工商业者可以从资产阶级中划出去改称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可以考虑划出去。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听到党和政府准备进一步具体化。目前仅有为数有限的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改变阶级成分，被工会接纳为会员。不少的人摘帽子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不得其门而入。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认为对于中小型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的生活困难问题和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改变阶级成分、参加工会的问题是当前工商界的重要问题，必须加以注意。希

望党和政府及时地作出适当的措施，并在今后的贯彻执行中，克服拖拉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让我谈谈对于赎买政策问题的看法。

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会对于这个问题曾经展开了讨论；民建会中央也已把这个问题放下去在一百三十多个地方组织、二万四千多位会员中间展开讨论，到目前为止，都还未达到结束阶段。这里所谈的，仅仅是个人的意见，为了要谈得更清楚些，也许要多占用些时间。我的意见的要点是：一、赎买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二、定息七年五厘拖一个尾巴是好办法；三、今天工商界的重要问题并不是定息期间长短的问题。

大家知道，赎买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中采取和平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中国历史上没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赎买什么时候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资本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那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怎样对待呢？我们国家是采取和平改造政策，而不是采取强力没收政策。这是因为对国家、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建议事业都有利。当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政权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那时社会主义改造就开始，也即是赎买开始。因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下，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后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图利，这不是赎买是什么呢？自从共同纲领订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进而为利用、限制、四马分肥和高级、中级、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阶段；从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定息停止之日，这又是一个阶段。所以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一直至定息停止之日，这整个时期是改造过程，也是赎买过程。前一阶段，后一阶段，实质上都是赎买，不是赎买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赎买在后一阶段定为七年，是太短还是太长呢？我说不太短也不太长，理有有三：

第一、赎买是要国家拿出钱来的，虽然生产资料是归为国家所有，但也必须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和其他一切人民，都能在不太勉强的情形下，大家可以过得去而愿意接受。而七年期间一般说来能够得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绝大多数同意，尤其是大多数工商业者欢天喜地感到鼓舞。这样说，是不是没有反对呢？有的。去年十二月全国工商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关于定息问题，毛主席曾对全联和民建会各地负责同志谈过，定息以七年为期，即今年、明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这样的处理方针，需要在工人中间多做宣传、解释工作，因为这不仅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中会有意见，在国营企业的职工中也会有意见的。对于中小工商业者也需要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上面主席讲话的一段，全凭我记忆所及提了出来，如有错误，由本人负责。）所以我说反对是有的，可以有办法说服的，赞成的终是大多数。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在赎买过程中，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使得工商业者来提高自己，充分学习，学习业务、学习技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作好准备，终于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这些改造时间，认识到消灭剥削和贫困，是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理，这也就是要有七年期间的必要。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还只是基本完成，需要再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定息七年到期就是一九六二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年，这个时候三改一同完成，共同进入社会主义，这是

第三个理由。

我认为七年定息是恰到好处，既照顾到工商业的局部，也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整体，这的确是对国家有利、对劳动人民有利、对工商业者也有利的好办法。

有人问：你这样说，对要求延长期限的人怎么办呢？我认为毛主席对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安排。毛主席说：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到那时候工商界还有生活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拖一个尾巴，这些主张要长期拿下去的人，在七年到期还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拿。但是，照我看起来，今天虽然主张要拿下去，到了七年后不仅环境情况和生活条件起了变化，自己受到党的教育改造，这样的愿望是会消逝的。

总而言之，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满意的，只能做到大多数人同意。我认为对于定息问题，假如有人自己不要拿，那是可以的，但要强求别人也不要拿，这是不可以的。反转来讲，自己要多拿几年，这主张也是可以；但也不能强求别人都要多拿几年，这同样是不可以的。

还有人对于定息名称来钻字眼，以为定息就是利息，既是利息就联想到还本，这和革命进行中的赎买完全是两样东西，其实定息只是赎买过程中每年给付金额若干的一种计算尺度，以便利计算而已，与赎买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至于这个名称恰当不恰当，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认为凡事应从精神、实质上多求理解，专在名词概念上作推敲，意义是不大的。

我认为今天工商界最重要的问题，不在此而在彼，是合营企业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和中小工商业者有关的问题。这些都是当前实际问题，牵涉到发挥积极性问题、解决生活问题和如何正确处理阶级矛盾的问题。当然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但又是必须解决的。在今天我谈的第一、第二部分已经有所涉及了，我希望党和政府重视这些问题，予以详细讨论，能用各种各样方式，逐批深入具体研究，按照可能条件，分别解决。

最后我就两面性问题谈几句话。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我不反对别人说没有。目前形势已经改变，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有没有两面性是一个理论性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彻底解决的。它的存在对于工商业者的能否很好地接受改造是有关系的，但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不是暂时让它存在呢？我看是可以的。我个人的体会是如此，当否也请同志们指教。

关于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吴韫山认为目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公方代表在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公私关系好不好，公方应负主要责任。为了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建议，首先应加强对公方代表的教育，在私方人员方面，应该诚恳地接受领导，既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他说，如私方人员是副职，应按照职务分工进行工作；如果私方是正职，就应有全面处理和主持业务的权力，公方副职除自己的分工范围外，对全面业务最好处在监督地位，不要代替私方，要放手让私方去做，并给予大力支持。他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中的矛盾，今后仍会不断发生，私方人员要树立主人翁的态度，不要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多愁善病总把自己看成"外人"，要学习李逵的正直无私，对各种歪风要拿起板斧来"劈"，如果自己有错就负荆请罪，这样才合乎互相监督的精神。

潘仰尧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公方代表抓的太多，抓的太紧，抓的太死，抓的太细。他认为，有人主张索性不要公方代表是不对的，那是因噎废食的想法。

朱继圣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界有成见，对工商界的进步估计不足，提起工商界总是

唯利是图，总是自私自利，以致造成了公私之间的深沟和高墙。他认为：改善公私关系，应该双方努力。

座谈中大家集中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赎买政策问题。胡庆照反对定息二十年的做法。他说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具有工商业者兼地主的成分。我所经营的企业曾经经历过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生产阶段，然后积累成为半机器工业的食品工厂，现在是合营厂，到了客观条件许可时，就可以转为国有。他回亿自己企业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世界一般的资产阶级具有共同性，都是剥削工人阶级养肥了自己，尽管少数企业的原始积累容或不同，但其最后的成长还是取诸之剥削。这是一个本质问题。他说，从根本上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剥削而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本来应该无偿的归还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过三大敌人的压迫，具有两面性，可以不用剥夺的办法，而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赎买政策正是根据和平改造的原则确定的。他认为赎买不能等价交换，也不能要求等价交换。因为人是不能以经济价值来比价的。至于"赎买到底"的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就是说要把一个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以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进步的一面，就要求国家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所迁就。当前有部分工商业者提出"定息改变为二十年"和采用"赎买存单"以及用"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等代替定息的办法，这无异说：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有人认为工商界中已经没有两面性了。他说：这是带有浓厚的阶级思想感情的。这种看法，正可以作为"没有两面性"的有力回答。

潘仰尧、朱继圣等都表示不同意定息二十年的主张。潘仰尧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发了存单工商业者就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认识它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改造过程。但他最后说："李康年想出的一些办法，值得参考，不可一笔抹煞。"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十一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王艮仲、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黄长水、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巩天民、云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琢庵、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业。民建中央委员兼宣教处长资耀华发表书面意见。

王艮仲从自己改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谈到关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首先申明自己是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分子，当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同时也参加过民主运动，营救过革命干部，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解放后参加过土地改革。在这段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骄傲情绪，也出现过自卑感，在土改以后，有宁左勿右的思想。这些表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当思想上远离资产阶级故旧朋友或党员朋友的时候，原来没有墙的也有了墙，当自己的思想上丢掉了这些成见时，墙也就拆掉了。他认为拆墙就是拆阶级，就是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果说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就可以不要改造了，这就是等于把资本主义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是不可以的。

他认为障碍着党与非党关系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党员对新形势认识不足，对工商界歧视，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工商界有些人抱着原来的东西不放，不愿意继续改造。因此，拆墙要从两方面拆，一方面要教育党员克服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承认两面性，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提出对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需要加以区分，宗派主义是团结群众问题，是属于思想作风问题；而宗派活动，则属于组织上闹小圈子的问题，是纪律不容许的。其次反对宗派主义不能同党的核心领导对立起来，核心不是宗派，没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

胡厥文认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只要公私双方互相学习，一两年后，公方就可以成为企业中内行的组织者，私方也可以学会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改变自己的作风。他说，我们人民内部的合作共事，不等于对待敌人，尔诈我虞是不适于共事关系的，他认为目前公私共事是有阶级关系的，但这种共事关系应该对事，不应当对人，更不应当对阶级。他说凡是做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事，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是对的。把企业办好，是公私双方的共同愿望，为什么不能相处得更好呢？目前，公私双方关系搞不好，不外乎是相互间信任不够，自高自大，鄙视对方，侵犯职责。这种情况，公方要多负些责任。他主张公私双方要互相尊重，开始相敬如宾，进一步发展到开诚相见，夫妻之间吵架原是平常的事，有的越吵越好，如果一吵架就马上"离婚"，公方代表就不要了，这也不好。最后他认为工商界这次帮助党整风，在大放大鸣中间，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三个主义？程度怎样？每个工商业者都要在运动中抓紧机会，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财富。

毕鸣岐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他说：

千家驹同志的发言批判了某人所说的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

批判了两面性和赎买政策的错误看法我是同意的，千是我们的老师，在几年改造中是给我们了很大帮助。如果不同意见作为交换意见。

在五月十七日我曾以工人阶级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为题发表了我的看法，这是我个人这样看，同时也是我在工作中所听到一些工商界群众的反映和求要。尽管其中的一些看法高了些片面了些，我们应当肯定一点，其主要的是要求进步迅速的走入社会主义。这些思想矛盾的发生是为了迅速走入社会主义社会。把它反映出来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认为有些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面是公方对于私方人员的心情体会不够，对于我们的进步要求还估计不足，我提出这个思想反映是从积极出发的是为了我们工商界更好的安心工作安心改造，在思想改造中使公方对私方能做到有的放矢。当然是在我谈的时候有缺点因为只提出了在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之后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给予应有的评价（应当声明从全面安排量材录用适当照顾已经是给了充足的评价，例如说民族资产阶级是财富不是包袱，这是党和政府根据全业合营后私方人员有了积极表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评价，这是给私方人员很大的鼓励。但是，有职有权，受到尊重还不够），而对于私方人员在工作中尚存在着的某些所谓消极思想和作风就没有同时批判，因而使有的同志对于我的谈话有片面性，我的看法是主要帮助党整风，向党反映一部分党员同志在工作上的三大害，而对于我们工商界本身未提出检讨。俟党将整风运动不久胜利完成后，我们还要使工商界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和职工改变观感上要求党对于我们加强教育也给我们以和风细雨的来个整风，这次向一部分党员同志提出批评，这种精神也就是毛主席所教导的"教育人者首先受教育"我们先携助党整风然后再教育我们。

当着我提出了工人阶级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之后，有的同志说我给民族资产阶级评价过高了些。特别是我没把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在企业中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没有加以分析批判相对之下显的过高了和不适当了。总之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是给我了很大的启发和

帮助。

对于千家驹同志的发言所提出的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正确认识赎买政策我是一致的。至于他把我所讲的话加以引证之后，而没有交待清楚给扣帽子我是不同意的。例如他说毕鸣岐同志说“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这种思想斗争，思想变化的情况，是很多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千家驹同志引证了这个话之后接着说“的确，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企业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这是他们接受改造的明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设想放弃之后，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时，不再存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留恋之感，所谓‘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不是这种心情的表现吗？”

我们在实践中所感觉的是经过艰苦斗争胜利之后那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主要的是提高了社会主义的觉悟和走社会主义的信心。例如自解放来抗美援朝、税收工作、公债等、受了教育之后内因是很重要的。至于我们所发现的个别人所作的打油诗“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在我们工商联和民建会提出以此进行教育，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思想，加强思想改造，我们对于工商界中所能了解到的情况不管是少数的想法或者是个别人的想法，我们是毫无保留的向党反映，要求党更好的深入了解对我们加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难道说这不是我们向党诚诚恳恳老老实实接受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吗？不能把个别的或少数的看成一般不能把个别的或少数的当做全面，这种分析法不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非常不同意千家驹同志说“同时，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句话我不仅是没有说过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没有，我也没有听说民族资本家说过，凡是稍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都懂得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是劳动创造世界，我们都深入人心的是自建国以来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以他们有力的双手和智慧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是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认识世界上的一切伟大创造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我不知道千家驹同志说的“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是从那里来的．同时这个大帽子的底下没有人还是摘下去好，教育人最好是以理服人采取用压力办法是不解决问题思想改造不是靠用扣帽子必须使我们从思想深处认清前途，一心一意的走社会主义．我们从八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深深体会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者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走上全业合营只说成是外因而他们体会的外因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而是说“外因”是“压力”．把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教育识清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自觉性的一面，就根本不存在。例如在全业合营前公私合营是一户一户的搞，我们曾经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如果这样搞得搞一二十年，后来发展工商业申请的是一批一批，在一九五五年底全联执委会议听了毛主席的教导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在五六年初就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高潮，这样的高潮不是谁要它来它就可以来，人们不能创造也不能制定在党和政府在事先也没准备来个高潮，我认为这个高潮是外因和内因相结合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难道说这样一个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应当说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定要被先进的生产方式所代替，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个社会发展规律．”如果我们工商业者不认识或不承认这个规律，我们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变化也不能到了今天．谁想不承

认我们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和要求那是同样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当然应当声明不等于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完成，即便资产阶级消灭之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商业者谁也不能否认。

在我上次发言中说"在我们工商界思想改造有着如此变化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留恋资本主义，走回头路等等。这样的教育，改造方法是与实际不符的"。我们的概念留恋资本主义，走回头路是指的"贪恋资本主义制度，留恋剥削，搞地下工厂，不愿在公私合营搞生产，而喜欢出来单干，"虽然这是很少数的，但在工商界曾经不断发现过。

千家驹同志所谈的"所谓资本主义一面，即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我们指他们还留恋资本主义是指思想情况，不是指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解释非常同意，也是给工商界解除了思想包袱。工商界的群众对于资本主义一面的想法正是如此，在过去在概念上有很大差别。

千家驹同志说"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否存在以及两面性应作怎样解释的问题。首先应问资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经全消灭"。我同意以上这个提法，这是个解决思想关键的问题，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几年以来党和政府所给我们的思想改造教育多般都认清即便使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还是长期的。没有人设想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阶级消灭之前而先消灭。有阶级就有两面性，就有阶级关系。这是多数工商业者所懂得的事，不过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应当回忆全业合营前几年来阶级教育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有消极的一面如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等五毒行为。这个印象深入人心自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阶级矛盾基本结束，我们的阶级教育还是说阶级仍然存在阶级关系存在，两面性也存在，并没有把阶级正在消灭过程到了什么程度？阶级关系在企业中是否是主要的？两面性的变化的程度如何？都未加分析就简单的说阶级存在两面性就存在，我们用这样一个教条主义的方式是不能说服人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工商界可能分两种一种是口服心不服，你说怎样就怎样，一种是口不服心也不服，甚至于他们说两面性没有了，主要是说的消极一面没有了，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都没了，使用什么还去犯五毒行为啊？他们说的没有是指的民族资本家还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来进行五毒行为的这种消极一面没有了。如果把道理讲清楚阶级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也存在，例如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这些属于思想改造的范畴，我相信工商界是会同意的，这样的概念是会使我们接受改造更有信心。

千家驹同志说"资产阶级处在消灭过程之中，如认为已经消灭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提出以下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证明，他说"事实是，国家每年还要付出一亿多元的定息，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非任何人主观的产物"。对于以上这个解释其中我有很大的不同看法，从定息存在阶级就存在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上的照顾因为和一般劳动人民不同，因而阶级也存在我也同意。至于说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因而证明这是阶级存在我不同意，那么说在全业合营后对于我们的一切安排和照顾是由于阶级存在，俟到阶级消灭了是否全涮，我表示怀疑？事实党和政府不会这样做。

千家驹同志又说"全业合营后，一方面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基本上他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就这一意义说，他已经是个劳动人民了"，以上这个说法好像是阶

级消灭了。他又提出"但另一方面，他与一般劳动人民还有所不同，他拿定息，还有生活上的种种照顾（如高薪不减，病假期工资发50—70%），等等，因而还保留资产阶级的身份"。对于以上这个分析我有不同看法，对于拿定息，高薪因而保留资产阶级身份我没意见，对于50—70%病假工资，因为有些私方人员不幸得病只拿到月工资的30%生活实在困难，他们享受不到什么劳保福利，因而经过反映才同意照此病假工资办法，何况至今尚未全面实行，即便实行了也不能以此就作为保留资产阶级身份，此外在工商界中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定息可拿，工资还有的较工人为低，是否这些人应当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呢？

最后再提出一个问题，使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平心静气的来研究，不要扣帽子要实事求是讲道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是我国新的创造，既无经典著作可以依据，苏联和其它兄弟国家也无有经验可供参考。

全业合营后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阶级矛盾基本结束了，阶阶存在的成分也应当大大起变化，因为矛盾基本结束了，而阶级是否也要到基本结束，阶级关系是否就很淡薄了。应当说明不管是阶级存在或将来不存在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究竟阶级在什么程度下可以消灭，那么说就以定息还有六年为限了，这个时间照社会发展情况看时间是长呢还是短呢？我总认为时间相当长，因为现在是在一个高度的革命变化时期，很难估计，这样死板板的规定下来还有六年是否能适合社会发展规律，啊，现在是仅仅以定息扯着有定息就有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关系，有阶级就有两面性，这个进度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人的思想进步衡量呢？还是一定要规定还有六年呢？还是瓜熟蒂落随时摘瓜呢？我认为在今天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思想改造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看出来改造完成或改造未完成。如果说阶级一旦消灭两面性也马上消灭了，也是很不现实。大学毕业有大学课程，对于思想改造能否有个课程是很困难，即便是还有六年也应当做出六年改造规划。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在某一种情况下有过合作曾共同反帝反官僚反封建，建国以后就接受了利用限制改造响应各项爱国运动拥护总路线实现全业合营，几年来在经济建设上是有它一定的贡献，为什么现在还把这个阶级关系阶级两面性抓住不变，这在生产建设上有什么好处。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大踏步向社会主义迈进，但是我们民族资产阶级还在缚着足，迈不开步，跑不快，要求放开足，勇往直前为社会主义贡献更大的力量。

阶级！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一定的集团的。拿什么来划分这些集团呢？那就以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什么地位来划分。换句话说，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不占有，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占有与不占有，有无对产品的分配权，从这几方面来划分出集团与集团的区别。每一个集团，就是一个阶级。资本家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就是占有生产资料，占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且有权来任意支配这些产品，而工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归自己所有，也就谈不到来分配这产品。这两个不同的集团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这就是阶级的概念。如果从这个定义来看，今天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占有生产资料吗？若是说仍占有生产资料，就与实际不相符了，因为现在资本家已不能再支配我们过去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了，同时有许多资本家都不在他原企业工作了。今天资本家也不能占有产品了，也不能支配产品了。从这个两方面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当然定息从概念上说，定息的大小是从定产核资来的，因此说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因此说也是剥削，但其手段终究不是自己掌握生产资料，而为所欲为的剥削。关于这个思想问题，是在工商界中

存在着，它是个客观事实，你同意它它也存在，你不同意它也是存在着，这是早晚要解决的问题。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我们伟大祖国的第一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北京市的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出席了这个大会，彭真市长庄严地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人民日报上登载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了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以后于一月十八日天津西安也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连着又来了个上海，我很奇怪，可是没有不久，这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法就改了。那时工商界非常兴奋的说“看那，我们没有什么痛苦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了，真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没有愉快几天就变了。”在这天的人民日报上写着“过去，不少的工商界人士把社会主义想像成是很可怕的东西，觉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自己的前途。现在他们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有了美好的前途。”北京市工商界的许多人都喜欢用“鱼跃龙门来形容自己现位的变化。结果又是资本家鱼跃龙门”没有跃过去呢？还是龙门关上了呢？那个报上还有记载义合机器厂经理徐世清小儿子徐春林，过去常问他：“学校老师说工人叔叔最好，你是不是工人？”徐世清为了不愿意使幼小的儿子知道自己是个剥削者，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当他听到批准公私合营的消息以后，很很高兴的告诉他儿子“你爸爸快要变成工人了。”在报上还说“就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在短短的几天内，全市新批准公私合营的一万七千多家工商户的清产估价工作，从早晨到深夜紧张工作着，而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行动，就是资本家们跨入社会主义后的第一个积极表现。天津上海和全国工商城市谁也不能否认这个热火朝天的高潮。资本家们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社会主义，没有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带着，阶级关系还那样强调着，两面性还那样原封不动的严重，实令人难解。当初我们代表全国在政协大会上向毛主席报喜。我的意见是应当正视新形势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有其恰如其分的看法，那就是说工人阶级在今天应当怎样来看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这样一个根本变化，生产资料交还了工人阶级，为了更好的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工人阶级思想，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战士就应当把老大哥的手伸出来拉回头是岸的小弟弟一把（当然工人阶级早已在做着），把过去的阶级仇恨勾消，或者减少到很小限度上去，在企业岗位上强调搞好共事关系，不要再强调什么阶级矛盾，什么阶级关系，这样就可彼此以平等的工作关系来协商办事。（当然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

总之凡是为社会主义有好处的我是服从这个利益的，所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帽子还能起一定作用，那就多带几年。以便更好利于改造。

黄长水首先对今天上午毕鸣岐的发言提了一些相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千家驹在发言中引用一首打油诗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类型来批判是不适当的。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在我接触的人当中还没有这种思想。他说，工商业者自己要求合营，是受到党几年来的培养教育，和本身觉悟提高的结果。合营以后，政治上得到很好的安排，经济上也得到比工人农民更多的照顾，又如何会产生“亡国之民”的感概呢？

他不同意毕鸣岐提出“公私双方应该平等协商”的说法，他说：企业中共事关系，不是平等协商的问题，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根据宪法精神，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反映在企业中就是公方领导私方。因此目前在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是对私方的信任支持和有职

有权问题。

巩天民说：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政策，是通过统战部贯彻的。过去中央和地方各级统战部门，在这项工作中是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定成就，这是大家公认的。但另一方面是存在着缺点的。主要表现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上层人物照顾的多，而对他们的工作作风、思想改造方面具体帮助少。没有通过具体事物，适当的给予批评和帮助。老实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普遍存在着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在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上，在上层人物中，只能讲团结，不能批评，有时运用了批评，又不能达到新的团结。而统战工作对合营企业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业者往往使用多、关心少，例如私方人员的医疗费用、病假工资，国务院早有指示，但下边到现在多未贯彻实行。因此有人反映：统战部是"统上"、"战下"。为了正确贯彻统战政策，加强统战工作，他建议统战部应认真检查总结一下统战工作。

李琢庵发言中反映地方上对于统战工作有一些意见，认为统战工作不深入，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征求意见只限于上层；而上层由于经济比重大，顾虑多，对于中下层的情况不了解，反映的问题也就不会全面，很多问题反映上去也没有下文。统战部对工商联、民建会的工作，有时管得太紧，民主不够；有时又管得太松，形成不管。他反映目前在工商界还"鸣""放"得不够，主要顾虑是认为有放必有收，有收必有整，另外看到工商界的领导人物只讲好的，或只谈过去的老问题，还没有把真实思想情况反映出来，因此下面也就马首是瞻，不敢大胆"鸣""放"。他们认为要大鸣大放，还得工商界的领导人物真正起带头作用。

刘永业也反映工商界对整风还有顾虑，怕报复。他认为对工商界的改造，应该本着治病救人的办法，对症下药，但这方面做的不好。他说，我们是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但现在感到好像是反过来帮助工商界整风了，例如对"定息二十年"、"撤出公方代表"等等的批判。

资耀华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公私共事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二十年定息也没有必要；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在政治上需要有公方的领导，在经济上也需要是公方的领导。如果公方代表作风不正派，态度恶劣，不能搞好企业和公私共事关系，甚至妨碍开展生产时，可以请主管部门调换。

接着，他就最近在各地视察及原来所见所闻，谈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和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何破如何立的问题。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他说党中央重视，中小基层不重视，企业机关等部门更不重视，甚至有些地方根本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意义。因而在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发生了好些相当严重的偏差。例如有些公方代表因为不懂统战政策，不但公私关系搞不好，甚至有意造成私私之间的矛盾，在全行业合营后在私方很多的企业中，公方抬举那些表面唯唯诺诺，遇事逢迎一方，压制那些认真老实，爱提意见的一方。他希望中央统战部要将政策贯彻到基层和各企业中去，并随时进行检查。

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些党员以个人的意志代表党，不但以党代政，且以个人代政，要党的招牌，假党的威信，曲解党的政策，来压制非党人士。这怎能谈得上互相监督呢？他希望党在这方面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使党员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要破，要破得彻底，社会主义要立，

要立得巩固。但破什么？如何破？这是各地工商业者希望有所适从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一谈到破资本主义，差不多总是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否定的太多了，就会看不起资方，因而使工商业者自己也感觉到一无是处，低人一等，失去了自信心，这就妨碍了改造和进步，不能发挥积极性和潜在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和作风，都应当彻底铲除。但有一些很好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技术，过去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现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来还可以为共产主义服务。党中央和政府早已说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包袱，而是国家的财富。这个财富是指什么呢？当然不是指那小得可怜的二十几亿的生产资料，而是指的经营、几十万工商业者过去对企业、工厂管理、技术、经验等等知识。这些知识，是他们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生存竞争中得来的，是在抵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获得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斗争中所积累下来的。过去一个工厂，一个企业，其所以能在惊涛骇浪中，由小到大，生存发展，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为私人资本过去对于经营管理，稍一疏忽，就要倾家破产；对于技术知识，不求改进，就要被淘汰；对于服务方式，不日新月异地便利居民，就要门可罗雀。这些积极因素，若一概抹杀，而不加以批判地来肯定，则几十万大小工商业者就不是国家的财富，而真是国家的包袱了。所以希望负团结教育改造资本家职责的各方面，对于“破资本主义”，要破其所当破，不要破其所不必破，更不要破其所不当破，既不要全盘否定，更不要玉石俱焚，才可以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才可以发挥一切可能发挥的积极因素。

五 月 三 十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十二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业、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秘书长（天津油漆颜料公司副经理）车重远、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章元善、上海棉纺工业公司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述曾、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工商联主任委员）卢燕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姚维钧。

刘永业在发言中，建议政府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来进行自由经营。他认为中国人口多，需要的商品花色品种也多，小商小贩有它存在的条件。如果能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一方面可以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人民需要，一方面又增加一个劳动就业的场所。他说：现在自由市场很混乱，是有的管得太死，有的没有管；只要把他们很好地管起来，他们是会起很大作用的。

董少臣在发言中对于撤出公方代表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说，自从人民日报以“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为题登出我对公方代表的主张以后，有人说我想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说我要造反，说胆子太大了。后来有人帮我做了解释，说明这个标题和我的原意有些出入，有人又责怪我说了话不承认。因此，思想上有些沉重，本想申明一下，也有人劝我不要申明，为了“鸣、放”起个带头作用。

他说，本来大公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并没有系统的准备，就随便说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资本家接受党的教育已经七年了。合营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总觉得无事可做；衡量自己的能力，又不是干不了。这反映了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苦闷心情。我想，要使私方人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只靠空洞的语言教训一番，必须让

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锻炼才有可能．因此，我建议在企业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国家计划，具体业务交给具有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让公方代表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后来新华社播出来是撤出公方代表），这对私方人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做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我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私方人员可以有条件学会社会主义管理技术，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人民；第二、可以精简机构，公方代表可专做党的工作；第三、党的领导可以掌握全面情况，可以密切私方与党组织的关系，把生产搞得更好。

董少臣发言后，**车重远**又补充了一点意见．他说：关于"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的问题，天津市的工商业者有的同意，有的反对．我个人认为在个别合营阶段，公方代表是非派不可的，但是全行业合营以后，情况不同了，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公司，小的企业变成了车间，层层都派公方代表是否必要，值得考虑．不过全部撤出，是不堪设想的，因为阶级关系还存在，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还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章元善说：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我们感到义不容辞。我曾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了五年，参事室搬了几次家，愈搬愈远，我也感到愈想靠近党愈困难。现在三大主义已经发展到危险的程度，很多意见反映上去得不到及时处理，问题愈积愈多，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也就愈厚、沟也就愈深。有些问题，上面已经作出决定，到了下面又被保密起来，没能贯彻。他说：现在保密的事情太多，甚至有的疗养所的作息时间都保密。他建议政府把保密范围缩小，让更多的人知道国家更多的事情。

他说：解放后，在公文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话："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麻痹大家对缺点的认识，做了官僚主义的护身符。大家要对小的缺点提高警惕，因为小的会发展成大的，个别的也会发展成普遍的。他最后希望党对党员加强教育，希望公方和私方一齐学习，同时受同样教育，以便思想认识一致。

陈述曾发言中反映了上海棉纺业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棉纺业内部矛盾之一。他说，在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有着明确的规定，这说明酬劳金是资方代理人应得的合法利益（当然不一定是合理的利益）。资方代理人提出酬劳金问题已经一年多了，而上海工商联的领导人物一拖再拖，似乎准备拖过三年七年，把这个合法利益变为不合法。他认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缺点的：去年说，酬劳金不必谈了，今年又说，可以由私方自己协商，真是一个哑谜。这个情况，反映了资方代理人同棉纺业同业公会的领导层之间是缺少共同语言的。

接着，他对千家驹的发言提出了批评。他说，从资方代理人的角度来看，千家驹的发言跟我们资方代理人的思想感情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不同意千家驹所说排队买东西会在思想上滋生一些留恋资本主义的情绪；相反，如果对排队有所不满，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积极性的表现。他认为千家驹把脱胎换骨说成超凡入圣也不对，他说，我们绝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抽筋剥皮固然害怕，而对于超凡入圣也不感觉舒服，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圣人阶级，资产阶级是凡人阶级，那恐怕有许多资产阶级要放弃改造，工人阶级也有许多要背叛自己的阶级。

接着，他反映上海一些代理人的不满情绪：说我们代理人代理得太多了。我们代理经营管理，代理剥削工人，代理五毒，代理受教育，代理大老板过关，代理……而那些在工商界团体领导层里的人物（即代理资方的代理人）却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最后他要求在工商

联、民建等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席位。

卢燕南在发言中，主要谈的是公私关系。他谈到：现在有些党团员仍以旧眼光看待私方人员，对他们不信任。有个厂，上级有事通知开会，厂长不在，让秘书去；秘书不在，让党支书去；党支书不在，让工会主席去；都不在，宁可缺席，也不让私方人员去。有的厂，党与非党人士犯了错误，教育方式也不同，一是内部教育，一是开会批评，甚至发通报。他说：我们是资本家，但是有人叫我们“资本家”、“先生”或“老板”，心里总有些不舒服，听到有人称“同志”，心里就很兴奋，他希望社会上能改变对他们的称呼，希望报馆也能笔下留情，不要左一个资本家，右一个资本家。

他说：折墙、填沟，要公私双方一齐来搞。从私方人员来说要除三害，即消极性、自满情绪和自卑感。我们既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就要拿出当家作主的样子，正视自己的缺点，虚心学习，不怕碰钉子，主动争取公方领导，积极发挥“财富”作用。从党这方面来说，要加强对党团员的统战政策教育，请他们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说知心话，公方要大胆信任私方人员，要与私方人员真诚相见；在企业里，要把民主管理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草拟章程时，要有八办和工商联参加，以便反映多方面的意见。

最后，他提出：他们省工商联没有党员秘书长，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要求统战部给他们派个党员秘书长或党员办公室主任。

姚维钧发言中，主要反映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的情况，她认为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之中不少人得到了学习机会，思想有了提高，其中有些人也逐渐得到了安排。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有的因为家务事多、或男工商业者不支持，不能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有些骨干分子因社会活动太多，家务劳动没时间搞，爱人也发脾气。她建议有关方面要对男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她还反映了一些中小户工商业者家属生活困难情况，建议政府对他们给予适当照顾。她又反映了妇女在节育宣传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歧视，要求政府要多方面宣传，并按宪法规定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十三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联主委刘佩芝、北京市公私合营裕生祥铁工厂副厂长吴金萃、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处处长冯和法。

刘佩芝说：黑龙江省合营企业内公私关系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一部分不正常，如私方人员有职无权，分工不明确，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包办代替，偏听偏信等。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正常现象，是下边公方代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合营才一年，日子还少，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小问题是难免的。一年来，公方代表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公方代表，让私方人员全面领导企业还有问题，因此公方代表不能撤。他认为工商联党员秘书长联系各方面，对贯彻国家政策，推动工商联工作作用很大，也不能撤。他认为大多数工商业者是要求进步的，但是消极一面还有，表现思想动摇，留恋定息、患得患失。他还反映了工资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了一些意见。

吴金萃主张七年定息一次付清，资本家的帽子随着摘掉。他说：五日七日大公报把我写的关于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一篇文章发表了。在这二十多天里，我从报上看到、在不少的座谈会上听到，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些人不同意，所以我还要谈谈这个问题。我主张“向

工人阶级学习，如果具体到向工人店员去学，应当是有目的、有分寸、有选择的去学，而不是盲目的、笼统的去学。应当紧紧的抓住人家的优点主动的去学，而不是啃住了缺点拒绝学习。”我的想法错了么？到今天我仍不以为然。因为我还没看到有人主张要盲目的笼统的向每个工人、店员去学，也没有人主张抓住人家的缺点去学。我说有落后思想和行为的工人店员“不是个别的”，也还没有人能讲出“是个别的”。我说中国工人店员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为许多人的发言加以进一步肯定。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足够的理由来推翻我的几个主要论点。

千家驹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他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他说“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要中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上，为什么千家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

千家驹先生又说“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是不服气，那么今天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不服气”？何况谁又说过“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这样一句笼统的话？

另外在千家驹先生的发言里还有几点我不同意，这里只提毕鸣岐副主委没提到的。

比如千家驹先生在谈到“公私关系”问题时，说“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职工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同志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事实上这样谈解决得了问题么？

关于定息问题，我认为拿定息是拿赎买金，是拿照顾；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政府只是现在付款，而无所谓欠债，也没有人这么说。我主张：不要这样为付款延长时间而拖着我们当资产阶级分子了。我主张：按七年计算定息，除去已付的，一律用普通的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将来我们也便于处理，手续也简单（自愿的可以放弃）。

公私合营的牌子可以摘掉，改国营。现在是“合资”不是“合营”，因为人既不一定在本企业，即使在企业的，也是大的问题由上级决定，小问题由公方领导，私方只是作“公职工作”，谈不上经营，更没有为私人利润而经营的剥削实质，这叫什么公“私”合营呢？至于那些国家未投资，也未派人去的小户更是空挂合营的牌子，可以考虑根据自愿改为国营或仍维持私营，维持私营而又雇用劳动力的叫作资本家，政府按私营管理。其余是小业主。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随着，资本家的帽子可以一律摘掉。因为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是七年，我们已经取得四分之三社会主义，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这二年进步更快（因为已经改变了生产关系，失去了物质基础），完全可以取得另外的四分之一，落得个四分之四（至于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还是

要改造的）。以前有不少人把企业搞垮了，今天已入工会，并且有的当了公方代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还可以根据自愿或破产而改变阶级，我们怎么不能呢？

如果不是这样，退一步，撤出公方代表也是可以分别不同情况考虑的。因为撤了公方代表还有党在领导，事实上公方代表当中有很多是一般干部、工人、转业军人，……有的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和办法，有的政治水平也并不高，起的作用确实不大。但我不主张不加分析地全部撤出，同时，也不要把公方代表就看成是党，把撤出公方代表和服从党的领导混淆起来。

如果不是这样（不改国营、不摘帽子），比照劳保条例的办法也请再加考虑，不要草率从事。我们不是得寸进尺，而是二千元以上的照顾办法实在太笼统了。执行起来会发生很多问题。二千元以上的适当照顾，四千元的照顾不照顾呢？像我是个四千元股本的资本家，每年定息二百元，除去买公债40%，交互助金10%，余50%为一百元，每月合八元多。为了这八元多，资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就没有人管了。

那么我们又想不通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又是如此，究竟这定息是照顾呢？还是惩罚呢？是使我们安心呢？还是心慌呢？所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了帽子吧！

这些日子以来我感到工商界上层确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想法和作法。中下层鸣放起来意见很大，这自然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一方面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方面也要多听群众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才能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群众，否则一方面给党提意见，一方面不断地给群众扣帽子，并不等于自己完全没问题。我十分赞同巩天民副主委前天谈的"目前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工作、学习、思想都没有一般工商业者进步快"这句话。确实，因为中下层劳动是比上层多一点的，这就是进步快的根本原因。中下层都拥护上层，没有上层不成；上层是中下层选举出来的。但希望上层深入下层，否则反映情况不代表群众，被理论家们搞了去当资料，解决不了问题，那些新的理论、办法又不切合实际，矛盾反而增加。

另外，也要求研究工商界问题的理论家，和作工商界业务的同志们，深入中下层，因为自然科学家必须把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作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必然脱离实际。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冯和法说：工商联的宣教工作存在很大的缺点，其原因首先是党对宣教工作注意和领导不够，有些地区工商联和党委宣传部门挂不上钩，有些专业公司根本不重视工商业者的教育学习工作。其次是形势发展过快，我们自己主动的努力不足，常常以旧眼光来看新问题。再次是我们作宣教工作的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水平不高，没有及时提高自己。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缺点，就全盘否定几年来工商联宣教工作和工作上的成就，更不应该把教条主义的帽子到处乱扣。教条主义是必须反对的，因为它不结合实际。但是，什么是教条主义？这必须弄清楚，不能把不合自己意见的理论，或者别人对自己意见的批评，都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也不能以修正主义来批评教条主义，或者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真理。

这次工商业者揭露矛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不是对工商业者整风，这是谁都不会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致的，免不了会有争论，而且争论是有好处的，决不能对别人不同的意见扣上教条主义帽子，或者就认为是在打击工商业者的鸣放。例如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所载，北京工商界座谈中，吴金萃把别人批评他的意见认为是在对他加压力。阎少青认为千家驹的发言是给工商业者扣上五顶帽子，他所指的帽子是否真的是帽子还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姑且不谈，而阎少青给千家驹带上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三大帽子。这样的帽子乱飞，似乎也不是争鸣的应有态度。

现在工商业者中似乎没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不要改造了，但是，有一些人的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现在工商业者不要再改造了，认为说工商业者还要改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是教条主义。吴金萃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谈到向工人阶级学习和私方与公方的问题，就是认为工人阶级和公方并不比工商业者进步。这种说法是值得考虑的。前几天毕鸣岐同志在这里的发言，我和别的同志有同样的印象，仿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现在都是很进步的，现在还有不法行为的只是那些小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姑且不论小业主们是否会喊"冤枉"，我认为不加分析，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都是很进步，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毕同志在第三次发言中对于自己的说法作了补充，认为那天没有提到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是不全面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有的人认为，现在还说有两面性，是对客观事实不加分析，是教条主义。这是一种臆测之词。目前工商业者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要求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方面还存在定息等物质因素；一方面日益增长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愿望，一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思想感情。千家驹同志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重身分决定两面性，改造的方向就是两重身分变成为一种身分，即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两面性变成为一面，即建立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认为这话还可以加以补充。工商业者的两重身分是由于定息等物质条件尚还存在所致，然而即使定息等物质条件取消，摘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思想方面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是会存在阶级矛盾的。所以，我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于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于过去长时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思想感情如不经过较长时期的自我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工商业者思想感情的改造比物质关系的改变，还要艰巨些、长期些。

"赎买""定息"这些字句，是不应该从字面去理解的，赎买政策是区别于"剥夺"政策的一个用语，意思是国家采用和平改造方法来改变资本家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工商业者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和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所以国家在物质方面给予工商业者照顾，使工商业者逐步的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思想方面同样进行一系列的帮助，如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以企业为基地进行自我教育，以及适当的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以改变工商业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根本不存在"赎买到底"等各种把赎买政策理解为"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问题。

但是，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以李康年为代表，认为赎买就应该赎买到底，定息期间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还有一些发行赎买存单、赎买公债的主张。这种意见反映一种什么思想呢？我认为，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把国家对工商业者进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理解为一种买卖关系，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也就

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在国家的物质帮助下使工商业者更好地改造自己为工人阶级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定息的年限长短和赎买从那年算起等问题。千家驹同志一方面很正确地说，赎买如何计算是根本不必谈的，而且越谈越糊涂，而另方面他又认为赎买应从一九四九年算起，这也是一种矛盾。我认为定息七年是从宽计算，在这样长时期中，工商业者的大部分一定能够改造成为根据按劳取酬原则，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薄一波副总理说过，只要自愿，也可自动放弃定息，七年后还有困难的，可以拖一个尾巴。这是帮助工商业者改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工商业者的重视和帮助。如果忘记或者抛弃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前提，一切问题就很难讨论下去。

工商业者由这个阶级变到另个阶级，把这种质变用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脱胎换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些工商业者认为"这太可怕"，认为"我们交出了企业，还要对我们抽筋剥皮"。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实质上也就是认为不再需要进一步改造，使我不解的是，章乃器同志把"脱胎换骨"说成信仰主义、神秘主义，认为工商业者已经过了五关，现在还说要脱胎换骨，会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这不只是对这四个字的误解，实质上也反映了一些工商业者的感情。并不是所有工商业者都同意章乃器同志的说法的，乐松生同志就认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这是不会有争论的。但是，如果说，除了个别的资本家背叛自己的阶级，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外，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这样说法是客观的真理还是教条主义呢？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压迫而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吗？在解放初期，资产阶级难道没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因而使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国资本家能够敲锣打鼓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这肯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如果不是解放以来，国家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这种长时期的量变过程，那会有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的质变呢？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由于国家长时期的说服教育工作和逐步改变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的缘故，而是资本家自觉地热爱社会主义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吗？说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这是教条主义还是客观的现实，过去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物质关系改变，思想关系也在改变中，资本家一般由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而慢慢地对社会主义发生感情是可能的，但在目前除了个别的人外，说一般的人都已爱社会主义，那似乎为时过早了一些。今后，工商业者随着物质和思想两方面进一步改造完成，是可以爱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时候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已经脱胎换骨了。

此外，他还对向工人阶级学习，工商业者的职权问题等发表了意见。

六 月 一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十四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常委姚惠泉、新疆工商联主委买买提尼牙孜哈热、河南省工商联主委鲁定华、全国工商联常委（吉林省工商联常委）成盛三、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天津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秉钧（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是联合发言）、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上海石油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章志鸿。

姚惠泉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同时，对工作中若干缺点提出批评。

他认为工厂内迁的缺点也不少。有的在动员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大部落空，弄得私方人员和职工不安心工作。有的事前没有和职工很好协商，临时强迫命令，结果迁厂后供产销和职工生活都发生了问题。他说：在国家的许多成就面前，大家对共产党是信任的，但是若干工作中的缺点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影响党的威信，甚至使某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买买堤尼牙孜哈热说：新疆自治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取得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我们自治区的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党的和平改造的方针是欢迎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第一、公私共事关系，在我们自治区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某些公方代表只知道理论，不懂业务，看不起私方人员，不信任他们，以致某些私方人员怀疑将来是否会把自己排挤出去。在部分企业中，公方代表对工人和私方人员不同等看待，只照顾工人，压制私方人员的意见。安排私方人员的工作，也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例如长期在柜台售货的被分到理发店去了。家庭人口多的，工资不能维持生活的，也没有得到照顾。

第二、由于新疆是个民族地区，企业中的民族非常复杂，需要特别注意。但企业中有的汉族领导干部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歧视少数民族职工。阿不力孜木沙巴也夫说，公方的经理和私方的经理在名义上一样，而实际上，公方经理独揽大权，包办一切；民族经理的指示，科长和一般干部不一定接受。公方代表对于提高汉族工人的技术很注意，对于少数民族工人的培养就不重视。汉族职工家属可以安排工作，而有相当学识的少数民族家属却不给安排。牧场王场长（汉族）甚至叫牧工给他小孩倒屎倒尿，他的会计（汉族）打骂过牧工。他希望统战部派人深入下层，全面了解情况，正确解决存在的矛盾。

鲁定华说，私方应认清公私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合营后，资本家仍有消极的一面，有的人有一种自卑感，认为阶级不好，理论不高，工作缩手缩脚，我自己也受到过歧视，例如门警对工人出门不加检查，而经理出门却要检查，使我思想上背了包袱。有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相当严重，如洛阳有一个工商业者原来有六万多元股金，他听说两千元以下股金的户倘有生老病死，可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处理，于是他化了若干名字，把他的股金改成了两千元以下。这就是两面性的表现。

他认为有职有权是搞好公私关系的重要环节。他说，合营后，工作安排照顾是无微不至，但多数是有名无实，如"齐天大圣"一样。

另外，他还谈到迁厂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人到上海广州动员内迁时把愿许得很大，说什么建厂、原料、工资、福利、住宿、路费、人事安排、子弟上学等都不成问题，结果都不能实现。私方情绪不安，现在情况相当严重，建议政府处理。

他还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和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也不同意定息二十年。他还对县级干部不重视民主党派提出了批评。

成盛三说，吉林省的公私共事关系基本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多数公方对私方遇事迁就，政治上帮助少，少数有宗派主义情绪、独断独行。私方人员有严重的阶级自卑感，以为自己是被改造的阶级，处处小心，在工作中一不敢领导职工，二不敢负责，三不敢批评公方。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对职工加强统战政策和赎买政策的教育，对私方加强政治

理论和业务知识的教育以外，还需要在企业中建立一定的制度，做到集体领导、明确分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

他认为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里有着重要的作用，不能撤去。

童泉如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经济上看，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因为对企业的使用权已完全交给了国家，所有权也成了象征性的，根本不能自行处理，合营企业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因此，他主张在合营企业内只提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不要去强调阶级关系（当然还有阶级关系）。这样可以消除私方人员的顾虑，进一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建议有条件的合营企业可逐步改为国营或地方国营；在这些已改名的企业中，可以试行撤出公方代表。

最后，他建议党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注意培养党员和广大干部宽宏大量的政治风度。他说：不可设想，一个胸怀狭窄的人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不同意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的成立一个委员会以防止打击报复的建议，他认为那是消极的办法。

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联合发言认为千家驹、冯和法的发言没有解决群众所要知道的问题。

工商界听到毛主席以亲身体会说明需要继续改造时，很受感动，可是，他们对某些理论家关于两面性的说法还是有意见。首先，两面性这个名词看来很坏，好像两面性的人就是“好坏人”，好像消极的一面就是“五毒”行为；其次，某些工商业者不服气的是为什么工商业者犯个错误，就说是两面性，而知识界、工人犯了错误就不说两面性呢？第三，工商联、民建会的宣教工作，总是先摆理论，很少结合具体人具体事实事求是地分析。民建会的人讲话的时候总是以改造人自居，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因此，群众说：你们自己还没通，就拿“通”的姿态讲话，群众怎么能接受呢。

解放七、八年了，工商业者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要求周围的人对他们给以恰如其分的估计。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过二重性，没说两面性，二重性和两面性是否一样，如果用二重性也可以说明问题，可否把两面性这个名词改为二重性，以示阶段不同。免得一些人一听到提两面性，就想到“五毒”。

他们希望宣传教育不要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他们说很多报纸、刊物和会议，有些人习惯用老一套的方法分析资产阶级两面性如何如何，而对知识分子的“胸襟狭窄”，农民的“自私自利”，就不作为两面性。这就有意无意损伤了工商界的自尊心。

他们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的办法。

聂叙伦谈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扣帽子”的问题。他说，这次帮助党整风，必须本着毛主席所指导的，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揭露问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中，不可能要求大家的看法都完全一致，虽然是“和风细雨”，但究竟还是“有风有雨”，所以，带来一些批评也是很自然的。近来在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扣自己的帽子，认为这对鸣放有害，会使发言人增加顾虑。我以为这种指责是不必要的，如果帽子的尺码不合，一定戴不上，不是大就是小，勉强戴上了，别人看着也不像，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要是合尺码的话，戴上也是舒服的，比光着头伤风感昌要好得多。我建议今后座谈时，发言的人应尽可能避免对别人“扣帽子”，即使有些措词上的缺点，听的人也不应该把对自己的批评看成是“扣帽子”。这样，对鸣放和帮助党整风才有好处。

第二、关于两面性的问题。他不同意有人把积极性和消极性截然划分开。他说，任何一

个人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或者是只有消极的一面，只能是各人程度不同，有多有少而已。常常是对甲事积极了，对乙事消极；今天积极了，明天消极；在同一事物中的某一部分积极，另一部分消极。这是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因此在工商界中的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分子，不是绝对的先进和落后，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即如鸦片是毒品，但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医疗上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对任何事物都不要看得绝对化。

第三、关于工商业者的估价问题。冯和法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提到："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我认为资本家不仅可能爱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涌现了不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商业者，而且越来越多。我们对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不应该忽视，但对积极的一面也应该有正确的估计。

章志鸿同意冯和法关于阶级关系的意见：思想矛盾是主要的，经济矛盾是次要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民建会有一个姓倪的同志（工商业者），解放前，工人称他"赤佬"（上海骂人的话）；解放后，称他老板；合营后，称他倪经理；现在叫他老倪了。这反映阶级关系的变化。

他认为千家驹发言总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与自己的感情格格不入。他认为千家驹对于工商业者的有些看法还停留在"老板"阶段。他说：座谈会上反映的很多矛盾，不能说都是阶级关系，有的是党群关系，有的是由于官僚主义。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实际上是小户的自我讽刺，不能说大部分工商业者都如此。大部分资本家并到大企业后是爱护企业的。引证个别的例子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中央的一些理论专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前两年的阶段，看不到姓倪的那种变化。一味强调阶级关系，这就会把三大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掩护起来。

六　月　四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十五次座谈。会上，中国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蒂因和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分别汇报了她们最近到西北地区视察沿海工厂、商店内迁工作的问题和她们的意见。

汤蒂因说：她们这次到西北共视察了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内迁的工厂、商店都不少，内迁人员也很多。他们内迁后，对于壮大内地技术力量、解决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以及试制新产品、增加新品种，以及对当地人民和内迁人员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都起了很大作用。如西安市有个油漆厂的颜料车间，因某项技术问题不能解决而停工，从上海调去了一个技术人员后，不但恢复了颜料车间的生产，还创制了不少新品种，降低了成本。再如洛阳市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只有两万多种商品，沿海地区商店迁去以后，现在已经增加到五万多种。当地党、政对于内迁人员工作上的安排，生活上的照顾一般也是重视的。在工作上，做到职位不降低，有的还得到了提拔；有的私方人员还当选为市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在经营上当地也给予极大的照顾，把最好的地段让出来给内迁厂店，或者为内迁厂店单独造大楼，如洛阳的上海市场、广州市场；西安服务大楼等都是新建的。在生活方面，把大米尽量让给南方人吃，办南方灶，洗澡用水也尽量照顾南方人的卫生习惯。但是，内迁人员总的情绪是想家，不安心，要求回上海，个别的还有为此闹事的。

存在的问题不少：一、工资问题是最多最尖锐的问题，中央规定的工资地区类别同地区物价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二、在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的安家费各不一致，有的地区已经取消，有的地区没有取消，工人们对此也有意见。三、回家省亲问题也需要解决。四、家属就业问题：在动员内迁时合同中写明家属可以就业；今天受国务院人事冻结的限制，家属安排就发生了困难，有的安排下来做试验工，满期了也不能转正。五、对在乡家属的劳保待遇，没有按照劳保条例四十八条规定办理。六、家属宿舍远远不够，在分配上也有些不合理。七、医生、护士的数量少、质量差，事故多，有人反映"生命没有保障"。八、关于企业的性质也有问题，如悦宾楼有四十七个职工，早就合营了，现在却以小商小贩看待，要自负盈亏。九、有些行业不能保持原有经营特点，如一个绒线店现在寄卖西服。十、在人事安排上，西安的私方人员安排为主任副主任，大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正式任命。十一、不重视劳动保护，洛阳翻砂厂露天作业影响健康。十二、年老体弱慢性病的人在当地没有休养条件，要求调回上海，也没有解决。十三、内迁人员中缺乏生根落户的思想，他们希望制订合同，定期支援，期满以后，自由抉择。十四、企业亏本情况相当普遍，他们去得早、开支大，加上迁移费、装修费、停工损失，都要企业负担，因此，职工与私方的经营情绪都低落，其他生活不习惯，本地与外来的关系问题也很多。

接着，**胡子婴**发言，她分析内迁人员为什么会有不安情绪。她认为客观原因有九：一，生活不习惯，沿海生活条件和内地生活条件不同，例如南方人喜欢洗澡，而当地人就看不惯。其他如交通、清洁卫生以及饮食等也都没有沿海城市方便。二，自然条件不同，风沙多、气候冷、干燥，气压也较高。三，语言不同，当地人听广东、上海等地人说话很困难，也容易产生隔阂。四，宣传工作有严重的片面性。五，洛阳、西安、兰州原来基础太差，建设发展的太快，许多福利设施都没有跟上去。六，基建计划推迟，或者有些基建计划紧缩，和原来既定的迁厂迁店计划不衔接。这样迁去的商店和服务性行业就多出来了。七，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任务有矛盾，有些任务，中央直属厂担负了，地方厂吃不饱。八，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的工资待遇有差别。九，中央的工资地区分类不尽切合当地实际情况。这些都是造成内迁人员不安心的客观原因。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她认为也有很多主观原因。她说：首先是迁厂迁店的盲目性，没有很好地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像皇帝选妃子一样，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有严重的片面性，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干部不能和工人同甘共苦，吃饭住房子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作风生硬，民主风度不够，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事："你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政策界限不清，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人员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根本不支持，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第六，法纪不严，兰州大中华菜馆

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但一直得不到解决。第七，市场管理不严。随便哄抬物价，甚至一条街，同样的东西价钱却有几种。第八，社会治安工作搞的不好，在兰州、西安、洛阳都常常发生偷、抢、诈骗等现象。第九，思想教育差。在上述三个地区都存在着闹不团结的现象。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她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十，很多单位党、政、工会三位一体，什么事都由一个人作主，不能发挥组织作用，当地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妇联、民建等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她向中央提了有关工资等问题的几点建议。

最后，她希望大家能实事求是的提意见。她说，最近几天她感觉凡是讲理论都变成了教条，凡是批评都变成了帽子。最好不要夸张，这样对自己没好处。

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李康年关于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个极大胆、极虚心、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同意这个建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有些不同意见，他说，赎买到“底”的“底”字应该是指党和政府帮助我们改造到底的“底”；赎买时间应该从一九四九年算起；私方接受了赎买存单，并不是就摘下帽子，而应该继续加强学习，认真改造自己。

六　月　五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十六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中央委员、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上海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民建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还有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刘靖基、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建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文钊作了书面发言。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说：我以一个在大学里从事理论教育同时也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一部分宣教工作者的身份来谈谈有关教条主义的问题。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并不是说一切的理论都是教条，所有的理论家都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反对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与理论家。解放几年来，在我们国家的理论教学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工商界的学习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

这种教条主义倾向表现在一系列的教学环节上，即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式，以及审查教学成绩的方法上。这就大大地削弱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作用，减低了学习的效果。现在我把这三个环节都简单地来说一下。

一、在教学内容上：主要表现在教学课程不结合实际，甚至不符合实际。例如现在教的政治经济学，用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所说的都是外国情况，例子也是外国的，而对中国经济情况和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就根本没有谈到，因此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从外国搬来的教科书，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再如，我们现在谈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如只根据《资本论》中所说的情况来解释，就不符合实际，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是赶上了垄断时代，但从列宁死后到现在，资本主义又已有了很大变化，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就有许多变化，今天我们讲课如不结合现代情况来谈，而只是以《资本论》上的例子来解释，就是不符合实际，是教条主义的。讲哲学、联共党史也有同样的教条主义情况存在。所以我建议中宣部要对中国的理论教学内容加以革新。

二、在教学方式上：目前学校内讲课多数都是采取死背讲稿的方式，限制和妨碍了教师

的发挥。我认为理论教育的目的是应该如何帮助大家以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去看问题，而不是要大家去背书。现在无论在大学内或是工商界的业余学校内，教学方式都是背书。讲过来讲过去老是那几句话，听的人也感到乏味。同时许多讲稿都是经过教研室研究通过的，有的课，本人也感到内容不好，但仍不肯发挥；有些教研室片面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认为教员能将讲稿背得一字不差就是组织性强、纪律性强。我则认为应给教课的人有发挥的余地才好。大家对这种背书式叫"低头照本宣科"，要是有人多举例发挥就叫"抬头信口开河"。低头也错，抬头也错，许多人宁可做"照本宣科"的人，不愿作"信口开河"的人。因为课程经教研室研究过，至少不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可是信口开河就会闯大祸。

还有人对教学的严肃性理解不正确，认为一定要板起面孔说教或正襟危坐听讲才算是严肃性，否则就是没有严肃性。我认为严肃性是指原则性强、理论性强。我看，毛主席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讲话时，也是谈笑风生的，但不能说不严肃。

三、考核教学成绩，平时辅导等方法方面，由于在教学内容上是背书，在考试、辅导时也是背书。在小组讨论时虽然也强调要学生独立思考，结果也只是"笔记搬家"。现在考试是采用抽签口试办法，要考一百多个学生，教师们感到疲于奔命，有的还要先做好标准答案，回答时第一点与第二点顺序先后也不能错。

采取这样的考核教学方法，显然是不可能不有教条主义的。对这些理论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我希望中宣部能彻底地检查一下。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中宣部还没有邀请有关人士来检查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其次，党过去对民主党派宣教工作的帮助也很不够。例如党中央召开宣教会议时，就没有和各民主党派联系，邀请民主党派的宣教工作者去参加（至少中国民主建国会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也是一个缺点。

在宣教工作中，确实存在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应该反对，但是现在也有些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如章乃器同志最近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与文章就是这样。我分析了一下，认为章乃器同志文章中有六个问题都是涉及原则性的问题：

一、"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这篇文章——章乃器同志讲党员所以有"特权思想"，是以斯大林说了："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为思想基础的。这是一个曲解。因为斯大林说这句话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党员有"特殊"思想。我们对死的人也要公平。乃器同志所看到的在联共党史中引用的只是斯大林演说的一部分，是不完全的，据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二十五页，《追悼列宁》这篇演说中，斯大林是以非常沉痛的心情说道："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底军队，列宁同志底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员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底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下面的话，就是党史上所没有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底党员的。并不是任何人都经得住身为本党党员所必经的种种患难与风波的。工人阶级的子弟，在贫困与斗争中养成的子弟，受到千辛万苦和作过英勇努力的人，就是首先当应成为本党党员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主义者底党，共产主义者底党，同时也就称呼为工人阶级底党。""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底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一个遗嘱，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实现！……"试问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誓言中有没有叫党员脱离群众的意思呢？是没有的。说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只是表明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波，坚决奋斗，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

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反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二、他反对在企业中分“公方”与“私方”、党与非党的提法。他反对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认为社论里所说必须服从公方领导的提法是片面的，他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们虽然主张私方应当“有职、有权”，但这与服从“公方领导”是不冲突的。他认为目前阻碍私方发挥积极性的只是“三害”，我认为也是片面的。

三、他反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区别。章乃器同志总是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虽然承认两个阶级有本质的区别，承认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但他把工人阶级却看成只是不剥剥的阶级，反剥削的阶级，根本不提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阶级”，这样就使剥削阶级的剥削对象不知那里去了。他虽然说阶级间有本质区别，但又认为工人阶级分子与资产阶级分子间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说工人和资本家都一样。去年民建二中全会时章乃器同志一开头提出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引起大家的反对，经过讨论，他后来虽然也承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了，但又认为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当然，在宣传工作上应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不应把一切坏事情都说成是“两面性”。而且我们今天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也是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并不是坏的意思。所以并非承认了有两面性就要低人一等。我们也没有说“两面性”就是“五毒”。胡子昂同志是工商业者，但他在访问苏联时却能与赫鲁晓夫并坐，受到很大的光荣。这就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有了两面性，所以才有条件能与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一起。这个“两面性”是光荣的。至于工人阶级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两面性”的问题，因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是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是不会留恋资本主义的。一定要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具有两面性是错错的，在理论上是决说不通的。

四、“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章乃器同志认为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这也是不通的。因为有了不劳而获的人，就一定有“劳而不获”的人，这是相对的。至少有人是要多劳少获的。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剥削又是什么？章乃器同志说剥削一定要有痛苦，好像必须象奴隶制社会拿皮鞭打才算剥削。可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是很巧妙的、隐蔽的。譬如美国的资本家就收买很多的工人贵族，美国工人也的确有人有汽车，难道我们可以说美国没有剥削吗？当然目前也有定息只有十几元钱的人，与定息多的有区别。但不能因此就把定息的剥削实质掩盖起来。有的人说“抚恤金、养老金也是不劳而获”，我看是不同的。抚恤金、养老金是从工人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得来的，不是来自剥削。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死了，因为他过去剥削有功，所以才对他抚恤一番。

五、章乃器同志还将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对立起来看，认为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怕。这就无形中承认了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其实，官僚主义的来源是过去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所以才有条件反官僚主义，工人阶级本质上并没有官僚主义。章乃器同志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如英国、美国政府都有官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地彻底反对官僚主义。今天由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才把反对官僚主义提到了首要地位。这也就是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恶习。所以我们还不能把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来相提并论。

六、章乃器同志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章乃器同志一系列的

思想，实际上就是告诉工商界要放松自我改造，因为他反对"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就是反对本质的改造，只要形式上的改变。这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改造来说，就会让他们停留于形式上，不会认识到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是一种对工商界朋友们的故意恫吓。事实上没有人说还有什么"抽筋剥皮"的一关。

以上六条都涉及原则问题，是用反教条主义的旗职来反马列主义原则。反教条主义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能反错内容。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看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怎样帮助党整风。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帮助党整风，决不能按照我们自己阶级出身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求党倒退。

李康年重申赎买二十年的主张，他说：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二十年"或者"赎买二十年"的建议者。

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主张请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二十二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存单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二千七百五十万元，除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已发二亿二千万元外，对资本家只发十九亿八千万元，多余二亿二千万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项工作，拟请指令交通银行办理，有不愿得此项赎买存单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银行得代为暂时保存，或按赎买存单应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

赎买存单应得人既已放弃赎买存单，即是放弃剥削之表现，应得人于取得捐献收据，或缴纳国库之凭证后，即可将此收据或凭证，作为放弃剥削之凭证，而向工会争取入会，争取劳保待遇，经工会审查核准，给与工会会员证后，资产阶级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议不能采取，则请研究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按如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上述建议如再不能采用，则请研究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加代领定息业务，同时亦得代管股票，及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转赠捐献，或缴纳国库。按以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此外如资方家属的劳动就业，应责成劳动部门及专业公司妥为安排，在赎买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期限且较公债为长，大多数人已经必须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剥削基本消灭了，赎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与他商榷。

我的答复是：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六十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八十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至于我建议赎买存单年期分二十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二十二亿元，定息两字应该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十五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步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以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第五段第二节"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这说明赎买是专对生产资料的，至于对资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见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预有准备，即是需要十五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一九四九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尝不可的。如果十五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二十年吗？我的建议与党和政府原定计划步骤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吧？

一、千家驹同志说，赎买不要算细账，何以他还认为应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呢，算了有什么作用呢？

二、倘然要算细账，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并不是十四年而是十四年不足。

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即四马分肥办法）都是赎买，此说没有根据。

四、他说十四年中（实际上到目前只有八年）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这些话完全是凭主观的理想而毫无调查资料。就我所知，还有资本被虚盈实税因而亏本的（千家驹同志发言第一节中所说的），还有资本被阶级斗争因而损失的，还有资本被五反退款因而短少的，有的虚盈实亏，有的资负倒挂，有的资本蚀光，有的生活资料亦已卖光，也有因周转不灵而增资的，这些岂不是客观的存在吗。

五、他说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也在于使他们安心改造，我觉得他把和平改造方针的内容混淆起来了，因为和平改造方针有二个内容：一，对物（生产资料）——赎买（利用、限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机构。二，对人（资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为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两者之间虽互相关连，而各有区别，他说赎买是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似觉不可理解。

六、无论赎买也好，购买也好，这是不是一种合理措施呢，如果说是合理措施，则资本家既将生产资料交出而政府说并不是欠他之债非还不可，这成什么话呢。这是丢掉赎买意义了。

七、他说赎买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债则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65%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事实，而且对工商界说来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我说，我扣了这顶立资本主义的帽子实在有些冤枉，请问毛主席所谓不是半赎买半没收之说，作如何理解。

八、千家驹同志说赎买应自一九四九年算起，兹查毛主席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说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一九五五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九五五年夏季以来开始的，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

九、根据毛主席说开国以后的三年中，是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可见得决不是赎买时期。

十、开国之初，是增加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时期，所谓劳资，即是私营企业内部组织，当时还谈下到赎买政策。

十一、共同纲领订立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其第三条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还没有赎买字样。

十二、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如果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已在开始赎买之中，未免太矛盾了。

十三、一九四九年并未进行清产核资，财产数字无法估计，如照资本家账册记载，他们是随意编造，各自一套，绝无标准，殊不足凭。

十四、财产重估是一九五〇年进行的，当时估价是仅凭私方主观进行的，并无工人阶级参加，不足为凭，且币制还是旧人民币。

十五、主张赎买开始是一九四九年者，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

十六、五反是一九五二年举行的，当时退款数字之大，殊足惊人，这种退款数字，都是在资产项下减除的，这对国家定息之支出，是有好处的，如果强调赎买开始在一九五二年以前，是没有好处的。

十七、如果赎买确定为一九四九年开始，则八年以来所开新厂新店怎么办呢，其问题有工人阶级劳动所得而由政府鼓励他们创办的，又将怎么办呢？

十八、如果赎买确定为一九四九年开始，则目前正在讨论的工龄问题，何以强调应为一九五六年开始呢？

所以我主张无论老合营或全行业合营，一律以定息起付之日为赎买开始之时，财产数字一律以清产核资时所核定的数字为准，质之千家驹同志以为何如。

王光英首先对工作中接触到的问题提出意见，他感到全行业合营后，各专业系统对企业改造抓得多，对人的改造抓得不够。统战部和八办对公私关系、生活照顾考虑多，而对生产

考虑不够，对工商界原有的宝贵的经验也没有注意吸收。

他认为，发挥私方的作用是个很大问题。天津国药业八百从业人员中，有很多人具有极其丰富经验，他们能辨别药的好坏，了解市场情况，掌握货源，泡制技术也熟练，在增产节约中他们可以提出很多主意，但是，有些企业对私方提出的意见，有时不加可否，有时又很轻率的否定。俗话说："不用人，不知人"，不知道这个人，也就用不好这个人。他建议合营企业应该建立必要的制度，人员要有明确分工，要把人员安排在最妥善的地方。

接着他对这次座谈会上讨论的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分化中，不能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除了定息以外，就没有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以后，思想是起了变化的，但立场、观点、方法的改变还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能够随时不忘掉要有阶级本质的变化，就是说"脱胎换骨"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不赞成逃避现实，也不赞成在名词上兜圈子，企图否定阶级本质的改造。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恰当处理内部矛盾的办法和工商界的努力，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一面大大提高，消极一面不断缩小，这反映了阶级特性在变化。但有人就因此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有人强调内因，看不到外因，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在解放前反对三大敌人，同时也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解放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要求走社会主义积极性才逐渐增长起来，不能否认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教育才促成我们的变化，我们应该"饮水思源"，把好事都说到自己头上来是不公平的。

定息明明是剥削收入，有人硬说是不劳而获。这句话不管说得怎样好听，里边是夹了东西，就是卖官盐里头夹私盐。不能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工商界不愿意自欺欺人。有个青年工商业者说拿到定息或高薪手心都出汗，内心有很多斗争。何必逃避这些对自己有好处的斗争呢？有人说定息不算剥削，这个提法，代表不了我们工商界。

他说对工商界估计要实事求是，高估了，对我们接受改造不利。容易助长工商界自满情绪，容易翘起尾巴来要和公方平起平坐，这不但不能改变职工对我们的观感，还可能印象更坏，对工作，对生产都不利。估计低了，会丧失改造信心。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没法和社会主义比，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效率高毋宁说是剥削艺术高。全行业合营的时候，有个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怎么到现在还有歌颂资本主义的呢？我们要辨明是非，农民说土改好得很，地主说糟得很；刘自然的死，美国拍手称快，人民咬牙切齿。我们看得很清楚，有鲜明的是非界线。假扮一种超组织的姿态实际上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原封不动地兜揽市场，我们是能辨善恶的，我们要求进步，要求尽早的变成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欢迎的，但是，要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于笑里藏刀的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上当。现在天津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是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下想出来的。在中国，'对不上号'，不如用孙中山先生的大贫小贫的办法来说比较合适。"这分明是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一定要反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刘靖基对公私共事关系和公方代表制问题发表书面意见，他认为合营企业中当前主要矛盾是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不够信任、对他们存有阶级成见，存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因此，在工作中就有"真主意、假商量"（事已决定，形式上商量一下），"真主意、不商量"（人事调动一般是不商量的），"真主意，硬商量"（事已照做，不同意也不行）等情况。他建议在整风中对这些现象加以检查，并且对于公私关系的经验，加以总结。

他根本不同意撤销公方代表。他说，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领导企业改造和私方人员改造，有很大的作用和成绩，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最后完成以前，公方代表制度应当继续存在，否则，就会引起各方面的不良影响。他主张在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内，如：私方人员经过了培养和锻炼，有党委组织的领导，同时又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因为公方代表需要调到别一个岗位上去，而国家一时又派不出公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具备条件的私方人员担当起国家分配给他们的任务，直接对国家负责，这样，将更有利于摆脱依赖思想，发挥主动负责的精神，为祖国建设服务。

邓文钊书面发言，认为在当前合营企业里，共事关系是主要的，阶级关系是次要的，应该强调共事关系，正经理就是正经理，副经理就是副经理；正厂长就是正厂长，副长厂就是副厂长，不应当冠上"公方""私方"名义，筑起墙来。他认为只有搞好共事关系，给资本家以安心工作和贡献才能的环境，才能共同搞好企业，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在安心生产实践中改造自己，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逐步消灭阶级矛盾。

六 月 六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十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建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中国民建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畬、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上海申新一厂工程师金德霖、上海恒丰棉纺织厂副厂长聂光琦（金德霖和聂光琦二人联合发言）、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韩望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胡子昂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统战部和国务院四、五、八办跟民建会、工商联应该很好地配合，帮助和支持工商联、民建会大胆做好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及时地揭发矛盾，以求进一步合理地解决矛盾。但是，统战部的这项工作是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了。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我总觉得随着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深入，统战部与民建会、工商联的关系不是愈走愈近，而是逐渐疏远。是不是统战部怕别人批评包办代替而把工作量压缩了，这样是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的。

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员。在党和政府来讲，确实是"求贤若渴"，一再肯定工商业者是国家的财富。并在全业合营后，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这中间还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我仅就工商界中的技术人员问题，提出一些意见。据我所知，单单上海一个地方，工商界里就有七、八千个高等技术人员。但是，在某些公方代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层层压迫下，他们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根据最近民主建国会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所反映的资料，工商界的技术人员所以不能发挥财富作用的原因，主要的是：

一、有职无权。有的公方代表认为，安排私方人员担任厂长、经理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何必得陇望蜀，有职又要有权呢？

二、用非所学。有些合营厂里的党支部代替了行政，人事部门更是大权在握，他要调你向东，你当然不能向西。

三、缺乏信任。一般反映，技术人员无论你有天大本领，只要头上顶了一个“私”字，那就永远抬不起来，在厂内固然看不到书刊，进不了试验室，看不到文件，连设计图都见不了面，有时拿了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去参观别的工厂，对方因为来的是私方人员，竟要求补送人事资料，使他裹足不前，啼笑皆非。

四、支持不够。私方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公方和职工的支持，制新产品，不给原材料，稍微多用点钱，就说破坏财务制度；有时甚至给合理化建议扣上一个“偷工减料”的帽子，更使人噤若寒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五、鼓励不够。对于私方人员的创造发明，应该论功行赏，否则，不能鼓励积极性的发挥。广州有一位私方技术人员发明万能缝纫机，只得到一件卫生衫，因此，私方反映：“大小事迹，都是一只鸡蛋”。

六、压制民主。部分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盛气凌人，私方稍有意见，就被扣上“抗拒领导，抗拒改造”的帽子。于是私方有意见也不敢说，或者是说的不是想的。难怪有些私方人员觉得在企业里是“孤掌难鸣”了。

为了调动工商界的财富发挥积极因素，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适当的解决。

两面性的存在，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的好恶，而决定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全业合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或者说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但是，这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两面性已经没有了。如果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工商界的改造没有好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末随着历史条件的演进，它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关于这点，刘少奇委员长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一面一天一天的扩大，逐渐具备了社会主义成分，而消极的一面则在一天一天的缩小，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思想意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这同过去时期所说的消极一面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这样来看两面性，我觉得同今天工商界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必再提消极的一面了。

本来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只有一面性，这就是剥削工人、唯利是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消极的一面性。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除了它的本质与外国的资本家有共通性外，还有它的积极的、独特的一面——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积极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还是中国的特产，在我看来，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当然，我们还必须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最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就是说，要以工人阶级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改造自己。近来，有人看见个别工人同志有缺点，就漠视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认为工人阶级不值得学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既然以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分子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同时，我们所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指学习工人阶级最本质的东西，如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热爱劳动等等。工人阶级中个别分子有缺点，这是很能理解的，但我们绝不能以个别工人来看整个工人阶级。因此，向工人阶级学习，不应有所疑惑，否则，就会迷失我们改造的方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变成一个工人阶级分子，这中间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过程，才能够起到质的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改造说成是脱胎换骨，就是这个道

理。

有人反映，某些公方人员简直把两面性当作歧视工商界的口头禅，动辄就在私方人员的头上扣一顶两面性的帽子，这是不对的。

近来工商界人士有股怨气，一听到“资产阶级”“两面性”和“改造”这些字眼，就感头痛，思想上有抵触。我觉得，今天一般工商业者并不否认两面性的存在，问题是要讲清道理，要分析事物，要明辨是非，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也不能含糊。可是生硬的批评与机械的搬用，是不能说服人的。记得在一九五四年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有位同志首先提倡有技术的资本家归队，我坚决反对。我的看法是这顶帽子不妨多戴几天，戴到瓜熟蒂落再摘下来。照我乐观的看法，只要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工商界也为了全中国的人民，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这顶帽子说不定很快就会掉下来，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阶级既然还没有消灭，阶级关系就自然是客观的存在，并不是哪一个人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反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呢？这话要分两头讲。很多人反映：部分公方代表过于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的一言一动，甚至一个合理化建议都描写成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属于资产阶级类型，使他们感到抬不起头来，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另一方面，私方人员也把阶级关系当作牢笼枷锁，好像这一辈子也挣脱不了这付手镣脚铐，不晓得那一天阶级才能消灭，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我们要有明确的看法，千万不要悲观，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已经在党和毛主席的和平改造政策之下得到挽救，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过渡。我们当中的若干人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成绩。尽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还不平衡，还有困难，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工作生活是一天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们不讳言，私方是有一些苦闷的，这些苦闷可以说一部分是公方代表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在私方人员头上的（如对私方人员的轻视、鄙视，或者有职无权），这需要对公方和职工进行教育，要逐步做到公私双方同呼吸，共命运，一块儿工作，一块儿生活。这是一件巨大的统战工作，需要党善于帮助教育，改变过去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让广大的工商界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活跃起来，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衷诚地向公方同志们建议：（向私方讲的话这里从略）我们必须从思想情感上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要把过去听不欢迎的改变为欢迎的。当然这不是欢迎资产阶级，而是欢迎正在消灭资产阶级和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所称呼我们的“中国式的资本家”。我们要在认识他们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重视他们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他们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发展。帮助他们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希望他们对资产阶级不要有所留恋，这样公私合作共事关系是可以搞得好的。

最近有人提到公私合营企业考虑撤回公方代表的问题，我的看法：公私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必须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个别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如果领导无能，阻碍了生产、业务的发展，私方完全有理由反映意见要求撤退。但是我们因为有的合营企业公方领导不好，就主张全部撤除公方代表，那是不正确的。

另外再谈几个问题：

（一）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界骨干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企业工作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工商联、民建会两面都来叫，几面开会，忙得不能分身。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

方，都很普遍。希望这次在统战部召开的小组会上很好讨论，合理安排。

（二）各地工商联大都是接收旧时的商会和工业会改组而成的，情况比较复杂。几年以来，由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到工商联参加秘书长一级的工作，对于推动工商联的工作，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有些地方是有缺点。现在，要不要撤退这部分党员干部，我看应该从工作出发，我是不同意一律撤退的。如果必须撤退，也要作好安排，还要加强联系，以免脱节。关于这点我有一个建议，无论任何党派团体对于党团员参加工作，应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看待，不要让他特殊。这就是说，放在组织之中，不是放在组织之上，地位只管有高低，职权要按照规定制度办事。这就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因此在党派也好、团体也好，可以大批进去帮助搞好工作，也可以随时撤调工作。只要通过组织，协商办事，根本谈不上派与撤的问题。

（三）关于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干部培养、教育、福利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两会注意不够，统战部也注意得不够。有的地方统战部已经向民主党派的干部上党课，并允许他们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对于干部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我看中央统战部可以在这方面通盘筹划一下。

（四）关于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以及通过这项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问题，这个问题跟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关系太大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不够。现在第一步应该赶快放手，帮助各地民建会和工商联推动它们的成员大“鸣”大“放”。

举例来说，最近有人主张把定息延期到二十年，这显然是与国家定息七年的决定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定息是赎买政策的具体措施，目的在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定息不是买卖，二十年的说法，并不是代表了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五日原建议人李康年同志在座谈会上有所说明。我看全国工商界放弃剥削的声音，越来越见高涨，这个建议，是不会得到支持的。我是不同意的。

中央的工商界座谈会，由李部长同很多负责同志亲自主持，会开得很好。希望中央统战部把这个精神和办法层层传达下去，各级统战部都应该这样做，这样才能使工商界的朋友有大“放”大“鸣”的勇气。要一个工商业者当着公方代表的面大鸣大放，而不“怕”是不简单的，是需要做一番深入仔细的工作，加以推动和鼓励的。谈到这里，我殷切希望中央要加强检查督促工作，有许多事情，中央有关部门作了通盘研究，及时采取了适当措施，这是很好的，但是传达下去后的执行情况，往往缺乏认真检查，好像政令出了都门，就百事大吉了。就以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来说，国务院在今四年月十七日就发下通知，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实行。这只是一例。有人曾说，来中央谈得头头是道，回地方就泄了气。这说明过去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工作做得不够。这个情况应该改变，要责成各地将执行情况随时上报，各级组织也要随时检查。

陈经畬首先谈公私关系问题。他说在会内会外反映公私关系不正常的人很多，但是若认为现在是非常严重，或者是认为比合营初期更有问题，那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公私关系在进一步转好的过程中，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从武汉市来说，老合营比新合营好，大企业比小企业好，以前劳资关系正常的又比不正常的好。在全省来说，市里比县里好，县里又比集镇里好。公私关系的好坏，与统战政策贯彻的深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也与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密切地联系着。我认为搞得好的归结到一个字即“诚”字，相处以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的是两个字“歧视”。彼此歧视，只看见彼此的缺点，彼此的

优点、应该得值学习的地方，则一笔抹杀。这样，就是兄弟也要互阋于墙，何况是两个在历史上对立的阶级。

在湖北省座谈会上有人说：公私关系是婆媳关系，不是母女关系。我认为，已过了门几年的媳妇，还是不给予应有信任，使他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责备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消极，没有主人翁思想。这是有些工商业者思想上不易想得通的。

全行业合营了，工商业者都想诚诚恳恳，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因为私方人员把企业交出来以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在公方领导下把企业搞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工商业者的主要心情，希望公方代表和社会一般人士能够理解。工商界中，消极躺倒或违法乱纪的分子是有的。但毕竟是少数，以这些个别事例代替一般加以渲染，只有引起思想混乱，没有说服力的。

他说，有许多中小户的生活存在困难。政府过去确有很多照顾，但有许多办法在下面没有很好贯彻。另外，有些问题在中央过去所制定的办法中没有包括进去。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中央考虑解决。

他说：湖北省所属市、县有的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深居简出，不深入下层。有的事情，民建和市县的工商联及工商界向当地统战部反映很多，得到解决和答复的太少；得到了答复或是提出了处理办法的，到了下面也很难执行。现在还有应当安排尚未安排的人，和安排得不适当的人，还没有得到解决。湖北省有七十一个县，有统战部的约有三十几个县，希望把统战面扩大些，多设些县统战部。

他说，所谓赎买问题，首先要明确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原来即是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与工人，只是物归原主，根本就说不到代价问题。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为工人阶级所有，也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买卖行为，乃是一个革命。在我国，工人从资本家手里取回生产资料，不是用剥夺，而是用和平改造的方法。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说他们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赎买。如果以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关系来看赎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至于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

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的性质。

他谈到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问题的时候说，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派公方代表的制度，这是好的，就生产来说是有利的，而且是应该的。至于有的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或是能力薄弱，作风不好，甚至造成企业的损失，国家可以随时撤换（武汉已有先例）。因此我认为公方代表作风不好和对私方不信任，只是公方代表的个人问题，不能因个人问题而对国家的制度加以变更，这是不恰当的。

最后他说，现在有若干人提出来要不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这些同志是把部分工人中的不健康作风或者个别落后工人中的行为，认为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向工人阶级学习，是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劳动热情、组织性、纪律性、大

公无私的精神。并不是要我们去向部分工人的不健康作风，个别落后工人的不良行为学习。部分工人或个别工人的不良行为不能说成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们的国家空前的强盛，建设事业突飞猛进。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得来的吗？我们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我已经七十八岁了，经历了满清皇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的统治，深切体会到今天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学习是完完全全正确的。而且在思想上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要更加坚定的树立起来。这样，我们工商业者才能够改造的更好，早日将自己也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

苗海南在发言中谈到了工商联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商联、民建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是代表了工商业者最大的合法利益。工商联组织今后还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另一个最大的合法利益，就是把合营企业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把工商业者改造成工人阶级。但是，他也认为，在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对于工商业者的某些具体利益是代表不够的，今后必须加以改变。

接着，他谈到工商联如何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代表合法利益最困难的是是非问题。哪些合法，哪些非法，弄不清。资产阶级有自卑感，工人阶级有自尊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阶级的感情掩盖了是非问题。

他说：说资本家不留恋过去，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个人就有过留恋过去的思想，例如，我认为共产党好，企业合营的时候，也是我自己愿意的，但是一碰到一些小刺激，就会想到过去的事情。有一个时候我很苦恼，一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自己究竟算什么，就觉得前途没有路了。我曾经攒了三十片安眠药，准备将来没有路的时候吃上就完了。为此，我患了好几年的糖尿病，中西医都没有治好，是毛主席掌握自己命运那一句话给治好了。解放以来，我有三大兴奋，第一兴奋是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的讲话；第二个兴奋是合营高潮；第三个兴奋是今天党的整风，让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最后，他对座谈会反映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的可以个别撤换，不能否定这个制度。为了搞好公私关系，他建议在企业中创造条件成立管理委员会，公私双方在管委会领导下按职务办事，在工作中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不强调公私关系。

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说法。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果真定息二十年，势必造成大中小工商业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和睦。

关于两面性问题，他说，现在很少人不承认两面性，如果有人不承认消极一面，实质上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究竟占到百分之几，在宣传工作上要特别注意。他说，有人谈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人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成，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

聂光琦说：上海市工商联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单位，同业公会以企业为单位，而资本家是以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同业公会，因此两个机构为大资本家所独占。即使有少数资方代理人，

但有的人为了要靠拢资本家，往往不能真正代表资方代理人的意见。如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在大会上说："资方代理金酬劳问题，中央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是行不通的，要求政府不要开空头支票"。这种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既未与大家商量，怎能知道行不通呢？事实证明，在棉纺织业的鸣与放的动员大会上，荣丰棉纺厂（也就是韩志明有关的企业）的大股东荣章初就大声疾呼地说："我从来就未曾听见过政府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的话，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向大会保证，我愿意付给代理人酬劳金，因为我认为酬劳金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工商联负责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只字未提。是不是想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他认为付给代理人酬劳金是一个传统的制度。棉纺业资方过去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委托给代理人，解放初期当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和"五反"运动的时候，都是资方代理人替他们挡头阵的，现在资方代理人却因为他们的企业既已合营，代理人就不起作用了，因而置之不理，这样抹煞代理人的功绩是不公平的。他认为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劳金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和定息结合起来，绝不愿意让这笔钱由国家负担。

他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某些制度和管理方法成了形式主义。上海棉纺织公司有三位经理，六位副经理，他们不下厂，有事用电话联系。变成了"电话经理"。办公室主任也不下厂，技术人员就是下厂也不到车间，他们只要"经验"要数目字。棉纺公司也是专靠开专业会议来领导生产。指标像气球一样提得越高越好。纺管局盲目将织布用纱改细，结果不耐用，大家很有意见。开展增产节约，好多数字都是重复、虚报的，对具体工作的领导也是踢皮球，公文旅行，人事机构臃肿。这样下去，会使企业受损失。

韩望尘首先对"赎买二十年"和合营企业要不要公方代表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赎买政策"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包括愿意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长远利益。赎买政策的具体表现为定息，它是国家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过渡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桥梁。因此，绝不能把它当作资本家与国家"进行交易"的"条件"。工商业者如果对待这个问题抱着"讨价还价"的态度，是不恰当的。

至于定息七年只能赎买35%，只有定为二十年，才算"赎买到底"的说法，我也不同意。应该怎样理解"赎买到底"呢？我认为企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而国家把资方人员全部包下来，安排工作，甚至保留高薪；二千元以下的小业主，还按照劳保条例享受福利待遇和病假工资等，都应当当作"赎买政策"的扩大或延伸。定息和安排照顾的形式与内容虽不一样，但作用与目的都是为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创造条件。直到私方人员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以为就是"赎买到底"了。

倘若说，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把"定息"改成"赎买存单"就算把资产阶级的改造基本完成了。我看这是"揠苗助长"，结果会"欲速不达"。既要延长领取定息的时间，又要提早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确是难以自解的。而且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广大工商业者的前进愿望；不是积极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不是鼓励前进，而是拉后腿；不是争取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而是加深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这对我们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陕西的工商业者，不论大、中、小户，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说：把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发挥私方人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十分必要，私方的潜力还挖掘得不够。但是不是说只有不要公方代表，私方人员才能发挥积极性呢？应该

好好考虑一下。

诚然，在合营企业里，有的公方代表，只注意生产任务，营业指标（当然这是对的），对私方人员的改造不够重视；有的公方代表不熟悉业务，对生产经营是外行；有的民主作风不够，对私方的意见不重视，建议不采纳，甚至有时把人民内部的矛盾错误地当成敌我矛盾去处理，造成很不好的后果。这些缺点，都是不容讳言的，但是，公私共事关系很好的，或者由不好变好的也为数不少。公方对私方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帮助，使私方大受感动的，也不是个别的。可见，说一切都好，则不近实际。同样，说一切都不好，也不是事实。

有人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搞不好生产。我看不能机械的对待问题。比方说，不懂技术，可以学，学就会成内行。再说"政治资本"在企业里并不是没有用处，相反地它是大有用处的，因为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缺少了政治教育是不可想象的。公方代表本身有缺点，这是人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这个制度。

有人说，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人员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我认为"比一比"，"试试看"的提法，可能会被有些私方人员误解为可以不要政治领导，而搞资本主义竞争的那一套。

根据以上情况，他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注意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质量——政治修养、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因为公方代表肩负着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双重任务，必须慎重选择。合营企业里的党组织的书记，最好不要兼任厂长或经理。否则会失去或削弱党的监督作用，而且会使私方人员感到"党政大权，一人独揽"，群众有意见没地方去讲。另外，管人事工作的人，特别是人事工作的负责人，一定要政治性强和懂得人情，有社会经验的人。

接着他又谈到目前一般中小工商业户生产经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专业公司、供销合作社对归口的工商业户，在货源分配上照顾不够，常常把畅销货留给自己的零售门市部销售；对一些冷背残次货，则又硬性搭配给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小商贩，造成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一般中小户对这个分配方式很有意见。还有，他们想到外地采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缺乏的货物时，不但得不到支持，有时还遭到多方留难或打击。他说：一般中小户，资金较少，他们的经营一方面要采取"勤进快销"的办法，一方面还要依靠向银行贷款周转。但是银行贷款手续繁琐，甚至对归口公司核定的贷款金额任意核减，特别对某些较困难的业户，怕收回困难，不敢贷给。这对他们经营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全行业合营后，对合营商店上交利润的提取，从每季提取一次，改为每月提取一次，也给流动资金较少的企业造成了经营周转上的困难。

钱孙卿说：江苏省的"鸣放"情况基本上是先天不足，群众还有顾虑。据工商界反映：有不少的人对许家屯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强调消极性的说法，挫伤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他认为两面性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否则，光谈理论是不解决问题的。

他说，现在大的资本家都得到了工作安排和照顾，今后的问题是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中等户的要求是：合理安排、才职相称。小户的要求是生活问题。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一定要建立在生活安定的基础上。目前，各级工商联最急要的工作是要跟专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挂上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有关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就很难解

决。

六 月 七 日

今天，座谈会举行第十八次座谈。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人作了长篇的发言，驳斥了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孙晓村在发言中，分析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并对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工商界中的左、中、右三派是客观的存在，这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千家驹驳斥了某些人否定资产阶级两面性、混淆阶级本质的企图。他指出：在争鸣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也不让我们加以反驳。孙起孟认为党和政府对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在方针政策上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仍然存在。那些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实质上是否认他们的两面性。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厂副经理林炳炜，他根据解放前后的惯例和解放后政府的先行有关法令，提出资方代理人应该参加目前定息的分配，希望解决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和摘掉帽子的问题，并在民建会、工商联等组织中有一定的代表席位。

湖南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彭六安认为酬劳金问题是资方与资方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应该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解决，不应由政府负担。

全国工商联常委刘国钧，以亲身经历说明政府赎买政策的英明伟大，他深深体会到思想改造的艰难，他说资产阶级光改头换面不行，必须"洗心涤肺、脱胎换骨"，他又说：我在改造中碰到痛苦的时候，就反躬自问：刘国钧呀，你为什么不洗心涤肺、脱胎换骨？另外，他在会上还谈了国内外贸易问题。

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民建会常委周士观，他首先建议"工商界"月刊最近准备发表的章乃器一篇文章，不要加上民建副主任的头衔。接着他认为工商界上层人士要注意脱离群众和骄傲自满的倾向。

今天的会议上毕鸣岐还作了书面发言。

孙晓村说：我是民建的一个成员，民建成员中有80%的工商业者，有20%的非工商业者，我是属于20%中间的。近来，工商业者的同志们每听到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同志发言或报告时，总批评我们以改造者自居。对于这种批评我们衷心地欢迎，把它看作改进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但是，我也要说明，我们并没有以改造者自居，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工商业者同志们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进步得很快，这种实践是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应该向这许多进步的工商业者同志们学习；我们也在这样做。至于对于工商业改造的一些看法，我们既是同志就不能不讲，这是另一回事。

我对于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以及工商界中骨干分子作用的看法。

我想就我最近所接触到的情况，谈一谈当前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

我认为当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着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的发挥，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讲来，是十分不利的。

原因在那里？说起来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自从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起着深刻的变化，而为数不少的公私双方人员的思想、认识显然落后于这种客观形势，他们用旧眼光来对待新事物，结果是那些合营企业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了什么变化呢？那就是：这个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它的分子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高潮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把高潮以后的各种变化具体地分析一下：

那些变化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呢？第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交出了三权，离开了生产资料，作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正在开始消灭。第二，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已不再存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很小。第三，这个阶级正在剧烈地分化，不少人愿意放弃定息，希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个劳动者。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说阶级还存在呢？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象过去那样的一个阶级不再存在了，但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表现在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上，并且以定息的形式获得一部分社会生产物，这样一部分人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农民，也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只能是作为正在消灭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而存在，所以，阶级还是存在。这句话不仅指思想意识，还包括这种正在消灭中的物质基础。正在消灭而同时又还存在，这就是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

那些变化说明工商业者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呢？第一，他们被安排在合营企业、合作社企业以至国营企业中担任职务，他们成为这些企业中的公职人员，同时又是私方人员，他们与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合作共事关系，同时又是阶级关系。第二，在这些企业里，他们为社会主义做了工作，而且大多数人想贡献才能，把工作做好，例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他们也看清楚自己今后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把企业工作做好。上海食品业周凌同志说得好："工商界要做好事的还是绝对多数"。第三，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积极学习政治理论，有些人迫切要求学习业务，目的是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并且学会本领。第四，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定息是他们的主要收入，但多数人的生活费用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工资收入。第五，由于阶级还存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性的两面性也还存在。说到两面性，有几种误解必须讲清楚：一、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一顶帽子，不应当拿"两面派"、"两面三刀"这些话来理解两面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光荣地走上和平改造的道路，就是因为有两面性。所以，提两面性不应当发生伤害自尊心的问题。二、说两面性还存在，也就是说两面性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高潮以后，两面性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首先，积极的一面愈来愈扩大，愈来愈成为主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愈来愈缩小；其次，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思想、意识，但既有思想意识，自然会通过作风行为表现出来，这些思想意识的特点就是强烈地反映出阶级矛盾的性质。三、说高潮以后两面性还存在，从民建去年二中全会起到现在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说其中消极的一面在政治上是不革命与反革命，在经济上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还有两面性的人在论战中为了争取群众故意说对方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这种变化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对于这种变化没有足够的认识，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我认为不少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和职工对于这种变化是认识不足的，他们以高潮以前、总路线以前甚至五反以前的资本家来看高潮以后的工商业者。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中央常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于这种变化也是认识不

足的，因而在工作上也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这种认识落后于形势，集中地表现在对合营企业中的双重关系的看法上。有些公方人员在双重关系上过分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合营企业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不认识国家把公私双方人员放在一个企业里，目的不是为了开展阶级斗争，而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一切力量来搞好企业，所以合作共事关系是主要的，只有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尊重私方人员的职权，私方人员才会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发挥财富的作用。关于阶级关系，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任何人所能否定得了的。但今天的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任何人在企业中工作不能不服从于企业的任务。因此，应该认识，指出这种阶级关系，对公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有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私方人员的政策的责任；对私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应当靠拢公方，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警惕自己还存在的消极的一面，努力进一步自我改造，使自己的思想、作风与所处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环境日趋一致。双重关系在合营企业中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在一定时期之后，阶级关系必然会消灭，那时候，双重关系就变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合作共事关系。即使在今天，如果处理的好，阶级关系虽未消灭，但也会显著地下降。当然，这是需要公私双方共同努力的。

有些公方人员对这种变化，认识不足，在对待私方人员时，以为让他们有职有权，就无异让资产阶级多得了一些东西，工人阶级失掉了一些东西，于是对他们冷淡，把他们放在一边，其结果，私方人员感到受歧视，感到有职无权，感到虽有才能而无处贡献，虽有积极性而无从发挥。这些公方人员自以为这样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了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事，因为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工作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而私方人员如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一定能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我建议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人员，应当好好地总结一下一年多来公私合作共事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就我们所知道的，凡是搞得好的企业，既有利于建设，又有利于改造；而搞得不好的，则给党带来了政治上的损失：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影响；二是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受挫折；三是使私方人员怀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这种政治上的损失是很大的。

不错，公私关系的不正常，除了有些是由于企业中的制度存在着问题外，从公方人员讲来，有时还由于公方人员经验不足（这一点相当普遍），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这一事实认识不足。我认为党和政府、工会应当大力帮助公方人员和职工群众提高这方面的认识，使他们理解如对工商业者的进步没有足够的认识，那就无异否认了党的教育的伟大成绩。南京有一位民建会员说："只有阶级教育，没有阶级正在转变的教育"。这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的。

也有许多公方代表在这方面工作得很好的，我在最近视察时就看到好几个例子，这里不谈。

以上说的是公方。对于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以及它的分子的变化，私方人员的认识是不是也有不足呢？肯定的说，也是认识不足。这种认识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企业不再像私营时期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在企业里不敢当家作主，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抱定"干门前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宗旨。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与公方代表的态度、作风，以至企业中有些制度有关，与民建会的教育，帮助不够，代表合

法利益不够有关，但从私方人员讲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自己已经离开进行剥削的物质基础，国家已经把自己当做公职人员，要求发挥财富作用，自己只要积极工作，努力改造，就无愧于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者。

另一方面：认为企业既然交出，自己的改造已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两面性了，如说有，也只是先进与落后，那是工人阶级也有的，所以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了，不应该再提阶级关系了。最近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一听到"进一步自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值得研究的，其中有由于自己的进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宣教工作的缺点所引起的成分，但主要是骄傲自满的表现。有的工商界同志忘记了高潮的到来除了党的教育与工商业者的爱国思想和政治觉悟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的环境以及党和政府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所起的作用，没有这些，仅仅依靠教育的力量与爱国思想还是不可能有高潮的；忘记了资产阶级还存在，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自我改造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所以这显然也是严重的思想认识问题。

公方人员之所以思想认识落后于形势，是和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分不开的。私方人员之所以对自己的阶级和分子的变化认识不足或认识不当，是受到阶级性的局限，这种自卑与自大实质上就是两面性中消极一面的表现，不承认还有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自我改造，怕听人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说得现在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于自己原来的阶级的留恋，以及两面性还存在的反映。

如果上面的分析还与事实相符的话，那末为了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除了公方人员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外，私方人员也必须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克服目前正在滋长的放松自我改造的情况。工商界的同志要认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一场反复的、痛苦的自我斗争，因此，必须善于区别哪些论点是思想改造的花园中的香花，哪些论点虽然很迎合自己的情感，却是危险的毒草。民建过去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今后应该代表的必须积极代表，不要只限于反映一番，而对于思想教育工作，则必须认真地检查过去的缺点，用与工商界同命运共呼吸的精神，帮助工商界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迅速前进。至于改进公私关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大家谈得很多，我不想再谈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以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为自己的工作方针的，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但当前的情况怎样呢？骨干分子相当苦闷，对自己的作用认识不足，群众对骨干分子有意见，有的人把骨干分子与宗派活动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因此，我想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讲几句话。

为什么非要培养骨干分子不可呢？骨干分子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在一个社会里，一个阶级里，一个集团里，甚至在一个有共同信仰的政党里，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以及对待客观真理的态度不是每个成员都一样的。古人说："闻道有先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不一样，就自然会分出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类人。这是客观规律，工商界也不例外。这样讲，丝毫没有轻视中间落后层的意思，要知道，左、中、右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中明天可以变成左，今天的右，明天可以变成中，所以，骨干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左、向中转变。骨干分子如果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不能起这样的作用，那正如李维汉部长所说的（大意如此）这样的骨干分子是无血无肉的。

只是一堆枯骨而已，那也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了。骨干分子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先进的，所以他们还要善于向人学习，要认真地克服自己落后的一面，如果不谦虚，不努力，今天是骨干分子，明天可能变成中间以至落后分子。总之，骨干分子不是什么荣誉的称号，作为骨干分子，只有多作工作的义务，而没有自高自大的权利。

从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段历史来看，骨干分子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远在“三反”“五反”以前，工商界中就有一些先进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感到兴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这些同志在“五反”运动中以及后来在总路线宣布时，都起了破除顾虑、带头先行的良好作用。一九五五年冬，听了毛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指示以后，先在全国工商联的会议上，后在各地的人代会上，也是许多骨干分子带头进行了自我检讨。那时，工商界中先进的人数愈来愈多，这种形势对于高潮的到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推动力量，由此可见，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由于党领导民建和工商联掌握了这个客观规律，培养骨干分子来带动中间，影响落后，不断地扩大左派与中间的队伍，终于顺利地推动全体工商界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在肯定骨干分子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骨干分子的缺点。根据不少工商界同志的反映，就这一年多的情况来说，许多骨干分子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关心群众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不敢积极地代表群众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他们与群众的共同语言渐渐缺少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更严重的是有的骨干分子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以改造者自居，造成与群众对立的局面。在这些问题，我认为统战部、民建会是有一定责任的，这就是对骨干分子的关心、帮助不够，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批评不够，对他们的社会活动与岗位工作的矛盾没有及时予以解决。

左、中、右的客观存在，以及民建会培养骨干分子的工作与宗派活动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工商界中，民建内部有没有人搞宗派活动，那应该严肃地检查。但工商界中既有左、中、右，那么民建在进行工作时，为了了解情况，作好工作，有时分别与这些人或那些人开会商量，是不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就以民建内部来讲，在某一些问题上，也是有左、中、右的分别的，有时这几位同志研究某一个问题，或者为了帮助另外几位同志而进行一些商讨，这也是不可少的。那么，这种活动是不是也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鉴别宗派活动要看是否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宗派活动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是无原则地排斥他人。做法上是不择手段的。作为骨干分子，宗派主义情绪也是不应该有的，有了这种情绪，就会脱离群众，更何况宗派活动。我们反对宗派主义情绪，更反对宗派活动。任何组织内，不容许有宗派活动，宗派活动是破坏组织的。所以，看一个问题应该从实质、内容上来看，而不能只看形式、表面，否则几个同志平常接触多一点就被认为是宗派活动，那就是自己带着宗派眼光看人，不信任同志，对工作是很不利的。

工商界中间，民建成员中间既然有左、中、右，那末在某一个问题上，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与参加在民建、工商联工作的党员的看法比较一致，那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而接触的内容无疑地就是想把他们认为对的主张、看法扩展开去，影响他人。这能说是宗派活动吗？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吗？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说到这儿，我要说明，在这一问题上，我是不同意章乃器同志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那篇文章中对统战部的批评的。我认为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既可以有组织对组织的来往，也可以有成员对成员的来往，何况组织来往也是不免

要通过个人的。对于上一点我想没有人认为不应该的。问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成员和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可以请求统战部的同志就工作问题以及对方针、政策的认识问题交换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民主党派的成员请求与统战部谈话，我想统战部没有理由不答允的。反过来说，统战部也完全可以约请民主党派内的一些同志交换工作上的意见。这样作，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过去做得太少，不是太多。统战部既然没有限制哪一些人可以来交换意见，哪一些人不能来；而对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这种接触又只是对他个人的帮助，没有任何对他个人以至对组织的约束力。我想不出这种来往与宗派活动有什么相同之处？民主党派中可能有个别成员作风不良，假借统战部的名义来压人，有的人甚至搞宗派活动，那是应该反对的。但这是另一件事，如果因为个别现象，就把所有这种来往说成宗派活动，甚至说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那就是把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限制在组织对组织的接触上，其他来往都变成有宗派活动的嫌疑，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阻塞了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正常来往。

总之，作为骨干分子，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克服一切自高自大，以改造者自居，脱离群众的作风，应该无微不至地团结帮助中间，带动落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骨干分子的作用也应有足够的估计，对他们的困难有足够的同情，尤其不应该以自己的宗派主义情绪来看他们，这样做，对于团结大家共同前进是没有好处的，这种重大的是非问题是不容许混淆的。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话。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正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所以要整风，要除三害，我们所以要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因此，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论多么尖锐的批评都应该受到欢迎，但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最近这一大放大鸣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意见，我个人认为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从"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对于工商业者的进一步自我改造不利的，其中有些意见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极端错误的态度的。对这些言论，我们一定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伟大公式，发挥争鸣的精神，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同志们，这是一个严肃的任务。

千家驹说：自从我在上次工商界座谈会发言之后，许多工商界朋友对我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是好的。因为经过争论，可以把问题弄得更清楚，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不用害怕别人的批评，应该欢迎别人的反对意见，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只许我说，不许你鸣，甚至认为有人提了不同意见，就是压制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帮助党整风，就等于给党治病，对于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工作上的缺点，工商界可以开药方，非工商界也可以开药方，通过辩论，就可以找出真正的病源，从而对症下药，倘有不同意见，就给提不同意见的人戴一顶教条主义的帽子，这种办法我看是不妥当的。

我想讲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今天在有些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够正常，某些私方代表有职无权，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解决这一类的问题，需要制订一系列的制度，要在合营企业中进行赎买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教育。至于工商业者是不是还有两

面性，是否需要继续进行改造，这是属于另一类性质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是有关联的，但不能混为一谈。

在合营企业中改善公私关系的方法，我基本上同意盛丕老的意见，应把合营企业里的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开来，凡是重大问题，原则性问题的决策工作应由企业的党、政（包括私方行政人员）、工、团建立适当的会议制度，在党和公方代表统一领导下，集体作出决定。至于决策的贯彻执行以及日常事务工作，则由企业的行政部门按照行政的职别办事。这种办法，一方面保证了公方对企业的领导权，一方面可以消除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的现象，使私方人员可以有职有权有责。

在合营企业中，不仅有公私关系，还存在着私方人员与职工群众的关系。我上次发言："劳资双方过去有墙，……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这几句话引起了许多工商业者的反感，我想这是出于一种误会。难道说劳资之间没有历史的阶级仇恨吗？难道说这种阶级仇恨应归咎于劳方吗？要把这道墙彻底拆掉，资方应有最大的耐心，从工作上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的观感，这几句话怎么能被理解为要工商界"安心于不公平"呢？应该知道，不少职工群众对国家的赎买政策是有抵触情绪的，他们认为政府今天太照顾资本家了。陈云副总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工商联大会上曾经说过："职工和私方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但是也要估计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并不是很快可以转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来进行工作，缩小这个距离。"又指出："政府和工会应该对职工广泛进行赎买政策的教育……私方人员在改进公私关系中采取积极、正确的态度，所谓积极，就是不要但求无过，而是要不怕困难，不怕碰钉子，积极工作。"陈云副总理这几句话，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

要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我认为应该从加强对职工群众和公方人员的赎买政策的教育、建立公私共事关系的一套制度、私方人员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待工作这三方面齐头并进，而不是否定两面性，否定定息是剥削，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否定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不存在，否定阶级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已经消灭。

对于两面性，我们应该根据历史情况作具体分析。大家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全行业合营以后与合营以前两面性的内容也是不相同的。谁也没有说过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指经济上的"五毒"或政治上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然而有人却一口这样咬定，并据此而否认两面性的存在。

同时，我们也一再指出：两面性中积极一面是主要的一面，而且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发展，消极一面是次要一面，它正在缩小以至逐步消灭，所谓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而言，而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但是竟有人认为说有两面性就是强调消极一面，就会打击私方人员的积极性，这不是无的放矢是什么呢？

我们还认为：阶级正处在剧烈的分化之中，工商业者是在逐步向着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之中，同时两面性在工商界分子中，存在的程度也是极不平衡的，有多有少，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但从大量观察，即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两面性总还是存在的。我上次说，有人反映"合营前是小国之君，合营后是大国之臣"等等，这不过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从没有说过所有的工商业者都是如此，然而有人竟认为这是以个别例子来概括全部。

我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从这次的大放大鸣中证明比我们过去所想像的似乎还要严重一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

利而完全解决了；但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看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不是现在还有人公开主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可怕吗？这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一个艰巨的长期性的工作。过去我们总以为否定两面性，否认定息是剥削仅仅是某一二个人的主张，在这次争鸣中不是证明他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吗？在争鸣中还暴露出有的工商业者定息是要拿的，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要再戴了，这不是两面性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帮助党整风和工商业者进一步改造问题。工商业者帮助党来整风，其目的是要求工商业者揭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矛盾，以改进工作。这是一件事情。为了进一步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商业者需要继续学习，进一步接受改造，这是又一件事情。不要混为一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我在上次发言中也曾提出过，特别是关于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的问题，政府没有及时定出适当的措施来贯彻执行，从我来说，作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人之一，也没有积极地提出意见，这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如果由批评缺点而否定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加以否定，概称之为教条主义，而加以反对，甚至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那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但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例如关于定息问题，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就令人奇怪了。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来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是什么呢？这种说法的目的不外是要根本否定我国目前仍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残余的剥削阶级而存在。这种理论如果成立，那我们一切的改造工作，即要进一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任务也变成无的放矢了。这与马克思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又如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那么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又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能转化不等于说没有本质区别，正如地主可以转化为农民，但能够说农民同地主没有本质区别吗！）这那里算得上理论呢？这是诡辩或故弄玄虚罢了。

我上次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要没收，这是说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来说，是应该这样做的，但由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的形式。赎买是消灭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一种手段，它同和平改造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家所有制决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有人提议要赎买到底，即付定息二十年（甚至有提出三十五年的）这种思想不应加以批评吗？

不错，在争鸣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但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它总是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认为一加反驳，就是压制争鸣，就是教条主义，这是什么逻辑呢？应该认识争鸣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互相辩论，有理说倒人，教条主义的帽子是吓不倒人的。

最后我想就李康年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关于李康年先生主张定息二十年，我上次发言曾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消极性的一种表现。最近李康年先生在发言中说我没有看过他的建议原文，的确这是事实。在李康年发言后，我曾仔细读了他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定息的建议书》、《关于定息建议书的补充理由》以及《从我学习哲

学以后来看政府用和平方针改造工商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实施定息办法问题》等文，又听了他这次的发言。我认为上次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还不够全面。李康年先生的建议虽也包含有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给资产阶级的打算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他不仅坚持赎买"必须付足二十二亿元"，而且这二十二亿元的赎买存单是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起发行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已经付出的二亿二千万元还不算在内，国家多出的二亿二千万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包括董事监察人等等在内）进行购买，名叫资方代理人的"酬奖"和"对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的慰籍金"，以慰籍他们"确由阶级斗争之故遭迁的损失"。他不但断章取义的曲解了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曲解了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社论，还歪曲了马克思所说，购买对于无产阶级将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一句话（按马克思此语出自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原文是："我们并不认为，赎买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对于我们就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了"）。在李康年先生看来，赎买既然对无产阶级"最便宜不过"，对资产阶级当然是"吃亏"不过了，"可是（无产阶级）心中还有些不服气，他们以为资本家究竟太便宜了"。这在他看来，真可说是"是非倒置"了。李康年先生在座谈会中建议把他的建议全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交全国基层讨论，我个人倒是同意李康年先生这个建议的（只要纸张不太紧张的话）。把李康年先生的建议书印发全国讨论，老实说，这个建议是决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对工商业者改造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但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使工商界认识到思想改造是怎么一种艰苦的工作，这对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会大有帮助的。

现在党提出了"工作整风两不误"，我也愿意对工商界提出"改造整风两不误"的意见。为了帮助党整风，我们应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尽量说出来，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是应该加以批判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要以一吐为快，但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以有利于工商业者进一步的改造，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离开了这一基本方针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了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应该加以避免。

孙起孟说：党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帮助党整风，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同样地也就是要反对这三个主义。从揭发出来的现象看，毛病是很多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党，竟有这么多的毛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工作中的错误？还是路线、方针的错误？还是兼而有之？我以为应当有一个基本估计。对此，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的看法：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工作中基本上实现了方针、任务，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少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此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有了毛病，就需要揭发出来，以利于辨明是非，改正错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

高潮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清清楚楚的，民族资产阶

级还存在，那么，怎样去认识这个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变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在估计上如果有偏差，势必影响到在处理阶级关系上出偏差，因此这个问题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党员和干部中间，在估计上存在着"左"的毛病，"左"的表现和恶果，同志们已经讲得很多，我只想补充说一说"左"的毛病主要出在那几个问题上。

第一是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认识不够甚至无所认识。高潮以后，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间已经消灭了，资本家在合营企业里，不管他们自觉与否，是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因此把他们还当作像高潮以前那样的资本家来看待，是脱离实际的。

第二、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以后的积极作用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民族资产阶级是"财富"，这样的话对于把他们看作"包袱"的思想起了澄清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一般的也还是主要地看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和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对于他们的掌握了现代文化和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则估计不足甚至无所认识。不少人没有看到，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资本家原来用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或者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技术、知识，现在已经不能不依附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而为它服务了，因此，资方人员的本领也就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财富。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充分使用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所长，帮助他们学习和改造，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既是适应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又是符合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安排了资方人员而不是很好地使用他们，让他们作出贡献，不仅是资方人员会有意见，对于工人阶级也是不利的。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向资本家学习和向他们学习什么。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积极作用，有不少人是估计偏低，认识不足的。

第三、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特别是高潮以后他们的变化，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实事求是地区别开来，恰如其分地给以肯定或者否定。笼统地肯定固然不好，笼统地否定，也会伤害许多人的心。没有看到，工商界中有不少人的心是向着社会主义的，向着共产党的，而且这样的人只会日益增多，而不会日益减少。有一部分人，从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在某些问题上，甚且保持着比较保守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爱国的心是不落人后的，对于企业里的工作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愿意拿出本领来贡献给国家的心也是坚定的。估计"左"了，笼统的否定工商界的积极方面，就会伤害这些人的积极性。

形成"左"的毛病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简单地只有好的或者坏的一面，而是同时具有两面，这就是在我国条件下为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两面性。两面性是比较不好掌握的，一分析不好，一笼统，不是偏于这一面，就是偏于那一面，也就是，容易偏"左"或者偏右。

关于两面性问题，已经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讨论，这次座谈会上，也有很多位同志对此发表了意见。可以不可以说，经过讨论以后，同意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还有两面性的人在增多起来，也就是，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一致面在扩大起来。当然，两面性到底有没有，还可以研究，现在更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高潮以后的变化问题。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怎样变化？关于这一点，我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

指正。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是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的两面性也就必然要发生变化，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他们的两面性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变化，作了概括的叙述，明确地指出他们的两面性是有变化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现在的特点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领域，但是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东西。对他们的两面性的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另一个是他们的个人改造。从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观察，他们已经不再是企业私营时期那样的资本家了，他们的身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他们还有剥削收入等等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还是资本家（有部分个体劳动者参加了公私合营成为定息户，这样的人当然并不因为拿定息而变成资本家。）；从他们在企业、机关中的工作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开始成为劳动者。因此，不能简单地、抽象地把他们叫做资本家或者劳动者，而只能辩证地，也就是科学地把他们叫做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听来好像是矛盾的，但这样的说法可能反映着客观的事实。他们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具有两面性，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到达了现在的境地，是否停滞不变了呢？不是的，他们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不容许不变，而且正在变化之中。作为一个阶级特征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就现在的情况看，大体上说，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一面（主要指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立场）增长得很多、很快，第二种是，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一面，社会主义的一面增长得很少、很慢，甚至没有增长，第三种是中间状态。这里所讲的政治立场，主要是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如何，当然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有莫大的关系，但是自我改造也起着极大的作用。上述的三种情况又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可以不可以这样的估计，总的趋势是向第一种情况逐步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向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主要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思想作风或者变化极少的人不会没有。

是什么因素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中间发生了上述三种不同的情况呢？又是什么因素使上述的三种情况向着第一种情况发展变化呢？关键在于教育改造，在于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两面性问题讨论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明确工商界今后教育改造的方针（把这一项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上）和任务（要解决什么问题，同劳动人民的改造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等等）。

总起来说，我的看法有这样的五点：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有没有两面性，我认为，有两面性而不是没有两面性。

第二、两面性有无变化？怎样变化？两面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高潮以后，变化更加显著而重大。他们的两面性已经变为：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上一方面还是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已经开始向劳动者方面逐步转化。这样的两面性还会变下去，直到它的消灭。因此，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成是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的人，在实质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至于说两面性

中的消极一面，在高潮以后还是指"五毒"，那显然是出于误解。如果工商界中确实有人有这样的误解，我们大家有责任向他们解释清楚。

第三、两面性今后变化的特点怎样？总的趋势是，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缩小，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增长。而在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中间，客观地存在着三种情况：进步很多、很快的，进步很少、很慢的和中间状态。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内部这样的变化，也就很难理解两面性发展变化的整个趋势。

第四、对两面性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社会地位，一是他们的个人改造。在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个人改造对于两面性的变化就有突出的作用。

第五、两面性好不好？这要看同什么比较。拿来同工人阶级比，自然不好，因为两面性里面还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但是如果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有两面性正是它的好处，就以它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相比较，也应当看到它的有很大变化、很大进步的这一面。由于有不好的一面，所以还有改造的任务，奋斗的目标；由于有好的一面，因此毋庸自卑，而是要以很大的信心和努力来进行自我改造。

附带在这里说一说两面性是不是一顶帽子的问题。用语恰当不恰当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在于这里头所代表的一种看法和所反映的一种情况。人们听了这样的话会想到：既然是人家给我扣上的帽子，那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其实，工商界中很多人都知道，两面性正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因此只能当作革命对象而打倒。正因为有了两面性这个特点，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才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他们才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同他们的矛盾，才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可能。必须指出，所以要把两面性的问题弄清楚，决不是为了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脸搽黑，用意只能是为了弄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以变成劳动者为目标的自我改造过程中达到了怎样的境地和还需要作些什么努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同工人阶级还有本质上的区别，指出这样的本质区别是符合实际的、必要的。但指明这个区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目的无非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是为了使劳动人民的改造工作做得更好。无非是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神，从团结的主观愿望出发，分清是非，以利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从上述的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在高潮后的变化，以及这个阶级的内部情况等等来分析，我体会到毛主席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来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因此，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就将是一个长期适用的（不是一时的，到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就成为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全面适用的（不是局部的）根本方针。有人认为既然肯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撇开阶级矛盾；或者，既然肯定阶级矛盾还存在，那就无法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此，我感到有两点需要说一说。第一点，我以为怀疑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或者能否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没有根据的。党对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按照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的方针来处理的。我们只要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同对待官僚资产阶级的方针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原则区别。过去几年中阶级矛盾的处理（包括"五反"在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总的说来

不都是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并且解决了问题的吗？正因为领导全国人民的党坚持了这一方针，这就使得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逐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高潮以后，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定息等等问题上是存在着阶级矛盾的，可是都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出适当的处理。

第二点，把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里面了，对于阶级矛盾，又应当怎样来正确对待呢？当然，突出阶级矛盾是不对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以后，阶级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阶级矛盾避而不谈，甚至抹煞阶级矛盾，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今天，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加了，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和矛盾。这些差异和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矛盾一方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客观的存在，抛开它就不能正确地、适当地处理这一部分的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安排政策，叫做量才录用，适当照顾。为什么在量才录用之外还要加个适当照顾呢？这就是因为还有阶级差异；这就表明在一视同仁之外还需要有所区别。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大大缓和了，而且终究要完全消灭，在我们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间还是很明显的。他们之间不仅有着思想矛盾，而且还有着阶级利益的矛盾。例如定息问题，职工中间对于定息五厘都是有意见的，七年不变，意见也不少，但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却有人认为七年五厘还是吃了亏，主张定息还要延长多少年。这首先应当肯定是是非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这同一般的是非矛盾有没有不同？显然是不同的，不同之点在于这个是非矛盾反映出阶级矛盾。处理起来，还是正视阶级矛盾好，还是抹煞阶级矛盾好？很明显，抹煞的办法是不好的。当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下，提出阶级矛盾，决不是为了扩大和巩固它，而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矛盾，以致最后地消灭这个矛盾。在教育改造的工作中，在处理阶级关系中，正视阶级矛盾，按照具体情况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笼统对待，这只会使得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能符合具体情况，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增进团结。

总起来说：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处理，这是党已经肯定了的根本方针。实现这个方针，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前提实现了，那么，尽管阶级矛盾存在，有的时候还相当尖锐，这个方针还是能够实现的，高潮以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高潮以后，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转为非对抗性了，这就更有利于贯彻这个方针。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民族资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准则。问题不在于是否阶级矛盾，更不在于是否承认有阶级矛盾，问题在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准则。一离开这个准则，团结的主观愿望就没有必要的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没有划明是非的标准，这样，就不可能达到新的团结基础。因此，必须在肯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阶级矛盾的同时，肯定社会主义的准则。

毕鸣岐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谈了“谁是教条主义者”和“从阶级看自卑感”两个问题。

他认为：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是一日千里，在时刻变化着，人的思想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伟大变革中，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那就不可能相安无事、心安理得的戴下去。思想觉悟越高，不安情绪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也是目前思想上最大的矛盾，所谓在工作中的自卑感就由此而生。”

毕鸣岐认为：李康年说定息照5%计算，以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为了减去矛盾从五八年起发行无记名式的定期存单，这种看法脱离了民族资产阶级现时的实际思想变化，与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多数工商业者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关系、消灭剥削和消灭自卑感背道而驰（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希望以二十年赎买完毕）。他说：提出定息延长二十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

毕鸣岐说：章乃器同志说"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的确，这个说法，我个人就感到舒服，我相信其他工商业者也同样感到舒服。毕鸣岐又说："定息额是根据'定产估值'，它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确，它也与资本主义经营时期任所欲为的剥削不一样。它终究是属于剥削性质的。在走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是不应当存在的。因此，我的结论是：它是属于剥削性质的。"

毕鸣岐说："有许多工商业者已不存在剥削，只有工资收入，即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有一点定息，但是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小。"他认为，"对于以上在工商界占有相当多数的人，应当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他们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去。"

六　月　八　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开的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今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他指出：那些反对思想改造的论调和攻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他希望工商界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表示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会上，李烛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陈叔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先后发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伟大精神，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英明方针，予以极高的估价。对于某些人企图离开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思想，给予严厉的驳斥。李烛尘很坦率地说，"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有一条心，走一条路才能长期共存，如果人各一心，各走各路，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胡厥文认为，章乃器最近期的一些论调是错误的，对工商界是没有好处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指出，章乃器的一些怪论是资产阶级思想突出的典型。

会上，汤蒂因、黄长水、李康年三人作了书面发言。汤蒂因反映工商界中小户的困难。黄长水对改进公私关系、党群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李康年补充他上一次的发言说，他的意见并不是要大家必须领足二十年的"赎金"，愿意放弃的人可以放弃。

李烛尘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我认为这是及时的、必要的，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的，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也正是党有伟大的力量，恢弘的气度，正视缺点，改正缺点的具体表现。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热火朝天地掀起了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浪潮，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大家也都谈得很好。我们工商界存在问题很多，也是党搞好整风运动的一股不容

忽视的值得依靠的力量。从民建会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来，有些工商业者对于“鸣、放”是有顾虑的，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有不少人正在看北京的风向行事。长沙一份材料反映：一个会员揭露了公私矛盾后以，又表示后悔了；一个会员错误地认为：“北京鸣放情况现在进入分析和收的阶段，上海的工人也说话了，自己也有不敢大鸣之感。”这些看法和说法是不应该有的，充分地信任党，因为党对于接受任何方面提出的任何意见，都是敞开着大门的。必须认识，好比对对子，“齐放”是上联，“争鸣”是下联，我们资本家可以“鸣、放”，工人阶级当然也可以“鸣、放”，我们有这种意见，别人当然也可以有那种意见，我们可以彻底敞开，别人也可以适当分析，大家一起“鸣”、一起“放”，所有的怀疑顾虑都是多余的，全国工商业者要破除任何思想障碍，把几百万双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几百万颗心里所想到的东西，从嘴里说了出来，让党听到我们的声音，做到实事求是地有的放矢，而不是感情用事，这正是表示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我们工商界中仍然有许多人到现在还怀有浓厚的自卑感，对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还不够高，在公私共事关系中表现的也不很好，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观方面的因素很多，如阶级没落感、缺乏政治责任感；对“三反、五反”有斗争过火处理过严的委屈感等等；这些需要通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以克服，客观方面存在的比较重要的因素，则是不少党内同志对于如何克服工商业者的自卑感和鼓励他们发挥积极性，注意不够，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对私方人员的团结、帮助、信任、支持不够。解放以来工商界人士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也有不少的积极表现，中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全行业合营高潮的到来，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这是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在这当中工商界人士自觉自愿和主动的努力也是不应当忽视的，他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迎接全行业合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明证。这更是政府所公认的。而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不少党内人士仍然只知道强调阶级关系，没有注意到形势已经有新的发展，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今天阶级关系已经大大不同于往日，仍然用处理旧的阶级关系的方式方法来应付公私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低估或者无视工商业者的积极的一面，强调他们的消极的一面，在鼓励、表扬、支持、推动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贡献才能方面做得非常不够，相反地轻视他们，歧视他们，这样做，怎能不加重他们的自卑感，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呢？当然，我们工商业者也不应当只看到自己的积极的一面，忽视由于阶级存在所必然产生的消极的一面，模糊阶级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放松自己的改造。工商业者的自卑感是应该可以克服的，积极性是应该可以发挥的，本来是可以因势利导的事，但是由于党内人士未能及时跟上形势，密切注意起来，使应该改观的情势改变不大，使不少工商业者感觉有职无权；有力无处使，一股热劲冷却下去，这是多么可惜啊！有人说：工商界的积极性未能提高，为什么一九五六年这些新转为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 30 %以上呢？正因为如此，假使所有的工业企业的私方人员都能积极起来，它的成果肯定说还要大大的提高。党内人士应多多检查一下在工作中是否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滋长；多多检查一下，作为一个领导人和教育别人的人，自己是否已经受到足够的教育，党是否已经给与足够的教育，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从各个方面包括合营企业私方人员在内取得好心的和切实有效的帮助，对于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个人民内部矛盾，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有责任协助党和国家做好解决对资改造工作中发生的矛盾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在我们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

育工作中，三个主义的危害性到了怎样的程度，及时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改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我们今后工作不要只是坐在北京发指示，要下去了解情况反映情况，即时改善，这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鸣、放"，使全国工商业者的心事吐露出来，我相信也希望党一定会重视我们提出来的意见，把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纠正过来，客观因素推动着主观因素的消长；阻碍工商业者克服自卑感、发挥积极性的客观因素逐步消除了，主观因素也一定会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逐步加强，而逐步消失，原来冷却的东西在工商业者的身上重新冒起热气来，劲头不大的情况将会一去不复返，这对于他们的改造和国家的建设都是有益的。

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紧密联系起来的。作为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要具备与党长期共存下去，实行相互监督的条件，民建会和工商联必须教育工商业者成员与党共一条心，同走一条路，这颗心，这条路就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社会主义，假使各怀异心、各走各路，那就不可能共存了，同时我们要"争鸣"，为的是反映工商界大众的合理的意见要求，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起着鼓励推动他们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让他们破除思想障碍，积极投入以与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竞赛，充分贡献技术才能，这样，工商界就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祖国建设大业中"百花齐放"的光荣行例。

最后，我热烈地、殷切地盼望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八办的负责同志们一定能够把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的成果，提交党作为展开整风运动的参考资料。凡是可以及时解决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及时地大力予以解决，边整边改是党的整风方针，党以具体行动来鼓励工商界人士大鸣大放，工商界人士的若干顾虑和怀疑，将是多余的了。

胡厥文说：在这次座谈会上，大家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揭露了不少缺点，对党提出了各种建议。一个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两次伟大的革命胜利和经济建设空前成就的党，能够这样虚怀若谷地倾听人民的意见，乐于接受各种非常尖锐的批评，这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同时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公无私，一切为人民的崇高精神。我认为，几年来党的政策方针是英明的是正确的，但同时由于我国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情况非常复杂，各种工作都是新的，大家还缺乏经验，以致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和缺点。我们为了党能够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家有责任把党在政策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揭露出来，使得党能够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进一步加强领导的力量。我们在旧中国亲身经历过三大敌人的压迫和贫困落后的悲惨生活，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短短几年中完全改变了旧中国面貌，大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我们每一个爱国的和有良心的工商业者，都是爱戴中国共产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的。这次座谈会中揭露了不少缺点和错误，这不但没有使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发生怀疑，而且更加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党定能明辨是非，纠正错误，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迈步前进。

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有些是个别的，有许多是比较普遍的。其中最普遍的是：一，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的进步估计不足，往往还有以"五反"前的资本家来看今日的工商业者。不少党员和职工对于统战政策的精神实质不够明确，有的甚至对我国有哪些民主党派、民主建国会是什么组织等常识都没有。二，公私关系、党群关系好的固然不少，不正常的也很普遍，私方在企业中往往有职有责而无权，积极性不能发挥。公私关系、党群关系固然是两方面的事情，有些问题是私方应该负责的，但是，不少公方看不见

私方的积极性，也没有很好地体会国家对于工商业者改造的政策，片面地甚至错误地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当作外人。不少的公方对于业务是外行，又不尊重私方的意见，以致有形无形间给国家带来了不少损失。三，人事安排不恰当，不少私方的技术人员受到投闲置散的待遇，有力无处用。四，中小工商业者中间有一些人在生活上还有困难，目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予以解决。这一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说各地都是存在的。

国家把我们工商业者视作一项财富，我们多数工商业者也的的确确愿意尽自己的一切所长，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但是，由于以上所说的问题的存在，往往打击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造成了公私之间、党群之间的距离。这些问题不解决，大家所指出的“墙”与“沟”是不可能拆除和填平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怀疑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或者党的领导。如果不重视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不给予及时的解决，发展下去的后果是严重的；同时，如果把这些问题错误地认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毛病，或者因而否认党的领导的正确，那更是不应该的。我认为，大家揭露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党中央和毛主席比我们任何人都看得全面和透彻，所以发动了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我们工商业者大“放”大“鸣”地揭露各种问题，帮助党整风，就是为了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党的威信更加提高，能够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次大“放”大“鸣”中，我们工商业者不少人对党作了尖锐的批评，并且提出了各种意见，这都是爱护党、信任党的表示。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但是，决不能认为“争鸣”中一切意见都是正确的，党都应该照单全收。我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政策，为了通过“放”“鸣”，能够很好地解决矛盾，使全国人民进一步团结一致，就必须明辨是非，区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把对的肯定下来，把不对的予以解说和批评。

在这次“争鸣”中，某些同志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考虑的。根据我的体会，这次“争鸣”中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并且辨明是非：一，有些人把党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某些党员的缺点，和党的领导本身等同起来，从而怀疑到党的领导是否必要。这在讨论企业中应该不应该撤出公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中应该不应该撤出党员干部的时候就有这种倾向。二，有些人在各种名词掩蔽下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从而否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领导作用。这表现在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争论中，也表现在目前阶级关系和两面性问题的争论中。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说是有区别的，工商业者和工人是没有区别的。这种把具体的人和抽象的阶级完全分裂开来的说法实质上就是否认两个阶级之间的区别。三，有些人误解和曲解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等同起来。这表现在对赎买政策和定息问题的争论上，也表现在工商业者现在还有没有两面性，还要不要进行改造的争论上。对于这些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明辨是非，不能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认为打击了“放”“鸣”。

对于章乃器同志最近在报上所发表的几篇文字和谈话中的许多论点，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说：“脱胎换骨”是增加工商业者无穷考虑，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可怕，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等等，不仅是我不能同意，我相信，正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前进的我们大多数的工商业者都是不能接受的。就以脱胎换骨这一句话来分析，在我们社会里，这是一句赞美称许的话，例如某人家的一个子弟向来不好好读书，行为不检，亲友为之痛心，

现在他改好了，亲友高兴之下说："你这个人进步了，完全改变了，竟然脱胎换骨了"。这是赞美之词。今天我们资本家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怎么不能说是脱胎换骨呢？这是最合适的一句话，也是一句好话，怎么会引起无穷考虑呢？又如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前者是一种剥削制度，后者是一种不良的工作作风，这样两种不同的东西怎么能相比呢？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官僚主义，难道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官僚主义吗？难道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官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吗？难道资本主义社会能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揭露与批判官僚主义吗？这种道理实在是很明显的。又如定息，当然是剥削，又何必把它另起一个"不劳而获"的名词。难道说定息是剥削，我们资本家就抬不起头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就心安理得了吗？这种论调，工商业者骤然一看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深得我心，但是深入地一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论调对于我们的改造进步没有好处的。我们工商界愈来愈进步，就会有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论调。我认为，国家把我们当财富，这是一句实在的话，同时也是一句鼓励的话、至于我们工商业者自己尤其是骨干分子、代表人物则应该带动工商业者尽一切力量，贡献才能，同时反求诸己，时时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你做了一件好事，人家说你了不起，是鼓励，而你自己却不应当自高自大地就以为自己了不起，要知道，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认为乃器同志这种论调的最大危害不仅把事非弄模糊了，而且会阻碍我们工商业者的进步。我们要的是诤友，要的是良药。今天共产党这样正确、伟大、尚且要整风，要求听逆耳之言，难道正在改造求进步中的工商业者不该听一些逆耳之言来提高自己吗？

我认为，我们工商界要进步，要改造，要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我们民建会、工商联必须在这样的目标下团结起来，明辨是非，改进工作。

"百家争鸣"在思想体系上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某些党员存在着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灰尘。社会主义是我们"争鸣"的思想基础，争鸣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不能帮助党除"三害"的，更不可能要求党依照资本主义原则领导全国人民改变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完全相信，党对于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清除"三害"是完全有决心的。通过这次整风，党的领导一定会更加强有力，存在于某些党员身上的"三害"将不断地被清除，党的威信将更进一步地提高，全国人民将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通过这次整风，公私关系、党群关系都将逐步的正常起来，过去阻碍我们积极性的一切因素均将逐渐清除。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将有比现在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使我们大家能够把自己的一切专长发挥出来。

现在，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胜利开始的时候；对我们工商业者来说，正是加强自我改造，尽快地把自己改变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的时候。不论为了国家的建设或者为了我们自己的改造，我们都应该在企业中和公方及职工一起，团结一致地展开增产节约运动，投入社会主义竞赛。这是我们国家当前的头等重要任务。我们工商业者有丰富的业务经验，不少人有现代的技术，我们如能积极贡献才能，我相信一定能够在增产节约中作出贡献，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也有助于我们的自我改造。

陈叔通说：我先要说明，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不是代表任何组织的意见。

一年多以前，工商界曾经敲锣打鼓欢迎全行业合营的高潮。高潮以后，党和政府从政治

上、经济上各个方面来鼓励工商界的热情。单就定息来说，当时工商界的朋友们都认为定息期限最长不过三年，定息数目最多不会超过三厘。但是，毛主席宣布定息一律五厘，七年不变，还可以拖一个尾巴。对这个决定，工商界朋友们都是喜出望外。

党和政府的用意，是大家所能够体会得到的，就是要工商界能够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接受改造。因而，工商界里面出现了很多先进生产者与先进工作者，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像我们理想的美满，工商界中也出现了松劲思想。

为什么在高潮以后，在党和政府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后，反而会产生松劲思想呢？这是我们应该思索的问题。

在这次座谈会中，突出地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公私共事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中小工商业者所存在的问题。

从去年七月，国务院四、五、八办召开工商座谈会以后，公私共事关系逐步有所好转。但是根据这一次座谈会上大家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私方有职无权的问题仍然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很多私方人员在工作上得不到支持和帮助，他们的建议得不到重视，他们的职权得不到尊重。某些公方人员在业务上是外行，但不信任私方，甚至歧视私方。有的公方强调阶级关系，忽视公私共事关系，因而以不正确的态度对待私方人员。部分职工群众也还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有的还不接受私方领导人员在职务上的调配。所有这一些情况，那能不影响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呢？因此，我认为，正确地解决公私共事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发挥私方人员积极作用的重要关键。

在中小工商业中，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活困难问题，一个是摘掉帽子、加入工会问题。为了照顾一些中小工商业者的困难，全国工商联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曾经通过工商界生活互助金方案。但是，目前很多地区还没有举办，而且即使举办起来，要求全部解决工商业者的困难，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各级工商联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从速把工商界生活互助金举办起来；同时，要深入地调查研究，把实际情况反映给政府和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解决。对于某些定息不多，坚决要求放弃定息的中小工商业者，希望政府考虑，解除他们思想上的包袱。

在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以后，还存在一些对资本主义的留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上碰到了困难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消极情绪。我们应当理解这种心情，帮助工商业者解除工作上和生活上应该解决的困难，而不要单纯地责备工商界。

从这次座谈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我们工商联的工作是有很大的缺点的。我们对工商业者的真实情况了解不透，没有能够帮助他们搞好公私共事关系，支持他们在生产经营中贡献出知识和才能，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对于中小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我们也关心不够，支持不力。这一次，经过大家把问题揭发出来以后，我们工商联应该努力改进工作。我想党和政府也会分别问题的性质，逐步进行解决。这对于党的整风，对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并进一步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将会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全国工商界也应该消除一切顾虑，继续大放大鸣，把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不可讳言，也暴露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如果我们不能明辨是非，对这些混乱思想加以澄清的话，不仅会妨碍"争鸣"，而

且会引导我们向错误的道路发展。"因此，原则性问题，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

一、我们工商界必须明白，只有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我们才能通过和平道路走上社会主义。不然，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的回头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能与社会主义共存的，更谈不到长期共存。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违反这个原则，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那末，民族资产阶级不会有今天的地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也将从头再写。但有人口里承认领导，实际上用各种诡辩来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令人遗憾的是我会的章乃器副主委最近在报上和《工商界》月刊第六期上所发表的文章，正是在争鸣的掩饰下，贩运资本主义思想的突出的典型。他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这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的区别存在；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阶级领导另一阶级的问题存在。这不仅否定了今天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阶级的存在。

二、我们说，两面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有了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才有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才有走和平道路的可能。两面性的性质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从两面性的变化来说，今日所谓两面性，主要是社会主义的一面与资本主义的一面。高潮以后的两面性与高潮以前的两面性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正在不断的变化中，今后的两面性与现在的两面性也必然又有所不同。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的一面在继续增长，而资本主义的一面在继续缩小。但因为资本主义的一面还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们工商业者还需要继续改造，任何放松改造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当然，工人也有缺点，也要改造，毛主席说过，"谁说工人不要改造？"但因为工人是被剥削的阶级，他没有留恋资本主义的思想，因而工人的改造与工商界的改造是根本不同的。有人说："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这是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三、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是怪论。国家每年支付的定息，都是工人阶级劳动的产物。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既然不劳而获，同时工人阶级就必然劳而不获（我同意吴大琨的说法）。不劳而获的收入与剥削收入是同一性质的东西。但正因为有人把定息看作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好比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因而要求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同时，还希望国家把二十年定息一次付清，以便摘掉资本家帽子。这种名利双收的想法，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凡是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的人，反对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

前面我说过，工商业者在工作上、生活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是容易产生消极情绪的，我们应该帮助工商业者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以便于发挥积极作用。我应该说明，这并不是要工商业者把一切责任推给客观的存在。恰恰相反，我们工商界必须加强主观努力，提高政治责任感，主动地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我们一方面要求有职有权，要求公方和职工的尊重和支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守职尽责，主动地靠拢公方和职工群众，积极贡献出知识和才能，逐步改变职工群众对我们的观感。

大家知道，工商业者的个人改造应该以企业为基地，在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有些人认为自己已经很进步，听到还要改造，就感到不服气。我认为，工商业者中间各人的进步是不平衡的，有进步的，有中间的，也还有落后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进步的人不仅应该继续进步，还应该帮助别人进步。有人对脱胎换骨害怕，认为

有无穷的忧虑。我认为，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就阶级本质来说，确是两个胎，两付骨。从资产阶级分子变为工人阶级分子，就必须脱资本主义的胎，换社会主义的骨。目前工商界社会主义的一面正在增长，资本主义的一面正在缩小，最后归于消灭，这就是脱胎换骨的过程。大家都在脱、都在换，到了已经脱了换了那一天，谁要叫你再脱再换呢？为什么会有无穷忧虑呢？

我们帮助党进行整风，是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一致性，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然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办法，我们就不仅要"放"，而且要齐"放"；不仅要"鸣"，而且要争"鸣"。为的是明辨是非，共同进步，我们还应该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交换意见。我批评别人，是为了帮助别人进步；别人批评我，也是为了帮助我进步。我们大家在社会主义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经过讨论，逐步求得一致的。一切用主观主义来反对主观主义，用官僚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用教条主义甚至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应该的。揭发矛盾，反对"三害"，是为了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进全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为了其他。由于党能够一贯地对错误作斗争，及时纠正错误，因而我们的党是正确的，光荣的，伟大的。这次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根据这次座谈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我想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座谈会上有很多人提出，应该进一步对职工、公方和私方三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完全必要的。我认为，工商业者为了改造自己，应该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对于公方和职工，也同样应该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关于统战政策的教育。而且要教育他们，对于私方人员的变化和积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估价。管理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件新的工作，工商业者不能因为自己有一定的业务技术知识而自高自大。恰巧相反，他们仍然应该向职工和公方学习并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技能，提高政治觉悟。至于业务和技术水平比较低的私方人员，自然更应该加强学习。对于公方来说，缺乏业务知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时随地向群众学习，而且要向私方学习，使自己在业务上成为内行。

第二，建立和健全企业管理委员会。

有些企业已建立管理委员会，但不够健全；有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应该作为一种制度，明定章程，使大家能够职责分明，照章办事。这个章程，听说现在由总工会在那里摸经验。我认为，应该以总工会为主，加入企业部门，并邀民建及工商联参加，共同讨论。

章程是可以修改的，可否定下章程，先行试办，取得经验，再作进一步的修改。

第三，工商座谈会。

工商座谈会是交换意见、协调公私关系，改进企业工作的良好办法。陈云副总理曾指示过，各地要把工商座谈会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据了解，不少大城市是举行了的，但没有经常化。有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举行过。我认为，工商座谈会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一样，应该制度化。可否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主持，由民建会和工商联参加，拟订出一个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以便各地推行，大家遵守。工商座谈会不能形式化，而应该有具体内容。开会前要做好准备，以便真正能解决问题，每次开会除有关业务部门参加外，希望各地统战部参加。

李维汉的总结发言

朋友们、同志们：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要结束了，我谨向积极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们致谢，向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者致谢。

这个座谈会有它的特点：第一，从五月十五日起到今天举行了二十五次座谈，讲了话的有一百零八位，可以说：会开得相当热烈，话讲得相当充分。第二，参加座谈会的包含了各方面的朋友，有大、中、小各个类型和妇女、青年、资方代理人等等工商业者，有工商联、民建会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有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中央的常务委员，这就使得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批评和意见比较广泛，比较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情况。第三，座谈会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明辨是非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座谈会应当说是开得好的，对于我们党的整风有很大帮助，对于继续贯彻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很大帮助。

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对于正确的批评和意见，我们愿意认真接受，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改进工作。

座谈会上谈到了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的问题。这两类问题都很重要，应当寻求适当的处理办法。由于它们关涉到的方面很多，中小工商业者问题的情况尤为复杂，处理起来会遇到许多的实际困难，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不可能求得一致的意见和具体的答案。我们已请专门小组仔细加以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合理的、行得通的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考虑处理。在政府作出决定以前，会像过去一样，同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员交换意见。

座谈会上提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的工作问题、工商联和民建会间的分工合作问题以及工商联同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交请专门小组加以研究，希望能够总结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根据座谈会上许多朋友的希望，我在这里作个声明：现在在工商联担任正副秘书长或者其他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凡属他们所在的工商联组织要求他们留在里面工作的，除特殊情况外，都要继续留在里面工作下去，个别不适当的可以调换；统战部应当同时和非党的正副秘书长和其他非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并对他们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至于中共同民建会的关系问题，我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一般地已经谈过，这里不加重复了。

座谈会上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到了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的确，这是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种关系，大多数是在高潮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历时不久的新的关系，加以其中有工作关系，又有阶级关系，因此不仅是新，而且比较复杂，要处理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这种关系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从私营企业的劳资对立的关系，经过这种两重性关系，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合作互助关系。这个变化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同时也如同许多朋友讲过的，多数是在逐渐进步。我们认为今后还会继续进步，这一方面是因为私方人员一般是爱国的，不少人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方

人员在认识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经过整风，一定会有所改进，而党和政府的有关领导部门当然要更多地努力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公方人员就必须负责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公方人员对于高潮以来私方人员的变化和进步，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对于一切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私方人员，应当充分给以信任，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有技术专长的，应当尽可能使他们在技术岗位上发挥所长，并且继续提高。对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必须充分给以支持。对他们要有鼓励有批评；他们有成绩和进步，应当适当鼓励；他们有缺点和错误，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批评，启发他们自觉地加以改正。要认真地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座谈会上就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已交请专门小组进行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总结经验，拟出一些关于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办法来。自然，关于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我们还必须邀请公方人员和职工代表交换意见，这是需要向大家声明的。

对于私方人员，我们希望他们下定决心在企业工作中扎下根来。有了这个决心，就会从自己这一方面去努力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努力搞好企业里的工作。在他们面前，摆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而要完成这双重任务，他们必须以企业为基地，在劳动实践中，在同职工一道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

高潮以后，我国的城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同企业里的生产资料开始分离，从而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剥削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由于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改变为劳动者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也就还存在；当然两面性的面貌已经有所改变，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为了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正确地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远的不说，建国以来，大家应当很熟悉我们一直是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为了促进资产阶级分子向劳动人民的转化，我认为朋友们主张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在思想改造工作中，必须肯定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一面，鼓励他们继续前进；而对他们的消极一面，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积极帮助他们改正，但是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

有人反对思想改造，断言：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他们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说已经没有了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这些人把同自己的论调相反的观点和思想，都当作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唯成分论，加以攻击。这种论调是在给工商界"帮倒忙"，是对工商界很不利的。在我们的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经过几年来的教育改造，工商界有很大的进步，他们中的进步分子

逐渐增多起来，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人们，大多数也在逐渐向进步的方向变化。进步分子必须继续求进步，经得起考验；同时，很好地团结中间分子一道前进，并且同他们一道去向落后分子进行工作。工商界的进步分子要能够这样地发挥带头、骨干作用，就需要努力克服脱离多数的宗派主义的毛病。在帮助工商界团结和进步的工作上，我们曾经贡献过一点力量，今后仍然要同工商联、民建会一道，进一步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并且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吧，朋友们！

• • •

章乃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书面发言（会后收到），表示不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他的书面发言全文如下：

读了六月六日和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道，我愿意发表如下的几点意见：

一、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放大鸣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以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时，又要求过多的赎买金。用推论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应该实事求是，力求全面；不应抓住一部分或一点来推，而且一推就是十万八千里。实际上，要求早点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们向工商业家做工作，只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会主义，我们就珍若拱璧，视为工作的重大胜利。当然，时代是不同了，看问题应该结合形势的发展。但对于不愿意再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反而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那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我想，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是可以少安毋躁的。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

二、看来，直到现在，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仍然还有许多人没有想通或者没有完全想通。这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强大，怕整得太狠就要整垮了。这些是好良心人，但也应该对他们说明白：我们不怕伤风、感冒。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党的伟大方针仍然存在着试探的意味，怕表面宽大、内里并不那么宽大，怕"放"了之后要"收"，"收"的时候要反过来整，因此，还是"保留三分"、"观望一下"为好。这些是世故较深的人，他们对党的方针是信任不够的。还会有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了"唯我独忠"的姿态。这种人的思想就值得检查了。应该明确，在目前，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是90%以上的大多数人，忠于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什么希罕的事；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当然，也是根据事实，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别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决不能只许说反面的，不许说正面的。扣帽子也没有什么，只要不

乱扣。

三、孙晓村同志说我批评"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这是不实在的。请查一下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的原文，我说的是"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说"助长"，说"看起来似乎"，说"幌子"，这同孙晓村同志的"在参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这是有意的睁开眼睛撒谎，还是健忘呢？他还说，民建内部有左、中、右的分别，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这是对的。但我要再问一下：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这是不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一致的呢？他还谈到骨干分子是否参加宗派活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骨干分子一般地不会参加宗派活动；骨干分子参加宗派活动，是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造成的。

四、吴大琨同志批评我曲解了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首先我不同意他的说法。这一句话对某些党员会起到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客观实际去找。这样，整风期间报纸上的报道就已经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吴大琨同志刚刚相反，他从列宁文选里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说的全文来谈问题。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应该问一问：究竟是联共党史发行的广泛呢，还是列宁文选发行的广泛？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吴大琨同志那样，在读联共党史的时候要到列宁选集里去找根据？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据，仍然不能说明斯大林这句话是科学的。吴大琨同志还说："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我所说的是可以被敌人用来进行反宣传，在"脱胎换骨"之下加上"抽筋剥皮"。吴大琨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五、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的确，群众是能够辨善恶的。有许多有关理论性的问题，请大家在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和《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再给以批评，我也暂不作答。关于我在《工商界》发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员的头衔一点，我要说明：我从来发表文章都不愿用什么头衔，这次是由于《工商界》编者的要求我才同意的。我也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我的确负有这样的头衔。同时，用了这样的头衔，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么组织。文章总是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的。所以，我也看不到任何人有权利可以制止一个人发表文章用头衔。对这点，我毫无成见，请法学家加以研究吧！

六、最后，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综合五月二十六日、二十八——三十一日，六月一、二、五——十日《人民日报》）

（原载《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3号）

这是为什么？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象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事、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

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工人说话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

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阶级的舆论，正在吸引着全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注意。在这以前，有一部分职工曾经对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要求延长定息、撤销公方代表等问题表示过意见。现在，激起工人们发言的是性质更重大、范围更广阔的政治题目。在这一次，各地工人发言非常踊跃，情绪非常热烈。要求发言的工人很多，写信给报纸的工人也很多，报纸上发表的，不过是工人的意见的一小部分。很明显，广大的工人群众看出了，在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有一股歪风，这股歪风是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的。觉悟的工人群众不能不起而应战了。

在近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言论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善意的正确的批评，但是也有少数并不如此。这少数错误的意见企图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削弱党的领导。而且发表这种错误意见的人，还力图造成一种空气，不允许人们加以反驳，甚至对于反驳者进行威胁。正是这种情况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愤怒，使他们在紧张的劳动中也无法沉默。

广大的职工群众看得清楚，如果听任这种右派野心分子飞扬跋扈，那末，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就将受到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就将受到危害。职工群众了解，我国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流血奋斗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在过去的长时期奋斗中，各种不同的人们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态度，哪些人应该受到最多的信任，哪些人应该受到最少的信任。他们也知道，不管说话的人们怎样说得漂亮，如果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工人群众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从各地职工座谈会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充分感觉到，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对于自己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拥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也有意见，他们也要帮助党整风，帮助党组织改正错误，克服缺点。但是他们懂得，当有人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活动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一致，击退这些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

最近有一种论调，仿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再不需要改造了。因而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已经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工人阶级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倒是工人阶级应该向资本家学习许多优良品质。但是话刚说

完，事实的考验马上就来了。对于目前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究竟是谁更能够鉴别，谁更能够采取坚决明确的态度？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不但表现在英勇的建设的劳动中，也表现在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坚决的斗争中。这个事实不但证明了，我们的国家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且证明了，工人阶级有充分的觉悟和决心足以领导我们的国家。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既然放手让资产阶级思想"鸣"，就不能同时也让工人阶级"鸣"，因为据说，工人阶级一"鸣"，就会妨碍别人"鸣"。怪哉！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还要等待别人给予言论自由！当然，这种论调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工人阶级"鸣"了，并不是不允许别人"鸣"。工人阶级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别人也可以不同意工人阶级的意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谁也没有妨碍谁。其次，如果工人阶级一"鸣"，有力地驳倒了一些错误言论，使得资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再无理可"鸣"，那么，这种错误的言论受到一些"妨碍"，于国于民，到底又有什么不好呢？

不平常的春天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二月底到六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

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五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讲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认识他们的面目，以便增长见识，得到教训。这样，他们的头脑更热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

结果如何呢？

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们且不说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说宪法怎样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且不说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

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间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吗？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

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通过）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适当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议案，决定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六条作如下补充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根据需要和当地条件，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猪饲料。分配给每户社员的这种土地的数量，按照每户社员养猪头数的多少决定。每人使用的这种土地，连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所规定的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合计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百分之十。

政府工作报告

（一五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这是伟大的转变的一年。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更加有了保证。这一年，就是以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载入我国史册的一年。

关于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国务院决定由我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报

告。我的报告，是依据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来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这个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结。

一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七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九五六年的自然灾荒，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约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约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业就经历了这样严重灾情的考验。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农民发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现了增产的要求。一九五六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约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组织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设，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业的发展一度受到影响。一九五六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灾最重，产量比一九五五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户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等项的支出和发放生产救灾贷款的款项共达八亿六千万元，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向灾区调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同时增长，生产资料的需要骤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现了紧张情况。可是，尽管如此，一九五六年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营业，也都得到了发展。这一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较一九五五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较一九五五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约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达一百一十亿元，较一九五五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完成了给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员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们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

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设想，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不采取一视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针，或者私营工商业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绝改造的话，那么，二百多万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营业不仅不能得到发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营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从业人员就会遇到失业和转业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业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业放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之内，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业者就在一九五六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发展所准备好了的。一九四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们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来说，也无论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供销小组、分散生产联合经营等低级形式到手工业合作社的高级形式、从小规模的手工业合作社到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部分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同时，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联系配合起来进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万万人民生活的历史大变革后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获得很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是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错误，有的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检查。我们欢迎全国人民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当然，我们在检查偏差和错误的时候，要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要分析在当时那些偏差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无法避免的。这样，我们才能判明这些偏差和错误的性质、程度和范围。对于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错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坚决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的人，我们应该公开向他们道歉；在运动中没有处理完毕的问题，现在应该由有关机关迅速予以处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绩的。以思想改造运动来说，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问题的处理是比较粗糙的，因而损伤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再以肃清反革命运动来说，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计有以下四类：（一）因积恶累累民愤极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解放后到一九五二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经刑满释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现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经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现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宽大处理、教育释放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经过劳动改造或者宽大处理而得到释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们已经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们认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将会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检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认为肃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主席已经提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检查，我们相信，检查的结果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错误来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在个别单位甚至个别地区发生的错误比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和典型试验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说这些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错误、抹煞成绩，引导一些立场不稳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质或者部分性质的偏差和错误，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质或者全面性质的错误，以达到他们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敌我矛盾了。应该指出，目前在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早被消灭，但是这些阶级的分子，还正在劳动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们固有的阶级思想和阶级感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私营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们还拿定息，对工人阶级还有剥削关系，因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说股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这些讨论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剥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打掩护。有少数资本家主张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更是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露骨的表现。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资产阶级还存在着两面性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明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继续改造的必要吗？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他们进行自我批判，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们得到“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要作到这一点，又非经长期的改造功夫不可。这对绝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来说，又有什么

不好呢？现在不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吗？由上述情形看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更不必说在人民内部之外，还存在着我们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敌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经明白看到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思想斗争，也有政治斗争。因此，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无视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继续进行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已经正确地规划了建设和改造相结合的步骤。而一九五六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现在我举出一些数字说明这个情况。

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一九五六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一九五六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从主要工业产品看，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金属切削机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调整设备和改变型号的原因，虽然在台数上比一九五二年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种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五六年，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业产品，一九五六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较多的增加。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轻工业生产由于一九五五年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增长速度很快。例如，棉纱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万件，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件；棉布的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万匹，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万匹；食糖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万吨，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将近十一万吨。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农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如前所说，总产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超过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亿八千万元的水平。一九五六年，在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农业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前三年共开垦荒地三千六百万亩，而一九五六年就开垦荒地二千九百万亩；前三年扩大的灌溉面积共四千一百多万亩，而一九五六年就扩大了一亿多亩。

一九五六年全国完成了将近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等于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因而改变了前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只完成五年计划一半稍多的情况；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六，这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能够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新增加的钢的生产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万吨；新建和修复的铁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产和建设的迅速发展相适应，一九五六年在运输方面和贸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现代运输工具前三年的货运量共增加了一亿一千二百万吨，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万吨；商业机构零售总额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亿元，而一九五六年就增加了

六十二亿元。

一九五六年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显然，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是极其巨大的。这就使国家有比较充足的力量来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又保证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从而准备了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利条件。

一九五六年政府对国家建设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将要在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分别作的关于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详细指出。一九五六年预算开支中的某些项目和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从财政方面说，执行国家预算的结果，当年支出超过当年收入十八亿三千万元，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十六亿五千万元，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亿八千万元，银行发行货币也多了一些，因而动用了库存物资大约二十亿元。从经济和文教方面说，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同时，职工的人数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职工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虽然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这两种物资的供应都较紧张，并且减少了国家的物资后备力量。在造成物资供应紧张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额大了一些，“摊子”铺得多了一些，这样就多增加了财政的开支，多增加了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也就多增加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耗。

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我们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许多建设项目在前三年已经完成了土木建筑工程，需要在一九五六年进行大量的设备安装工程，另有许多项目已经完成了设计和施工准备工作，需要在一九五六年开始大量施工，并且还由于设计和施工力量的壮大，设备自给能力的增长，需要在一九五六年安排一些新的项目，这样，就使基本建设的项目大大地增加了。现在从建设项目来看，大多数是安排得恰当的。有小部分动工过早了，或者进度过快了，也有个别项目，是安排得不恰当的。不恰当的项目，显然是错误的。那些动工过早和进度过快的项目，在当年确实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对于长远的建设事业还是需要的。同时，有一些项目，主要是一些非生产性的项目，由于建筑标准过高，造成不少浪费。这些，都应该引为教训，今后力求避免。

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经开始察觉，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继续发展。以后在编制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时候，我们就吸取这个教训，缩减了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适当地增加了国家的后备。

这次提交大会审议的一九五七年度的国家预算草案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各种数字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以既积极又充分可靠的步骤向前发展的。一九五七年的国家预算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增长近百分之二；为了避免像去年那样在财政上出现赤字的现象，国家预算支出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百分之四。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六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达到六百零三亿元，这是按照计划范围内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五百七十七亿二千万元为基数进行比较的。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六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九，达到六百一十一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缩减为一百一十一亿元，它虽然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计划原定的一九五七年投资还多十四亿元，五年合计仍然超过五年计划原定数约五十亿元。在一九五

七年已经过去的五个多月时间内，预算和计划的执行情况，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厉行增产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争取农业丰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那么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完成一九五七年的各项指标，也就能够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议，国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正在由有关部门具体制订中。

应该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所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援助分不开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共有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苏联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的优惠贷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这种真诚的援助，值得我们再一次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还有人企图抹煞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计。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一九五五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一九五六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一九五七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或者财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数字同一九五二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较，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钢的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内，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八年，四十九年合计的钢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拿目前我国钢的产量同工业发达的国家的产量来比还是很低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方针，今后仍然应该继续坚持。我国一九五七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万元。以粮食和棉花来说，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产量合计只六千零五十万担。不要忘记，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个期间，还

有两个大的灾荒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开工建设的有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这些建设工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在第一个五年内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建设工程，多数都是旧中国时代所不能想象的。第一个五年期间铁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第一个五年合计为二十八万人，这就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材，而旧中国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七年，三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拿财政的情况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的财政收支各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元，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基本上是依靠内部的积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的。五年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建设事业和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国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我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无可否认的。那种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们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顾少数人发财享受不顾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很落后，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须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证明，这个政策保证了城乡人民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最必需的价格合理的生活消费品，免受私商的剥削，即使在发生灾荒的年份和灾害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这个政策支援了工业建设，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怎么能够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呢？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贪图少数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恋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想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我们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并不是否认在统购统销方面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一度曾经因为供应过宽，不得不增加收购，在某些地区就发生购粮过多、留粮过少的现象。又如，对棉布的统销工作，去年棉布增产较多，供应宽了一些，今年棉布减产，不得不减少供应。这都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顾后和统筹安排不够所产生的缺点。对于各种缺点，政府将继续注意检查和改正。

有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认为我国在建设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学习苏联

的结果．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看法．我们认为，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习得不好，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先进经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向苏联学习，难道向美国学习建设资本主义的经验么？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才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对别国的经验要选择恰当并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选择能力和学会正确运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学习得好，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少付代价．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同时，我们又必须批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都当作教条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在目前，正当右派分子用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有更重要的意义．应该肯定，在今后我们还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向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当然，其他国家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有可能，我们也都要加以学习．

下面我想对于教育改革和向科学进军两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几年来，我们作了这样的改革，并且有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今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还应该继续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过去，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这些缺点今后应该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教育改革中有这些缺点，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认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教育改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问题．旧中国的高等学校，由于要适应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需要，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大多数院系庞杂重复，培养目标笼统模糊．各科中工科所占的比重很小，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袭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旧教育的这种情况根本不能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在解放后头几年的国际形势和内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又要求有一部分学校实行内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和各个高等学校几年来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巨大工作，使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体上能够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需要．但是，教育部门在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是有缺点的，例如，对某些学校安排不当，对老教师的意见和经验重视不够等等．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今后应

该力求保持高等学校的稳定，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且要更好地结合我国的实际，稳步地改进现有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

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去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但是这次整风运动证明，要使教师们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今后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几年来，学校的政治教师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挥更大的力量。

现在我来谈谈学生毕业后参加劳动的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要求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参加劳动者的队伍。解放以来，我国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要适应国家对高级和中级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较多。这样，就造成了近几年来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只有一小部分参加工农业生产的现象。特别是去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多招了一部分学生，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就更加增高了。但是，应该指明，这种现象却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现象，经过国家的妥善安排以后，它将逐渐地转入正常的状态。今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将根据计划少招一些学生，今后我国的各级教育都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因此，今后，一方面每年将会有更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每年又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这才能使我国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加，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扩大。这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现象，也将是今后长时期内存在的现象。

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的，从小学起，特别是从中学到大学和出国留学，劳动人民是很少有份的。新中国的情形就根本不同。我们的教育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近几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他们想把子弟送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因此，尽管我国的各级教育事业几年来的发展在速度上和规模上都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但是，总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我们的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而不可能把好事在一天之内办完。

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高等学校中也应该加强劳动教育，学生毕业后一般地应该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今后应该对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实施。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社会上特别是一部分干部中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因而造成了不少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劳动人民，毕业后不愿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不健康现象。我们应该向所有的青年学生确切地讲明，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在我们的国家

里，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工人和农民是最有前途的人。青年学生都应该把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看作最大的光荣，同时又应该认识，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是有困难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不怕艰苦，下定决心吃苦，老老实实地劳动。全国学生的家长们和社会舆论都应该鼓励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农业生产劳动，要继续批判一部分家长和干部轻视体力劳动，阻挠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错误思想和行动。教育部门应该根据上述教育方针，在过去几年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对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彻底地稳步地加以改进。

我还简单地谈谈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七年来我国派遣了七千多人出国留学，派遣的标准一般是按照政治、业务和体格三个条件，这是对的。为了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前，我们对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曾经特别着重政治条件的审查，这是完全必要的。值得引为教训的，是当时在审查政治条件的工作中有形式主义的缺点，因而还有个别政治品质不好的学生也被派出去了。同时，对留学生的业务和体格条件也有注意不够的地方。我们决定今后一般不派高中毕业生，只派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去学习国内所缺的专业。选派留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政治条件的审查，而且要克服上述的各种缺点。有人认为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中，革命干部的子女占多了。事实怎样呢？根据已有的统计材料，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我们派出留学生六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革命干部的子女还不到百分之三点五。由此可知，那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向科学进军

以往一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国科学事业有了重要的发展。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试制了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成为常设机构。各方面科学研究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也有了扩大。科学工作体制的原则已经确定。科学工作中的协作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关于图书仪器等科学工作条件的问题，已经或者正在拟定方案，逐步加以解决。有些重要的科学实验设备正在建设中。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功率为七千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a粒子的迴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科学研究，一年来也有不少成就。所有这些，都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对科学事业也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

在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却有人说，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甚至有人说，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好像从解放以来，我们在科学方面不仅没有丝毫成绩，而且是倒退了一样。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请看事实：第一，现有科学事业的规模，虽然离我们国家建设的需要还很远，但是，无论在研究人员、机构、经费和设备各方面，都比国民党时代大得多。第二，在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也不是国民党时代所能比拟的。首先是许多老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工作上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许多新的学科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发展了一些与工业建设和国防直接有关的学科和新技术。高等学校也开设了大批新的专业。第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们在这方

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力量，还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第四，全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斗争中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社会科学有强烈的阶级性，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科学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中。老科学家们经过思想改造和工作实践，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一般地都提高了，留学生陆续回国，增强了各门学科的力量。大批高等学校学生毕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后备力量。根据以上种种，怎么能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还落后呢？还要补过去十二年的课呢？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科学家在国民党时代非常困苦的条件下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就，而且我们从来就把他们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作为中国科学财富的组成部分。说新中国科学落后于国民党时代的人，无非是否认我们科学家八年来的成就，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罢了。

对于科学规划，有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集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这个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这个规划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今天的初步蓝图，就不可能有将来日益完备的科学工作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事业，也必须是有计划的。在国家规划之外，无疑也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他们自己所专长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潜力。但是，反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使科学事业陷于无政府状态中，这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本身都是不利的。

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政府今年在医学、农学和机械等方面，已经制定较好的协调方案，并且已经部分地见诸实行。这种作法，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加速了科学工作的开展，以后应该加以推广。有人只赞成本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不赞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他们往往反对协调工作，甚至拒绝国家对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调配，这是一种严重的本位主义作风，应该加以批判。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门户之见而妨碍协作。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

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目前许多领导人都不是科学家，"外行"

不能领导"内行"。有人甚至认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教育自己的干部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逐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做好工作。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思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对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八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是管理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机构，它负责统筹安排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的工作。十二年科学规划，是几百位中国科学家集体劳动的成果，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也是科学家，这怎么能说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呢？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三　关于人民生活

解放以后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首先，让我们来看占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解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一九四九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是三百二十六亿元，一九五六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一九五〇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一九五六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国家供应给农民的消费资料也随着增长了。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〇年，棉布供应增加了两倍，胶鞋增加了一点九倍，食盐增加了将近一倍，糖增加了二点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样大，是旧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占全国人口第二位的职工的生活状况。一九四九年末，国家机关、公私企业和事业共有职工大约八百万人，一九五六年末增加到约二千四百万人，其中有私营企业转为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村干部共约三百万人。在七年中间，我们解决了约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九五二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一九五六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人对新中国人民生活的这种显著变化熟视无睹，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工人和农民是人民的最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怎么能说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呢？应该承认，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少数职工，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解放以前的几年有了改善，但是还没有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广大工农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多太快。至于占人口极少数的旧社会的剥削者，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解放以前降低了，这是完全应该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少数剥削者过着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处于贫困的半饥饿状态。只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够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首先保证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阶层的合理需要。那些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如果他们不是

把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不加分析地当作普遍的全体的现象来下断语，那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只想到极少数的剥削者而没有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

我们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穷，因此，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是很低的。解放以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快的，但是，按全国人口计算的平均产量，却增长得相当慢。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速度，而其中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农业的增长速度。我们是六万万人口的大国，如果每个人每年增加一元钱的购买力，全国人民的购买力就增加六亿元，国家也就必须相应地增加六亿元消费资料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吃的，就需要增加六十亿斤粮食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穿的，就需要增加两千万匹的棉布供应，也就是要增加两百万担棉花的生产。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我国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大约增加三十多亿元。扣除小量的储备和每年人口增长所消费的部分，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左右。这些数字表明每年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消费资料供应紧张、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因此，六万万人民生活的水平只能在本国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不可能要求太快。有些人不从我国上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为一进入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马上就能够有很大的提高，而不懂得必须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建设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道理。过去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向全国人民说明得不够，宣传得不够，这是有缺点的。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天天埋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口口声声称道美国生活方式，他们是在幻想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过那极少数剥削者的生活。

有人说，现在工农的生活太悬殊了。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呢？应该承认，工农的生活是有差别的。但是，当我们把工农的生活加以比较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工农生活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在旧中国的农村，广大的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目前我国农民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这一类人还需要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帮助。全国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七十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三百元左右。这里所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不仅包括农民从生产合作社分配到的收入，同时也包括农民个人经营的农业生产的收入。当然，全国各地农民的收入是不平衡的，贫瘠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低，富庶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高。一九五六年职工全年的平均工资是六百一十元，比农民一家人的全年平均收入高一倍多。如果只从收入的货币数字比较，似乎工农生活确是很悬殊。但是，如果将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估计在内，情况就不同了。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从全国来看，大约每人每月的平均开支只需要五元，在城市维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却需要十元。因此，我们认为，工农生活水平虽然有差别，但是并不过分悬殊，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因而在工农生活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也是应该的。在过去几次工资改革中，我们对于壮工、杂工、学徒工和一部分临时工的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农民对这部分职工的工资过高表示不满意，也是有理由的，但是，这同那种故意夸大工农生活悬殊，借以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的恶意攻击，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今后对于这部分职工的工资标准，必须因地制

宜地结合当地农民生活情况，分别加以规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体上保持平衡。我们还应该向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工业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工业的原料和工业产品的市场，职工生活消费资料的供应，很大部分依靠农业的增产和农民的支援。在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不能很快提高的情况下，工人对于生活的改善也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

有人说，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悬殊太大了。如果这个意见是指目前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工农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因而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不宜差别太大，那么，这个意见是对的。如果这个意见是指不同性质的劳动不应该在待遇上有一个合理的差别，那就不对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所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取消这种差别，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悬殊太大，又要反对平均主义。在去年工资改革的时候和工资改革以后，为着适当地缩小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工资差距，国家对于企业领导人员和国家机关高级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曾经先后采取了控制或者降低的措施。今后对于高级工作人员在工资方面、在住房和医疗等方面以及供给制残余的不合理现象，将继续采取措施，逐步地加以调整和解决。至于有人故意夸大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待遇上的悬殊，甚至把领导人员说成是"剥削者"，如果他们不是极端幼稚无知的话，那便是别有用心了。

下面我想对于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学徒制度、人民文化生活等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劳动就业问题

解放以来，经过逐年的努力，如前所说，全国职工增加了一千三百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招聘工作，去年进行了登记，今后将按照他们的学识专长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分年逐步地加以安排。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安定了，社会的医药卫生工作加强了，社会救济和职工福利的事业发展了，因而人口的增殖率有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的工业还很落后，国家机关和工业企业的职工已经增加过多，今后每年只能根据生产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吸收必要的人员。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劳动就业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参加农业劳动。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也将是劳动就业的一个辅助方面。最近上海、江苏、广东等地方劳动部门因地制宜地积极帮助将近一万多失业人员参加了手工业、服务性行业和各种社会辅助劳动，这是一个好经验。今后还应该提倡由社会团体和群众自己想出各种办法，扩大就业范围，协助国家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也应该发挥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力量，提倡社会团体和群众之间的互助，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最近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所介绍的各种群众性的互助互济办法，是有成效的，应该提倡和推广。

关于工资制度问题

工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它体现着工人阶级内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各类人员之间的关系，也体现着工农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需要合理的安排，而旧的不平衡和

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这就必须不断地加以调整和解决。

解放初，我们国家的工资制度是十分混乱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是轻重倒置、高低悬殊、极不合理的，它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反映了旧中国各派经济集团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同时，许多老干部和工作人员还实行着老解放区的供给制度。工资制度上的这种混乱状态对于统一的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事业是完全不相适应的。经过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几次的工资制度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地建立了大体上适合我国情况的工资制度。但是，它还很不完善。在工资等级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学徒制度、津贴制度、奖励制度方面，在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福利费等等职工福利待遇的规定方面，都还有不切合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需要我们继续加以改进。在工资改革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工资工作经验的时候，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够，对待中国原有的工资制度中有用的经验，还缺乏慎重的研究，甚至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关于学徒制度问题

对于解放前的学徒制度，它的封建性的陋规是应该否定的，但是，关于学徒学习的期限、学习的内容、学徒的待遇以及酬师制度等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却应该慎重地加以研究和吸取。现在所实行的短期技工训练班和短期培训学徒的办法，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并且加以改革。经验证明，短期培训出来的技术工人，大都技术知识很窄，缺乏多方面的独立的作业能力。同时，由于学徒期间待遇过高，学习期满后升级太快，升级考试制度不合理，因而容易造成青年工人忽视生产实践经验的倾向，甚至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间滋长着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把掌握生产技术知识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尊重老工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刻苦钻研得来的技术经验，不虚心向老工人请教学习，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新老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师徒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必须耐心地教育青年工人，使他们懂得，多方面的熟练的生产技术绝不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间能够学到的，必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间，经过不断的勤学苦练才能够逐步地掌握。老工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他们的技术经验是丰富的宝贵的，而且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也是丰富的。他们曾经长期在旧社会里过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生活，他们也亲身体验了新社会的平等的幸福的生活，因而他们最懂得应该怎样珍贵和保护革命的胜利成果。青年工人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但是，他们还年青，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还很少，因此，向老工人学习，在生产实践中锻炼，是今后青年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和生产技术知识的主要方法。同样，在农民中，也应该教育青年农民尊重老农，虚心学习老农的生产经验和政治经验。在知识分子中，应该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科学家、老教育家、老工程师、老医生、老作家、老艺术家，虚心地学习他们多少年来经过刻苦钻研所积累的学识和经验。

关于人民的文化生活问题

我们国家的文化水平是落后的，文盲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解放以后，我们就积极地推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在校的小学学生已经从一九四九年的二千四百多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六千三百多万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扫除文盲二千二百多万人。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七年，国家用于普及教育的经费将近四十九亿元，占全部文教经费的百分之二十四强，占全部普通教育经费的百分之五十四强。这样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但

是，仍然不能满足学龄儿童按时入学的要求。除了国家办学以外，我们应该积极提倡集体办学，个人办学，充分地发挥社会集团和群众的力量，以补充国家力量的不足。过去在扫盲工作上，有过忽起忽落的毛病，在小学和幼儿教育上，有过部分待遇过高的错误。这些，现在都在改进中。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后我们应该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国家只能集中地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对于大量的各种文化艺术事业，应该提倡文化艺术工作者自力经营。经验证明，过去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的想法和办法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在广大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业余的文艺和体育活动。国家举办、自力经营、群众业余这三个方面的文艺和体育活动队伍，应该通过实践相互学习和提高，以逐步地满足人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改善人民的卫生保健状况和防治疾病方面，我们这几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的医药卫生队伍已经迅速扩大，城乡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几种对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例如鼠疫、霍乱、天花等，已经能够基本上加以控制。但是，卫生部门在领导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方面，还有时紧时松的毛病；在医疗制度方面，还有许多不合理和不便于群众的地方；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今后应该坚决克服上述这些缺点，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彻底改善卫生医药工作，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劳动者都能够共同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这是多少年来我国劳动人民所向往的伟大理想。但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文化还落后，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要使我们国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的人民能够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场长期的艰巨斗争。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是几年而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地提倡勤俭朴素作风，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我们的老一代人，要教育年青的一代，使他们懂得美好的生活是必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创造的。

四 关于国家基本制度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这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里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就是宪法规定的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我们的国家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国家制度，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后还必须依靠这种国家制度，才能保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对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任何动摇都是不能容许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国家制度的一切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而不需要任何改进和发展了。恰恰相反，这种改进和发展是经常需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各种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不能不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制度中有所反映。毫无疑问，这些旧生产关系的残余是一定要一天天消亡下去，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定要一天天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运用方法，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同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很短，我们的经验

还很不够，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才能使我们国家基本制度本身更加键全和完善起来。

至于根据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所制定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形式，更是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的。例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解放初期为了工作的便利，建立了大区军政委员会或者行政委员会。到了一九五四年，为了适应在计划经济下加强统一管理的需要，我们撤销了大区军政委员会。近两年来，为了纠正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统得过严的缺点，我们又研究了体制问题，现在政府正准备适当地扩大地方权力，以便在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有这些改变，显然是必需的，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各方面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必须随着客观情况而不断改进，否则，就不能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甚至起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我们各方面的制度的确有许多还是不够完备的，有缺点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订的当时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当情况发生变化之后没有及时地加以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订的时候，就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不完全符合于客观情况，甚至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制度上的缺点，是由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经验的时候，没有很好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在现行的各种制度中，凡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应该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有益的意见，分别加以修正、补充或者废除。

我在这里要说一说许多人表示关心的法制问题。我国今天的法制，的确还没有完备，但是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完全无法可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订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如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选举法、婚姻法、兵役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逮捕拘留条例等等。同时政府根据工作需要，还制订了许多单行条例和规章，发布了许多决定和指示，这些在实际上都起了法律的作用。在国家建立之初，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例如民法、刑法，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没有完全确立以前，是难以制订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颁布暂行条例、决定、指示等等来作为共同遵守的工作规范，是必要的，适当的。只有在这些条例、决定、指示行之有效的基础上，才可以总结经验，制订长期适用的法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在初期也是不完备的，也是经过很长时期才逐渐制订出来的。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国家在各方面工作的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经验，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在整理过去已有法规的同时，制订社会主义的各种法律，例如刑法已经有了初步草案，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在由有关方面草拟中。

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他们企图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的办法来诋毁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这些破坏性

的言论加上各种伪装，企图迷惑那些还看不清楚他们面目的人。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当然不能同善意的批评相提并论。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健全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所欢迎的。而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

我们的国家有民主和专政两方面的职能。有人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专政这方面的任务就已经没有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仍然在伺机而动。在原来的剥削阶级分子中，也还有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人。此外，在社会上还有一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犯、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尤其不要忘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经常对我们进行武装挑衅，并且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来进行破坏活动和颠复活动。因此，我们决不能削弱我们国家的专政的职能，我们必须改进专政机构的工作，继续巩固国防，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根据我国的宪法，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种权利日益扩大并且日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才能享受自由，而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的。与此相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保证了广大人民行使宪法上所给予的自由权利，而对于那些少数反革命分子，必须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右派分子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自由权利太少了，好像是对于反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国家都要给予便利和保证，才叫做有了自由。显然，人民是不会同意给予这种自由的。

右派分子还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认为，只有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才是最民主的。其实，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了所谓普遍、直接的选举，但是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用各种方法特别是金钱和行政手段控制选举，来保障他们的统治地位。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选举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目前我国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在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这种选举制度是适合于我国当前情况的较好的民主形式。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在县以上的各级也实行直接选举。在进行选举的时候，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提出联合的候选人名单，事实证明这是适当的。至于候选人的名额问题，过去在联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候选人数和当选名额相等，这是各方面协商的结果。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作法，也仍然要经由各方面协商决定。总之，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是为了真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而不是用虚伪的形式欺骗人民，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选举是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一个方面，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还有更丰富内容。宪法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国家机关就是根据这种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进行工作的。许多重要的法律，在制订过程中，都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国家的经济计划，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控制指标或者草案交给基层生产单位的广大群众讨论，然后加以确定；为了发动广大职工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和对企业行政领导工作进行监督，我们在企业中正在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也根据民主办社的原则，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务委员会。我国公

民，经常通过人民代表、监察机关、人民团体、报纸刊物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也常常直接用来信来访的形式向各级领导机关申述意见。我们的国家机关，正是通过这些办法，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政府领导机关对待人民批评、建议、来访和来信的工作还做得不很好，我们应该迅速加以纠正，并且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十分重视这种工作。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也是我国民主生活的一个显著的表现。发动群众来公开揭发和批评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工作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加以克服，这是任何号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会做，而且也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应该指出，在我们国家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中还存在着，甚至是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习气。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旧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还经常在侵蚀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干部；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他们行使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还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就有可能滋长起来。同时，我们国家的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点，例如机构庞大，层次过多，有些事权过于集中等等，也助长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习气的存在，妨碍着我们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的联系，给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失。我们必须继续扩大民主，依靠群众的监督，不断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们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把广泛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互相结合起来。我们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我们之所以要有广泛的民主，是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不可能使全国人民在一个共同的方向、统一的计划下进行有组织的共同斗争，也就不可能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是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动而有所不同的。大家知道，过去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我们对于民主和集中这两方面比较着重于集中，但是，即使在战争和革命的时期，集中仍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民主。近两年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经济管理工作上，民主的扩大都是很明显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因为民主的扩大而根本否定集中的领导。小资产阶级从他们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出发，常常向往于所谓"绝对民主"，也就是不要集中领导的民主。这种"绝对民主"只能使人民陷入散漫的、无组织的状况中，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特别喜欢这种"绝对民主"的观念，企图利用这种观念来涣散劳动人民的意志，瓦解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为了击败右派分子的阴谋，我们必须坚决地保卫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度，不让那些所谓"绝对民主"的观念来侵蚀我们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宪法明文肯定了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就是要领导全中国人民建成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中国人民历来所憧憬的大同世界。难道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别的党派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这样伟大的理想吗？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广大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够

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新的生活。北京工人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这是对于这种"党天下"的叫嚣的最好的回答。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也就是把共产党当成一个脱离群众与群众对立的宗派，所以有些右派分子又说，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根子，这是完全违反事实的谰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又主动地提出了愿意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它的最终目的又是要实现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使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趋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党同宗派主义是绝不相容的。共产党总是教育党员要时时刻刻注意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绝不容许党员用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外人士。中国人民大众之所以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因为他们根据事实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工农联盟是基本力量，但是同时必须团结其他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阶层。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具体表现。有了这样的统一战线，就能够更好地联系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使国家能够及时地采取适当措施来调节他们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通过团结在这样的统一战路之内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共产党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作用和目的就在这里。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然还要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任何怀疑统一战线政策的意义，低估统一战线的作用，轻视统一战路工作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但是，必须肯定，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

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和制定的，而在执行这些方针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这种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办法，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正是表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两党或者多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只是资产阶级各派集团欺骗劳动人民的虚假民主罢了。现在有些右派分子所梦想的，就是要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和"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办法，搬到中国来代替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

一九五四年我受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组织政府的时候，就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提出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的，当时共产党以外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的成员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后来增加政府成员的时候，大致也是根据了这个比例。这种安排是根据当时情况确定的，现在看来也是适当的。

要保证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

坚强的核心领导。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相反的，许多专门业务工作应该由专家负责。这里所说的专家，自然也包括共产党员专家在内。至于体现共产党领导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因时因事有所不同，以求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使领导和被领导、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都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更好地合作共事。许多人在这方面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是应该仔细研究的。但是，右派分子提出的“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组织”、“党不要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请共产党下台”等等狂妄要求，却与前面说过的“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各党派轮流执政”等等谬论同出一辙，互相呼应，目的都是要使人民政权脱离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以便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

有些人批评现在有党政不分的现象，对这个问题要加以分析。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有些带有政治号召和政策指示性质的决定或者带有群众运动性质、需要党政一齐动手的工作指示，由同级党政机关联合发布；有些工作的检查，由相应的党政机关联合进行；有些政府机关的会议邀请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对于推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今后还应该续继采用。但是，在某些机关中，共产党的组织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或者对于某些具体业务不通过行政而直接干预，这些现象对于政府工作和对于党的工作都是不适当的，应该加以纠正。

有人提出在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中非共产党员的负责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如果对这个问题加以具体分析，便可以看出存在有各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合作得很好，彼此之间无墙无沟；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对非共产党人士的职权不够尊重，甚至对他们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第三种情况，是有些非共产党人士，对自己的职务尽责不够，并且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采取疏远和猜疑的态度，而有关的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对他们的接近和帮助也往往不够。后两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积极加以克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共产党的组织要教育自己的党员，切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克服宗派主义思想，善于在工作中尊重、团结和帮助党外人士，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学习他们的专长和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改进工作。对于某些影响团结、增加隔阂的工作制度，应该加以改变。同时，非共产党人士也应该勇于尽职尽责，消除对于工农干部的抵触情绪，消除对于共产党员的猜疑隔阂，开诚相见，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随时提出批评和建议，并且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以期达到双方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目的。在非共产党人士中有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还抱着对立的情绪，他们尤其需要努力改造自己，清除这种对立情绪。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同时也就是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的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于这些错误的思想和作风的任何积极的批评，那怕态度有些偏激，内容不够全面，所根据的个别事实还有出入，我们都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加以考虑，采纳其中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些右派分子硬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在指责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的毛病和缺点的时候，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相提并论，这些谬论必须加以驳斥。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国家机关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

的工具。这种国家机关是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在这种国主机关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是不可克服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而且能够吸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相容的。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就是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的保证。

五　关于国内外团结

各位代表，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人民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稳步前进；人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步地提高；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国家制度正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着巩固和推动的作用。我们究竟是依靠了什么力量，才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呢？就国内来说，我们是依靠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就国外来说，我们是依靠了我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依靠了我国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比过去更艰巨、更伟大的任务。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批判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继续肃清公开的和暗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在国外，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大团结，孤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和平共处。

谈到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问题，首先应该说明人民的界限。在现阶段，人民是指拥护社会主义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的爱国人士，也就是说按照宪法享有公民权的一切人。同社会主义对抗、同人民对立的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反动的势力和集团，和目前还在受着管制和劳动改造的分子。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敌我之间的矛盾虽然还存在，但是国内的敌人却大大减少了，这就使得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正是因为这样，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特别指示我们要善于分辨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并且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办法。但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没有互相转化的可能的。目前还在管制中的分子，经过劳动改造重新做人以后，可以取得公民权，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而目前属于人民内部的一些人或者某种集团，如果他们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就有可能从人民方面转化到人民的敌人方面去。

处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人民内部，一部分人对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暂时感到不习惯，另外一部分人甚至会感到严重的抵触。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在思想和立场上常常表现出进步、中间和落后的不同状态，常常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分化。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而不是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工人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这也就包含着改造其他阶级分子的立场和思想，使他们能够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右派分子一旦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们本身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巩固团结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不断地通过两方面的斗争来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严肃认真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另一方面要彻底批判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们国家基本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破坏国内外团结的言论，使得在这些最根本问题上的是非更加明确起来．我们相信，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真正爱国的，是愿意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政府对本身工作的检查，都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到不断的解决，使工作中的错误得到纠正．那些企图利用我们人民内部矛盾和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在我们人民内部挑拨是非、企图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相反地，这个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有了国内的团结，我们就更有力量巩固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巩固我们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

一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经常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但是，不断壮大的和平力量终于推动着国际形势在总的方面朝着有利于全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战争的方向发展．

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曾经企图在匈牙利打开缺口，然后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个击破．但是，匈牙利人民击退了帝国主义者的进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了深刻有益的教训．结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不久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捷、波两国总理对我国的访问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员之间一系列的互相访问，都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际团结，是任何挑拨离间所不能破坏的．

一年来，苏联对于重大国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合理建议，例如关于裁军、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停止试验核武器、取消在外国的军事基地和撤走在外国的武装部队、举行大国首脑会议等等建议，也推动了国际局势走向和缓．为了维护中近东的和平，苏联还提出了各大国保证中近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它们内政的建议．苏联的这些建议，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主张．这充分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会侵犯别人，也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侵犯我们，我们坚决主张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英勇的埃及人民击退英法侵略、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新的高涨．这一斗争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一年来，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埃及、叙利亚等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争取独立自由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一些，都是促使国际形势趋向和缓的重要因素．但是，美国却利用英法被削弱的

形势，竭力夺取英法在中近东、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加强对当地人民的奴役和压迫。这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由于这个政策带有更大的欺骗性，由于某些国家的人民还缺乏斗争的经验，美国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在某些国家，例如在约旦，一时得逞，使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遭到暂时的挫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正像任何人民运动一样，是不可能镇压下去的。美国越来越露骨的干涉和越来越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一定会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加觉醒，更加清楚地认识美国殖民主义的真面目。在差不多所有被美国控制的国家里，要求摆脱美国控制、采取和平中立政策、反对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证明了这一点。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一定要胜利的斗争。每一次挫折和每一个困难都会教育各国人民，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能够终于找到把斗争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美国侵略者严密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台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反美运动，而这次反美运动又正是发生在美国在台湾建立了导弹基地以后。现在美国又片面地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准备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美国这样作，一方面是为了继续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镇压南朝鲜人民，加强在南朝鲜的殖民统治。这就说明，美国正在步老殖民主义的后尘，不得不日益依靠刺刀来维持它的新殖民主义。可以肯定，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绝不会比老殖民主义有更好的下场。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召开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的建议，强烈谴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片面行动。

美国夺取它的同盟国家的殖民利益和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引起了这些国家对美国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在美国的主要同盟国家中，争取摆脱美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控制，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和解、进行互利的来往的趋势正在一天天发展。同时，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展开了规模日益宏大的和平运动，这就充分表示美国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警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团结，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队伍日益扩大，由于美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的增长和美国侵略集团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斗争，我们就有可能推动国际局势继续走向和缓，并且迫使帝国主义战争集团接受和平共处的原则。

各位代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是有利的。我国人民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指示，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胜利斗争，达到更巩固的团结。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加强国内外团结，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6月27日《人民日报》）

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李　先　念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提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一　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

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收入29,754,444,000元，为预算的100.4%。其中，本年收入28,743,406,000元，为预算的100.42%；上年结余收入1,011,038,000元，为预算的100%。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总支出30,574,138,000元，为预算的102.66%。将一九五六年同一九五五年作比较，剔除不可比的部分，即在收入中剔除这两年的上年结余收入和国外借款收入，在总支出中剔除一九五五年决算时用结余拨付的银行信贷资金和地方预算周转金，则一九五六年收入实际增长15.82%，支出实际增长17.99%。

一九五六年收支相抵，当年支出大于当年收入1,830,732,000元。除去使用了一九五六年预算所列的上年结余收入1,011,038,000元以外，预算赤字为819,694,000元。为了弥补这个赤字，中央财政动用了一九五四年决算时在银行存储备用的结余款项504,396,000元，地方财政动用了以前年度中央拨给地方作为周转之用的结余款项134,999,000元，其余180,299,000元是从银行透支解决的。

这里所说的收支数字，是按照已经降低的重工业产品内部调拨价格换算出来的。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曾经说到，一九五六年要降低国营工业主要生产资料产品的内部调拨价格，国家预算收支数字须要在执行中加以换算和调整。这个报告里所用的数字，除了同以前年度作比较的地方，仍然按照原来的老价数字计算以外，都是重工业品降低调拨价格以后经过换算的新价数字。

一九五六年各类收入完成的情况如下：

（一）各项税收共收到14,088,299,000元，为预算的101.94%。其中，工商税10,098,366,000元，为预算的102.94%；农业税2,965,401,000元，为预算的98.19%。

（二）企业和事业收入共收到13,426,398,000元，为预算的100.34%。其中，工业各部门收入5,446,319,000元，为预算的96.12%；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收入2,131,733,000元，为预算的101.92%；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部门收入4,413,872,000元，为预算的

103.35%。

（三）债务收入共收到723,954,000元，为预算的97.54%。其中，公债收入606,535,000元，为预算的101.09%；国外借款收入117,419,000元，为预算的82.55%。

（四）其它收入共收到504,755,000元，为预算的74.08%。

一九五六年各类收入同一九五五年相比，各项税收增加11.95%，企业和事业收入增加25.58%，债务收入（不计算国外借款收入）减少2.06%，其他收入减少42.04%。

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收入比上年有不小的增长，主要收入项目一般是完成得较好的。完成较好的原因：第一，一九五五年农业大丰收，为一九五六年轻工业生产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原料，城乡经济都比较活跃，增加了财政收入。第二，一九五六年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扩大了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国家各方面的支出，这样，虽然引来若干紧张情况，但是也增加了当年的税收和企业利润。第三，一九五六年许多轻工业品的产量增加很多，从国外进口的高级消费品也较往年为多。这些轻工业品和高级消费品，有的税率较高，也为国家多提供了一部分财政收入。

一九五六年也有一些项目没有完成预算所规定的收入。农业税因为去年夏季部分地区小麦受灾，产量减少，质量降低，减少了收入。工业收入因为有的部门增加人员过多，工资增长也有一部分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加大了成本，减少了利润，再加上工作中还有其他一些缺点，因而没有全部完成利润上缴任务。国外借款收入因为是根据拨付的物资结算的，一九五六年这些物资没有按计划全部运到，或者运到较晚，没有在年内办理结算，所以没有完成预算收入。其他收入也没有完成，主要是因为各种零星收入如清仓物资变价收入、公产出租收入、契税收入、罚款收入等，都较前减少了。

一九五六年各类支出的情况如下：

（一）经济建设费共支出15,915,132,000元，为预算的104.09%。其中，工业支出8,827,508,000元，为预算的110.94%；农业、林业、水利等支出2,284,422,000元，为预算的105.36%；铁道、交通、邮电等支出2,782,181,000元，为预算的101.07%；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支出939,796,000元，为预算的110.51%。

（二）社会文教费共支出4,595,904,000元，为预算的118.27%。其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支出4,020,779,000元，为预算的115.67%；抚恤、社会救济等支出575,125,000元，为预算的140.34%。

（三）国防支出6,116,569,000元，为预算的102.34%。

（四）行政管理支出（包括公安、司法、检察费）2,659,641,000元，为预算的110.32%。

（五）债务支出721，890,000元，为预算的96.3%。

（六）对外援助支出404，002，000元，为预算的91.9%。

（七）其他支出161,000,000元，为预算的67.28%。

一九五六年各类支出同一九五五年相比，经济建设支出增加22.81%，社会文教支出增加39.82%，国防支出减少5.9%，行政管理支出增加29.6%，债务支出增加10.08%，对外援助支出增加2.76%，其他支出增加60.6%。一九五六年支出中，用于各类基本建设的投资共为13,986,000,000元，占决算总支出的45.74%，比上年增长62%。

一九五六年国家各类支出中，除了债务支出、对外援助支出和其他支出三类没有用完预

算所规定的数额以外，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等主要项目都超过了预算。超过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一九五六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在有关防汛、排水、堵口、复堤、救济和修复等方面增加了开支；由于灾荒的影响和实际执行中有困难，原来决定由地方在农业税附加中自行解决的一半小学教育经费，也改由国家预算拨款补助了一部分。

第二，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各方面的积极性很高，许多事业计划原来就订得不小，在执行中间又超过了计划，增大了支出。

第三，一九五六年企业、事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增长的幅度，部分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特别是人员的增加超过计划更多，除了影响企业部门的上缴利润以外，还增大了各种事业费和行政管理支出。

第四，一九五六年降低了国营工业主要生产资料产品的内部调拨价格以后，按照规定，应当相应地减少这些产品生产部门的收入，同时减少这些产品使用部门的支出。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有一部分支出没有完全核减下来，以致发生亏损1.46亿元。前面所说的一九五六年赤字8.19亿元之内，是包括着这笔数字的。

第五，一九五六年在预算管理的某些方面也控制较松，追加了一些不急需或者不很必要的开支。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保证了建设事业的资金供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建设事业获得了极其巨大的胜利。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年度的增长速度。在这一年，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厂、矿山和水利工程，已经投入生产或者开始使用，更多的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已经开始施工或者继续施工。许多我国从来不能制造的重要的现代工业产品，已经从我们自己的工厂里开始制造出来了。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的部分就有139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全部工业产值108亿元还多。一九五六年农业生产虽然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虽然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建立，组织和领导生产的经验不够，但是，粮食的产量仍然超过了一九五五年，除了棉花、油菜籽等少数农作物的产量低于一九五五年以外，其他许多农作物的产量仍然保持或者超过了一九五五年的产量。一九五六年，国家和农民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全国增加灌溉面积一亿多亩，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以前我国原有全部灌溉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绝大部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或者组织成为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我国生产关系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途。

一九五六年，我国就业职工人数增加了230万人，企业职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平均增长了14%左右。在农村中，除了灾区和个别工作较差的地区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多数社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一九五六年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九五六年我国各族、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生产情绪空前高涨。广大的职工、农民、军队官兵、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运动在各行各业中相继开展，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一批又一批地涌现出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充满着信心和热望。在我国帮助工作的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专家们，也充分表现了国际主义精神，提供了辛勤忘我的劳动。

一九五六年我国经济、文化工作各个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无可怀疑的。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广大群众建设热情的空前高涨，是国家预算收支能够有较大增长的可靠基础；而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又是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九五六年国家财政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正视的。现在，就几个重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一九五六年预算执行的结果，支出大于收入，出现了赤字。从预算本身的收支数字来看，赤字为819,694,000元；从当年收入和当年支出的数字来看，支出大于收入1,830,732,000元。根据历年的情况，每年预算执行的结果，都是当年收入大于当年支出，有一定的结余。国家将这些结余拨给银行或者存入银行，增加银行的信贷资金，以解决各企业部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经济单位增加贷款的需要。一九五六年年初编制预算的时候，由于对社会主义高潮下的新情况估计不足，仍然根据过去的经验，在预算收入中列了一笔上年结余。这样，一开始就把预算的底子打大了一些，而在预算执行当中，又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先后追加了一些支出，以致执行的结果，收入虽然有所超过，但支出超过较多，不仅动用了原列的上年结余，而且出现了赤字，要从银行动用财政的历年结余存款和从银行透支。

（二）一方面，财政上从银行动用了历年结余款项，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部分款项，因而增大了银行的支出；另一方面，银行本身发放的贷款不但不能缩减，而且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原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1.2亿元，结果增加了20.3亿元（包括救灾贷款在内）；原计划增加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贷款2.9亿元，结果增加了9.4亿元。在银行信贷收入方面，由于商业部门一九五六年销货较多，归还了一部分贷款，城市人民储蓄也超过了计划，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整个说来，银行存款收入增加得少，贷款支出增加得多，收支相抵还有相当大的差额。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国家相应地增加了货币的发行，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同一九五五年底比较，一九五六年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6.9亿元（一九五七年五月底统计，已经回笼了9.7亿元）。当然，从一九五六年的经济情况看，货币流通量也是需要增加一部分的。因为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发展了，商品流通扩大了，原有的市场货币流通量已经不足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过去农民是以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为储存手段的，现在这些农副产品主要由农业合作社集体出售了，农民储存的货币就比过去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也应当有相应的增加。因此，一九五六年增加了的货币流通量，分析起来，一部分是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扩大所正常需要的；一部分是农村经济情况变化以后农民储存所需要的；只有一小部分在一个时候是超过正常需要的。

(三)财政支出和银行发放的贷款都是要购买物资的。财政收支发生赤字和银行存款放款发生差额，就会引起若干商品供应的紧张和国家商品物资库存的减少。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一九五六年国家商品物资库存总值比上年减少了约20亿元。商业部门多卖出了这些物资，基本上保证了主要物资的供应，同时也向银行归还了一部分贷款，抵销了银行的一部分信贷支出。应当说，在一九五六年的具体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

胜利进行，动用一部分库存物资，以支持财政支出和贷款的发放，是完全必要的。在我国，仅商业各部门就经常保有200—300亿元的周转和库存物资，动用20亿元的物资并不会影响大局，今后主要物资的供应还是有保证的。

综合上述各点来看，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收支都发生了差额，结果，就使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些，商品物资库存减少了一些。一九五六年国家究竟多用了多少钱呢？前面所举的几个数字是有交错重复的。我们研究，大约多用了20多亿元，即：商品物资库存减少的部分，加上货币流通量超过正常需要的部分，就是多用了的数字。

总的说来，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和信贷的支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有一部分是用得多了或者用得不适当。一九五六年各方面工作的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只是部分的。从财政工作来说，成绩也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工作，作这样的估价是不是恰当呢？我们认为是恰当的。我们还不能忘记，一九五六年建设事业的巨大进展是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国家为了领导人民战胜灾荒，先后拨款5.76亿元（包括有关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和修复等费用）；发放救灾贷款2.8亿元；并且从全国各地向灾区调集了大量的粮食。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底，国家对受灾省区供应的粮食，同上一个粮食年度比较，增加70亿斤。这样，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除了工作中发生了缺点和错误的个别地方以外，灾区粮食供应未断，国家供应的粮食价格不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解放以前的几次大灾荒中，灾区物价狂涨、生产停顿、无数灾民流离失所、饿死冻死，而剥削者侵夺土地、囤积居奇、乘机发财的景况，那么，就丝毫用不着怀疑，如果不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粮食统购统销的正确政策，要平稳地渡过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这样严重的灾荒情况下，要在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更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我们特别不能忘记，一九五六年建设事业的巨大进展是在翻天复地的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取得的。本来，任何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和社会经济的重大改组，通常总不可避免地要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大的波动。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完成这样的大革命，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显著的经济上的波动。正是因为一九五六年的灾荒是平稳渡过的，社会变革是进行得很顺利的，人们就往往忽视这些重要情况，不去足够地估计我们曾经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和取得成绩的。总之，对我们的工作应当有全面的、恰当的、实事求是的估价。不正视缺点，就不能认真地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工作；但是，不足够地估计成绩，就会看不见主流，就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迷失前进的方向。

一九五六年各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是丰富的。从国家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我们取得了这样一条经验，这就是预算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三者都必须平衡，并且相互结合。这就是：

第一，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必须同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结合起来，统一安排。我们国家的资金，是通过国家预算和银行信贷两种方式来进行分配的。国家预算不仅要保证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事业开支的需要，同时还要保证银行发放必要的工商业贷款、农业贷款和其他各种贷款的需要。如果只考虑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不考虑银行增加信贷资金的需要，那么，尽管预算收支平衡了，但从国家整个资金的收支来看，仍然会是不平衡的。

在我国，银行信贷具有怎样一种性质和作用呢？大家知道，在经济事业中，国家拨出基本建设投资，修建了厂房，安装了机器以后，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流动资金，用于购买原料及其他周转的需要，才能进行生产。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经营采购供应业务，也需要

大量的流动资金。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其他集体经济单位和个体经济单位，也都需要一定的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一切企业和经济单位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是分为这样两个部分的：一部分是各企业各经济单位自己掌握使用的资金，就是自有资金；另一部分是需要贷款解决的资金，就是信贷资金，其中主要是用来解决短期周转和季节性周转的资金。这种信贷资金，在我国是由国家银行集中管理和经营，随时贷给各用款单位的。仅有各企业各经济单位自有的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没有这种信贷资金，或者这种信贷资金没有达到社会经济生活所需要的一定数量，就不可能维持社会的正常生产、正常商品流通和正常的经济生活。

为什么银行发放贷款所需要增加的信贷资金，必须由国家预算加以保证呢？这是因为：一、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社会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安排；二、我们必须基本上稳定物价，不允许银行任意发行货币，引起物价波动；三、国民经济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各企业各经济单位对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的需要不断地增加。因此，银行的信贷资金必须逐年有所增加，而且需要有可靠的来源。银行的信贷资金从那里来呢？一个来源是各企业、各经济单位、机关、团体、学校暂时闲置存入银行的资金和城乡人民的储蓄；另一个来源是银行在正常需要的范围内所发行的货币。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银行的信贷资金仅仅依靠这两个来源是不够的。这个不够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信贷收支差额。为了弥补这个差额，使之达到平衡，只能依靠国家预算拨款来解决。因此，银行每年需要由国家增拨的信贷资金，应当看作是国家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投资，应当由国家预算有计划地给予保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必须同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结合起来，统一安排。至于银行如何正确地运用信贷资金、企业如何节约地使用流动资金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预算和信贷的平衡，必须考虑物资供求的平衡。预算的支出和信贷投放，是要用来购买物资的。如果财政收支发生赤字，信贷收支发生差额，最后都要用物资来抵付。因此，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的多少，要根据物资供应的可能情况来决定。如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过少，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周转，影响建设事业的正常发展。如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过多，就会使社会购买力超过物资供应的可能，造成物资供应的紧张情况，甚至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所以说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平衡，必须考虑物资供求的平衡。

一九五六年的经验证明，处理财政问题，不仅要考虑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而且要考虑财政同经济的关系。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如果单从财政来看，赤字8.19亿元，只占整个预算支出的2.68%，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仅仅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算大。但是把预算、信贷、物资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它对于国家库存物资和市场供应所发生的若干影响。一九五六年我们的缺点在那里呢？缺点就在于没有根据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大发展的情况，照顾信贷资金大量增加的需要，没有在国家预算中拨付银行必要的信贷资金，这是一九五六年信贷支出多于收入和商品库存减少的重要原因。一九五六年在财政信贷都有差额的情况下，为什么又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一九五六年我们有历年积存下来的较为充裕的物资，所以尽管供求关系有些紧张，仍然保证了物资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但是一九五六年的货币流通量是增加得多了一些。这些多了的货币，有一部分是要在今年购买物资的。这对今年各项事业的安排有一定的影响，需要我们在今年大力增加生产，节约开支，增加库存物资，而只要我们注意了这样做，暂时的困难是不难克服的。

一九五六年工作中的另一条经验，就是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编制，除了注意当年的预算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的平衡以外，还应当瞻前顾后，注意年度之间的相互衔接，避免过大的起伏。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原料的很大部分来自农业，国家资金来源的很大部分也直接或者间接同农业有关，而农业的收成是不稳定的，丰收和歉收是很难预料的。一旦发生灾荒，就要增加当年的财政支出，减少当年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要减少第二年的工业生产、物资供应和财政收入。同时，我们的国家还处在建设的初期，家底还薄，各种物资的储备较少，今后也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年度之间的发展速度有快有慢，是不可避免的，在特殊情况下，大的起伏也难于避免，要求年度之间的发展速度完全均衡是不合乎实际的。但是，年度之间的起伏过大，特别是在发展速度必须减缓的时候，就会给建设事业和人员的安排，带来若干困难。为了减少这种困难，我们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时候，应当瞻前顾后，注意衔接。这就是说，决定基本建设的规模，不仅要看本年有多少建筑材料；而且要看以后年度可能有多少建筑材料；决定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不仅要看本年有多少原料，而且要看以后年度可能有多少原料；决定商品供应的数量，不仅要看本年有多少商品，而且要看以后年度可能有多少商品。进一步说，建设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供应什么商品，本年多少，以后年度多少，也应当力求符合实际情况的要求。由于我们的国家有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就有可能有计划地照顾年度之间的衔接，自觉地调节年度之间的起伏幅度，尽量避免过大的起伏。在一九五六年，由于前几年财政和物资有些结余，一九五五年农业获得丰收，由于许多新建工程经过前几年的准备，勘察设计已经完成，国外设备大量进口，技术力量已有增强，在这些条件下，将基本建设、工业生产和商品供应的增长速度适当地加快一些是应当的，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看来，由于我们的经验不够，增长的幅度有一部分是过大了。假使一九五六年少增长一点，能够多余出若干原材料和商品物资，对于顺利地安排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是会有帮助的。一九五六年的经验说明，在丰年的时候，应当预计到以后可能的歉收；在有余的时候，应当预计到以后可能发生的不足。这就是说，应当逐步地扩大物资储备，以丰补歉，以有余补不足，保证我们的建设事业顺利地前进，更加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必须平衡，编制计划和预算必须瞻前顾后，这都是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应该努力掌握和适应这种规律。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生动的，我们所说的平衡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客观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农业的丰歉和其他预计不到的情况，都会在经济生活中引起新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因此，计划平衡了，在执行过程中还会出现不平衡。旧的不平衡克服了，还会出现新的不平衡。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加强计划和预算执行的组织工作和检查工作，克服不断发生的不平衡，推动建设事业的前进。

二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安排

为了巩固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一九五七年必须根据财力和物力的条件，适当地安排国家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和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标编制的。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入为29,292,934,000元，同一九五六年当年收入28,743,406,000元比较，增加1.91%；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支出也为29,292,934,000元，同一九五六年决算

30,574,138,000元比较，减少4.19%。收支平衡。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同银行信贷计划是互相结合的。一九五七年银行信贷计划，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计算，支出大于收入6亿元，由国家预算增拨信贷资金6亿元来解决。信贷收支平衡。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入中，各类收入的数字如下

（一）各项税收14,570,209,000元，为上年决算数的103.42%。其中，工商税10,500,000,000元，为上年的103.98%；农业税2,990,209,000元，为上年的100.84%。

（二）企业和事业收入13,668,969,000元，为上年的101.81%。其中，工业各部门收入5,880,785,000元，为上年的107.97%；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收入2,264,692,000元，为上年的106.24%；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部门收入4,101,826,000元，为上年的92.89%。

（三）债务收入623,320,000元，为上年的86.1%。其中，国内公债600,000,000元，为上年的98.92%；国外借款23,320,000元，为上年的19.86%。

（四）其他收入430,436,000元，为上年的85.28%。

为什么一九五七年各项税收和企业事业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增长不多呢？从工农业生产的情况看，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4.5%，农副业总产值将增长4.9%，工业成本也将有所降低，而且增产节约运动正在开展，预算收入似乎应当有相当的增加。但是，由于一九五七年有以下一些情况，就使税收和企业事业收入不能有相应的增长：

第一，工业总产值虽然将有增长，但各种工业产品的比重发生了变化，国家收入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于一九五六年农业生产遭受了灾害，原料不足，有些轻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下降了，有些轻工业品的产量甚至比上年减少了。例如按计划产量，棉纱减产61.1万件，就要减少财政收入3亿多元，估计实际执行中棉纱减产还不只此数。

第二，一九五七年农业产量将有增长，农业税征收额在继续稳定的原则下稍有调整。但是一九五七年秋季征收的粮食，要到一九五八年才能变成现款纳入预算，因此，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所列的农业税收入，还不能相应地增加。一九五七年预算中所列的农业税收入，包括上年秋征公粮的变价款、本年夏征公粮的变价款，还有一小部分本年秋征当中征收的现款。一九五六年秋征，因为灾荒减免较多，减征细粮约20亿斤，合现款1.7亿元，影响了一九五七年农业税收入。

第三，一九五七年开始实行了去年已经确定的提高盐税税率的措施，增加收入1亿元；但是，为了鼓励农民养猪，一九五七年降低了屠宰税的税率，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减少收入1.5亿元。

第四，一九五七年提高了某些高级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增加了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在调整生猪和油菜籽、芝麻等油料的价格当中，收购价格提高得多，销售价格提高得少，减少了一部分财政收入。这部分减少了的收入，远多于提高某些高级消费品价格所能增加的收入。

第五，一九五七年政府向供销合作社征收的所得税将比去年增加；但是，国营商业部门由于上述价格的调整和国外进口商品特别是高级消费品的减少，减少了一部分收入。

第六，一九五七年工业、交通、建筑、商业等部门由于上年增加的人员过多，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一九五七年职工全年的工资都必须按照去年提高了的标准和级别发给，而去年是从四月份或者七月份才开始提高的。这样就增大了企业成本，相对地减少了企业利润。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就使一九五七年税收和利润很难有较大的增加。至于商业、对外贸易等部门的收入所以比一九五六年减少，其原因除了上述有关的因素以外，还由于有些地区已经把过去由商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加工订货的办法，改变为由工业部门向商业部门销售成品的办法，这样，商业部门的收入就要有一部分转到工业部门。虽然这部分转移出去的收入，仍然纳入了国家预算，但预算中所列的商业收入是减少了。

为什么一九五七年债务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呢？因为一九五六年债务收入中，有国外借款收入117,419,000元，而一九五七年债务收入中，国外借款收入只有23,320,000元。这两年的国外借款收入都是过去借款协定中留下来的尾数。开国以来，苏联政府贷给我国的款项，折合人民币共为52.94亿元，其中，一九五二年以前使用的部分21.74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使用的部分31.2亿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建设初期，苏联曾经几次给予我们贷款援助，我们对于这种援助表示衷心感谢。现在，经过几年的时间，应当说，我们已经更有条件依靠国内自己的积累来进行建设了。

一九五七年其他收入的所以减少，是因为各种零星收入减少了。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入虽然比一九五六年增长得很少，但是把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六年两年收入的增长速度平均计算，每年增长10.81%，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认为是不慢的。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各个年度的当年预算收入（为了便于比较，剔除国外借款收入，统按老价计算）：一九五三年213.24亿元，一九五四年253.53亿元，一九五五年255.46亿元，一九五六年295.86亿元，一九五七年预计300.7亿元。五年收入总数预计共为1,318.79亿元，将比五年计划原列国内收入总数1,302.17亿元超过16.62亿元，即超额完成1.28%。（五年计划原列综合财政计划收入1,353.28亿元，其中包括企业提取的大修理基金和企业奖励基金43.87亿元，国外借款收入7.24亿元，扣除这些数字列入预算的国内收入为1,302.17亿元。）如果再加上五年中国外借款收入31.2亿元、一九五二年以前滚存下来的结余收入17.68亿元、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动用地方作为预算周转之用的款项1.47亿元，预计五年收入总数共为1,369.14亿元。

从预算收入的来源分析，五年来各类经济成份的缴款在预算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起了很大的变化。国营经济和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65.4%，一九五七年将上升到79.2%；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民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13.4%，一九五七年将下降到11.2%；公私合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1.2%，一九五七年将上升到7.2%；私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16.9%，一九五七年将下降到1.1%；此外，还有很小的一部分缴款，如规费、契税和一般城市居民购买的公债等，很难区分经济成份，这些缴款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3.1%，一九五七年将为1.3%。国家预算收入来源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也表明我国财政经济的基础是更加巩固了。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支出中，各类支出如下：

（一）经济建设支出13,683,051,000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46.71%，为上年决算数的85.93%。

（二）社会文教支出4,835,216,000元，占预算的16.51%，为上年的105.36%。

（三）国防支出5,523,320,000元，占预算的18.85%，为上年的90.3%。

（四）行政管理支出2,445,314,000元，占预算的8.35%，为上年的91.99%。

（五）债务支出829,004,000元，占预算的2.83%，为上年的114.84%。

（六）对外援助支出507,890,000元，占预算的1.73%，为上年的125.71%。

（七）其他支出275,344,000元，占预算的0.94%，为上年的170.08%。

（八）增拨银行信贷资金600,000,000元，占预算的2.05%。

（九）总预备费593,755,000元，占预算的2.03%。

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支出中，工业支出8,121,256,000元，为上年决算数的90.09%；农业、林业、水利等支出2,044,396,000元，为上年的89.4%；铁道、交通、邮电等支出2,216,442,000元，为上年的80.18%；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支出256,922,000元，为上年的27.21%。

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支出虽然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但是在资金的使用上，根据保证重点、保证急需的原则，作了更加合理的分配。在工业方面，着重保证了冶金、煤炭、电力、化学（包括化学肥料）、建筑材料等原材料工业、动力工业以及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工业的投资；着重保证了那些有原材料、有销路的轻工业的投资；同时对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当中生产设备能力有余或者目前并不急需的投资，作了适当的削减。在农林水利方面，着重注意了兴修小型农田水利、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业技术、防治牲畜疫病等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而短期内又容易收效的支出；减少了一部分可以暂时缓办的大型水利工程和增购拖拉机等方面的支出，削减了一些可以节省的开支。在铁道、交通、邮电方面，着重保证了增建铁路复线、加强现有线路和修建几条铁路新线的支出；减少了由于某些新线工程的推迟而在今年可以减少的支出。在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方面，今年支出削减得较多，只能保证修建十分急需的仓库和加工工厂的需要。

一九五七年建设资金的分配当中，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地安排了轻工业的投资。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轻工业的原料大部分是农副业产品，而农副业产品的增长有一定的限度，从国外进口也有一定的限制，并且，现有的轻工业设备，有的还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这些情况，在安排轻工业投资的时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九五七年农林水利支出总额比去年减少了。减少的原因，除了上述大型水利工程和增购拖拉机的支出有所削减以外，主要是由于去年水灾较大，中途追加了较多的防汛、抢险、堵口、复堤经费。今年这方面的开支减少了。如果扣除这笔数字，今年国家预算中工业支出同农业支出的比例，实际为3.97比1，同一九五六年的4.19比1相比较，农业支出的比例是略有提高的（这里所说的工业支出和农业支出，都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和各种事业费）。此外，一九五七年国家发放的农业贷款，最高发放额将达39亿元，除去到期收回的部分以外，年末余额将由去年年底的30.3亿元增加到33.3亿元。这笔资金只要运用得合理，将对支援农业生产和巩固农业合作化发生重大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社会文教支出中，初等和中等教育支出2,269,330,000元，为上年决算数的112.75%；高等教育支出636,656,000元，为上年的101.64%；科学支出327,142,000元，为上年的133.91%；文化支出172,351,000元，为上年的90.85%；卫生支出469,067,000元，为上年的95.94%；抚恤和救济支出583,404,000元，为上年的102.66%。

一九五七年初等、中等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是增加的。但是因为：第一、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支出中，教职员的工资占着很大的比重。第二、一九五六年各级学校招生较多，这些学生是在下半年入学的，只需要开支半年的教学费用，一九五七年却需要开支全年的教学费用。因此，一九五七年教育事业还只能根据提高质量、稳步发展的原则来安排。在这种情

况下，大中学校招生人数将比去年有若干减少．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在社会上和中小学毕业学生中间进行解释说服工作，提倡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其他可能参加的劳动。同时还要提倡由人民群众自己出钱，集体地或者个体地办学。只要依靠群众，办法是有的．

一九五七年科学研究事业支出和抚恤救济支出也是增加的，只有文化、卫生支出有所减少．文化和卫生事业因为去年有了较大的发展，今年在财力增长较少的情况下，把发展的速度减缓一些是可以的。

今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去年迅速发展的情况来比较，速度虽然减缓了一些，但是由于今年的发展是在去年大大扩展了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事业的规模，仍然有相当的扩大．比如一九五七年各级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同一九五六年比较，还将有不少的增加。高等学校学生将由40万人增加到44万人；中等学校学生将由516万人增加到557万人；小学学生将由6,346万人增加到6,581万人。

一九五七年国防支出比一九五六年作了较大的削减。近年来，我国的国防支出和它在预算中的比例是一再减少的。国防支出的数字，一九五五年为65亿元，一九五六年减为61.17亿元，一九五七年再减为55.23亿元；国防支出在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九五五年为22.1%，一九五六年减为20%，一九五七年再减为18.85%。

一九五七年行政管理支出也比一九五六年有较大的削减。一九五七年行政管理支出中，人员的工资开支比一九五六年仍然是增加的。一九五七年行政管理支出的减少，主要是大大降低了机关公用费标准的结果。一九五七年年初已经适当地降低了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工资．在乡村的基层经济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乡干部，他们的工资去年有些地区提得过高了一些，今年准备由地方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降低一点。这样做，就减少的支出来说，数字不大，但有利于这些人员在生活上更加接近群众，更加便于团结群众，做好工作．

一九五七年债务支出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1亿多元，主要是因为国内公债还本付息的支出比去年增大了．

一九五七年对外援助支出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1亿多元。一九五七年的其他支出包括补发转业军人复员费、民兵业务费、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也有一些增加．

一九五七年增拨银行信贷资金6亿元，这是一九五六年所没有的．这笔资金实际上也是国家预算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它对于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贷款的需要和保证信贷收支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总预备费比一九五六年少列1.9亿元。但是，一九五六年在确定预算的时候，有一部分支出，比如增加工资等约4亿元，已经预定要在总预备费内开支。今年预定要在总预备费内开支的，只有准备调整某些农产品购销价格将发生的亏损大约1亿元．一九五六年预算中列有上年结余收入，今年则相反地在支出中增拨了银行信贷资金．今年预算中所列的物资储备支出和去年预算比较虽然有所减少，但比去年决算中的物资储备支出却增加不少．因此，今年预算的后备力量，实际上是比去年充实一些的．

以上是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中各类支出的主要情况．从各类支出的分配上看，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在国家预算支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了．五年来，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费用和用于国防、行政的费用在国家预算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起了显著的变化．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36.3%，一九五七年下降为27.2%；经济建设支出和社会文教支出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55.9%，一九五七年上升为63.22%．

这说明国防和行政管理费用的降低，使国家有可能将较多的资金用于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其次，从有关人民生活方面的支出来看，一九五七年职工工资标准虽然不拟提高，但是，由于一九五六年增加工资和提升级别是从四月和七月开始的，今年则是按全年计算，这样，绝大部分职工今年全年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比去年增加了。一九五七年农业税负担基本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较多，只要没有较大的灾荒，农民的收入也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一九五七年人民的购买力将比去年继续增长，国家供应的商品总值也将比去年有所增加。有些商品的供应量虽然比去年减少了，但是同一九五五年以前各年比较起来，仍然是增加得不少的。如棉布的供应量（包括各种用布），一九五三年为13,034万匹，一九五四年为12,870万匹，一九五五年为12,885万匹，一九五六年为17,405万匹，一九五七年预计为15,100万匹（一九五七年是按第二期布票折扣供应的数字计算的）。这说明国家在调整建设规模和速度的同时，还是尽可能地注意了有关人民生活方面的需要。最后，从国家预算支出总数来看，五年支出总数将达到1,369.14亿元，比五年计划原列五年预算支出总数1,309.41亿元超过59.73亿元，即超过4.56%。这说明五年的财政支出保证了国家建设资金的需要，情况是良好的。

一九五七年上述国家预算的各类支出数字，是按照各种支出的门类，也就是按照预算所列的支出科目划分的。各类支出数字中，包括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事业费支出和其他方面的支出在内。如果单就基本建设投资来看，一九五七年各类基本建设投资额（包括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方面的基本建设在内）共为111亿元，为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额的79.37%。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历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数字是：一九五三年65.06亿元，一九五四年74.98亿元，一九五五年86.32亿元，一九五六年139.86亿元，一九五七年预计111亿元。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虽然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但如果把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六年两年投资增长的速度平均计算，每年增长27.7%，速度还是不小的。

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在资金分配当中削减了可以不办或者可以缓办的部分，保证了必须保证的项目和开支；在照顾必要的服务性和辅助性建设投资的条件下，削减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增加了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只要执行当中能够努力进一步改善设计和施工，那么，较少的投资，可以发挥较大的效能。国家建设的规模仍然是巨大的，前进的速度仍然是相当快的。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五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将达477.22亿元，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427.44亿元超过49.78亿元，超过11.6%。

上述国家预算的各类支出数字，包括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在内。按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来划分，一九五七年中央预算支出20,732,315,000元，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70.78%，比上年决算数减少4.56%；地方预算支出8,560,619,000元，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29.22%，比上年决算数减少3.28%。一九五七年地方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2,843,025,000元，占地方预算支出总数的32.71%，为上年的86.43%；社会文教支出为3,396,231,000元，占总数的39.07%，为上年的106.13%；行政管理支出为2,078,544,000元，占总数的23.91%，为上年的92.42%；其他支出为124,161,000元；占总数的1.43%，为上年的110.66%；地方预备费为118,658,000元，占总数的1.37%。一九五七年地方预算支出虽然比上年略有减少，但是，中央预算支出减少的比例还要大一些。从五年的情况来看，五年来在国家预算支出总数中，中央预算支出和地方预算支出所占的比例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中央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已经由一九五三年的75.84%，下降为一九五七年的70.78%；地方预

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已经由一九五三年的24.16%，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29.22%。这种比例的变化表明，近年来地方建设事业有了较多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原来由中央各部门管理的事业，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划交地方管理了。今后还将有步骤地继续下放一些企业和事业，这是有利于发挥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效果，从而有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的。

一九五七年地方预算支出中，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预算支出共为937,697,000元，占地方预算支出总数的10.95%。过去几年来，对少数民族地区有照顾不够的地方，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支出在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有所增长的，并且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

以上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支的安排，已经在可能范围内照顾了各部门、各地区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将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并且要在进行建设的同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的国家还穷，能够积累的资金是有限度的。有些同志希望自己的部门和地区多分配一些，使事业能够发展得更快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从一个部门和地区来看，也可能有道理。问题是国家必须兼顾资金积累和人民消费，钱只有这么多，只能权衡轻重缓急，适当加以安排。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收支，从全面来看，可以说是恰当的，也是大体合理的。

一九五七年国家的预算，收入和支出是平衡的，并且注意了预算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的平衡，注意了年度之间的安排，只要在执行当中加强努力，做好工作，不但可以完成，而且有可能做到收多于支。一九五七年预算收入，虽然有上年农业灾歉的影响和其他不利因素，仍然比一九五六年稍有增长；一九五七年预算支出，虽然比一九五六年有若干减少，仍然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认为一九五七年的国家预算是可靠的，也是积极的。

一九五七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这里简要地报告一下一月到五月国家预算收支的情况。一月到五月，国家预算收入共为127.37亿元，完成年度预算草案数的43.48%，相当于去年同期的109.14%；国家预算支出共为107.85亿元，为年度预算草案数的36.82%，相当于去年同期的97.66%。五个月收支相抵，收大于支19.52亿元，而一九五六年同期收大于支6.29亿元。在收入方面，除了某些工业部门利润上缴的情况较差以外，一般完成情况是比较好的。在支出方面，基本建设共拨款47.21亿元，按照原定的计划给予了充分的保证；行政费及其他可以节减的开支，则有了显著的降低。由于收支相抵暂时有了一笔为数不小的余数，已经减少了一部分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部分库存物资，对物资的供应和市场情况，开始发生了有利的影响。所有这些情况说明，几个月来国家预算的收支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农业收成还不能确定，还有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同时，尽管由于机关、团体的公用开支大大减少，有关物资的供求情况有了显著的缓和，但是，人民所需要的若干种日用品的供求情况仍然比较紧张。因此，必须继续兢兢业业，加强工作，不能放松努力。

三　一九五七年工作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家财政是国家各方面经济活动和各方面工作的集中反映。为了保证国家预算的完满实现，不仅要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工作，而且要依靠有关经济工作的加强。现在，我就执行一

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必须普遍深入地全面地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分别作了在全面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也作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开展这一运动的关键，在于使全体经济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重大意义。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扩大社会主义积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方法。我们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尽可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要在进行建设的同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需要有大量的建设资金，需要合理有效地使用财力物力，这只有依靠全国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才能逐步得到解决。一九五七年由于我们要克服各种建设事业在前进当中若干暂时的困难，要进一步缓和部分物资的供应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从各个方面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就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并且，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还有利于改进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使他们更加接近群众，同群众共甘苦，以便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增产节约不应当看作是临时性的措施，而应当看作是国家建设上长期的根本的方针；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情，应当是每一个经济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牢牢记住的格言，一时一刻也不应忘记。

我国人民历来是勤劳朴素的。我们的革命队伍，从来就有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开国以来，我们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继承了这种传统，基本上是以勤俭的精神来建国的。今天的政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能够领导人民勤俭建国的政府。过去几次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都曾经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在建设事业和各方面的工作中，浪费现象还是不少的，还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从一九五七年的情况看，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有没有增产节约的潜力呢？我们认为潜力是很大的，门路是很多的。一九五七年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将有111亿元；工业各部门的生产成本费用仅中央十三个工业部就将有112亿元；商业各部门的商品流转费用将有70多亿元；国家各部门的各种事业费总数将有50亿元（其中经济各部门的勘察设计、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人员培养等事业费20亿元；文化、教育、卫生、社会救济的经费30亿元）；国家机关、军队、团体和企业、事业管理机关的公用开支和管理用费（不包括工资开支）将有37亿元左右（其中办公杂支、会议费、邮电费、差旅费、家具购置费等项公用开支约有20多亿元）。上述各项数字是从几个不同分类的角度来说的，这些数字之间有交错重复的地方。但是从这些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这样巨大的经济活动当中，增加百分之一的收入或者节约百分之一的支出，就是一个可观的数额。问题在于能否把潜力发掘出来。只要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能够改善设计，改进施工的组织和管理，深入动员内部资源，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降低造价；只要在工业生产方面能够根据原料和销路的可能条件，积极增加生产，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只要在商业方面能够合理地调整商业网，减少商品流转环节，克服商品调运中的不合理情况，努力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减少商品损耗；只要国营经济各部门和供销合作社能够在使用流动资金方面减少不必要的积压，节约地使用资金；只要在各种事业费方面能够克服许多事业单位由于人员编制和开支定额缺乏严格管理而造成的某些浪费现象；只要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管理单位能够认真精简机构人员，节约公用开支和管理费

用；只要这样，所有以上任何一个方面的增产节约，都将有重大的意义，都能够为国家积累巨大的财富或者节减大量的开支。关键在于发动和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群众的智慧，发掘潜力，开辟门路。

近几个月来，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在许多地方和许多部门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开始获得了显著的成效。许多事实有力地说明，在基本建设方面，一个工业区内根据可能的条件，统一规划、协作建厂，就可以统一使用人力物力，减少分散重复，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并且加快施工的速度。一个建设单位，适当地调整和改进厂房工程设计，合理地降低辅助性建筑的标准，精打细算，就可以只用较少的投资，达到原定的工程建设要求。许多事实说明，企业单位发动广大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就可以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大大地增加生产。例如煤炭工业部系统，一月到五月原煤的产量超过计划132万吨。冶金工业系统，一月到五月钢材的产量超过计划11万吨。有些企业单位曾经认为经过多次的生产竞赛，已经是"潜力挖尽、生产到顶"了，现在又大大地发掘出新的潜力，突破了原定的计划。几个月来，机关、部队、团体和企业、事业管理机构的公用开支普遍降低了，例如全国行政机关的公用开支标准比去年降低了31%，而行政管理工作和业务活动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风气也正在增长，这是人民群众所欢迎的。所有以上事实有力地说明，只要发动群众，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办更多的事，就可以大大地增加生产，节约开支，为国家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但是应当指出，增产节约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所有部门、所有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已经了解了的。现在，还有少数人员甚至有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员，还怕本部门、本单位降低标准、减少投资吃了亏，还在不加区别地追求高的标准，看不起那些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企业和事业。他们有的还在只图自己方便，不愿意和同一地区其他单位共同协作，互相支持。此外，也还有少数人仍然在讲求排场，追求享受，比生活、比待遇。以上这些作法，不仅浪费国家资财，腐蚀一部分干部的思想，而且会加深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教育。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还应当防止和克服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有些同志认为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已经进行过增产节约运动，今年还是那一套；有的甚至片面地强调过去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生过的缺点，怀疑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意义。我们说，增产节约确实是"旧事重提"，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却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一条平凡浅近的真理。过去的增产节约运动，尽管发生过若干缺点，那些缺点应当作为经验教训，用来改进今后的工作，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夸大缺点，动摇增产节约这一根本的方针。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还要防止和克服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有些同志认为今年的计划所规定的增长速度较低，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于是能多做的不多做了，能做得快的做得慢了，能做得好和省的不去积极争取了。一定要说清楚，在规定全面计划的时候，应当强调把计划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但在具体执行当中，则应当充分地发挥积极性，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所规定的各种指标。用同样的钱，办较多的事，用同样的原材料，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注意产品的数量，同时注意产品的质量和生产安全，依然是一切生产和事业中应当积极努力的目标。正是因为一九五七年调整了建设规模和速度，在具体执行中反对消极松劲的保守思想就更为重要。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广到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单位去。要认真检查这一运动开展的情况，结合整风运动，克服各种思想障碍，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把运动深入下去，并且坚持下去。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快要结束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教训，应当认真地接受这些经验教训，纠正缺点，改进工作，才能使增产节约运动收到更大的效果，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新的胜利。

第二，为了完满地实现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还必须继续稳定市场物价。

在我们的国家里，价格是调节国家积累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杠杆之一，在一定的限度内价格对生产和消费起着影响和调节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说基本上稳定，是因为粮食、布匹、棉花、煤炭等大多数生活必需品和多数工业品都没有涨价，或者基本上没有涨价。就是在去年那样严重的灾荒下，这些商品的价格也还是基本上稳定的。这些主要商品的价格的基本稳定，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并且为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应当承认，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了一些，这些商品是：若干副食品、某些高级消费品、食盐和若干手工业品。这些商品的涨价，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国家为了扩大油料作物的种植和鼓励养猪，提高了菜籽、芝麻等油料和生猪的收购价格，同时也适当地提高了食油和猪肉的销售价格。

（二）为了有助于平衡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并且适当地增加一些财政收入，国家提高了呢绒和高级纸烟的价格，提高了盐税的税率和食盐的销售价格。

（三）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后，自由市场上若干手工业品和小土产品，由于供不应求，有的还由于成本增加，价格提高了。

（四）有些城市由于去年蔬菜生产遭受了自然灾害，由于今年春寒，上市季节推迟，也由于城市人口增加很快，蔬菜产量赶不上需要，因此，蔬菜的价格上涨了，有些地方在缺菜季节上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以上这些价格的变动，可以总括为这样两类：一类是属于国家主动调整的。其中，有的大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增加产品供应，保证价格的稳定；有的是为了在不影响广是人民生活或者对广大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条件下，适当地调节供求关系，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对于这些商品价格的调整，是有计划和经过计算的；调整的幅度和范围是有控制的；调整了价格的商品，在全部商品中只占很小一个部分，大部分并没有变动。国家在有些价格的调整中，固然增加了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在另外一些商品价格的调整中，却减少了财政收入，整个说来，减少的财政收入大于增加的财政收入。另一类物价的变动是自由市场上价格的变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价值规律的支配，某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刺激生产，充裕货源，使价格趋向稳定，有一定的作用。近来自由市场上有些商品上市量已经增多，就说明了这种作用。但也正是由于这样，自由市场上的物价会有一时的一定幅度的摆动，这是早已说过的。总起来说，这个时期许多主要的商品没有涨价，国家对若干商品价格的调整基本上也是必要的；自由市场上若干商品价格的变动是不可免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有积极的一面。观察物价问题，决不能忽视当时的具体条件，试想，在一九五六年灾荒的情况下，假使象旧社会那样听由市场涨落，没有国家的有力掌握和在地区间和季节间作大力的调节，那么，今天的市场物价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由于这个时期若干商品销售价格的上涨，职工的生活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但是，在去年增加工资以后，职工的支付能力也有了不

同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还是有所改善的。农民由于若干农产品提高了收购价格，增加了收入，他们的所得也大于所失。

关于这个时期物价的调整和变动，从工作上来检查，是有缺点的。第一，由于一九五六年人民的购买力增加过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差额，这种差额对商品供求关系所发生的作用，在自由市场上表现得较为明显。第二，由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使用的物资多了，在原材料的分配当中，对于一般为市场服务的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照顾不够，分配较少，使这些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产品数量不足以供应市场的需要。第三，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工作一下子还跟不上去，管理和组织都还不够；手工业合作化的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有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管理费用和公共积累多了一些，特别是自由市场上手工业原料的价格也在上涨，因而增大了成本，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第四，蔬菜品种零星复杂，需要保持鲜嫩，由国家全部经营有困难，但有一个时期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对于蔬菜的生产和供应，确实有注意得不够的地方。这也是某些城市蔬菜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第五，也还有少数商品，价格虽然没有变动，但是由于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有缺点，商品质量降低了，消费者是有意见的。上述几种主要由国家经营的商品的价格，大都是在今年三、四月份调整的，加上这一个时期自由市场上若干手工业品、副食品、小土产品和蔬菜的价格上涨，这样，就容易在人们中间造成一种印象，觉得物价提高了很多。这也是近来各方面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的一个原因。

当前在物价管理上，国家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呢？我们认为应当采取继续稳定物价的方针。对于主要由国家经营的商品，除了个别不合理的以外，一般不再调整商品价格。这样做，是有利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顺利执行的。对于自由市场，国家应当通过必要的经济的方法和行政的方法，加强领导和管理，尽可能地避免价格摆动过大的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在可能范围内增加手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使手工业能够逐步增加生产，降低产品成本，以便适当地稳定手工业品的价格。各城市和工业区的有关部门应当切实注意对蔬菜生产和供应的领导，增加产量，改善供应，并且由国家经营必要数量的蔬菜，以便运用经济力量，积极影响和调节蔬菜价格。当然，某些手工业品的价格，由于今年原料还不充裕，自由市场上手工业原料的价格还高，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还需要逐步积累经验，所以短时期内还难有较大的回落。自由市场上副食品、小土产品和蔬菜的价格，还需要在努力增加生产和适当加强市场管理当中逐步加以稳定，这是要有一定时间的。今后的物价，还会有若干小的摆动，完全没有摆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责任在于控制和调节这种摆动的幅度。关于物价问题，还应当说到，在目前情况下，个别地区，个别商品提高收购价，降低销售价是可能的。但是要求普遍地进一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或者不适当地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做法要增加社会购买力，而这种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又要受消费物资供应的限制。在不能供应更多的消费物资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扩大人民购买力同物资供应之间的差额，影响市场物价，人民还是得不到实际的好处。

第三，为了完满地实现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改进财政制度。

加强财政管理，是帮助企业、事业、基本建设单位和国家行政机关改善组织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实行节约制度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国家推动增产节约、克服因循落后、反对贪污浪费的有力武器之一。一九五六年由于某些方面放松了管理和监督，因而助长了若干资金

分散和浪费的现象，一九五七年应当克服这些缺点，在继续发挥各地方、各部门积极性的同时，加强财政管理，厉行财政监督。

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批准以后，在执行当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必须有所追加和追减的时候，应当坚持这样的原则：追加支出，必须考虑有无资金来源；追减收入，必须考虑相应地减少支出。一九五七年在预算执行当中，应当给予各地方和各主管部门相当的灵活性。在支出指标的范围内，在各个不同项目之间，除了下列限制以外，各地方和各主管部门可以依照规定，进行调剂，机动处理。这些限制是：基本建设支出不能调作一般支出；主要工程的支出，不能调作次要工程的支出；救灾、防汛、修复等费用，不能调作其他无关的支出。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工程的拨款，根据国家的定额和标准进一步核减下来的部分，可以由主管部门另行安排使用。但是基本建设不能挪用生产资金；不能把基本建设费用摊入现有生产的成本，或者用其他减少利润的方法，扩大基本建设的投资。基本建设工程的年终财务结算办法须要研究改进，以便配合计划领导和经营管理的改进，克服年终赶工和下年年初窝工的现象。一九五七年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各种预算收入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地缴入国库；各种预算支出，必须按照事业的进度和工程的进度及时拨款；企业部门的流动资金必须进一步核实，加速资金的周转。目前从国家使用的全部流动资金来说，数目是不算多的，但有些企业流动资金过多，有闲置和浪费的现象。事业单位的各种费用必须进一步核减，并且核实定额，撙节使用。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费用和公用开支，凡是能够和国家机关的开支标准统一起来的，应当按照当地国家机关的开支标准执行。在工资开支方面，国务院已经确定的一九五七年不提高工资标准、一般不提升级别和控制人员增加的规定，应当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国家的农业贷款，基本上应当在计划指标的范围内合理发放，农产品预购定金也应当按照计划加以控制。

应当指出，加强财政管理，厉行财政监督，是为了推动事业的发展，而不是妨碍事业的发展。严格的财政监督和单纯的财政观点是两回事。管理得过严过多，因而限制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性是不对的；放松应有的管理和控制，因而使国家的资金分散和浪费也是不对的。我们的财政工作，检查起来，对于一些大的方面还没有很好地管理起来，而对于若干小的方面却有管得过多过细的现象。这是财政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缺点，今后应当切实地加以改进。

为了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工作，有必要考虑逐步改进有关的财政制度。

财政制度是保证财政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工具。制度规定得合理，就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推动增产节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建设资金的积累。反之，就要影响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我们现行的制度，有的是有缺点的，有的原来适用，现在情况变化了，不适用了。现在看来，有些制度作些必要的修订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另外一些制度，如财政体制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则必须考虑加以改变。

关于财政体制，一年多来已经作了多次的讨论，并且已经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作了一些改进。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必须划分中央财政同地方财政的权限和责任，将目前地方财政基本上由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办法，适当地加以改变，使地方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安排收支，即是：给地方划定收支的范围，使地方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可以根据国家的政策和统一的计划，安排本地区的收支。这样才能使地方在既经划定的范围以内，在事业发展而收入增加的时候可以多支一些；这方面节约了，那方面可以多支；这一年有了结余，下一年可以继续使用；使用得越合理，可以办的事情越多。这样作，就可以将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同地方的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结合起来，使财政工作更好地适应地方的实际情况，并且有利于进一步

发挥地方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

关于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应当考虑改变现行的收入全部上缴、支出全部另行拨款的办法，实行利润分成的办法，适当地扩大企业部门和企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的权限，使企业部门和企业单位能够以分得的一部分收入，解决自己一定的投资和其他必要的开支。这样作，就可以把企业的支出同企业本身的收入结合起来，把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统一领导同每个企业在业务经营上的独立性结合起来，以便发挥企业部门和企业单位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他们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本部门本单位的财务情况，努力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节约开支。

此外，现行的税收制度也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进行必要的修改。关于工商税制，主要的问题是应当改变现行的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的新情况，简化税制，简化纳税手续，以便推动企业更好地加强经济核算，并且使国家的收入更加均衡和及时。关于农业税制，主要的问题是应当改变以户为征收单位和一部分地区实行累进税、另一部分地区实行比例税的办法，采用以农业社为征税单位，并且考虑统一实行比例税制的办法，以适应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

过去的各种制度，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前几年，在财政体制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上，集中管理较多，对于有力地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对于保证国家建设资金的需要，调节各阶层人民的收入，配合社会主义改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问题是情况已经变化了，原来制度中合理的规定，已经不合理了，或者不完全合理了。对于这些制度，近年来我们也曾经作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是现在仅仅这样做已经不够了。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很多方面的重大问题。从去年开始，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已经作了若干研究，拟订了若干个方案，有的正在进一步研究比较，有的准备选点试办，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九五七年或者一九五八年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是一九五七年工作当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各位代表！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反映了我国人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平建设的强烈愿望。这个预算的实现，将要胜利地结束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把国民经济引向新的高涨。在执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我们将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是无往不胜的，是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的。政府决心依靠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实现国家建设计划。希望全国职工、农民、军队官兵、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完满地实现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而奋斗！

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薄　一　波

各位代表：

我谨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一　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

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是在以下的条件下进行的。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成形了我国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一高潮大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要求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一九五五年农业的大丰收，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是近三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中，财力上有了一定的结余，物力上有了一定的储备，技术力量有了一定的成长，基本建设的设计、设备、施工组织都有了较好的准备。一九五六年度的计划，适应了这种新的形势，从而在财政经济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并且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指标，都是很积极的。应该说，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大革命、大建设的高潮中的愿望的。

全国人民对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都很关心。现在，根据对计划执行结果的检查，我们可以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说：一九五六年度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或者超额地完成了。

一九五六年是我国社会制度大变革的一年。在全国组织起来了75.6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全国组织起来了约10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小组，参加的人数达到500多万人，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99.6%和占职工总数99%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82.2%和占从业人员总数85.1%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由于这一伟大的变革，我国就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

盾，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样，在我国实行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的推动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全国工业总产值一九五六年完成了586.6亿元，比上年增长31%，这是近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为291.7亿元，比上年增长41.7%；消费资料的生产为294.9亿元，比上年增长22%。机器制造业的生产为57.6亿元，比上年增长90.2%。手工业的生产为117亿元，比上年增长16%。

按工业总产值计算，已经提前一年并且超额9.5%完成了五年计划（即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下同）。在五年计划所列的46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已经有生铁、钢、钢材、烧碱、纯碱、硝酸铵、青霉素、氯霉素、各种磺胺、汽车外胎、蒸汽锅炉、汽轮机、水轮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金属切削机床、双轮带铧犁、谷类播种机、客车、自行车、机制纸、水泥、棉纱、棉布、麻袋等27种产品的产量，提前一年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我国试制成功的新的工业产品，根据九个工业部的统计，即达1,200多种，其中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15,000瓩的全套水轮发电设备、12,000瓩的汽轮机和汽轮发电机、单轴自动车床、耐高热合金钢等，都是运用了世界上新的技术在我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现在，这些产品不仅已经试制成功，并且已经投入生产了。各工业部门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主要工业设备的利用率，都比上年有了显著的提高。

一九五六年各工业部（不包括森林工业部）所管理的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比上年降低了10.7%，扣除降低调拨价格的因素，比上年降低了7.9%（原计划降低8.4%），没有完成计划。生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约26%（原计划提高18.6%）。应该指出，按生产工人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不能反映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全面情况，因为在工业企业中，除了生产工人以外，还有不少的非直接生产的职工。目前在我国工业业企中的非直接生产职工过多，一般要占生产工人总数的一半左右，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应该逐步改变。工业劳动生产率怎样计算才更合理，我们也正在研究改进办法。

全国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一九五六年完成了582.9亿元，为计划的96%，比上年增长4.9%。一九五六年我国遭受了最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某些农作物受到很大的损失，受灾的农田面积约2.3亿亩，受灾的人口约7,000万人。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在全国农民中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农业增产运动，在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增加农田施肥数量、精耕细作、推广优良品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灾地区的广大农民，同灾荒进行了搏斗，缩小了灾荒所造成的损失，因而使主要农作物的粮食、大豆等的全国总产量，仍然有所增加。一九五六年粮食总产量为3,65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154亿斤，增长4.4%；大豆产量为204.7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亿斤，增长12.2%；棉花产量为2,890万担，比上年减少了147万担，下降4.8%；猪的头数年末达到9,780万头，比上年增加了988万头，增长11.2%。一九五六年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已经接近完成五年计划；粮食的总产量则已经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有很大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完成了139.9亿元，为计划的99.9%，比上年增加了53.6亿元，增长62%。这是解放以来，投资额增长最多的一年，也是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最多的一年。一九五六年和前三年所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累计计算，已经完成五年

计划投资总额的86%左右。这样，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基本建设计划就有充分的保证了。

一九五六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625项，已经全部投入生产的有89项，其中主要的有：煤矿20项，电站21项，黑色和有色冶金3项，建筑材料4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21项，棉纺织和制糖等轻工业12项。一九五六年铁路铺轨3,108公里，其中：新建1,747公里，恢复285公里，新建和恢复复线210公里，新建企业专用线866公里（仅系铁道部负责修建的，下同）。宝成线和鹰厦线已经全线临时通车。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铁路铺轨累计为7,532公里，其中：新建4,387公里，恢复324公里，新建复线356公里，恢复复线420公里，新建企业专用线2,045公里。新建铁路铺轨总数已经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铺轨总数303公里。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部门新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一九五六年一年中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超过了解放前全部的炼钢能力。旧中国几乎没有的机器制造业，完全没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现在都建设起来了。近代化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建设起来了。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交通运输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五六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完成了24,605万吨，超过计划11.6%，比上年增长27%；货物周转量完成了1,203.5亿吨公里，超过计划11.6%，比上年增长22.6%。都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

在经济事业发展的同时，全国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在一九五六年也有很大的发展。高等学校招生18.5万人，超过计划5.2%；中等专业学校招生43.3万人，为计划的97.4%；初级和高级中学招生234.3万人，超过计划9.6%；初级和高级小学招生2,345.3万人，比上年增长35.6%。各级学校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比上年有很大的增长，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和小学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提前一年超过了五年计划。

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所属科学研究机构达到66所，研究人员（包括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达到4,475人。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比以前加强了。各部所属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05所，研究人员（包括工程师和技术员）达到10,307人。同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科学家们初步制定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草案）。

一九五六年摄制影片176部，超过计划37.5%。电影放映队达到6,233队，为计划的97%。报纸发行243,942万印张（即对开报纸，下同），超过计划2.2%。杂志出版76,343万印张，为计划的89.3%。图书出版435,613万印张，超过计划16.2%。以上各项，都比上年有很大的增长。此外，图书馆、博物馆也都有所发展；艺术有了进一步的繁荣，民间艺人得到进一步的安排。

一九五六年卫生部门所属的医院和研究所的病床总数达到214,673张，超过计划2.3%，比上年增加了40,980张。对于危害人民健康的各种慢性病的防治，特别是对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已经开始取得成绩，治疗了患者40万余人。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并且发挥中医的作用，已经吸收了大约3万名中医参加公立卫生机构的工作。此外，在卫生防疫、医疗预防、妇幼卫生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很多的工作。

随着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一九五六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全国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文化、教育、科学、卫生部门的工人职员总数（以下简称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总数）年底达到2,240万人；年平均人数（全年每日实有人数的累计数，除以365日，即得年平均人数，下同）为2,117.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535.7万人，除去由私营工商企业等转变为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干部305万人

以外，实际上比上年新增加了230多万人。这是几年来就业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如果将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和不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合在一起计算，那么，一九五六年底就是2,417万人，比计划以内达到的2,240万人多177万人。

一九五六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约27亿元，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全年职工的工资总额除以年平均人数，即得年平均工资，下同）增长了接近14%。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根据许多地区的调查，凡是没有受灾或者受灾不大的地区，约有80%左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产量，约有75%左右的农户增加了收入。受灾地区虽然减产或和收成很少，但是经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生产自救，加上政府的大力援助，除了个别工作不好的地区以外，受灾地区农民的生活也一般地得到了保障。

一九五六年社会购买力达到约465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这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物质生活有所改善的具体表现。

总之，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是获得了极为巨大的胜利和成就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伟大胜利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毫无疑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获得的伟大的胜利和成就，将给我国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的极为有利的影响；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某些困难。这些困难的发生，有的是由于客观的原因，有的则是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

现在看来，一九五六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是应该着重指出的：

第一，一九五六年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多了约15亿元到20亿元。由于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过大，因而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基本建设投资额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特别是超过了建筑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生产增长的速度，从而就引起了钢材、木材和若干种机械设备供应的紧张情况。应该说，这是一九五六年计划工作中的一个错误，但是我们当时并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而是在后来才了解的。由于历年来的基本建设计划总有5%左右不能完成，在编制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我们也以为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但是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却完成了99.9%，因而就更加显出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是定得过大了。

第二，一九五六年银行信贷计划，农业贷款增加11.2亿元，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贷款增加2.9亿元。但是执行的结果，对农业的贷款却增加了20.3亿元，对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9.4亿元。两项共计29.7亿元，超过计划15.6亿元。为了从财力上保证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增加这些贷款是完全必要的。这几项贷款的原定计划显然是小了。在执行过程中增加了这些贷款的数额，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撙节地加以使用，也可以少贷几亿元。在执行中有一小部分应该少贷的而没有能够少贷，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第三，一九五六年计划新增加工人职员84万人，但是执行的结果增加了230万人，超过计划146万人。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许多事业的扩大超过了原定计划，在执行劳动计划的过程中稍微超过原定计划也是必要的，但是显然超过得太多了。这是我们控制不严和有些部门轻易招收职工的结果。此外，在一九五六年增加了职工的工资，这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增加得多了一些。

第四，一九五六年教育事业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定得过高了，在执行过程中又有某

些方面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结果，就使有些学校招生的数量超过了师资、校舍和设备供应的可能条件，给师生在教学方面和生活方面带来了一些困难。

由于以上的缺点和错误，在我国财政收支方面，出现了赤字；在银行信贷收支方面，也出现了差额，多发行了一部分货币；这两者又集中表现为过多地使用了几年来国家所积蓄的商业库存和物资储备。这样，就给一九五七年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的安排，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应该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为了顺利地渡过一九五六年的大灾荒，适当地使用国家的后备力量，是完全应该的，不使用是不正确的。这样做，虽然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能够逐步克服的。我们还应该了解，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通常都是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大波动的。我们为了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曾经忍受了不知多大的牺牲和困难，而今天，我们在取得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的斗争中，并且在同时又取得大建设的胜利和渡过很大的灾荒，只引起这样一点小小的波动和困难，难道能够说我们的情况是不好的吗？应该说总的情况是很好的。由于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们对于在大革命中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波动，可以自觉地在一九五七年及其以后的计划中加以调节。我们的物价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国家若干后备物资在一九五七年就可以部分地得到补充，人民生活也还可能争取有所改善。这就是说，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真是一次和平革命，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革命中可能引起的破坏和损失，这对于全中国的人民是极为有利的。

二 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说明

在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编制了一九五七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如前面说过的，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有些已经提前完成，有些接近完成。这些是安排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利条件。但是，一九五六年我国遭受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对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的各方面都有不利的影响；由于前面说过的一九五六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使得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这些是安排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困难条件。根据上述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综合平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的方针下，我们编制了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大家知道，年度计划的编制必须做到既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有充分可靠的物力、财力的保证，并且保留必要的后备。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是尽可能地使基本建设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使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劳动工资的安排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相适应；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上下年之间能够比较平衡地向前发展。在安排消费同积累的关系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消费；在安排生产同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物资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生产上的需要；在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尽量地注意到各部门投资比例的适当，并且发挥投资的经济效果，力争使用同样数量的钱能够办更多的事。

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已经印成专册，发给各位代表，其中详细数字，我不拟在这里重复了。现在，我仅就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运输事业、商业、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劳动工资等计划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分别加以说明。

（一）工业生产

一九五七年工业生产的总值计划安排为603.4亿元，比上年增长4.5%（这是按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在一九五六年为577.2亿元进行比较的）。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1%，为什么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上年降低这么多呢？

在这里，除了生产资料中的新式畜力农具、锅驼机、水车等农业机械因为一九五六年生产过多，一九五七年计划基本上停止生产，机械制造工业的其他若干产品因为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它们的产值也将相应地有所减少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比一九五六年增加很少。消费资料生产在我国全部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一九五六年为50.3%，一九五七年计划为48.4%；而在消费资料生产中，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又最大，一九五六年为77.7%，一九五七年计划为77%。由于棉纱的产量一九五七年计划比上年减少61.1万件，使棉纺织工业的产值将减少14.4亿元，仅此一项，就使全部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降低约2.5%。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全部食品工业的产值比一九五六年增加2.2亿元，增加也很少。一九五七年的工业生产计划，由于纺织工业的生产下降，食品工业的生产增加很少，这样不仅使整个消费资料的生产计划只比上年增长1.1%，并且把一九五七年全部工业生产计划的增长速度也拉下来了。

但是，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的计划增长速度分开来看，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为311.3亿元，比上年增长8%；消费资料的生产为292.1亿元，比上年增长1.1%。

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增长速度如下：

电力：188.6亿度，比上年增长13.7%。

原煤：11,727万吨，比上年增长10.7%。

原油：150万吨，比上年增长29%。

生铁：555.4万吨，比上年增长16.3%。

钢：498.7万吨，比上年增长11.7%。

钢材：447.8万吨，比上年增长17%。

烧碱：17.8万吨，比上年增长13.8%。

硫酸铵：49.9万吨，比上年增长11.8%。

水泥：680.7万吨，比上年增长6.5%。

蒸汽锅炉：4,019.7蒸发量吨，比上年增长33%。

汽轮机：14.35万瓩，比上年增长19.1%。

发电机：28.4万瓩，为上年的98.9%。

电动机：125.1万瓩，比上年增长17.7%。

变压器：359.8万千伏安，比上年增长26.4%。

金属切削机床：22,640台，比上年增长2.7%。

载重汽车：7,000辆，比上年增长324.8%。

原木，2,506万立方公尺（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21.9%。

从上列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主要产品的生产增长情况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产品的产量，一九五七年比上年增长在10%以上，一半以上产品的产量，一九五七年比上年增长在15%以上。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上年增长41.7%的基础上，还能够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应该说是不慢的。这说明，我们在安排一九五七年度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继续坚持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则，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前面说过，一九五七年计划基本上停止新式畜力农具、锅驼机、水车等农业机械的生产，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比一九五六年有所减少，这就限制了机械制造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一九五七年机械制造工业的产值计划安排为54.9亿元，相当于上年的95.6%而一九五六年机械制造工业的生产则比上年增长90.2%。这样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如果把机械制造工业的产值从生产资料生产的总值中剔除出去加以比较的话，则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就不是8%，而是11%以上。

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增长速度如下，

棉纱：463.5万件，为上年的88.3%。

棉布，50亿公尺（包括手工业生产量），为上年的85.3%。

麻袋：7,814万条，为上年的99.3%。

面粉：503万吨（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0.2%。

食糖：87.4万吨（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8.3%。

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有些产品比上年增加很少，有些产品还比上年减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由于去年农业遭受灾害，主要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生产，没有完成计划。一九五六年由于上年棉花丰收，同时进口的棉花也比较多，因此棉纱的生产比上年增长32.2%，但是，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难以为继的。因为我国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的。接连几年的丰收是少有的，在丰年之后，往往是平年或者是歉年。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农业有三年是丰年（一九五〇、一九五二、一九五五），有两年是平年（一九五一、一九五三），有三年是歉年（一九四九、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在过去几年中，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曾经多次地影响我国轻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的起伏。农业的丰歉，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波动，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是难于避免的；但是剧烈的波动，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此，对于粮食、棉花和其他一部分工业原料作物，在可能的条件下，要有必要数量的储备，以调剂歉年之后的生产和消费，减轻社会经济生活的波动。今后我们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应该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的供应比较紧张。我们在分配原材料的时候，对手工业生产的需要已经给予适当的照顾。例如，一九五七年棉布总的生产水平比上年下降15%左左，但是对于手工织布业的生产，则计划维持上年生产水平的90%左右；在钢铁材料的供应方面，除了手工业自己生产的土铁归他自己使用，各地回收的废钢铁首先满足手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外，国家还从统一分配的钢铁材料中给手工业调剂了一部分。采取这些措施以后，一九五七年手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估计可以维持一九五六年的水平或者略高一些。

为了保证手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手工业管理部门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该继续调整生

产组织，大力整顿社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目前存在着盲目地追求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倾向，变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国营工厂的倾向，应该加以纠正。同时，还应该扶助个体手工业者，不得加以排斥。

（二）农业生产

一九五七年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11.5亿元，比上年增长4.9%。

粮食（不包括大豆）总产量计划安排为3,820亿斤，比上年增加170亿斤，增长4.7%。

棉花总产量计划安排为3,000万担，比上年增加110万担，增长3.8%。

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的生活的要求，落后于轻工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逐步地解决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合作社同合作社之间、以及合作社内部的矛盾，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增产。国家对于农业的发展，一向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为了保证继续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今后还将特别注意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以增加肥料的供应量。开垦荒地需要投资较多，但是为了增加企业生产，根据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增加一些投资，扩大耕地面积，也是必要的。

前面说过，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的增产，对于工业生产的增长影响很大。目前，我国轻工业有较大的生产能力，棉纱锭子已有700多万枚，每年可纺纱560万件以上，其他某些轻工业企业也有多余的生产能力。人们会问，为什么不可以多生产一些工业原料作物以充分发挥轻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人口增加很快，耕地面积增加有限，粮食的增加还满足不了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在现有的耕地中不能更多地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几年来，由于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虽然也有所增加，但是，它的种植面积在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逐年有所下降，一九五七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计划安排为239,989万亩，比一九五三年增长11.1%，其中，工业原料作物为23,071万亩，比一九五三年增长31.9%；粮食作物为184,972万亩，比一九五三年增长7.9%。粮食作物在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为79.3%一九五七年下降为77.1%。为了保证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必须适当安排粮食作物同工业原料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在我国还不能大量开荒和大量扩大耕地面积以前，从现有的耕地中不适当地扩大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是不对的，但是，缩小现有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是不利的。棉花、糖料、油料等主要工业原料作物，应该保持一九五七年的种植面积，不再减少，还应该有小量的增加，并且必须进一步加强精耕细作和采用优良品种等有效的措施，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猪的增产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城乡肉食的供应，而且养猪积肥也是当前农业肥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缓和城乡肉食供应的紧张情况，并且适应农业增产对于肥料的需要，必须提高猪的生产数量和质量。一九五七年猪的头数，年末计划达到1.1亿头，比上年增加1,220万头。完成这个计划，有没有保证呢？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展养猪业十分重视，生猪的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了14.26%，农民养猪比较有利了；饲料的来源增多，国家给农民预留的精饲料也比上年增加了；再加上适当地增加农民的自留地，以利于农民自己解决蔬菜和牲畜饲料。这些都是完成计划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猪的头数，比产量最高的一九五四年还要超过1,000万头，现在不少地方猪的质量还不高，

因此，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计划，并且提高猪的质量。但是，由于采取了上面的措施，目前商业部门收购的猪，数量已经开始增多，部分猪的质量也比上年肥大，可见农民对于养猪的积极性，已经有所提高，完成计划是有可能的。

造林面积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为4,500万亩，比上年减少500万亩。为什么一九五七年计划造林面积比上年减少了呢？这是由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平均每年造林2,744.5万亩，面积不少，但是成活率比较低，根据典型调查，过去造林的成活率一般在60%左右。因此，必须在保证成活率确实能有显著提高的前提之下，努力完成今年的造林任务。在木材采伐方面，地方林区，过去一般在路远山深的地方采伐得少，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采伐得多，这对于水土保持和林区迹地更新都有不利的影响。今年增加了地方木材采伐的投资，主要用在修路方面，以便增加深山的采伐量，逐步改变某些不利于水土保持和林区迹地更新的采伐情况。

（三）基本建设

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111亿元，为上年的79.4%。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确定，在材料供应方面和财政方面，都进行过反复的平衡计算。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研究，我们采取了111亿元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既能够使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设保持适当的规模，保证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又有利于一九五八年计划的安排，既能够使一九五六年造成的某些原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的供应紧张情况缓和下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又可以尽量地减少建筑力量的窝工损失和设备的积压。111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同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相比，是显得少了。但是，同五年计划原来所规定的一九五七年投资额相比，还超过了14亿元；如果把前四年实现了的投资额和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投资额合起来计算，则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投资总额的49.78亿元。

根据上述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在项目的安排方面，适当地调整了若干部门的投资比重，加强了薄弱环节。主要是：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减少了纺织工业、食品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设备能力暂时还有多余的部门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煤炭、电力、冶金、化学、森林等生产能力不足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保持了农林水利部门的投资比重。增加了地方投资的比重，相应地减少了中央部门的投资比重。例如：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一九五六年的22.4%，下降为一九五七年的20%左右。又如煤炭、电力、冶金、化学、森林等五个工业部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共为34.5亿元，占工业各部门投资额的50%；一九五七年投资额计划共需37.1亿元，占工业各部投资额计划的59.1%。又如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同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工业的投资比例，由五年计划中的一九五七年的1.9比1，改变为一九五七年计划的3.3比1。地方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五年计划中的一九五七年的13.7%，提高到一九五七年计划的18.8%。

在编制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到：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我国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工业部门发展的要求；冶金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工业发展的要求。在积极发展我国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方面，除了应该继续建设若干起骨干作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多发展一些投资少、收效快的中、小型企业，和有计划地发展小煤矿、小铁矿、小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以增加原材料和燃料的产量。在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工业方面，除了发展一些重型的精密的机械工业企业以外，应该在平时和战时相结合、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制造和修

理相结合的前提之下，对各机械工业部所管理的企业、非机械工业部门和地方所管理的机械工业企业，统筹安排，以充分发挥我国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工业的潜在力量。这些工作，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度计划的安排中，已经开始予以注意，今后还必须进一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按照上述投资安排，一九五七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591项，其中计划竣工的219项。各工业部一九五七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486项，其中计划竣工的177项。在计划竣工的项目中，主要的有：煤矿58项，电站21项，黑色和有色冶金14项，建筑材料和木材加工9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32项，纺织、造纸、食品等轻工业20项。这些企业投入生产达到设计能力以后，每年的生产量是：原煤1,080万吨，发电量33.6亿度（发电设备容量67.3万瓩），原油32.5万吨，生铁81万吨，钢材48.9万吨，焦炭157万吨，硫酸4万吨，硝酸铵9万吨，水泥108万吨，运出木材315万立方公尺，棉纱69.3万件(纱锭71.5万枚)，棉布64,602万公尺（织布机21,325台），机制纸13.6万吨，机制糖8.7万吨，等等。但是，实践证明，新建企业在投入生产以后，经过一定时间，它的年产量，很多是会超过设计能力的。

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一九五七年农林水利各部和地方农业投资计划共为9.7亿元，比上年减少1.9亿元。主要是减少了中等技术学校、试验研究机构等建设单位的投资，和减少了拖拉机的增加数量。水利部一九五七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26项，其中有水库工程10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今年正式开工。地方兴修的限额以上的水利工程32项。农垦部兴建的限额以上的农牧场3项；地方兴建的限额以上的农场93项。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都有减少，但是为了照顾农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分配投资额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使农业方面少减一点，工业方面多减一点。

一九五七年铁路计划铺轨1,860公里，其中：新建535公里，恢复152公里，新建复线533公里，专用线640公里。在新建铁路铺轨中：包（头）兰（州）线铺轨329公里，福建的南（平）谙（头）线铺轨63公里，内蒙古的牙克石森林线铺轨45公里。交通部一九五七年计划施工的公路有7条，其中主要的是新建新藏公路和改建青藏公路，计划新增加的公路里程为1,125公里。邮电部一九五七年除了重点建设部分市内电话和增加必需的邮运设备以外，计划架设京汉、市沪、京沈、京西（安）、西（安）兰（州）等长途电讯干线的十二路载波电话和改善省内线路。

商业各部一九五七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17项，其中主要是肉类联合加工和冷藏库，计划新增加日宰猪1.1万头的生产能力和冷藏库容量5.15万吨。

文教各部一九五七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37项，其中主要的有：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直接管理的）11项，电影制片厂和洗印厂7项，医院4项；计划新建、扩建高等学校可以容纳新生3.3万人，新建医院增加床位1,420张。

在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中，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修改了某些过高的和不适当的设计标准，尽可能地照顾了各个部门之间、各个工厂之间的专业分工和协作配合，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削减了非急需的项目和缩小了某些企业的规模，并且尽可能地就地取材，降低建筑造价。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就节约了资金，提高了投资的经济效果。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需要对原定的设计和规划作必要的修改，这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做得好就可以大量节约，做得不好还可能造成新的浪费。

因此，必须节约一切可能节省的投资，同时反对偷工减料，用各种办法提高工程质量。不久以前召开了全国设计工作会议，已经开始对原定的各项设计和规划进行全面的审查修改工作。我们相信，在全国职工、全国勘察设计和建筑安装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努力之下，一定会把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地坚持下去，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资金，把建设事业办得更好。

（四）运输事业

一九五七年的运输计划，是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的规模来安排的。

在铁路运输方面，货运量计划安排为25,600万吨，比上年增长4%；货物周转量计划安排为1,26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5.1%

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六年新建的铁路，沟通了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中原地区和沿海地区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随着生产和建设的发展，随着新线的通车和运量的增加，旧线的负担也大大地加重了，以致有些区段如京汉、石太、同蒲、陇海西段等线路的通过能力，在一九五六年就感到严重不足，曾经发生了堵塞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一九五七年适当地增加了加强旧线的投资，加强旧线的投资额在铁道部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九五六年的26.4%，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39.4%，计划在京汉、石太、陇海等线的某些地区段修建复线533公里。经过采取了这些措施和加强运输的组织工作以后，预计铁路运输的通过能力将有所增加。

在水路运输方面，长江的运输能力，过去四年增加了船舶230,620载重吨，一九五七年计划增加32,600载重吨，五年合计超过原计划2,520载重吨。这对保证四川省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外运和各地工业品运进西南各省，有很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已经由水路运出了40余亿斤粮食，支援了受灾地区和缺粮地区。但是，长江的运输特别是川江的运输情况还是很紧张的。这是由于港口的建设落后于船舶运输能力的增加；中、下游的运输能力的增加，没有同上游运输能力的增加相适应。为此，一九五七年计划加强重庆、汉口等港口的建设，并且建造拖轮以增加长江中、下游的运力。在运输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开始注意加强港口管理，注意港口、航行和修船工作之间的协作配合。

西南各省是我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地区，它有许多农副业产品可以用来支援全国，同时全国各地也必须用许多工业品支援西南。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运输能力不够，虽然增加了长江的船舶，新建成了宝成铁路，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除了继续加强水路运输以外，还必须着手进行新的铁路干线建设的准备工作。

由于我国目前石油生产落后，液体燃料供应不足，因此，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发展汽车运输。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发挥铁路和水路现代运输工具的运输能力的同时，应该注意发挥各种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组织利用各种民间运输工具，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后还应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保证一九五七年运输计划的完成，一切运输部门都必须加强运输的组织领导工作，提高运输设备的利用效率。在各运输部门之间，应该推行联运制度，签订运输协作合同，做好运输的协作配合工作。各产、销部门和运输部门应该大力贯彻执行合理运输和统一送货制度，并且注意平衡运输。

（五）商　业

一九五七年社会购买力估算约为473.2亿元，比上年增加8.2亿元，增长1.8%。这个社会购买力的计划，一方面是估算了农民在农业生产正常的情况下可能增加的购买力，估算了职工工资总额的增加部分，两项合计，居民的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增加约18亿元；另一方面，由于压缩了机关、部队、企业、人民团体等社会集团的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减少9.8亿元。这样，增减相抵，一九五七年社会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增加8.2亿元。

在商品供应方面，一九五七年社会商品供应总额估算约为463.5亿元。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虽然有一些差额，但是经过认真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尽量开辟原材料的来源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商品的进口，并且加强商品供应工作，加上今年春季对于若干种商品价格的调整，这样就可以使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接近平衡，市场物价就可以继续保持稳定。

在一九五六年农业遭受严重灾害之后，国家从丰收的西南地区调运出来50.8亿斤粮食，支援受灾地区和缺粮地区，仅仅河北一省就调入36.3亿斤，使广大受灾地区的农民免于饥饿，使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得到保证，同时避免了粮食价格的上涨。由于棉花遭灾减产，一九五七年棉纱产量计划比上年减少约61.1万件，以致棉布的销售量将比上年减少2,300万匹左右，不得不把一九五七年五月份至八月份通用的第二期布票一律对折使用。这样，虽然减少了棉布的供应量，但是也避免了棉布价格的上涨。国家在大力稳定粮食、棉布等主要商品价格的同时，主动地提高了若干种商品的价格，作为平衡社会购买力的方法，从全局来看，我们认为这种措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这里，简单地谈一下一九五七年对外贸易计划安排情况。

一九五七年计划安排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相当于一九五六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91.6%。在出口计划方面，主要是减少了粮食、食油、猪肉的出口数量，以照顾国内的需要。例如，一九五七年计划出口粮食（包括大豆）38亿斤，比上年减少10.8亿斤；计划出口猪肉（包括活猪）7.7万吨，比上年减少8.5万吨。在进口计划方面，主要是减少了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的进口数量，以促进我国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

我国的对外贸易，过去几年，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约占75%左右，矿产品机械等约占25%左右。在进口总额中，机器和各种设备约占60%左右，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约占10%左右，其他工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约占30%左右。这种出口和进口中各类产品所占的比重，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将逐渐发生变化。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下降；矿产品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上升。在进口总额中，机器设备的进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下降；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某些原材料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某些消费资料的进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上升。这种变化，在一九五七年对外贸易计划的安排中，已经有所表现。当然，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这种变化也只能是逐渐的。

（六）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

在教育事业方面，由于一九五六年学校招生有一部分过多，以致师资和校舍建筑、教学设备都赶不上发展的需要。一九五七年根据师资和财力、物力方面的可能条件，适当地缩减了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人数，使学校能够有较多的精力，进行整顿，提高教学质量。

一九五七年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数和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以下简称在校数），安情排况如下：

初级和高级小学招生1,616.9万人，在校数达到6,581.4万人，比上年增长3.7%。

初级和高级中学招生184.3万人，在校数达到556.6万人，比上年增长7.8 %。

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级师范学校）招生15.8万人，在校数达到77.5万人，相当于上年的水平。

高等学校招生10.7万人，在校数达到44.3万人，比上年增长10%。

一九五七年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数，虽然比上年减少了，但是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还有不少的增加。在解决由于上年招生过多所发生的问题和今年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以后的问题上，还有很多的困难。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应该努力克服这些困难。社会各方面的人士，也应该帮助教育部门克服困难。

应指该出，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我国普通教育的目的，主要的是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者，其次才是为培养专门人材打好普通知识的基础.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强调并且逐步实施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制度。一方面，应该鼓励脑力劳动者参加一部分可能参加的体力劳动；同时，还应该动员现在机关中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离开机关工作岗位，到农村中、工厂中种几年地、做几年工，以学习和掌握生产知识，并且熟习工、农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和思想。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逐步地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同时，还应该经常从工、农劳动人民中，有计划地挑选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并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人，到机关中工作，以便加强机关工作人员同工、农劳动人民的经常联系。现在还有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这在目前还不可避免。不能入学的学龄儿童，只好晚一些入学。小学、中学毕业生的大部分不能逐级升学，应该参加体力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现象.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已经到达劳动年龄的，凡是家在农村的，应该说服和支持他们回农村参加生产；家在城市的，如果在城市安排不了，也应该尽可能地动员和安排他们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这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在我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情况下，除了合理地使用国家办学的力量以外，群众办学的方法应该积极提倡。机关、团体和企业的职工，可以自已出钱集体办学（不由机关、企业拨款）；农民和城市居民也可以组织起来，集体办学；知识分子可以合作办学；热心教育事业而又有条件个人办学的人，也可以个人办学。总之，小学和中学教育，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进行。国家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将逐年增加，计划所安排的中、小学招生数，也将逐年有所增长。但是，国家的物力、财力有限，因此，教育经费和招生人数每年不能增加很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在不增加国家拨款的限度内，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集体地或者个体地来办小学、中学或者其他的学校，是能够多招收一些学生进行学习的。

今年中等专业学校，除了中级师范学校将继续在初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之外，中等技术学校计划从现有企业的职工中招收新生。

高等学校今年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还是不小的。我们要求巩固已有的成绩，克服缺点，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在卫生事业方面，继续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继续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仍

然是一九五七年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乡村医疗工作，应该进一步发挥基层卫生组织的作用，更多地组织门诊、出诊和巡回医疗；城市应该注意发挥联合诊所的作用和适当地增设联合诊所，合理地改进公费医疗制度，以便腾出更多的医疗力量，来照顾城市一般居民的治病要求。不论乡村或者城市，都应该进一步地发挥中医的作用。

在科学研究事业方面，一九五七年全国科学研究计划草案，已经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国第一个研究原子核的功率为7,000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2,500万电子伏的α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一九五七年中国科学院将着手建设几个重要学科的研究所，如电子学、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核子物理、力学等研究单位，为今后新技术的发展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各部和各地方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统筹安排，分工协作，以合理地使用科学研究的人员和设备，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在文化、出版事业方面，应该给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限，一九五七年文化事业的各项计划指标，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根据分配的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

在体育事业方面，应该继续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七）劳动工资

一九五七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总数，年底计划达到2,226.2万人，比上年减少约14万人。一九五七年的年平均人数，计划安排为2,216.8万人，比上年增长4.7%。

为什么一九五七年年底计划达到的职工总数要比一九五六年年底的实有人数减少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年度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缺点，即建筑安装部门的许多单位第四季度赶工，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许多单位第四季度赶任务，大量增加职工，而到下一年的第一季度就要窝工。我们初步接受了这些经验教训，一九五七年要尽可能地克服这一缺点适当地减少职工人数。这一缺点的造成，是同劳动计划控制不严，年度计划下达时间过晚，财政上的年终结算制度执行有缺点等等分不开的，因此，今后应该合理地安排计划，提前下达任务，纠正执行财政上的年终结算制度的缺点，以便使各经济单位有可能均衡地进行生产和均衡地完成计划。同时，一切企业和事业单位，除了经上级批准的，需要赶工或者赶任务的个别特殊的工程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以外，都不得在第四季度赶工或者赶任务。过去不少单位用增加人员、加班加点以及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来超额完成任务，甚至以此贪图奖金，这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同时使工程质量、产品质量和工作质量下降，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应该坚决纠正。一九五六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00多万职工，其中一半以上是临时工和季节工。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有不少万人回乡进行农业生产去了。这就证明，一九五七年年底达到的职工总数，比上年减少约14万人，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我国人口多，劳动资源丰富。目前我国厂矿企业的职工已有多余，而工业又只能逐步地发展，不可能每年都大量招收职工。因此，今后劳动就业不能只在工业方面打主意，而要更多地在农业、农副业和手工业方面打主意。

一九五七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工资总额，计划排为141.2亿元，比上年增加12.1亿元，增长9.4%。其中：（1）一九五六年增加的工资是从四月一日或者七月一日起发给的，只发了两个或者三个季度，一九五七年要发四个季度，再加上某些正常的升级，这一

项比上年增加约5.7亿元；（2）一九五六年各个月份陆续增加的职工，一九五七年都要支领全年的工资，连同一九五七年人数增减相抵以后，这一项比上年增加约6.4亿元。

以上所说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各位代表！一九五七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一九五七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完成以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现在，对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可能完成情况作一些预计，我想是有必要的，也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

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03.4亿元，超过五年计划12.7%。这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的递增率将是17.4%，比原定的14.7%的增长速度加快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重，将由一九五二年的39.7比60.3，变为一九五七年的51.6比48.4。我国钢的生产量，将由一九五二年的134.9万吨，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498.7万吨，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5.4倍。由于我国新的工业企业不断地投入生产和技术力量的不断地成长，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业生产部门和新的工业产品。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我国已经试制成功并且开始成批生产的最重要的新产品有：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6,000瓩和12,000瓩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10,000瓩和15,000瓩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31,500千伏安的变压器、日产160吨钢的平炉、滚筒直经4公尺的电动卷扬机、多种型式的自动车床和机床、矽钢片、优质薄板、无缝钢管、50公斤的重轨、大型工槽钢、铝材、高纯度的苯胺和邻甲苯胺等等。一九五七年我国计划继续试制和开始试制的主要新产品有：72,500瓩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25,000瓩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40,500千伏安的变压器、2,500吨的水压机、700公厘的全套轧钢机、80吨（车身重）的电机车、载货量5,000吨的沿海货轮、载油量4,500吨的沿海油轮、40马力的拖拉机、四轴自动车床、组合机床和钼、硒、碲、锗、镓、铂稀有金属产品等等。

一九五七年的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11.5亿元，超过五年计划2.5%。这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和农副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的递增率将是4.8%，比原定的4.3%也将超过。我国粮食的产量，将由一九五二年的3,088亿斤，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3,820亿斤，而在一九四九年只有2,162亿斤。我国棉花的产量，将由一九五二年的2,607万担，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3,000万担，而在一九四九年只有888万担。

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111亿元，超过五年计划的一九五七年投资额14%，加上前四年已经实现了的投资额，预计可以达到477.22亿元，比原定的五年投资总额超过11.6%。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将达到825项，比原定的694项超过131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竣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将达到448项，比原定的455项减少7项，主要是因为有些建设单位的规模扩大了，有些建设单位的进度延迟了。各工业部五年预计竣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350项，其中主要的有：煤矿94项，电站37项，炼油厂和油矿7项，黑色和有色冶金20项，化学工业10项，建筑材料和木料加工13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108项，纺织、造纸、食品等轻工业45项。五年预计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按每年的生产量计算，主要的有：原煤4,528万吨，发电量104.7亿度（发电设备容量209.4万瓩），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126.5万吨，生铁309.4万吨，钢217万吨，钢材114.9万吨，水泥239.3万吨，棉纱161万件（纱锭166万枚），棉布14.1亿公尺（织布机46,552台），机制纸21.5万吨，机制糖15.5万吨，这些都是按设计能力计算的，前面说过，很多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是会超过设计能力的。

一九五七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年平均人数，计划安排为2,216.8万人，社会就业面比五年计划扩大了。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计划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约37%左右，超过原定增长33%的水平。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也有相当的增加。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高级和初级中学、高级和初级小学，计划安排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比五年计划超过2%到18%。

因此，实现了一九五七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除了个别的建设项目、个别的产品和某些事业的发展指标以外，绝大多数的建设项目、绝大多数的产品和绝大多数的事业的发展指标，都可以超额地完成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将要建立起来了。我国基本上已经能够用自已制造的设备，建设自已的电站、采矿企业、中型冶金企业、金属加工企业、化学工业企业和轻工业企业了。我国已经开始自已制造的机械，装备自已的运输部门、农业部门和加强国防了。我国也已经能够用自已生产的金属材料，来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建设事业的大部分需要了。我国人民知道，这些成就，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我国的援助分不开的，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援助再一次表示深切的感谢。

三　为实现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为了保证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满实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它不仅是保证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实现的根本措施，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战略意义的方针。

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已经发出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也向全国发出了号召，不再重复。这里我只想着重地说一说在基本建设的各个方面，如何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的问题。因为基本建设的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在建设事业中如果能够从各方面很好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就可以保证我国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过去几年我国的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新的工业企业建设起来了，许多新的工业城市出现了，许多原有的城市的工业大大地发展了，许多消费城市开始改变为生产城市。但是，应该指出，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的经验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领导部门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国的建设事业，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使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例如，在工业建设方面，对于新建和改建企业项目的安排注意较多，而对于合理地利用我国原有的中、小型企业和手工业注意不够。在工业的技术政策方面，某些地方不适当地强调了大规模、现代化和高标准，而对于建设中、小型的企业，很好地利用我国劳动力多的优点，则注意不够。在工业建设的设备供应方面，有些可以用自已能够制造的设备而不愿意用，要求从国外进口同类的设备。在工业建设的相互配合方面，不注意组织生产的协作，而要建设全能的工厂。建筑的安全、卫生、防空、防火、防洪标准偏高，城市规划过大，办公楼、招待所、休养所、大礼堂等盖得过多，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追求豪华、铺张浪费的不良现象。所有这些缺

点，都给我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一些损失。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这些缺点，使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更加适应于我国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农业比重大和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现实情况。为此目的，我们准备有步骤地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第一，新工业企业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现有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及其相互关系，统等兼顾，适当安排，以便迅速地增加生产，相互促进其发展；而避免相互排挤，阻碍生产的发展。

第二，在工业建设中，应该采用适合于我国经济条件和工业水平的技术装备。为着我国的工业化，必须建设一批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企业作为骨干。但是，其他企业的建设，应该提倡最新技术同一般技术相结合，机械化、半机械化同手工操作相结合。

第三，大型企业的建设，要同中、小型企业的建设相结合，并且今后应该多建中、小型企业。

第四，除了某些我们自己还不能设计的、技术水平最先进的企业的建设，必须请苏联和有关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之外，一般中、小型企业和中等技术水平的企业的建设，应该努力自行设计和自行制造设备。只要是自己能够制造的设备，即使质量差一点，也应该采用。

第五，以市或者一个地区为单位，尽可能地统一安排企业的协作，临近的工厂，力求共同使用铺助车间、附属车间和实验室。

第六，降低建筑标准。生产性建筑的标准，包括厂房在内，应该在能够保证建筑的质量、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原则下，力求节约，而不应该追求过高标准。宿舍的建筑标准，不论城市或者乡村，一般应该同当地居民的住宅水平看齐或者稍高一些。现在采用的防空、防火、防洪、卫生等标准，应该适当降低。

第七，关于住宅建设。国家主要应该解决职工的集体宿舍，也可以建设一部分标准较低的公寓。同时，应该鼓励职工自建家属宿舍。职工家属宿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解决。城市职工宿舍的修建、管理、分配和租金等问题，是关系到城市建设和职工生活的重要问题，应该全面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同职工进行讨论，以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

第八，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再建设办公大楼、招待所、休养所和大礼堂。某些城市必须增加一些公共建筑和服务性的建筑（如学校、商店、医院、邮电局、旅馆、影剧院等等）的时候，也应该因陋就简，面向群众，合理分布。

第九，严格控制城市规划的规模，合理地降低城市建设的各项标准，节约投资，节约用地。在建设工厂和学校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原有的城镇。

第十，今后所有建筑安装单位，在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利用正式工程的建筑物，少建或者不建临时性的建筑物。在必须建设某些临时性的建筑物的时候，也应该只限于那些必要的工棚和现场性的加工场，一般地不再建设永久性的建筑基地。现有的永久性的建筑基地，在建筑任务完成之后，它的全部建筑物，包括办公、住宅、福利等建筑物在内，应该逐步地改作他用。

我们相信，采取上述措施，就可以在基本建设方面合理地节约国家的建设资金，就可以用同样数量的钱而能够办更多的事，使我国的建设事业真正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向前发展。

各位代表！

一九五七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比较积极的和充分可靠的。这个计划在进一步地深入开发增产节约运动的条件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下，是可能超额完成的。根据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累计已经完成年度计划的41.4%，比一九五六年同期增长了11%左右；几种主要的工业产品比一九五六年同期增产的数量是：电力13.6亿度，原煤517万吨，钢材65万吨，水泥26万吨。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状况，已经有所缓和。在农业生产方面，冬播作物小麦的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油菜籽的产量则比上年有较多的增产；春播、夏播作物的种植情况，一般良好；水稻、杂粮的种植面积都比上年扩大，而棉花的种植面积，则有所缩小；猪的饲养头数，也较上年有所增长。如果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可能完成计划。在基本建设方面，到五月底止，投资额累计已经完成年度计划的25.1%，略低于一九五六年同期水平。在市场方面，供应市场的生产资料已有增加；消费资料，特别是副食品的供应，也开始有所好转。在交通运输方面，主要线路的紧张状态，也在逐步改善。总之，一九五七年度的计划，过去几个月的执行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农业的收成目前尚难断定，还应该预防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工业生产中，有些产品的品种过少，有些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或者有些下降，还应该积极地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某些轻工业产品由于原料不足，在下半年的生产中还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特别是由于棉花不足，棉纱、棉布的产量比计划还要减少。同时消费资料的供应，虽有某些好转，但少数商品仍然比较紧张；生产资料的供应虽有改善，但总的说来还感到不足。因此，全国人民必须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在力量，努力克服困难，加强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为全面地完成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为更多地、更好地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7月2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
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

（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

（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予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

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比问题。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

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认为：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小可大，一般地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村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各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那些是正确的和那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农村中的这场大辩论，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所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外关系的调整、经营管理的改善等问题，中央准备在研究各地整社的经验之后，再发指示。

（原载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中央批转《浙江省委转发杨心培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兹将《浙江省委转发杨心培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连同浙江省委的批语转发你们，并请印发至县委，让他们也读一读。

浙江仙居县合作社一轰而散的教训，应该引起各地认真重视。这样的情形虽然只是在个别的县份发生了，但是，象仙居县这样，对于社员的意见和要求不去及时地加以适当解决，而让问题成堆，放松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对错误的言论，不敢理直气壮地加以批判；对于少数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反攻、破坏活动，缩手缩脚，不去认真弄清楚、坚决予以反击等现象，并不是个别存在的现象，应该引起严重注意。

附：　　浙江省委转发杨心培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

各地委、县委并报中央、上海局：

兹将杨心培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仙居县在群众闹事中合作社一轰而散，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百分之九十一退到百分之十九，主要原因是在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严肃地贯彻执行农村阶级路线，合作化以后在经营管理、政策处理等问题上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暴露之后，长期拖延，县委没有领导广大干部采用民主办社的方法认真地予以解决。有些群众提出退社、分社的要求，由于领导对群众的觉悟估计不足，又不肯做艰苦的工作，害怕"一枝动百枝摇"，错误地采用了"硬压"的办法，使合作社内问题成了堆，因而闹事发生以后合作社一轰而散，一时不可收拾。这一问题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应该引为鉴戒。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杨心培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

省委：

兹将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简要报告如下：

（一）

该县去年秋收后，个别地区即发生退社问题，至今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期间，在全县三十三个乡镇中有二十九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事的特点，主要是闹退社闹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三〇二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者一一六个，部分垮台者五十五个。入社农户由百分之九十一降至百分之十九。被打干部一〇七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者三四〇户。

该县群众闹事并非突然事件。为了便于研究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该县合作化的简单历史：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纠正了坚决收缩的错误，合作化迅速的发展，到十二月底，全县已有互助组二五七个，占总农户百分之三·二；初级社一，一八五个，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五·八六；高级社四个，占总农户百分之〇·五二。一九五六年春高级社发展到了一七九个，占总农户百分之六十七·五八，初级社三七六个，占总农户百分之十九·四六。当时又根据中央颁布的农业生产发展纲要四十条，掀起了生产高潮。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克服了领导落后于实际的右的倾向，使运动走向了正常的、迅速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春花的空前丰收，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高涨。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却产生了骄傲情绪，认为一切都是一帆风顺，没有问题了，在发展高级

社的过程中急躁粗糙，对建设规划和骨干选择重视不够。全县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四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五·八六的初级社的基础上，一九五六年六月发展到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百分之八十八·一五；一九五七年春天达到百分之九十一。同时社的规模过大，全县三〇二个社中，七〇〇户以上者二个，五〇〇——七〇〇户者十一个，三〇〇——五〇〇户者四十一个，一〇〇——三〇〇户者一五三个，五〇——一〇〇户者六十四个，五〇户以下者三十七个。建社以后许多经济政策没有及时处理，账目混乱，特别是生产指导上不顾客观条件，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在二十万亩水稻田中，将十五万亩从两熟改为三熟，推行时强调"百分之百"、"党性保证"，再加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结果改了七五，〇〇〇亩，除一五，〇〇〇亩增产之外，其他全部减产，并荒田一五，〇〇〇亩（全县田地共三十万亩），全县全年减产百分之二十二。

秋收分配之后，群众思想混乱，比较普遍的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闹退社，闹分社的现象开始产生。当时领导上没有看到合作社中大量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抓紧生产整社，救灾防荒和政治思想工作，对农村群众思想混乱只看到富裕农民叫嚣的一面。在整社中，只抓紧了批判富裕农民的思想和推行"三包"责任制，对合作社采取了既不许退，又不许分的政策，对于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重视解决。到四月中旬，夏收夏种即将开始，春花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实际减产百分之二十五），矛盾又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重新暴露出来。贫苦农民要求我们改正错误，部分富裕农民要求搞垮合作社，以便"自由"发展，过去在阶级斗争中受过批判或打击的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企图借机报复，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企图进行复辟活动。不同的阶层，抱着不同的目的，造成了紧张一时的闹社浪潮。

闹事以后，县委坚持采用说服教育，团结广大群众的方针，在团结广大群众的基础上孤立和处理违法分子，暴露和惩办反革命分子和敌对阶级分子。对合作社采取了：在肯定合作化优越性和作好工作的前提下，执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对闹事问题的处理采取了分清敌我、区别对待的政策。并根据上述方针、政策，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这样工作以后，到五月中旬闹事已大部停止，又在"增强团结、争取丰收"的口号下，开始处理善后问题，恢复生产，整顿合作社等工作。至六月中旬，夏收夏种已基本结束，情况逐步好转。

（二）

从闹事的性质和原因来看，目前农村三类性质的矛盾互相渗透着，而内部矛盾是主要的。

第一，关于农村内部矛盾问题，表现在二个主要方面：1、在生产和分配中，处理国家、合作社和社员的关系上存在的问题：（1）在生产计划上，首先是粮食和经济作物、副业的关系，任何生产都比粮食生产收入多。仙居县山区、半山区多，上山砍柴每日可得七、八角，而合作社每个劳动日只有三、四角。一九五六年上半年抓住以粮食生产为主 甚至用命令主义办法推广三熟制，不使社员适当从事副业生产，增加收入，下半年就控制不住了，社员自发的去搞副业，积极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反而少了。其次，是主粮与杂粮的关系上，山区、半山区盛产杂粮，特别是薯类，但是我们在粮食政策上按四折一计算产量，限制了发展。去年由三六，〇〇〇亩降至一二，〇〇〇亩。（2）在粮食政策上，一是春花丰收以后，自满麻痹，分给群众过多了一些；二是秋后由于粮食紧张不合理地压缩周转粮、动员百分之二十节约粮，甚至计产时对合作社还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贪污、盗窃粮；三是薯类四折一计产粮；四是土地减

少，人口增多，三定不变。上述生产计划和粮食政策上，都是合作社抓紧，单干户放松，自然农民都埋怨合作社了。（3）合作化之后，对整社抓得不紧，特别是社内分配和财务工作搞得不好，夏收分配中，实行“平衡余缺”，平均每人分九十斤，劳动工分少的人也分九十斤，不出钱，作为超支，劳动多的人也只拿九十斤，而拿不到钱，这样“打乱平分”造成全县百分之八十的社员超支。其次队向合作社报产时层层瞒产和贪污盗窃现象较为普遍。根据全县一七〇个社的调查，犯有贪污行为的就有社干二三二人，会计一二九人，平均每社有二人以上。由于不适当地集中管理损耗霉烂现象不少，如东岭社去年烂霉黄瓜五，〇〇〇斤，谷子变质六，〇〇〇斤。玉米变质一，〇〇〇斤，霉烂四〇〇〇斤，被偷去地黄(药材)六十斤。三是合作社财政不公开，账目混乱。全县有一〇三个社长期不向群众公布账目。据二九七个社的调查，其账目较清楚的有一一〇个社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七；有一般问题的有一二九个社，占总数百分之四十四；账目严重混乱的五十八个社，占总数百之十九。有的社甚至根本没有账目，胡乱地把账记在楼板上墙壁上。

由于上述问题，合作社的劳动工分很低。全县去年每个劳动日最高七角四分，最低的仅为九分，平均为三角三分。

2、合作化之后，基层党员绝大部分都当了干部，掌握了政治的、经济的大权，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了党群关系上某种程度的紧张状态：一是在生产、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甚至用戴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二是少数干部违法乱纪，合作化高潮以来，二五一个乡干部中，有七十四人吊打过人；二十三个乡镇一，一一七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四十八名，占百分之四·七；三是合作化之后，大量干部不参加劳动，并有不少的人多得工分。如大路乡五星社社干不劳而获工分占总工分的百分之四，加上误工共占百分之五；四是干部作风不深入，县只到区、乡，区乡只到社，很少有人到社员家里跑跑，不象与群众同甘共苦，很难听取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同时阶级认识模糊，在贫农和下中农中缺乏艰苦的工作，因而工作缺乏可靠的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还是严重存在着，并且由于自由市场的开放而增加了。在这一矛盾中，除了与为数极少的富农阶级的阶级斗争外，主要的表现在贫苦农民与富裕农民的矛盾上。在社会主义高潮中一部分富裕农民随流而来，在政策处理上照顾其利益不够（入社政策），高潮之后，又一户不许退出。按照国家计划生产或者按照价值法则生产，按照统购价格出卖农产品或按照自由市场价格出卖农产品，社内社外差别很大。因此，这一矛盾看来还是很紧张的。这是这次闹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敌我矛盾。在过去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被我们斗争和镇压的敌对阶级分子，占不小的数量。仙居仅镇压者即占百分之〇·六。他们中除部分被改造之外，大部分对我有深刻的阶级仇恨。另外，我们在合作化过程中，政策上也有一些问题：一是高级化中对地主、富农无分别无步骤地吸收进来，模糊了阶级界线，助长了群众的麻痹思想。二是对兵痞流氓等旧社会渣子，所谓“不三不四”的人，常常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缺乏区别对待与积极改造的措施。因而他们抱有极大成见，易于被敌对阶级分子所利用。

仙居重要闹事事件中，约有三类情况：一是由于内部矛盾没有处理好，引起广大群众不满，群众闹事中，坏分子渗透进来；二是反革命分子制造的；三是纯系内部矛盾。第一种占大多数，后两种占少数。因此三类矛盾互相渗透，内部矛盾是主要的。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官僚主义作风是很突出的，它是使客观矛盾不能正确处理，使矛盾扩大到尖锐化的

程度，成为闹事最主要的原因。

（三）

对闹事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处理？党内争论很多。争论焦点在于：如何区分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对闹事群众是采取团结的方针，还是压服的方针，对参加闹事的敌对阶级分子是及时镇压还是一味宽大？具体的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对合作化问题：在闹事初期，广大基层干部是害怕"一动百摇"，必须"百分之百"的态度，在未闹事的社，既不积极作好巩固工作，又不敢宣传自愿原则，既不主动分社，又不允许退社，而是采取"捧牢"的办法，及至群众闹起来以后，则是采取"顶牛"办法，结果是散社垮社。事实证明，凡是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对个别坚持退社户允许退社，可以避免闹事；如果早允许分社，还可以减少退社。在闹事后期，则转到另一种情况：一是对仙居合作化失去信心，对秋收前后，扩大高级社，办初级社，争取合作化恢复优势，表示怀疑。二是"越少越好，越精越好"，甚至提出许多苛刻条件（什么"五大保证"、"四精"），限制退社农民重新入社。

经过事实教训，现在认识上已获得统一，这就是在闹事中采取了在肯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作好工作的基础上允许分社和退社，闹事后，积极进行了整理恢复工作，现在到秋收前全力巩固，秋收后积极发展争取优势。

二、对闹事事件的处理问题：县委从闹事开始时，就确定在争取广大群众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处理闹事案件，并将县的政法部门、兵役局、部队和专署公安处帮助工作的同志组成办公室，组织了侦察力量，到重大闹事案件地区进行侦察鉴别工作，做好处理准备。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争论：一是基层干部多半要求多捕人，县委坚持了少捕的原则，共捕了九人，拘留四十二人。拘捕的是多了一些。事后来看，不可多捕，不可早捕，也不可不捕，但要在群众条件成熟时再捕。二是有些同志把闹事原因全部归咎于合作社，或者全部归咎到干部作风问题，对于敌我矛盾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过于忽视了，似乎认为"作好工作，允许退社"就缓和了与群众的关系，因而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界线不清，忽视镇压敌人；一般闹事与严重违法界线不清，忽视处理违法分子。六月初县委开了专门会议，组织了大批力量，由点到面的开始处理工作，处理的政策是根据分清敌我、区别对待的原则，对群众一般闹事者，从团结出发，进行调解协商；严重违法者，依法处理；对敌对阶级分子闹事者依法惩办；对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者，本教育改造精神，按照不同情况分别依法处理并在群众中宣布。

在处理合作社和闹事问题时，有计划地展开政治宣传工作，进行团结教育、政策教育和法制教育，划清是非界线，揭露坏分子阴谋，明确合作化前途。

上述方针政策问题，以及政治宣传工作问题，在党内不能及时统一，是闹事地区扩大，时间拖长的主要原因。

（四）

闹事之后，情况又起了基本变化，合作化由百分之九十一降低到百分之十九，两条道路的矛盾又成为农村主要矛盾了。社内关系还没有解决，社内与社外关系又突出起来了；部分

党员和干部对退社农民有报复情绪和排斥的态度，另外少数富裕农民和“不三不四”的人以及敌对阶级分子积极地进攻合作社，讽刺打击社员甚至破坏生产。因此今后的基本任务将是集中力量解决合作化问题。目前到秋收以前集中力量巩固现有合作社，秋后主要是扩大高级社，组织初级社，争取合作化的优势地位。明年再考虑全盘高级化问题。巩固与恢复合作社中，有以下几个环节。

一、组织力量进行系统的经济政策的调查研究，逐步的调整国家与合作社的关系。如粮食与经济作物关系，主粮与杂粮关系，以及粮食的统购统销问题。

二、调整合作社内部关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社规模不要太大；已太大者适当分小（根据各地经济情况与合作社基础），或采取联社办法，由各队独立经营。二是加强合作社的财务管理。是要有人分工管财务会计工作，每乡要有一至二个会计辅导员，专管财务工作，不许任何部门挪用。

三、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阶级政策。首先是从政策上和组织工作上把贫农、下中农团结起来。有了这一条，一切问题才有巩固的基础。其次是对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是必须坚持的，而且已成突出问题，但要采取耐心教育和正确的政策加以克服。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团结改造多数，孤立少数。对地主、富农，要在群众条件成熟的时候，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检查，划清阶级界线，分别把表现好的个别吸收到社里来，表现不好的放在社外，监督生产，对进行破坏活动或参加闹事者依法处理，准备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分批地吸收到社内，过急是不利的。

四、展开大规模的农村宣传工作：一是对广大干部和党员进行形势教育和群众观点的教育。教育他们善于区分内部和敌我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的处理方针，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二是在广大群众中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阶级立场的教育和法制教育。三是对干部和群众普遍进行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教育。

为了实现恢复合作化的任务，必须下决心组织大批干部力量深入农村，进行工作。

当否？供参考。

杨　心　培

一九五七年六月

中共中央关于
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

随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各地、各界的深入开展，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了。根据目前的统计，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约有三、〇〇〇余人。党内的右派分子，多数是解放前后入党的，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应该看到，从党内发现出这些右派分子，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很大成绩，这对于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的意

义。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在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质和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党籍采取从严的方针之后，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他们划为右派，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有的单位甚至因此影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和开展。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指出，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但是，既然他的言行同党外右派分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同样地划为右派分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了解，党内右派分子有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有较多的政治资本，因而也就容易欺骗、蒙蔽和影响群众。同时，他们又和党外的右派分子相呼应，相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因而对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这种党内右派分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于那些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分子。因为这样，不但对于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不利的，而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尤其有害的。

中共中央关于
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另印发北京各单位）

现在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厂中的整风运动正在逐步开展，不少地方来问在农民和工人中要不要划右派分子。中央认为：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没有改变成分的，即照原来的成分对待，已经改变了成分又进行捣乱破坏的，可以分别恢复他原来的成分，戴上原来的帽子，但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各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一律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此点望即通知工厂和农村中的党的基层组织。

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向工商界报告处理工商界意见的初步结果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

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九月十三日邀请出席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举行座谈会，向他们报告政府对工商界人士提出的意见的处理经过和改进办法。出席会议的有两会中央委员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代表共五百多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李维汉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孙起孟主持，他说，今年五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会上除少数别有用心的的右派分子恶毒地向党进攻，并已遭到广大工商业者的回击以外，大多数的批评和意见是正确的、善意的，当时就成立了三个小组作了深入的研究，现在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研究。

接着由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周光春、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商业部副部长吴雪之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许涤新分别就有关问题作了报告。

周光春谈到公私合营工业的情况和问题。他说，一年多以来，公私合营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显示了合营企业的优越性。表现在：生产一般提高30%以上，产品质量有很大改进，职工情绪高涨；劳资纠纷减少，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有所改进。绝大多数工厂在合营后改进了劳动条件和职工福利，有条件的工厂实行了劳动保险，有些工厂实行了劳保合同。此外，还提拔了工人干部，安排了私方人员，广大职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思想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周光春指出，目前公私合营企业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企业管理方面还有些一般化的做法，不少合营企业的表报多、会议多，管理机构和其他非生产人员增多，工厂的权限还缺乏明确的规定等。

周光春说，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对这些缺点和问题，已作了研究，并提出初步解决的办法，报国务院批准。今后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一、加强公私合营工厂的政治思想工作，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和勤俭办厂的方针。二、在企业管理方面，今后工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公私合营工厂规模的大小，结合现在的管理基础、技术设备条件、产品品种繁简、从事制造还是修理、经营方式、生产集中还是分散等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分类进行管理。三、报表多、会议多，必须认真加以精简，目前已规定了一些精简的办法。四、用提高和发展生产的办法来逐步改变合营工厂管理机构和非生产人员过多的现象，逐步降低非生产人员和全厂职工的比例数字。此外，关于公私合营工厂的财务管理的权限和人事调配权问题，周光春也提了很多具体改进意见。

刘子久从国家生产发展的情况，以及城乡关系、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关系、工商

业者同工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说明有些人要求目前多增加工资是有困难的。他希望大家正确地认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并且不能从一时一地，或某一企业的生产，而是应该瞻前顾后，从全局观点来处理工资问题。他指出目前只能适当地保证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生活。

吴雪之就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教育、改造以及合营商店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商业部认为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通过开展大辩论的形式来进行，辩论的主要题目，除了工商界整风中所提出的题目以外，还可以着重辩论两个问题：一、究竟是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好？还是单干好？二、正确地认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辩论第一个题目的目的，在于帮助广大小商贩认识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参加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不论对国家、对自己，都比单干好，使小商贩认识到应当爱国守法，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那些企图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不遵守国家的物价政策，不服从市场管理法令，进行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行为，都是企图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回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完全是错误的。辩论第二个题目的目的，在于帮助小商贩认识到国家对小商贩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政策的正确性，认识到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批判那些只顾多分红、多得工资，而不留公益金、公积金、互助合作基金，不愿把公积金的一部分统筹联合使用于较大范围的基本建设，甚至企图把以上这些基金分掉的错误思想。

关于公私合营企业董事会和业务改进委员会问题，吴雪之说，合营企业原有的董事会一般仍可以继续存在，至于行业董事会，因它的作用和任务同业务改进委员会、同业公会的作用和任务重复，今后只有某些特别需要的行业，才成立全业性的董事会。吴雪之说，商业部确定按专业公司系统成立业务改进委员会，北京、广州、长沙、青岛等地已在上半年进行试点，准备将各地经验加以总结以后，再行逐步推广。

关于大城市商业局、专业公司和市辖区的区委、区人民委员会对基层商店的领导分工问题，以及小商贩进一步改造等问题，吴雪之都作了说明。

许涤新说，五、六月间中央统战部的工商座谈会上大家提出的意见共归纳成二十四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和处理的除上面几位同志已经报告的以外，还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关于公私合营企业清产核资遗留问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已提出了处理办法，并经国务院批准下达。这些规定是：（1）根据国务院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一日颁布的"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在这个规定公布以前已经进行过财产清估的合营企业，如果清估偏紧偏松，或提取公积金过大，其清估结果不再作变动。如果个别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必须予以照顾，可由当地有关部门和私方代表协商，适当提高定息息率，增加的息率从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计算。（2）有的地方，清产核资时从原企业的资产中提取一部分"准备金"，作为偿还未了债务之用。现在对这笔未用的"准备金"可以转作原企业私方的股本，如果企业原来有公股，按原私股比例转作私股。（3）企业合营时的待处理财产，除去一部分一时无法处理的财产（如冻结外汇等）以外，其他待处理财产，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加以处理了结。

二、对于已经裁并改组的华侨企业，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华侨投资，仍可加挂原来厂、店的牌号；华侨企业原来已经注册的商标，在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原则下，可以恢复使用；今后对华侨企业的裁并改组，必须注意到对华侨投资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影响，慎重进行。

三、关于女私方人员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现已规定不论女私方人员核定的股金多少，一律按照她们所在企业的女职工同等待遇。

四、关于工会同工商联的工作关系，经政府和全国总工会研究后，确定今后对两会有关的问题，两会市级机构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互相交流情况，适当解决一些问题；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联合举办文娱活动；两会基层组织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可以协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双方还可以举行一些专门问题的会议。

此外，关于大家提出的工商联同各有关业务部门的关系和经费开支问题，已经提出了解决办法，并已在今年七月七日公布。关于私营工商企业的文书、材料、帐册的处理问题，也已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家档案局研究，并提出了处理的意见。

许涤新最后说，除上述问题外，还有公私共事关系、私方的福利待遇同工商联互助金的界线等问题，因牵涉的方面比较广，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

孙起孟最后说，今天的会议从两个方面有力地驳斥了右派。一方面，从政府有关部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孰优孰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到底是不是关心人民，认真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的报告还戳破了右派分子所说的反右派斗争是为了抵制鸣放的污蔑。事实证明：政府对工商业者提出的善意批评和意见是十分重视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坚决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并且认真加以克服。

（9月14日《今日新闻》）

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在全国农村中逐步展开。中央认为：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在上级党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接着这个大辩论，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一）整顿干部作风。农业合作社绝大多数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在工作上是积极的，有成绩的。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在联系群众、经手财政、管理生产、处理人事等问题上存在着某些缺点或错误。至于违法乱纪、错误严重的，则只占极少数。整顿干部作风，就是要帮助他们改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并把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带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多数干部，同那些违法乱纪、严重错误的极少数人分别开来。各地合作社对于这个整风的部署，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拟定，但大体上要依序采取如下的做法：第一，先在合作社干部中，在党团支部中，充分说明整风的必要性，说明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使干部们和党团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第二，放手让社员群众在社员代表大会上，生产队全体会议上，或全体社员会议上，对于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第三，组织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小型会议，查清事实，分别缺点错误的大小轻重，分清责任，然后由犯错误的人在一定的群众会议上作自我检讨。属于群

众误会的事，应该解释清楚。如果有地主、富农、投机商、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必须依靠群众，在适当场合加以揭穿。第四，党支部和上级工作组要按照惩前毖后（戒于前而慎于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群众在一起研究处理的方案。在群众的谅解之下，对错误并不严重而又表示决心改正的干部，不必给予处分，对于错误严重，处分也要适当，使他们得有改正的机会。第五，合作社干部的改选，应该由社员群众自下而上地层层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党支部在选举方面的领导，不能采取指定的做法，但必须注意使合作社的领导成份保持原来贫雇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同时注意使上中农也有适当的代表人，以利合作社的巩固和团结。

（二）调整社和队的组织。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要力求便于经营管理和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为此，它们的组织规模大小、应该照顾地区条件、经济条件、居住条件和历史条件，容许有各种差别，而不应该千篇一律。根据一年多的经验看来，在多数情况下，一村一社是比较适当的。有些大村可以一村数社，有些距离较近的小村也可以数村一社。现在各地合作社的组织（包括某些大社在内），凡是业已经过考验，确实办好，而为群众所满意的，就应该稳定下来，不要轻易变动。但是，有一部分合作社的组织规模是过大的，不适当的，应该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调整，或者把社划小，或者保持联社的形式，由分社（有的叫小队）自负盈亏。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按照各地方的特点，可以有所伸缩，过大不便管理，过小会损害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在调整社和队的组织的时候，必须注意各部分群众的意见和利益，经过充分的协商，提倡互助互让，调解分歧，恰当处理土地、农具、耕畜、水利、林木等等经济问题。在慎重地调整社和队的组织之后，就都应当长期稳定下来，以利生产和建设。

在社、队关系的问题上，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既要克服某些合作社过分集权的弊病、也要防止生产队权限过大、形成分散主义的偏向。

（三）统筹安排，使全体社员各得其所。合作化后，除了灾区以外，大多数社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有一部分社员还只保持原来收入的水平，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社员因为劳动力不足或其他原因而暂时减少收入。对于其中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应该根据互助原则，适当安排他们在社内的劳动，或者适当帮助他们发展家庭副业。对于五保户，也应该根据他们的能力，分配一些可能的轻便的工作，使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劳动收入，只在劳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才由社用公益金给予照顾。对于富裕中农，除极少数坚决要求退社的，可以在适当批评之后允许退社以外，应该根据互利原则，按期归还他们入社生产资料（例如，农具、耕畜、果木，等）折价的款项；或者经过协商和群众讨论，按照不同情况，在不损害贫农、下中农基本利益的条件下，采取比例分红或其他可以妥协的办法，处理他们入社生产资料的遗留问题，使他们得到适当的收入。对于有丰富劳动经验和较高生产技术的老农，要发挥他们的特长，按照他们在生产上的贡献，给以合理的报酬。对于从事手工业、运输业、渔业和其他非农业劳动的社员，应该照顾他们的劳动特点，适当处理有关的各种问题，使他们得到合理的收入。

（四）改善生产管理，拟定生产规划。全体社员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只有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依靠合作社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整社工作必须不误生产。在正确处理内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各地合作社应该总结本社的经验，参考其他合作社的经验，根据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并根据中央关于做好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结合具体情况改进生产管理工作，克服缺点。同时，要发动全体社员，讨

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且根据本地本社的特点，研究增加农业生产和发展多种经济的措施，实事求是地拟定下年度和长期的生产规划，作为全体社员努力奋斗的目标。合作社拟定生产规划，必须服从国家经济计划和政策的指导，尊重其他合作社的利益，避免本位主义。生产规划应着重利用本社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的基本建设，例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等等，为扩大再生产准备必要的条件。

以上的整社工作，应该从现在起到明年春耕以前，逐步进行。这是巩固合作制度的重大关键。各地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完成这个任务。

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农业合作社在增加农业生产上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发挥合作社优越性的主要关键之一，在于做好生产管理工作，充分发挥所有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做到既能够增加社员劳动出勤率，又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保持统一经营和集中领导。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从而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和季节性，加上目前农业生产主要还是手工操作等特点，因此在生产管理上，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把合作社的统一经营、集中领导与发挥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主动性、灵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就成为指导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了的合作社，就能更好地发挥社员的积极性，生产有秩序、生产管理就做得好，生产就增加得快些。反之，生产管理就作得不好，社员积极性就发挥得少，甚至常常发生主观主义和窝工浪费、无人负责等现象，从而影响了增产。为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制度，中央认为：

第一、合作社必须在有利于巩固统一领导、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制度。管理委员会是合作社统一经营的领导机构，凡属全社的生产资料使用、生产计划、基本建设、技术措施、资金筹集、劳力调配、工分定额、分配方案、财务会计制度等，都由管委会根据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的决议，统一计划，统一规定。但是，应该认识，这些计划与规定，都要通过生产队、副业组去执行。生产队，是合作社组织劳动、管理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副业组，则是管理副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生产队和副业组管理农、副业生产，必须遵守社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但是，生产队和副业组在生产管理过程中负有自己一定的职责，因而也就应当赋予它们一定的权限，在服从管理委员会统一的生产计划的原则下，对于某些技术措施的改进，工分定额的临时调整，多余劳力的安排，小量副业的经营等，生产队和副业组都应有一定的伸缩权限，使之便于因时因地制宜，以利生产。各地必须改变社管理委员会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毛病，同时也要防止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要通过社和队的民主讨论和社员代表大会，明确划分社与队的职责与权限，做到上下合理分工而又相互

协作，从而搞好生产。

第二、必须普遍推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并实行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分的办法。这是社队分工分权的一项根本措施。每年的生产计划指标，应该是积极的，可靠的，高于常年实际产量，并且力求逐年有所提高，以推动生产前进；但是在生产队积极完成合作社生产计划指标的条件下，包产指标应该略低于计划指标，使包产的队有产可超，有成可提，以鼓励所有队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超产部分提成多少，减产扣分多少，各地各社可以酌情自定。

第三、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中，必须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按照各地具体条件，可以分别推行"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这是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一种有效办法。生产队必须加强劳动纪律教育。每个社员都应该保证按时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完成生产任务，爱护农具耕畜，节约生产成本。要做到每一块耕地、每一件农活都有生产小组和专人负责，在农活完成之后有专人负责验收。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克服现在某些合作社耕作粗糙，土地撂荒，无人负责的现象。

第四、合作社必须坚持集体劳动的根本原则，既要明确分工，又要互相协作，并要合理使用劳力。农业生产上的集体劳动，应力求适合于前述的农业生产的特点。除了按季节按农活分片分块包工，尽力避免临时派工，防止窝工浪费以外，还要按照不同的农活性质，规定那一些农活应该集体进行，那一些农活则可分散进行，即所谓：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在实行集体干活的时候，也要划定地块地段，彼此分头进行，实行分工协作。不应该"干活一窝蜂"，以致责任不明，耕作粗糙。在劳动时间上，应按照各地历史习惯，因地制宜，决不可模仿机关、工厂的上下班制度，并应避免出工时互相等待，浪费时间，以致降低劳动效率。

第五、合作社必须充分利用社员的一切劳动力，合理分配社员的工作，切实执行统筹兼顾、逐户安排的方针。社管理委员会，特别是生产队，应该仔细了解每个社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特点和特长，做到"用其所长，各得其所"。对一些有特殊技术的社员，如园艺、养鱼、养蚕桑等，应该继续分配他们去担任这些工作。对于过去从事其他专业劳动的社员，如手工业、运输、伐木工人等，合作社应该把他们组成副业组，继续经营。这种特殊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的计算，应该与农业生产分开，不要混在一起。如果合作社没有条件经营这些生产，可以让他们自己去经营，自负盈亏，合作社只抽取其一定的公积金、公益金，并给以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劳动力弱的人，则应当从副业生产、田间管理和包地块等方面，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此外，对于社员参加社内劳动与参加家庭劳动的时间，应当本先公后私、适当兼顾的原则，加以安排。

第六、合作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对于农业生产管理工作的好坏，关系很大。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种种特点，又由于目前农业社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不高，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也证明中央一九五六年九月指示中规定合作社规模的一般标准，是适宜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今后社的组织规模，一般应该以百户以上的村为单位，实行一村一社。有些过小的自然村，相隔又很近的，可以几村办一社。过大的自然村，可以一村一社，也可以一村数社。山区三两户的小村庄，可以组织合作小组，也可以入社后在经济上自负盈亏。关于生产队的规模，一般应该以居住接近，二十户

左右为宜。在社与队的规模调整之后，生产管理上都应该实行两级制，取消原来的三级制或四级制。层次过多，对于深入工作、联系群众和组织生产，都是不利的。

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了之后，应该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

第七、合作社的技术措施和耕作改制，必须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上级农业部门应该指示方向，积极提倡，典型示范，交流经验，而不应该机械规定计划，强迫合作社执行。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必须与当地农民经验相结合。必须研究当地农业发展的历史，重视老农经验，而不能割断历史，不听老农意见。合作社的的生产计划应该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其办法，由国家规定生产指标，逐步过渡到国家只规定征购指标，合作社在保证完成国家征购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国家需要、社员需要和社的可能条件，制订合作社自己的生产计划。

第八、所有的合作社，都必须积极地、在适当增加社员收入的基础上，逐年增加公共积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经常设法扩大生产门路，使当年生产与扩大基本建设相结合、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为此，所有的合作社，都应该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出发，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及近年来的经验，发动社员参加讨论，制订合作社五年或十年的生产规划。首先可制订简单的纲要，然后再逐步具体化。

在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指示的同时，必须加强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务使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工作，在广大社员的自觉行动和监督之下逐步地加强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

正确执行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曾是我们实现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顺利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今后巩固合作社的一个重要保证。

在实现合作化的时候，实行互利政策的重点，主要是合理地处理生产资料入社的问题；合作化实现以后，互利政策的重点，主要是经过合理的生产分工和合理的分配，恰当地调节各社员之间，尤其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收入问题。目前的情况是：贫农和下中农入社以后，由于按劳取酬原则的实行，绝大多数都比入社前的收入增加了，但是也有少数劳力少人口多的困难户比入社前的收入有所减少。上中农和部分非农业劳动的社员入社以后，他们的劳动收入分为三种情况：一部分人增加了，一部分人保持原有水平，一部分人暂时减少了。产生这后一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由于合作社初办时期的生产水平不可能很快提高；同时也还由于部分同志对互利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执行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因此，有必要在积极地增加生产的同时，认真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合理地调整合作社内部各部分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做到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这对于加强社内团结、巩固合作社有很重大的意义。

为此，根据现有的经验和互利政策的精神，提出如下各点：

一、对于可能减少收入的社员，首先是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应该在劳动生产分工上（如安排田间管理的零活时）和经营社内及家庭副业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家庭辅助劳力的作用，增加自己的收入。

二、非农业户在入社后减少收入者，应该适当地调整其工作。原来的小商贩，可以经过商业供销部门的同意组织代销代购小组，划归供销社管理。原来有其他生产技术的（如各种手工业等），应尽量利用其生产技术，组织合作社经营的或个人经营的各种手工业生产。如果是由社经营，则应按照他们技术水平的高低，适当地调整劳动工分，使能得到合理报酬，增加收入。

三、某些特殊的生产资料，如鱼塘、苇地、果园、桑园等，原主投入劳力较多，现在收益较大，如果是属于小量的，可以部分或者全部暂不入社，归原主经营。或者入社后，仍然包给原主经营，实行比例分益，在包工包产上给予适当照顾，使原主能增加一部分收入。

四、成片的果树、林木是应该统一经营的。但它是多年的劳动成果，如社员各人的占有悬殊较大者，一般应该由社统一经营，实行比例分红。已折价入社，如社员意见很多者，也可改为比例分红，并且规定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维持不变。在山区、丘陵区多数社员的林木占有悬殊不大者，可以折价入社，分年还款。

五、对于入社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多余的折价款和社员的投资，应该按期归还，并应付给应得的利息。如果折价过低，社员意见很多的，应按入社时的一般市价作适当的调整，但基本合理者不再变动。在正常年景下，上述款项如果拖延不还，必然会减弱或丧失社员对互利政策的信用，引起原所有主不满，这对于巩固贫、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如果原来规定的还清期限太短，事实上不能按期还清时，应同原主协商，适当延长。

六、多民族地区的民族联合社，除必须尊重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宗教的习惯外，还必须注意在经济利益上的互利，特别是要照顾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社员的经济利益。

七、为鼓励发展畜牧业，除了合作社统一经营以外，应该允许社员家庭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如牛、马、骡、驴等，完全归自己所有。合作社如要使用社员的耕畜役畜时，应照付适当租金。

八、对于个体农民，要加强领导，教育他们遵守政府法令，争取他们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加入合作社。

上述各项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做好夏收分配工作的指示中，已经做了一些规定，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一并研究执行，

所有上述这些调整各社员之间，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之间具体经济利益的工作，都必须通过社员群众的讨论和有关方面的充分协商，使之合情合理地得到贯彻。我们应该教育干部：在合作社内部，首先必须依靠原来的贫农和下中农，坚决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巩固合作社的基础；同时又应该切实注意上中农的利益。我们还应该向贫农、下中农说明，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于上中农合理的经济利益给以适当的照顾，甚至作必要的某些让步，更好地团结他们，求得更顺利地巩固合作社，这是符合于自己的长远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教育上中农，为了自己将来更大的利益，他们也应该照顾贫农、下中农的利益，贫、中农团结在一起，坚决办好合作社。应该指出，上中农是劳动农民的一部分，他们占农村人口

20%左右，生产技术较高，对于一部分老下中农还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对他们的团结。但是，他们（特别是入社前有部分剥削收入的老上中农）有较多的资本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具有动摇性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合作化的高潮时期绝大部分加入了合作社，现在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要退社，并进行一些不利于合作社的活动。因此，我们对待上中农不只有团结的一面，还必须有批评改造的一面，（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许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决不许可迁就这些动摇的上中农。我们一定要加强思想领导，批判这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犯右倾的错误。但是在经济上，我们应当适当照顾这些人的合理利益，认真执行互利政策，而不应当损害他们的利益。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犯左倾的错误。总之，我们对于上中农的团结，必须建立在首先巩固合作社内部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加强对动摇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在多数农民与上中农之间坚决贯彻执行互利政策这样三个条件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团结全体农民、巩固合作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社论

本报在今年七月一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曾经说："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为什么说他们是反动派呢？

什么是反动？反动和革命是矛盾斗争的两种倾向，反动就是逆革命之潮流而动。历史是向前运动的。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决地打破旧制度，创建和发展新制度。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违反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新制度产生以前顽固地维护旧制度，在新制度产生以后破坏新制度，企图恢复旧制度，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所以，划分革命和反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标准。在封建主义没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反对封建主义而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曾经是进步的阶级。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社会主义兴起的时期，维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成了反动的阶级。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需要摆脱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制度，这是客观历史的要求。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领导全国人民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因此它是最革命的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顽固地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竭力阻挡历史前进，因此是最反动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或者同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它的革命性的一面；它害怕革命的基本力量即工农大众，没有彻底反对革命敌人的勇气，这是它的妥协性的一面。在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什么是划分革命和反动的标准呢？现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

命。因此，反对资本主义道路，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坚持资本主义道路，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在今天，工人、贫苦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是革命派的主力；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弄不清呢？

有一部人弄不清，是因为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标准来划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和反动派。他们忘记了现在革命的任务不同了，性质不同了。在民主革命期间，资本主义还有一部分积极的作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还可以参加这个革命或保持中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改变的现在，资本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它已经不能再帮助生产力发展，反而要阻碍生产力发展，要使社会倒退。在这样的时候，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而反对无产阶级的分子，就不但不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势必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了。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在那时，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统一战线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要求，这就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因此他们能够加入这个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也是有矛盾的，各有不同的阶级要求。不过，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这种矛盾一般还不至于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还可以获得调节。但是，在当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对于民主革命就是不坚决的，甚至是不赞成的。他们所宣传的改良主义道路和“第三条道路”的反动幻想，就表示了他们对于民主革命的抵抗。他们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已经不能避免新的政治上的分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自然更不能避免新的政治上的分化。在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无产阶级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但是在他们中间还只是少数。另一部分人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现在的右派，也只占少数。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坚决的立场，他们是中间派。但是这种中间状态只是一种过渡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每一个人所必须考虑的只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和新民主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还是可以存在的）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问题；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每一个人所必须考虑的却是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问题。在前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勉强还能在形式上同国民党的反动路线、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并立，保持一个“中间道路”的假象。在现在，这种“中间道路”就连名称也不能成立了。或者是坚持资本主义，这就要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或者是坚持社会主义，这就要拥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粉碎一切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势力。当前的问题就是这样简单明了地摆着。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没有折衷的余地。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需要一个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接受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是不可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在他们和广大人民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国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且已经庄严地记载在我们的宪法之中。谁要是反对这个立场，谁就是违反了我们国家

的根本大法，谁就是甘愿做一个抵抗历史潮流的反动分子。这难道不是清楚而又清楚吗？

或许有人会说，资产阶级右派至少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呀，把他们看做反动派，不是跟国民党没有区别了吗？

我们说：如果资产阶级右派上台，如果他们的政治阴谋能够实现，那最后的结果就不会同国民党当政有什么根本区别。而且在实际上，他们如果一定要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就非依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不可。因此，要他们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等等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道路上，不仅现在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就是过去也没有。有的只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亦即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好象是在中间，而实际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的改装。

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个事实：那些醉心资产阶级民主的人物，那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那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号召，首先受到了谁的支持呢？正是美帝国主义。难道美帝国主义真希望中国得到自由和独立吗？当美帝国主义认为单靠蒋介石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看中了这些人。这是为什么呢？事情是很明显的，要反共，就势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不会有别的出路。

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案，不但早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许多著作里从理论上驳倒，而且也为全部中国革命的过程从实际上推翻。一九四九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这样写道：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导领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所以，企图现在在中国恢复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是要毁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且是要断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把中国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反共不等于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不等于反人民。你们为什么要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在一起呢？"有的右派分子这样说。

社会主义并不是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可以服用的什么药丸。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联合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结果。它要消灭资产阶级，改造小生产者，并且杜绝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胜利和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全世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也只能由共产党领导，而全世界一切反共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也都反对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保证。反共必然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必先反共。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本来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

"我的动机是爱国的。"有的右派分子又这样说。

爱国不是抽象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今天，爱国就是爱我

们的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的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是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分不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就是违背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就将使中国重新陷于被奴役的地位。难道这还是"爱国"吗？

"他们不过是对党的某些政策和国家的某些制度提出一些批评罢了，也许批评得过火一些，但是给戴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未免有些冤屈。"这又是一种看法，右派分子也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辩解。

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共产党需要而且欢迎群众对它提出批评，帮助它改进工作。凡是善意的批评，即使言词有些过火，或者批评错了，都是用得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条原则的。但是右派分子是根本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根本背叛人民的事业，那么，即使他们的某些话在形式上也好象很堂皇，很客气，也不应该为了摆出"雅量"而认敌为友。右派分子中有各色各样的人。有的是赤膊上阵硬打硬冲的，这种人的面目容易认清；有的是富于政治经验的老奸巨滑，暗中活动而不露声色，甚至还能装出一副老实可怜相的，这种人就比较能迷惑人。一般地说，右派分子都知道，公开提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危险的，是于自己不利的，所以他们的办法是从具体问题着手来展开进攻。这就是说，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原则上"拥护，实质上反对，表面上赞成，暗地里捣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内容的。如果说，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就是"党天下"，那就是不要党的组织领导；党不应该拿出成品来，要成立"政治设计院"，那就是不要党的政治领导；不要进行思想改造，认为马克思主义讲多了就是教条主义，那就是不要党的思想领导；要党退出这里，退出那里，说党不能领导这个，不能领导那个，那就是要党放弃对各个部门的领导权；叫嚷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其他等等都搞糟了，那就是党根本不应该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试问，把这一切具体内容都否定之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除了一个空名以外还剩下什么呢！所有这些都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带根本原则性的问题，是考验一个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的问题，是考验一个人对于人民事业是拥护还是背叛的问题。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批评是有区别的，是看得出来的、人们应该学会区别尖锐的但是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那怕是隐晦的批评，才不致上当。

还有人认为，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美蒋并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似乎不好说他们是反动派。其实，反动并不一定要同美蒋有组织上的联系，不同美蒋联系，仍然可以一样搞反动活动。破坏农业合作社、向农民倒算甚至组织暴乱的地主，难道因为同美蒋没有直接关系，就不是反动派了吗？当然，这些人里也还会有同美蒋有组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那样就不止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了。

最后，或许有人问：既然右派是反动派，为什么一般地不这么称呼，并且一般地不办罪？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巩固程度足够允许这样做，而且这也给右派分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坚持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为了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同时也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一部分右派分子认识到没有别的出路，因而不能不向人民认罪投降，改过自新。

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

邓　子　恢

毛主席说过"巩固合作社是全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把合作社巩固起来。如何才能巩固合作社？中央总结了六条经验，写在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上，即（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二）贯彻阶级路线．（三）贯彻民主办社．（四）不断扩大再生产。（五）坚持勤俭办社．（六）合理分配．这六条同志们都讨论过了，我现在不再重复，只着重谈以下四点：

第一，改进生产管理工作．这是当前保证农副业增产、巩固合作社的主要关键之一．改进生产管理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所有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到"人尽其才"，既增加劳动出勤率，又提高劳动效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区别农业社生产管理和工厂生产管理的特点，必须研究农业生产的分散性，野外作业，手工操作等具体情况，总结各地合作社一年来管理生产的经验，建立和健全适合于农业生产特点的生产管理制度，把社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把社的生产管理好，而保证合作社不断增产和巩固。这些制度一年来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创造了一套，这就是"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制"，我现在把这些制度归纳为以下几点加以说明：

（一）所谓"三包制"，即生产队包工、包产、包财务，这是处理社与队关系的一种最好办法．社将土地、耕畜、农具、肥料、种籽等交给生产队负责管理，在报酬上究竟是做多少工就记多少工好呢，还是包工制好呢？在农作物收获上是产多少就交多少好呢，还是包产制好呢？在财务开支上是用多少就报多少好呢，还是包财务制度好呢？显然三包制度是比较少弊端、少争吵，从而也是比较进步的制度．某些深远山区三五户的小村庄也可以包产到组，个别不适宜于集体包产和零散的农作物也可以包产到户，这与浙江某些县所实行的"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有原则的区别．

（二）所谓"两个指标"，超产提成，减产扣分制度，是队与社关系的进一步合理化．过去各地也有包工包产制，但包产指标与计划指标多是一个指标，队员看到完成计划指标费力较大，就能完成也超产不大，提成不多，因此积极性往往不高．现在改为两个指标，计划指标略高于常年实际产量，而包产指标则略低于计划指标，使包产的队有产可超，有成可提．这是鼓励队员积极性的有效办法，总要队员积极性高，超了产，队员好，社也好，国家也好．这是有利无害的．当然包产指标太低也不好，没有特殊原因减了产的，适当加以处罚，也是必要的．

* 这是邓子恢同志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第四部分的，这部分的原题为"关于巩固合作社问题"．

（三）所谓"工包到组""组包片"，是处理队与组关系的一种好办法。生产队把某一片地的某一季节的农活交给组去经营，是采取评工记分的老办法，还是按片按季节包工好呢？显然包工制是比较进步的，这样就可以避免队长"临时派工""临时调兵遣将"浪费时间的毛病。

（四）所谓"田间零活包到户"，是处理组与组员关系的一种灵活的办法。田间管理的零活，用个把人去做就行了，如果也是每日派工评工，既浪费时间，质量不好又不容易查清责任。改为"按田定额，包工到户"，一般田间零活工分都事先按地块评定好，包给户去做，这样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可以避免耕作粗糙的现象。而且，包给户以后，全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都可以用上，早晚做、白天做都可以；在安排劳动的时候，对困难户就比较好照顾。

（五）所谓"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就是说劳动组织必须适合于生产的需要。"敲钟集合、等齐下地""干活一窝锋""班排进攻"这类的做法，浪费劳力很严重，必须把它克服过来。主要农活必须集体干，但是，做活的班子必须组织好，需要几个人就去几个人，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去什么样的人，有些零活就可以由各户分散去干。集体干的活，也要分块、分地段、划清界限，彼此分头进行，贯彻执行个人责任制，以收人人努力之效。

（六）所谓"统筹兼顾、逐户安排，用人所长，各得其所"，是今后互利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生产管理的重要内容。但"用人所长，各得其所"是一件非常细致的组织工作，不能草率从事。"用人所长"可以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办法，争取做到所有的社员都有适当的工作。南方有些地方有些社，土地很少，非农业户很多，安排确有困难，但也必须想办法安排。要说服干部耐心地、认真地去解决困难户（首先是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的问题。

（七）实行牲口"分户喂养、养用合一"制度。这种办法，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分户喂养能提高社员爱畜、保畜的积极性；能提高牲畜的配种率，繁殖率，成活率；能减少牲畜的瘦弱、死亡。耕牛应该分散喂养，骡马在有集中喂养习惯的地方，也可以集中喂养，开始以分惧喂养为宜，不要过分集中。

（八）此外副业生产的管理和劳动计酬是个大问题，应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社、队、户经营副业生产的范围，各地应有个规定。社员家庭副业一般以限于家畜、家禽的饲养和家庭手工业为好。生产队经营的副业不宜太多。合作社还可以经营国家委托的加工业生产，但不能经营商业。

第二，是要不断扩大再生产。这是巩固提高合作社的一个基本关键。因此，必须教育合作社的干部和社员积极进行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办法有两条。一条是扩大公共积累，在增产的情况下，合作社公共积累增加的速度，应该大于劳动报酬提高的速度。过去积累太少的，今后应当酌量增加。在年成较好的时候，应当多扣留一些公积金。另一条，也是最主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动员社员多出基建劳动日。全国有社员一亿一千八百万户，每户平均一个半劳动力，共有劳动力一亿七千七百万个，如果每个劳动力每年平均出二十个劳动日来进行基本建设，就是三十五亿四千万个劳动日，这个力量是极其伟大的。合作社应该进行劳动力的全面规划，最好在春前把社员参加社内劳动、家庭副业劳动、国家义务劳动和社内基本建设劳动日规划到户，保证劳动力的均衡调配。基本建设用工占多大比例，各地可以自行商定。

今冬明春扩大再生产应该抓紧这几件工作：（一）兴修水利，这是增产的先决条件．明年全国计划扩大水利灌溉面积六千万亩，改善灌溉面积四千三百万亩，排涝四千七百万亩，保持水土四万八千平方公里，必须鼓起劲来，完成这些计划。（二）增积肥料。（三）在有水有肥的条件下，改变耕作制度。如旱改水，单改双，坡地改梯田等。（四）发展山区生产。山区生产的潜力很大，植树造林并可经营多种经济。陈云同志建议南方多种油茶，北方多种核桃，请各地认真研究一下，并做出逐步实现的计划来。（五）发展畜牧业。农业和牧业不仅互相支援，而且是互相依存。有条件的社可以试办小型牧场，除自繁、自养、自用之外，还可以出卖，借以增加收入。（六）在原料销路有把握的条件下发展副业生产。

基本建设要有长期的全面的规划．长计划（五年、十年）要和短安排（一年、一季）结合起来。规划内容应包括农、林、渔、牧、副业。规划可以由上而下提控制指标，由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定案。

基本建设用工付酬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当年付酬；另一种是跨年度分期付酬；再一种是按劳力摊派义务工，不付酬．比较起来，第一种办法更能刺激社员参加基本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基本建设劳动参加当年分红既不影响合作社的积累，也不影响社员的实际收入．譬如某社某年生产劳动共有九万个工，另外基建劳动有一万个工，当年收入扣除了税收、生产费、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之外，还有九万元给社员分配。如果基建劳动不分红，只按当年生产劳动九万个工分红，则每个劳动日可分一元，共分九万元。如果基建劳动一万个工参加分红，共是十万个工，则每个劳动日只分九毛，社还是只分给社员九万元，这对社来说并无差别．就社员来说也是如此，譬如社员张三共做了二百个工，其中生产劳动一百八十个工，基建劳动二十个工，如果只按当年生产工一百八十个分红，每工一元，可得一百八十元．如果基建劳动参加分红，本人共二百个工，每工九毛，也是一百八十元，并无差别．而这种基建劳动参加当年分红的好处是动员容易，并可以鼓励社员的积极性，避免磨洋工，浪费劳力的现象．但缺点是分值降低，也会引起社员不满，因此要向社员讲清楚，算基建帐．如果社员觉悟高的社也可以采取第二或第三种办法．究竟采取那一种办法更好，各地各社可以按具体情况自定．造林劳动则可以采取包栽包活的办法，俟成活后再记工付酬．

第三，要正确贯彻执行合作社的经营方针．合作社的经营方针应当是：（一）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发展多种经济．这条方针不能动摇．发展多种经济必须研究当地历史，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二）勤俭办社，勤俭持家，要同一切游手好闲的现象进行斗争，反对铺张浪费．（三）要善于经济核算，多举办一些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多的生产．（四）合作社的计划必须和国家的计划相衔接．

第四，是贯彻阶级路线．当前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仍然和发展合作社时一样，是依靠贫农（包括原来是贫农的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一年来各地的经验证明，坚决拥护合作社的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下中农，这是合作社过去能够办起来和今后能够巩固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虽然贫农、下中农也有人对社不满，但他们不满是对工作有意见，是要求把社办好，而不是要求把社搞垮．因此，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必须明确认识自己的依靠力量．但同时还必须认识阶级路线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善于争取团结并改造上中农．一年来各地经验证明，上中农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拥护合作社的，一部分人动摇，另一部分人则对合作社不满，其中有少数人则坚决反对合作社．各地闹社事件主要是最后这少数人主持的．他们利用贫农下中农当中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加上地、富、反革命分子的挑拨，这就是

各地闹社的社会基础。因此我们除了坚决依靠贫农下中农外，还必须做好团结上中农工作，因为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人数在一亿人以上，这是一个大数目，同时他们是劳动者，而且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又比较高，他们对部分下中农仍有相当影响，如果我们不注意争取上中农，而让地、富、反革命分子争取过去，那么农村情况将可能有新变化，所谓巩固贫农优势就将显得困难。这个道理望向各地同志讲清楚。要达到团结上中农，一方面要在政治上批判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要在经济上照顾他们的合理利益，贯彻互利政策。这就是说政治上要抓紧、经济上要适当让步，才能达到团结改造的目的。过去我们有些地方有些社恰恰与此相反，政治上放松领导，经济上却卡得很紧，这也是一年来发生闹社事件的原因之一。今后应接受这个教训。在目前全面整风的条件下，在彻底批判上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之后，要同时注意经济利益的适当调整，不要以为经过思想教育便万事大吉，对经济问题便搁置不理，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

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社论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一九五六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一九五六年的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变革并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村中，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迫切要求合作化，富裕中农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追随潮流，同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确实认识了合作化的利益。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促进了城市的社会主义高潮，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手工业也合作化了。由于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社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在一九五六年除了接受社会主义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同时，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经过了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的严重斗争，多数人也大大减少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勇气。

至于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扫地，更

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

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党派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所以是民主党派。由于这种情况，解放以后，各民主党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治协商机构和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中都被给予相当的地位。它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或多或少地参加了一些革命的群众运动，并且曾经多次宣布它们拥护社会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大体上也类似民主党派。实际上，多数民主党派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它们的倾向一般也代表着许多无党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还多一种资本：他们的大部分直接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在经济文化的种种部门需要着他们。

在各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界中，都有一部分右派，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今天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唯一出路，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为中国造成了一日千里的进步，没有社会主义，这种进步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是社会主义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有计划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于广大人民的统一的利益和意志。这是他们所认为不能忍受的。因此他们决心要同无产阶级较量一下。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虽然确是痛恨社会主义，并且自信还有号召的能力，也并没有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竖起反社会主义的旗帜。首先，如上面所说，他们在全国人民中间是孤立的。他们不但不能动摇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也得不到工商业者和富裕中农的多数的支持。其次，就在各民主党派中和资产阶级知识界中，他们也处于少数的地位。在各民主党派中，在资产阶级知识界中，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转入无产阶级立场的左派，但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还不长，他们也还是一个比较的少数。各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多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还在动摇观望于左右两翼之间。他们还没有放弃对于资本主义的依恋，但是他们也并不敌视社会主义。鉴于这种情况，资产阶级右派在一九五六年决定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按照右派分子的观点，对他们"有利"的时机总是会来的。匈牙利事件是他们的时机。毛主席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又是他们的时机。一九五七年五月，共产党决定整风，这对于右派分子当然更是好时机。于是他们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发起了大举进攻。他们攻击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特别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公开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且要求共产党下台。

资产阶级右派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撕破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凶恶面目露出来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不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敌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曾经趋于缓和的阶级斗争，由于右派的猖狂进攻，再一次尖锐化起来了。人民群众不能不坚决地彻底地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人民群众认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随之以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是对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政治斗争，直至他们投降为止。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说取得政权。在我国，政权问题在一九四九年

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命脉，因此才有可能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右派分子的进攻证明，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某些方面说来，还不是巩固的。无产阶级对于某些国家机关和某些文教组织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领导。对于右派分子，无产阶级当然不可能实现领导。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对于中间分子，特别是受右派影响较深的那些中间分子，无产阶级也只有一种不甚巩固的领导。反右派斗争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我们国家的一切方面把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地树立起来。

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说要把右派分子(除非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起来，或者加以肉体上的消灭。反对右派分子的方法，仍然是群众性的辩论，仍然是摆事实，说道理，把右派分子一一驳倒。我们国家的情况不需要对右派采取极端的政策。我们要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我们也要使一切愿意真诚悔改的右派分子得到改造的机会，尤其是要使广大群众在反右派斗争中得到教育。

使广大群众在反右派斗争中得到教育，这里包括左派和中间派。对于左派，是要使他们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和受到锻炼。对于中间派，是要使他们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自己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是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有一部分从中间派归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所谓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地就是对中间派说的。

中间派是可以同无产阶级合作的，也是无产阶级所必须争取的，但是他们同无产阶级之间有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

所谓中间派，就是动摇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革命和反动之间的人们。左派和右派都是坚决的，而中间派是不坚决的。就全国人民来说，左派是绝大多数，中间派是少数，右派更是极少数。但是就目前的知识界的情况说来，如前面所说，左派暂时也还是比较的少数。多数还是中间派。中间派可以跟着右派走，也可以跟着左派走。右派之所以敢于进攻，就是由于中间派的存在，就是由于右派还有可能同左派争夺中间派。因此，不解决这一部分人的政治立场问题，反右派斗争就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知识分子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们同经济基础的关系，好比毛同皮一般的关系。现在，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灭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开始新生活，就是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否则，知识分子就会成为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目前的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向左转，不向劳动人民靠拢，就多少类似这种“梁上君子”。这是过渡时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他们虽然并不坚决拥护资本主义，但是毕竟还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他们对旧世界还有留恋，对新社会还有些生疏，常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之感。当然，这种现象是不会持久的。他们或者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终将站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来。同样，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多数在目前也在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无产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还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帮助他们尽量缩短动摇的时间。为了团结中间派，就要坚决反对右派，并且批评中间派的动摇性。思想革命就是要革掉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工商业工作者和社

会主义的农民。

目前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这一场斗争对于粉碎右派，教育中间派和社会上的一切人，都具有伟大的决定的意义。当然，一次斗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了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加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加速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的建立。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争取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我国人民在整个过渡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它将还需要经过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全国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全体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民应当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改进工作，为尽快地和尽可能完满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建成完全巩固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

邓 小 平

一 运动的一般情况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情况，作出了全面的估计，对于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现在全国的运动正按照中央的方针顺利地开展着。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目前的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

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运动要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城乡各种反革命反子，农村中还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社会上的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贪污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他们同人民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除此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整风，也包含着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对于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还要用惩办和镇压的方法。对于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人民中的犯法分子也要给予法律处分，这种处分也有教育作用。

四个多月来运动的发展，完全符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完全证明了中央方针的正确性。

运动证明了：对资产级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运动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富裕中农中，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权还不巩固。他们是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经过批评和教育，是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用大力团结和教育中间派，这样才能孤立右派，壮大左派。

运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在农村的贫农下中农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是维护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力量。在他们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武器去进行斗争。此外，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只要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他们是很容易明白的。

运动证明了：在共产党的基本队伍中，在各级党、政府、人民团体、企业单位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党在基本上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但是从群众的大鸣大放中，也揭露了我们在工作上和作风上的大量缺点，有些是很严重的，不改正是危险的。同时，在党员和团员中也有少数的右派分子，另有一部分人则有严重的右倾思想。

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

的。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事实所驳倒了。

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已经得到显著的成效。特别是那些鸣放得充分的单位，和那些注意改正工作缺点的单位，成效更显著。整个运动发展的情况是：右派被孤立被分化，中间派向左靠，左派力量在增加。

但是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和展开，不能草率收兵，不能前紧后松，必须争取全胜。在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机关，运动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凡是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应该及时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当然，有些单位的情况同机关不同，运动发展的阶段也就不完全相同。例如农村，有大鸣大放，有对于坏分子的斗争和对于富裕中农的批判，但是这并不同于机关中的反右派。对于农民和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像机关干部那样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工人、农民、学生在着重整改阶段都要继续鸣放，督促和帮助领导干部整改，但是并非他们自己也着重整改，那是对领导干部说的。此外，在第三、第四阶段如果继续发现右派，或者原有的右派还没有低头，当然仍有反右派的任务。所以对这四个阶段不能看得太死。总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四个阶段都必须经过，并且都必须搞透。运动的全胜，不只决定于反右派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

二　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这里面包括工商业者、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卫生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大学生等。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

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他们不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就有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的危险。

党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贯的。党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实行赎买政策，并且争取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党对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在学术文化范围内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有这些方针政策都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党始终坚持：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必须逐步工人阶级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教育必须加强，错误思想必须批判，“毒草”必须锄掉。对于“毒草”的开放，是为了从反面

教育群众，为了锄掉可以作肥料，为了在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党并且指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

资产阶级对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没有反抗，这是因为：(1)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别的出路；(2)经过"三反""五反"，他们中的多数人认识了反对无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3)政府对他们合营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作了适当的安置。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最近时期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说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站在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的立场。右派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左右两派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都是少数，多数是中间派。右派要同左派争夺中间派。右派总想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但是要等待时机。右派认为匈牙利事件、提出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政策、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的整风就是他们的"时机"。

右派分子一般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从历史上看，有许多人参加过反动党团，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但是历史是发展的，人是变化着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也有许多人现在有了转变。相反，一部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派甚至左派现在却成了右派。这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新的政治分化。

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知识分子过去经过几次运动，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成为左派。多数人现在可以接受或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比较薄弱，由于中间派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跟随右派，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因为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可以利用合法地位发号施令，招兵买马。民主党派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产物，其中有些成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左派，但是大多数成员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因此，右派一度在民主党派的许多组织中占了上风。

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的时候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纲领，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1)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

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也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和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经过三个多月的斗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省市以上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是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要十分注意团结中间派的工作，并且注意促进右派分子的分化，帮助其中已有悔改表现的人逐步改造。应该看到，有些右派分子是可以改造的，改造以后对人民还是有用的。

在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的单位，应该坚决及时地转入整改和思想教育阶段。现在有不少单位对于转入整改缺乏决心，应该纠正。所谓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是说已使所有右派分子受到揭露、批判和孤立，并且使大多数右派分子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不是说所有右派分子的检讨和交代都达到彻底的程度。总有一部分右派分子是不会悔改的，他们要把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多数右派分子也不会在短期内真正转变。但是只要他们在群众中孤立了，就是我们的斗争胜利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其中少数人具有右派观点外，还有其他严重的错误观点，特别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在思想教育和批评反省阶段，必须集中力量对这些错误观点给以系统的批判。这是这次整风运动所必须完成的最重大任务之一。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应该在这次运动中，对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摧毁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根本改变许多文教单位和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

必须大力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骨干，切实整顿许多文教组织。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须注意培养革命的专门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和地方都要在最近时期定出分门别类的具体计划，大力贯彻执行。

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

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虽然现在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是愿意进步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必须看到，他们是国家的重要财

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新生力量的培养，都需要他们努力。因此要用大力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用妥善的而不是粗暴的方法使他们逐步脱离中间状态，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要通过整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帮助他们深入群众，接近实际，并且同他们多谈话，多交朋友，倾听他们对工作的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缺点必须克服。知识分子在鸣放期间所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认真研究处理。在学术文化工作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加以贯彻。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标准，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

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应该是严肃和宽大相结合。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掌握分寸。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需要一个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应该在六条标准的基础上，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各民主党派再无作用的意见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最近都开过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应该帮助他们在继续深入中央和省市的斗争的同时，把斗争积极地有步骤地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中去，然后转入一般整风，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

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的办法大体上和各民主党派相同。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参加工商界骨干的整风，或者另外编组整风。对于资本家中的右派分子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和他们对于工人群众思想的侵蚀，要加以揭发和批判。对于他们中间的严重违法活动应该进行斗争，以便教育多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地下工厂”要禁止，要变成地上的，以便加以管理、监督和改造。小型工商业者则着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能的时候也可以组织辩论，略如工人、农民中的整风办法。他们中间有严重违法活动的，也要进行揭发和斗争。总之，一定要使工商界所有的人受到教育，不要象过去的某些运动那样把一部分人（主要是小型工商业者）忘记了。

三　关于农村

农村总的情况是好的：合作社基本上是巩固的，粮食增产了，干部作风也有了进步。但是由于办社的时间短、经验少、灾荒大，所以还有困难和缺点。

合作化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农村中没有问题了。

一部分农民对国家、合作社、家庭三者的关系还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存在着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在统购统销问题上，富裕农民同国家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用各种办法少卖余粮和其他主要农产品，某些人甚至进行投机活动。特别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一部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重新抬头。

富裕中农的绝大部分因为大势所趋加入了合作社，但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思想上还是动摇的。少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或者在被迫入社以后，带头搞乱闹退社；或者在社外进行破坏合作社的活动。他们总想同合作社较量一下。此外，他们也是农村中抵抗统购统销政策、从事粮食投机的主要势力。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制造反动言论，散布谣言、闹迷信，搞赌博，搞倒算，煽动闹事，甚至建立反革命组织，制造暴乱。

党内在最近一个时期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认为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结束，可以不再强调阶级路线；可以埋头搞生产，放松对于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麻痹大意，没有及时地给以有力的打击。在农村干部中，也有少数人由于家庭经济地位变化，资本主义思想有了发展。这些人在合作化、统购统销等基本问题上，实际上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对党和国家的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

由此可见，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正在全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的目的是：（1）在大辩论中明辨是非，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2）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影响；（3）揭露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4）在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整社、整党、整团，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工作缺点，以达到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合作社、巩固统购统销政策、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

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同样必须是大鸣大放大争，同样必须是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

现在全国采取了几种不同办法，但都是大同小异的。各地情况不一，不必强求一律。但是，不管采取那种办法，都不应该妨碍大鸣大放。已有的经验证明，惟有大鸣大放，才能大争，惟有大争，才能暴露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言行，才能明辨是非，提高觉悟。尤其重要的是，惟有大鸣大放，才能使群众畅所欲言，对于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使干部头脑清醒起来，以利于改进工作，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在运动中，要坚持“只动口，不动手”的原则，防止和纠正简单粗暴的作法。

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一概不提反右派斗争的口号，不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

各地材料证明，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小部分阶级异己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具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分子。为了加强农村运动的领导，为了同上述这些分子作斗争，为了批判各种右倾思想，必须开好各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三级干部会议也必须采取大鸣大放大争的办法。

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才能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刑满释放以后如果又犯罪，必须再捉再判。对各种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坚决惩办，并且必须坚决取缔会道门，禁止赌博。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该逮捕判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逮捕判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这种偏向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加以纠正。

上述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城市。

各地农村中都有一些“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不良分子。对于这些人，如果由地方法院处理就不胜其烦，但是不加处理，对于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又有很大妨害。可以考虑由社员代表大会或者乡人民代表大会定出切实可行的公约，由上一级政府批准，加以约束，并建立调处委员会负责公约的执行。违反这些公约的，可以授权合作社或者乡政府给以适当处罚。这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办法，是社会主义社会限制个人主义、

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形成新的风俗习惯的重要方法。不但在农村中，而且在城市中，在厂矿机关学校中，都可以试行。城市中有些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氓分子，还可以遣送到本省农村中，由政府分别委托有条件的合作社管制生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建议国务院研究适当办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审议决定。

对于已经摘掉地主富农"帽子"而又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应该把"帽子"重新戴上。

对于一部分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富裕中农，必须进行说理斗争，但是不要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同等对待。对富裕中农仍是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问题。

对于单干户，不能歧视，不能苛待，要争取教育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但是不能给予单干户优于合作社的条件。他们要同社员一样承担对国家的各项义务。

对于富裕中农和单干户，除进行政治教育外，还要采取一些经济措施以限制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退社要求的富裕中农，要在经过大辩论和对某些收入降低的农户在经济上加以妥善安排（要有适当的让步）之后，达到大部留社、少数出社的目的。对少数坚决闹退社的，可以在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行和剥夺他们的政治影响之后，开除他们出社。为了限制合作社社员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于自留地、个人开荒、个人经营副业和农村自由市场活动的范围，要有适当限制。对于单干户，要由乡政府或由乡政府委托合作社切实管起来，不让他们有进行资本主义活动和破坏合作社的"自由"。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和有害活动（如挖合作社"墙脚"、雇工剥削、买青苗、放高利贷、做投机买卖、偷税漏税、出租土地等），必须加以限制或制止。城市的企业和机关要在农村招收工人和临时工的时候，应该经过合作社介绍，或者同合作社订合同，不许自由录用合作社员和单干农民。这点将由国务院作出规定。

关于如何结合两条道路的辩论，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问题，中央已发出三个专门指示，这里不再多说。这里只着重说明，农村阶级路线仍有决定意义，忘记了农村阶级分析和阶级路线是错误的。在整社中必须保证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合作社的主要干部必须一般地由贫农和下中农担任。

合作社干部必须坚决参加生产劳动。现在许多社的干部这样作了，影响很好，但是还有不少干部对于这一点执行得不积极、不充分，有的甚至拒绝执行，需要继续加以督促，切实执行，并须经常坚持下去。

合作社制度的巩固基本上决定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有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合作化表现出了很大优越性，才是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可靠保障。只有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才能停止富裕中农的动摇，使他们跟着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又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不发展农业，不但影响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影响工农联盟和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不能迅速地发展工业。

一九五六年一月制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四十条纲要草案，鼓舞了士气，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中央根据一年多的经验，对四十条草案作了一些修正，提议全会基本通过这个纲要，以便在全国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讨论。在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之后，应该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农业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借以推动今年冬季的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潮，推动合作社在社员积极参加之下，制定本社发展农业的长期规划。在全国讨论之后，中央将对这一纲要作再一次的修改，经过年底党代表大会的讨论，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

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今后十年内制定农业计划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指针。

要实现四十条纲要，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一九五六年生产高潮的巨大成绩应该肯定，这些成绩超过解放后的任何一年，有的项目甚至超过几年成绩的总和。当然也有缺点，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但是决不应该因为有些缺点，而对伟大成绩估计不足。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好的一面是工作踏实一些，但是有些地方有劲头不足的现象，必须注意纠正。

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和现代化的农业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过去几年对工业宣传得多一些，调了一大批干部去搞工业，这是必要的，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农业宣传就有些不够。现在应该着重宣传关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把社会上近两年来所出现的看不起农业生产、农民想进城、城里人不愿意下乡、平地人不愿意上山的不良风气改变过来。

能否实现四十条，关键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全党必须加强领导农业。必须在今后国家建设中，增加农业（包括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尽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和其他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工业。

在五年之内，全国绝大多数合作社必须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使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总计起来，按人平均，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现在农村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户已经达到合作化以前的一般中农水平，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已经达到富裕中农的水平，生活仍然贫困的农户一般不过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因此，在五年之内，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在社员收入有所增加的条件下，应该尽可能地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依靠合作社自己的力量逐步增多一些基本建设，不仅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合作社）的物质基础。有了较多的公共财产，才会使合作社像钢骨水泥般地巩固起来，否则会像沙堆一样容易散掉。

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要提倡节约，勤俭持家。节省出来的钱，向农业社投资，或者存入银行、信用社。粮食也要节约。除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以外，农业社和农户还应该储粮备荒。

今冬明春，应该象前冬去春一样，掀起一个积肥和兴修农田水利的大运动，并适当地进行其他基本建设。对于这项工作，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了专门指示。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当地的具体指标和具体规划。

合作社的一切增产措施必须充分运用群众路线，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原则。要善于用说服的办法，鼓舞群众的积积性，来举办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各种事业，和解决合社作的各种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提倡的事情，即使完全正确，大量成功，如果不经过群众认真的讨论并作出决定，群众也会有不满；而事实上总会有一部分失败或者效果不好，如果没有经过群众就更难免群众的埋怨。但是只要一切通过群众，即使受了损失，也是大家负责，大家得到教训，利于团结和改正。这点必须教育基层干部经常加以注意。

四　关于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队伍的整风问题，是本阶级整顿思想作风、提高阶级觉悟的问题，同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有原则的区别。因此，应该着重改进工作和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不应该把机关学校中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办法，拿来对待一般的工人群众。

目前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总的方面是好的。一千一百几十万产业职工中，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出身于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前的老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共产党员占百分之十三（加上共青团员共占百分之二十九）。

但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情况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历次运动证明，老工人都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比较浓厚。还有百分之三左右（有些单位超过百分之五）的新工人是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们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

因此，有必要在整风中对工人群众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必要通过整风更好地树立和培养工人队伍的骨干和核心力量。有必要进一步清查坏人，纯洁工人阶级队伍。经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一支有觉悟、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队伍。

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责任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群众的政治任务问题。要使工人群众懂得：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增强阶级内部的团结；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努力生产，克勤克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动全国人民，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在一部分以新工人为主的工厂中，要着重解决新工人的改造立场的问题。在一切新工人中明白提出思想改造的任务，是完全必要的。

应该结合工人的切身生活体验和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结合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本企业的具体状况，提出讨论题目。一般可以讨论：(1)工人阶级如何负起领导阶级责任的问题；(2)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3）生活改善和生产发展的关系问题；（4）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5)工农关系问题；（主要是讨论工人生活水平不要过高于农民）。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作好关于改进工资福利制度的思想准备。

在职工中实行大鸣大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字报形式简便，生动活泼，引人注意，便于发动群众；批评领导人员和工人群众中的缺点，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明确尖锐，有声有色。无论工厂或者机关学校，都可以把大字报逐步变成经常的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工厂中整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新工人的思想，要着重依靠老工人和工龄较长、受政治教育较多的工人。必须充分发挥老工人的积极作用，用他们的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去团结和教育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几年来不少干部对老工人的作用有些忽视，在某些政策措施上，如晋级、计件工资、工作安排、劳动保险、子女就业等，对老工人的照顾有些不够，需要加以改进。

领导上必须认真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要自始至终贯彻执行边整边改的方针。

要检查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领导干部（包括党、政、工、团）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项经常制度。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钻研技术和业务，逐步地使自己从

外行变成内行。要深入生产，深入工人，关怀群众疾苦，生活上和工人打成一片，坚决废除脱离群众的特殊待遇。帮助和引导工段一级干部克服命令主义，使他们作到既能勇于负责，又会走群众路线。

要大力紧缩机构，减少党、政、工、团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中过多的非生产人员，注意从工人中培养和生长干部，充分发挥不脱产、半脱产的积极分子和干部的作用。强调技术人员和职员同工人相结合，组织他们参加实际操作，以便培养出大批既有实际经验、又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优秀干部。

对于一些影响生产、影响团结、阻碍工人积极性发挥的各种规章制度，应该坚决修改或者废除。同时要相应地建立必要的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以便从制度上巩固整风的成果。

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扩大企业民主、吸引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这次整风中应该充分运用，并在总结试点经验之后，全面推广。

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应该遵照中央的规定，即：（1）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2）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3）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领导人员。（4）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的时候，可以向上级管理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

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多数还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整风主要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大体上可以仿照机关整风的做法。但是因为他们直接参加生产建设，比较接近工人，和机关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因此，对他们要按照不同对象和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不应该采取简单化的方法。

对工人中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流氓、阿飞、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等，应该进行批判和适当斗争。情况特别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应该在运动结束以后开除出厂，并作出适当处理。但是对于（1）一般思想落后、爱说怪话、劳动纪律松弛或因工作、生活问题对领导不满的人；（2）有地域观念、本位主义思想、宗派情绪的人；（3）一般闹事分子等，不要不加区别地都当成政治上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加以斗争和打击。要十分注意防止打击报复。防止形成宗派斗争。

对老工人和转业军人中发生的问题，应该特别慎重处理。

手工业、运输业合作社的整风，应该和整社相结合。要充分发扬工人和贫苦独立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注意团结比较富裕的有技术的社员、揭露和批判原来的小业主和一部分富裕的独立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倾向，制止他们当中某些人的破坏活动，在胜利的大辩论和干部整风的基础上巩固合作社。

职工家属和城市其他劳动人民，也应该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可能地组织鸣放，进行辩论，明确大是大非

五　关于少数民族

在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中，应该同样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且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

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除了同汉族地区相同的内容以外，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在广大群众中，应该用新旧对比的方法，宣传各民族团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民族大家庭的利益和必要，揭露坏分子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中，应该指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同样有危险。过去我们强调反对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也仍然要继续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但是目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同样必要的。应该认清，一切利用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某些隔阂、来分裂民族团结和破坏祖国统一的人，都是违反我国宪法和危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于公然煽动民族分离的特别恶劣的分子，应该坚决地加以揭露和驳斥，使其完全孤立，借以教育群众和干部。

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反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关键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只有在各民族中形成了真正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核心，才能克服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巩固民族间的团结统一。各民族的党员都必须了解：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根本不相容，它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党内决不能允许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因此，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中，必须定出计划，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教育，并且按照具体条件，对本民族某些党员中突出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必要的批判。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中的政治教育方针应该改变，今后应该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点的教育，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民族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民族主义倾向的批判必须防止急躁，必须慎重地由上而下地有领导地进行，必须注意获得本民族多数党员干部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支持。汉族干部仍然应该继续注意检查和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本地民族干部则应该着重检查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只有经常注意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包括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主义）的思想，才能不断提高各民族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统一。

在完成了民主改革而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上不要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可以在适当范围内，用适当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六　关　于　军　队

在军队方面，经过反右派斗争，军队系统也查出了少数右派分子。这对于军队的巩固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军队一般比较纯洁，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告一结束以后，应该集中力量进行内部整风，并以干部为重点。

在近几年的社会大变革中，军队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由于处于和平环境，大批新成分参加军队，以及某些工作人员不适当地强调专业化、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等原

因，几年来，干部的个人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倾向有了一些发展。有的干部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自己有功劳，应该“论功行赏”。他们不是兢兢业业地去完成任务，而是追求名誉、地位和待遇，计较个人得失，不愿到艰苦地区去工作。军队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等方面，也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军队同地方党政联系不够，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缺乏经常的研究和教育。少数干部和士兵对当前农村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上述的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认真地加以解决。

在军队各级机关和学校的整风，可以采取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在连队，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有领导的辩论。

军队担负着国防和训练等繁重任务，在整风期间，必须注意不要松懈战斗准备和训练工作，特别是第一线部队、整风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军队的团结，增强纪律，增强战斗力，而不是相反。

七 关 于 党 和 团

目前我们的党已经有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党员（内有预备党员二百八十万）。其中工人党员一百七十四万余人，农民党员八百五十万余人，知识分子党员一百八十八万余人，其他成分的党员六十万余人。

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大多数党员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运动揭发了大量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一部分党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味追求个人享受，计较名誉地位。也有极少数党员丧失革命意志，甚至堕落腐化，违法乱纪。

在运动中，党员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了。从党内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对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党员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对党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同党有分歧，并且在这次斗争中表现政治动摇。

党内所以发生这些严重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1)大部分党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2)党的组织发展较快，注意质量不够，而且思想政治工作也没跟上。(3)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党员是在胜利后的环境中入党的，他们入党的时候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觉悟，入党后长期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环境中，没有经过同资产阶级的直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一百八十八万知识分子党员中，大部分没有经过生产劳动的锻炼，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考验。

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象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在运动转入第三第四阶段以后，在党内比在党外更加要抓紧整风的任务。除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包括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错误必须认真改正以外，还要在一般党员中批判右倾思想，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在这次整风中，对每个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普遍地进行一次检查。认真改正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生活不健全、纪律松懈等缺点。

除了徒叛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之外，在整风中，必须爱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

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教育党员、干部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革命的意志，一定要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必须结合这次整风运动，对所有党的基层组织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达到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的目的。

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如果因为情节较轻、转变较好而不开除，就可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对于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的分子，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必须清除出党。

对于丧失革命意志、不起共产党员作用、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人，应该劝他们退党或者清洗出党。

在决定开除一个党员的时候，要将他们的错误事实核对确实，要遵守规定的手续，并且在开除他们以后，仍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关怀他们，指定专人同他们保持联系，进行考察和教育。

对于预备党员要加强教育，并且进行严格的审查，防止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转为正式党员。

为了不断地调整党员的成分，补充党的新鲜血液；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在确实保证党员质量的条件下，可以有控制地把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人，特别是老工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接收为党员。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考验了每一个党员，特别是考验了每一个干部。在这里，有必要谈一谈党的干部工作问题。

我们党从来就是注意选拔优秀的工农分子和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担负各种的领导工作的。这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路线。

我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曾经过多地吸收了一批没有经过生产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工作，这是一个缺点。

今后我们仍然应该从工人、农民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但是，他们应该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和农民。同样应该从优秀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但是他们应该是经过生产和斗争的锻炼，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对于现有的没有经过实际斗争锻炼、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应该有计划地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农村、工厂中去劳动几年，或者到基层去做几年实际工作。凡是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缺少这一课的，必须补上这一课。文学、艺术、新闻、理论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宣传工作者也必须这样做。

对于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应该研究适当办法，首先分配他们到适合于他们的学科的生产单位中去，从事一年到几年的劳动以后，再根据他们的专长和在劳动中的表现，分配他们的工作 。

必须认真创造条件，使生产中的体力劳动者有提高文化科学知识的机会，并且使其中能够深造的一部分人，有升入大专学校的机会。

认真地贯彻执行这样的干部工作路线，才能使党和国家培养和选拔干部的工作，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

关于干部地方化的问题，是党的干部中作工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些糊涂观点，需要加以澄清。

在全国解放初期，中央提出依靠大军、依靠老解放区干部建立新解放区的工作，这个方

针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这些干部绝大部分工作是好的，已经同当地群众建立了联系，也就是说，他也已经地方化了，应该继续留下来工作。有少数人继续工作有困难，或者表现不好，应该动员他们回原籍或原工作地区参加生产，或作其他妥善安置。各地都应该提拔相当数量的本地干部作工作，这一点已经做了，还要继续做。现在，在多数地方，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是融洽的，正常的。但是也有些同志，对于干部地方化缺乏正确的了解，有些人甚至有排斥外来干部的情绪。这是一种错误的地方主义的表现，应该在这次整风中加以纠正。

必须指出：干部地方化并不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无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必须首先共产主义化，而地方主义却是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本地干部的提拔仍然必须服从德才兼备的原则，而且在某些范围内还应该有适当的调剂。例如在县一级，清一色的本地干部就未必有利，更不必说县以上了。

下面谈一谈青年团的问题。

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有力助手。各级党组织应该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巩固和团员质量的提高。团的工作在近年来是有重大成绩的。但是在这次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中，在团员中也暴露出来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团的干部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必须结合这次整风运动，对团的组织和工作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

对于犯有各种严重错误的共青团员，在进行组织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参照对犯各种错误的党员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但是应该比党员稍放宽一些，应该更着重于教育。

八　改进工作，争取全胜

改进工作和反右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不可忽视任何一方面。

党的领导能否巩固和加强，决定于党的本身，决定于领导是否正确，能否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右派本身并不能消除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在运动中，党内党外提的批评意见很多。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的虽较偏激，也并不是没有益处。

在我们的工作中，反映得比较突出的毛病是：

许多规章制度不合理，不切实际，相互矛盾。这影响到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这一部门和那一部门之间，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到生产的发展。这些东西有的是原来规定就不正确的，有的是原来正确，但因条件变化、应该改变而未及时改变的；有的是应该由各地去因地制宜作出规定，而不应该由中央统一规定的，有的是中央各部门在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有的是因为经验不足难于避免的，有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里有集中过多的现象，也有分散主义的现象。地方的某些规定，也有同样情形。

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负责同志忙于事务，接近群众太少，对群众中的问题不甚了解。许多不合理的生活制度，助长了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少干部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走群众路线，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少干部不愿同非党群众和非党人士来往。

这些现象，不改不行，必须坚决改。

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把六亿人口团结起来，一心一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需

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样的政治局面可以使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较易于克服困难，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有利于较快地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

要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一方面必须贯彻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巩固党的和国家的纪律，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为了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目前应该集中于以下三点：

（1）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的倾向。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呼吸。党员同非党群众、党外人士要有亲密的联系，要多交朋友。干部同群众生活不要相差太多，取消形成干部特殊化的规定和制度，提倡艰苦朴素的风气。领导干部要接近下层、接近群众，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工农生活、城乡生活不要相差太多。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情况，因此，在目前应该坚持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

（2）改变制度上和组织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适当地调整党政之间和上下之间的集中统一和分工负责的关系。该集中的必须集中，该分散的必须分散，该下放的必须下放。过分集中的现象和分散主义的现象都要纠正。

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了有关工业、商业、财政体制的三个文件，主要的精神就是下放一部分权力，以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利于加强对各种企业和事业的领导，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也不至于损害统一领导和重点建设。这种改变，肯定比现行体要好。但是，新的规定也不会是完满无缺的，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加以补充和改进。值得指出的是，若干权力下放以后，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因而更需要加强计划和平衡的工作。这点，无论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

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非生产人员过多，机构庞大臃肿，也助长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必须大力紧缩。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这对于当前的国家建设事业有三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第二、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过锻炼、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第三、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加强劳动战线，加强基层，加速建设。因此，各个单位都应该迅速订出整编方案，动员大批人员到生产中去，到需要加强的基层单位中去，或者另行安置。许多不必要的和重叠的机构应该裁减合并和减少层次。为了紧缩机构，除了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尽量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基层工作以外，其他干部也有一部分需要回到生产中去或者回到基层去。在我们的国家中，必须养成干部能上也能下、能脱离生产也能回到生产的优良风气。

（3）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经常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认真考虑各种合理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诚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决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只有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才能鼓舞群众的热情，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使群众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勇于批评和发表意见，敢于争辩和坚持真理。

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为了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为了解除中间分子的顾虑，反右派斗争本身也必须特别注意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竭力避免夸大和片面性；对于中间分子和工人农民的错误观点，要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对于学术上的争论，尤其要反对轻率和武断。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群众敢讲话的空气。

我们要争取运动的全胜。所谓全胜，就是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取得改进工作的胜利，取得改造思想的胜利，并且使斗争的结果能够造成上面所说的那种政治局面。

现在反右派斗争还需要深入和展开，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改进工作还只是开始。这是必须特别注意的。

对于改进工作，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做得比较好。这些单位的经验证明，群众所提的意见，大部分是本单位可以马上接受和实现的，只有小部分问题需要由上级或中央统一解决。

为了认真地改进工作，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让群众的意见得以无保留地充分发表。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各单位，要成立由负责人主持的专门小组，广泛收集群众对于改进工作的意见，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提出改进工作的计划和方案，逐步实行。各部门、各单位改进工作的情况，必须随时报告上级和中央。

现在全国许多单位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改进工作的高潮，这些单位的工作情况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面貌。过去拖延多年没有克服的缺点，这次很快就克服了，过去需要长时期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次很短时间就解决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和群众、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大大加强。但是，也还有不少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改进工作没有重视或者重视不够。有的人唯恐揭露缺点，运动一开始就不敢让群众鸣放；有的人在鸣放之后，又利用反右派把自己的错误掩盖起来，企图逃避整改，蒙混过关；个别的人甚至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和报复。这些是不能允许的。在改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群众的口号应该是：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而对于领导人员的口号应该是：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的改。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加强对整风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领导，以求得运动的全胜。

（原载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转自《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

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成就

（一九五七年九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在国庆节前夕应本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的要求，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意义发表了谈话。

负责人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很快就要结束了，执行计划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还有待于今后总结，但是可以肯定，这个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是胜利完成了，到现在为止，除少数指标以外，绝大多数指标都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人们记得，当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我国虽然恢复了被长期战争所破坏的国民经济，使社会生产力在总的方面达到以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发挥了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当时，我国仍然是一个经济技术很落后和经济成分很复杂的国家，不仅工业基础薄弱，而且小农经济占优势，技术更加落后，资本主义经济也还占很大的比重。现在经过短短的不到五年的时间，由于我们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我国的经济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负责人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国家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一九五六年，在全国范围内，农户已经有96.3%、手工业者有92%实现了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几乎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对于这些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今年又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进行了巨大的巩固工作，获得新的成就。由此，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基本上由多种成分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成分，这样也就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负责人说，这里应该特别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这种巨大的剧烈的变革，在进程中不仅没有破坏社会生产力，而且明显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长远看，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已为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当然，现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政治和思想的斗争），在我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显著的。作为五年计划中心的工业基本建设，按投资额计算，五年合计将超额完成计划5%以上。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为骨干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五年内开始施工的共八百二十五个，在今年底能建成的共四

百四十八个，中其属于一百五十六项的是五十六个。这八百多个项目是我国现代大工业的第一批骨干，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有巨大的作用，它们虽然还没有全部建成，但是已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初步基础。由于这种建设，我们不仅一般地加强了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和轻工业，而且开辟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如合金钢和铝及其他有色金属的冶炼和加工，汽车、飞机的制造，冶金、发电、采矿设备的制造，无线电和精密仪表的制造等等。由于这些新工业部门的建立，就开始改变了我国工业原来残缺不全的状况。这些新的工业企业，分布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分布在原来工业很少的内地，这样也就开始改变了我国工业原来偏集于一方的状态。

负责人指出，**我国的工业建设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经济事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农业、水利和林业方面，五年内基建投资达到三十八亿元以上，超过原计划50%以上；水利方面除了建设了十几座大型水库以外，同时建设了许多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开展了广泛的农田水利工作，由此不仅防御了巨大的洪水，而且增加了灌溉面积二亿多亩。五年内国家和群众开垦的荒地达到八千万亩，超过计划一倍以上。在交通运输方面，重要的有新建铁路干线和支线四千九百二十多公里，由中央投资修建的公路干线一万二千公里，都超过计划20%左右。

负责人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壮大和锻炼了我国的技术力量**。一九五二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过十七万多人，预计一九五七年将达到八十万人，增长了三点五倍左右。由于绝大多数的工程技术人员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一般的大型企业，包括钢铁联合企业、煤矿、电站、炼油厂、机器制造工厂、化学工厂以及铁路、水库等，除资源条件较复杂和技术条件要求很高的以外，都可以自己设计了。这是我国在技术上的很大进步。

负责人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了发挥原有企业的生产潜力来加速新企业建设的方针**。除了对一部分老企业进行重大改建以外，对大多数的老企业，加强了技术措施，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发扬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原有企业的潜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在这过程中，党和政府曾经批判了厌旧贪新的不良倾向。正是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方针我国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运输取得了很高的发展速度，并且使多数指标大大超过了原定的计划。我国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总产值，已经为一九五二年的223.4%，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7.4%，为原计划的112.7%。其中，生产资料一九五七年的产值为一九五二年的290.2%，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23.7%；为原计划的128.1%；消费资料一九五七年的产值为一九五二年的179.4%，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2.4%，为原计划的99.8%。在农业方面，一九五七年的农业总产值为一九五二年的126.4%，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4.8%，为原计划的102.5%。其中，粮食一九五七年的产值为一九五二年的123.7%，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4.3%，为原计划的103.2%；棉花一九五七年的产值为一九五二年115.1%，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2.9%，为原计划的91.7%。在运输方面，一九五七年铁路货运量为一九五二年的193.8%，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4.1%，为原计划的104.3%；一九五七年公路货运量为一九五二年的503.2%，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38.2%，为原计划的154.5%。

上列百分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是按年度计划数字来计算的，据现在预计，除农业生产的若干指标以外，上述其他指标都有可能超过，因此实际速度可能还要高些。以钢的产量来说，一九五七年年度计划是四百九十八万七千吨，预计可能达到五百二十万吨左右。

负责人认为**第一个五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我国的农业约增产了粮食七百多亿斤和棉花四百万担，其他经济作物和牲畜也都有了较多的增长，保证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保证了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当然，从客观需要来说，我国的农业还显得有些落后，今后还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加速农业的发展。

负责人认为**产量的提高固然是我国经济方面的重大成就，而工业产品品种的增加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一九五二年我国只能生产一百八十多种钢和四百多种规格的钢材，一九五七年已能生产三百七十多种钢和三千多种规格的钢材；一九五七年已经能够生产二百多种在解放以前不能生产的新型机床。尤其是，我国现在已经能够制造许多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业产品，如一千立方公尺的高炉，一百八十五吨的平炉，一万二千瓩的火力发电设备和一万五千瓩的全套水利发电设备，联合采煤机，地质勘探用钻机，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高效率蒸气机车，四轴自动车床等等。这样，也就在品种方面提高了我国设备和原材料的自给能力。而我国设备和原材料在数量、品种方面的自给能力的加强，就为今后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负责人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是密切结合进行的**。经济建设推动了文教建设的发展，文教建设又在培养干部、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等帮助了经济建设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达到二十七万多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达到八十四万多人，其中大部分分配到经济各部门和科学研究机关中担负技术方面的工作，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科学技术队伍。我国有许多忠心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家，为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负责人指出，在一个占世界陆地面积十三分之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方而原来经济又极端落后的国家里，用短短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不能不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不仅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于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也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

负责人说，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分子不止一次地说："中国的五年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在事实面前，这种谎言已经不攻自破。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分子又造出谣言，说什么"中国的五年计划虽然可以完成，但人民生活却是不断降低了"；国内的右派分子也跟着唱和，说什么"五年计划搞坏了"，"统购统销糟透了"等等，对于这些恶意的诬蔑，今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有力地作了驳斥。这里只举出这样的事实：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我国就业的职工增加了大约六百五十万人，基本上消灭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并且使绝大多数新增加的城市劳动力得到就业的机会，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40%以上，五年内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支付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和文教费达六十多亿元，仅前四年国家拨款建筑的职工住宅达六千六百多万平方公尺。这些都超过了原定的计划。在这期间，由于国家用很大力量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且采取了稳定农业税负担的政策，适当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保证了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农民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善。初步计算，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农民总收入大约提高了30%左右。

负责人指出，**一方面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证人民生活得到适当的改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的方针。与此相联系的建设方针是，我国的经济建设一方面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另一方面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发展工业必须和**

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事实证说，由毛主席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执行了这个方针，因而得到了很大的成就，避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发生脱节的现象。当然，我们也还有执行得不够的地方，今后还需要继续努力。

负责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建设工作和计划工作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它们只是属于局部的性质。这一点，除一小撮右派分子不顾事实而加以歪曲以外，全国人民都是了解的。重要的还在于：我们不仅很快地改正了某些缺点和错误，而且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规定了今后建设的正确方针。例如，在建设中我们曾经发生过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有些建设贪大、贪新、对大中小结合和充分利用原有设备注意不够，造成某些浪费，但是，党和政府批评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全面地持久地节约的方针，即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方针，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将给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巨大利益。

负责人说，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国内，我们有巩的人民民主专政，有伟大的共产党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在国际上，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物资、技术和建设经验方面的热情支援，有了他们的支援，使我们减少了许多困难和少走了许多弯路。

一方面依靠国内广大群众的无穷的力量，又一方面继续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亲密团结和互助合作，就使我们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

（10月1日《人民日报》）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要点（节录）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邓　小　平

（三）关　于　农　业

全国发展农业生产四十条纲要，提议全会基本通过，由政治局根据讨论的意见作适当修改后，即发到全国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讨论。在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之后，应该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借以推动今年冬季的生产和基本建设，推动合作社在社员积极参加之下，制定本社发展农业的长期规划。

有同志提出这个纲要的序言，对挖掘农业生产潜力，提得不够积极，这个意见很好。我国农业生产潜力很大。一九五六年就有十六个县达到了“四百、五百、八百”的亩产指标。

今年估计全国有几十个县、市达到这一指标．建议各省在今年秋收基础上作出分期分批地达到这一指标的具体规划．

要实现四十条纲要，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一九五六年生产高潮的巨大成绩应该肯定，这些成绩超过解放后的任何一年，有的项目甚至超过几年成绩的总和．当然也有缺点，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但是决不应该因为有些缺点，而对伟大成绩估计不足．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好的一面是工作踏实一些，但是有些地方有劲头不足的现象，必须注意纠正．

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过去几年对工业宣传得多一些，调了一大批干部去搞工业，这是必要的，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农业宣传就有些不够．现在应该着重宣传关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把社会上近两年来所出现的看不起农业生产、农民想进城、城里人不愿意下乡、平地人不愿上山的不良风气改变过来．

能否实现四十条，关键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全党仍然必须认真地抓住农业，增加农业（包括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尽力发展化肥工业和其他能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工业．

农业必须逐步机械化．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现在即应该成立专门机构，研究设计适合我国各地具体条件的农业机械（首先是动力机械、运输机械、提水机械，也要直接用于耕作的机械），尽早地陆续地投入生产．

但是，国家的投资总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指望国家投资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国家投资主要应该放在那些比较经济的和带关键性的地方．所以，发展农业的基本建设和各种措施，必须主要依靠合作社本身的积累和本身的人力．一九五六年扩大再生产的各项措施，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依靠合作社自己的人力财力物力完成的．

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都必须注意经济核算．如果不顾成本，用赔钱贴钱的方法来增产，即使一时一地见效，也决不能持久．

在社员收入有所增加的条件下，应该尽可能地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依靠合作社自己的力量逐步增多一些基本建设，不仅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合作社）的物质基础．有了较多的公共财产才会使合作社象钢骨水泥般地巩固起来，否则会象沙堆一样容易散掉．“示范章程”中关于公积金规定的条文，应该经过适当程序加以修改，使合作社在收入多的地区和收入多的年份，可以多提一些公积金．

为了开发山地，鼓励上山，有同志主张中央和各地划出专门经费，指定专门用途，这个意见值得考虑．

中央要求在五年之内，合作社必须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使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总计起来，按人平均，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现在农村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户已经达到一般中农水平，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三十已经达到富裕中农的水平，生活仍然贫困的农户一般不过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因此，在五年之内，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要提倡节约，勤俭持家．节省出来的钱，向农业社投资，或者存入银行、信用社．粮食也要节约．除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以外，农业社和农户还应该储粮备荒．目前，多数地区已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农户，有了多少不等的余粮；有些农户已经储备了半年粮．如果广泛地提倡节约粮食，农业纲要所提出的储粮

指标，完全可能提前实现。

今冬明春应该再掀起一个兴修小型水利和积肥的运动．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了专门指示．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当地的具体指标．

在许多省区，耕畜是当前薄弱的一环．必须努力保护耕畜安全过冬，竭力制止耕畜的不正常死亡现象．还要为开春的配种繁殖做好准备，力求增加耕畜．

今年秋季干旱，相当数量的麦田还没有下种．除了正在尽力担水点种以外，还可以跟当地老农商量，找出其他的办法抗旱播种。已经种下去的，生长也不好，要好好加强越冬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

冬季副业生产也不能放松，有的地方秋后还有造林和整理土地、改良土壤、保护水土等任务．总之，要在今冬明春再掀起一个农业生产的高潮．并且以冬季生产为中心，结合鸣放，进行整党整社．整个冬季工作和劳动力的使用要有很好的安排，不能顾此失彼．

合作社的一切增产措施必须充分运用群众路线，贯彻民主办社的原则．要善于用说服的方法，鼓舞群众的积极性，来举办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各种事业，和解决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提倡的事情，即使完全正确，大量成功，如果不经过群众，群众也会有不满；而事实上总会有一部分失败或者效果不好，如果没有经过群众就更难免群众的埋怨。但是只要一切通过群众，即使受了损失，也是大家负责，大家得到教训，利于团结和改正．这点必须教育基层干部经常加以注意．

为了在农业增产的基础上改善农民生活，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必须认真提倡节制生育．各省市应该分别订出具体计划，控制本省市人口的增加．

此外 各地同志在讨论中还提出许多具体要求，将分别交由有关部门考虑。

国务院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

农业生产的合作社已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对于根本解决我国粮食问题提供了广阔的可能．但是，各项农业增产措施的实现，需要较长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粮食增产的速度不可能是很快的．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生产用粮的增加，个体经济转变为合作经济以后，农民收入普遍有所增加，过去吃粮较少的农户，也增加了粮食消费量．这样，城市和农村的粮食需要就大大增加起来．同时，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还不够稳定，收成丰歉在年度间和地区间很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和城市的粮食消费特别是丰收地区的粮食消费，如果不加适当节制，那就势必影响城市工矿区、经济作物区、灾区和其他方面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妨碍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国家对于粮食的分配，在长时期内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当前的方针应该是：在坚持粮食三定的基础上，实

行以丰补歉，保证国家正常的粮食收入，严格控制粮食的销售。根据这个方针，特对粮食统购统销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国家在计算和核定农业社和单干户粮食征收、收购或者供应数量的时候，一九五五年实行粮食"三定"时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定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量不得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地区农民的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二）农业社和单干户生产的粮食，超过粮食"三定"定产数量的部分，国家对于余粮的和自足的农业社和单干户，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于缺粮的农业社和单干户，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国家增购的数量，一般应为增产部分的40%，在特殊情况下，应该多增购一些；但是增产的部分，农业社和农民也应该有所得，以便用来保证人口和牲畜增加的粮食需要，适当储积备荒的粮食，或者改善农民的粮食消费状况，发挥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

（三）国家在核定农业社的粮食征收、收购或者供应数量的时候，不能因为分给社员自留地而减少国家的粮食征收、收购任务或者增加供应指标。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只能种植饲料和蔬菜，不能种植别的经济作物。别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应该由农业社统一安排。

（四）对于单干户的粮食统购统销、农业税征收和国家负担，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办事。单干户必须服从国家的种植计划。这些事务乡人民委员会可以委托单干户所在地的农业社负责办理。

（五）在农村粮食统购任务完成以后，过去为了农民相互间的粮食调剂，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今后为了加强粮食管理，此种粮食市场应该关闭。关闭以后，由国家粮食机构在可能范围内，帮助农业社和农民进行粮食品种的调剂。

（六）国家在核定农村和市镇的全年粮食供应数量以后，必须按季分月逐级下达粮食销售指标，坚决执行。国务院下达的控制指标，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必要时作适当调整。省级以下的地区和部门，没有经过省级人民委员会的批准，一律不准变动上级规定的控制指标。

（七）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应该同农业社内部的粮食分配结合进行。农业社分配粮食，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先后顺序：第一、首先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收、收购任务（包括增产社的增购任务）；第二、留下农业社生产必需的种子和饲料，分给全体社员基本口粮和必要的饲料；第三、在解决了上述两项问题以后，才可以适当照顾劳动强出工多的社员，或者用来发展副业和多养牲畜，但是不准开设饭店和经营熟食品。农业社在社内分配粮食的时候，应该注意储积备荒的粮食。

农业社由于缴纳农业税而发生缺粮情况，国家征收农业税的时候，对缺粮部分可以全部或部分改征代金或者经济作物。

农业社在新粮收获以后，预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是应该的，但在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收、收购任务以前，预分的部分必须低于"三定"时规定的留粮标准。

农业社在不减少国家核定的粮食征收、收购任务或者不增加供应指标的条件下，对于社员口粮的分配，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人分等定量的办法或者其他适宜的办法，力求公平合理。

（八）在城市统销方面，居民口粮标准偏高的地方，应该把标准合理地降低下来。集体伙食单位用粮，应该严格整顿，不准虚报人数和多购粮食。市镇人民的口粮供应，应该尽可

能搭配一定数量的红薯．工商行业用粮应该严格节约和控制．

本补充规定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补充规定执行．本补充规定没有提到的，仍然按照过去颁发的暂行办法和规定执行．

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廖 鲁 言

主席、各位同志、各位朋友：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在"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的．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间，毛主席先后同中共的十四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十七条"。一九五六年一月，毛主席又在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这个纲要的草案初稿．最近几天，由中共中央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共1，375人，分组进行了讨论。经过这次讨论，又采纳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做了一些修改．在这次讨论中，还有一些有益的意见，也是在今后工作中应该注意，应该解决的，但是不便写在这个纲要里面去．这个纲要草案的修正稿，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三日通过，现在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因为我在农业部工作，又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一部分工作，中共中央指定我向诸位做一个说明。

我想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提出来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所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十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所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使我国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情况吧！那个时候，由于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首先是由于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的影响，以致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的事业裹足不前，甚至消极退缩，农村中间正气不伸，邪气上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而资本主义思想抬头，粮食统购统销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措施遭到了一些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抵抗．那个时候，许多人为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的

需要而发生忧虑，甚至有些人因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发生动摇。当时，我们虽然是有信心的，我们坚决地相信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是一定可以克服的，但是那时办法还不多，对于一些人的忧虑还缺乏充分的说明力量。

现在就不同了。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抓住了并且正确地解决了农业合作化这个基本环节，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来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除了少数的富裕农民、富农和过去的地主分子以外，绝大多数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全国农村中，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短短几个月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就由1,690万户增加到7,000万户，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由14%增加到60%以上，有些省、市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目前，入社的农户仍在不断地增加，合作化的比例仍在不断地上涨。预计到今年春耕以前，除了个别的省和自治区以外，其余各省、市都将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条所规定的任务，提前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基础较好的地区，初级社升高级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已经具有群众运动的规模，其余的地区也在积极试办高级社。辽宁省已有4,655个高级社，包括160多万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60%。河南省新乡专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已经高级合作化的县、区和乡，则为数更多。预计到今年春耕以前，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包括的农户将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只要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增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条所规定的，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一九五七年或者一九五八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

半年以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这样多，这样快，是不是好的呢？事实说明：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之下，已经不存在干部勉强要群众入社的问题，而是各级领导机关所定的发展合作化的计划一再地被群众要求入社的热情所突破。广大社员的思想奔向社会主义，集中在增加农业和副业的生产上，社员彼此之间你占便宜我吃亏的斤斤计较的心理大大减弱了。同时，合作社内有关社员经济利益的各种具体问题，由于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公布，也处理得更为细致，更为合理，合作社内贫农和中农之间的关系，一般也是健康的，正常的。最重要的带根本性质的情况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地拟定了或者正在拟定发展生产的规划，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九五五年，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粮食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增加了20%以上，棉花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增加了70%。一九五五年的秋耕秋种和冬耕冬种的工作，比以往任何一年做得好，许多地方战胜了秋冬的旱情，完成了并且超过了冬麦的播种计划。冬季生产和备耕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往年到春季才做的许多工作，现在提前到冬季来进行了。我是南京人，本月初在南京郊区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冒着寒冷天气，忙于翻耕土地，兴修水利，积粪造肥，这是过去少见的事。不但南方，就是在北方，据各地同志来说，也是如此。这种新气象是遍于全国的。近几年来，我们总是宣传农业生产不能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应当是“一年之计在于冬”（头一年的冬天），但是收效并不很大。现在这句口号已经真正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实践了。豆饼、化学肥料、水车和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到处脱销的现象，也充分证明了广大农民生产情绪的饱满和要求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半年以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确实是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正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农业生产的高潮形势下提出的，是恰合时宜的，完全符合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的。

第二，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是向农民提出的，并且是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它向农民指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关于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描画出我国农村的繁荣幸福的明天。

合作起来的农民，正在为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而积极劳动的农民，他们迫切要求有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奋斗目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全面规划也很难定好。农民不仅在生产上要求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奋斗目标，而且对于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农民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得到饱食暖衣之后，他们就要求修房子，盖新屋，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读书识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讲卫生，"人财两旺"。农民在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提出这一系列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努力促其实现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法则就是：不断地发展生产，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是以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对于农民的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项要求都做了规划。因此，这个纲要一经公布，就必将发生巨大的号召作用和动员力量，就必将推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农业生产的高潮进一步地向前发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和中共的某些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所商定的"十七条"，传达到农村中去以后，已经发挥了巨大的动员作用。许多地方的农民兴奋地说："这一下子看到社会主义了"。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可以预先肯定，这个四十条的纲要，将更有力地鼓舞五万万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同时，这个纲要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运用五万万农民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这个纲要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农业合作化，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和各项增产措施，造林绿化，发展畜牧业，发展渔业、手工业，扫除文盲，办小学，安装收听广播的工具，发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改善居住条件以及吸收城市失业的人员，使他们获得就业的机会等等，除了一部分是由国家举办的，或者由国家协助农民举办的以外，大部分是由农民自己举办的，自己动手来做的。农民有没有力量办呢？农民有大量的人力，这是没有人怀疑的。财力和物力怎样呢？农民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四年多打的粮食和多收的棉花，价值就等于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中农林水利支出的两倍。今后会年年增产，农民的财力和物力也会一年比一年增大。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农民是有力量办的。当然，国家在财政上、经济上和技术上，也应当给农民以尽可能的支援。但是。国家所花的钱不可能太多，尤其是目前这几年的情况是如此。否则，如果事事依赖国家，一切都由国家投资来举办，那是国家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其结果势必是推迟这些事业兴办的时间，有的甚至办不起来了，或者是把国家的财力大量地使用到这些方面来，而缩减工业投资，从而就会推迟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无论是把这些本来可以主要地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事业推迟不办，或者是推迟国家工业化，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对于农民，都是不利的。

正因为这个纲要主要是向农民提出的，并且主要是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它就应当成为动员农民的一个有力的文献，所以，就应当写得比较简单明了，使农民容易了解。在多次的讨论中，有些同志提出增加若干条款的意见，其中有的是应当完全由国家举办的。有的同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不大，或者没有直接关系，有的是属于工作执行中的方法问题。这些意见，也曾经试图加到这个纲要里面去，结果把纲要全文弄得太长，过于复杂烦琐，势必会削弱它的动员农民的作用，所以还是删去了。在多次的讨论中，也曾经试图把各种农作

物的产量指标，畜牧、渔业、造林和灌溉的指标，以及拖拉机和化学肥料的产量指标等等都列到纲要里面去；并且曾经这样写过，后来还是删去了。因为这些指标应当由国家的各个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在经过详细研究之后，作出规定，更为适宜。这样，就使这个纲要能够集中地向农民指出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指出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应当努力完成的各项任务。这就能够更有力地动员广大农民群众。

当然，这并不是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只是农民的事。相反地，在这个纲要中，有许多事是要城乡一起进行的，在这个纲要中，还规定了国家机关的各有关业务部门为了实现这个纲要所必须努力做好的各项工作。不仅各级农业部门应当做好它所担负的工作，机械制造部门也应当按照国家的计划，造出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抽水机等提水设备和拖拉机等农业机器来供应农民，化学工业部门应当完成并且超额完成化学肥料的生产任务，商业和供销合作部门应当做好农产品、副产品的收购工作和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努力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和农村电话网、邮政网，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也都应当为完成这个纲要所规定的同它们有关的各项任务而努力。总之，正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一开始所指出的："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并转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新的高潮。"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当根据本纲要草案，并按照本地方的具体条件，分别拟定本地方的各项工作的分期分批发展的具体计划。同时，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各个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和政法部门也都应当根据本纲要草案，重新审订自己的工作规划。"

同时，要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要求工人和知识分子积极动员起来，给农民以必要的协助。纲要中所提出的许多东西，从新式农具、拖拉机、电话机、直到收听广播的工具、医药用品等等，都是由工人制造的。纲要所提出的许多任务，从增产的各项措施直到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要求，都是要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来帮助农民解决的。所以，工人和知识分子如果不动员起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是向农民提出的，靠农民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同时又是向全国人民提出的，靠全国人民，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一齐动员起来，通力合作，才能实现的。

这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今后几个月内将还是一个草案，要请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加以讨论，提出意见。

第三，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是有条件、有根据可以保证实现的，并且可以提前实现或者超额完成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中心，就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特别是要求在十二年内，把粮食每亩的平均产量，按照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由一九五五年的150多斤提高到400斤，由一九五五年的208斤提高到500斤和由一九五五年的400斤提高到800斤；把棉花每亩的平均产量，由一九五五年的全国平均35斤皮棉，按照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60斤、80斤和100斤皮棉。按照这种亩产量的水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的全国总产量将比一九五五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以上，棉花的全国总产量将比一九五五年的产量增加两倍。只要这项中心要求做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提高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项要求，就将毫无疑问地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实现。

各地负责同志，对于实现上述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指标是满怀信心的，劲头都很大，有的省并且表示可以提前实现。当原来的十七条传到农民中去的时候，广大农民对于实现上述增产指标，同样是信心很高，劲头很大。

实现上述增产指标的条件和根据是什么呢？主要是我国人多，劳动力多，气候条件比较好，劳动力和土地的增产潜力很大。而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特别是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以后，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的制度，实行集体所有和按劳取酬的制度，解放了生产力。这样，就将发扬起广大农民的惊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够更合理地、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大大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也就能够更合理地、更充分地利用土地、耕畜和农具。合作起来，土地联片，去掉田塍地界和多余的田间道路，就可以增加不少的耕地面积（许多材料说明可以增加5%，按这个标准计算，全国就可以增加8,000万亩土地）。合作起来，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整修土地，改良土壤，变旱地为水地，把瘠薄的土地和废弃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合作起来，就有可能把男、女、全、半劳动力和能做轻微劳动的人们，都充分地利用起来，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实行多种经营。合作起来，就有可能统一经营，因地种植，并且能够用更多的劳动力进行土地加工，精耕细作，进一步改进栽培方法，改善耕作制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总之，合作起来，就可以空前地发挥增产潜力，做到"范围广，门路多，耕作细"，从而大大地增加农业生产，增加社会的财富和社员的收入。这种可能性，已经由各地许许多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践所完全证实了。现在，各个地方已经有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些乡、区和个别的县，全社、全乡、全区或者全县的粮食和棉花的每亩平均产量，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要求的在十二年内达到的水平。既然这些丰产的典型社、典型乡、典型区和典型县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这个水平，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同一地区的，条件大致相同的，其他的合作社和其他的乡、区、县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平。既然这些丰产的典型社、典型乡、典型区和典型县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已经达到并且超过了这个水平，我们就更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十二年内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在拖拉机、化学肥料、抽水机、农药农械等的逐步增加和大型水利工程修得更多的条件下，各个地区分别平均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农业生产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是很有可能超过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指出的关于交通、邮电、文化、教育、卫生等项要求，也是在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若干农村中已经实现的事情。许多人感觉短期内难于解决的城市100多万失业人员问题，现在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浙江省嘉兴专区就要求从上海移入10万个劳动力，江西省也要求把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城市失业人员移50万人到那里去。至于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就更不待说了。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100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

所以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它既不是保守的，也不是冒进的。它很有可能提前实现或者超额完成。这样也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第四，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正确地解决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抓住了农业这个基本环节，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顺利地向前推进。

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中心是发展重工业。工业领

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这是社会主义的确定不移的根本原则。这个原则是无可怀疑的，是不能动摇的。

但是，我国是一个拥有六万万人口的大国，农民超过五万万，占人口的六分之五以上。毛主席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我国这样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市场，直到现在，它的购买力还是很低的（虽然比解放以前已经提高了一些），但是它的潜在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旦实现了，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拥有大得惊人的购买力的国内市场。我国工业的发展，除了依靠国内市场以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出路么？当然我们还可以争取工业品的出口，但是主要必须依靠国内市场。我国现在的城市和工矿区的人口约有8,000万，每年需要的粮食和副食品，除了依靠国内供给，依靠农村供给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来路么？我国六万万人口，他们的购买力势必日益提高，所需要的轻工业品，数量之大也是惊人的，难道我国的轻工业除了依靠国内的原料供应以外，还可以主要靠从外国输入轻工业原料么？我国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数量之大也是惊人的，譬如要使我国可以用机器耕种的土地都用拖拉机耕种，那就需要120万到150万标准台（15匹马力为一台）的拖拉机，每年报废换新的数量是12万到15万台；又如化学肥料，如果普遍使用起来，每年至少要2,000万吨氮肥，磷肥钾肥还不在内。这又是重工业的何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农业的发展又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如果不正确地解决农业问题，农业没有巨大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必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我国是一个拥有六万万人口，而农民占人口六分之五以上的大国，这个根本特点，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丝毫不可忽视的。当然，如果有人因而否认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必须切实注意五万万农民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注意农业对于工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当前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中目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这个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就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农民和农业的问题，系统地解决了，从而将在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加速发展，将使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前完成。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

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附：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这个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中共中央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序　　言

这个纲要是在我国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便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

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发展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农业用粮食和原料供应工业，同时，有五亿以上人口的农村，给我国工业提供了世界上的最巨大的国内市场。以这些说来，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

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业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没有农业合作化，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关于在十二年内在全国几个主要不同地区的粮食，除掉某些例外，争取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争取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在单干时候的水平的要求，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成就，经过今后大家千方百计的努力，纲要所提出的这些要求，便有着实现的可能性。

由于我国一般的自然条件好，农村劳动力多，农民有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和精耕细作的丰富经验，农业经济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必须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积极的合理的措

施，并且有准备地有步骤地适合情况地积极推广农业的机械化，充分发掘农业的这种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为着实现纲要的要求而斗争。

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辛勤劳动。但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总是尽可能援助农民的。纲要所规定的许多农业增产措施，今后将逐步得到人民政府的更多的必要的援助。在实际上，这是工农的互相支援，城乡的互相支援。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互相支援，是农民解放的保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封建残余分子为了恢复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极力挑拨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他们这种卑鄙的挑拨失败了，并且还要继续失败下去。

要教育农民群众把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统一起来。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群众就将继续受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富农、投机商人的统治和剥削，就不能有自己的合作社；就将继续出现许多家破人亡的局面。要爱家就得要爱国爱社。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错误的，实际结果都将是危害自己家庭利益的。

在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困难还是会继续出现的。但是，事在人为。对于我们解放了的人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不怕困难，是我们劳动人民本来的伟大性格。

本纲要是就全国的范围提出的。各地方以至各合作社的情况存在着许多的差别。因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合作社，都应当根据本纲要，按照本地方、本合作社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经过群众路线，分别拟定本地方的各项工作的分批分期发展的具体规划。同时，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各个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和政法部门，也都应当根据本纲要，重新审订自己的工作规划。

本纲要所述各项任务中，有一些任务，例如绿化，勤俭持家，消灭老鼠、苍蝇、蚊子，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等，城市居民也应当实行，并且一定要城乡配合进行才能有效地实现。

纲　要

（一）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

巩固合作社的条件是：（1）在合作社的领导成分中，保持原来的贫雇农和下中农（主要是现在的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优势，同时注意使上中农也有适当的代表。（2）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合作社领导机关要按时公布财务收支，干部要同群众商量办事，参加生产劳动。（3）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要同一切游手好闲的现象作斗争，反对铺张浪费。（4）根据合作社的经济情况和当地的自然情况，采取各种增产措施，逐步地增加农

业基本建设，保证遵守和完成国家的计划，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5）合理地处理分配问题，兼顾国家、合作社、社员三方面的利益，在发展生产和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使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和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争取在一九六二年前后，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按人口平均，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6）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克服不顾国家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的本位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每年应当结合农村干部的整风和合作社的整社，系统地总结本年度的工作，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在多民族的地区，要特别注意民族间的团结和互助。

现有的、数目不多的初级合作社，在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应当引导它们自愿地转为高级合作社。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的，听其自便。

（二）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

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下，各地应当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保证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纺织原料（棉花、麻类、蚕茧），油料（大豆、花生、油菜籽、芝麻、油茶、油桐），糖料（甘蔗、甜菜），茶叶，烤烟，果类，药材等项农作物的计划指标，还应当积极地发展其他一切有销路的经济作物。华南各省有条件的地区，应当注意发展热带和亚热带作物。

农业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和饲料。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应当按照国家的计划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三）发展畜牧业

畜牧业的合作化，应当按照各地情况，分别规定不同的发展计划。有计划地发展国营牧场。

大力保护和繁殖牛、马、驴、骡、骆驼、猪、羊、兔等家畜和适当地繁殖各种家禽。特别注意保持母畜、幼畜和种公畜。建立配种站，改良畜种。

在牧区要保护草原，改良和培植牧草，特别注意开辟水源。牧业合作社应当逐步建立自己的饲料和饲草的基地。推广青贮饲料。

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病疫，例如牛瘟、猪瘟、鸡瘟、牛肺疫、口蹄疫、猪囊虫、羊痘、羊疥癣等。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农业区的县或者区和牧业区的区或者乡，应当建立起畜牧兽医工作站。合作社应当有初级的防

治兽疫的人员。充分发挥民间兽医人员的力量，组织和领导他们提高技术，参加防治兽疫的工作。

（四）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

增产措施的项目，主要是：（1）兴修水利。（2）增加肥料。（3）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4）推广优良品种。（5）扩大复种面积。（6）多种高产作物。（7）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8）改良土壤。（9）保持水土。（10）保护和繁殖耕畜。(11)消灭虫害和病害。(12)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主要是：（1）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2）举办农业展览会。（3）各级政府定期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奖励丰产模范。（4）组织合作社之间的参观和评比，交流增产经验。（5）在总结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传授，发动农民和干部学习外社外乡外县外省（自治区）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

（五）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全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应当以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同时修建必要的可能的大型水利工程。

小型水利工程（打井、挖塘、筑堤、打旱井、开渠、筑圩、修水库、兴修蓄水排水的沟洫畦田台田系统等），小河的治理，都由地方和农业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尽可能大量地进行。通过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

内涝灾害严重的地区，应该大力进行除涝排水、改造洼地的工程建设。

要求在十二年内，把水田和水浇地的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三亿九千多万亩扩大到九亿亩左右。灌溉设施的抗旱能力，按各地不同情况，分别提高到三十天到五十天；适宜发展双季稻的地方，要提高到五十天到七十天，以保证收成。为了充分利用一切水源，有关部门应当积极进行对地下水的勘察工作，保证水利部门所需要的必要资料。

凡是能够发电的水利建设，应当尽可能同时进行中小型的水电建设，结合国家大中型的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增加农村用电。

（六）大力增加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

农业合作社要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由自己解决肥料的需要。应当特别注意养猪（有些地方养羊）。除了某些不养猪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因为宗教习惯不养猪的少数家庭以外，要求一九六二年达到农村平均每户养猪一头半到两头，一九六七年达到农村平均每户养猪二头半到三头。要做到猪羊有圈，牛马有栏。还应当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各种绿肥作物，并且把城乡的粪便，可作肥料的垃圾和其他杂肥尽量利用起来。

中央和地方都应当积极发展化学肥料的制造工业，争取到一九六二年生产化学肥料五百万吨到七百万吨左右，一九六七年生产一千五百万吨左右。积极发展细菌肥料。

（七）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

根据生产的需要，经过地区适应性的试验和改制，积极推广那些适合当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经常注意农具的保养和修理的工作。加强新式农具使用的技术指导。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以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

（八）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

要求在一九六二年以前，经过地区适应性的典型试验，普及各种农作物现有的优良品种。对于良种已经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应当加强种子复壮和品种更换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种，并且注意试种外地和外国的良种。

农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自己的种子地，加强群众的选种工作，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更换制度。在丰歉经常不定的地区，要注意储备优良品种的种子。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都应当建立种子管理机构。

（九）扩大复种面积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把复种指数（包括绿肥作物在内）分别提高到下列的水平：（1）五岭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二百三十左右。（2）五岭以北、长江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二百左右。（3）长江以北，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一百六十左右。（4）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左右。（5）长城以北地区，一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已有耕地，减少撂荒面积，在可能的地方，力争扩大复种面积。

（十）多种高产作物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水源，增加稻谷的种植面积。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要求增加稻谷二亿五千万亩。根据需要和民食习惯，适当地发展玉米和薯类等高产作物。

（十一）积极地因地制宜地改进耕作方法

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合理地施肥，合理地灌溉，合理地轮作（换茬）、间作、套种和密植。

不违农时，及时播种，及时锄草间苗，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收获，细收净打，力求丰产保收。

（十二）改良土壤

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都应当积极改良和利用盐碱地、瘠薄的红土壤地、低洼地、砂地

和其他各种瘠薄的土地。注意防止土地的盐碱化。山地必须有计划地积极地整修梯田。用各种办法把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好地。

（十三）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

在有水土冲刷的地区，应当依靠农业合作社，广泛地发动群众，结合当地的生产，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从一九五六年起，要求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显著地收到保持水土的功效，逐步减少水土流失的损害。为使此项工作能够较快地收到效果，农业、林业、水利、牧业和科学研究等有关部门，必须在当地党政机关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支援。

（十四）保护和繁殖耕畜

从一九五六年起，要求在七年到十二年的时间内，每一个农业合作社都要有足够数量的强壮的耕畜。为此，必须生产足够的饲草、饲料，种植高产饲料作物。合作社应当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地改进耕畜的饲养管理工作。合作社和政府应当采取正确的措施奖励耕畜的繁殖。

（十五）防治和消灭病虫害

从一九五六年起，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例如蝗虫、稻螟虫、粘虫、玉米螟虫、棉蚜虫、棉红蜘蛛、棉红铃虫、小麦吸浆虫、麦类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甘薯黑斑病等；同时防止其他危险性的病害、虫害、杂草的传播蔓延。各地区应当把当地其他可能消灭的主要虫害和病害，列入消灭计划之内。为此，必须加强植物保护工作和植物检疫工作。

有计划地发展农药和药械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供应工作。同时，加强使用上的技术指导，保证安全有效。

（十六）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国家应当有计划地开垦荒地。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一千三百多万亩增加到一亿亩左右。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组织移民和鼓励合作社组织分社或者派出生产队，进行垦荒。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和发展畜牧业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避免破坏树林和破坏必需的草原。在树林已经遭到破坏的地方，应当努力恢复。

农业合作社应当充分利用田埂、地角、塘边、沟沿、空闲的场院等一切零星的土地。这些土地可以根据情况，分配给生产队或者社员个人经营。

工矿、商业、农业等企业，文教、卫生、水利、交通、军事等部门和群众团体，在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都必须尽量节省用地，尽量避免和减少占用耕地。

（十七）发展山区经济

按照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发展山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各种土特产的

生产。

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原则下，发展山区的粮食生产。现在还缺粮的地区，应当争取做到粮食自给或者减少粮食调进。

远山区，应当着重发展用材林。近山区，应当着重发展特用经济林、薪炭林、各种果木和土特产。南方的山区，应当注意发展油茶、油桐、竹子、桑树、茶树等。北方的山区，应当注意发展核桃、柞树、花椒等。

发展药材生产。注意保护野生药材，并且根据可能条件逐步进行部分的人工栽培。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山区生产最严重的兽害。保护和发展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

山区、半山区的专区、县、乡和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制定较长期的山区生产规划，合理地使用土地，促进生产的全面发展。国家各有关部门，应当从交通运输、供销贸易、文教卫生、组织移民等方面作有力的配合和支援。

（十八）发展林业，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可能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为此，必须依靠农业合作社造林，实行社种社有的政策。要求合作社自己采集树籽和培育树苗，采取分工负责、包栽包活的办法。同时，鼓励社员在自己的宅旁种树，自种自有。

种树，除了用材林（包括竹林）以外，应当尽量利用一切人力和城乡空地，发展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

大力加强国营造林。国营林场以营造大片用材林为主，并且有计划地营造水土保持林、防风林、防沙林和海防林。

铁路，干线公路和大河流两旁、大型水库周围、矿山附近的绿化，由铁路、交通、水利部门和厂矿负责经营，收益归各经营部门；也可以由附近的农业合作社经营，按照有关部门所定的规格造林，收益归合作社。

绿化用地，不应当占用耕地。

要求在十二年内，尽可能地把国有森林全部经营管理起来。国家不便经营管理的小规模的国有林，应当委托合作社经营管理。必须保护和爱惜森林资源，加强防火工作，防治虫害和病害，制止滥伐和采伐当中浪费木材的现象，并且及时更新采伐迹地，恢复森林。

（十九）发展海洋和淡水的水产品生产和水产养殖业

在海洋渔业中，应当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发挥现有捕捞工具的潜力，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应当注意增加公共积累，添置和改良生产工具，逐步发展机帆船和轮船。加强生产的安全措施，争取向深海发展。利用一切可能养鱼的水面，发展淡水养殖业。加强培育优良鱼种和防治鱼瘟的工作。积极发展浅海养殖业，加强鱼类、藻类、贝类的养殖。

（二十）办好国营农场

要求所有的国营农场，团结和帮助周围的农业合作社，在生产技术方面发挥应有的示范

作用。国营农场应当实行多种经营，提高劳动力利用率；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和劳动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厉行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办农场的方针，改善工资制度，既要增加产量，又要降低成本。

（二十一）改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

根据需要和可能条件，建立和改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例如农业科学院，区域性的和专业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省的农业试验站，县的示范繁殖农场和农业技术服务站等，使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必须同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必须总结当地农民特别是老农的增产经验，学习其他地方农业生产上的好经验。县的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分别选择重点的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作为工作的基地，参加农业生产。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要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为农业合作社培养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人材，以适应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十二）加强气象水文工作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基本上建成气象台站网和水文测站网。加强天气预报，特别是危险天气预报的工作。建立农业气象预报的工作。各地应当注意收听关于气象的广播，以便预防水、旱、风、冻等自然灾害。

（二十三）勤俭办社，勤俭持家

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必须实行勤俭办社的原则。勤，就是要发动社员勤劳生产，在可能和必要条件下积极地扩大生产范围，发展多种经济，进行细致工作。俭，就是要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合作社的各种基本建设，都应当尽量利用合作社本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应当教育农民勤俭持家，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各项家务开支。农村中的妇女团体，应当把教育妇女勤俭持家，作好家务劳动，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

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

（二十四）提高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多种经济

为了充分发展农业和林、牧、渔等副业以及农村手工业，努力扩大生产门路，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村人民的收入，农业合作社应当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北方要设法增加冬季生产。同时，还应当积极改进生产技术，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不断地提高社员的劳动生产率。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内，要求做到农村中的每一个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二百五十天左右的工作。根据妇女的特点，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妇女劳动力。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在七年内，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要求做到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

每年参加农业和副业（包括家庭副业）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八十天到一百八十天。此外，对于农村中一切具有半劳动力的人们，或者能够从事轻微劳动的人们，合作社应当作好适当的安排，要求他们积极地分别参加适合自己能力的劳动。

（二十五）储备粮食

要求一切农业合作社，除了主要是经营山林或者经营经济作物的缺粮社以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按照自己的情况，定出具体计划，加上社员家庭的粮食储备，分别储积足够三个月、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在丰歉经常不定和交通不便的地区，特别要注意以丰补歉，积谷防荒。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国家应当储备足够一年到两年之用的粮食，以应急需。

（二十六）改善居住条件

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农业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互助、节约开支和节省用地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

（二十七）除四害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二十八）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黑热病、钩虫病、血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其他疾病，例如：麻疹、赤痢、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白质炎、白喉、肺结核、麻疯、沙眼、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也应当积极防治。积极培养医务卫生人员，包括中医在内。

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讲求清洁卫生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二十九）保护妇女儿童

对于妇女的生产劳动，坚决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农业合作社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可以成立适合需要的临时简便的农忙托儿组织。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应当予以照顾。对于农村儿童参加农忙时期的辅助劳动，应当根据他们的年龄和体力，做出适当的规定。

卫生部门应当为农村训练助产员，积极推广新法接生，保护产妇和婴儿，降低产妇的染病率和婴儿的死亡率。

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三十）实行"五保"，优待烈属和残废革命军人，供养和尊敬父母

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

对于缺乏劳动力的烈属和享受残废抚恤金以后仍然不能维持生活的残废革命军人，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优待办法给以优待，使他们的生活不致低于一般社员的水平。

应当教育青壮年男女供养和尊敬自己的父母，使年老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在生活上得到合理的照顾，在精神上得到充分的安慰。

（三十一）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争取在乡或者社逐步设立业余文化学校，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育。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

（三十二）发展农村广播网

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大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

（三十三）发展农村的电话网和邮政网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建立乡和某些合作社的电话网，有些地区可以设置无线报话器。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邮政网，做好邮电传递工作。

（三十四）发展农村交通运输

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在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之间，根据当地运输发展的需要，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经济适用、不浪费土地的原则，依靠群众力量，逐步修建适应当地运输工具的各种道路。同时作好各种道路的经常养护工作。特别要注意山区道路的修建。

有河道可通的地方，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整理和疏浚航道，以利交通。

（三十五）调整农村商业网

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商业部门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应当在最近几年内，完成农村商业网的调整，加强商品的流通，加强初级市场的管理，保证做好农村中的商品供应工作和农产品的收购工作，同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作斗争，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

（三十六）发展农村信贷合作事业

巩固农村信用合作社，积极开展农村信贷业务和农村储蓄业务，帮助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解决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

（三十七）发挥复员军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积极性

在农村的复员军人应当在社会主义生产战线上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联系群众，遵守政策、法令和劳动纪律，成为农业生产中的积极分子。乡人民委员会和农业合作社要适当地安排复员军人的生产活动，帮助他们学习和提高生产技术。各级人民政府要经常关心复员军人的进步，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三十八）提高农村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教育农村青年热爱祖国、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和爱社如家，鼓励他们积极地学习文化和农业科学技术，学习老年和壮年农民的生产经验。农村青年应当成为农村的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中的突击力量。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三十九）改造地主、富农、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保护农村的社会主义秩序

过去的地主分子、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和农村中的过去的反革命分子，按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根据他们的实际表现，可以由农业合作社分别吸收他们入社做社员或者做候补社员。不够入社条件的，可以由乡人民委员会交给合作社监督生产。对于这些人，合作社要分别情况加强教育和加强管理，并且要经常地教育社员和社外农民，提高警惕性，防止他们中间可能发生的破坏活动。已经成为社员的或者候补社员的过去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如果表现不好，并且屡教不改，是社员的，可以分别降为候补社员或者监督生产；是候补社员的，可以降为监督生产。如果有破坏行为，还应当给予法律制裁。

严禁赌博，取缔会道门活动。对于盗窃犯、诈骗犯、流氓分子、特务分子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都必须依法惩办。

（四十）城市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必须互相支援

工人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和工业原材，满足工业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城市的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还应当通过联欢、访问和通信等项方法，加强联系，互相鼓励，交流经验，以便有利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的巩固。

（转自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按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的单行本排印）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热烈的欢迎，鼓舞起广大农民更大的生产热情。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和保证我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伟大纲领。实现这个纲领，就将保证我国农业的巨大发展，保证我国农民生活大大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也将促进和保证我国工业的顺利发展，保证我国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和全国人民生活的稳步的和普遍的改善。我们要立即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广泛地展开一次关于这四十条纲要的大讨论，使全国人民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

现在正是冬季生产和准备明春生产的重要时机，在这个时候讨论四十条纲要，正好可以从下而上地集中群众的意见和实际经验，制订省、县、区、乡和农业合作社的各级计划，结合冬季生产、兴修水利、大量积肥等项运动，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新的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的丰收。同时，广大群众目前正进行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在这个时候进行关于四十条纲要的讨论也是适宜的。只要划出一段时间，在农村大约七个晚上到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逐条宣读，逐条讨论。在不同的群众中可以有不同的讨论方法，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可以多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可以少讨论；重要的问题要多讨论，不大重要的问题可以少讨论。讨论的过程应该成为挖掘生产潜力、克服各种保守思想的过程，应该成为制订或修改社、乡、区、县的生产规划的过程，应该成为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大动员的过程。

一九五六年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不论北方和南方，到处都有高额增产的先进事例。总计一九五六年

全国有二十九个县、市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生产指标，即纲要中规定的一九六七年的生产指标．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就有七个千斤县．北方贫瘠地区的甘肃定西县在一九五六年增产的粮食达到了一九五三年的三倍．今年有更多的县、市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一九六七年的生产指标．如河北今年有三千一百零四个社达到了四百斤，有一百九十八个社达到了五百斤以上，有九十一个社达到了六百斤以上，有六十八个社达到了八百斤以上，有十一个社达到了千斤以上．又如湖北红安县土质瘠薄，生产条件不好，今年每亩平均产粮也达到八百三十四斤，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别的省区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量增产的地区，有的是十分贫瘠的，在那里能够提早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指标，那末，条件与它们相同或者比它们好的地方，难道反而不能做到吗？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一九五六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一百多亿斤．

为了在讨论中使群众能够对于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辨别清楚，并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各地在讨论四十条纲要的时候，抓住中心的问题，这就是：能不能和如何在十二年内达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指标？能不能和如何在几年内赶上和超过原来富裕中农的收入？应该怎样争取明年农业的大丰收？在讨论中还应该想出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马上开始实行．江西崇仁县日升农业合作社最近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的时候，抓住了这些中心问题，讨论的结果很好．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证明农业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过去的想法太保守．于是他们马上提起了劲头，制订了今后五年的生产规划，争取到一九六二年粮食亩产量要达到一千斤，即提前五年超过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河南林县高家台农业合作社讨论这个草案的时候，总结了几年来兴修水利的成绩．社员们一致认为过去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今后还是大有可为．他们一面讨论，一面制订规划，立即把兴修水利的任务分配给各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现在大家干劲很足，一个规模空前的兴修水利和准备明年大生产的高潮已经发动起来了．如果说去年全国已经有二十九个县、市的粮食产量，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指标；那末，今年至少总有几十个县、市会达到或超过这个指标．只要各地抓紧今冬明春的生产环节，加紧冬耕冬种，大力开展水利和积肥运动，为明年的农业增产打下基础，我们相信明年就会有更多的地区能够提前实现农业纲要所规定的指标．

各级党委应该抓紧目前的时机，发动广大群众认真讨论农业纲要的修正草案，振作精神，鼓起一把劲，既要反对消极自流，也要反对不切实际的空喊．我们必须向右倾消极情绪和说空话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赞扬群众中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情．现在有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全乡、全社的会议上提出了“跨过黄河！跨过长江”的口号．他们的意思是说，黄河以北也要争取把平均每亩粮食产量提高到五百斤，长江以北也要争取把平均每亩粮食产量提高到八百斤．这些口号是好的，并且有少数单位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新中国的人民应

该有这样的志气！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努力向先进的标准看齐，要虚心地热情地吸取先进地区的经验，特别是与本地条件相同或相似的地区的经验。在每个县里，也会有比较先进的地区，至少也可以找到比较先进的乡、社和生产队。要用最大的热情对待他们所创造的一切好经验，使它成为鼓舞和引导全体人民前进的力量。

发展农业，并不只是农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事情。人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农业，人人对农业的发展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在关于四十条纲要的大辩论中间，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的成员和街道居民，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都应该明确地认识发展农业同自己的密切关系，提出自己对发展农业能做和应做的一些事情，并且尽快地开始实行。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行动起来，要尽快地把可能抽调的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加强农业战线上的领导和力量。辽宁省已经决定并且着手下放的干部有二十多万人。江苏省已经决定并且着手下放的干部有十三万人，其他各省、市也都在陆续下放。他们采取的办法叫做"一放到底"，直接到基层去工作，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很好和很重要的措施。能够下乡、上山去直接支援农业生产的工作人员，都要尽快下乡去，上山去。青年知识分子更要把下乡、上山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的方式，要在这次大辩论中把自己对待农业生产的错误认识改正过来，下决心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到农民群众中去。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同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这次大辩论中，同样应该进一步了解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更快更好地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四十条纲要所规划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让我们展开全民的大讨论，动员全国的力量，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吧！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越南劳动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罗马尼亚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在会议上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和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迫切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交换意见的结果表明，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上的观点和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的看法是一致的。会议的讨论也涉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会议参加者在起草宣言草案的时候曾经同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进行了协商。没有参加会议的兄弟党，对于本宣言中所提出的意见采取什么态度和什么做法，由它们自己决定。

一

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现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九亿五千多万人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建设新生活。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发展鼓励了战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巨大发展。在最近十二年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外，还有七亿多人挣脱了殖民枷锁，建立了自己的民族主权国家。仍然受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正在加强争取本民族的解放的斗争。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剧烈地加速了帝国主义的没落过程。帝国主义已经丧失了对于大部分人类的原有统治。帝国主义各国的社会，由于深刻的阶级矛盾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在分崩离析；那里的工人阶级日益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政策，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为民主权利、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它保证了生产力以资本主义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保证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在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群众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人民政权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团结，实现了各民族的平等友好，执行了维护世界和平和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外交政策。日益壮大和巩固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给予国际局势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帮助了争取和平、进步和人民自由的事业。

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由于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帝国主义的阵地已经大大削弱了。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各国，正在捍卫已经取得的独立，并且为经济上的自主和国际间的和平而斗争。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这些国家的平等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和它们在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斗争中的合作，都便于这些国家的人民保卫自己的民族自由和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

在帝国主义各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在这些国家里，现代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没有用来服务于社会进步和人类福利，因为资本主义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使这种发展畸形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是动荡不稳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国家里，暂时仍然保持着的比较景气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军备竞赛和其他暂时因素的不巩固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避免新的、深刻的震动和危机。暂时的景气助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工人中的改良主义幻想。战后时期，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在反对日益加剧的剥削、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中争得了工资的某些提高，但是，就在若干这类国家里，实际工资也仍然低于战前水平。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千百万的劳动者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由于垄断资本的广泛侵入农业和它强迫推行的价格政策、银行信贷和其他贷款办法，由于军备竞赛所引起的苛捐杂税的增加，农民基本群众在继续破产和贫困化。日趋尖锐的矛盾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而且存在于垄断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存在于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以至资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目前所处的境遇，使他们越来越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们摆脱灾难深重的处境的唯一出路。这样就为

吸引他们积极参加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力图依靠所谓"实力地位"政策统治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并且企图阻挠人类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前进，它们打着"反共"的幌子，力图消灭民主自由，威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想要以新的形式给已经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锁，并且经常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敌对的颠复活动。美国某些侵略集团的政策是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集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样，这些集团就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在战后的年代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朝鲜、马来亚、怯尼亚、危地马拉、埃及、阿尔及利亚、阿曼和也门等地进行了或者还在进行着战争。同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顽固地拒绝裁减军备，拒绝禁止使用和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拒绝就立刻停止试验这种武器达成协议。他们继续所谓"冷战"，进行军备竞赛，建立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实行破坏和平的侵略政策，造成新战争的危险。而如果在未能缔结禁用核武器的协定的情况下发生世界战争，那么，它就必将是一场破坏力空前巨大的核武器战争。

在西德，在美国的扶植下，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从而在欧洲的中心造成了严重战争危险的策源地。反对威胁着和平的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是德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力量和欧洲各国人民的重要任务。在这个斗争中，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会议参加者表示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团结一致，并且表示对它完全支持。

同时，帝国主义者企图强迫中近东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接受臭名远扬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从而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造成了威胁。它们组织反对独立的叙利亚的各种阴谋和挑衅。这些反对叙利亚、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挑衅的目的，是要离间阿拉伯国家，使它们陷于孤立，以便为消灭它们的自由和独立扫清道路。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这一侵略集团，在东南亚造成了战争危险。

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战争危险必须保持最大的警惕。

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帝国主义者在埃及的侵略计划的失败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者利用反革命势力来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计划，也同样遭到了失败。

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因为人民决不会再继续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

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根据当前条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关于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

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友好的可靠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共同提出的五项原则，以及亚非国家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原则，是符合于和平共处的利益的。现在，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成了世界各国最广大群众的要求。各国共产党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它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一起，竭尽全力来防止战争。

二

会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和兄弟合作，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间以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是为生活所考验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目前，各国劳动者对于执行维护世界和平政策的并且是和平和社会进步的堡垒的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给以支持，是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各国工人阶级、民主力量和劳动者所关切的，是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不断地巩固兄弟联系，是维护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成果，使它们不受社会主义敌人的任何阴谋所侵犯，并且扩大和巩固这些成果。

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般互助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各国建立了相互间的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合作。这对于巩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对于巩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后，社会主义各国将继续扩大和改善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

社会主义各国同样主张在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全面扩大同一切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只要那些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

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不是为了反对任何其他国家。不但如此，这种团结还有利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因为它抑制好战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野心，支持和鼓舞日益壮大的和平力量。社会主义各国反对把世界分割成为各个军事集团。但是，在西方国家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取消双方军事集团的建议的现实情况下，华沙条约组织应该存在和加强；这个组织是防御性的，是为欧洲各国人民的安全和世界和平服务的。

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在统一的大家庭里，是由于它们走上了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有共同的阶级实质，由于它们需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由于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由于它们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可靠保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兄弟关系和友谊，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政策，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余。社会主义各国间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完全可以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

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加以解决。

三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广大群众中唤起了越来越深刻的同情。社会主义思想正在掌握着越来越多的成千成万的人们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竭力从思想上腐蚀群众，歪曲社会主义和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制造迷惑和混乱。因此，加强对于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揭穿帝国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造谣诬蔑，通过生动的和有说服力的形式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好，具有首要的意义。

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肯定了它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完全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下述原理的正确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遵循着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和传统有很大不同，必须予以充分重视，但是这些规律仍然在普遍地起着作用。

这些共同的规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不允许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列宁曾经多次告诫，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但是，如果夸大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会议参加者认为，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并且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为生活经验所检验过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集体贡献。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

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在现阶段中，加强反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会议强调指出，必须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队伍中坚决克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带有国际性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妨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妨碍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用引经据典和死啃书本来代替对具体情况的研究，使党脱离群众。一个陷入宗派主义、脱离广大群众的党，决不能给工人阶级事业带来胜利。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共产党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但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这一个或那一个党在个别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

必须指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在取得政权以后，工人阶级面对着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技术基础的严重任务。同时，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很大。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们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坚持自己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不容许破坏这种统一的派别和集团存在，这是顺利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必要保证。

四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临着伟大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不但需要共产党和工人党本身的团结，而且需要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需要巩固工农联盟，需要全体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的团结，需要有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和平的力量的团结。

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斗争是保卫和平的斗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在争取同任何爱好和平、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共同行动。会议参加者声明，他们支持任何国家、政党、团体、运动和个人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一切努力，支持他们争取实现和平共处、建立欧洲和亚洲的集体安全、裁减军备、禁止使用和试验核武器的一切努力。

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主利益的忠诚的保卫者。在许多国家中，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还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任务。在这些国家里，有必要建立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

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无数的事实证明，各种爱国民主力量团结得越广泛越巩固，他们的共同斗争就越有把握取得胜利。

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反对战争危险和争取他们切身利益的斗争中，越来越把锋芒指向军备竞赛的祸首、新的世界战争计划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侵略和反动的堡垒——大垄断资本集团。这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和政策，不但同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同所有其他阶层——农民、知识分子、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越来越发生矛盾。在美国垄断资本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身受美国经济和军事扩张政策危害的国家里，把最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进行争取和平、保卫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独裁统治的斗争的客观前提正在形成。

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历史变化和巨大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在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的增长，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是多样化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如果能实现，对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对于全民族，都是有利的。

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进部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阵线和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党派和社会团体达成各种可能形式的协议和建立各种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多数的人民团结起来，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工人阶级依靠人民的大多数，并且坚决打击那些对于资本家和地主不肯放弃妥协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同时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只有广泛地不断地开展工农群众和城市中等阶层反对大垄断资本、反对反动派、争取深刻的社会改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一切。

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无论是在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扩大和维护他们的民主权利、争取和保卫民族独立、争取国际间的和平的斗争中，或者在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都主张同社会党建立合作。尽管社会党的右翼领袖们竭力阻止这种合作，但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许多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还是在增长着。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存在着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在工人运动中的许多迫切问题上采取统一行动的障碍。

在工人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了充分条件去密切联系最广大的群众，因此必须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彻底地依靠人民群众，使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事

业成为具有高度的主人翁精神的千百万劳动者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几年所采取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步骤，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人民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毫无疑问，为了有效地团结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团结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和平的力量，必须首先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本身的团结，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一切更广泛的团结的核心，是工人阶级事业胜利的最基本的保证。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负有特别重大的历史责任。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为了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进一步团结的利益，为了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它们将始终不渝地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和同志式的合作。

会议满意地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长壮大了，它经受了许多严重的考验，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光辉的胜利。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向劳动人民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生命力，证明了自己不仅能够宣传而且能够在艰巨的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

像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前进运动一样，共产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困难和曲折。但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任何困难和曲折，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都不能挫折工人阶级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决心。共产党人从走上斗争舞台的时候起，就遭到反动势力的种种迫害。但是共产主义运动英勇地击退了它们的攻击，而且在考验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共产党人正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团结一致，来回答帝国主义反动势力阻挠人类社会向新时代前进的企图。

同帝国主义所谓“共产主义危机”的胡说相反，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发展和巩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最近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成功，有力地说明了它们的队伍的团结一致，说明了它们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实。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

会议参加者交换意见以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在现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相互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

会议参加者一致表示坚定的信念，相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自己的团结和在这个基础上的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促进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

刘少奇

同志们：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向我国工人阶级，致最热烈的祝贺！

这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正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一九五六年，我国已经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又展开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依靠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努力，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从而为我国的工业化事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我国人民多少年来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任何国外和国内的敌人，再也不可能阻止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这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又是世界形势进入了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转折点的时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力量，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的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力量。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使苏联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若干最重要方面超过了美国。最近在莫斯科，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随后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也举行了会议，这两个会议发表了两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这两个会议的成功，证明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证明了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经济战线上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都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同时，必须继续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坚持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国家计划而斗争。我们要努力掌握和提高技术，充分发挥企业中的潜

在力量，通过社会主义竞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产量和加快建设速度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和工程质量，并且注意节约资金和原材料。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合乎实际地贯彻执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使工业生产迅速地向前推进，并且帮助农业生产也能够迅速地向前推进。

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工业生产，我国全体工人和全体企业管理人员必须团结一致，为办好企业而奋斗。我们的企业管理制度是高度的集中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一切企业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并且以严格的劳动纪律来保证千百万人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扬职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吸引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企业中需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在我们的工矿企业中已经开始实行了在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现在又正在用大鸣大放、出大字报、展开大辩论的方法进行整风运动，通过群众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揭发和克服企业管理和领导作风上的缺点。这些都是扩大企业民主的有效形式。劳动群众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所以在我们的企业中能够实行广泛的民主。这种以办好企业为目的的广泛的民主，不但不妨害企业行政领导的集中，而且正是为了加强集中。这样作的效果，已经为整风运动开展以来的事实所充分地证明了。一切工矿企业都应当坚决地依靠群众，进行彻底的整改，并且使现在整风运动中所用的方法成为经常的工作方法，把它和职工代表大会紧紧地结合起来。工人同志们也要更加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用群众的力量保证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办好我们的企业。在我们国家里，有不少工人同志具有这样一种高贵的品德，他们象爱护自己的家庭一样地爱护企业，把办好企业当成自己的事情，坚决地维护企业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密切地关心本企业的生产状况。他们这种爱厂如家的精神，应当在所有的工人中提倡和发扬起来。

进行整风运动，在职工群众中摆事实，说道理，分清是非，这不但是改进工作的好方法，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好方法。工人阶级决不因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就不需要自我教育了，相反，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工人阶级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方面也必须起模范作用。在目前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但从外部影响着工人的队伍，而且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农民，青年学生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成分变成了工人，他们还会把种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带到工人队伍内部来。错误思想的影响如果听其泛滥，就会损害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并且会损害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的团结。新工人和年青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为了把自己锻炼成为有觉悟、有组织、有纪律的阶级战士，能够担当领导阶级的责任，他们就必须用自我教育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在职员和技术人员中，更加迫切地需要进行自我改造，使自己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正变成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同时，职工群众还要和混进工人队伍的一些坏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保持工人队伍的纯洁。

在很多老工人的身上，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们是新工人、特别是年青工人应该学习的榜样。老工人和先进工人应该继续提高自己的觉悟，努力成为工人队伍中自我改造和加强团结的核心力量。

过去几年来，工人群众不论在阶级斗争的战线上或者在生产战线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后中国工人阶级应当更加提高自己，更好地负起领导阶级的责任。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进行许多复杂的斗争，克服许多困难。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事业，我们不但要

严肃地解决各种敌我矛盾，而且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在这些斗争中，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表现出自己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工人阶级应当勇于承担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艰难和困苦，并且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出它是最不自私、最能为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坚持奋斗的阶级，使自己真正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考虑问题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而不是只从某一部分人出发；要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是只从眼前的利益出发。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够担负起它在历史上所应当担负的任务。在改善生活问题上，工人阶级应当照顾到全国人民主要是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力求使工农生活水平比较接近，以利于加强工农联盟。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四项有关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来的。我们相信，这些规定一定能够得到全国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

我们的工会过去在团结和教育工人群众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会应当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各级党组织应该加强对于工会工作的领导，使工会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学校，并且通过工会而使党和自己的阶级密切地联系起来。某些工会组织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一向，必须在整风运动中坚决加以纠正。一切工会工作的干部都应该在生活上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熟悉生产、深入群众，坚决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工会工作者面着复杂的任务：他们需要善于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善于正确地处理生产和福利、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关系，善于正确地处理行政和群众的关系，善于处理这一部分工人和那一部分工人的关系。但是工会工作者不应当害怕困难，而要在克服困难中创造出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且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干部。

工会还必须加强对于工人群众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教育，加强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联系和团结。我们要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们要虚心地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学习，也要向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学习。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了热情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所十分感谢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也要支持一切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各国人民团结的支柱，有了这个团结，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事业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更大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万岁！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万岁！

（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附：关于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和超过英国工业水平的资料

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将英国的工业发展情况，和我国的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的有关资料简单介绍如下：

（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我国和英国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我国		英国	
	1956年	1957年	1956年	1957年
钢	446万吨	524万吨	2,099万吨	2,174万吨
铁	477万吨		1,338万吨	
煤	10,592万吨	12,800万吨	22,560万吨	22,600万吨
电力	165亿度	190亿度	950亿度	960亿度
化肥		67万吨		350万吨

（二）英国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最早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工业化的时期（一七三〇——一八六〇）。

早在16至18世纪，英国就利用扩大海外贸易，和残酷地掠夺殖民地及贩卖奴隶等手段取得了高额利润；在国内通过发行大量的公债，征税和信用制度积累了资本。同时还由于实行了圈地运动和劫夺寺产运动，一方面使大量土地集中在"新的贵族"手里。另一方面，使农民丧失了所有的土地，成为无产者，给新兴的工业提供了劳动后备军。这一切都给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准备了条件。

从一七三〇年开始到一八六〇年止，约经过13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并以纺织工业为重点。直到18世纪中叶，广泛采用了蒸汽机，英国才开始发展重工业。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实际是从一八一〇年开始到一八六〇年完成的。由于建立了机器制造业，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在工农业生产中占了主导地位，工业品输出量也在激增，英国逐渐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国。

第二个时期是英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一八六〇——一九一四）。

英国的垄断资本和财政资本是首先在从事开发殖民地原料的企业中形成的。在一九一〇

年以后已经出现了一个最大股份银行的小集团。它不但影响着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全部国民经济，还部分地影响着全世界的经济。英国工业垄断要慢一些，直到一八九〇年才在化学、烟草等工业中建立了若干垄断组织。至于重工业的垄断组织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形成。此时，英国已逐步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第一位，英国生产的生铁、煤、布匹比美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的产量加在一起还要多。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期，英国工业发展速度已呈递减的趋势，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未超过2％。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逐渐衰落。它已逐渐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德国赶上并超过。

第三个时期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时期（一九一四——一九三八）。

这个时期，英国的"唯我独尊"的经济地位已经动摇了，经济危机爆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渐露头角，并且占到了优势。这表现在英国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急剧下降。在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从未有过工业高涨。只有很少几年高于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绝大多数的年份则是大大低于这一水平。一九二九年，美国工业产量增加70％，而英国即还未达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在一九三二年的生产水平比一九二九年还要低15％。特别是采煤工业、炼铁工业、造船业的生产水平在所有这些年份中都低于战前水平。采煤量一九一三年是29200万吨，一九三八年降低到23100万吨。钢的产量一九一三年是766万吨，一九二一年降低到370万吨。

第四个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一九三八——一九五六）。

战后，英国的经济由于德、意、日等国退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争舞台，以及英国的经济军事化，使得英国工业处于所谓"繁荣"状态。英国工业生产量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仅次于美国，高过西德，居第二位。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英国的经济已开始显著地恶化。其具体表现，许多工农业部门生产的绝对量缩减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在加剧，英国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削弱了，它的外汇财政状况恶化了。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六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不到50％，平均每年增长额只有2％。钢的产量由1320万吨增加到2099万吨，每年平均增长2.5％。除了冶金工业、金属加工工业的产量一九五五年较一九五四年增长8％，化学工业增长5％以外，在其它所有部门中，几乎都出现了生产停滞或生产缩减的现象。英国从一九五四年年底开始，特别在侵略埃及以后，经济情况非常不妙，工业生产不断下降。例如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较一九五四年同期比较，生产的增长额只有3％。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量只较一九五五年同期多1.5％。一九五六年三月的工业生产指数，不仅自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以来第一次没有较上年同期有任何增长，甚至还减少了1％。这种情况正是经济趋于萧条的一个重要迹象。

（三）英国工业发展情况和我国工业发展情况作下列几方面的比较：

1.在工业化的速度方面：英国化了130年的时间，我国除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外，只要化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2.在工业生产的速度方面：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的总产量预计将增长1.32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8.3％；而英国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六年的19年中工业的总产量只增长了50％，每年平均的增长速度只有2％。从主要产品的产量来看，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钢增加了近三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31.8％，煤增加近一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14.1％；而英国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43年中，钢只增加169％，每年平均增长速

英国经济发展四个时期主要年份钢、煤产量

	1870年	1913年	1937年	1950年	1955年
钢	22万吨	766万吨	1,320万吨	1,660万吨	2,010万吨
煤	11,219万吨	29,202万吨	24,420万吨	21,980万吨	22,550万吨

一九五六年英、美、西德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英国	美国	西德
	2,099万吨	10,524万吨	2,318万吨
	22,560万吨	48,330万吨	13,440万吨
发电量	950亿度	6,820亿度	840亿度

度是1.3%，煤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2.8%。再看：英国在一八八〇年就生产130万吨钢，到一九〇四年才生产511万吨钢，我国一九五二年生产135万吨钢，到一九五七年生产524万吨钢。这就是说他们用了一八八〇年——一九〇四年二十四年时间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七年五年时间就达到了。再从我国和英国同样时间的速度来比较：一九四九年我国钢的产量是十五万八千吨，英国在一九四八年钢的产量为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吨，比我国多将近一百倍；一九五二年英国钢的产量还比我国多十二倍以上；一九五七年英国只比我国多三倍。

3.在资源方面：我国地大物博，有很多资源还未开发。据有关部门初步提供的材料，煤的远景储量有一万亿吨以上，铁矿有一百二十亿吨以上，我国的水力资源也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估算的资料，就有五亿瓩以上的蕴藏量。英国资源贫乏，据第五届世界动力会议公布的资料，英国煤田可能总埋藏量只有1739亿吨，只及我国煤田储量的17%，英国铁矿已经探明的工业储量只有24亿吨，远景储量也只有38亿吨，只及我国已经掌握的铁矿储量的31.6%。英国的水力蕴藏量也很小，枯水季节只能发电九十万匹马力。英国本土资料这样贫乏，因此许多重要原料完全依靠进口，国内生产的原料只有百分之十，铁矿在本国开采的只能满足60%的需要，每年要从外国输入大量的铁砂，现在殖民地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使英国丧失了许多重要原料市场。

4.英国的市场一向依赖于海外。战后英国工业产品中有20%以上是出口的。目前，民族独立运动迅速高涨，使英国失去了很多重要商品市场。特别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争日益尖锐，而西德已成为英国工业可怕的劲敌，这就不得不影响英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英国的资本投资大多投向国外，对本国工业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资本积累也受到很大影响。我国有最广大的国内市场，市场需要的不断增加和大量增加就提供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同时也使我们有可能较大量地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

（四）十五年后我国和英国的钢、煤、水泥的产量的比较。

关于钢的产量：按照英国几十年来钢的增长速度来推算（英国必然发生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不计算在内），到一九七二年，大概达到3600万吨；我国的钢产量，第二个五年计划

期间达到1200万吨，如采取积极精神，各方面配合得好，可达到1500万吨左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产2500万吨一3000万吨，到一九七二年可达到4000万吨一4500万吨。

关于煤的产量：一九五六年我国产煤10.592万吨，英国为22,560万吨。我国不及英国一半，但是这时期我国的速度每年增产14%，以后能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而英国四十几年来煤的生产呈下降趋势。因此，在一九六三年就能超过英国一九六五年的生产量。

关于水泥的产量：一九五六年我国水泥产量为639万吨，也是不到英国（1,300万吨）的一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速度每年平均为18%，第二个五年计划为14%，第三个五年计划为10%。而英国在一九三八——一九五六年的十六年间平均每年只增长2.8%，一九五四年后逐年下降。这样，我国可以提前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前半期赶上英国。

关于化学肥料的产量：英国现产350万吨，我国67万吨。估计十五年后，英国还限于500万吨左右，我国可以赶上去，数字还会超过。因为我国农业的需要量很大。

产量比较	钢（万公吨）	煤（万公吨）	水泥（万公吨）
1937：我国			
英国	1,320.8	24,355.6	738.9①
1952：我国	135.0	6,352.6	286.0
英国	1,636.7	22,886.8	1,131.7
1956：我国	446.5	10,592.2	639.3
英国	2,099.0	22,560.0	1.297.2
1962：我国（预计）	1,200—1,500	22,000.0	1,250.0
英国（预计）	2,581		1,534.6
1963：我国（预计）		25,000.0	
英国（预计）		24,400.0②	
1967：我国（预计）	2,500—3,000		2,010.0
英国（预计）			1,770 0
1972：我国（预计）	4,000—4,500		
英国（预计）	3,600		

① 是1938年的数字

② 是1965年的数字

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七日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李　富　春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并且代表国务院热烈祝贺大会的成功。

依靠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努力，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事实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某些重要任务和某些重要指标，如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工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铁路和公路的运输量等等，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五六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样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根据初步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底，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将超过五年计划百分之十七左右；农副业总产值和粮食、棉花的总产量都将达到五年计划的指标，并且略有超过；各种现代运输工具的货运量将超过五年计划百分之十四以上，其中铁路货运量将超过百分之十一以上；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即基本建设工程总量，将超过五年计划百分之十三以上，其中工业基本建设将超过百分之七左右，农业、水利、林业基本建设将超过百分之五十三点七，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将超过百分之十二；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总数也都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由于绝大多数指标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首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一九五六年，经过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高潮，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底，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五，合作社经济占百分之二，公私合营经济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在农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约占百分之一多一点，合作社经济将近占百分之九十四，个体经济约占百分之五。在商业机构零售总额中，国营经济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供销合作社经济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九，公私合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起来合作经营的小商贩）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六，私营经济占百分之三。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论在

城市或者在农村都确立了巩固的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个体经济已经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确立起来。

接着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又通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这个伟大的运动，开展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更加巩固了。任何敌人也不可能阻止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全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奋斗目标，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和文教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预计为四百八十四亿九千万元，其中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预计为二百七十三亿八千万元，开始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八百二十多个，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全部建成的约有四百五十个，其中属于苏联帮助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的有五十七个（此外还有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十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计划为二千三百多个，在计划执行中有了很多增加，并且绝大部分都可以在今年年底建成。由于上述建设的完成，一九五七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总额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一倍以上。工业基本建设的大规模进行，不仅大大地增加了工业生产能力，而且建立了一系列的新工业部门，改变了我国过去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所造成的工业基础薄弱和残缺不全、互不配合的状态，使我国变成为一个具有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效率蒸汽机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的国家。我国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已经基本上建成，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也都已经大为加强，同时，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新的工业区正在形成，在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也开始了部分的工业建设。第一个五年在进行大规模新工业建设的同时，我国原有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也有了很大发挥，因而使我国工业总产值到一九五七年底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九五七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有很大的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机器设备的自给能力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金属材料的自给能力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当第一个五年内开工建设的重大企业在第二个五年内全部建设完工并且发挥生产能力的时候，我国的机器设备和金属材料的自给能力将会有更多的提高。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项基本方针，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五年内，我国的生产资料工业产值增长了两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以上。主要重工业产品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钢百分之三十一，电力百分之二十一，煤百分之十四，石油百分之二十七，机器制造（以全部产值计）百分之三十三，水泥百分之十八。我国的钢产量在一九五七年预计将达到五百二十四万吨，比一九五二年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长了将近二点九倍，比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九十二万吨增长了四点七倍；我国第一个五年合计的钢产量将达到一千六百五十六万吨，等于旧中国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八年共四十九年间钢的总产量七百六十万吨的百分之二百一十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轻工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消费资料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棉布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三十，食糖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机制纸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九。

我国在积极发展工业的同时，努力推进了农业、林业和水利事业的发展。我国农业合作

化的实现，改变了几千年来个体农业分散经营的落后面貌，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且为农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了条件，从而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之后，我国农村中的增产运动也就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于农业、水利和林业方面的拨款达到七十五亿元以上，农业贷款净额有二十九亿元，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在水利方面，我们已经着手根治淮河，开始治理黄河，并且依靠农民的积极性，在国家支援下，五年内增加灌溉面积二亿一千多万亩，等于我国到一九五二年止几千年开发的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的百分之六十。增加的耕地面积达六千多万亩。在五年中间，虽然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七年也有不小的自然灾害，但是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还是逐年有所增加的。在一九五七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不包括大豆）预计达到三千七百亿斤，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六百一十多亿斤，我国的棉花产量预计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担，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六百七十多万担，其他各种作物的产量和牲畜的数量都有了增加。由于农业的发展，五年内虽然我国的人口增加了六千多万人，但是我国仍然保证了粮食的自给，并且基本上保证了轻工业原料的自给。

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了八千五百公里的铁路和七万多公里的公路，交通部新增加船舶四十一万载重吨，新建和加挂长途电报、电话线路十一万多对公里，并且改善了原有的各种交通运输的设备，基本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九五七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达到四十四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二十五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达到七十四万多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三十六万人；普通中学和工农中学在校学生数达到五百九十五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三百四十五万人；小学在校学生数达到六千七百多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一千六百多万人。在这期间，中国科学院所属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约增加了四千多人。报刊和图书的出版量，广播的发射电力，影片的摄制量，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到一倍以上，其他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的成绩也是很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达到二十七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达到八十四万多人，对于解决我国科学技术人材缺乏的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我国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扩大了，技术力量也壮大起来了，一九五七年我国产业职工的总数比一九五二年约增加了八百万人，其中中等以上的技术人员总数增加了六十多万人。大部分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由于努力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经过大规模建设的实际锻炼，普遍地提高了技术水平。现在，一般的大中型企业，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金属企业、煤矿、电站、炼油厂、机器制造工厂和化学工厂等，以及铁路、水利等工程，除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和技术条件要求很高的以外，都可以自己进行设计和进行建设了。党和国家机关在领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后的建设中减少错误和少走弯路。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积极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五年内我国在改善职工生活中，在扩大就业面、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劳动保险和福利、奖金制度、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赖若愚同志的报告中已详细讲了。在改善职工生活方面，我们已经做了的，是在我国目前经济还不发达的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大限

度，这在旧中国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五年内，我国农民的总收入大约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全国每人平均的物质消费量，除猪肉一项没有什么增加以外，其他各种消费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同时进行和互相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奠定，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第二，不论生产或者建设，也不论经济或者文化，都是在原来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在比较充分地利用、改造原有企业的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的。第三，是在兼顾建设和生活的方针指导下发展的，是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改善物质生活相结合下进行的，因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这些特点，已经充分表现了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充分地表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符合全国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这就能够了解，为什么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坚决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今年夏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人民就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中国的经济情况系统研究不够，因此在工作中也就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对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某些方面、某些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得不尽适当，在计划指标的年度之间的安排上也有不够衔接的地方，同时在建设事业方面贯彻执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勤俭建国的方针都还不够。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要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进行具体分析，总结经验，并且彻底改正。但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无疑是主要的、基本的，缺点和错误只是部分的和暂时的。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是由于：在国内，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依靠了工人阶级，团结了全国人民，发挥了积极因素；在国外，我们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的援助，并且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支持。这种成就证明了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援助的条件下，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即依靠勇敢、勤劳并且富有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依靠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前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帝国主义分子认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我国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而且，我们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决不会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而只要几十年的时间就行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中国人民有理由满怀信心地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迎接即将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现在我再说一说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方针。

如前所说，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初步基础，但是，我国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处在过渡时期。这是因为：在经济上，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还比较低，因而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目前还缺乏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我们虽然在一九五七年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可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最后解决。我们面临着从经济上和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严重任务，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除了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以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主要的就是要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完成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算起，大约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原来经济文化又十分落后的大国，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不能不说是很高的速度。

当我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且进一步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国就有可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根据大体计算，我国到一九七二年，钢的产量有可能达到四千万吨左右，即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增长六点六倍左右。英国在一九五六年钢的产量已经达到二千一百万吨左右，但是根据英国工业发展速度慢，资源有限和市场难以扩大甚至日益缩小的情况，即使抛开他必然要发生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不说，他在一九七二年钢的产量也不易达到我国同年的水平。而在煤炭、机床、水泥、化学肥料等工业品的产量方面，十五年后我国肯定能够超过英国的水平。在十五年后把我国的工业从现在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状况改变为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状况，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个伟大的光荣的而且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为什么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呢？为什么我们又能够在今后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呢？

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给了我们这样充分的可能性。

第一，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铺平了道路。八年来，我国工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经过今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全国工人阶级和农民正在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国家机关的各方面的工作正在大力的改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了生产力的更快发展。

第二，我国拥有大量的人口，不仅有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更多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使我国具有最大的国内市场，市场需要的不断增加和大量增加就提供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同时也使我们有可能较大量地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我国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低，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国是一“穷”二“白”。改变“穷”和“白”，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正因为我们“穷”和“白”，所以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要革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志气、有劲头，能够勤劳勇敢，能够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根据现在已经初步查明的情况，我国的黑色金属、某些有色金属和煤炭等矿物的储藏量都是很多的，例如，我国初步掌握的还不完全的矿产的远景储量，铁矿石有一百二十亿吨以上，煤有一万亿吨以上；我国又是世界上几个水力资源最

多的国家之一，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加速工业的发展。我国也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加速农业的发展。

第四，我国有建国已经四十年的强大的苏联的支援，还有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同时，他们的宝贵经验可供我们学习，使我们有可能加速建设的进度。

第五，我们处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兄弟国家的帮助下，我们在许多方面可以直接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成就，缩短以至避开摸索的过程。

第六，最根本的条件，还在于我国有久经锻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能够对发展社会生产力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国的工人阶级勇敢、勤劳和富于革命传统，我国的农民已经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勤劳俭朴，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或者正在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正在成长，因而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能够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是不会不遇到困难的，由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底子穷，在一个时期内财力、物力的增长，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够，工作中发生某些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但是只要我们动员一切积极的因素，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发掘一切潜在的力量，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种对于我国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对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生产建设积极性估计不足，或者不积极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都是错误的。

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生产建设事业，始终是采取积极的促进的态度，反对消极的保守的态度。党中央在一九五五年冬季就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又提出了勤俭建国的方针。这两个方针是密切联系的，只有用勤俭的精神来办企业，办合作社、办学校、办其他一切事业，我们才能够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第一个五年计划证明，我们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把这种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并且使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可以建设得多一些和快一些。应当指出，在执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的时候，必须抓住重点，不能百废俱兴，齐头并进，如果各种事业都要又多又快，把那些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也办起来，把那些可花可不花的钱也花掉，那我们就不能够使重点事业办得又多又快，我们也就不能够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因此，无论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各部门，或者是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各部门，无论是中央管理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或者是地方管理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在工作中都应当坚持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并且抓住重点，真正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不久就要开始了。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还没有最后确定，因此我现在不能向同志们报告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而只能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的原则，说一说有关任务和方针的一些问题。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建设方针，在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都作了规定，这些，仍然是我们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所主要依靠的原则。由于"八大"到现在经过了两个年度计划的实践，我们对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和建设工作的经验，在认识上又深入了一步，因此，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和具体指标的安排，必须做一些调整。

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使重工业得到优先的发展，以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也必须同时充分注意农业的建设，使整个农业生产得到尽可能快的发展，以便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而重工业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有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我国的重工业虽然在第一个五年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初步的基础，但是我国重工业目前的生产量，不仅比苏联和美国落后得多，也比英国、西德和日本等国家落后，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国的农业和轻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同样地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轻工业的落后是由于农业和重工业不能提供更多的原料。而农业在合作化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由重工业提供比较充足的化学肥料、农业机械、水利机械、运输机械、动力、燃料和建筑材料，逐步地进行技术改造。交通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更直接有赖于重工业提供大量的设备、材料和燃料。可见，我国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都需要重工业的发展。没有比较发达的重工业，就没有工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同样不能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我们必须使重工业继续高速度地发展，总产量增长一倍以上；并且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必须使那些直接或者间接为农业服务的部分发展得快一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应当争取钢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万吨左右，煤产量达到二亿三千万吨左右，发电量达到四百四十亿度左右，化学肥料产量达到七百万吨左右，水泥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五十万吨左右，农业机械的产量将根据实际需要有大量的增加。这些产品的产量都达到了或者超过了党的"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的指标。至于原油和机床的产量，前者由于目前资源条件的限制，后者由于需要减少的限制，将比"八大"建议提出的指标降低一些，但是如果条件变化，将尽可能提高生产。

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说明，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毛泽东主席指示我们："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农民用了很大的力量推进了农业的发展，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外，国家还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增加了农业机械、水利机械、化学肥料和动力的供应，同时，在积聚肥料、兴修小型农田水利、改良耕作制度、推广先进技术经验、精耕细作、推广良种、增加高产作物和防治病虫害等方面，广大农民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了极其浩繁的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因而使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棉花等作物产量达到了计划指标，并且略有超过，避免了农业同工业脱节的危险。但是，由于我国的自然灾害严重，耕地不足，农业技术还落后，限制了农业的更快发展。同迅速发展的工业相比较，同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相比较，农业还显得落后了一步。近年以来人民必需的某些生活消费品的供应情况有些紧张，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业发展还比较慢。

农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大家知道，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一九五七年，即是说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

设，工业已经得到迅速发展的情况下 农业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还占将近一半，在工业农业净产值（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中还占将近三分之二。同时，我国人口很多，生活消费品的需要量很大，而农村人口又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不仅是人民衣食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农业发展的快慢，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快慢，影响着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影响到国家和合作社的积累。我们要改变我国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不仅要积极发展工业，而且要积极发展农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我们必须在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根据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积极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技术措施，以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为主，辅之以可能条件下的开荒，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一九六二年，我们必须争取全国的粮食产量不低于四千八百亿斤，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千一百亿斤以上；棉花产量不低于四千三百万担，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千万担以上；猪的头数不低于二亿二千万头，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亿头左右。

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将采取如下一些重大措施：（1）增加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的投资。同时，农业合作社应当把增加的积累的大部分用之于发展农业生产。（2）有计划地整治为害严重的河流，广泛开展小型的农田水利，减少水涝灾害，增加灌溉面积。（3）努力增加化学肥料的供应，同时广泛开展农村中的积肥造肥运动，以提高农田的施肥量。（4）增加适合于我国各地农业发展需要的各种机械的供应，努力推广各种先进的技术经验。（5）尽可能增加复种面积。（6）努力改良品种和防治病虫害。（7）发展山区交通，大力开发山区，并且努力保持水土。（8）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开垦荒地。

我们认为：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应当包括工业和农业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的内容在内。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根据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适当调整重工业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发展关系。

加速农业的发展，不仅是农业部门和全国农民的任务，而且是工业、运输业、商业、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卫生各部门和全国职工的任务，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因为有了农业的大发展，就有工业的大发展，也就有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各部门的职工同志们，应当为农业发展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我们必须支援农业，支援农民，保证在今后十年内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的要求。

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我们还必须贯彻执行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我们面临着更大规模的建设任务，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还落后，因此就常常遇到资金问题，物资问题，技术干部问题，就业问题，就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的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尤其应当注意做到全面照顾，全面安排。除了解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问题以外，还必须相应地注意国民经济其他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和那一部分人民的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拿国民收入的分配来说，我们应当既照顾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又要满足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既照顾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又适当满足国家重点建设优先发展的需要；既照顾地方重点建设的需要，又适当满足中央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在生活方面，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应当统一安排，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过分悬殊。总之，对于生产、建设、劳动和

民生等各项问题的安排，都要求从整体观点和全局观点出发，去掉本位主义观点和局部观点。在这里，问题的中心在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一方面保证六亿人民有吃有穿，逐步地做到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一方面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也正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同志们，我们已经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在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一个规模更加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高潮正在形成。在这个高潮中间，我国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要发挥模范作用、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团结全国人民取得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更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希望各级工会组织进一步联系职工群众，更好地发挥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作用，发扬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迅速到来和持久地向前发展。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一定能够团结全国人民担当起新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也一定能够胜利地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祝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动员全国职工掀起生产高潮的大会，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更大胜利的大会。

（转自《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号）

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节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江　华

《人民日报》编者按：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文章虽长，却很值得耐心地读完。

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江华

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报告针对党内的思想分歧，批判了忽视敌我矛盾和夸大敌我矛盾的两种错误倾向，坚持了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里所批判的错误观点，目前在其他地方的党组织内也是存在着的，也是必须加以澄清的。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些理论性原则性的问题展开大辩论，对于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贯彻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有很重大的意义。

报告的第九部分着重地说明了从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的反党活动得出的教训，也值得大家注意。

同志们：

我受省委员会的委托，向全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

从全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到现在，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全省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的队伍在这一年中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同时，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整风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整风运动的胜利，必然会鼓舞全省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鼓起劲头，贯彻执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为争取提早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而斗争。

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七年全省形势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证明：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经过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年来，运动发展的过程是这样的：从今年三月开始，我们组织全省党内外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五月开始，在县市以上领导机关和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卫生界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开始，又在农村、城市的基层组织中逐步开展了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全省的整风运动正在更广泛深入地展开。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全省县、市以上领导机关中已经查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在各个战线上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现在，他们的阴谋已经彻底破产，他们在群众中已经完全孤立了。

全民整风运动已经在全省开展，大部分县以上领导机关已经取得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初步经验。在各项工作中，大鸣大放大辩论已经开始成为经常的工作方法。适应于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已经开始为干部所掌握。广大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正在转变，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在农村，整风运动坚定了大多数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批判了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从而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在工矿企业中，整风运动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了劳动纪律，提高了出勤率，密切了党群关系，初步形成了勤俭办企业的风气，推动了新的生产高潮的到来。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抓住了整风，各项工作都获得显著的改进，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气象。但是，应当指出：一年来我们对于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一个学习、实践、积累经验、逐步前进的过程。在这个大转变的过程中，党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有分歧、有斗争的。现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对这些问题作如下的说明：

一，对于一年来的形势、特别是对于今年上半年形势的看法，曾经发生过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前一种倾向是看不到敌我矛盾仍然存在，后一种倾向则是夸大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在反右派斗争中，党内一些有右倾思想的人，看不到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看不到资产阶级右派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不了解反右派斗争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大是大非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个斗争，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而对于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表现了严重的政治动摇和温情主义。只有彻底批判他们的这种右倾思想，才能使运动深入展开。

党内还有一部分人，夸大了敌我矛盾，认为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表现为敌我矛盾，并且认为省委上半年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右倾。这些同志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应当认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从大鸣大放和闹事中所暴露的问题来看，绝大部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中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摇和不满，这些是反映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一部分是由于各级领导上对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缺乏经验，在工作上和作风上还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广大群众对于新的制度还感到不习惯和不适应，这些就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机，兴风作浪，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造成一阵混乱的局面。但是，物极必反，当他们的反动面貌充分暴露的时候，就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一时被蒙蔽的部分群众，也清醒过来，这样就形成了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斗争的结果证明：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信赖的，右派分子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忽视敌我矛盾是错误的，但是决不能夸大敌人的力量。不能把不属于右派的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看作敌我矛盾，也不能把富裕中农对于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看作敌我矛盾，错误地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

二，形势的发展，是时紧时松、曲折前进的，许多同志对于这一点缺乏完整的认识。在

三大改造高潮前后，资产阶级分子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富裕中农也鉴于大势所趋，加入了合作社。在那个时候，如果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就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我们及时地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是完全正确的。当右派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的时候，我们提出反右派斗争和彻底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使右派分子完全陷于孤立的地位。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是有起伏的。在这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阶级敌人被迫退却，斗争形势可能在一定时期缓和下来。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决不甘心死亡，在某种条件下，又会向社会主义发起新的进攻。这种斗争的起伏形势，将在若干年内反复地发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将通过这种起伏，逐步地减弱以至消灭。有些同志往往不看形势发展的这种规律，把反右派斗争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立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

三，对于闹事，有些同志只看到它是坏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经过主观上的努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例如仙居县在今年上半年闹事中有很多农业合作社垮台，这是坏事。但是，经过省委、地委派干部加强领导，总结经验教训，因而有效地纠正了干部的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农村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多贫农、下中农都亲身体会到合作社垮台给他们所造成的生产和生活上的很大困难，自动要求恢复合作社。目前入社农民已经达到农户总数的70%以上，各项工作都有了显著的改进。这就使坏事转向反面，成为好事。因此，必须认识：闹事固然会造成一些损失，但是，从闹事中可以暴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以暴露敌人的破坏活动；可以锻炼干部，教育群众；还可以促进领导上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只要善于从闹事中吸取教训，认真改进工作，就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四，对于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和大字报这个群众路线的新形式，许多同志还认识不足。有些人对鸣放和辩论表现得决心不大，信心不高，害怕出乱子，害怕辩不过人家，害怕“引火烧身”。这是一种不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错误思想。我们不仅应当相信工农基本群众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且也应当相信在我国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中是富裕中农）的大多数是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和群众一起进行整风。经验证明，只有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才能彻底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这个方法既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克服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克服群众的某些错误观点；又可以揭露敌人，动员和教育群众向敌人进行斗争。

这里要着重地说一说关于说服和压服的问题。有些同志怀疑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他们不了解，用说服的方法，诸如扎根串连、打通思想、有事和群众商量、尊重大多数群众意见等，都是我们党的一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长期实践中早已证明是有效的。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情况紧张，不可能从容地展开大辩论。在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时期，主要任务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主要斗争形式是急风暴雨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也不可能从容地展开大辩论。在目前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造人的思想和改进工作问题，而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正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好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新发展。我们必须自觉地在各项工作中学会运用这种形式，并且使之经常化，使之成为传统。

对于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我们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即压服的方法，严厉地给以打击。不这样办，就要犯右的错误。但是，在处理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敌我矛盾的时候，一般地仍然应该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因为这种敌我矛盾往往和人民内部矛盾混在一起，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就难以争取中间群众，孤立右派。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才有利于提高中间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划清大是大非界线，彻底暴露、孤立和分化右派分子。同时，由于人民的力量强大，对于右派分子，也不需要采取极端的政策。

从上述问题看来，党内有不少同志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的学习还很不够，对于新形势，新任务、新方法的认识还有很多偏差。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领导广大党员认真研究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决不能用老眼光来看新形势，用旧方法来解决新问题。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在各个战线上和各项工作上，都应当通过整风，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解决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从而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分化右派分子和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因此，大辩论应当围绕当前中心工作的各项重大问题广泛深入地展开，使辩论的结果，既能划清大是大非，教育和团结大多数群众，又能推动当前工作，掀起一个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高潮。

今冬明春在全省范围内应当继续深入展开全民整风运动。县以上领导机关的整风运动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结合整改），反击右派阶段（结合整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以及每人学习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凡是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的单位，应当及时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和艺人当中，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进行反右派斗争；在大鸣大放以后，第二阶段一般都应当转入以整改为主。如果有显著的错误言论，应当结合整改，展开辩论，划清是非界线。

改进工作和反右派斗争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目前改进工作只是开始，各级领导机关应当十分重视抓住这一环节，切实加强对改进工作的领导，争取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争取改进工作的胜利，争取改造思想的胜利。

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多快好省方针的提出并不是出于偶然。首先，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前进的事业历来就是促进派，历来就要求一切前进事业按照需要和可能多多地发展，快快地发展。我们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而给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又集中力量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我国尽可能迅速地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很明显，这不但对于我国本身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维护全世界的和平，都有极大的意义。其次，还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建设的步子就必须迈得比较快、比较大，就必须采取勤俭建国的方针，采取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除此以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有没有可能呢？回答是完全肯定的。前面说所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只是我国情况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建设的困难的一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面，即有利的一面，看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劳动力多、人民勤劳勇敢、幅员广大、自然条件良好、资源丰富的国家。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估算的资料，我国单是水力资源，就有五亿瓩以上的蕴藏量。铁的远景储量约有一百二十亿吨，煤的远景储量达一万亿吨。因为幅员广大，我们还可以垦荒植林、开发山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性和积极性，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我们还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这就完全能够保证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裕、强大的国家。而且，就是困难的那一面，也可以转化成为刺激我们前进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国所以能够在一九五五年冬天到一九五六年春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原因之一就是绝大多数的农民穷，农民看清了只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穷困的境遇。这些都说明，我们采取多快好省的方针有很多有利条件，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结果，证明了多快好省的方针是切实可行的。按照一九五七年的预计完成数字，同一九五二年比较，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2%，其中工业增长132%，手工业增长66%，农业和副业增长24%。以主要产品的年产量说，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底，发电量达到一百九十亿度以上，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三点二倍；原煤产量达到一亿二千八百三十七万吨，接近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二点一倍；钢产量达到五百二十四万多吨，差不多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五点七倍；粮食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九百多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差不多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二倍。在这五年当中，许多产品的产量超过了解放前几十年的总和。同原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教育事业等方面都超额完成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就没有问题了。总说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建设的。但是，是不是已经动员了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了一切有利条件，发挥了一切潜在力量，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贯彻执行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呢？应当说，我们的努力还是很不够的，而且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的掩盖下，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为什么去年秋天以后，在部分干部中间产生了这种保守的倾向呢？这是因为，他们对一九五六年的成绩和缺点作了错误的估计。一九五六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有一个很大的跃进。从一方面说，这是当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必然产物。从另一方面说，这又是在生产和基本建设上有了前三年的经验积累，有了各方面的大量准备工作之后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一九五六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为了保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一年来个跃进也是必要的。事实上，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的大跃进，确实有力地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当中，也发生了某些偏差：基本建设投资多了些，企业、机关的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招收得多了些，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增加得多了些，因此引起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供应的某些紧张。加以一九五六年的农业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灾荒，而国家的储备物资又有了减少，对下一年度的经济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总的说来，一九五六年的主流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是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潮。然而，有些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只看到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次要的偏差的一方面，而没有看到主流，因而以为今后再不能讲多和快，只要保守一些，就是"充分可靠"，就好过日子了。他们曲解了"充分可靠"的要求，忘记了它的前提应该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只有从积极方面调动群众的力量，发挥生产和建设中的一切潜力，才能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在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上的懒汉。

当然，在某种情况下，局部地、暂时地放慢步子，甚至作适当的后退，是必要的和容许的。拿最近的例子来说，在一九五七年，它们就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训，适当减少了一些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和削除了一部分基本建设项目，调整了某些部门的发展速度，在劳动工资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样做，正是为了更好地积聚力量，不仅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而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首先是一九五八年的计划作好准备，使今后能够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前进。一九五七年国家计划执行的结果，证明了这样作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主张促进，提倡多快好省，是不是就一定会盲目冒进呢？不论做什么工作，我们历来反对主观主义的做法；既反对因循旧规的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盲目的冒险主义。我们所要求的多和快，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情况的多和快。盲目的、主观主义的多和快，并不能真正达到多和快的目的。那种做法，不但不能有效地促进建设事业，反而会给它带来损害。例如去年，由于对南方北方、山地水地的不同需要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在中央和地方的布置下一下子制造了一百八十万部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以至积压了差不多一半。象这样的多和快，就带有主观主义成分。那些超过了需要的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没有起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反而积压了资金和钢材，浪费了人工和设备能力。当然，由于经验不足，对情况不

能一下子摸得很清楚，要求在任何具体工作中完全避免盲目冒进或者盲目保守的错误，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前进，而不应当借口多和快而冒进，或者借口反对冒进而保守甚至冒退．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曾经这样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一段话，值得我们再读几遍．

多、快、好、省，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建设必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必须按照需要和可能力求增产，并且在一切方面力求节约资金．为了多、快、好，这就需要勤；为了省，这就需要俭．多和快是对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好和省是对质量（包括品种、规格）和成本的要求．有了好和省，就限制了片面的盲目的多和快，限制了粗制滥造和浪费资金，同时也就使我们有可能用同样的资源和资金，进行更多的生产和建设，使生产和建设发展得更快．只顾追数量，只顾赶时间而不顾质量、品种和成本，是错误的；只顾质量，不顾数量不顾成本，不注意按时完成，也是错误的．我们在建设中，既要有按量按时的增长，也要有质量的提高、品种的适合需要和资金的节约．这两个方面，互相制约，互相推进．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坚持完整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坚决反对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错误倾向．当然，只顾多、快和省，而不顾生产和建设的安全，造成工伤事故和人力物力的损失，同样是错误的，同样也必须坚决反对．

多快好省这四个要求，是相对的．怎样算做多快好省，要根据整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统一考虑，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例如，有时新建或扩建一个工厂，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来看是发展了生产；但是可能因此不合理地影响了其他地区其他部门原有企业的设备能力的充分利用以及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或者影响了更重要的建设工程，从全国来看，反而造成了浪费．因此，我们对每一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必须从全局出发，周密考虑需要和可能，原料和市场，各部门各地区的协作配合，以及上一年度和下一年度的衔接，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在国家统一的计划下按比例地协调地全面地发展．在建设当中，任何脱离整体的本位主义思想，是同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的方针相违背的．

建设要有重点，要分清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不能在同一时期内百废俱兴．孟子说得好，"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意思是说，只有不作那些不该作的事，少作那些可以不作的事，才有力量去做那主要的、必须作的事．同时百废俱兴，结果会俱不能兴．例如水利要着重中小型，只办若干极可能又极必需的大型水利工程．钢铁业第一个五年重点在扩建鞍钢，第二个五年就有可能建设包钢、武钢，同时还要办一些中型的和小型的钢铁厂．各项工作要分期分批办．不分期不分批，就是无重点 就会办坏，也就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的方针．

人的思想要符合实际是不容易的．我国有六亿几千万人，特别是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中．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以成万计，他们虽然一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也各有不同的经历和岗位，各有不同的想法．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大家都还是一件新事，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在

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统一的符合实际的计划，当然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并不等于不能够，这是能够办到的。我们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是都在一个统一意志和统一计划之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吗？由分歧到统一，是经过调查，经过研究，经过辩论，最重要的是经过实践的考验来达到的。反复研究和反复实践，这就是我们的方法。

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快要结束。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开始了。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已经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有条件促进工业、农业和其他各种经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广大群众和干部在各项建设工作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国民经济计划水平和管理水平也有了提高，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后的建设中能够依靠群众的经验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避免犯大的错误。根据国务院最近公布的规定，国家的管理体制已有适当的改变，各地方、各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特别是经过全党整风和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克服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主观主义将大为减少，就更将直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目前，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推动下，农村中已经掀起了一个去污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的高潮，工业方面也正在走向新的高涨，经济战线上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这个时机，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加紧进行准备。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把一九五八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并且相应地做好原料、市场等各个方面的平衡调度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掘企业的潜力和加强企业之间的配合协作，各个地方的党组织要积极领导所在地区各个企业（包括中央各部所管的企业）编好计划。如果我们努力的结果，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那么，我们就可以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国务院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布）

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以后，在我国农村中，除了部分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还有3%左右的个体农户。这些个体农户多数是富裕农民，或者是兼营商贩或手工艺的农户或者是深山远林里居住零散的农户，也还有一部分是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另外，还有少数是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没有正业的游民分子。由于这些个体农户已经为数不多，并且极为分散，又由于乡、镇人民委员会近年来把力量集中在巩固农业合作社方面，疏忽了对他们的领导，加上他们中一部分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以及某些地区对自由市场缺乏管理，以致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个体农户进行投机活动，违反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逃避公粮负担，甚至还对农业合作社进行破坏。这些违法行为对农业合作社的巩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为了加强对个体农户的团结教育改造和管理，现在作如下各项决定，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一）对于个体农户，乡、镇人民委员会可以委托他们所在地或者附近的农业合作社按照他们本人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教育和加强领导。农业合作社召开乡村居民各种有关会议的时候，应该吸收个体农户参加，以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且使他们能及时地了解和遵守政府的法令和行政措施。

（二）受委托的农业合作社，有责任对个体农户的生产活动、播种计划、纳税和农产品交售进行必要的监督。个体农户应该把向国家应纳的税款和交售的农产品，交给农业合作社一起向国家交纳和出售。如果有的个体农户无力自己运输而需要由农业合作社代为运输的，则应该由个体农户合理地摊纳实际需用的运费。个体农户如有尾欠或者漏交公粮，或者是存有应售而未售的余粮及其他统购物资，农业合作社得根据乡、镇人民委员会的委托，有权督促其照数补交和出售。个体农户因为生活困难，需要酌情减免公粮或统购任务的，农业合作社应该依实反映，由乡、镇人民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令和规定处理。个体农户如果在自由市场买卖国家统一收购和禁止自由买卖的农产品，农业合作社有权加以制止，如果制止无效，应该报请乡、镇人民委员会依法处理。

（三）受委托的农业合作社，有责任对个体农户宰杀牲畜、砍伐树木依法进行全面的管理。个体农户违反政府规定私自宰杀不应宰杀的牲畜或者乱砍树木，农业合作社有权加以制止，如果制止无效，应该报请乡、镇人民委员会依法处理。

（四）受委托的农业合作社，可以按照国务院和地方人民委员会的规定，向个体农户摊派义务工；也可以按照全村人民的公约，向个体农户摊派兴修与其本人有关的公共水利建设或者兴办其他公益事业所需要的人工和款项。

个体农户可以同农业合作社共同使用公共的水利建设并且共同负责加以养护。农业合作社自力修建的水利建设，只要水量充足，经农业合作社同意，个体农户也可以参加使用，但是个体农户需要缴纳适当数量的水费并且参加这些水利工程的岁修和养护工作。

（五）个体农户分摊的一切负担，应该比照合作社农户的负担办理，既不要偏轻，也不要偏重，对于贫苦的个体农户，还应该相应地减免。

（六）农业合作社，对于在生产上有困难的个体农户，可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农业合作社社员和个体农户之间或者是个体农户相互之间的劳动互助，使他们能够继续发展生产。对于生活困难的个体农户，农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银行和乡、镇人民委员会，应该使他们在贷款和救济方面得到适当的照顾。

（七）农业合作社应该对个体农民加强领导和教育，紧密地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自愿地加入农业合作社。凡不愿意加入的，听其自便。

对于散居在深山远林的个体农户，附近的农业合作社在吸收他们入社以后，可以允许他们在经济上自负盈亏，而在生产上给以指导和扶助，并且加强对他们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八）对于尚未允许参加农业合作社生产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乡、镇人民委员会应该委托农业合作社依照有关法令负责进行监督和改造。

国务院总理　　周　恩　来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节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柯 庆 施

《人民日报》编者按：柯庆施同志的这个报告，虽然大部分是关于上海的情况和问题，但是这些情况和问题的性质，特别是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柯庆施同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的处理，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这一部分中还谈到了对一九五六年工作的评价，批判了那种认为一九五六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的错误的说法，说明了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正确性。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报告的第四部分分析了党内干部的思想状况，提出了发扬革命朝气，打掉官气，实行劳动锻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制度，以及培养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等重要措施。

代表同志们！

根据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议程，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目前我们工作中的形势，讨论和决定上海党组织如何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的问题。

一

关于国内外的形势，党中央经常给我们作出全面的分析。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作了“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政治报告，使我们对形势、对全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做各种工作都要看一看全局。全国有全国的全局，全市有全市的全局，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也都有各自的全局。懂得了全局，才能心中有数，不致迷失方向。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经常注意形势，不注意全局，不注意对事物进行全面的分析。有时看到成绩，看不到缺点；有时看到缺点，又看不到成绩；对成绩和缺点，有时又分不清主次。为了使整改进行得好，也需要先看看全局。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来谈谈形势，特别是过去一个时期发生过争论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谈谈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指示。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同志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阵妖风吹昏了头脑，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好象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六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

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彻底孤立了。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但是不论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资产阶级中，他们也只占极少数。当他们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们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论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摆在眼前的现实例子，证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领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批六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学会了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248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60%，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34.5%，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4.5%，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40%（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较高的，一般大学占30%左右），右派只占8.5%。这两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就以商学两界而论，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们自我改造的成绩是显著的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吗？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认为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即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如果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

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他们看不见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认真研究周围事物的新发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他们错误地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属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级斗争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认或者忽视敌我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由于阶级关系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注视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当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这方面的斗争，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争所做的那样。但是，鉴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中间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仍然应该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争取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从中间派转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当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间还会起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逐渐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都曾有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

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因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但是还有许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或者阶级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继续产生。在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所有这些方面，领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觉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总之，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以我们党的整风为例。我们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但是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认识上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许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某些争论，对于形势发展快慢的不同估计的某些争论。这种争论将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

我们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没有根据的。看来他们好象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说服大多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剥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训练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

们，局势是有利于我们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经验，最有力地说明对人民采取说服方法的伟大效力。经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问题，以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中的大批问题，取得很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还取得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说，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学会或者没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有抵触。因此，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级关系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都能认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只要我们大家有了经验，并且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经常的制度，经常的办法，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是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问题，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其次，需要估计一下我们工作的成就。

尽管资产阶级右派说我们这也搞糟了，那也搞糟了，但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和全民大辩论，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行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展开了突飞猛进的大建设，这是连社会主义的敌人也无法否认的，因为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经过一九五六年达到高潮的三大改造运动，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的，在经济上和社会秩序上没有发生波动和破坏，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又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事实上，其中一些重要任务和重要指标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奠定。我国的农业在合作化以后的新条件下正在向前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我国的面貌已经根本改变，我国的国际地位已经空前提高。由于党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一系列政策的贯彻执行，全国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正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国人民的团结，在党的领导下日益加强和巩固。我国人民正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这都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就我们上海各个战线上的工作来说，也是一样。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占全国比重很大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改变了上海的政治和经济面貌，为上海的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上海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各项指标也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是一百二十八亿元，其中除去手工业产值三亿元外，工业产值是一百二十五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0%左右，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的16.3%，比解放初期的一九四九年增加297.51%，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一九五二年增加96%，平均每年增长14.5%。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一般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比重，也分别从一九四九年的16.7%、22.6%、60%，变为一九五七年的41.2%、26.2%、32.6%。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

化。随着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上海经济的改造，上海工业制造了大批的新产品，机器制造工业也从过去只能进行装配变为可以独立制造，许多产品的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这就使上海这个工业基地能够供应全国人民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能够为发展国内外贸易供应更多的物资，能够为国家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郊区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加上上海的有利条件，为争取郊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任务准备了条件。文化教育战线和其他各个战线也有了很大的成绩。劳动就业逐步扩大的结果，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更重要的是人的变化。几年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不但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使上海工人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技术水平都有了提高，能够担负起领导阶级的重任，而且也推动了各界人民的政治思想改造。今年的反右派斗争，证明了光荣的上海工人，首先是老工人，是维护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力量；证明了其他各界人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力量的左派；中间分子也有程度不同的进步；右派只占极少数。没有广大人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在短短的时间内，使得右派分子遭到孤立和分化，遭到严重的失败，是不可能的。全民整风运动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力量，促使上海各个战线上的工作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谁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上海，已经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上海了。冒险家乐园的旧上海已经随着黑暗的时代一的去不返了。新的人民的上海已经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暴风雨中成长起来。明天的上海，将是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更加强大的基地，屹立在东海岸国防前线的更加强大的堡垒。

我们上海的工作所以取得这些成绩，是上海百万工人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结果，是上海七百万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是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也是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努力地、积极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各项正确政策的结果。在回顾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向全市的工人同志和各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和上海人民同全国的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一样，大家都以有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而自豪。

在这里，我们还要答复一个问题：上海各方面工作发展得这样快，是不是“冒进”了？

有一部分同志曾经认为我们上海的各项工作都“冒进”了。在对上海工业方针的争论中，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大家记得，一九五六年，市的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曾经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这个方法，一方面反对了忽视上海这个工业基地的作用，不注意利用这个基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对了不顾全国的统筹安排和当地的具体条件，盲目大发展的思想。事实证明，这个方针，给上海的工作带来了朝气，推动了各个方面的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有的同志说，由于有了这个方针，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冒进”了。这种意见，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全局来说，倒是因为有了这个方针，才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又限制了各方面的盲目发展。一年来上海工作的发展是正常的。问题是对于什么叫正常、什么叫冒进，有完全不同的了解。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形势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

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地阅读和思索。"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我们认为，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那就必须对上海的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根据国家的统筹安排，千方百计地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地利用上海基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我们看来，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现象；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现象。否则，就谈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就谈不到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因此，我们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针。这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方针。为了多、快、好、就需要勤，就需要努力，就需要认真；为了省，就需要俭，也需要努力，需要认真。这个方针，是既反对了右倾保守，又反对了急躁冒进。这是一个促进的而不是"促退"的方针，是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方针，而且是一个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个别缺点和错误，但是决不能因此对整个方针发生动摇。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是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难道我们能够说，经过一番努力就能够做到的也不去做，以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得慢一些、少一些，才是正确的、才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坚决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就叫做"好大喜功"，就要受到责备，而执行相反的方针才应当受到赞扬吗？当然，赞扬的人是有的，但决不会来自渴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因此，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实际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这种思想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损失。去年下半年以后，多、快、好、省的方针不大提了，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也执行得不带劲了，不少人的革命干劲低落了。这才叫作不正常现象。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批判这种右倾保守观点，改正各种不正常现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设高潮，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潮。

四

整风运动胜利的标志，不仅是右派被孤立分化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克服了，而且我们

党的干部必须是愈整革命意志愈旺盛，愈整阶级觉悟愈高，使我们的工作愈做愈朝气蓬勃，愈做愈好。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阶级觉悟最高、革命意志最旺盛的人。当资本主义看来还很强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却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级级的胜利不可避免，看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他们赤手空拳，百折不挠地为革命奋斗了一生。当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开始下决心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他们只是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小组，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他们终于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国处在最黑暗的反动统治下的时候，中国共产主义者却在上海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宣告共产主义必然在中国胜利。当蒋介石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以为他的江山已经坐定了的时候，我们中国共产党却在井冈山升起了胜利的红旗。当时有多少人嘲笑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列宁，嘲笑中国共产党人，说他们是"白日作梦"。历史的发展却证明了，被嘲笑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那些以为资本主义会万世长存的人们。我们共产党人讲究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结果，证明了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谁也阻止不了世界向着共产主义过渡。因此，我们的革命意志不是来自空想，而是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可靠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把个人的命运同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我们共产党人就鄙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们的党员不是普通的人，而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应该成为自觉的阶级利益、阶级意识的代表者之一，因此他的个人利益完全不应该在党和阶级的利益之外突出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党人永远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的革命意志永远是旺盛的，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摧毁的。在阶级斗争中，在战争中，在需要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视死如归；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在进行建设的时候，我们要请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旺盛的革命意志的表现。

就整个说来，我们上海党组织的革命意志是旺盛的，是有战斗力的。但是，从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情况看，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干部革命意志都旺盛。根据粗略的分析，干部情况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人，革命意志旺盛。他们在工作中积极努力，艰苦奋斗，努力学习，有上进心。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开动脑筋，调查研究，钻研问题，苦思多想，不怕困难，任劳任怨，富于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样的干部作领导人的地方，那里的工作一定会是朝气勃勃地比较迅速地向前发展的，虽然也有缺点错误，但比较容易克服。在那里，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成长也比较快。

第二种人，能够工作，也不愿作坏事，但是缺乏发愤图强、顽强进取的精神。他们的特点是一般地能够完成党给他们的任务，可是墨守成规，很少有所创造。在工作中对政治不够关心，因而缺乏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力。这些同志往往对于"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不愿意或不会去千方百计想方法，认真努力去做，一遇困难，就"认为做不到"，也就不去做了。他们中间有知识分子，自以为有知识，就不积极努力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中间也有工农出身的同志，自己文化水平低，却又不积极努力学习。他们中间也有老干部，有一定的斗争经验，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是因而自高自大，认为自己差不多了，也就不再积极努力提高自己的本领。他们中间有些同志有时也自觉到自己的落后，时有苦闷，又没有决心鼓起劲来干。因此，在他们担任领导工作的地方，工作改进迟缓，他们自己的进步也

慢。

第三种人，个人主义包袱较重，思想上开始发霉。他们还是想作革命工作的，但是他们或者以为自己是老资格，或者以为自己有功劳，或者虽然不是老资格，却自以为特别有本领，常常把个人同群众、个人同党的位置摆不对头。他们对群众，自以为高人一等，官气冲天。他们考虑问题往往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后面。有的人只要有机会，就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到一些就高兴，争不到就闹情绪。这些人对待工作，沾染了"官气"，照例办公，言不及义，对他个人的问题很有兴趣，对政治问题、工作问题、群众疾苦问题兴趣淡薄，好象不值得他认真关心似的。他们有时候也很积极，但多半是以个人得失作标准。个人主义的霉点，有时晒晒太阳，比如经过党和群众的批评教育就少一些；党和群众的监督稍为放松，就会继续发展。因此，他们如果不痛下决心，改正缺点错误，就有不能继续作共产党员的危险。

以上三种情况，只是就最突出的表现说的。第一，第二两种情况的人，在我们的同志中占大多数，第三种情况的人虽有一定的数量，但在干部中只占少数。当然，也有的人有时进步、有时落后，在两种情况之间摇摆，不很稳定。我们所以作这样一种分析，只是为了便于说明情况。希望更多的同志经过努力，不断进步，大家都成为革命意志旺盛的人。

此外，在整风中还揭露出一些党内右派分子、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他们确实是思想上政治上已经腐烂了的人，他们是什么性都有，就是没有党性，什么主义都有，就是没有共产主义。在他们看来，他们无负于任何人，倒是党和人民一百个对他们不起。他们经常胡作非为，利用各种机会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人虽然在党内占极少数，但是往往为害很大。党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揭露了并且从党内清除了这些坏分子，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收获。

党的干部的这种种情况说明：我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改造旧社会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在社会上有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问题，在我们党内也有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问题。那些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过不了这一关，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了；另外一些同志，比如思想上开始发霉的人，能不能过这一关，也是一个值得他们加以思索的问题。

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他们早已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经过了长时期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表现也很好。他们对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是有比较充分的精神准备的。但是，不能认为我们全体党员对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都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有些人，他们原来就是混进党内来的坏人，他们只想混过关去，现在被揭露出来了，混不过去了。还有些人，原来是抱着赞同我们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态度来参加党的，一到同党走完了民主革命这段路，他们便不愿前进了。有一些同志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但是由于骄傲自满，不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接近劳动群众，不接近基层工作，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总是提不高，在革命的大风浪中，有时被胜利冲昏头脑，有时又被胜利吓昏头脑。还有一些人，在新的条件下经受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阴谋手段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俘虏。

不能说党对这种现象没有发出过警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不是很容易过的。还在一九四九年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警告过我们，要预防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前打败仗。毛泽东同志指出："敌人

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同志这段话，虽然是就全国胜利后我们要遇到资产阶级的捧场说的，而实际的含义，也就是指明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关头就要到来了，比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关头，对相当多的一些同志说来，是更严重的考验。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历史关头所遇到的对手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但可以拿糖弹、拿阴谋手段来打败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而且还可以凭它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凭它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一部分至今尚未觉悟的人们一起对我们党的包围，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影响，凭党内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党内向党的进攻和腐蚀作用，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的分子，征服那些在政治上不坚定的共产党人。

大家知道，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总的说来，是有利于我们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连英国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不到十五年工夫英国就要落在我们后面。但是，天下事要人去做的，在客观条件具备之后，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就在主观能动作用了。这就是我们不惜花许多时间来讨论革命意志问题的缘故。我们共产党人要做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促进派，不能做促退派。所以，必须时刻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侵袭，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努力做一个无愧于共产党人光荣称号的好党员。为此，我们认为采取下列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必须通过整风运动和经常工作，认真地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

为了使所有的干部，能够胜利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之外，在整风运动中，党必须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必须教育所有党员、干部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旺盛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所有党团员，要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也就是说，必须使我们全体同志再经受一次深刻的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锻炼，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在目前的着重整改阶段和即将到来的第四阶段，必须着重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包括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还要彻底地批判右倾思想，批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批判民族主义。对于革命意志衰退、消极落后的党员，也必须严加批判，重者还应绳之以纪律。对党内右派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必须按照中央规定的原则和手续，同党外右派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一视同仁地严肃处理。但是对于一切受处分的人，也仍然要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

总之，在这次整风中，每个党员都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普遍地进行一次自我检查。全民整风运动已被实践证明是一个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最好方法。今后应按照中央指示，每年或每两年整风一次，以便保证我们党经常处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中，永远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永远朝气蓬勃地前进。

但是，我们知道，过渡时期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干部的政治思想情况也在经常不断地变化，所以，除了依靠整风运动外，更重要的是在平时认真抓紧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应该认真组织全体干部学习时事、学习党的重大政策方针，并须深入地开展辩论，借以帮助干部深刻地了解当前政治方向和领会党的重大政策方针的精神

实质；应该引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把剩余精力主要放在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科学文化知识上；应该协助领导干部每年划出一定的工作时间，到先进工作单位参观，到邻近省区交流经验，借以取得生动的实际工作知识，扩大眼界，开拓胸襟。凡是政治生活不健全的地方必须健全起来；凡是纪律松懈的地方必须加强，凡是成分不纯的基层党组织必须整顿。

第二、要使全党所有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密切同基层群众的联系，密切同斗争实际的联系，借以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今后除了按照中央指示继续从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外，同样应当从经过生产锻炼的、同劳动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根据“全面锻炼、统一安排”的方针，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经过体力劳动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缺这一课的必须补上这一课。凡是没有经过体力劳动和实际斗争锻炼、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其他干部都应当到农村、工厂去劳动几年，或者到基层去做几年工作，真正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应当强调指出：这是一项重大的革命措施。只有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我们才能够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我们相信，大多数下放干部不但自己可以锻炼得很好，他们还会帮助党外同志也锻炼得很好。但是，我们也应当向下放干部说清楚，到农村、到基层去锻炼，这对每个同志本人来说是一个思想革命，没有充分的革命自觉和坚决的改造自己的决心，就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多数人是自觉地下去的，他们迫切地要求下去，在得到批准以后，他们兴奋愉快地投入到火热的体力劳动和实际斗争中、投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了。但也有些人不完全自觉，或者是带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下去的。比如说：“反正薪金照发，下去几年镀镀金再回来。”我们说：下去是可以锻炼人的，但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己的革命自觉、革命决心和革命毅力。我们相信大多数可以在锻炼中得到巨大的进步，但也有少数人，如果不下决心认真改正自己的毛病，他们就不但不能“几年后回来”，而且将失去当干部的资格。我们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下放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帮助他们，使所有下去的同志，都抱定坚强的决心，把自己锻炼成生龙活虎般的共产主义战士。不但对现在已经下去的同志，对于将来下去的也应该这样做，应当对他们负责，决不允许放任不管。

在职干部也必须解决这个重新锻炼自己的问题。除了应当采取轮流下去劳动锻炼外，对在职干部也应当定出一些办法，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也能参加体力劳动，也能接近实际，接近基层。因此，市委认为，应当首先规定：每个领导干部，包括市委领导同志，每年应有四个月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直接帮助下级，取得经验。半年各下去两个月或一次下去四个月或每周下去两天都可以，但必须作为固定制度，坚决执行。领导干部每星期四不开会，下基层工作和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的制度，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必须坚持。各个机关、学校、部队、企业的负责同志，必须建立一个经常同基层联系的制度，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研究他们的工作，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想办法解决。

第三、要使广大干部逐步地作到“又红又专”，成为红色专家。红指政治，专指业务，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政治是统帅，政治要统帅业务；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专不红，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等于没有灵魂。只注意业务，不注意政治，光会算帐，不讲思想，光搞物质基础，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要迷失方向，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因此，必须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使所有业务干部注意政治，不作迷失方向的经济专家、技术专家。同时也必须批判不学习业务的倾向，使所有干部努力钻研业务，力求成为业务上的内行，不作空头政治家。我们需要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

否则，业务部门许多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就难于真正解决。现在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已经红了，或者已经专了，或者自己已经又红又专了，其实又红又专是没有止境的，一自满就会退步。我们的同志必须有革命的雄心，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学习业务，不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堡垒是要人攻的，时间是靠人挤的，除了到学校进修，主要靠在职学习。各个部门都应作出规划，务期在十年内造就一大批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以便在各个战线上真正建立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第四、我们还要从组织上保证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随着建设事业的大踏步跃进，应该下放的权力，必须坚决下放，以便广大干部得以大胆、主动地进行工作。某些现在看来应该修改或废除的管理制度，必须坚决改变，以便广大干部可以果敢地放手去搞工作。今后各级党组织应当根据中央所指示的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改善我们的组织工作，并订出相应的工作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原载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

我国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执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努力，并且得到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到一九五七年底已经胜利地超额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使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党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已经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了。生产关系这种根本的变化，为我国社会生产力开辟了迅速发展的道路。一九五七年全国人民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这就使得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的同时，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这个伟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加巩固，使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在一九五五年冬和一九五六年春社会主义改造形成高潮的时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在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在一九五六年出现了跃进的形势，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许多指标。到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大超额完成的时候，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同时，以水利为中心的农业基本建设和以铁路为中心的运输建设都取得很大的成就．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有了显著的提高．

现在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各方面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的情况，分别公布如下：

一、社会主义改造

在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之后，到一九五七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其中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在手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达到589万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左右。

在一九五六年私营工商业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之后，到一九五七年底，未改造的资本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到千分之一；私营商业（主要是小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只占3%。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基本完成。

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可以用下列简单的事实来说明：即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的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所占的比重由19%提高到33%，合作社经济由1.5%提高到56%，公私合营经济由0.7%提高到8%，个体经济则由72%降低到3%，资本主义经济更由7%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

二、基本建设

五年内，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550亿元，折合黄金五万万七千万两以上，其中国家对经济和文化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427.4亿元的15.3%。一九五六年一年的投资额达到140亿元，约占五年计划规定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基本建设任务的超额完成。

五年内，在实际完成的国家投资总额中，工业部门占56%，农林水利部门占8.2%，运输邮电部门占18.7%．在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国家适当地增加了农林水利部门的投资。

五年内，在实际完成的国家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占76%，消费性建设的投资占24%。（注）

五年内，由于进行基本建设而新增的固定资产达到411亿元，其中新增工业固定资产达到214亿元。

重工业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中，重工业的投资占87%；轻工业的投资占13%。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建设项目，绝大部分都已建成，并且增加了很多新的建设项目。五年内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一万个以上，其中：黑色金属312，电力599，煤炭600，石油22，金属加工1,921，化学637，建筑材料832，造纸253，纺织613，食品和其他约5,000个。

在施工的一万多个工矿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比计划规定的单位数增加227个，到一九五七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有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有109个。苏联帮助我国建

设的166个重大建设项目，到一九五七年底，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68个工程项目，到一九五七年底，有64个已经施工建设，有27个已经建成投入生产。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批新建和扩建企业的投入生产，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五年计划规定的新增工业生产能力的计划，大部超额完成了。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的生产能力（以设计的年产能力计算）为：炼铁339万吨，炼钢282万吨，轧钢165万吨，采煤6,376万吨，发电（以发电机容量计算）246.9万瓩，天然石油131.2万吨，人造石油52.2万吨，合成氨13.7万吨，水泥261万吨，金属切削机床8,704台，载重汽车30,000辆，纱锭201万枚，织布机5.5万台，机制糖62万吨，机制纸25万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大力进行了地质勘探工作，到一九五七年底，已探明的煤矿储量约544亿吨，铁矿储量约56亿吨，石油、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矿藏储量都有很大增加。地质资源的勘探工作跟不上建设需要的情况，已经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大量进行地质勘探的结果，证明我国的各种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基本建设的技术力量在五年中有了迅速的增长。现在，我国已能设计一些比较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程，如年产15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240万吨原煤的煤矿，年产7.5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设备总容量100万瓩的水电站，65万瓩的火电站等。

三、工 业 生 产

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定计划21%，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41%；原定计划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实际达到19.2%，而一九五六年的增长速度达到31.1%。

一九五七年手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8%。

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及手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41.5%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56.5%。

一九五七年工业中的生产资料生产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2.2倍，平均每年增长26%；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39.7%，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52.8%。机器制造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5.2%，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9.5%。旧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状态已经开始改变。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轻工业也有很快的发展。一九五七年工业中的消费品生产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89%，平均每年增长13.5%。

在五年计划规定的四十六种主要产品中，生铁、钢、钢材、水泥、纯碱、烧碱、内燃机、蒸辆锅炉、汽轮机、水轮机、发电机、机床、客车、汽车轮胎、棉纱、棉布、抗菌素等二十七种产品的产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水平。到一九五七年底没有完成原定计划的只有原油、机车、食用植物油、火柴、卷烟、糖等六种产品。

现将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变化情况，列表如下：（见下页）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生产了许多种我国从来所没有的新的工业产品。钢铁工业方面有：高级合金结构钢、特殊仪表用钢，矽钢片、造船钢板、锅炉用无缝钢管、50公斤的重轨

等重要钢材。一九五七年钢材品种已达4,000种。钢材自给率在一九五七年已经达到86%。机械工业方面有：飞机、载重汽车、客轮、货轮、容量1.2万瓩的成套火力发电设备、1.5万瓩的成套水力发电设备、容积1,000立方公尺的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200多种新型机床、自动电话交换机、以及全套纺织、造纸、制糖等设备。机械设备的自给率在一九五七年已经达到60%以上。在化学工业方面，已经能够生产化学纤维、各种抗菌素等产品，而这些产品在旧中国都是要靠国外进口的。

五年来，工业技术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一九五七年全国工业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7.5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倍；工业和基本建设部门的职工达到1,019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66%。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61%，平均每年提高9.9%。

五年内，十二个工业部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了29%，平均每年降低6.5%。

	1952年	1957年	1957年比1952年增长的百分比（%）
钢	135万吨	535 万吨	296
生铁	193万吨	594 万吨	208
发电量	72.6亿度	193 亿度	166
煤炭	6,649万吨	13,000万吨	96
原油	43.6万吨	146 万吨	235
水泥	286万吨	686 万吨	140
木材	1,120 万立方公尺	2,787万立方公尺	149
硫酸	19 万吨	63.2万吨	233
纯碱	19.2万吨	50.6万吨	164
烧碱	7.9万吨	19.8万吨	150
化学肥料（不包括硝酸铵）	18.1万吨	63.1万吨	249
抗菌素	—	34.6 吨	—
发电设备	—	19.8万瓩	—
金属切削机床	1.37万台	2.8 万台	104
机车	20台	167 台	735
货车	5,792辆	7,300 辆	26
汽车	—	7,500 辆	—
民用船舶	1.6 万载重量吨	5.4万载重量吨	338
内燃机	2.76万马力	60.9万马力	21倍
棉纱	362 万件	465 万件	28
棉布	38.3亿公尺	50.6亿公尺	32
纸	54 万吨	122 万吨	126
食用植物油	98 万吨	110 万吨	12
糖	45.1万吨	86.4万吨	92
原盐	494.15万吨	827.7万吨	67
卷烟	265 万箱	446 万箱	68

注：上列生铁、煤炭、木材、棉布、纸 食用植物油、糖、原盐等8种产品均包括手工业产量数字。

四、农业生产

五年来，农业生产虽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组织起来的全国广大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自然灾害作了艰苦的斗争，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一九五七年农业和农家副业总产值完成原定计划101%，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总产量达到3,700亿斤，完成原定计划102%，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0%。棉花总产量达到3,280万担，完成了计划，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6%。五年产量合计与解放前收成较好的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五年比较：粮食增加4,100余亿斤，约增加了32%；棉花增加7,600余万担，约增加了1.2倍。一九五七年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虽然有若干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比一九五二年也都有很大的增长。

五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一九五七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67,745万亩，完成原定计划101%。五年内，全国新增灌溉面积21,810万亩，相当于一九五二年全部灌溉面积的69%。增加最多的一年是一九五六年，这一年新增的灌溉面积达11,870万亩，占五年合计的一半以上。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一九五七年达到235,866万亩，完成原定计划104%，复种指数由一九五二年的131%，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141%。

五年内，国营农场有所发展。一九五七年农垦系统国营农牧场达到710个，生产用地面积1,800万亩，拖拉机10,177标准台。

五年内，国家对农林水利建设投资40亿元，建成大型水库13座，其中主要的有河北省的官厅水库、安徽省的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等，三门峡水库已经开始施工。同时，农民群众还兴修了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在预防洪水灾害和扩大灌溉面积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为了支援农民发展生产，五年内国家在供应大量农业生产资料的同时，并发放农业贷款78亿元。农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自筹了大量的农业建设资金。

一九五七年生猪有显著的增长，达到14,590万头，完成原定计划105%，比一九五二年增长63%。其它牲畜虽然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比一九五二年都有所增长。

五年内，增加了海洋渔业设备，积极地发展了淡水养殖。一九五七年水产总量达312万吨，完成原定计划111%，比一九五二年增长87%。

在林业建设方面，广大群众积极地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五年内，造林面积达到21,102万亩，其中营造用材林9,329万亩。一九五六年造林面积扩大最多，这一年就扩大了8,600万亩，从而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造林计划。

全国气象台、气象站网已经基本建成，一九五七年气象台、气象站达到1,600多个，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4.2倍。

五、运输邮电

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62公里，比一九五二年增加22%。五年内，新

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约一万公里。工程巨大、穿过高山峻岭的宝成铁路和鹰厦铁路，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集二铁路都已先后建成。在修建新铁路的同时，加强和改造了现有铁路的技术设备，修建了许多复线，增加了通过能力。武汉长江大桥提前二年建成，从此南北贯通，"天堑变通途"。

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比一九五二年增加1倍。海拔高、工程艰巨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已经相继通车。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之间也修建了许多简易公路。

一九五七年全国内河通航里程已经达到14万余公里，比一九五二年增加52%，其中有3.9万公里可通轮船，比一九五二年增加29%。

一九五七年航空线路长度已经达到2.6万公里，比一九五二年增加1倍，除中苏航线外，增辟了中越、中缅航线，便利了国际友好往来。

一九五七年全国现代化运输工具的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超过原定计划14%和15%，比一九五二年分别增长144%和142%。

一九五七年邮电业务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72%。一九五二年全国大约只有59%的乡通达邮路，到一九五七年底已经基本上乡乡通邮。

六、国内外商业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供应不断增长，一九五七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比一九五二年增长71%；主要消费品的零售量，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的百分比：粮食23，食用植物油35，盐31，糖87，棉布19，胶鞋82，机制纸54，卷烟75。

为了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五年来国家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采购的农副产品总值共达582亿元。国家通过供销合作社供应给农村的各种生产资料达103亿元。

国家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粮食和其他几种主要商品，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五年内国家征收公粮1,666亿斤，收购粮食2,690亿斤，两者合计占粮食总产量(折成去壳粮)的28%，扣除销售给农村的部分，国家实际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只有2，592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16.6%。几种主要商品实行统购统销的结果，保证了工业生产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上的需要。

五年来，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给经济建设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国家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适当地提高了若干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而对销售价格也相应地作了适当的调整。以一九五二年为100，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产品采购价格指数为122.4，二十九个大、中城市的零售物价指数为109.5，十二大城市职工生活费指数为109.2。

一九五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一九五二年增长62%。在进口贸易额中，生产资料占93%。随着我国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工矿产品在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已经由一九五二年的18%，上升到一九五七年的28%。

七、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一九五七年底，我国职工人数已经达到2,451万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一九五七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42.8%。国

家为职工支付的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五年共达103亿元，国家投资新建的职工住宅面积9,454万平方公尺。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五亿多农民的生活得到了逐步的提高。一九五七年全国农民的收入，比一九五二年增加近30%。五年内农业税的征收额一直稳定在一九五三年的水平，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农民的负担相对地减轻了。同时，国家适当地提高了若干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民还得到了利益。

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五年内，高等学校共招生56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招生112万人。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包括研究生）共27万人，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共84万人。五年内，普通中学共招生875万人，小学共招生8,800万人。群众办学、业余文化学习，扫盲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共有500多个，研究人员20,000多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两倍以上。五年内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为我国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准备了条件。五年来，出版、广播、电影、戏剧等文化艺术活动空前活跃。

五年来，广大劳动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大大发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医疗预防网迅速扩大。一九五七年已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都有诊所，全国各种卫生事业机构中的床位张数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73%。全国中、西医人数达到55万人。

• • •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我国历史上的空前壮举，所获得的成就是很大的。这些成就，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更加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更加坚强，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民经济的繁荣景象，与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为十分鲜明的对照，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由于我国原来的经济十分落后，所以即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的今天，我国的工业还不够强大，农业生产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地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面貌，全国人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正满怀着信心，为实现我国更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勇前进。

注：生产性建设投资是指用于生产用的厂房和机械设备；运输用的铁路、公路、海港码头、运输工具；商业金融事业的仓库等的投资。

消费性建设投资是指用于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建设的投资。如住宅、学校、医院、影剧院、托儿所、俱乐部、食堂以及机关团体的办公室等。

（转自1959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乘　风　破　浪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回顾一九五七年，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谁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呢。

苏联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苏联人造卫星上了天，宣告了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的开始，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莫斯科会议表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共产主义力量空前强大和空前团结。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胜过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胜过战争的力量，如果在不久以前，甚至在共产主义者中间对于这一点还有争论的话，那么，现在在西方世界中，这却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了。现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所谈论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危机”、“苏联的衰退”等等，而是“自由世界的危机”、“美国的落后”了。

在社会主义力量迅速上升的同时，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在过去一年中有了巨大的发展。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从亚洲涌到了非洲。在埃及人民取得了反抗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战争的胜利之后，叙利亚人民粉碎了美英帝国主义策划的国内政变，并且胜利地挫折了美国和土耳其的侵略阴谋。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了收复西伊里安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坚决打击荷兰殖民者的势力。加纳和马来亚已经宣布独立。在阿尔及利亚、也门、阿曼、西属摩洛哥等地，到处燃烧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烽火。目前正在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有力地表达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十八亿亚非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的高涨。亚非各国人民的独立运动深刻地动摇了殖民主义的基础，大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和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互相支援，构成了当代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同社会主义各国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情况相反。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空前团结和壮大，由于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由于各国和平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的困难大大增加了，它们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了。美帝国主义对叙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干涉都没有成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虚声恫吓也失败了。在苏联发射洲际弹道火箭和人造卫星成功，而美国的“先锋”号卫星试验失败后，美帝国主义的以“实力地位”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彻底破产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西欧各国对美国加紧扩军备战政策的抗拒，不能不引起美国和它的盟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不久以前在巴黎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最高会议，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美国统治集团妄图督促其西欧盟国加紧扩军备战步调，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原定计划的失败。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三个会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北大西洋集团最高

会议和亚非团结大会——如此生动地表明了我们时代的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和各国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走上坡路，而帝国主义正在走下坡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景。当然，人们也应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力图扭转它们的颓势；美国统治集团正疯狂地策划加速扩军备战；甚至有些战争狂人竟鼓吹“先发制人”的战争。因此，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再接再厉地为和平而奋斗，决不能让美国侵略集团的战争政策得逞。现在，社会主义力量同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和平运动团结在一起，有足够的力量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各国爱好和平人民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停止军备竞赛，实现和平共处。瞻望未来，各国爱和平的人民满怀信心，在一九五八年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更加团结和壮大，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世界和平运动必将更加高涨，国际局势必将有进一步的缓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获得更大的成就。

在我国，一九五七年也是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展开了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是从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依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表现为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情况是比较少数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大量的。而且，人民内部矛盾有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也有不属于或者不完全属于这种性质的。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接着又展开了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资产阶级右派乘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的义愤。因而整风运动就进入以处理敌我矛盾为主的阶段——反右派斗争阶段。经过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被粉碎了，右派分子被孤立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了。这是我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目前，全国多数单位的整风运动已经从反右派斗争转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即转入仍然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阶段。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已经证明不但是教育和团结人民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有效方法，而且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在整风运动中，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当前的任务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以前，争取这次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取得完全的胜利。整风运动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应该把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在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农村、城镇居民中全面地贯彻整风运动，使全国人人都受到整风的教育。凡是反右派斗争取得了胜利的单位，都应转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坚决整顿作风和改进工作，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整改告一段落之后，应转入各人学习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批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争取改造思想的胜利。在整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都应该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批判错误思想，划清是非界限，提高群众觉悟，克服工作缺点。这样，就将使我国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局

面，这就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将是整风运动的有重大意义的收获。我们相信，胜利地完成这次整风运动，将使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

在全民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一九五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九五七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工农业生产继续有了很大的增长。工业方面，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指标的17.3%左右，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132.5%；钢产量达到了五百二十四万吨，生铁五百九十万吨，煤一亿二千八百万吨，发电量一百九十亿度，棉砂四百六十一万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有四百五十个限额以上的工厂建成，其中包括苏联援助的一百五十六项中的五十七项。我国现在已经拥有能够制造飞机、汽车、蒸气机车、远洋货轮、新式机床、发电、冶金和矿山设备等近代工业企业。农业方面，一九五七年虽然遭受不小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仍比一九五六年增产，达到三千七百亿斤，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六百一十多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担，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六百七十多万担。其他如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努力，由于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已经胜利地超额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仅仅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算起，还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只有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有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现在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国人民光荣的伟大的和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人民既然能够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既然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国人民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强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我国地大、物博、人多，我国人民又勤劳又勇敢，我国又有了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利用整风运动的伟大成就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以及其他一切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一个胜利的开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使我国重工业继续高速度地发展，并且使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有更多的发展，同时还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农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应该比第一个五年有更大的发展。党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不仅是全国农民的行动纲领，而且全国各个部门的职工也应当积极支持实现这个纲要草案所规定的目标。目前全国农村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

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事在人为。在一九五七年以前，人们何偿预料到，在世界和中国，会如此迅速地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善于接受教训，那末，我们首先就必顺彻底纠正那种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思想状态，就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一九五五年底一九五六年初的干劲，曾经造成一九五六年的我国经济事业中的大跃进。目前，这种干劲又在活跃起来，显出威力来了。安徽全省去冬今春原计划兴修水利八亿土方，现在已经超额完成，并且决定再做八亿土方。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革命气概！我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最最需要的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就是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强大”的敌人，轻视一切“严重”的艰难困苦——虽然在战术上需要重视它们，需要一个一个地加以征服，但是这也只有在战略上藐视它们的前提之下才能够实现。古人说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在我们的面前正是万里浪：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目的。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毛　泽　东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

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触，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纲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

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 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作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

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

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

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那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

“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

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劳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雒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复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复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复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

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 × ×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回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可能形成正式条文．

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节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薄 一 波

各位代表：

我代表国务院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 一九五七年经济战线上的胜利

一九五七年是我国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个胜利，促进了经济战线上的胜利；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又进一步地巩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一九五七年各个战线上大胜利的结果是，进一步地巩固了全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团结，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回顾一九五七年，就会使每个人对于我们伟大的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在各个战线上取得的伟大胜利，最基本的推动力量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倡导的全民性的整风运动，以及在这个运动中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整风运动的本来的目的，是要消除国家机关内部和共产党内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提高思想，改进工作，以迎接今后更加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是，在群众性的"大鸣大放"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右派竟然利令智昏，乘机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极为猖狂的进攻，企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与右派的愿望相反，他们的这种进攻，引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使他们自

已立即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为了保卫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的斗争，取得了全盘的胜利．经过这个斗争，经过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全民大辩论，也就形成了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各项工作的改善．整风运动还没有结束，目前已经进到以整改为主的阶段，不久以后，将要进入各人学习文件、批评反省、提高思想的阶段，但是，人们都已经感到它所发生的巨大作用和它将要发生的更深远的影响．

现在来说我国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

先说工业战线上的情况．

根据预计数字（实际完成的统计数字，要在以后才能作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完成了一百二十三亿七千万元，比原定的年度计划大大地超过了．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五年基本建设总投资额累计完成四百八十七亿七千七百万元，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百分之十四点一．

一九五七年工业投资额完成六十五亿五千万元，超过原定的年度计划百分之四点一．这一年继续施工和开始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共有六百四十二个，建设完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共有一百七十八个，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大企业建成最多的一年．全年平均，差不多每两天就有一个重大企业建设完工．在这些建设完工的企业中，属于苏联帮助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的有二十二个．重要的有：本溪钢铁公司，黑龙江钢厂，吉林肥料厂，吉林电石厂，哈尔滨锅炉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太原第一热电站，佳木斯造纸厂，等等．此外，还有国内设计的沈阳重型机器厂，四川狮子滩水电站，改建的安东人造纤维厂等．由于这些重大企业的建成和投入生产，我国就可以提高优质钢和合金钢的自给率，就增加了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性的化学工业基地，就能够自己制造火力发电设备所需要的锅炉和目前所缺乏的某些重型机器，就能够大量生产工业用纸．

一九五七年新增加的工业生产能力（按年产量计算）仅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就有：采煤一千四千八十九万吨，发电量三十二亿五千万度，生铁八十一万吨，钢材四十八万五千吨，水泥一百零五万吨，棉纱五十二万件，机制纸七万七千吨．

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包括原有企业和新建企业的在内，预计达到六百二十八亿一千万元（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超过年度计划百分之四点十，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九，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百分之十七点三．主要工业产品也绝大多数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比上一年，原煤增产了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吨，电力增产了二十四亿度，生铁增产了一百零八万吨，钢增产了约七十八万吨，机床增产了三千一百多台，化学肥料增产了十四万吨，水泥增产了将近三十万吨，木材增产了约五百二十万立方公尺．

从一九五七年的第四季度以来，全国各企业经过"鸣放"高潮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责任感大大增强，政治积极性和增产节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职工内部，分清了是非，发扬了正气，打击了邪气，孤立了坏人，积极分子大量增加．广大职工群众不仅对国家建设、企业管理、干部作风和生活福利等方面揭露了很多缺点，提出了改进意见，而且很快地提高了出勤率，加强了劳动纪律，突破了

很多定额，改进了经营管理，使许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面貌为之一新，使工业战线上形成了一个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

以下再说农业战线上的情况。

根据预计，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粮食增加了五十亿斤，达到三千七百亿斤；棉花增加了约三百九十万担，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担；甘蔗增加了三千零九十二万担，甜菜增加了约三百九十万担，黄麻、洋麻增加了约一百万担，猪的饲养头数增加了约三千万头。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达到六百零三亿五千万元（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五。由于部分地区的水灾较为严重，部分地区在入秋以后的旱灾又较普遍，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只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七，但是还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百分之一点二。

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已经有六十五个县、市，分别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提出的每亩生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已经有五十六个省、市，分别达到了每亩生产棉花（皮棉）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的要求，即提前十年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任务。而广东省的澄海、潮关、揭阳、潮阳、普宁、南澳，福建省的龙溪、海澄、长乐，湖北省的孝感，四川省的郫县等十一个县，粮食的每亩平均产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一千斤。湖北省的麻城、广济，浙江省的慈溪，甘肃省的敦煌，河北省的石家庄等五个省、市，棉花的每亩平均产量已经达到一百斤以上。根据十六个省、市三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统计，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

在一九五七年入秋以后，全国农村经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和社会主义教育，击破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对于合作化的诬蔑和进攻，批判了一部分富裕中农在两条道路之间的动摇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坚定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改进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执行了中央关于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调整了合作社的内部关系，争取了更多的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从而进一步地巩固了农业的合作化制度和农村的社会主义秩序。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公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的宣布，进一步地鼓舞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比一九五五年冬和一九五六年春规模更大的新的农业生产高潮，特别是兴修水利和增积肥料的高潮。目前全国每天有近一亿劳动力参加农田水利的建设。原定一九五七年十月和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增加灌溉面积九千二百多万亩，但是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已经完成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即用四个月的时间超额完成了全年度的任务。拿安徽省作为例子来说，这个省原定去冬今春兴修八亿土方的农田水利工程，后来增加到十六亿土方，但是，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就已经完成十六亿多土方。其他各省农民的许多英雄事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有的事实，充分地显示了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在争取农业大发展中，有着多么坚强的信心和无穷无尽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今年增加灌溉面积的计划以及其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计划，就可以大大地超额完成。

以下我们还要说到交通运输和商业战线上的情况。

一九五七年建设铁路新线和复线共计一千一百多公里，举世瞩目的长江大桥、宝成铁路和鹰厦铁路这样的巨大工程，已经建设完成。此外，企业专用线铺轨五百一十六公里（仅是铁道

部负责修建的部分)。由于长江大桥的建成，已经把京汉和粤汉两大铁路干线连结起来，实现了我国人民长期以来跨过长江的愿望。由于宝成铁路的通车，已经把物产丰富的四川同全国的铁路网连结起来，克服了我国诗人李白所说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困难。由于鹰厦铁路的建成，进一步巩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国防，密切了这些地区同全国的经济联系。同时，铁路、公路、内河、沿海等运输计划，也都超额完成。比一九五六年，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八，公路汽车货物周转量增长百分之八点四，交通部直属的内河和沿海运输企业的货物周转量分别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四和百分之二十九点二。

商业方面：一九五七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一年增加五亿元，商业部门零售商品的库存到年末比年初增加二十亿元以上。由于增产节约的开展，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已经基本改变，物价继续保持稳定，棉花和其它农产品的收购任务，也良好地完成了。粮食的收购数量，也超过了上一年同期的水平，但是，还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全年度的收购任务。

在对外贸易方面，一九五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原计划超过百分之四。

最后说到文教战线上的情况。

一九五七年的在校学生人数，比一九五六年，高等学校增长百分之九点七，普通中学增长百分之十五，小学增长百分之五点五。群众办学在一九五七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方面成绩最多的有四川、江苏、河南、河北等省。卫生部系统的医院病床数，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七。文化出版事业，也有所发展。

在高等学校和其他知识界，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提高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觉悟，许多处在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地靠拢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生产，接受劳动锻炼，已经开始成为风气。同时，党和国家从各方面调配了干部，加强了对于文教工作的领导。

总的看来，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经过过去几年来全国人民的努力，特别是一九五六年的发展、大跃进，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就已经形成。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主要指标，就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

从全国解放以来，我国经济是高速度地向前发展的。但是，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完全平坦的，是有一些曲折的，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前进的。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曾经不只一次地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荒给予我们的困难，也不只一次地遇到了物资、财政和技术力量不足给予我们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一个一个地被我们克服了。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不仅向人民群众指出困难在哪里，而且善于领导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地去同困难作斗争。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当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在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公开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把我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政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说得一无是处。右派分子的这种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意攻击，在人民面前，在事实的面前，已经彻头彻尾地破产了。

应当说明：在一九五六年冬，由于某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情况比较紧张，曾经有过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如李先念副总理在关于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所说，我们对于当时财经工作中的某些个别问题曾经有过一些不适当的估计。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随即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增产和节约，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动员起来的

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到了夏季以后，那些局部的困难就逐渐克服了，并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九五七年重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了生产、建设部门的需要，而且还增加了各工业部门的库存，补充了国家的储备。农业和轻工业部门所生产的粮食、布匹和其他日用品，基本上保证了市场的供应，并且补充了一九五六年动用的一部分库存。财政收支不仅取得了平衡，而且有所结余。这个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优越性，证明了我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

《人民日报》社论

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向自然大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所有这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都预示着：一九五八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我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都要打一个大胜仗。

目前在我们的国家到处呈现的这种蓬勃、兴旺的气象，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在所有制方面，而且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获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我国人民革命干劲的新高涨。我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辉煌成就。现在经过了去年大半年的整风运动，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修正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及又一次强调坚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勤俭建国的方针之后，全国人民的革命干劲更加高涨起来了。过去几个月的情况表明，从前许多人认为做不到的一些事情，群众却在不长的时间内办到了。从前看来不可能的许多事情，现在都成为可能的了。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不是"中有希望"，也不是"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实实在在地大有希望。一切悲观论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民族已经觉醒起来，正在大大发扬旺盛的革命精神，已经做了并且还要做出更加伟大的前无古人的事情。

在这春色满园，气象万千的大好时光里，也不是没有一些工愁善虑的人担心跑得这样快，会不会出"乱子"？据说他们有过"经验"：年初反保守、年中反"冒进"是一个规律。他们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要稳妥可靠些，不要再犯冒进的错误。"许多人虽没有这样说，但实际上是这么想。他们对于落后的状况安之若素，既不去分析研究变化中的实际情况，寻找挖潜力的途径，也不去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们的目光只注定在事情的困难方面，从不打开脑筋，找出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在他们那里看不见什么革命的干劲。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成为这些同志的处世哲学。不难看到，一种右倾保守的思想还缠绕着这些同志的脑筋。

这些人不了解：跃进和冒进有原则的不同。跃进是一种有实际可能性的前进，它不同于通常的前进，它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的前进。安徽省去冬今春已完成水利工程十六亿土方（过去八年中只修了十四亿多土方），广西省去冬今春将修水利灌溉面积一千一百万亩（过去共只有八百三十万亩），都翻了一翻以上，这就是跃进。这种革命式的跃进，体现出革命的规模和革命的速度，是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所必需的。只要客观条件具备，经过主观努力可以跃进，这种跃进就是可靠的。不经过什么努力就可以达到的计划，决不能称为可靠的计划，只能叫做保守的计划。如果客观条件具备，经过努力可以跃进，不跃进就是右倾保守。同跃进相反，冒进是超越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没有根据或者没有充分根据的胡思乱想，主观主义的蛮干。其结果是既不能好省，也不能多快，不仅不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会延缓社会主义建设。这当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有许多事情，明明是跃进，却被有些人当作"冒进"来反对。跃进是从旧的阶段跳到新的阶段，既然是新的东西，自然不会十全十美，不会万无一失，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和过失，但这决不是"冒进"。一九五六年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尽管其中有个别的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基本上健康的大跃进。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肯定跃进，肯定好的东西，同时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调整和克服其中个别的缺点。但是有些人却分辨不出九个好指头和一个坏指头的区别，把个别当作一般，把支流当作主流，对整个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反"冒进"，实际反跃进。惩前毖后，我们不应当再用这种错误的态度来对待当前的新的跃进。

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满足于已得的一点成绩，满足于比过去稍为提高的计划和指标。在他们看来，已得的成绩，提高了的计划和指标，已经差不多了，比起过去来说已经是进了一步，甚至可以说是"奇迹"了。这些同志只看到过去，只会根据老经验、老规矩来看今天的事情，没有想到解放了的生产力，觉醒了的群众可以干出前无古人的、过去谁也不敢想的奇迹来。他们也看到某些先进的范例，但是他们只觉得这是特殊的、不能普遍做到的事情。他们没有反问自己，为什么别人能做到的事情自己不能做到，为什么这个地方做到的事情那个地方做不到。他们总是强调困难，把困难的因素估计得过多，把战胜困难的因素估计得过少，更缺乏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的革命乐观主义。因此他们不是向先进看齐，不是把先进经验全面推广。他们也有比较，但不是和最先进的比，而是和落后的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这些同志应该了解，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志士来说，把事情做得合乎普通规格只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尽一切可能把事情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才是我们的本色。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勇于打破妨碍先进事物的"常规"，力争上游，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在进行一切事业的时候应有的革命态度。

必须了解，我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而革命——这就是跃进。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而不是改良主义者。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阶级，它或者前进而取得伟大的划时代的胜利，或者安于剥削阶级加给我们的贫穷、落后和奴隶的锁链。在过去革命斗争的年代里，我们就是力争上游，向前跃进，把压在无产阶级身上的一切剥削制度统统推翻。现在，当无产

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同样地需要力争上游，向前跃进。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经说过，"革命在几个月中使我们的政治制度赶上了先进的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极顽强的，它很严厉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灭亡，或者是同样地在经济上也赶过它们。……或者是灭亡，或者是开足马力向前进展。这是历史提出来的问题。"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就是根据列宁的这个原则指示，以很高的速度实行工业化，使苏联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环境当然比苏联当时的情况好得多，已经不象苏联当时那样单独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支援了。但是，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仍然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无时不希望颠复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如果我们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安全就不能认为有充分的保证。同时，从国内情况来说，我国原来是一个"又穷又白"（在经济上还很贫困，在文化上许多方面还落后到接近空白的程度）的大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薄弱的，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不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就不能认为是巩固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党中央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的方针，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古语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鼓起革命干劲，力争上游，否则我们就要落后。就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来说，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已经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粮食生产达到纲要规定要十年达到的指标。这些都是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的计划。全国各省都应当考虑在五年、或者六年、或者七年、或者八年内实现纲要所规定的十年实现的指标。十年决于三年，全国大部分应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区的面貌基本改变。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当然，我们的事业是艰巨的事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要完成这样的壮举，不会没有困难。问题在于我们对困难采取什么态度。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困难是题中应有之议。因为我们干的是翻天复地的事业。干这样的事业而没有困难是不可设想的。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气质。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就决不可能坚持革命的斗争，更不用说取得革命的胜利了。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就是说，对于敌人、困难，首先必须藐视它，必须有战胜它的决心和信心，然后认真地对付每个具体的敌人、困难，逐步地把它战胜。共产党人必须有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干劲，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思想活泼，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富于进取精神，敢于打破"常规"，奋勇前进。我国又穷又白，固然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困难，但同时又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正因为我国又穷又白，我国人民特别迫切要求革命，要求改变我国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要求建设繁荣、富强、幸福的生活，而具有这样强烈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六亿人民，勇敢勤劳，正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在这股伟大的力量面前，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

让我们全党同志和所有革命志士，同人民群众一起，鼓起革命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吧！

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六十条指示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上海局，联省会议各召集人，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

发给你们河南省委二月二日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问题的报告一份，供你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作参考。

中　央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

河南省委关于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六十条指示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中央：

史向生同志参加南宁会议回来后，即于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一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和讨论了主席的指示，同时向省直各部门负责干部作了传达，二月三日分七个地区召开县书以上干部会议，由常委同志分头去传达。

省委常委会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这是保证把技术革命搞成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获得自己充分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为进一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理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贯彻执行主席的六十条指示，就能缩短我国的过渡时期。在这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比胜负的时期，中国的大跃进，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的任务是十分重大的。主席的六十条指示提示我们，中国已进入技术革命的新阶段，为了保证新的革命的胜利，必须在领导方法上来个大的革命。能否又红又专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在技术革命中前进或掉队的问题。又红又专最大的障碍是保守与暮气。常委会初步检查，我们的保守与暮气主要表现在：眼光不远，信心不坚，魄力不大，学习不专。我们容易动摇，大台风来了要动，小台风来了也要动一动，不能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这是需要十分警惕的。常委会决心认真回忆总结过去二年多来跃进反跃进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论、思想的高度来接受经验教训。目前各方面都出现跃进和革新的气象，是全面大跃进的革命形势，特别在整风之后，要充分估计到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和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改进领导方法上已经决定立即执行主席的各项指示，省委马上搞试验田、试验车间；省委委员每年保证下去四个月，一天不少，今年一月份大部分常委委员都在下边；省委强调抓先进，先听好的，先看好的，到先进地区就地开会，总结先进经验，带动落后。省委委员都要作出学习计划，包括三部分：一是学习基本理论和文化科学，二是掌握文化工具（外国文、古文等），三是亲自动手写文章。在学习上特别强调扫掉暮气，学习主席的学习精神。

中共河南省委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日

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社论

最近以来，报纸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许多省份不是十年内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的任务，而是决心用五年、六年、七年的时间去完成；许多省市的地方工业，在今后五年内不是计划增长百分之几十，而是增长几倍。比如甘肃省决定全民动手，自力更生，在五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比现在的增长十六倍到十九倍，赶上或超过全省的农业总产值。这种种消息表明：这些地方和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员，已经冲破了旧思想的束缚，敢于大胆地提出新任务，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他们的思想现在已经赶上前去，因此旗帜鲜明，干劲十足。这种情况，是符合于当前国内外有利的形势，也是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

但是，对于已经到来的工业农业大跃进的局面，对于许多省市和部门大胆提出的任务和指标，有些人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们一方面感到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又怀疑许多省市和部门能够达到自己提出的积极指标，并且担心由此而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会出现许多不平衡，会弄得一团糟。在他们看来，从容不迫，平衡发展，才是正常的现象，而快步向前，有先有后，就是不正常，就是特殊。

是不是平衡就可喜，不平衡就可怕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写道："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这中间所说的"均势"就是平衡，它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也明确地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讲演中，毛主席又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

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 这就是说，任何事物，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则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且只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在发展中存在矛盾，出现不平衡，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而平衡，矛盾的统一，才是特殊的现象。有些人恰恰相反地理解这个问题，他们就不能不陷进形而上学的泥坑。

客观的无数事实却不断地向我们证明，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生的力量，时时刻刻在向旧的事物冲击，向旧的定额、旧的指标、旧的规章制度挑战。这就是先进和落后的竞争，新事物和旧事物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旧的平衡一定要被冲破，不平衡一定要出现；不平衡经过调节，然后再达到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一步。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无论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在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或者在建设和生活之间，总的说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不断地出现过许多不平衡；但是，经过国家计划的适当调节，不平衡就达到了新的平衡，国民经济也就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事物经过“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这种螺旋式的反复，也就不断地得到发展。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因势利导，无法任意改变。人们的思想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就一定不能把事情办好，只会把事情办坏。

在这方面我们有过许多经验教训。以一九五六年的例子来说，这一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三大改造高潮的带动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1%，农业生产在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然增长了4.9%，基本建设完成了五年计划工作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但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他们只看到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某些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困难，以为这也困难，那也困难，简直惶恐得很。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了解，对党和广大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又已经来到，我们应当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

正如党中央几次指出过的，实现每一项任务，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快一些，好一些；另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慢一些，差一些。人们对于平衡问题的两种看法，两种态度，也就往往产生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一种是积极的方法，就是竭力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新生事物的生长，让落后事物赶上先进事物；另一种是消极的方法，不信任也不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关心以至压制新生事物的生长，让先进事物去迁就落后事物。很明显，前一种工作方法可以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快一些和好一些，后一种工作方法只能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慢一些和差一些。我们应当坚决采取前一种工作方法，完全抛弃后一种工作方法。

上面所说的两种工作方法，表现在计划工作方面，就是两种平衡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互相对立的方法，它是人们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方法的表现。要做到积极平衡，就必须充满热情，时时刻刻注意并且主动地去发现先进的和新生的事物，就必须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信任和依靠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只关起门来计算数字。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于生产和需要之间，这一部门和另一部门之间，这一地方和另一地方之间，是需要组织平衡的。让不平衡自流地发展，就可能使国民经济的某些部分发生彼此脱节的现象，这当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不许可的。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正是表现在我们能够经常地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活动进行调节，完全避免象资本主义世界那样必然要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且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们承认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平衡现象是经常的绝对的，并不妨碍我们去组织新的平衡。相反，正是因为经常存在着不平衡，我们就必须时时刻刻做调整工作，组织平衡。这里，问题的中心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方法。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组织平衡，我们就成为促进派；如果采取消极的态度和不正确的方法去组织平衡，就成为保守派，并且有成为促退派的危险。

在目前讨论和制订一九五八年计划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重视组织平衡的方法问题。重庆钢铁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这个公司原来的轧钢能力大于炼钢能力，炼钢能力又大于炼铁能力。在第一次制订一九五八年生产计划的时候，他们根据落后环节组织平衡，结果总产值比去年只能增长5%弱，钢产量只能增长10%弱，钢材产量只能增长5%，成本只能降低3.6%。后来，他们发动职工讨论，决心突破落后环节，根据先进环节组织平衡，结果总产值比去年增长8.5%，钢产量增长17.86%，钢材产量增长11.71%，成本降低7.2%。这就说明，用消极的态度和方法去组织平衡是错误的，只有用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去组织平衡才是正确的。

有人认为，用积极的态度去组织平衡，会使得各方面都紧张起来。这诚然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落后要赶上先进，先进要更加先进，当然会紧张起来。让新生事物生长得快一些，让旧有事物灭亡得快一些，当然要紧张起来。但是，难道我们能够安于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而不迅速加以改变吗？如果我们不安于落后状态，就必须加紧努力，急起直追。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从国外状况来说，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它们是不甘心于失败的，它们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我们必须鼓足革命干劲，同它们争时间，比速度，在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赶过它们，充分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从国内状况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只能说刚才开始，只有再经过几十年时间的刻苦奋斗，当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充分地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多紧张一些，将来就可以少紧张一些；如果现在不紧张，将来就可能很紧张。

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

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政法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和军队等方面开展起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在运动中展开了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全民大辩论，并且证明党中央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高潮，但是另有很多单位还没有开始发动或者还没有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也有不少单位还没有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思想作风上的系统整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有些同志甚至觉得生产和整风这两项紧迫任务，是互相矛盾、很难同时并举的。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条纲，领导得好，安排得好，群众发动得好，完全可以把现阶段的整风运动和生产等工作统一地抓起来，而且，只要发动起群众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就可以有力地揭露出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性，就可以迅速地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就可以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使干部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因此，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各级党委，各部门和各单位的一切党的组织，必须抓紧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并且注意下列各点：

一、领导上要心中有数，一方面，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采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不管过去的浪费和保守现象如何严重，成绩总还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因此，应该适时地引导干部和群众把最大的注意力和干劲，放在积极地改进工作、发展生产方面，用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具体措施，在实际上清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思想。

二、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要防止只片面地注意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要防止离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实践，抽象地空谈整改。

三、凡是没有经过群众鸣放、干部整改过程的地方，在这个运动中间，应该选择适当的时

机，认真补课，即首先让群众批评干部和工作中的缺点，并且雷厉风行地加以改正，以消除群众和干部间的隔阂，解除群众的顾虑。

四、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原来设想和安排好的平衡，也会不断地被万马奔腾的群众运动所突破。我们应该欢迎和赞扬群众在各个战线上的跃进，促进落后的部分赶上去，力求在先进的基础上达到新的运动的平衡，并且审订原来的规划。

五、原来一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会在运动中不断地为群众的创举所打破。我们必须对于群众的创造，虚心地加以研究，按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在实践中的考验，重新审订原来的规章制度。凡是真正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又可以迅速修改的，应该立即修改。

六、现在已经有些群众自动要求取消或者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我们对于群众这种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表现和热情，应该欢迎和爱护。但是在实际处理工资福利问题的时候，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于那些真正妨碍工农团结、妨害职工内部团结和其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工资福利制度，应该经过细心地研究，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全国性的要经过中央批准），作恰当的调整，除此之外，不要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

关于运动的具体部署和工作步骤，由各地各级党委自行安排。关于运动的经验应该及时地加以总结和交流。

（转自1958年3月4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成都会议通过。四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一）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二）小社合并为大社，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

2.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

3.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

4.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

（三）为了便于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为了在乡的范围内发展各种小型工业和文化教育

事业，在小社合并为大社以后，每一个乡领导几个农业合作社是适宜的。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大乡。

（四）农业合作社的合并必须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需要合并而不合并是不适当的，不需要合并而合并，或者合并得过早过大，也是不适当的。因此，各地农业社是否合并，合并的规模多大，以及进行并社工作的时间和步骤，应当完全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根本地区的情况自行考虑和规定。

中共中央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成都会议通过。四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一）合作社留给社员以一定比例的自留地，鼓励社员发展喂猪和其他家庭副业，适当照顾社员个人利益，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并已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有些地方自留地留的过多，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过大，这种情况对于合作社的巩固发生了不利的影响，应当采取适当的步骤予以调整。

（二）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以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为宜。

（三）考虑到目前全国农业合作社在苦战三年的口号下，对于合作社收入的分配将要或已经增加积累的比重，减少给社员消费的比重，合作社的劳动力绝大部分也已投入合作社的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社员的个人收入已经受了限制，因此，社员自留地面积和家庭副业收入比例一般应该留到以后去调整，在苦战三年期间一般不要有所变动。

（四）某些个别地方如果这一方面的现状很不合理，对于合作社的巩固很有妨害，认为必须在目前就加以改善，可以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规定妥善办法，进行适当的调整。

关于一九五八年
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成都会议通过。四月五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一、会议大体上同意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五八年度计划第二本账的报告和财政部党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第二本账的报告。应即由计委、经委和财政部进行安排。

二、第二本账不公布。只在适当时机，用预计可以超额完成等方式个别宣布。

三、新增加的财政收入（即在第二本账比第一本账增加的四十亿元以外再增加的收入），今后一般不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而应当作为流动资金。

第二本账新增加的三十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现在不要一次全部分配。应当首先安排急需安排的项目，其余待进一步看清情况后，再陆续追加。

四、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等部门在第二本账中新增加的收入，应当纳入国家预算。其应当增加的基建投资，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平衡。

五、农业所需要的排灌机械，其资金主要应当由合作社自筹；其不足者，应当尽可能地在现在已经分配的农贷内贷款解决；这样仍然不能解决的时候，再考虑由国家增加农贷。

六、在生产大跃进中，不仅要注意产量增加，而且应当注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并且注意新产品的试制和增加。

七、中央有关部门，应当经常注意通报经济情况，定期编发产品目录，说明生产和销售的情况，供各地参考。并且及时注意调整生产和平衡。

附件一：关于一九五八年度计划第二本账的报告

主席、中央：

各地方、各部门送来的第一本账，也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我们已经汇总起来，并且做了初步的平衡工作。这本账，比二月上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高了很多：工业总产值增加一百五十七亿元，农业总产值增加六十六亿元。这确是一个多快好省的账，它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大发展、大跃进的新形势。从这本账看，南宁会议的反对保守、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的精神，已经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解放了的生产力，象原子核分裂一样，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我国的民族确实大有希望。

跃进最快的是农业战线。一九五八年全国将扩大灌溉面积近二亿六千万亩，超过解放以

前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开拓的灌溉面积。二月底为止，已经完成一亿八千多万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因为水利这一关过去了，只要再过好排水灌溉机械这一关，过好肥料这一关，今年农业的增产就有了很大的把握。在排水灌溉机械方面，第一本账计划生产五十九万马力，第二本账增加到二百七十万马力，其中约有一百万马力，可以在六月底以前分配到农村，对今年农业增产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肥料方面，虽然今年化学肥料的供应量还只能有二百五十万吨，但是，因为各地大量地养猪积肥，和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增加肥料，也是会收到很大成效的。各地方对于农业的大跃进，充满了信心。地方提出的粮食产量指标，达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比中央的第一本账增加三百九十六亿斤；比去年的产量增加六百一十六亿斤，这大体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产的总和。棉花产量指标，达到四千零九十三万担，比中央的第一本账增加五百九十三万担，比大丰收的去年的产量增加八百一十三万担。这样，今年粮食增产的速度将是百分之十六点六，棉花增产的速度将是百分之二十四点八。这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

接着农业生产高潮，一个比一九五六年规模更为壮阔的新的工业生产高潮，也已经迅速形成。现在的工业总产值指标是九百零四亿元，比去年实际完成的产值六百八十亿元增加二百二十四亿元，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三十三，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

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如下列：

	第二本账	第二本账比第一本账增加	第二本账比1957年产量增加数
生铁	800万吨	67万吨	210万吨
钢	700万吨	75万吨	176万吨
原煤	16,737万吨	1,665万吨	3,875万吨
发电量	246亿度	21亿度	56亿度
原油	166万吨	11万吨	22万吨
氮肥	99万吨	9万吨	32万吨
排水灌溉机械	270万马力	211万马力	
水泥	1,010万吨	244万吨	341万吨
木材	3,095万立方公尺	247万立方公尺	493万立方公尺
棉纱	560万件	40万件	99万件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地方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主席关于尽快地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赶过当地农业总产值的号召，把全国各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一下子提起来了。现在看，各地方的干劲比中央各部门还要足一些，特别是甘肃、陕西、云南、贵州、湖南、安徽、河南七个省，都计划把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上述的比第一本账增加的一百五十七亿元工业总产值中，地方增加的是一百零七亿元，这样，今年地方工业的增长速度，将达到百分之三十七以上；中央工业的增长速度，经过几次提高，也达到百分之二十八左右。但是，中央工业的潜在力量并不是已经挖尽，还应当再努一把力，向地方看齐。

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局面，促使交通运输部门也必须有一个跃进。在交通运输各部中间，铁道部做得比较及时，也比较好。现在铁路货运量的第二本账，比第一本账增加三千万吨，达到三亿四千万吨。同时，铁道系统已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日产百万吨公里运动，并且决定精减一万多员工。通过这些措施，今年就可以降低运输成本百分之十二点五，增产节约

二亿五千万元。考虑到生产和建设的指标都在不断地提高，因此，除了铁路的货运量指标应当进一步地提高以外，公路和水运的货运量指标，也应当尽可能地提高。

按照第二本账计算，今年的国家预算收入将可以达到三百七十二亿元，比第一本账增加四十亿元。此外，中央各部和地方还有相当数量的自有资金。在深入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以后，进一步增加账政收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定一百四十五亿元。我们在编制第二本账的时候，从财政收入增加的四十亿元以及中央各部和地方自有资金中，拿出三十亿元，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这样，今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投资总数就将增加为一百七十五亿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这笔新增加的投资，是一下子加上去好呢？还是先少加后多加好呢？或者还是象往年那样，边走边看，等到“八月十五”再往上加好呢？我们认为采取头一种做法，才能够适应建设大发展的需要。当然，就是这样做了，到今年秋季，在生产大发展，财政收入有更多增加的基础上，基本建设投资还应当有进一步的增加。

在这新增加的三十亿元基本建设投资中间，准备以六成分给地方，以四成分给中央各部。这样，地方将得到十八亿元，这对于地方建设事业的大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保证。

新增加的投资，准备主要用来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发展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电力、化学肥料、机械制造工业和铁路的建设。同时，尽先保证那些已经开工的重点工程，和在一两年内就能够竣工的新建工程，得到必需的投资。对于新上马的重大建设项目，也将适当安排。

今年经济建设的特色，是遍地开花。县县办工厂，乡乡办工厂，规模之大，声势之壮，前所未有。过去地方办工业，障碍重重，发展很慢。自从主席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十大关系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而真正冲破那些束缚地方工业发展的思想障碍，却是在主席肯定了一九五六年大跃进的成绩，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重新强调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特别是在提出地方工业总产值要赶过当地农业总产值的号召以后。从山西省的沁县来看，现在就已经建立起来八十二个小型工厂，在五年内要发展到二百零一个，形成全县的农村工业网，实现农业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和半机械化，做到“机器到处响，工厂遍城乡”。这里，就找到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具体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央办大工业，省办省的工业，专区办专区的工业，县办县的工业，乡办乡的工业。这就叫做正确处理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大型建设项目同中、小型建设项目的关系。主席关于花三成力量搞中央的大工业，花七成力量搞地方的中、小型工业的指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指示一举而解放了办地方工业和办中、小型工业的积极性，而我国有一百八十多个专区，两千多个县，遍地开花，基数很大，工业化的速度就可以大大地加快。完全可以预期，在全国贯彻执行主席的这个指示以后，我国工业每年增长的速度将不是百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十几，而是百分之二十、三十。

现在，我们正在组织中央各部作各种小型企业的标准设计，供地方采用。可以设想，在那些资源条件具备的县分，不用几年，完全有可能至少建设一个小的煤矿，一个小的化学肥料厂，一个小的煤炼油厂，一个小的炼铁厂，一个小的水泥厂和一个小的电站，以及为当地农副业加工的各种小工厂和为以上各种企业服务的机械联合修造厂。到那时候，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工业点将不再是廖若晨星，而是满天星斗了。

我国是一个大国，一个省就等于人家一个国，甚至一个专区就比欧洲的一个小国大，一

旦把各省、各专区和各县举办工业的积极性通统调动起来，万马齐奔，又有中央大型工业的协助和国家的统一规划、调整，我国工业化的速度没有理由不比欧洲各国快得多。

纵观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后，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贯彻执行主席所指示的方针，继续发扬革命干劲，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就可能比苏联更快一些。我们就可以掌握时机，在比十五年更短的时间内赶过英国。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大发展、大跃进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加有力地来组织实现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是物资有没有保证。我们认为是有保证的，即使有某些困难，也是完全有办法克服的。

为了克服物资供应中的某些困难，各个生产单位和基本建设单位，都应当千方百计地增加生产，清理库存和节约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经济协作区应当加强协作，统一调剂；对外贸易部门应当积极组织某些必需物资的进口。除了上面这些措施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动用一些国家储备。这样，某些物资不足的困难，是能够解决的。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每当人们感到物资多一点的时候，恰恰就是反映生产和建设都松了劲的时候。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就是这样。实际上，只要生产和建设的劲头一上来，物资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反之，每当人们感到物资少一点的时候，也就是反映生产和建设大跃进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不足的物资就能够很快地多起来。一九五六年是这样，今年也将是这样。那种一碰到物资略有多余，就叫喊物资积压，要泻肚子；那种一碰到物资略有不足，就叫喊困难，就叫喊"冒进"，实际上都会放慢建设速度。对于这两种叫喊，都应当硬着头皮顶住。因为作这种叫喊的人，往往只看到物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人的作用；只看到静止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发展的东西。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变化着的客观形势，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把它做到。

物资有了着落，有些同志还担心某些工业产品会不会积压。总的来说，我国工业产品是不足的，这是基本的方面。只要生产部门经常地注意增加品种和提高质量，销路是不成问题的。在国民经济大发展、大跃进的形势下，更是如此。少数产品，在一个短时间内，也可能出现多余的现象，我们认为，国家可以把这些产品收购起来，积极组织推销。至于销路确实不好的产品，应当着重改变品种和改进质量，打开销路。

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各地方、各部门在报纸上公布的数字，有的比这个第二本账还要高一些，经过群众讨论以后，还会更高一些。这些数字，可以作为各地方和广大群众奋斗的目标，不列入国家计划。

附：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第二本账简表

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

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

附件二：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第二本账的简要报告

主席、中央：

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第二本账，初步估算是三百六十九亿元。这本账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预算三百三十二亿元增加了三十七亿元。这个增加的部分，按收入项目来看，企

业收入增加二十四点五亿元，各项税收增加十一点八亿元，公债收入增加零点七亿元；按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来看，中央增加二十四亿元，地方增加十三亿元。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第二本账，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数字比较，增加六十一亿元（第一本账增加二十四亿元，第二本账又增加三十七亿元），增长近百分之二十。这个增长速度较之大跃进的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八的速度，还要高些，它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大发展的新形势，也反映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更高的速度积累建设资金的充分可能性。

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第二本账比国家经济委员会估算的三百七十二亿元，少三亿元。这是因为目前还有些省市没有报来材料，只能估算；有些省市的材料虽然报来了，但报来的时间不一，数字还在变动；而且我们和经委在具体计算方法上也有一些出入，需要继续详细核对和计算。

关于第二本账的支出，同意经委初步提出的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三十亿元的数字（包括中央各部和地方用自有资金安排的部分在内）。同时，由于生产规模和基本建设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农产品收购将进一步增加，商业部门的库存也可能有相当的增加，所有这些，都需要增加若干流动资金。这一点也应当在安排支出的时候加以注意。

国家财政的跃进，是以工农业生产的跃进为基础的。一九五三年是生产建设跃进的一年，预算收入比上年增加四十亿元；一九五六年也是一个跃进年，预算收入又增加四十亿元。一九五八年跃进的劲头更足，规模更大，而且，生产和预算的基数比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也大得多，预算收入按这次提出的第二本账将增加六十一亿元。这个数字经过努力是可能实现的。足见各方面鼓足干劲，积极起来，生产越发展，财政就越充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真理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今年经济和财政大跃进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个地方都能够尽量根据当地的可能，挖掘潜力，组织收入，自己筹措资金，很少向中央要钱。这次提出增加的一百五十七亿元工业产值中，中央工业增加的部分占三分之一，地方工业增加的部分占三分之二。而且中央工业成本降低的比例也低于地方工业成本降低的比例，中央工业的成本比第一本账降低百分之二点三，地方工业的成本比第一本账降低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这说明中央各部门的劲头固然很大；地方的劲头更大，增加生产节约支出的积极性更高。从目前的情况看，今年在财政管理方面，日子会过得比较顺当。这是同今年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有一定关系的。地方可以自己作主，统筹收支，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进一步发挥起来了，不需要再象往年那样事事要求追加预算了。

从各地区跃进的情况，可以看出，富区固然可以跃进，经济不大发达的地区，同样可以跃进，有时候还可以带头跃进。比如甘、陕、云、贵等省尽管经济基础比较弱些，条件较差，但它们的工业产值都计划比上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足见事在人为。

这个报告里所说的国家预算的第二本账，还是初步数字。许多数字暂时只能按全国的经济指标加以估算，并没有分省数字。正式的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第二本账，要等到经济指标最后确定下来和各地方材料报齐以后，才能正式编制。

附：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收入第二本账估算表

财政部党组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

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收入第二本账估算表

单位：亿元

预算科目	1957年预计执行数	1958年预算收入第一本账	1958年预算收入第二本账 金额	比第一本账增加数	为1957年预计执行数的%
一、各项税收类	154.39	165.37	177.17	11.80	114.7
其中：工商税收入	113.05	123.90	134.80	10.90	119.3
关税收入	5.79	5.50	6.04	0.54	104.3
农业税收入	29.31	29.97	30.33	0.36	103.5
二、企业及事业收入类	144.26	158.11	182.65	24.54	126.6
中央企业及事业收入	118.50	127.72	142.81	15.09	120.5
其中：工业收入	48.16	54.03	62.20	8.17	129.2
农、林、水、气象收入	4.45	4.67	5.51	0.84	123.8
铁、交、邮、民航收入	19.59	20.62	23.68	3.06	120.9
粮、商、外贸、银行等收入	42.89	45.72	48.43	2.71	112.9
地方企业及事业收入	25.76	30.39	39.84	9.45	154.7
三、债务收入类	6.73	6.30	7.00	0.70	104.0
其中：国内公债收入	6.59	6.30	7.00	0.70	106.2
四、其他收入类	2.83	2.20	2.20		77.7
收入合计	308.21	331.98	369.02	37.04	119.7
企业利润留成数	9.49	10.93	13.12	2.14	138.3
总计	317.70	342.95	382.14	39.18	120.3

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第二本账简表

项目	计算单位	1957年完成	1958年计划			
			第一本账	第一本账为1957年的%	第二本账	第二本账为1957年的%
(一)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	1,328.6	1,435.7	108.1	1,658.2	124.8
(二)工业:						
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	亿元	679.6	747.4	110.0	903.8	133.0
在总产值中:工业	亿元	581.8	643.7	110.5	771.7	132.6
手工业	亿元	97.8	103.7	106.3	132.1	135.2
在总产值中:中央	亿元	310.9	348.1	112.0	397.7	127.9
地方	亿元	368.7	399.3	108.2	506.1	137.3
主要的产品产量:						
发电量	亿度	190.3	224.5	118.0	246.0	129.3
原煤	万吨	12,861.8	15,072.4	117.2	16,737.4	130.1
生铁	万吨	590.4	732.6	124.1	800.1	135.5
钢	万吨	524.4	624.8	119.2	700.0	133.5
商品钢材	万吨	426.0	482.0	113.1	541.1	127.0
木材	万立方公尺	2,602.3	2,847.7	109.4	3,095.1	118.9
水泥	万吨	668.9	765.6	114.5	1,010.0	151.0
金属切削机床	台	25,171.0	27,022.0	107.4	50,000.0	198.6
交流发电机	万瓩	29.9	62.0	207.6	77.0	257.5
交流电动机	万瓩	136.8	251.2	183.7	340.0	248.5
变压器	万千伏安	401.1	576.9	143.8	700.0	174.5
载重汽车	辆	7,500.0	13,000.0	173.3	21,100.0	281.3
排灌机械	万马力		59.0		270.0	
氮肥	万吨	67.8	90.6	133.7	99.5	146.8
棉纱	万件	461.5	520.0	112.7	560.0	121.3
机制纸	万吨	89.0	104.2	117.1	120.5	135.3
原盐	万吨	806.8	820.0	101.6	1,002.4	124.2

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第二本账简表（续完）

项目	计算单位	1957年完成	1958年计划			
			第一本账	第一本账为1957年的%	第二本账	第二本账为1957年的%
（三）农业：						
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	亿元	649.0	688.3	106.1	754.4	116.2
主要的产品产量：						
粮食	亿斤	3,700.0	3,920.0	105.9	4,316.0	116.6
棉花	万担	3,280.0	3,500.0	106.7	4,093.0	124.8
猪	万头	12,777.0	15,000.0	117.4	19,515.0	152.7
增加农田灌溉面积	万亩	4,458.0	9,221.0	206.8	25,986.0	582.9
（四）基本建设：						
投资总额	亿元	123.7	145.7	117.8	175.0	141.5
（五）铁路运输：						
货运量	万吨	27,417.0	31,000.0	113.1	34,000.0	124.0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1,346.0	1,525.0	113.2	1,648.0	122.4
（六）对外贸易：						
进出口贸易总额	亿元	101.3	110.0	108.6	117.6	116.1
出口总额	亿元	53.0	60.0	113.2	65.0	122.6
进口总额	亿元	48.3	50.0	103.5	52.6	108.9
（七）国家财政收入	亿元	303.0	332.0	107.7	372.0	120.7

注：在"1957年完成"栏内，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的数字是实际完成的数字，其余的都还是预计完成的数字。

中 共 中 央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成都会议通过。四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一）会议完全同意毛主席关于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国各地应当普遍地积极推广，并且经过这个运动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二）农具的改革是多方面的，包括水利排灌、田间耕作、农村运输、饲料和农副产品初步加工以及防治病虫害等等工具的改革．在不同的地区，以那方面的工具改革为主，情形不同，农民群众的要求也不相同。各地在推广农具改革运动的时候，应当因地制宜，不要千篇一律．

（三）农具的改革，无论是机械化（包括农用的动力机器和机引农具）、半机械化（所谓新式畜力农具），或者是旧式农具的初步改良（所谓改良农具），都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要单纯等待农业机器，而放松了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我们的任务是：在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

（四）农业机器应该以小型的为主，配合以适当数量的大型和中型的．农业机器的性能，应该力求便于综合利用．机器的型号名称，应该一律采用中文，不要沿用外文名称．

（五）农业机械的制造（包括机引农具、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除了大型的和技术要求较高的农业机器以外，一般的应该以地方工业为主．由各个地方或者经过各个协作区，根据当地的条件和需要，自行安排；中央有关部门在技术和经验交流方面予以帮助．对于地方工业基础较差的地方，在协作区内省间调剂仍然不能解决的，中央有关部门应当组织调剂．

（六）为了适应农业机械的生产和修配，需要供应大量的滚珠、电动机等，并且应当在若干县、乡设立农业机械修配站．这一建设任务由各地方统筹办理．

（七）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靠农业合作社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机械化的事业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历来是农业合作社自买自用的．一般的农业机器，例如抽水机、脱粒机、碾米机、切片机、打草机、饲料粉碎机、喷雾器以及小型的拖拉机等等，也应当由农业合作社自买自用。大型拖拉机，农业合作社一般不需要．中型拖拉机，一部分是农业合作社所需要的，可以根据农业合作社的财力，分别采取社有社营、国有社营、联社经营和国社合营等不同形式．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成都会议通过。四月五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援；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地方工业的发展，正确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而又符合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经过讨论，提出如下的意见．

一、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是，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走群众路线．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各省、市、自治区在制订地方工业发展规划的时候，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1）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资源情况和现有的工业基础，地方工业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大体的分工是必要的．在一个省、自治区的范围内，也应该如此．

（2）要对现有企业的情况进行摸底排队，充分发掘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根据需要，加以扩建或改建．

（3）整理和发展手工业．首先应该注意发展为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在当前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中，应该充分发挥手工业的作用．其次，还应当积极地发展为国内外市场所需要的特种手工业产品．

（4）建设新企业，应该首先注意兴办为农业服务和为大工业服务的企业．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工业，应该根据资源条件和社会购买力的情况适当地发展．新建企业的规模，一般应以中、小型为主，县以下则应以小型为主．

（5）在一个省、自治区的范围内，地方工业的布局，应该依托现有工业城市作为技术中心，同时选择若干县城作为联结工业城市和其他各县地方工业的基点．在中心城市、基点县以及其他各县的同产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协作制度，形成点面结合、城乡结合、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工业网．

（6）各省、自治区的规划，应该包括县、乡、社所办的工业在内，以便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的总产值，这是以省、自治区为单位来说的，而不是要求每一个专区、每一个县的工业都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在地方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的省份，地方工业仍应根据需要作适当的发展，但不应

单纯强调发展的速度，而应强调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制造。

（7）鉴于今年各地的财力、物力、人力集中地用于农业大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应该根据这种情况，适当地进行安排。对于规模小、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特别是对于改良农具、制造和修配农业机械、开采有色金属、小煤窑等小型企业，应该积极地发展，对于投资较大、技术较复杂的企业，例如，化肥厂、煤炼油厂等，今年着重做好准备工作，试办几个中小型企业，以便取得经验，为以后大发展创设条件。

二、地方工业的建设资金，除了少数较大的重要的建设项目，主要由中央投资以外，其他一般建设项目所需的资金，主要应该由地方自筹来解决。地方资金的来源，主要应该依靠地方财政筹集，地方工业企业的内部积累，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社的积累。此外，必要时，还可以发行地方建设公债。今年，由于农业社和广大农民投资于水利建设的资金已经为数很大，一般不宜再过多地向他们筹集工业建设资金。

三、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为此，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现在各地县以下工业企业的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县营、乡营，合作社（农业社或手工业社）营，县、社或乡、社合营等三种。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手工业合作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转为县的手工业联合社经营的合作工厂，取消分红制，改用工资制，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形式。一般农村中的小型工业，以采取县、社合营或乡营的形式为好。县营工业要开办一个经营多种业务的联合工厂，这种联合工厂比较易于适应农业的季节性，可以灵活地统一地调剂劳动力的使用，技术设备的利用和流动资金的利用，并且可以成为农村工业网的核心。

四、县营企业的劳动力，除了一部分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应该是正式职工以外，其余所需的劳动力，应该就地招用临时工。在招用临时工的时候，应由企业、农业社和劳动者本人三方签订合同。为了保证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每县都要作出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规划，并且要使县营企业和农业社建立经常的联系协作制度，使县营企业所需的多数临时工成为相对固定的、分批轮换的有一定技术的临时工人（临时工应当经过一定时间的熟练期）。

县营企业职工的工作时间，不宜机械地执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也不宜过长。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规定。

县营企业职工（包括临时工在内）工资的平均收入，原则上应该高于一般农民的收入水平，但不宜悬殊过大。工资制度也不宜执行八级工资制。

临时工的工资收入，归本人所得还是交回农业社按劳动日制度实行再分配。这个问题牵涉到厂、社、临时工三方面的利益，处理不好，就会对工农关系和工农业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原则上，临时工的工资收入，应该归本人所得。但由于临时工参加工业劳动而在农业社内没有作到应该作到的劳动日数，因此，作为一个社员来说，他应该对社承担必要的义务，例如，向社交纳相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农业税，交纳的方式可以由各地自定。农业社应该保证临时工及其家属的口粮供应，但临时工在企业内工作期间的口粮，应该根据农业社分配口粮的标准按统销价向社购买。

一般国营企业现行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制度，不适用于县以下办的工业企业。各省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适用于县以下工业企业的劳动工资的办法草案，经过典型试验，报请中央审查批准。并经过政权机关的合法手续之后，再普遍推行。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

（一）

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市场商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时期，许多地区又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其中从事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七十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也有六、七十万人。由于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同时也由于市场商品供应情况趋向缓和，这些私营工业的大部分已经登记并实行公私合营，一小部分已经倒闭；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已经有一部分组织起来，许多到城镇经商的农民已经还乡生产。这个时期的情况说明了在我国经济中，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和复杂的。

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在目前过渡时期在某些方面还不能够完全满足全国人民的复杂的变化多端的需要；由于社会上目前还有多余的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在短期内我们还不能完全给以适当的解决；同时，还由于我们在经济改组工作中和市场管理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漏洞。这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有很多是生产经营的方式机动灵活，同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社会主义工商业和合作社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有些还是社会主义工商业和合作社在相当长时期内所不能完全代替和不必要代替的。但是，它们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其中一小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这就不仅妨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组织的巩固，在不同程度上腐蚀了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思想意识。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二）

对于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我们的方针是要将它们一律管理起来，不允许它们未经登记进行非法经营；凡是经过审查允许继续经营的，必须加强监督和管理，取缔它们的投机违法行为，对它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做到既能发挥它们对社会

主义建设的有益作用，又能限制它们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各地应当抓紧目前全民整风这个有利时机，在这些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中间有领导地展开以反对资本主义道路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它们的生产经营，加以审查，区别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分别地有步骤地进行整顿、登记、改造、排挤、淘汰或取缔。对它们的挖社会主义企业墙脚和投机违法行为，根据不同情况，按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处理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原则，分别给以警告、悔过、补税、罚款、没收、停业以至判刑等不同的处分。对于需要转业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应当作妥善的安排。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积极动员和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从事农业劳动。

（三）

根据上述方针，我们对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一、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但是应当分别情况，作不同处理。对于有严重违法行为或者为国计民生所不需要的，坚决予以取缔。对于国计民生虽然需要，但我们能够代替的，应当采取经济方法予以代替，并且从税收、价格、原料供应等方面予以排挤淘汰。对于没有严重违法行为、国计民生需要而我们目前又不能代替的，可以予以登记，发给证照，一般可以实行公私合营。对于他们的违法行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以适当处理。对于那些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的人员，经过批评教育，在他们承认错误以后，一般可以允许他们回到原企业工作。

二、对于个体手工业户，应该加强对它们的领导、管理和改造，在自愿的原则下，有计划地吸收他们参加手工业合作社。对于目前大量存在的个体手工业户，应当普遍进行一次审查。（1）对于在当地有长期户口的个体手工业户（包括修理、服务性的行业），如果确系依靠手工业为生，而且为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可以登记，发给证照。其中有组织成为手工业合作社条件的，应当在自愿的原则下，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但对于适合于个体生产、而不适合于组织集体生产的某些特种手工艺品，则应当允许他们长期进行个体生产。（2）凡是带有季节性、流动性的适应城市居民特殊需要的农村手艺人（磨剪刀、锯盆碗等）进城营业时，可以允许。但是对于那些盲目流入城市、准备长期经营一般性手工业的农民，应当动员他们回乡参加生产。（3）对于家庭副业、失业人员的生产自救组织，如果他们的原料和销售没有困难，可以允许他们经营，但不必组织成为手工业合作社。（4）对于小业主和富裕的独立劳动者的某些违法行为，应该启发他们自觉地进行检讨，同时在运用资金、增添工人、增加设备以及价格、利润、工资等方面，加以严格控制，限制他们的剥削行为和盲目发展，鼓励他们将现有的雇佣关系，改变为劳动合伙关系。

三、对于小商小贩和行商，应普遍进行一次审查。对于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坚决予以取缔。没有严重违法行为的，亦应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在一定的经营地区内。目前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小商贩，应当进一步把他们组织成合作小组、合作商店或使他们成为国营商业的代购人员和代销人员。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不适当地经营商业的行为，应该加以劝阻和取缔。农民自产自销的商品，仅限于第三类物资，而且不得进行长途运销。农业合作社、农民经营的手工业副业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的时候，应当照章纳税。

四、对于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的全年收入，应当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加以适当控制。（1）个体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稍低于当地同行业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个体户，应当从原料、加工、订货、税收等方面适当地加以控制。某些有特殊技艺的人员的收入，可以高于一般社员的平均收入。（2）小商小贩全年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或略低于当地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营业员的平均工资。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应当在货源分配、税收、批零差价、代购代销手续费和盈余分配等方面加以控制。对于某些收入过低的，应当从以上几个方面酌情加以照顾。合作商店所得的纯利，除交纳所得税和提存公积金以外，股金分红部分一般不应该超过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合作商店的公积金不许分掉，在公积金过多时，可以动员他们拿出一部分投资于地方工业和商业的基本建设。上述所得税征收办法和临时商业税税率的调整办法，由财政部另行拟定。

（四）

对于残余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一项重要的任务。各级党委必须足够认识到这一工作的复杂性，既要积极对它们进行改造；又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来处理；应当采取依靠群众和加强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慎重地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各级党委在接到这一指示后，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定出执行的办法和步骤，责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协同行动，切实贯彻执行。

中央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

一、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二、整风第四阶段进行的方法，应当是：在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党组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整风会议，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采取人人检讨、人人过关的方法。一般地说，这样的小型会议，开个四、五次，即可大体结束。如果，在会议进行当中，发现重点人物，或发现有重大原则性的意见分歧，须要更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则需要适当增加会议次数。召开这种会议的目的，是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提高觉悟，改进工作。小型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凡是能够写的同志，都应当写出本人参加整风运动的思想总结。这种思想总结可以采用个别交谈互相传阅的方式，不必经过会议的讨论

通过。

三、整风第四阶段，以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揭发和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应当着重揭发和批判在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在揭发和批判宗派主义的时候，应当联系到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加以揭发和批判，以便提高全党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上述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本部门在这个阶段应当着重地揭发和批判哪些方面的问题。

四、在农村，应当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整党、整团、整社。在整党、整团、整社的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党、团的委员会和社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农村党员、团员、乡、社干部可以不必写个人的思想总结，但是，要在整风中进行一次鉴定。

五、各地区在统一安排本地区整风工作的时候，应当把财贸部门和其它分散的基层单位、城镇居民、小商小贩的整风统一安排进去，并且要注意加强领导。不要使这些方面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漏掉了或者滑过去了。

六、无论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基层单位，无论在整风运动中和今后日常工作中，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表扬先进，改进工作，都应该广泛使用鸣放辩论和写大字报的方法。

七、为了有力地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的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　泽　东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

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1958年4月15日，于广州）

（原载1958年第1期《红旗》）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情况（节录）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五月二十三日下午闭幕。

这次会议反映了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这次会议本身就是一次整风的会议，一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一次大跃进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五月五日下午开始举行的。在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同志作了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

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表示同意刘少奇同志所作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邓小平同志所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同志所作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代表们在发言中，热烈拥护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认为这条路线将形成党的团结的政治基础，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最高的速度前进。代表们认为，只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这条总路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以至超过英国的时间将不需要十五年，而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各项指标的时间，更将大大地缩短。

代表们讨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教训，指出了正确的思想方

法的巨大意义。他们强调指出，为了贯彻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必须实行"政治挂帅"，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提倡共产主义的崇高风格，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大家还特别强调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学习他的著作，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榜样。

在发言中，代表们从多方面讨论了怎样贯彻执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问题，并广泛地交换了关于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许多发言的人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随着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人们的思想上的解放，生产力将会得到怎样巨大的发展。他们在发言中谈到了在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工业、地质勘探、建筑业、铁道建设、交通运输、农业、水利事业、国内外贸易、财政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科学工作中实现大跃进的计划和措施，谈到了勤俭办厂、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学校的经验，实行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工作和干部实行跟班劳动、搞试验田的经验，关于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相互协作的经验，关于改良农具、深翻土地、增积肥料、改良种子、兴修水利、战胜沙荒、绿化荒山的经验，关于农村中的文化革命、消灭文盲、普及教育、除四害、讲卫生、移风易俗的经验，并且谈到了军事工作、公安工作、政法工作怎样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问题。

（节自1958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刘　少　奇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报告的内容是：目前形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

一

这次会议距离本届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党正确地执行了并且发展了本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决定的方针和政策，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一年多来，在国际和国内都发生了很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

在国际方面，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著名的论断：世界形势的发展在最近达到了

一个新的转折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生产发展速度等方面，早就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段时间内，天空曾经出现一片乌云。帝国主义阵营和各国反动派，不止一次地发动了反共、反人民、反民族独立的高潮。帝国主义者煽动和支持了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同时向埃及进行武装侵略。当时我们指出：这片乌云很快就会消散的。果然，匈牙利的革命无产阶级在苏联的援助和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下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埃及和叙利亚的反侵略斗争，也在苏联和世界和平力量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一九五七年十月和十一月，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因而使全世界不能不承认，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同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接着又举行了六十四个共产主义政党的会议。这两个会议发表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大大地加强了国际工人阶级队伍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促进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东风已经压倒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

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是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关于这个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宣言，邓小平同志将作专门的报告。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是：半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证明莫斯科宣言的估计和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现在已经陷入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猛烈下降，失业大量增加。这个危机正在冲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且使得资产阶级政客、资产阶级学者、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战后所散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逃脱危机的欺骗宣传，彻底破产。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加深了，在这些国家里，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首先是美、英、法三国之间的矛盾，扩大化了，虽然它们现在仍然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反共、反人民、反民族独立运动为目标而互相联系着。中立主义的倾向继续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继续高涨；尽管帝国主义还在用阴谋的方法和武力的方法加以破坏，尽管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企图限制反帝国主义最坚决的人民力量的发展，但是事实证明，它们并不能够阻止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的历史潮流前进。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和人民为保卫民族主权和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斗争，正在胜利地发展着。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正在英勇地进行着。全世界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要求实现苏联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禁止使用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和制止干涉别国内政，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却顽固地反对这一切，这就使得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面前愈来愈丧失人心。美帝国主义还在继续进行战争威胁和准备新的战争，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如同莫斯科宣言所说，"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因为人民绝不会再继续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

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相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正在蒸蒸日上。苏联、中国和其他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比过去发展得更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日益巩固，互助关系日益发展。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的和平倡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从朝鲜撤退，大大地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中的威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没有危机的事实，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光明前途。

在当代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条件下，帝国

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除了采取进行战争威胁、准备战争、进行武力侵略、加紧对于本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镇压这些手段以外，还竭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寻找新的工具，企图从内部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最近在它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来对抗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这个纲领根本违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仅仅适合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目前在国际范围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彻底地粉碎现代修正主义，坚决地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这种团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地团结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民族奴役的人们，共同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更大的胜利而斗争。

毫无疑问，目前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有利于从事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的各国人民，仅仅不利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不利于那些坚持为帝国主义政策辩护而背叛社会主义利益的修正主义分子。

在我们国内，象大家所看到的，党所领导的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而展开的整风运动，已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战线上收到了伟大的成效。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有系统地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使它适合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整风这条总纲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的整风高潮，又进一步地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的高潮。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就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

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所有这四部分人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经过反右派斗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群众中是彻底地孤立了，并且开始分化了。激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社会上反革命残余和各种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坏分子也进一步地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大大地巩固起来了。

反右派斗争在我们党内也有深刻的意义。我们清除了一批党内的右派分子。这批右派分子是混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他们在党内极端地发展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进行修正主义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同党外的右派分子里外呼应，共同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清除了党内的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是党的事业的一个大胜利。

处在中间状态的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半心半意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反右派斗争和紧接着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在生产建设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跃进中，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着他们原来的政治面貌。他们中间的多数现在感到“形势逼人”，必须继续进步，不能停留在原来那种中间状态了。他们开能承认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两面性，承认必须改正自己的许多错误观点，并且表示决心改造自己，向党“交心”，争取成为左派。许多知识分子积极地参加了整风运动，表示决心要成为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红色专家，并且有一部分人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参加体力劳动，同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认真的接触。

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认真地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揭露了少数民族中某些破坏祖国统一的分裂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时也进一步地克服了某些汉族干部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样，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在一九五七年的进攻中所表现的就是如此。这次进攻虽然被击退了，但是以后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准备进行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彻底解决他们同人民之间的矛盾。对于其他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也必须继续加以镇压。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在无产阶级内部由于有一部分人受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地都应当采取整风的方法加以解决。至于劳动人民中间在认识上的正确同错误、先进同落后的矛盾，其中有些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有联系，多数不属于阶级间的矛盾，更显然是应当用整风的方法去解决了。

劳动人民中间的政治空气，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在群众中放手地进行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了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由于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放手地开展了对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都大大地提高了。很多单位的领导干部向群众作了恳切的自我批评，认真地进行了整改，这就感动了群众，加强了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信任，同时也启发他们自觉地批判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落后习惯，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在一切整风深入的地方，群众和干部的心情都大为畅快，他们之间过去存在着的某些隔阂消除了。群众亲切地感觉到党把心交给了他们，他们也把心交给党。因此，在这些地方，反映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各种歪风大大下降，而共产主义的正气大大上升。许多原来处在落后状态的人们得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解放，迅速地赶上了先进的人们，这是我们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

现在，在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无论城市和农村，无论机关、企业、学校和部队，都在出大字报，开辩论会，蓬蓬勃勃地发展着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用这种整风的方法正确地处理人

民内部的一切矛盾，正在开始成为全民的新风俗、新习惯。群众和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克服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克服建设事业中的一切浪费现象和保守现象，纠正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中的不合理现象，改变那些限制生产力发展、限制群众积极性的规章制度。依靠群众的揭发、批判、倡议、监督和实践，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快地解决了。群众公开地指名地批评领导人员，也公开地指名地互相批评，毫不吞吞吐吐、畏首畏尾。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着把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搞得更好。他们对于被批评者采取真正的同志态度，肯定他们的成绩，帮助他们改正缺点，帮助他们进步，而不是要把他们"一棍子打死"。这是一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在我们的国家里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的深刻变化。厂矿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开始经常地用一定的时间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许多农村工作的领导者同农民合作种试验田。大批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下乡上山，或者到企业的基层单位劳动。群众的榜样激动了干部，干部的榜样也激动了群众。管理人员直接参加了一部分体力劳动，劳动群众也直接参加了一部分管理工作。在上级和下级之间，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互助合作、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关系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许多工作人员的命令主义作风，经过这次整风运动有了很大的改变。只要我们继续采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一定可以有效地彻底地克服工作中的命令主义作风，逐步地消灭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恶习。

在整风运动中展开的这样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尖锐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和随之而来的这样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不能设想的。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能象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一样，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利益，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敢于实现这样广大的民主。资产级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硬说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事实恰恰相反，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逐步地消灭官僚主义。为了发扬人民民主，消灭官僚主义，就应当加强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应当削弱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我们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的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事实证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不但不妨碍集中。反而更有利于实现高度的集中；不但不会使社会主义的纪律涣散，反而更有利于在人民群众自觉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的纪律。干部丢掉了官气，放下了架子，同群众打成一片，领导的威信不是更低了，而是更高了。经过整风运动，在国家生活的广大范围内，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在日益发展起来。

广大的劳动群众进一步地看到了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依存于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看到了个人幸福依存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因而他们在劳动中表现了共产主义的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几年辛苦，万年幸福"，就是他们的口号。在这股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洪流面前，许多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顽石被冲掉了。在城市中和乡村中，人们争先恐后地参加各种义务劳动。很多地方的农民在兴修水利的时候，打破了几千年祖传的只顾本乡本土的狭隘观念。在全国的劳动竞赛中，很多先进的单位和个人热心地传授自己的技术经验和发明创造，帮助落后的单位和个人赶上自己的水平。很多企业、机关、

学校、部队和个人都主动地同别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协作，以促进自己的工作和别人的工作共同发展。这一切，正如列宁所说，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是“有世界历史的意义的转变开端”。

所有上述因素，都汇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的革命干劲。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所有这些号召，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在劳动中，在工作中，出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势如破竹的锐气，不达目的不止的学习和钻研的精神，无所畏惧的创造精神。个人同个人、小组同小组、企业同企业、合作社同合作社、县同县、城市同城市，展开了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竞赛。定额不断地被突破，新的技术不断地被创造。企业行政机关提出的指标，一次一次地被群众超过。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更快的发展。

在工业方面，今年一月到四月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其中四月份增长百分之四十二。根据目前情况估算，今年我国钢产量将超过七百一十万吨，煤产量将达到一亿八千万吨，机床产量将达到六万台，排灌机械的产量将达到三百五十多万马力，化学肥料产量将达到一百三十五万吨。这样，我国今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将比原定的计划高得很多，将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任何一年。

广大职工群众高度的革命干劲，也表现在试制新产品、革新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方面。在今年头四个月内，全国已经试制成功很多种小型拖拉机，其中有几种能够通用于水田、旱地、山地和梯田，并且能够用作灌溉、发电、运输和农产品加工的动力。上海市在今年四个月试制成功的新产品达一千多种。太原钢厂采取了三槽出钢的新技术，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将近半倍。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原材料的节约，今年的工业生产成本，将有可能比去年降低百分之十左右，为国家节约十四亿元左右的资金。

今年的工业基本建设也已经形成了高潮。在今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程，将近一千项，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工建设的全部限额以上项目还多。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型的煤矿、电站、炼油厂、钢铁厂、有色金属矿、化学肥料厂、水泥厂、机械厂和农畜产品加工厂等，已经动工建设。

由于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基本建设，今年地方工业的产量将大大提高。以铁和钢来说，今年由地方企业生产的铁将达到一百七十三万吨（去年只五十九万三千吨），钢将达到一百四十一万吨（去年只七十九万吨）。地方工业的迅速发展，是今年工业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随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深入，今年工业基本建设的工程造价将大大降低。在许多情况下，用过去建设一个厂的资金，现在可以建设两个厂。例如，按设计的造价比较，过去建设一个年产一百万吨的钢铁厂，需要投资十亿元左右，现在只要用四亿多元；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氮肥厂，过去需要投资一亿三千万元，现在只要用六千万元。基本建设的施工时间也比过去大大缩短了。

去冬今春的农业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今年的工业新高潮；而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反

转来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

在农业方面，最突出的跃进是合作社农民的兴修水利运动。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全国扩大了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比解放以后八年内增加的灌溉面积总和还多八千万亩，比解放以前几千年间所达到的灌溉总面积还多一亿一千万亩。同时，又改造了低洼易涝耕地二亿多亩，改善了灌溉面积一亿四千万亩。控制了水土流失面积十六万平方公里。这些就是人民群众经过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社会生产力大解放之后，在农业方面所表现的征服自然界的威力。

在同一期间，全国农民积肥约三千一百亿担（包括各种肥料，主要是土肥和泥肥），平均每亩可施肥一万八千多斤，按肥效计算比积肥成绩很好的一九五六年还多两倍以上。许多地方还大规模地进行了改良土壤、平整土地的工作。

从今年一月到四月，全国造林二亿九千万余亩，等于过去八年造林总面积的一倍半。开发山区，开垦荒地，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等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很大的进展。

农业合作社的劳动组织已经进一步地改善。多数合作社男女全劳动力的出勤率，在去冬今春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全国各地农村中，正在广泛地展开着改良工具的群众运动。千百万农民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改良的和半机械化的农具、提水工具、运输工具、农产品加工工具，从而开始改变着几千年来的原始的手工劳动的状况，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各地的农民积极地、因地制宜地进行了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的改进。这是农村中伟大的技术革命的萌芽。

在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战线上，工作也都在跃进。新的纪录和新的创造不断地出现。

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也在迅速发展。全国很多农村都在积极地扫除文盲，大量地发展民办小学和民办中学。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也在迅速地发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已经在全国城乡展开，并且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事情是这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们精神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们精神的解放，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进；这种生产力的跃进，又继续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人们思想的前进。人们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们自己。

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末，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在这里，人们看见了：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怎样涌现出自己创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

二

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不但是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胜利发展的结果，而且是正确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反复说过：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进行得快些和好些，另一种方法是进行得慢些和差些。我们在二者之间将如何取舍呢？斗争是存在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关于这两种方法的斗争，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作已经在理论上解决了，而且经过一九五五年秋

季、冬季和一九五六年春季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在实际上解决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也有两种方法的斗争，去年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已经在理论上解决了，而且经过去年以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也已经在实际上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方法的斗争，直到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前，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的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党中央曾经批判了主张放慢建设速度的错误意见。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党中央认为，这个计划不但能够完成，而且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事实上，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季，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群众性的生产建设的高潮开始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常规"就已经必须冲破了。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口号，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速度。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同志接着把"序言"中所阐述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且指出了全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克服实际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以便把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它不但给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而且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同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要求全党注意正确处理：(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党内党外的是非关系；(十)国际关系。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其中的第一项和第五项，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原则，以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互相结合的原则。第二项和第三项，指出了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地集中资金在经济建设方面。第四项指出了必须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其他的几项，主要地是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在后来继续发展了的观点。这个报告的总的精神，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把一切可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方针和各种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的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这一年，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基本建设工作量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农业生产虽然遭到了严重的灾荒，仍然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九。这样，我们就在四年的时间内，在工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和交通运输等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在基本建设方面，也创造了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顺利条件。

在一九五六年的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主要是由于多招收了一部分新职工，某些人员的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了市场供应情况的某些紧张。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经过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增产节约运动，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但是不久，党就纠正了这个错误。在去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上，重申了坚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又重新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斗号召。党中央的这些正确的指导，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相结合，才又在更大的规模上产生了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跃进。曾经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表示怀疑的同志，许多人已经从这样一次反复中得到了教训；有些人却还没有得到教训，他们说："到秋后再同你们算帐。"让他们等着算帐吧，他们总是要输的。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他们迫切地要求摆脱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障碍。鉴于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获得胜利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及时地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使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不致在中途发生停顿，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不致因为革命的间断而冷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不致因为满足于既得的成就而生长起骄气和暮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时期以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还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夜，党中央就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地指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紧接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党中央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就指出了在农业方面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实现集体化的道路，并且在一九五三年向全国人民大规模地宣传了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和实行了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一切，都使革命不失时机地从一个阶段前进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胜利前进到另一个胜利。

提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这就是说，我们的不断发展的革命，现在又需要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党的这个及时的号召，迅速地受到了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热情的响应。事实上，人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在许多地方，征服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伟大的进军，已经轰轰烈烈、蓬蓬勃勃地开始了。

如上所说，在八年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已经在实践中一步又一步地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虽然这条路线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但是我们认为，它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可以确定下来了。

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这条总路线的要求，党和全国人民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在技术革命方面，主要的任务是：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

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

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积极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积极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将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发展起来，将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

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这样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必将大大增强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

有些人不认识提高建设速度的重要性，不赞成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提出了这样那样的反对意见。

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于紧张"，宁可慢一点好。但是，难道慢一点就不紧张么？要知道，六亿多人长期处在贫穷和缺少文化的状况下，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勉强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灾荒，不能迅速地制止可能的外来侵略，完全处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动地位，那才是一种可怕的紧张局面。为了摆脱那种局面，几万万人鼓起干劲，满怀信心地投入热烈的劳动和斗争中，这是我们应当双手欢迎的一种革命的常规。这种"紧张"完全没有什么可怕。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领导工人农民努力改进技术，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组织，来实现生产的跃进；必须注意使群众在生产高潮的发展中有必要的休整，使苦战和必要的休整结合起来，使生产建设有节奏地前进，并且注意安全。有几万万人发动起来的大运动中，也难免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生某些缺点，在向前发展的同时遇到某些困难，甚至是很大的不可预料的困难，这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的。但是团结起来了的广大人民决不会为这些缺点和困难所吓倒，一定能够及时地克服这些缺点和困难。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么？

有些人怀疑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当然，如果把多快好省这个统一的方针分割开来，只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或者只追求好省而忽视多快，必然会造成浪费。多和快是对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好和省是对质量和成本的要求，它们是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事实证明，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可以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潜在力量高度地发挥起来，可

以在整个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中造成最大的节约．反之，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限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潜在力量的发挥，就一定要造成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浩大的浪费。

有些人又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会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在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之间，造成不平衡．不平衡一定会有的，不实行这个方针，不平衡也会永远存在，因为任何平衡总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绝对的平衡是没有的．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需要保持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平衡，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作的任务。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去平衡，是使落后赶上先进，还是让先进迁就落后．要解决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积极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增辟财源；消极的方法是从片面的财政观点出发，限制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二年所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消极方法的错误，他说："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从抗日战争时期以来，我们历次的财政困难都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而顺利地解决了．由此可见，可怕的不是出现不平衡，而是对于不平衡惊慌失措，要求先进向落后看齐，要求削足适履、因噎废食．

因此，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提高建设速度，为什么工业和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呢？这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的大国，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大力地发展农业，这就是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对于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建筑材料，燃料，电力、运输工具等各种重工业产品以及各种轻工业产品提出巨大无比的要求，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大军发展粮食和各种副食品的生产，发展棉花和许多其他工业原料的生产，动员他们贡献无限的劳动，创造无限的财富，为国家的工业建设积累大量的资金，并且直接在农村发展小型工业．因此，大力发展农业，必将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有利于改善全国人民生活和巩固工农联盟．而如果没有农业的迅速发展．就不能有轻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就不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个真理，已经为过去八年特别是今年的事实所充分证明了．

有一些同志担心，发展农业虽然可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但是目前却首先要分散国家用在工业化上面的资金．前年和今年两次农业高潮证明这种忧虑是多余的．只要我们善于依靠五亿多农民这个伟大的力量，即使国家不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也可以使农业建设的规模大大地扩大．八年来国家为根治淮河，共投资十四亿五千万元，完成的工程总量为十六亿多土石方；而在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这半年的时间内，仅河南安徽两省，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劳动力和财力物力，就完成了一百二十亿土石方的工作量．

有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长．他们曾经引经据典，证明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慢慢的，并且是不能保证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浪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

济的发展速度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为了提高建设速度，为什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必须同时并举呢？发展工业生产既然是全国人民的普遍需要，这就必须执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彻底打破那种认为工业只能由少数人包办的神秘观点。只有中央和地方各级直至合作社一齐动手，并且在大中小企业方面实行分工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事情才能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举办一定数量的大企业是必要的。大企业的产量大，技术高，能够解决国民经济中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问题，并且成为带动全国工业发展的骨干。但是中小企业也有大企业所难以具备的优点：投资少，便于吸收分散的资金；建设时间短，投资效果发挥快；可以自己设计和供应设备，便于因陋就简地利用当地各种现成的设备；分布广，利于促进全国的工业化，促进全国技术力量的生长，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可以生产的品种多，改变产品也容易；接近原料和市场，可以灵活地利用资源，节约运输费用，供产销也易于结合；易于按照工作的多少而灵活地使用农村的劳动力和其他非专业的工人，因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首先注意了发展中央管理的工业和大型工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地方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是一个缺点。两年多以来，中央曾一再指出必须克服这缺点。在改进工业管理的体制和提倡中小型工业以后，各地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只要全国二十几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百八十多个专区、自治州，二千多个县、自治县，八万多个乡、镇，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七十多万个农业合作社，都能够在发展工业方面正确地充分地发挥积极性，那末，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各种工厂就会象星罗棋布那样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当然要比只靠中央管理的若干个大企业快得多。这样，前途必然是：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必然带来许多新的我们现在还难于预料的问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们所提倡的地方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化、分工协作的条件下的发展，而不是盲目的、自由竞争的发展。为了防止和减少可能的资源资金的浪费和产品的积压，中央和地方各级都必须认真地加强协作和平衡的工作，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同时，无论在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中，无论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那种片面地追求最新技术而不愿意充分利用一切现有的技术条件的倾向，反对那种片面地强调专家的作用而忽视工人农民革新生产技术的伟大作用的倾向。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同那种安于落后，不求进取的倾向，同样不利于建设事业的发展。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和发展。把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充分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把大型的事业和中小型的事业、提高的工作和普及的工作充分地结合起来，这一切，不但适用于工业，而且适用于其他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适用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整个事业。应当教育党和国家的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地全面地领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总路线，在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对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人员，应当着重地教育他们坚决执行联系实际、联系生产、联系群众的方针，以便有效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

三

党的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斗争。

如前所说，从去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如果陶醉于已有的成就，以为已经万事大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必须看到，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有一些单位、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们中间，整风运动进行得还不深不透。个别的单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还没有动，甚至还由右派分子或坏分子占领，群众的积极性还受着压制。在进行得比较深入的地方，群众提出来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也不是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领导机关必须深入检查，大力加强薄弱的环节，认真处理群众的意见，坚持把整改进行到底，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

整风运动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进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劳动中以及其他共同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改变人们的相互关系的前提。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下面，在国民党时代的经济组织中，不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互相敌视，在一般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一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反映着这种阶级间的对立状态。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这种对立状态基本上改变了，管理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同群众之间的互助合作的同志关系一般地开始建立起来了。但是，他们中间还有不少的人没有完全用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对待群众，还带有某种程度的国民党作风的残余，某种程度的官气。这就妨碍他们得到群众的充分信任，也妨碍一部分工人农民用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态度去对待社会主义的劳动。这些情况在整风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许多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中，管理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同群众之间的真正同志式的互相合作关系顺利地发展起来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充分地发挥起来了，这样，社会生产力也就进一步地得到了解放。

当前的任务，就是不但要在一切企业、一切合作社中间，而且要在一切机关、团体、学校中间，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认真地有系统地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消除其中旧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建立起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任何工作人员（首先是其中的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都必须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用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下级和群众，使群众感觉到你是他们自己的人，使他们感觉到你是把心交给了他们，就是说，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各级领导人员都必须深入下层，深入群众。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员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的制度，必须贯彻执行。

在人民解放军中，同样必须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它具有勤劳勇敢、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经过整风，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军队的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各级党委对军队的领导也加强了。整风运动的这些成果，应该认真地

巩固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注意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注意民兵工作，每年抓几次。这将大大有利于提高人民解放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利于巩固国防、解放台湾和维护和平的事业。

在完成了整改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和部队中的整风运动，即将进入第四阶段，即每人学习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间，每个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应当认真地研究党的路线和作风，总结这一次整风运动的收获，检查自己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缺点，进行相互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提高觉悟、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同群众的团结。在地方的县以上、在军队中营团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特别着重学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的整风运动，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他们中间深入整风的结果，将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巩固起来，在国家生活中继续起应有的作用，而各民主党派也就能够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当然，一次整风运动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矛盾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但要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一切旧制度，而且要彻底消灭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由这种旧制度所产生、为这种旧制度服务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要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说，要在人们的心理上最后地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一切残余。这是比在经济上消灭剥削阶级困难得多的任务，必须经过长期复杂的教育和斗争的过程才能解决。至于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例如正确同错误、先进同落后的矛盾，是永远会有的，需要不断地加以解决，并且不断地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前进。因此，认为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就可以一劳永逸、斗争不会再有曲折和反复的想法，无疑的是不正确的。在今后，应当使整风的方法，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成为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的经常的方法，并且应当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风运动，系统地处理当时所暴露出来的人民内部的以及其他性质的矛盾。

在任何情况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必须严格区别。只要是人民群众内部的思想问题，无论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或者是多数人对少数人，都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处理，而不应当采取强制压服的方法。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促进科学艺术事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方法，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方法，也是一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毒草既然是客观存在，不让它们以本来面目生长，它们也会以各种变形面目生长，暗地里毒害人群。不如公开对它们说：毒草是不合法的，长出来是要锄掉的，但是我们并不禁止你们长出来，有谁愿意出来斗争就出来吧。这个政策很见效，大批毒草猖狂进攻，被人民锄掉了。未被锄的仍然起来斗争，并不因为前车之复，后车就警戒了。凡未被锄的，今后一有机会，必然又会起来，那时又得再锄。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

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不能算数的。

在改进国家工作方面，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正确地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问题。如前所说，这是目前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使全国各方面的建设工作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也使中央各部门能够集中精力去办那些应当由自己负责办好的事情，这个原则早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来了。在实际工作中也已经开始执行，但是直到最近以前，还执行得很慢，很不彻底。根据今年春季党中央召集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讨论，在今后，原属国务院各部经营管理的企业，除了一些特殊的、主要的和试验性质的以外，原则上将一律交给地方经营管理。首先下放轻工业，然后再逐步下放重工业。其他经济事业和文教、政法等工作的管理权力也将同时下放。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省、市、自治区也要注意发挥专区、自治州和乡的积极性。

随着管理体质的改进，随着生产建设事业的跃进和群众觉悟的提高，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进现行的关于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工作的各种规章制度。整风的经验表明，现行的各种规章制度有许多是必要的、适当的；但是也有不少完全是多余的，甚至助长了浪费和保守，限制了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执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发动广大群众，根据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对现有的一切规章制度进行全面的审查，以便在充分听取和认真研究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有分析地加以处理。现行规章制度中必要的合理的部分，应当保存；不必要、不合理的部分，应当取消或者修改，或者另行拟定适合于当地情况和当前需要的新的规章制度，经过试验，加以推广。这是一项重大的工作，各地方各部门都必须拿出一定的时间和人力来进行，并且在改进规章制度的过程中具体解决那些当前存在的迫切问题，以便推动生产建设高潮的前进。

继续精简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机构，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改变这些方面的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当前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许多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企业中，在许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由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工作中的缺点而产生的机构臃肿、人员过多的情况，经过去年以来的精简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甚至还有一些职工领取工资而长期不做工作的现象。这种浪费劳动力、浪费资金和实际上侵占别人劳动成果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必须在改进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的同时，进一步精简机构，用各种办法合理地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随时把多余的职工调动到其他的劳动岗位上工作，力求不浪费一个工作日，并且使每一个多少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进行适当的生产或者其他有益的劳动。

在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无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都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便更多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关于工资、补贴、福利、奖金、价格、税收和利润等方面的政策，都必须合理地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工农生活水平、城乡生活水平之间，在不同工种、不同技术等级、不同地区的工资之间，一定的合理的差别是必要的，但是应当避免不合理的过大的距离。县和县以下的企业，对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问题，应当作出适合农村和半农村环境的规定，而不要搬用大城市大企业中现在实行的那一套办法。

整风运动和国家工作的改进，都是为着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使生产关系适

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这些工作的成果都应当直接间接地表现在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上，并且首先表现在今年的生产建设大跃进的胜利上。今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是苦战三年的第一年，也是争取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第一年。今年的成绩是对于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重大考验，大家都在看着这一年究竟怎样。因此，对于今年的工作必须努力抓紧，努力作好。在这里，重要的是领导真正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而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运动的后面。现在群众的热情很高，这是一切事业能够迅速向前发展的基本依靠，我们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但是领导者必须把革命的热情和务实的精神结合起来，不但要善于提出先进的指标，而且要善于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实现这个指标，切忌空喊和虚夸。我们提出的指标应当是经过努力可以作到的，不要把实在没有把握作到的东西轻易作为计划宣布，以免在不能实现的时候伤害群众的积极性，使得保守分子称快。要预先设想并且随时注意发现工作进行中的各种困难和缺点，既不加以夸大，也不加以抹煞，而是同群众一起千方百计地实事求是地努力加以克服。只要这样作，那么，除了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事故以外，我们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很大的成绩。

党的正确的领导是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必须成为各级政府的领导核心。在过去几年中，党的领导力量主要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今后也还必须继续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从现在起，已经可以而且必须集中更大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了。各级党委必须象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决地领导起来，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坚决地领导起来。在党外和党内存在着的那种认为党不能领导建设事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错误倾向，必须彻底纠正。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为了做好领导工作，必须真正懂得建设业务，懂得必要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全党干部都应当动手办"试验田"，这是一个政治和业务相结合、干部和群众相结合的好办法。当然，在注意技术和业务工作的时候，决不能忽略政治。我们既不要作不懂业务的空头政治家，也不能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红又专，这是全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前进道路，也是我们全党各级干部的前进道路。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永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在任何情况下，放弃或者忽略党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就会脱离群众，迷失方向。几年来，在建设事业的领导干部中间，一方面有不熟悉业务、不钻研业务的缺点，另一方面也有钻进了业务、却忽略了思想和政治的倾向。要知道，机器是要人来创造和发动的，物质资料生产是要经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事在人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伟大的动力。忽视这个伟大的动力，就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有人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既不能产生粮食，也不能产生煤和铁。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说法。试问：规定了和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提高了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群众鼓起了干劲，不是已经生产了更多的粮食，更多的煤和铁，而且还将生产得更多更多吗？

各级党委都应当注意党内党外的思想动向，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注意理论问题，认真研究党的路线和政策，坚决克服目前在许多地方许多部门中流行的那种只谈业务、不谈思想的庸俗风气。各级党委都应当注意报纸工作、学校工作、文化工作，并且把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队伍，看作是自己的重大的政治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全党同志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彻底反对教条主义和

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它们妨碍人们养成分析和总结经验的能力，使人们分不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因而容易在政治上犯错误。我们应当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获得生动活泼的发展。我们应当尊重群众的实践，尊重群众的革命性和创造性，这才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严肃的原则精神同生动的独创精神相结合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的国家曾经遭受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的压迫，造成许多方面的落后状态，现在虽然解放了，并在各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是不少人的精神状态还带着被压迫者的烙印，头脑里还装满了种种迷信、恐惧和自卑感。他们不是鼓足干劲，而是萎靡不振；不是力争上游，而是甘居下游。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战士应当彻底抛弃那种精神状态，提倡坚决相信真理、坚决依靠群众、对于任何权威都无所畏惧的崇高风格。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但是我们提倡的是实事求是的谦虚，决不是赞成妄自菲薄。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党同这六亿多人口结成了血肉的联系，依靠这个伟大的力量，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够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的。不错，这六亿多人口在经济上暂时还比较穷，在文化上还几乎是一张白纸，但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说来，这又算得什么呢？毛泽东同志说得好："除了别的特点以外，这六亿多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事实不正是如此吗？我们的六亿多人口在革命觉悟高涨和革命斗争胜利的速度方面，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经济文化发展的速度方面，也必须远远地超过它们。在历史上，永远是后来者居上，永远是暂时显得弱小的、代表进步方面的、新生的事物战胜那些表面上似乎强大的、代表保守方面的、趋向死亡的事物。我们必然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既然如此，我们难道还不应当相信自己，迅速同那些迷信、恐惧、自卑感等等宣告决裂吗？

我们的事业必然胜利，还由于我们有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兄弟般的援助，这是我们在国际方面的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我们将继续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继续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互助合作，并且同世界各国兄弟党在一起，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团结。我们坚决支持苏联的和平倡议，支持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努力，支持世界上一切反对侵略、维护主权、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支援着我们，我们的事业也支援着世界各国的人民。

同志们！让我们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强全党的团结和党同全国人民的团结，让我们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不断地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

阵营各国的团结以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谭震林

同志们！

我受中央的委托，就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向大会做如下说明：

（一）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冬季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期间提出来的。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和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于农业生产高潮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扩大农民的革命干劲，发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在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春，全国扩大灌溉面积一亿三千万亩，积肥五百多亿担。一九五六年，全国遭受了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比年成好的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一百五十亿斤。有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省，一九五六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的总产量，都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以上，有些县，这一年的粮、棉、油总产量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几十。

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春季，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建设事业采取促进态度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在一九五六年冬到一九五七年春，灌溉面积只扩大三千六百多万亩，积肥总量降至四百多亿担；一九五七年的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五千五百万亩。在仍然坚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地区，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却获得了显著的进展，并且出现了一批高额丰产的先进单位。这些事实，对于打破农业生产发展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一九五七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上，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又重新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党中央的这些正确的指示，同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所造成的群众积积性相结合，才又在更大规模上产生了去冬以来农业生产的新

高潮。曾经对于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发生怀疑的那些同志，有些人已从这样一次反复中得到了教训，有些人则仍在等待秋后算帐。让他们去等待罢，反正他们要算输的。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鼓舞之下，经过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全党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在全国人民当中，开展了共产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伟大的人民，不仅动手而且动脑，正在发挥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打破了右倾保守的障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

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底，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可改善灌溉面积一亿四千万亩，治理了低洼易涝的耕地两亿多亩，改造了瘠薄的耕地一亿多亩，植树造林二亿九千万亩，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十六万平方公里。积肥三千一百亿担，数量比第一次高潮的一九五六年多五倍，虽然主要是土肥和泥肥，但按肥效来说也增加了两倍以上。全国粮食播种面积预计将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八千万亩。

同时，在全国农村中开展了群众性的改良农具运动，农民创造和改良的各式农具，加工工具和运输工具，种类之多，数以万计，经各省选送到全国农具展览会的已有三千种以上。这种群众性的改良农具运动，是农村中伟大的技术革命的萌芽，随着工业的发展，将逐步实现农业耕作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目前各地夏收作物生长良好，丰收在望。广东、广西、江西的油菜已经收获，预计这三个省的油菜产量将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一般说来，夏收作物的收成比较稳定，增产潜力也很大，抓紧夏季丰收，提高夏收作物在全年收获中的比重，是争取农业大丰收的重要一环，这一点，已经引起各地重视。预计今年夏收作物的总产量可能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百亿斤左右。

综合各省规划，今年全国稻谷的播种面积将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亿一千多万亩，其中旱田改水田六千七百万亩，单季改双季四千四百万亩；薯类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六千四百万亩；玉米比去年增加二千三百万亩。高产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密植的比较普遍的采用，这些都是增加今年粮食产量的可靠条件。此外，九千万亩棉花的播种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有灌溉设施的棉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两千万亩，又有一千七百万亩棉田改用了岱字棉良种。

从夏收作物的生长情况和部分地区收获的实绩看，从春耕进行的情况看，从上述水利、肥料、改良农具、改良土壤和其他各项增产措施的实绩以及防治病虫害的农药农械等物资准备的情况看，今年的条件不仅是一九五七年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也大大超过第一个高潮一九五六年。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粮、棉、油等农产品一定会有较大比例的增长，例如，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上述情况说明，从一九五五年冬季以来，这三个冬春、三个年头的农业生产建设显示了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的过程。这种反复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它生动地教育了干部，教育了人民，使人们有所比较，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到：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必须艰苦奋斗，努力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是这条总路线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具体纲领。

（二）

自从一九五七年冬季开始农业新高潮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乡、社，都提出了提前实现和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按照各省（市、自治区）的规划，全国共有几百个县（市），计划在今年分别达到粮食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或者皮棉亩产一百斤。还有许多单位提出提前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绿化”和“四无”等口号。据据各地检查摸底的初步结果，计划粮食亩产实现“四、五、八”的县（市）和计划实现亩产百斤皮棉的县（市），大部分是工作基础较好，指标深入群众，措施比较切实，并且已经认真行动起来。但是，也有少数县（市），指标虽然先进，却还没有真正深入到生产队和社员，措施落后于指标，行动落后于措施。甚至还有的单位，指标也不够先进。必须抓紧时机，克服这些薄弱环节。

现在，各地提出的增产指标一般是积极的，问题在于切实抓紧具体措施。年终评比，看实际增产结果，就是一个考验。要注意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以免到秋后达不到指标要求。某些单位提出的增产指标，看来很高，似乎难以实现，但是从他们提出的措施看，实现指标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并且他们确确实实在那里认真地干，脚踏实地地干，他们并不是华而不实。但是无论是那一种情况，我们都必须考虑到客观条件方面出现不利因素的可能，例如发生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或者由于某些措施的客观条件不具备而落空。预先计算到这种可能，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使他们在不利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旺盛的干劲。总之，必须实行毛主席的指示：既鼓干劲，又留余地。

在“四无”、“绿化”、“机械化”、“水利化”等等问题上，同样要注意踏实，防止虚报和浮夸。在这些方面，现在我们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还需要经受考验。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现在有些地方打得看不见了，但是一到夏天，苍蝇、蚊子又会出来了一些，麻雀、老鼠也还会出现。这些东西繁殖是很快的，不是一个或几个“战役”就可以完全消灭的，而是要长期斗争，越打越少，以至基本消灭，并且还要继续斗争，才能把成绩巩固下来。绿化是要树栽下去，成活了，长了树冠，那才真叫绿化了。目前各地宣布的绿化只是绿化的第一步，还需要扶育成活，继续补栽加密，一直到成长得绿叶成荫，这是相当长期的工作。提出机械化的任务是必要的，必须继续督促城市工业为农业服务。可是机械还在试制，有的还没有完全定型，还没有大量生产出来。现在在农村中如果过多强调机械化，可能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等待机械化，而对于眼前见效最快的农具改良、半机械化和繁殖改良耕畜放松了努力，这也要注意。水利化，各地情况不同，现在所提的要求也不同。有的地方要求：“一次降雨二百公厘不形成水灾，五十天不降雨不形成旱灾”。有的要求比这个高，有的要求比这个还低些。总之，都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还是不能避免灾害，因此，现在各地提出的实现水利化，还只是第一步，还需要继续进行提高和巩固的工作。同时，还要看到：去冬今春兴修的水利工程，按工程应有的效益面积计算，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这是确实的；但是，由于动手兴修的时间是在去年种冬麦以后，在去年汛期以后，所以有些计划灌溉的耕地在麦收以前还不能平整，有些工程还没有蓄上水，还有的因为提水工具跟不上去，以致在今年汛期以前真正能够发挥灌溉效益的面积并不是三亿五千万亩的全部，而是其中的百分之五十、六十，秋后种麦则可以争取到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些。今年如此，以后兴修的工程也还是如此。此外，去冬今春所作的工程，也会有很少一部分质量不高，成

了废品，或者可能在汛期中经不起考验而冲垮。这些都是应该分析清楚和预先估计到的。同样，水土保持工程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是一做了工程，当年就可以把水土流失完全控制起来。其他的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在积极试验和推广中，也难免发生个别的毛病而带来局部的损失。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损失，比起由于右倾保守思想，客观能办到的事情也不去办而造成的损失，前者要少得多，后者要大得多。一九五五年冬季以来，三个冬春的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把上述这些问题预先恰当地讲清楚，对于保护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有好处，使他们早有精神准备，这就可以避免问题一旦发生的时候，精神毫无准备，垂头丧气，挫伤积极性；也可以防止再来一个反"冒进"的风波。

此外，还要估计到从今年起到一九六七年的十年之内，还可能出现两三个大水、大旱。在制定实现四十条纲要的规划的时候，应该把这种可能性估计在内。我们应该充分鼓励农民那种"气死龙王爷"的气概，人定胜天，与各种天灾做顽强斗争的精神；但是，在规划具体指标的时候，又必须充分估计到发生各种自然灾害的可能性。这就是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这就是要使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可能发生上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然而总的看来，已经获得大解放的社会生产力，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究竟提前几年，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乡、社，应当据据各自的条件定出不同的年限。现在已经有很多省、市、自治区提出规划，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或者稍多一两年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具有完全现实的可能性。我们相信，解放了的几亿农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定能够用他们自己的英雄劳动，创造出破天荒的纪录。

（三）

现在讲一讲对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一些新的主要的修改和补充。去年十月公布了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提交农业合作社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征求意见，到今年四月底止，总共收到各地方、各方面、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一千八百九十一条，综合整理为三百三十七条；又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比较集中的意见，综合整理为二百九十三条。根据这些意见，特别是根据从去冬以来的农业新高潮中的实践经验，对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又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这就是发给到会各位同志的第二次修正草案。其中，主要的修改和补充是：

第一，在生产指标方面，增加了发展油料作物的指标。这是符合于全面地、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的。从现在起，要大力发展油料，要把油料提高到和粮食、棉花一样重要的位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一倍到两倍。花生亩产达到三百斤到五百斤，油菜达到一百斤到三百斤，大豆达到二百斤到四百斤。这是完全可能做到，并且可能提前实现的。

在棉花亩产量指标方面，把"四十斤"删去了，重新恢复了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的草案的老样子；就是说，仍然要求棉花亩产量分别达到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皮棉的要求。这是因为一九五七年全国棉花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已经达到了亩产三十八斤皮棉，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棉田已经超过了亩产四十斤的指标；因而再提出四十斤作为奋斗目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张粮食亩产指标在八百斤以上和棉花亩产指标在一百斤皮棉以上，再提出更高一格的要求。我们认为，根据"既鼓干劲，又留余地"的原则，各省（市、自治

区）完全可以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制定提前和超额完成纲要规定的指标，全国的纲要可以不再提更高的要求。在纲要第二条中，把几种“除外地区”删掉了，而改为新的提法，即允许省（市、自治区）对于本省（市、自治区）境内自然条件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地区另定指标。在制定纲要的时候，我们还把可能发生的大水、大旱等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估计在内了。这样，使纲要所定的指标既是积极的，而又是灵活的，可靠的。

第二，在增产措施方面。主要是把密植单独写成一条，而把水利和水土保持合并成一条。同时补充和修改了关于水利、肥料、土壤和机械化等条款。各地增产的经验证明，除了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和推广良种以外，按照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土壤、水利、肥料等条件，实行不同程度的适当密植，是提高单位产量的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但是这也同其他先进的增产措施一样，常常遭到保守落后思想的抵抗。现在，在四十条纲要里面把它单独写成一条，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密植这项措施的实行。

水利，着重讲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方针。肥料，提高了养猪指标和化学肥料的增产指标。改良土壤，比过去的条文写得更具体了一些，特别强调了低产地区的土地改造和土地深翻。机械化、电气化一条也重新改写了，反映了当前伟大的群众性的农具改良运动，反映了发展地方小型工业和依靠合作社的资金积累来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可能性，强调了农具改良运动的现实意义，也说明了由农业技术革命的这种萌芽逐步过渡到农业耕作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此外，关于多种高产作物方面，提高了稻谷播种面积的指标，又着重强调了薯类。这些补充和修改都是最近半年多以来农业新高潮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第三，纲要修正草案第三十一条，“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条也有比较重要的修改。重新提出了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增加了关于在农村中兴办农业中学和提倡勤工俭学等内容，也提到了开展农村体育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条款做了某些补充、修改和次序的变动，以及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在这里不一一解释了。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五的大国，可以说，没有我国农业的发展，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化。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一九五五年冬、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季以来的两次生产高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农业的高潮对于工业高潮起了推动作用，完全证实了迅速地发展农业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当然，同时也应该看到，国家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业的迅速发展反过来也就必然推动农业更迅速的发展。工业上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赶上英国，农业上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正如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这样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必将大大增强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互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保障。”

建议大会基本上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并且号召全党同志和全体农民一起，和全国人民一起，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
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以后，一致同意这个报告。会议认为，党中央在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是正确的，党中央所领导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在继续完成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这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经胜利结束了。这次大会是整风的大会，是大跃进的大会，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这次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在继续完成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这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次大会的另一个内容是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

斯科会议的决议。决议完全支持莫斯科宣言，并且指出："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是我们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神圣义务。"大会还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今年的实行情况再作必要的修改，提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同五亿农民一起和全国人民一起，为提前实现这个纲要而努力。

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结果。如果说，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是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那末，第二次会议主要是总结了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且提出和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由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党已经有可能把主要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而我国的建设工作也已经有了八年的历史，特别是在最近三年中取得了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这样一个马鞍形发展的教训。经过这次大会，党和人民获得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的锐利武器，这对于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无疑将产生伟大的作用。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确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迫切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和对于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在我们的国家里，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究竟要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呢？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些好些呢？在有些人看来，我国建设只能慢些、差些，不能快些、好些。他们有种种理由：什么人口太多啦，经济文化太落后啦，农业长不上来啦，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啦，外国的速度也只有那样高啦，如此等等。这些人跟资产阶级右派不同，他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是他们的精神不够振作，反映了由于我们民族长期被压迫而遗留下来的自卑心理。他们只觉得自己矮得很，别人才是丈二金刚。他们不知道，解放了的、觉悟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多人口，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力量，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有最多的资金和最大的技术力量，就能够有工业和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在伟大的中国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面前，什么美国英国，什么帝国主义阵营，真正不过是一些侏儒罢了。我国的经济文化还很落后，但是正因为这样，我国人民对于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特别巨大。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对于尽早摆脱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迫切要求，表现了我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和势如破竹的气概。我们党深信，只要鼓足六亿多人民的干劲，动员六亿多人民力争上游，我们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设，一定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人们看到，正是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欧美所有经济发达、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我国在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方面不能同样远远地超过它们呢？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反对骄傲自大，但是自卑和自大同样是我们所必须抛弃的低级趣味。目前我国广大群众在全民整风和建设高潮中，已经表现出一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高尚风格。我们应该发扬这种共产主义的风格，使之成为全党的风格，全民族的风格。这是实现总路线的关键。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既然是相信群众的力量和反映群众的意志，那

末，实现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方法，也必然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我们的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群众。总路线规定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就是为了发挥五亿农民的积极性，为工业提供最大的市场，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原料。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就是为了使全国二十几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百八十多个专区、二千多个县、八万多个乡、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和七十多万个农业合作社，都能够充分发挥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使企业更加接近群众，更加便于充分地发掘群众的潜力。党所号召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必须是群众性的运动。而整风运动的深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的普及，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的克服，在领导工作中种试验田、跟班劳动、参观评比、抓两头带中间等项方法的推广，这些都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目前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跃进，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农具改良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蓬勃发展，扫盲运动、民办中小学、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成效显著，都有力地证明了，由于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已经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再教导我们，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如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是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和发展。在一切工作中运用这个路线，一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在党的路线已经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目前，全民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内的团结和全民团结已经大大增强，各项建设事业都处在跃进的高潮中。这一切都是使人高兴的。但是这决不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已经没有缺点、没有困难了，总路线的实现已经不会再有曲折，不再需要艰苦的奋斗了。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同时又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我们必须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缺点和困难，还要预计到一切可能发生的困难，预计到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总路线要求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这个伟大的理想变为现实，还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付出严重的努力。全党干部必须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顽强地学习：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我们必须学会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严肃的原则精神同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相结合。我们全党同志应当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便胜利地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原载《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

中央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通知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一）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任务和方法，中央在四月二日的指示中已有规定。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应即抓紧时间进行第四阶段的整风学习，务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除有特殊情况必须继续进行整风者外）在本年七月底以前胜利地结束这一次的整风运动。

（二）在整风第四阶段党员干部的学习文件规定如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第二、三两部分）

工作方法六十条（凡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学矛盾论）

学习这些文件的目的，是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站稳阶级立场，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改进工作作风，并且根据这些文件（结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讲话的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时间短，着重自我检查，所以这些文件的学习不能也不应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整风结束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另行规定较长时间的学习计划。

（三）现在有些单位已在开检查业务方针和思想作风的会议，这些单位的整风第四阶段的任务应即结合这些会议去完成，避免重复。

（四）在机关非党工作人员、一般职工、部队战士、学校学生和其他群众中的整风状况，各地应立即进行一次检查排队。在基本上完成了整风任务的单位，应该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总路线的教育，随后宣告这一次整风的完成。在整风结束时，各单位应向群众总结这次整风运动的收获，对于某些尚未解决的遗留问题（这种问题一定是有的，因为一次整风运动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说明处理办法，并在整风结束后积极予以处理。但是许多地方还有一些空白点，那里的整风任务基本上没有完成，群众还没有发动，敌我矛盾还没有解决，甚至根本没有进行整风（据重庆市复查结果，这种单位约占四分之一，有的还占三分之一）。对于这些单位必须迅速抽调力量，加强领导，认真实行鸣放反右整改，达到消灭空白点的目的。农村中的整风或者即行结束，或者如四月二日指示所说的待整党整团整社后再结束，由各省、市、自治区自定。但是一切没有进行整党整团整社的地方，一定要在今年秋后整一次。

力争高速度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我国的工业、农业和整个建设事业都在以高速度前进。

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象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也许有人想：快一些慢一些，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吗？它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呀！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是的，争速度就是抢时间。但是这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方针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根本上就是由于它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束缚下面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力能够最迅速地向前发展，能够不发生停顿和危机地向前发展。在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我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把我国的全部国民经济都转移到现代化大生产的轨道上去，迅速而彻底地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贫困和落后，使我国成为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才能最终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国际看更是这样。

因此，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

那末我们究竟能不能高速度发展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有加快建设的充分条件。1.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各式各样的无穷无尽的宝藏；2.解放了的六亿几千万人民；3.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4.再加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援助；5.可以运用苏联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因此可以说，快马加鞭日进千里的条件是很好的。

加快建设速度的条件是客观的存在，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三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呈现出一个前高、中低、后更高的马鞍形。这个马鞍形，充分说明了党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正确的方针的重要性。尽管客观条件前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主观努力程度的不同，却可以使中国成为两个样子：一个是轰轰烈烈，一个（比较地说）是冷冷清清。

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有非常伟大的作用，但是要有一把钥匙去开动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这把能够开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钥匙。要求快，

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当前的形势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当大家都想快、要快、力争快的时候，事情的进展果然就快了。今年5月份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6%；夏收粮食预计将比去年夏收增产三百亿斤左右，即增加二分之一左右。对于中国工农业能够高速度发展的怀疑论，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不能不高速度地破产了！

"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快了就能够"多"，这不用说。快和好省在某种条件下虽然会互相矛盾，而在根本上却也互相促进的。为了快，就必须动员起来力争上游，敢想敢干敢独创。于是，千千万万又好又省的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就出来了，一系列又好又省的政策也就出来了。没有快的需要，它们怎么会出来呢？就是出来，又怎么会受到人们的赏识和支持呢？

政策决定于方针。有了快的方针，才会有快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必须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政策。多快而不好省的政策，人民固然不需要，国力也不许可。比方说，我们不能安于只有几百万吨钢，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期内，把钢铁的产量提高到几千万吨。当我们的思想上有了这种武装、敢于这样设想、决心这样干以后，我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被动员起来了。我们就不得不探求既多快而又好省地发展钢铁工业的道路，因为别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就坚决执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的政策。而这样一来，局面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投资减一半，产量加一倍"的要求实现了；产铁二千万吨的一万多座中小型高炉，产钢一千万吨的二百座中小型转炉，在今后一年内就将陆续建成和投入生产了。

可是回想一下吧，当我们不进入提高速度的动员状态，而只是按老规矩踏步子，左顾右盼，一步三摇的时候，事情是怎么一个样子呢？机器不发动起来，什么力量都没有。其结果，不单是速度不快，而且是人民的精神不振，意气消沉。在那种松懈的空气下，人们习惯于一切按常规办事，干劲被压抑着，群众虽有大智大勇而无出头之日。在斗争的世界中，譬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安居中游是不可能的。有了好的条件，也要人去利用，去发展。常言说得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不经常磨炼，好铁也会生锈。不鼓足干劲，不力争上游，善跑的兔子也会因为半路睡大觉而落在乌龟的后面。同样，如果我们精神上不紧张起来，不坚持不断革命的方针，我们的任何有利条件也不会自动地起作用。而且，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积极的因素不发展，消极的因素就必然发展。这样，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会复杂化和尖锐化，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以至堕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的种种邪门外道，就必然乘虚而入。

由此可见，快和慢确实会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子，快或者慢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国家的和每个人的命运，关系到全国的政治空气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加快，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如果我们是个小国，我们前进得快一些，或者慢一些，对世界形势还不会发生什么重大影响。然而我们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的速度，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的和平力量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如果我们是唯一的和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不得不在摸索中前进，那末事情进行得慢一些也还情有可原。然而现在我们有苏联的四十年经验可以借鉴，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般的援助，我们自己也已经有了八年建设的基础。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还不努力地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就是毫无道理的了。

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应当不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据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让我们统一认识，统一步伐，同心同德，对着无限光明的未来前进，高速度地前进！

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

（一九五八年六月）

在三年到五年内，要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二千斤．这是在华东区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提出的令人振奋的奋斗目标．

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共开了七天，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四省一市掌管农业的书记和农业、水利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也参加了会议．

根据会议汇报，今年夏收作物虽然在去年秋种时遇到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旱，接着又连续遭受到严重的冻、风、雹、虫、病等灾害。但由于各地加强了对作物的后期管理，战胜了各种灾害，仍然获得空前未有的大丰收。四省一市今年小麦比去年增产七十三点五亿斤，即增长百分之五十七。油菜也比去年增产了三百一十七万担，即增长百分之七十六点二。

会议认为今年三麦（大麦、小麦、元麦）、油菜、蚕豆和豌豆等都出现了高额丰产，增产的潜力都很大，所以提高夏收作物比重，是今后农业增产的一项具有战略性的任务。据粗略估计，华东地区尚有冬闲田八千多万亩，可以用来发展夏收作物。到会各省市准备把明年的夏收粮食作物和油菜的种植面积扩大一千五百多万亩，并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会议研究了今明两年的粮食生产指标，各省市对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平均每人一千斤到一千五百斤都满怀信心，并且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二千斤是完全可能的。

会议强调指出，要在最短期间内完成上述粮食增产的伟大任务，必须继续大兴水利、多多积肥、改良土壤、选用良种、实行密植、加强田间管理、消灭病虫害和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工具改革运动．

在水利方面，会议要求今冬明春在长江以南已基本水利化的地区，继续做好扫尾工程，进一步巩固提高。在长江以北平原地区，主要任务是实现河网化，做到河河相通，沟沟相连，河沟塘连成一起。会议对丘陵和山区的水利工作也进行了研究。

肥料方面，会议认为仍应依靠农家肥料为主，发动群众天天积肥．叫海肥登陆，让山肥下山．把明年的积肥量再增加一倍以上，质量也要提高，达到每亩平均施肥二千二百担．安徽省采取“烧、熏、挖、换、扫、铲、沤、堆、拾、捞”的多种多样的积肥办法，可以推广。同时，各地到明年要做到社社大办土化肥厂，要有二分之一的县市办起“洋”化肥厂和细菌肥料厂。

深翻土地和改良土壤是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明年秋前，要把全部耕地都深翻（或加工）一次，深度达到一尺到二尺，并采取换土、掺土、施肥等办法，改良土壤。

明年要实现农作物的良种化，并且要求普遍推行密植。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的各种病虫害，并在今明两年内做出显著成绩来。

会议认为，江苏、安徽等地创造的"任务到队，专业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插标验收"办法，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重要经验，决定大力推广。各省市还要求把农作物"从耕到播、从播到青、从青到黄、从黄到场、从场到仓"等一系列的管理工作，都要认真细致地做好。

会议认为，必须立即改变目前有些地方在工具改革中只创造不推广，只推广不使用的现象。要求今年内完成推广改良农具的任务，明年全部使用改良农具。要求所有改良工具的工效至少比原有工具提高两倍。

这次会议还对发展棉花、油料、蚕桑、林业、水产、畜牧和开展群众性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等问题，交换了情况和经验，并研究了发展指标。

会议认为，今年大秋粮食作物的总产量将占全年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六，所以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争取今年大秋作物丰收，是今年全面增产的关键。经过研究，一致认为争取大秋丰收必须抓紧下列八项工作：一、抗旱抢种，完成夏种、秋种；二、加强田间管理，适时灌溉、追肥、中耕、锄草、培土等，随时消灭三类苗；三、坚决战胜水、旱和台风灾害，乡乡社社自制农药、农械，消灭病虫；四、发动群众积造速效性肥料；五、大搞工具改革；六、实行分工分业，改善劳动组织；七、组织耕牛站，保证及时耕种；八、组织乡乡社社大协作，城市支援农村。

会议认为必须继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结合总路线的进一步深入宣传，把粮食生产逐步提高到每人平均有一千五百斤和二千斤的奋斗目标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鼓起更大的干劲，推动生产飞跃前进。会议并认为不能放松对农村各种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要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广大农民的干劲持续不懈。

会议最后由谭震林同志作了总结发言。

（1958年6月28日《今日新闻》）

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陈　伯　达

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

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些是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建议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包含的几个要点。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在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尤其是在充分地激发地方首创精神、群众首创精神方面，这些要点带有非常伟大的革命意义。

从去年秋冬以来，在农村兴修水利和积肥的运动中，地方的、群众的高度首创精神的威力业已表现出来了。现在在地方建设中小工业的运动中，又再次表现出这种高度首创精神的威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今年各级地方单位和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工建设的各种中小工矿企业共八十多万个。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1)其中在明年六月前可以建成的小高炉有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座，可以增加炼铁能力二千万吨；(2)其中在明年六月前可以建成的小型转炉有二百多座，可以增加炼钢能力一千万吨，相当于鞍钢现有炼钢能力的三倍；(3)其中兴建的中小型有色金属开采企业有一千四百多个，它们在建成以后，就铜和铝的产量来说，都将超过一九五七年全国的水平。……如此等等。

这样看来，只要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地方计划的中小工业的发展规模，有不少部门，将赶上甚至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全国规模。有些工业部门原来打算要等到一九六二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候才能够达到的产量，由于地方中小工业的大量发展，在今年就有可能达到了。

在农业方面，大体也已经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今年一些主要农作物的收获量，也将达到或接近以前拟议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的产量。

所有上述这些，就是在充分发挥地方首创精神、群众首创精神的条件下，我国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面貌。

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只要想想工农大众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正在以千百万倍的“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创造出许多劳动的新奇迹，想想各地方蕴藏着的无穷潜力，那末，我们便可以相信，前面所说的可能性一定会变成现实性。

总路线和它所包含的几个要点，彻底地解决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普遍高涨和高速度发展的问题，从而也在不断地革新整个的社会。

本刊这一期发表湖北鄂城县委会的《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和《旭光一社是怎样领导和管理小小工厂的》两篇通讯。两篇通讯所叙述的，都是一个合作社中的新鲜事件。前一篇通讯主要叙述这一合作社怎样兴办了一系列的“小小工厂”，而又因此促进农业的发展；后一篇通讯主要叙述它怎样把农业管理工作同工业管理工作统一起来。这一个合作社的情况，是高度发扬地方首创精神和群众首创精神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典型，在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普遍高涨的一个缩影。所说的“这些小工厂办得快、生产快、收效大”，恰好说明地方的、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迅速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斗争中所将起的作用。通过这两篇通讯，我们看到在大跃进中的中国，看到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里的群众几乎全是一批生龙活虎般的、具有冲天意志的英雄好汉。他们敢想，敢说，敢做；而做起来，又善于倾听大家的意见，脚踏实地，合情合理，有条不紊。一句话，有理想，又有办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他们正在原来那个空白点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这一个合作社采取的做法，大体有如下所列：

（1）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2）办工业的目的，是为着满足整个合作社的需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而不是为着赚钱。

（3）因陋就简，开始只办小型的厂子，以后再逐渐扩大。

（4）发展了一种所谓"万能人"的运动，亦工亦农。社员们既要学会农业全套技术，又要学会工业几项技术。"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

（5）边干边学，到处"取经"。先求懂得一些普通的科学技术知识，再求逐步提高。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结合。

（6）管理人员要学会管理，又要学技术，是干部也是工人。

（7）除了个别的特殊情况以外，工业和农业的工作都是记工分。一般是：工厂工分不能过高于农业，也不能低于农业，但又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工作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8）工业和农业的工作时间一样，如果晚上加班，就采取累进记分的办法，以资奖励。

（9）根据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原则，小工厂有常年奋斗的计划，又有分段执行的计划。

可以不可以说，这个合作社的所作所为，在实际上是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区别以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出顺利条件的一种正确道路呢？我想，完全可以这末说。

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著作里面，认为在彻底废除私有制后，"超出社会最近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灾难，而且将保证满足一切公民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由整个社会按照计划和为了公共的利益而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教育可使年青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这已由于物质的原因而成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恩格斯当时所说的，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而提出的理想。可以不可以说，在我们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照耀下，旭光一社是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逐步地实现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这样的理想呢？我想，完全可以这末说。

两篇通讯的题目，都很谦逊地写着"小小工厂"的字样。但是，这类同农业相结合的合作社的"小小工厂"，却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是不可抵抗的、新生的、前进的力量，是共产主义的力量。

（原载《红旗》1958年第3期）

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

——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演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陈 伯 达

七月一日是我们的党的生日。党从建立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七个周年。这是中国人民和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经历曲折道路，而获得一系列伟大胜利的三十七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三十七年的时间不算很长，可是，人们看到，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中国人民已经在自己的大地上实现了翻天复地的变革，并且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全国解放八年来造成的生产力，在某些方面说来，大大地超过了过去几千年造成的生产力。这还只是我国生产力解冻的开始。可以预卜，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今后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加一日千里地显出新的面貌。

党的领导的成就，非常显著。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政党，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样的党同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不论在革命方面或建设方面，都会不断地创造出使庸人目瞪口呆的奇迹。特别是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六亿劳动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量日新月异的新事物的出现，乃是不可避免的，也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全部料到的。

几千年来被压迫阶级早已有过消灭人剥削人、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幸福生活的原始共产主义幻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了多少次农民战争，其中许多英雄人物，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有福共享、有祸同当"的社会。但是，不论奴隶暴动也罢，农民战争也罢，由于当时没有近代的大工业生产，没有近代的工人阶级，人们不可能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幻想变为社会的现实。

高举科学共产主义旗帜的，是近代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的是列宁。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和人类知识的成果，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的制度必将死亡，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必将起而代之。我们的党就是用这个共产主义科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的。这个伟大的革命科学的正确性和它的无敌的力量，一天一天地继续为世界各国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也完全为我国的经验所证明。帝国主义者恨透了它，咒骂着它，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附和帝国主义的咒骂，而又极端卑鄙地加以各种歪曲，这些都不能丝毫有损于它的光辉。中国古代有人说得好："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给我们指出斗争的一般方向，给我们提出斗争的一般指导原

理，而不可能给全世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开一张能够医治百病的药方，说是吃了这个药方，病就好了，革命就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他们不可能把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给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规定一个详细的方案，好让别人照章办事，坐享其成。列宁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也不能够向他提出这种要求。

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我们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但是，革命必须依靠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做，因此，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们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去指导本国革命的时候，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对于本国的具体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不能这样说，有了马克思，有了列宁，就可以把自己的脑子封闭起来。恰恰相反，忠实于革命辩证法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经常要求工人阶级的战士们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深思熟虑，分别看待各种具体的事实；要善于用批判的态度去检查别国的经验；要认真地总结斗争的新经验，解决历史提出的新任务。总之，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应当根据生活，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

修正主义者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指导原理，因而堕入叛徒的泥坑；教条主义者看不见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因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要求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任务。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旗手，就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而且随着革命斗争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解决这样的任务，从而引导中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进到又一个胜利。

能不能说，在这个原来经济很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解决这样的任务是一件很容易或很平常的事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只要回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向东方共产主义者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复杂任务，是过去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遇到过的，而解决这样的任务，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说来，又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列宁是这样说的：

> “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
>
> “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方那些经常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

列宁这番话是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是对当时俄国境内东部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而说的。但是，这些话的内容，在实际上超越了苏联的境界。在苏联境外的东方各国情况差不多都同样，即农民是主要的群众。因此，列宁所提出的任务——按照他所说，叫做“极其巨大的任务”——在实际上同样地摆在东方各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毛泽东同志勇敢地而且非常杰出地在中国革命中解决了这样极其巨大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善于考察和探索中国的各种特点，而毫不受公式主义的束缚。不是从公式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结合起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普通群众的智慧，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环境中，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百战百胜的威力。

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中，在为争取中国两个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同那种从右方面来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那种从"左"方面来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激烈的斗争。他胜利了，因为真理在他这边，因为他提出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提出了符合中国人民利益而不断地鼓舞中国人民前进的宏伟理想。

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正确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的任务，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在同各式各样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那末，也就没有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所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现在我在这里就若干对于整个中国人民的事业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来说一说。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首要的、特出的贡献，就是他分析中国的具体条件，认为必须在乡村中建设和发展革命的根据地，把乡村革命根据地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联盟的主要形式，并且把这样的根据地看成是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出发点。过去有许多人按照西方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一系列的经验，按照中国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经验，造成了一种认为革命起义总是要从大城市开始的观念，而人们通常总以为游击战争只是正规战争的附属或补充。毛泽东同志推翻了这些不适用于中国革命条件的老观念，提出了以革命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新观念，提出了把游击战争放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的新观念，提出了在革命中经过游击战争把全民武装起来的新观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新观念使党的领导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得到新的斗争方向；随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发展了和丰富了这些观念，而终于使中国人民和我们的党能够在一九四九年赢得全国的胜利。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由农民个体所有制过渡到合作所有制、由资本家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一系列的带根本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在革命根据地时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总结了农民群众劳动互助组织的经验，看出这类互助组织已经存在了社会主义的萌芽，看出这类互助组织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以推广。全国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总结这类新经验，而当全国的土地改革结束不久，就提出必须以贫农和下中农为核心，按照自愿的原则，在农民中普遍发展临时互助组以至常年互助组，并在互助组的基础上，逐步地和大量地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土地入股、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认为这种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完全社会主义化的主要过渡形式，并从而打破了原来一些同志认为没有农业机械化就很难实现农业大规模合作化的老观念。关于资本家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区别了官僚资本家所有制和民族资本家所有制。对于前者，在解放时就已经采用没收的办法；对于后者，则采用逐步改造办法和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主义的企业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总之，不论在农业手工业方面或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是结合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革命，都是大量地，而且普遍地推广多样性的过渡形式和过渡办法，并且因此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极其迅速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打破了我们中间一些同志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就是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老观念，而认为除了解决所有制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外，还必须进一步地、彻底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否则，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还是不巩固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进行猖狂的反革命进攻，人民内部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点。当人民群众全面地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之后，当人民内部经过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全面地分清大是大非之后，就出现了全民性的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还在江西根据地时代，毛泽东同志即已提出了又革命又建设的正确方针。在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继续坚持了这种方针。特别是随着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之后，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大大地壮大了解放区人民的物质力量，准备了在解放战争中消灭蒋介石反革命军队的物质基础。在经济、财政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总是把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批判了那种单纯依靠行政而脱离发展生产轨道的片面财政观点、片面分配观点的错误。

全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交错着前进的。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特别是从农业合作化方面所开始的种种迹象来看，指出了中国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力的浩大的、无穷无尽的潜在力量。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篇按语中这样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因此，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解决后，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整个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的问题，是"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于是概括地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总方针、总路线。而为着实现这样一个总方针、总路线，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脑子里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似乎以为这里已经不存在什么矛盾，特别是在人民内部，更似乎以为不存在什么矛盾，而任务很简单，那只是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地"发展生产力"。在革命时代，他们承认群众路线是需要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们觉得似乎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只要搞"业务"，有专家，有设备，也就行了，做得通了。只注意技术，不注意政治挂帅；只注意干部，不注意群众；只注意中央，不注意地方；只注意重点（提高）建设，忽视普及建设；只注意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只注意大企业，忽视中小企业；只要求最新的技术，忽视群众性的似乎"平凡"的技术革命。特别是有一种很不利于建设前进的、很有害的右倾观点，只简单地在财政问题上打圈子，而忽视群众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似乎以为不是生产支配消费、分配和交换，而是消费、分配和交换支配着生产。这类有害的右倾观点，在实质上成为一九五六年冬季所谓"反冒进"思想的出发点。

毛泽东同志推翻了前面所述的一堆错误观念，指出这堆错误观念只能起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新的深刻的观念。他把社会中的矛

盾区别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为敌我的矛盾，属于对抗性的矛盾；一种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他认为，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矛盾随时都是有的。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出来。问题是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出路不同。在我国现在，国外有敌视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国内还有反革命残余，还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这些都是敌我矛盾；但人民内部已经出现新的矛盾，这是我国人民在前进中的矛盾。在我国过渡时期中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上，是敌我矛盾；表现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在劳动人民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上，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的，只能把资本主义制度引向灭亡；而社会主义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逐步解决，从而把社会的发展引向繁荣的新阶段，引向共产主义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即整风的方法。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在这里，可以经过大辩论和适当调整关系，随时解决新出现的矛盾，达到新的团结，来推动生产力的前进。比如，前面所说的政治和技术，干部和群众，中央和地方，提高和普及，重工业和农业及轻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最新的技术和改良的技术，如此等等，这一系列的关系，都是现在人民内部所存在的一定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只要一方面，而放弃另一方面，这是片面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至于有的同志甚至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而只抓支流，例如放弃"政治挂帅"而单纯地去抓业务，不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单纯地去依靠行政的命令和各种不切合实际的规章制度，这些更不用说是很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不只是创造性地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实现总路线的几个基本点：即，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几个"同时"，几个"并举"，就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主要总结。这是一个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提纲。提起了这样一个纲，也就使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由于党提出的这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起了总路线几个基本点的这样一个纲，群众的、地方的和中央各部门的各种首创精神也就都发挥起来了。去冬以来，中国生产力的大跃进，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便潜伏着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客观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例如在一九五七年），而一经过毛泽东思想的启发，这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的形势，就形成起来了。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一掌握群众，就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目前中国大跃进的形势，最突出地说明了这点。毛泽东同志上述的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为群众所掌握，也就成为群众大力开辟生产力发展道路的武器。

在这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形势中，跟着就产生着许许多多新鲜的事物。这许多新鲜事物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

到现在为止，在出现的许多新事物中，有两件很有意义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新事物：第一，是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第二，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

现在不但县县办工业，而且乡乡社社也在办工业。总的口号叫做“全民办工业”。这样也就在逐步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在封建时代，存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资本主义把农业和工业分裂了，而且使城乡资本家剥削乡村以自肥；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农村中开始形成没有人剥削人制度的新农业和新工业的结合。很多工厂虽然是叫做“用土办法”办起来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土办法”将来会变成“洋办法”。初级的东西将来会变成高级的东西。现在因陋就简，但开始有个底子，前途未可限量。依靠群众对于技术的革新和创造的冲天气概，人们可以看得见，这类用“土办法”办起的“小小工厂”，就会逐步变成现代最新式的工业。县县如此，乡乡社社如此，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数量变成质量。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二次会议的报告所说的：“……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各种工厂就会象星罗棋布那样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当然要比只靠中央管理的若干个大企业快得多。这样，前途必然是：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随着国民经济普遍高涨而来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一般知识分子求知欲望的普遍高涨。现在全国文化教育的情况，正在开始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工农要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这样的伟大方向前进。

为了适应工农业大跃进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需要，不但要消灭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乡乡办中学，而且有些县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综合性的或专业的高等学校，甚至有的农业合作社也办起业余大学来。河南孟津县平乐乡翟泉农业社是全国合作社创办业余大学的开路先锋。据报载，这所业余大学设立十七个系，有学生五百一十九人。“他们的学习特点是教育和生产密切结合。在课堂内，学习书本知识，掌握理论；到田间以作物为教材，进行实地操作试验。”这个新型的业余大学对于该社的农业生产已经开始作了有益的贡献。各地工人群众正在努力提高文化，学习科学，力争攀登世界技术的高峰，并且在短期间内，开始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许多城市里的工厂已经办了各种学校。例如，太原钢铁厂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职工文化教育机构，其中包括一个正规的钢铁学院，参加各级学校学习的职工有一万人。最近北京、太原、重庆等地的工人们正在冲破“通不能专，专不能通”的思想束缚，力争通晓多种技术，要求成为又红又专又通的共产主义式的工人。由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开始，一些地方的工人正在出现学哲学的热潮。他们在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天津的工人说：“咱光有技术，摆不出道理来，好多事都办不了”。这就在高度的原则上说出他们学习的目的。在河南登封县三官庙，群众有这样的评论：“乡干部学习哲学后，出现了三大新气象：调查研究多了；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少了；依靠群众的观点加强了。”这就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将逐步成为启发一般劳动群众的智慧的钥匙。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党中央在学校中开始推行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业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校除了组织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参加生产劳动之外，并且还由师生合作，白手成家，在学校中搞起大小不等的多样性的工厂或农场。由于教学和生产的实际相结合，课堂的功课和现场的操作相结合，又是读书人或教师，又是生产劳动者，就使得他们的智慧很快地开了花，结了果。教学的质量提高了，同时还创造了不少先进的、甚至已有一些赶上或超

过国际水平的生产品。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认为又做工又读书的制度，会降低教学质量水平或浪费学生时间的说法，在事实面前，业已完全破产。应该了解，按照传统的学校制度，一个人如果从小学读起到大学毕业，总共就会花费十六七年的时间，脱离劳动群众，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这种教学制度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产物，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应该有一套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即应该是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而不是使二者彼此脱离；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成为多方面有能力的人，而不是使受教育者为片面的发展所局限，成为死背书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现在党中央正在继续研究制定一套适合于我国条件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但是实际的模范已经大量出现了，可不可以说，在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方面，象前面所说的太原钢铁厂和河南孟津翟泉社所办的大学，在实际上已经走在全国许多高等学校的最前面呢？可不可以说，那样的大学将不仅是一切工厂和合作社办学的先进旗帜，而且还是全国一切大中小学都应当效法的先进旗帜呢？可不可以说，象各地的工人要力争成为精通十八般武艺的"多面手"，象《红旗》第三期刊载的湖北鄂城旭光一社开展的"万能人"运动，"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这些不仅是工人农民的先进旗帜，而且还应该是全国学校教育方向和学生们求学方向的先进旗帜呢？可不可以说，我们这里的教育家们，如果要办好教育，应该先从创造这一系列新事例的工农们接受一些教育呢？我想，都应该这样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著作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可以采取的十项措施的最后两项是："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状态逐渐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在现在中国的实际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所提出而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它所包含的几个基本点正在使这两项措施的实现条件和具体形式，逐步明朗化。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

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伟大作用的一系列事实看来，使我们重新回忆起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这类的名言。中国人民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前进的。

毛泽东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旗帜，是在中国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因此，毛泽东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旗帜。

毛泽东旗帜就是中国人民高举的红旗。中国人民将在这一面伟大红旗的引导下，在不远的将来，继续胜利地到达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不断地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是从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适合人民群众前进的需要，而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总是正确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前进的方向。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论学习问题而向我们的同志所提出的要求。但是，这段话本身同时就是反映了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思想生活。

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毛泽东论学习问题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都将起着启发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应该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启发自己。我们相信，任何人，不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只要时刻是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人民的前途着想，那末，在他那里，就会产生力量，就会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上发现它的客观规律，并善于利用它的规律来为人民造福。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人民日报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云南傣族一位老年妇女发现野鼠生活规律的一篇通讯和一篇谈话记录。这位老年妇女，名字叫做曹依秀，今年六十四岁。当然，我还没有看过她，但看到报上印出的她的画像，也就可以看出她是人民群众中一位充满自信心的伟大乐观主义者。这位可尊敬的老人家，没有念过书，当然更说不上进过什么大学，可是在昆明医学界，竟然作过一次被称为"引人入胜"的学术演讲。她研究野鼠生活的规律，已经有了八年。她为了什么去做这个工作呢？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只有一个单纯的、但却是极高尚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要消灭鼠疫。据云南日报报道：她的家乡在一九四五年被日本侵略者放下大量老鼠，散布鼠疫。一九五一年党和人民政府派人在那里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也就启发了她。"从此，曹依秀几年如一日地在早晨外出工作时，就一定要带着锄头去，沿路留心看有无老鼠洞，发现了立即就挖。后来她又想到，要彻底消灭老鼠，必须摸清它的生活习惯，以后在每次挖洞前，她就留心观察洞口周围的情况和自然环境，洞内的情形等等，顽强地进行研究。到现在，她共消灭了一万多头老鼠，进行了细心的比较观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实际出发，一个普通的老年妇女竟然能够掌握了野鼠的生活规律，为人民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或许有人认为这算不了什么，野老鼠和我有什么关系？野老鼠这个问题怎么可以爬到我这个"科学家"的高贵头脑里来？但是，从人民的观点看来，这位老年妇女同那些有这类想法的所谓"科学家"比较起来，简直有不可能比拟的高贵。有许多大学生不是希望在毕业时候能够考上一个什么"副博士"吗？我想，这位没有读过书的老年妇女倒可以当一个博士，是人民的博士。她是一个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群众的真正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新社会的人物，是毛泽东式的人物。

我们大家不是很想当成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吗？不是想当一个人民的科学家吗？我就请大家想想曹依秀那样一副为人民的毛泽东式的好心肠；我就请大家观看曹依秀那样一派实事求是、苦钻创造的毛泽东式的新风格。

大家大概都读过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平日常说的：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曹依秀的做法也就是如

此。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有的教授提出这样的公式："理论——实际——理论"。听说，这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公式。可见解放虽然有了八年，但唯心论哲学还在羁绊着你们，要你们做一个空头的、对人民毫无用处的"哲学家"，要你们还是从书斋里冥想的所谓"理论"中来，再回到你们书斋里所冥想的"理想"中去。难道冯友兰先生反唯物论的公式在实际上不是表现这样的企图吗？哲学系的同学应该把这个唯物论的公式倒过来，而变为这样的公式：实际——理论——实际。

有些人只想当个"哲学家"。但是，哲学系的同学则有没有考虑过，学哲学有没有什么目的？做哲学家是干什么的？对人民有什么益处没有？搞了几年"哲学"，对人民的事业帮助过什么？人民培养了我们，我们就有义务来认真考虑一下并回答这些问题。不说别的，仅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人民群众中还有许多迷信。有各种各样的迷信。我现在说的，是对于神的迷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或准备过进行这种破除迷信的工作？大家是不是觉得这类的工作，不值得去动用"哲学家"的头脑？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读过列宁所写的《论战斗唯物论的意义》这篇论文？如果有人还没有读过，最好认真地把它读一读。列宁在那里说明为传播无神论有进行斗争的需要，同时又对于十八世纪欧洲老无神论者的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大家读过了有些什么感想，或者还是漠然置之？

在这里，我又想说一下安徽日报六月二十四日登载的《神的秘密》的一篇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通讯。合肥西部官亭南面的园洞山，原来传说有个神仙洞，最近忽然显灵了。洞里有仙方，吃了能治病，还可以使不生小孩子的妇女生孩子。到那里求仙方的人，除了要备香烛纸马，还得带些花生、麻饼之类的东西去供奉。供奉之后，再把花生、麻饼之类的东西拿回来，也就成了神仙赐给的"仙方"。有很多人为了求得"仙方"，耽误了一天生产，花了不少钱，有些老年人没有钱买东西，急得把老母鸡都卖了。但是很奇怪，等到人们叩头之后，再爬到洞里去拿那些供奉的东西，只能拿回一点点。其余的东西那里去了？青年们怀疑，想进洞里去看个究竟。可是有些老年人说，东西是洞里的大仙吃了。他们不许青年人去冒这个险。一天，有一个老太婆带了儿媳妇，去求大仙保佑，让她儿媳妇养个小孙孙。这时原来不会说话的神仙忽然会说起话来了。洞里发出嗡嗡的声音："只要你送床花被子，就可叫她养小孩"。她们被神仙的声音吓坏了，爬起就跑。在山下修塘的青年人晓得这件事，捺不住了，钻进洞里，把"大仙"抓出来了。原来这个大仙，不是别的，就是那里的一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我想，如果我们有些哲学家能够发现这类神的秘密，或者把中国过去的笔记和小说所写的许多属于这类的故事和材料编一编，进行一些具体的宣传工作，也就是作了一件对农民有教育意义的贡献。可是，我们这里的一些哲学家所羡慕的，似乎不是这类的工作，觉得这算得什么？这怎能算是"哲学"？我想，这种哲学家可能自己也是相当大仙的吧。至少说来，这种哲学家，唯心论的哲学家，是大仙们的亲戚朋友。

听说，有些大学生——当然，不只北京大学，还有其他大学和其他地方的大学生——觉得自己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到乡村去劳动，"太可怕"了，读了这么多的书，还要去参加生产劳动，至少是浪费。在报上我还看过这样的消息，有一个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在乡下曾经贴过一张大字报，认为多劳动两个月，会把同学变成"无用之材"。不过，实际是一切的标准。什么可惜不可惜，实际总归是会给我们做结论的。象现在工农们的求知欲望那末旺盛，将来就不会只有一个曹依秀，不会只有一个象那位已经在全国闻名的治白蚁专家李始美，而且会有成批成批的人物出来，在文化和科学知识上继续不断地大大超过大学生和教授。大家看了

报就知道，现在有许多农民的小麦试验田的产量高额，已经打破了世界的纪录，农业专家简直望尘莫及。当然，我们尊重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农学家。但是，有很多农学家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自高自大，藐视农民有高速度发展农业的能力，结果就被先进的农民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了。列宁常常爱用这句谚语："谁笑得最后，才笑得最好"。原来有些专家，有些科学家，笑农民落后。现在轮到农民来笑了。农民笑得最后，而且笑得最好。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当然，并不是只有在农业方面才出现这种情况。工人们的干劲和创造性，冲破了一些所谓专家或科学家原来画的圈圈，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打破世界纪录的东西。将来会从工人队伍里面，从农民队伍里面，跑出一批哲学家来，他们所懂得的哲学知识要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懂的。不信吗？实践是会给我们作证明的，时间是会给我们作证明的。

知识分子不甘落后怎样办？办法就是要决心同劳动群众结合，同生产劳动结合。办法就是首先不要摆出那种知识分子的架势，而是首先要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就是要实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化。

只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赤心，只要有满腔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热情，那末，任何人的智慧的发展都将是不可限量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将是不可限量的。

许多知识分子很喜欢谈什么"学术权威"，而又很害怕自己会失掉什么权威。共产主义者承认不承认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的著名论文中早已说明了这个问题。权威是需要的。你坐在船上，就必须尊重舵手；你坐在火车上，就必须尊重司机手。问题是要尊重代表人民利益、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威，是要尊重代表真理、代表进步的权威，而不应该尊重那些过了时的权威，不应该尊重那些假权威。有些人在过去一定时间内曾经是权威，但他自我满足了，停顿下来了，天天吃所谓"权威"饭，不想再进一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很好："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结果人家进步，他不行了，只得当个落伍分子。至于原来就是个假权威，大家也就只好简直了当地揭穿了它。过去是权威，现在是否还可以是权威呢？可以的，但首先是要再当当小学生。权威经常是从小学生来的。权威和小学生，经常要变化。小学生会变成权威，权威又会变成小学生。当了权威之后，不甘再当小学生，他就将不再是权威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农村调查》序言里写道："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队伍中，在人民群众中，经常处在最高权威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小学生。

在座的同学都叫做大学生。我在这里说话，又要大家甘当小学生，而且首先是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这说得通吗？这是说得通的。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的大学生，又有各种不同情况、不同程度的小学生。又是大学生，又是小学生，这叫做辩证法的对立的统一。

恩格斯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样写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在现在中国，正在展开着一个比欧洲文艺复兴更伟大得不可比拟的伟大的新时代。处在中国这样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看到人民群众的热情奔涌，才思横溢。这真是广大群众源源不绝地涌出自己创造力的伟大时代。毛泽东旗帜给了我们以明确和坚定的方向，给了我们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伟大的旗帜下，充当前进的战士，为人民的幸福，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这个讲演记录稿，经过本人整理和补充）

（《红旗》1958年第4期）

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徐　冰

（一）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人民共产主义精神空前高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使我国的形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面貌，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也因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领导地位空前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新的基础上更加成为牢不可破的联盟。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和它所属的知识分子已经起了激烈的分化。这就在社会主义的新的基础上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贯彻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造成十分有利的形势。

我们的革命是以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为指针，并把这个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革命是不停顿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鸿沟，革命是立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停顿地向前发展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着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全国解放的初期，我们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便展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的愈完全、愈彻底，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开展的愈迅速、愈广阔、愈坚决。因此，我们主张放手发动群众，通过不停顿的运动来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却主张把革命停滞在民主主义阶段上，再不要前进，以利于资本主义的恢复和发展，这样也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打败了世界上最顽固、最反动的美帝国主义。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脆弱的带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一方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仗恃着私人资本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便首先在经济战线上向我们展开了反限制的斗争。经过稳定物价、制止投机的斗争，经过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经过统购统销以及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的实施，又经过几年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以及经过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于一九五六年初在经济战线上取得重大的胜利，

基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历次的运动中严重地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训。

一九五六年初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更大的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逐步地突出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资本主义思想也就成了完全反动的思想。资产阶级分子既已失掉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如果愿意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能不抛弃资本主义立场，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才能够同我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我国目前还是一个文化和经济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但他们具有文化、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在我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展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同时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劳动。不管在地质方面，在建设矿山、工厂、铁路、水利工程方面，还是在文化、艺术、医药、卫生等等方面，处处都还需要知识分子。这样，在我国现在的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识和技能还是国家的一笔财富，这也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作用。怎样利用和发挥他们的这种作用，使他们能更好地为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服务，是我们党在文教工作、工农业建设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中应该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不是直接剥削者。但是，他们大都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受的多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育，头脑里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意识。他们依附于剥削阶级，一直为剥削阶级服务，所以从阶级成分上来说，从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上来说，是属于剥削阶级的。

在全国解放以前的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他们大多数人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种种压迫，因而在他们中间也渐次生长出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心和要求民主的愿望；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死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只是极少数，他们中间的多数人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或者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在全国解放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亲眼看到六亿人民的中国终于在世界上站了起来，也第一次感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荣耀。党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且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给以适当的安排和工作，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同时党在各个政治运动中对于他们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改造，期望他们在政治上和认识上不断提高，在国家建设中更能发挥他们的所长。而他们自己也亲身体验到，他们现在的工作条件、他们的生活和所受的政治待遇比以前不知好多少。他们表示愿意为国家建设服务。应该说在这方面他们是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和成绩的。

有人会抱怨说，既然全国解放九年以来，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国家的工作人员，又有一定程度的进步，为什么还给带上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剥削阶阶的帽子呢？我们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不只是从社会出身来看，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者，还要从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来看。解放以来的九年中，知识分子一部分接受了党的领导和教育，看清了前途，改造了自己，并且有一部分转化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并且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但这只是一部分，另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歧视改造，

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没有根本改变，看不起工农大众，看不起共产党。他们本来已经失掉了曾经为之服务的旧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以及正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消灭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应该依附到工人阶级方面来，但是他们却不甘心，对共产党不那么服气。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不单拒绝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而且仗恃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继续传播着资产阶级思想，把他们的专门工作和研究范围视为神秘的象牙之塔，外行不得干预。他们虽然也勉强地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学会了一些马列主义术语，但多是用来装幌子，打掩护，以继续贩卖资产阶级的肮脏货色；厚古薄今，厚外薄中，厚洋薄土，这就是他们抗拒思想改造的挡箭牌。他们知道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他们的文化、科学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门知识，需要他们帮助我们来教育和培养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当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的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愈以为自己的（专门知识）奇货可居，狂妄自大，尾巴翘到半天高。这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他们的两面性：有着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面，也有着向往资本主义（特别是在思想意识方面）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一面。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刚刚开始整风和右派猖狂进攻的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两面性表露的更为露骨。

对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只是单看他们的成分和社会出身，还要看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和思想意识如何，他们的屁股到底坐在那边。今天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没有彻底地进行思想改造，头脑里仍然塞着很多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从这方面来说，他们仍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的范畴，并不是象一些人故意歪曲地说的，因为共产党便于〔整〕知识分子而给他们戴上一顶不光彩的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的帽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还未改造好，他们的思想意识更未改造好，所以还是旧本还元，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改造，是一个曲折的长期的过程。对于他们不单需要进行政治立场的改造，还需要对他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学术思想进行根本的改造。这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政治立场的改造，离不开一定的思想基础，它为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创造了前提，而思想改造又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推进政治立场的改造。

一九五七年夏季以来的一系列运动的成果证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能够接受改造。在这些运动中，他们政治上受到重大的震动，思想斗争很尖锐，结果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认识的比较清楚了，政治上向左靠拢了。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受到四面八方的猛攻，这个顽固的思想阵地已开始被突破。在学术思想上也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重理论、轻实践，重业务、轻政治，只专不红，以及知识独占等等谬误思想在全国的机关、学校中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所谓的权威思想也受到猛烈的攻击，在业务上和学术上已树立起兴无灭资的阵势，并巩固了党的领导权。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我们的党员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破了过去那种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迁就、敷衍、不敢碰、不敢争辩学术思想的错误认识。我们首先引火烧身，并吸引广大群众对我们进行广泛批评，来进行大整、大改，同时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等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性运动。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单批判他们的错误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恳切地帮助着他们分析他们的错误根源，提出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不单批评他们学术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并且指出只有进行了根本改造，他们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仅仅开始吹来的一阵东风已经使学术思想领域内有了新鲜的空气。这就能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但应该指出，思想改造是一个更曲折、更长期的过程，有时还可能是激烈的斗争，需要进行更细致、更耐心、更艰苦的工作，经过无数次反复的教育和斗争把他们所依恃的政治资本剥光，把他们的个人主义整臭，才能使他们服服贴贴地依附于工人阶级。今后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改造，应该紧紧抓住业务和政治、理论和实际、技术和群众、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和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的方针。政治和业务相结合，这是政治挂帅的问题，是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使他们的业务服从政治和服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利益。教育和劳动相结合，这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它还是有不小的抵触，但我们要坚决贯彻这条革命的方针，才能建立起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强大队伍，才能把多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本改造过来。我们应该深入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去，同他们交朋友，了解他们，关怀他们，帮助他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助着党的有关部门贯彻上述的方针，进一步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参加到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中去，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步骤。在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根本改造的实践，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要知道，我们所要改造的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思想，所要整臭的是他们的腐朽的个人主义和名利观念，对于这些肮脏东西改造的越彻底，整的越臭，才更有可能把他们的文化技术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政治挂帅，知识公开，作出更多的贡献，使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开出灿烂的花朵。因此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我们不是排斥和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的花岗岩头脑的至死不悔的分子以外），而是克服他们那些消极的东西，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一切积极力量，心情舒畅地投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波涛中去，力争上游，但这要作很多很多的工作。

今后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党要直接去作，同时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去作，运用民主党派去作。

总起来说，经过几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在政治上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成为左派。但在他们当中占多数地位的中间派却还处在过渡状态，一方面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有了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还转不过弯子来，在政治上表现着左右摇摆。另一小部分右派分子，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派，不服气共产党的领导，不甘心资本主义的死亡，他们自恃有社会影响和文化科学知识作为资本，又利用中间派的严重动摇，在政治上决心要同我们进行搏斗，企图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打出一条道路。较量了，但他们惨败了。这场较量是我们和右派争取中间派阵地的一仗，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有决定意义的一仗，它使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了深刻的变化。第一，资产阶级右派的惨败和孤立严重地教训了中间派，使他们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反不得，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不得，兴无灭资的大势已定，形势逼人，不能不和右派划清界线。第二，中间派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个人主义观点在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受到了有力的揭露和打击，使他们认识了自己的两面性，认识了改造的必要。第三，我们党对于三风、五气的严肃斗争和认真的整改，工农群众空前跃进的革命干劲，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中间派，多数人表示要下决心改造自己。他们展开了向党交心的运动，订出个人的和集体的改造规划，进行评比、竞赛，掀起了群众性的自我改造的高潮。尽管他们还是三心二意、半真半假、由假到真等等现象，但上述情况也表明了在党的领导下，中间派的多数人已经不同

程度地向左转，在政治上表示决心抛弃资本主义立场，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带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实现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改造，还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我们应当有足够的估计，既不能简单粗暴，急于求成；也不要认为改造工作已经作得差不多了，因而产生麻痹和松动的思想。

（二）

统一战线是我国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是党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根据着我国的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认识、不同思想和不同信仰，但又都有共同奋斗目标的这些具体情况，而产生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和全国人民最大利益的政策。这些年来，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我们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同剥削者建立了另一个联盟，主要是为了对他们实行教育、改造工作，实现全国的大团结，吸引他们参加国家的各种建设，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我们的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来说，是以社会主义的教育对他们进一步实行团结、改造工作，正确地处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调动他们中的一切积极因素，为我们党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服务，使他们的多数人能够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同时配合着党的工农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完成兴无灭资的历史任务，使谁战胜谁的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

毛主席总结了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丰富经验，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党一直是遵循着这个政策的。八年来我国阶级斗争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并且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亚洲的许多民族国家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整风运动中，各级党委亲自动手，领导着各级统战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展开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认真地发挥统一战线政策的作用，动员了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了这个火热的斗争，结果使广大中间分子靠拢到我们方面，彻底孤立了右派分子。正是因为全党动手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了这一场斗争，才使这个运动迅速地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同样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是，几年来党内有些同志对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有必要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根据几年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说明有关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些问题。

有些同志怀疑，为什么我们不象消灭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采取强力剥夺的方法，而要用和平改造的方法来达到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目的呢？他们怀疑，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自找麻烦"、"得不偿失"。每当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趋于紧张的时候，这些同志总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生动摇。应当认识，党所以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不仅因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可能接受的，而且首先是因为这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所必需的。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过去和现在，都有着相当的影响，他们有以下的这些资本：

第一、他们有爱国历史以及同我们合作的一面。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曾经领导过辛亥革命和参加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他们也曾一度参加了大革命运动，当时同我们有过一段合作；虽然，接着资产阶级就背叛了革命，但是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有

的参与了抗战，受到我们党的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感召又同我们合作过；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他们逐渐打破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和依赖，在革命胜利后终于处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如果我们把他们一脚踢开，那就会造成某种不必要的混乱，同时，也没有必要和理由。我们同他们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盟，是为了改造他们能够为人民服务，也是为了经过团结和斗争，逐步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光。

第二、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经济上还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全国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于恢复和扩大生产，供给市场和适应人民需要是有帮助的，这是说他们还有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由于战争破坏所带来的灾害和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同时由于我们的国营经济还比较薄弱而又缺乏经营管理的人才和经验，我们在当时对它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是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没收的办法，就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生产停滞，物资缺乏，市场混乱和人心不安，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所希求而对革命不利的。

第三、民族资产阶级拥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文化、科学、技术具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在我国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资产阶级的专家，利用非社会主义者的手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队伍，同时尽可能地把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

八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采取和平改造而不是强力剥夺的方法，更容易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同时又能够充分地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比较更快、更好的方法。

党内有些同志在党对于民主党派的政策上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上也抱有过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民主党派既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就不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错误地认为民主党派是包袱，是花瓶，在实际工作中对它们往往采取漠视、轻视、放任不理的消极态度。应该认识，党对于民主党派的这种政策和方针，是根据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制定的。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无比的威信；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强有力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坚定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坚如磐石地巩固起来；先天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建立资产阶级王国的野心，但却不能形成独树一帜的强有力的政党，来同共产党对抗和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的民主党派除了资本主义的一面，还有不能不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一面。这就说明，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地削弱资本主义因素和增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在接受改造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服务。过去的经验证明，在历次运动中，它们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中起了相当的作用，我们能够把这些本来是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拿过来，成为工人阶级所运用的武器。在三反、五反以及反右、整风等政治运动中，如果没有民主党派的参加，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阻碍和困难，而不容易打进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脏进行根本的改造；同时民主党派对我们提出的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有助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的改进，这些正是民主党派的作用。应该从这方面来认识我们党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出了这么多右派分子，这是统战工作统出来的。这些同志不认识，右派是客观的存在，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消灭资产阶级，不能

不引起这个阶级的反抗。正是由于全党贯彻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才使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坚决反抗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被彻底揭露出来，受到有力的打击，并且争取了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逐步转到我们这一方面来。

在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右的倾向。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实现消灭资产阶级的任务，丝毫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居”。不去积极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对资产阶级麻痹迁就不敢斗争，甚至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都是同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相容的。我们必须经常注意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和克服一切“左”的和右的倾向，以便更好地完成党的统战工作任务。

用统一战线的和平改造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赎买政策：分利润，付定息，给高薪，在政治上给予妥善的安排。这种方法，是可以用比较少的代价，换取他们不太勉强地接受改造，不但可以减少破坏，而且可以吸引他们为社会主义贡献知识和力量，这是调动积极因素和终于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的有效办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赎买政策，除了坚持定息和高薪的政策之外，还应当继续贯彻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

第二，教育方法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方法。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之间的矛盾，除了有对抗性的一面而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除了少数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以外，对于占大多数的能够接受改造的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作这样作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说服和教育的工作”（毛主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教育工作即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就是统一战线的中心工作。教育方法，一种是实际的教育，一种是说理教育。这次整风运动，就是实际教育和说理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依靠我们八年来各项革命事业的伟大成就，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达到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目的，充分显示了教育方法的效果。

第三，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实现对他们的根本改造的最有效的形式。早在一九五〇年，毛主席就曾经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又说：“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经过几年来的工作，这个指示已经逐步为他们所接受，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在他们当中普遍地实行起来。事实证明，从他们内部来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就能更有效地启发自觉，促进分化，并且使我们充分保持主动地位。有些同志怀疑在他们内部进行自我改造的这种方法，能不能收到改造的效果。这些同志不了解他们的自我改造，正是在党的领导和全民大跃进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事实上，这次整风运动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使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习惯批评和自我批评，多数人由比较勉强地接受改造，进到比较自觉地实行自我改造，成功地运用了群众性的自我改造的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向党交心，制订集体和个人的改造规划、展开自我改造的社会主义竞赛。这种自我改造的方法，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的自我改造，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教育、改造，是一种高度的阶级斗争的艺术。

第四，统一战线使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形成犬牙交错的形式。这种阶级斗争渗透到社会主义的机关、学校、企业以至工会内部，也渗透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派、团体以至家庭内部。随着生产关系的基本改变，阶级斗争更集中地从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反映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互相渗透、犬牙交错的形式，使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在各方面同资产阶级的影响作斗争，同时也便于我们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善于掌握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地同他们建立联系和合作共事关系，并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性的党派和团体，以便更好地达到改造他们的目的。

第五，我们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波浪起伏的、曲折前进的。因此，我们在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有时着重团结、鼓励，有时着重批评、斗争。当资产阶级进攻的时候，着重批评斗争；在他们被迫退却以后，又主动调整关系，安定他们，团结他们进一步实行改造。右派的猖狂进攻造成了阶级斗争的一个时期的紧张局面。现在，由于反右、整风的胜利，阶级斗争的局面渐趋于缓和，我们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鼓励他们的进步表现，进一步推动他们进行自我改造。这种阶级斗争的波浪起伏的形势，今后还会反复地发生。右倾麻痹，或者认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显然都是不对的。

第六，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经过了许多过渡的形式和步骤，逐步进行改造，比起一下子消灭封建买办阶级的那种办法，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使这个阶级的人们逐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增加接受改造的自觉性，较快的把多数人化过来。所以结算起来，这还是一种比较好、快的方法，愈到后来，就愈可以看出它的深远影响和对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应当坚韧地、耐心地、不厌反复地进行改造工作，以利于加速完成最后消灭剥削阶级的历史任务。

（三）

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三千万人以上。他们多是集中在大、中城市：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合起来只有十万人左右，他们多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和政治活动分子，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看起来，民主党派很小，似乎只是“几根头发”，但它们的后面却是“一把头发”。各民主党派代表着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作为他们的政治寒暑表，集中地反映着他们的意图和动向，当然也反映着他们政治上的两面性。党团结了各民主党派，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了“安民布告”，指出了他们的前途，就更有利于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进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参与国家的建设工作，这是各民主党派主要的积极的一面。

各民主党派也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大多数民主党派和它们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它们的旗帜。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随着蒋介石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失败和孤立，特别是由于我们党坚决的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对他们的争取、斗争和团结，各民主党派开始抛弃中间路线，转到我们方面来，并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这是他们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各民主党派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尽管

各民主党派反映着资产阶级及从属于它的知识分子的意图和要求，在许多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和我们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斗争，但总的说来在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下，它们继续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完成国内民主改革的斗争，带动它们所联系和影响的阶级、阶层的人们参加了三大运动和三反、五反的伟大运动，并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们表示拥护党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它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讨论和修正，并一致举手通过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宪法。它们参加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这样，各民主党派就向着共产党所指出的方向前进，逐步地走上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应该说，几年来各民主党派在代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合法利益方面，在协助党对这些阶级、阶层贯彻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方面，在推动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方面，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发挥了它们的积极作用的。这是主要的一面。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这一面，因为这正是各民主党派之所以存在、发展和发挥积极作用的基本因素，是能够贯彻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基础。

但道路是曲折的，斗争是复杂的，各民主党派也还有着另外的消极的一面。

从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来看，在它们内部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奉行我们党的革命路线的左派。他们的数量现在虽还不多，可是作为进步可靠的骨干，在民主党派的各种活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作出不少成绩。但各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还是处于中间派的状态，他们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有着倾向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但基本上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立场，对党的领导有着不同程度的不满。还有一部分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对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是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为数虽然不多，却是民主党派中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从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到一九五七年春季，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逐步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并且在民主党派一部分中央组织也和许多地方组织中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利用了中间派的严重动摇，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反动的进攻被党和人民打退了，这种情况说明，各民主党派还有着消极的一面，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它们的政治面貌和组织状况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相当大的矛盾，必须进行根本改造。

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使民主党派经历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各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地进行了反右和整风，这个运动的胜利，粉碎了反动的右派路线，使右派分子在民主党派中和全国人民面前孤立起来。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机关已经撤掉了右派分子的实权。左派分子在这次反右和整风的运动中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经历了革命烈火的锻炼和考验，在政治认识上和斗争经验上有所提高，他们的队伍也有所扩大。左派和中左分子的联盟在民主党派的中央以及许多地方领导机关中已树立了政治上的领导优势，使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开始发生了新的气象。中间分子在这次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教育，表示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在政治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向左转，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更接近了一步。这些事实标志着各民主党派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逐步改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转折点。

民主党派的作用，现在归结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推动它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拿出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力量来参与国家的各种建设，一方

面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者是互相关联、互相推进的。根据多快好省的精神，自我改造应该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服务的实践中又能够更快地进行改造。多一分改造就多一分服务。因此，民主党派同样应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快、又好地发挥这两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多地把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更多的人改造过来。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根据我自己的认识谈一谈供同志们讨论时参考．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从属于它们的知识分子的产物．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完全改变了，原来属于这些阶级、阶层的分子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旧习惯、旧关系也还会在那些人们的脑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在政治上、思想上他们还会和我们有斗争，阶级斗争的火还不会熄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和消灭不能只从经济上来看，还应从政治上来看，它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过程，因此对于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也是长期的复杂的工作，都不是短短的三、五年内就可以办到的。所以民主党派也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对于它们所联系的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教育、改造工作，完成它们所负的历史使命。不要以为民主党派在整风、反右中被搞臭了，在今后的大跃进接着大跃进的情况下，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这些认识都是主观的、错误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党派在他们中间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对于民主党派不是取消它们或轻视它们，而是重视它们，政治上、思想上加强对它们的领导，使之继续加强自我改造，从而也更好地作为党的助手，在今后的长时期内继续加强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工作。这是我对于长期共存的了解．现在再谈互相监督的问题。我认为去年以来的整风和反右斗争，对于互相监督的执行起了很好的范例。在整风运动中，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对我们党和党员提了很多意见和批评，他们有些是从善意出发，有些是敌意攻击。我们接受了其中的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这对于我们党的整风和对于我们党员的三风五气的整改是有帮助的，我们也正是要求他们帮助我们整风的呵。同时，坚决地打击了穷凶极恶的右派分子，领导和帮助民主党派整风。上述这些，不都是我们同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的丰富内容吗？不应该把互相监督看成是一句空洞的或者只是为了敷衍民主党派的口号，它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会起一定的作用。当然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去年曾利用了互相监督为掩护，向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甚至于要上街，打出手，但这些又有什么可怕？我们终于把这些毒草揪了出来，使民主党派成员擦亮了眼睛，识别出什么是毒草和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反而更增加了对于互相监督的认识。今后我们应该继续贯彻中央指示的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既有利于我们党和党员对于工作上的改进，又有利于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

根据长期的和这次整风的经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必须是以社会主义的工作岗位为基地，依靠工农群众的影响，学习马列主义，采取自我改造的形式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群众运动和经常的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今后需要采取下列基本措施：

（一）以社会主义的工作岗位为基地．工作岗位，是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经常发生关系的所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也常常具体地从业务工作中反映出来．因此，有利于同他们进行两条道路、两种人生观、两种方法的斗争，达到团结、改造他们的目的．我们

应当对他们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行动给以认真的适当的批评；同时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在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应当根据以党委为核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建立行政会议制度，并同他们商量确定分工的职责范围，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关于政策方针上和工作上同他们的工作有关的重大问题，应当同他们反复进行商量、讨论，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料，并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实地调查。目的是为了充分敞开思想，暴露矛盾，集思广益，作好工作，为了便于使用和改造他们，需要彻底摸清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专长。作好这些工作的决定条件，是大力加强国家机关、文教战线和公私合营企业中党的领导。

（二）整风。每年或者每两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作为在过渡时期内解决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同我们的阶级矛盾的一个主要方法。这次整风运动，为他们进一步地进行自我改造奠定了基础。运动后期出现的交心运动、制订改造规划、开展竞赛的形式，更是把整风运动和经常的改造贯通起来。我们应当抓紧这个形式，积极推动他们实践改造规划，开展和深入社会主义竞赛，并在竞赛、评比中，继续用鸣放辩论和大字报等形式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整风的原则和精神继续贯彻到经常的改造工作中去。

（三）参加体力劳动，到工农中去，到实际中去，是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一个重要途径，应当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分别他们的各种不同情况，根据自觉自愿的原则，适当推行。年富力强的人可以到工农业中去劳动。一部分民主人士限于条件（如年老、多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也可以多到工业、农业中去参观、访问，走马看花，了解劳动人民生活，体验劳动人民感情，改变轻视劳动的观念。多数人不能长期脱离业务，也应当用一定时间进行体力劳动。在他们参加体力劳动期间，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名义以及他们的薪金额都不应该改变。

（四）学习。为了便于对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有必要采用各种形式，组织他们进行理论教育和时事教育的学习，帮助他们了解阶级、国家和革命的基本道理，以及国内外的大势，现在首先是需要学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文件，使他们透彻了解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质，以利于促进他们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为了确实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对于高级知识分子最好由党的负责干部或者有阶级斗争锻炼的干部作教员，并可以约请生产能手的工人和农民同志给他们作报告，把上课和整风结合起来。人民政协举办的社会主义学院，已经取得良好的成绩。今后应当多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学。各省、直辖市和其他大、中城市举办的政治学校和工商界短期讲习班，已经收到显著的效果，今后应当继续举办，没有举办的地方，建议举办起来。这些学校和讲习班应该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并规定一定的时间使学员参加劳动。

（五）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特别是批判他们的个人主义，摧毁资产阶级思想的窝巢，这是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继续坚决地有计划地进行。对于学术上，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应当推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利于改造他们。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应当继续帮助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总之，在思想战线上我们要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马列主义的红旗。

民主党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应是以整顿为主以实现根本改造的规划为主。他们改造得越彻底，他们协助着党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会作的越好。它们在

进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它们的成员还会有些发展的，但象过去那样的大发展，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四）

中央和各级党委对统一战线工作一向是重视的。一年多来，在全国整风运动中，为了回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争取、教育中间派，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实现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大跃进，地方和基层的党委更大大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大量的基层组织通过这一年严重斗争，提高了统战工作的政策思想水平，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许多基层组织出现了书记挂帅，亲自动手，及时研究部署，动员全党一齐动手做统战工作的局面。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大跃进，对于今后的统一战线工作将有深远的影响。

统一战线工作是处理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的工作；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方法。

对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如何能更好、更快地完成，主要的关键决定于党的领导。

关于党的领导的问题，在两个工作纲要上已经说的很清楚，我现在只就党领导民主党派的问题，作下面一些说明：

对于民主党派，必须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民主党派虽然都参加了政权，不是在野党，但由于它们所固有的两面性，对政府和我们的党来说，基本上是个半反对派。它们在政治上常常同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同我们唱对台戏。在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同我们唱对台戏是好的，是允许的，我们不应该加以压制。因此，在一些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上，我们需要经过反复的协商，经常的教育和批评，争取他们在政治上同我们达到大体一致。

党对于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抓思想，抓政策，抓规划。一年来，我们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在各民主党派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并没有根本打垮。因此，我们必须以政治作统帅，加强对于民主党派的领导工作，同他们思想见面，政策见面，进行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工作，同时也要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过去有些人实行所谓"我说你服，我打你通"，使人家不敢畅所欲言，勉强接受，但心中却又是不通不服，这只能证明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贫乏，多习惯于填鸭式的强制教育，不大善于进行入情入理的说服教育，这是不利于党的领导的。右派野心家曾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这种狂妄的别具野心的谬论当然应该予以坚决的驳斥，而不允许它毒害民主党派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经常同民主党派的左派和中间分子交代政策，交换意见，摸清他们的脉搏，了解他们的意图。在我们制订政策或者写成成品以后，也应该根据必要同他们进行讨论，反复协商，作到使他们多数人心悦诚服。各民主党派只有认识了党的政策正确，并且愿意为这个政策的实现而努力才能尽到对我党的辅助作用。

同时我们要注意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义务的范围内，各民主党派享有它们的组织独立性、政治自由权利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我们党是全国人民团结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这是在宪法上规定了的。但在法律面前，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处于平等的地位，没有任何特权。我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加强对它们的领导，同时又尊重它们的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和它们坦诚相见，积极合作，使它们

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运用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作到知无不言，把思想上、政治上的意见和问题都摆在桌面上来谈，解除它们进行非法的秘密活动的一切借口。这样它们才会感到心情舒畅，提高认识，更快、更好地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组织。

加强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首先要在党内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前面已经说过，统一战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政策，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从而也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宝库。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统一战线既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教条，只是在口头上背诵它、赞扬它。应该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中央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文件，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中灵活地运用它，把它磨炼成更犀利的武器，为实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服务。过去的革命经验启示我们，统一战线政策执行的正确或不正确，关系到我们的革命运动的胜利或失败。应该这样说，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统一战线政策贯彻的越坚决，越透彻，就能够越快、越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的建成。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要求各级党委亲自抓统一战线工作，全党动手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这个法宝的威力。

有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领导，还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这就是一领导，二放手，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包办代替和组织控制的作法。我们一方面抓紧对民主党派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加强对它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同它们的政治协商工作，同它们在左派中间分子进行广泛的接触，一切有关的问题都同他们敞开来谈。这就是说，我们固然应该依靠左派，以左派为骨干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我们也应该和左派一道，克服残存的宗派主义作风，向中间分子进行工作，同他们交朋友，帮助他们进行政治立场的改造和思想改造，以争取中间分子更进一步地向左转。我们还应当向右派分子作工作，以进一步地改造和分化右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他们的多数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回过头来，重新作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放手让各民主党派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下独立进行工作，抛弃那些不分原则问题和非原则问题事事干涉的拙笨方法，因为这既违反了统一战线政策，又束缚了民主党派的积极性，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在解放的初期，因为各民主党派的组织严重不纯，成份庞杂，它们的政治思想又多停滞在旧民主主义的水平上；为了帮助它们整顿组织，端正政治路线，我们统战部门在一个时期内曾过多地干预它们的党务，这在当时的一个短时期内还有一定的必要，但也产生了副作用助长了某些左派分子脱离中间分子的宗派主义，事事依赖统战部门，不去或很少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中间分子由于这个缘故（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对我们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不满和隔阂，右派分子则利用这种空子进行挑拨离间，拉拢中间分子，以达到他们的野心，同我们和左派分子对抗。我们统战部门的一些同志也因为习惯于组织控制、事事干涉的轻易办法，放松了对于民主党派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思想上成了懒汉，政治上不能提高，我们应该记取这个严重的教训。几年来，我们已经纠正了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现在有些地区统战部门的一些同志又回到老路上来，甚至于在民主党派机关内坐镇，事事加以"领导"。我应该说，如果有采取这种久已陈腐了的工作方法的情况，应该坚决地予以纠正。在各民主党派胜利地进行了反右、整风和交心运动以后，情况变化了，人们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了，应该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工作方法，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走出一条新的路子，绝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我只作这一点补充说明，供同志们讨论时的参考。

同志们，我们这次召开这样大规模的统战工作会议还是第一次，会议的目的是：对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本着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精神，展开充分讨论，交流经验。使我们大家对统一战线政策有更深刻的认识，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相信，这次大会一定能完成任务，不辜负党的委托，使统战工作来一个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

最近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部分地区的农业社，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劳畜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根据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经过试点举办公共食堂，受到群众欢迎。

福建安溪县委合作部总结公共食堂有八大好处，主要是：一、吃饭时间一致了，社员出工、开会和学习都不再互相等待了，可以节省出许多劳力用于生产；二、可以把妇女劳动力从做饭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增加了一批劳动力；三、解决了单身汉做饭、喂猪的困难；四、家畜家禽集体喂养了，社里的轻微劳动就多一些，稍能劳动的"五保"户都可以参加工作，这样就减少了"五保"户，减轻社员负担；五、有计划地用粮，就可以消灭吃过头粮的现象，也没有人闹粮食问题了；六、便于发展集体副业；七、过去夫妇、妯娌、姑嫂、婆媳之间，往往因做饭、吃饭问题闹意见，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家庭和睦了；八、人畜分居，卫生情况大改善，社员心情舒畅。把这些好处归结起来，就是增加了劳动力，减少了粮食问题的矛盾，团结了群众，提高了社员集体主义的觉悟。安溪县委合作部还专门总结了湖头乡高山社办公共食堂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

在开始这一工作的时候，这些地方都首先向群众进行充分的宣传教育，交代清楚政策界限，避免群众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疑虑。有些地方成立集体食堂后，有人说："吃大锅饭可算平均啦！"还有的人提出："实行集体吃饭、集体居住后，还要不要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是不是还有饲料地，猪、羊、鸡、鸭等是否还可以喂；生活资料是否还属于私人财产"等等。这些误解，经过解释后消除了。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通过）

（一）

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检查了八年多以来我军的建设工作，肯定了成绩，批判了错误的倾向，对于广大干部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高觉悟、振作精神、加强团结的巨大作用。在这次会议以后，全军工作的进步必然会大大加快。

会议认为，军委在过去八年多的时间内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坚持了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工作中的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那时以来，我军在中央和军委领导下，在完成全国的解放和剿匪、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卫祖国海陆边防和空防的安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同时，我军在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工作中，也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陆军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诸兵种合成军队，我们的空军已经迅速地发展了起来，海军也已经开始发展。在建军中我军坚持了自己的革命军队、人民军队的传统，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我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运动，去年以来的整风运动尤其卓著成效。部队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健康的。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迅速前进，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取得愈来愈显著的优势，世界保持和平的可能性日益增长，我们应当坚决为和平而奋斗。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害怕和平竞赛，拒绝缓和国际形势，拒绝裁减军备，还在积极准备新的战争。最近，由于伊拉克革命胜利，美英两国派遣武装部队分别侵占黎巴嫩和约旦，阴谋进攻伊拉克和阿联，中东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即使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强大压力，帝国主义者的战争计划受到制止，今后在其他地方，他们仍然会发动新的侵略，造成新的战争危险。同时，美帝国主义还继续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大力巩固国防，积极加强我军的现代化装备和现代化作战能力，防止侵略者的突然袭击，并在敌人敢于向我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侵略别国的意图。因此，我们的战略是积极防御。但是，对于我们的未解放的国土，必须坚决解放；对于进犯我国领土、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敌人，除了必须在防御阶段加以击败以外，还必须适时地转入反攻和追击，一直到把侵略者赶回他的本土，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使侵略永远不再发生。应当让那些侵

略者知道：我们要求和平决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可欺；如果侵略者敢于发动新的战争，那么结果就只能是帝国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说："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因为人民绝不会再继续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在目前国际形势紧张、帝国主义再三制造事件、向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独立运动挑战、用战争威胁全人类的情况下，我全军官兵和全国人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在敌人向我国、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同盟国家发起攻击的时候，迅速投入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和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革命战争。

适应着这样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实现和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迅速建立一支常规装备和特种装备相结合的精干的常备军，不但要有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必须有计划地完成各种国防设施，掌握和着重发展最新的军事技术，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军事技术装备方面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同时，必须根据我们的战争的人民性的特点，把预备役和民兵统一起来，积极实现全民皆兵，使我国广大的青年、成年男女都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在敌人胆敢进攻的时候都可以投入战争。强大的常备军、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无限雄厚的后备力量，这三者互相结合，才能有效地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可靠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才能给发动侵略的势力以彻底的致命的打击。

我军的训练必须加强，必须贯彻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贯彻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的原则。在军事训练方面，必须以现有装备为主，照顾将来装备的情况；以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学习苏军经验，并且认真地研究敌情。在政治教育方面，必须努力提高全军人员的共产主义觉悟，使全军人员都成为保卫和平、保卫祖国、保卫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具有高度自觉的战士，进一步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全军的团结、上下级的团结和官兵的团结。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对存在在我军中的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我军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分不开的。在我军进入建军新阶段的初期，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曾经有所滋长。经过军委在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四年初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一九五六年以反教条主义为重点的五个文件的学习和"八大"文件的学习，去年以来的整风运动，这些倾向在广大范围内基本上是被克服了。但是这次扩大会议表明，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同时，在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倾向也还很严重。这些倾向妨碍着许多同志的思想上的解放和我军工作的更快的发展，必须加以坚决的彻底的克服。

（二）

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

这两条军事路线在我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互相对立。正确路线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为反动阶级服务的旧军队，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属于人民，同人民完全一致。为了保证实现这一

点，军队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政治委员制度和不断加强政治工作。军队不但是战斗队，同时还是工作队、生产队，必须处处爱护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在军队内部，必须实行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原则，实行纪律和教育相结合、集中和民主相结合、上级的统一领导和下级的积极性创造性相结合、士兵拥护军官和军官爱护士兵相结合、官教兵和兵教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争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我们被迫进行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发挥人的能动性尤其重要；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士兵群众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依靠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行动，必须从人民战争的观点来研究敌我力量的对比，并从而规定正确的适合于我国具体条件的战略战术。同正确路线的这些观点相反，错误路线认为：军事和政治是互相独立的，军队只是单纯地打仗的，而打仗也只单纯地是军队的事；因此，在一方面，我们的军队同旧军队没有建军原则上的不同，军队不需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不需要加强政治工作，不需要重视正确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军事首长的个人权威以及为这种个人权威服务的惩办主义的军事纪律就可以决定一切；在另一方面，我们的作战和敌人的作战也没有原则上的不同，不需要重视人民战争的特点，不需要重视人的能动性、士兵群众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不需要重视我国具体条件在我军战略战术中的作用，单纯的军事技术就可以决定一切。

这样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串着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在我军建军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反映我国人民革命武装斗争实际的正确路线，就同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军队管理制度、同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党组织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著名的古田会议的决议，就作为这一斗争的胜利的总结而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但是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宁都会议上，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他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硬搬苏军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当时的革命游击战争，这种教条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相结合，就推翻了红军中的正确路线，使革命战争遭到惨痛的失败。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于我党我军的统治，从此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军事路线一直是正确的，这种情况保证了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保证了我军的成长壮大。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内，也发生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叛党行为，发生了抗日战争初期对于正确的军事路线的动摇，发生了抗日战争中期的项英、袁国平的投降路线。我军的这个曲折复杂的斗争历史，说明了错误的军事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是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军事影响的反映，也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的反映。

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因为是在新的条件下（在一方面，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和历史结论已经不能推翻；在另一方面，我军正在实现现代化建设，掌握现代化的作战技术），错误路线也采取了新的形式，利用了新的借口。它的主要表现是：

1、削弱党的领导，削弱军队政治工作。主张错误路线的人们借口现代战争条件，片面地强调现代化、正规化，降低党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把它们的作用缩小为保证任务的完成。甚至认为共同条令上不能写党字。他们力图抛弃在我军历史上久经考验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硬说它还没有经过现代战争的考验，而向往于在我军经验中证明为不利于党的领导、削弱政治工作和助长个人专断的单一首长制。他们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妨碍了训

练，松懈了纪律。他们不知道，我们所要建立的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革命化才是我军的本质，才是我军区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军队的所在，只讲现代化正规化，不讲革命化，就将使我军迷失政治方向。为了保证革命化，就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事实上，保证革命化才能保证多快好省地实现现代化和争取在现代战争中的胜利，才能加强训练和巩固纪律，这已经被朝鲜战争的胜利、反教条主义以后在技术上和训练中的创造发明运动、整风以后部队政治面貌一新的大量经验所证明了，所谓党委制没有经过现代战争的考验，只是一种不顾事实的胡说。

2、削弱军队和人民的联系。主张错误路线的人们认为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军队只能是战斗队，不能再担任工作队和生产队，因而使军队无论在教育训练方面或者日常活动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处在同人民相隔离的状态。这样，就大大妨碍了军队的政治进步，使军队中的许多错误倾向不容易得到及时的纠正，并且不利于广大的现役官兵和退役官兵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他们又认为今后作战只决定于现代化武器，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已经没有什么作用，因而他们片面地重视兵员的补充而忽视民兵的建设，在海陆边防和空防中片面地重视军队的巡逻检查监视而忽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对敌斗争。他们不知道，现代化武器只能对敌方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杀伤，它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最后胜负，而且它也有脆弱的一面——因为双方都有，可能禁止使用，它的生产供应也容易受到敌方的破坏。现代化的战争是总体战争，只有把现代武器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取胜，忽视人民群众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

3、削弱军队中的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主张错误路线的人们既然认为在现代战争中一切取决于军事技术，就不但否认了发扬下级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必要，而且认为这还将危害现代战争所需要的高度集中，因此认为群众路线同现代化正规化不能并存。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只承认纪律、条令、命令和首长的作用，不承认自觉、创造、民主和群众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形式主义一时曾几乎窒息了我军生动活泼的空气。按照他们所规定的纪律条令，指挥员对士兵即使处罚错了，也不许干涉和控诉。这就使得惩办主义一度大为流行，造成严重的恶果。事实上，在我军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人用种种理由来反对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中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原则。但是无论在早期的农村游击战争时期，在后来的解放战争的大兵团作战时期，在朝鲜前线的高度现代化战争时期，都证明了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不但不妨碍集中指挥和必要的纪律，而且是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加速胜利、减少损失的重要条件。战时尚且如此，平时更不必说了。

4、否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否认我军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主张错误路线的人们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只适用于小米加步枪的时代，现在已经过时了；同样，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基础的我军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也已经过时了；继续坚持这些东西就是犯保守主义的错误。他们说：朝鲜战争的经验只有局部意义，而且战争中没有使用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或是说：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和我军经验都没有形成条令，因此算不得科学。这些错误意见完全是一种奴隶思想的表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些同志念了一些条令，竟连中国几亿人民依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的指导才建立和发展了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才取得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胜利这样的基本事实都看不见了。他们忘记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首先必须区别它的词句和它的精神实质：它的若干词句反映着我国革命战争历史上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在我军

技术装备还没有赶上和超过帝国主义强国的时候还没有过时或没有完全过时；至于它的精神实质，却反映着一切战争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共同规律，因而只要战争没有消灭，也就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也忘记了：我军自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至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进行了世界上历时最久的革命战争，不但打过世界上最多的和最大规模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且打过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阵地战（双方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和使用氢弹导弹的战争现在还没有发生过），这种异常丰富的经验是军事科学的最宝贵的基础。诚然，我军的经验还需要继续发展，已有的经验系统化的总结还不够，还必须大力进行整理和补充的工作，在现代战争技术方面还必须继续努力向苏军学习并且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拒绝学习只是愚蠢，骄傲自满只能造成失败。但是无论如何，这决不能成为贬低和否识我军经验的伟大意义的借口。事实已经证明，正是由于在新条件下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建军和作战的丰富经验，才大大促进了我军各方面工作（包括技术工作）的跃进；而那些否认中国的理论是理论、中国的经验是经验，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中国的存在和中国人民的存在的人们，由于一脑子奴隶思想，无论在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才是十足的保守主义者。

5、歪曲学习苏军经验的意义。主张错误路线的人们为了替自己辩护，利用学习苏军经验作挡箭牌。他们说，学习苏军经验是中央的方针，而苏军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是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的和经过考验的经验，我国和苏联只有某些地理条件的不同，因此我们应该不走样地向苏军学习，即使需要活用，首先也必须死学，等等。但是他们的这些辩护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向列宁所创建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支无产阶级军队伟大的苏军学习，不但是我军目前的方针，而且是我军建军以来的一贯方针；我军一开始就是以苏军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全国解放以后，我军面临着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在这个任务中，苏联给了我军以兄弟般的援助，绝大多数为我军服务的苏联专家在工作中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我军在学习苏军的合同战术和现代军事技术方面，成绩也是主要的。但是正是苏军的创建者列宁坚决反对任何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习气，坚决反对把苏联的经验当作不发展的教条而在其他的国家加以生搬硬套，也正是因为列宁敢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创造精神，他才创建了史无前例的苏军。列宁说：“我们并不把马克思的理论视为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巧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为一个科学奠定了基础，而社会主义者若不愿落后于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事实上，苏军也是在总结经验、克服缺点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这就是说，离开具体的实践而把某种经验当作无以复加的神物而加以迷信是荒谬的。我军向苏军学习，当然也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去学习，根据我国的历史条件和我军的具体需要去有选择地学习，学习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同我国我军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所谓不走样地学，所谓死学活用，所谓只有某些地理条件不同，根本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谈不到学科学，更谈不到用科学，发展科学。

由此可见，主张错误路线的人们在政治上是违背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革命战争是革命政治的继续的观点，违背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观点，忽视了政治领导、党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的决定意义，而在思想方法上是违背了唯物论，违背了辩证法，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事物的根本态度。

在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错误路线是没有合法地位的，是不可能占据统治地位的，因此，在过去八年多以来的我军工作中，错误路线也只能在拥护正确路线、拥护中央军委领导的外表下暂时地局部地起作用，同我军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比较起来，是主流和支流的

关系。但是应该看到，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中可以横行无忌，俘虏群众，甚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为了坚持和贯彻正确路线，克服错误路线，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认真进行讨论和教育，决不可等闲视之。

（三）

我军干部的思想政治状况主要地是健康的。全军绝大部分干部都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团结在中央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服从指挥，积极工作，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广大干部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扬了我军艰苦朴素、英勇顽强、联系群众、自我牺牲的优良传统，创造性地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许多重大的任务。正是依靠广大干部同士兵群众在一起团结奋斗，我军才能在过去八年多的短短时间内取得多方面的伟大成就。大批干部在复员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成为先进分子，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爱戴，这也有力地说明了我军干部的光荣品质。

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在我军一部分干部中，除了在学风方面生长了教条主义的倾向以外，在党风方面也生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倾向，必须严重警惕，坚决克服。这种倾向的发展，表明我军有一部分干部是受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受了错误路线的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提倡个人权威和形式主义的迷惑；也表明在我军的领导工作和政治工作中，还有某些薄弱环节，因而使得某些思想阵地还没有被共产主义充分占领，某种程度上还由资本主义占领着。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的主要表现是：

1、比资格比地位比待遇。一部分干部无论对部队同志和地方同志，不是比政治比德才比工作，而是比资格比地位比待遇。他们不是从党和人民在各个时期的斗争需要的角度看工作的分配，而是从所谓论功行赏的角度去看工作的分配；不是对提拔新进表示欢迎，而是背着资格的包袱，实际上阻碍着新生力量的长成；不是把脱离人民的利益去追求个人名利看作可耻的阶级异己的东西，而是看作正常的理直气壮的事情；不是对自己的政治觉悟还不高、工作做得还不多不好，而人民给自己的信任、荣誉和报酬已经太多感觉不安，而是认为自己所得到的信任、荣誉和报酬总是太少，别人所得到的总是太多，因而觉得党是对自己不起。他们的思想在实质上是轻视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或普通战士的身分出现。这些很明显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应该指出：干部要求政治进步，这是一种积极的健康的现象，应该给予帮助；但是上述的那些观点，却不是要求进步的表现，而是追求落后的表现。

2、居功骄傲。少数干部自以为有功，把自己摆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目无组织，盛气凌人，听人奉承赞扬就高兴，受到批评监督就暴跳如雷或者怀恨在心，对领导合意的就服从，不合意的就不服从，对下级顺从的就宠爱偏袒，不顺从的就打击报复。他们以为革命胜利就是他们个人的功，而不知道这根本上是人民的功，党的功。人民和党的功是无限的，不朽的，而个人如果有功，也是对人民对党应尽的义务。只有永远为人民和党的利益奋斗的人，才能永远保持荣誉。如果以有功自居，把过去的功当作今天违背人民和党的利益的资本，那么不但今后不能再得到荣誉，而且连历史上的荣誉也必然要被自己毁灭干净。

3、政治上衰退消沉。少数干部对于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表现丧失兴趣，虽然积极于争政治待

遇，但是并不积极于政治本身。这些人对重大政治问题漠不关心，有时还替各种错误意见充当宣传员和辩护士，个别的人甚至丧失立场，不分敌我。他们对工作不但缺乏力争上游的干劲，得过且过，但求无过，有时简直完全不负责任，消极怠工，甚至能做工作而长年不做工作。他们安于享受，追求享受，情况严重的，就发展到违反军纪、党纪和法纪，走向道德和政治的堕落。

所有这些从资产阶级方面来的恶劣影响，在共产主义的革命朝气占绝对优势的我军，只是十个指头里的一个指头或者不到一个指头，而且一直受到我军的领导和广大官兵的坚决反对。对于这些倾向加以夸大，而看不到我军整个的光明的面貌，无疑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鉴于这些倾向虽然受过多次打击，在一部分干部中仍然有市场，仍然有同情者，有同这些倾向和平共居的人，因此决不能因其只是支流而加以忽视。对于共产主义者说来，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它同集体主义决不相容，向个人主义让步就是向集体主义进攻，不拔去个人主义的白旗就不能竖起集体主义的红旗。听任个人主义的发展，对个人来说必然危害个人，对集体来说必然危害集体。因此，全军上下，必须造成强大的革命舆论，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彻底搞臭，使其在我军没有容身之地。正因为我军是一支坚强的共产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战斗队伍，我们不但完全有必要向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展开尖锐的斗争，而且完全有信心能够给这些倾向以粉碎的打击，从而使我军在政治上、在内部团结方面和同人民的团结方面大大前进一步。对于这些倾向采取妥协忍让的态度，畏首畏尾，养痈贻患，无疑也是决不允许的。

（四）

根据以上所说的情况，我军目前必须着重作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按照中央的决定，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每年抓几次。军队中各级党委的工作必须健全起来，重视思想政治的领导和反倾向的斗争。地方各级党委、军队各级党委和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目前要集中力量在我军工作的各方面克服错误的军事路线的影响，彻底粉碎一切动摇党的领导和忽视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要在全军展开反对错误军事路线和个人主义的斗争，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气，压倒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邪气。要通过这一斗争，争取全军整风运动的全胜，并巩固整风运动的成果。

2、作好防御侵略、解放台湾、彻底消灭侵略者的战争准备工作。在最近期内，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前沿和纵深的重点设防，并且尽量按照军民两利的原则完成战场准备的主要项目。必须根据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势，根据防御侵略、解放台湾、彻底消灭侵略者的实际需要，定出发展各军种的建设规划，分别情况，或者迅速实施，或者积极准备。在保持一定数量常规武器的生产和储备的基础上，必须大力地突击式地解决特种武器的装备和储备问题。

3、必须积极积蓄和壮大后备力量，贯彻执行把预备役和民兵合而为一、实现全民皆兵的方针。除基干民兵的组织和装备必须加强外，无论城市农村，无论学校、企业、机关、街道，凡属合于一定年龄的公民，必须逐步做到人人接受军事训练，人人学会使用普通武器，彻底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

4、审查修订全军的规章制度。发动群众，对我军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加以审查，提出意见，由领导分别情况加以处理。凡是正确的必要的，必须加以坚持，防止否定一切。凡是不完善

的、不正确的或不必要的，分别加以补充、修订或取消。

5、彻底改进部队和学校的训练工作，加强全军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集中必要的人力，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下，系统地研究和总结我军三十多年的各方面经验，吸取我们的伟大同盟者苏军的经验，注意我们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经验，在一两年内陆续编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教范和教材。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应该建立和加强必要的专业研究机构，并在全军中掀起群众性的技术、文化革命运动。在训练工作中应该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训练的内容应该在继续提高军事训练质量的条件下，适当地增加政治、文化和生产技能的比重，帮助广大的官兵充分了解和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并且学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本领。

6、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生产兵团以外，全军官兵都应该按照担负任务的具体情况，在不妨碍训练和备战的条件下，每年抽出一定时间参加地方的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干部并可适当地参加地方党组织的某些领导活动，以便了解情况和学习经验。全军的技术力量应该按照可能条件，积极支援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工作。

7、改进干部工作。干部的使用和选拔必须坚持以工农为骨干、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阶级路线，以经过锻炼的基层干部为基本来源，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坚决反对重才轻德的倾向，坚决克服讲资格而不讲德才的倾向。必须注意培养和补充新生力量。军队的组织必须精干，干部在全军人员中的比例必须恰当，应该把多余的干部转作地方工作，这样既可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也可避免军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致妨碍了干部的积极性和军队的建设。对于已经丧失工作能力的同志，应当退休或者作其他妥善安置，务使他们各得其所。必须加强全军各方面干部的团结，坚决反对有害团结的宗派主义倾向。团结是在一定原则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对于各种非无产阶级、非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必须展开思想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干部的要求应该比对战士严，对高级干部、老干部的要求又应该比对下级干部、新干部严。

（五）

为了胜利地完成我军的任务，加速把我军建成为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进一步改进军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工作。

解放以来，军委的领导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军委领导工作的缺点是思想政治领导不够，对于错误倾向没有广泛地、深入地展开斗争。今后改进军委和各级领导工作的首要问题是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改变目前许多同志只谈业务不谈政治、思想互不交锋的庸俗空气。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军队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它的各级领导如果脱离政治，迷失方向，显然更是危险；这是许多触目惊心的教训所已经证明了的。因此，军委和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党的路线政策，提倡注意大是大非，开展原则争论，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敢想敢说敢做敢独创的革命精神，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经验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广大干部要求政治进步的愿望。

为了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在军队的领导工作中也要适当地解决集中和分散的问题。军队工作不同于地方工作，它需要较多的集中统一，把应该集中统一的职权加以分散，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集中过多，使高级领导机关忙于事务，下级机关和基层缺乏应有的机动，也不

利于工作的发展。几年以来，军队中的各级职权虽然经过一些调整，但是目前军委和其他高级领导机关管的事务仍然过多。今后，凡是上边可以不管的工作和上边管不好而下边可以管得好的工作，应该坚决交给下边去管，发挥下边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上边可以集中精力去考虑和解决重大的带关键性的问题。同样，各级党委也不要代替业务部门而纠缠于事务工作，也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重大问题方面。

军委和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建军和国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应该经过一定的酝酿讨论，征求意见，然后定案。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善于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情况，总结群众的经验，推广群众的创造。在地方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干部种试验田"、"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由点到面、点面结合"、"抓两头、带中间"、"参观、评比、竞赛"、"开现场会议"等项工作方法，同样可以适用于军队。在军队中广泛地采用这些工作方法，必将使军队工作的进步大大加快。

军委和各级党委都应当更多地召集干部会议，以利于统一思想，交流经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可以每年召集一次。

我们的军队是由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导的军队，是为世界上最崇高的事业——和平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军队，是属于伟大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由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考验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和从农村游击战争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的丰富的实战经验所武装的军队，是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苏联热情援助的条件下向现代化迈进的军队。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相信，毫无疑问，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军官兵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党和人民所给予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任务。

刘少奇同志视察山东工厂农村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于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山东视察了济南的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和公私合营成记面粉厂，在聊城专区视察了寿张县的台前农业社和高唐县姜店乡的宏伟农业社，还和上述工厂的干部及一部分工人举行了座谈会，邀请了寿张县委第一书记刘传友、寿张的台前社、前进社、掖县的先锋社、历城的东方红社、七一社等农业社的社干部刘秀印、潘行杰、张永茂、马庆祥、王泽岩等人，进行了座谈。在路过莘县、禹城时，还和这两个县正在举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和三级干部会的全体参加者见了面。少奇同志在视察中和座谈会上，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同志及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分别陪同少奇

同志进行视察和参加了座谈会。

少奇同志在视察中和座谈会上，对工业、农业、教育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重要指示。

在工业方面，少奇同志特别强调一人多艺，一物多用、一厂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说：一个工人应该学会多种技术，做个多面手。古人能够学会“十八般武艺”，我们应该比古人好一些，学会它十九样、二十样技术。这是个方向。一个东西也要叫它有多种用途。能不能使一个车床既能刨又能钻、能磨、能旋？少奇同志认为，一个工厂应该生产多种产品，有正业有副业，不要单打一。对于冶炼钢铁问题，少奇同志说，所有的工厂都应该尽可能自己炼，不要依赖别人；农村一些没有矿石的地区，可以组织一个班子到有矿石的地方去开采冶炼，自己出人出钱，再请出矿石的地方协助。少奇同志还十分关心工厂下放的问题，他说，现有的厂矿能够下放的尽量下放，新建的也应该分散到各地，交地方负责，这就会更好地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谈到厂矿如何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时，少奇同志说，一方面要靠改良工具和改进技术，同时，也要改善劳动组织，充分发挥人的潜力。至于必须增加新工人时，则应尽力把城市的人特别是职工家属组织到生产中去，不要到农村去找人，因为农民也很忙。少奇同志对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管理等问题，也作了重要指示。

在农业方面，少奇同志很赞扬寿张县委及台前、前进、宏伟、先锋等农业社的干劲和钻劲。他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了，这是个革命。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的亩产将达三万至五万斤的玉米、三万至五万斤的谷子、三十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一万五千斤籽棉的丰产田后，特别强调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深翻土地和改良农具、改进技术的重要性。对于保证农业跃进的水利问题，少奇同志强调地上水和地下水要综合利用。他说，搞地上水是必须的，但不完全可靠，应该大力搞地下水，多打大机井，来个双保险。要进一步改善大地畦田，使防涝、防洪和蓄水结合起来。

关于教育问题，少奇同志说，应该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设法逐步做到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学校，半工半读，学生是工人，工人也是学生。农村也可以这样做，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让他们包产，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既是学生又是农民。少奇同志说，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

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集体化，既省钱又省人，使广大妇女能够更好地参加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少奇同志在视察中，受到了工人、农民和干部们的热烈欢迎。大家一致为少奇同志的健康而高兴，为少奇同志能够视察自己的工厂、农业社而感到莫大的光荣。少奇同志的视察和所作的指示，给大家以极大的鼓励和更大的干劲。机床二厂党委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立即决定着手培植两个兄弟厂，代替本厂制造现在生产的中、小型刨床，以便腾出手来制造大型的龙门刨床。并采取措施，自己炼铁炼钢，保证今年炼铁一千九百吨，产钢两万吨，以解决钢铁供应的困难。工人们说：少奇同志来了，觉得身上有了更足的劲，一定在生产上干出新的成绩来。联合车间修订了自己的计划。除完成今年跃进计划外，保证再增产二十台刨床。成记面粉厂的全体职工，在少奇同志视察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少奇同志，保证在生产面粉的同时，大搞炼铁炼钢，保证到年底炼铁二千五百吨，钢胚九千五百吨。他们还要大闹技术革命，以求更快地把一些笨重的体力劳动改成机械化操作。

以干劲和钻劲而闻名的台前社和宏伟社的全体社员，在少奇同志参观了他们的丰产田

后，干劲又加上更大干劲，钻劲又加上了更新钻劲。台前社已决定由原计划每亩年产两千斤提高到四千斤，争取六千斤。宏伟社的棉花丰产田，由原计划的亩产一万五千斤籽棉提高到两万斤；姜店乡委决定，使全乡所有的农业社的棉田，都来一个新的跃进，努力赶上宏伟社，以回答少奇同志的关怀。

（8月4日《光明日报》）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

《红旗》编辑部按：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是由嵖岈山附近的二十七个农业合作社在今年四月间进行合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有九千三百六十九户。这个公社八月间拟定了试行简章草案，本刊特为发表，以供研究和参考。

第一条　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愿联合起来的社会基层组织，它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第二条　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

为此，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在社会的产品很丰富和人民有高度觉悟的条件下，逐步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过渡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第三条　年满十六周岁的公民都可以入社做正式社员。对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允许他们入社做非正式社员，依照法律取得政治权利的，可以做正式社员。

社员都有遵守社章，执行社内的决议，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的义务。正式社员除了有精神病的以外，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和监督社务的权利。非正式社员在社内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但在经济上可以和正式社员享受一样的待遇。

第四条　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各个农业合作社社员所交纳的股份基金，仍分记在各人名下，不计利息。各个农业合作社社员的投资，由公社负责偿还。

因为迁入和长大到十六周岁而入社的社员不要补交股份基金；迁出和死亡的，也不能抽走股份基金。

第五条　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

禽，仍归个人私有。社员私有的牲畜和林木转为全社公有，应该折价作为本人的投资。

单干户加入公社，除了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以外，应该将全部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这些生产资料，要按照原农业合作社的规定，折价抵交股份基金，多余部分作为本人的投资。

第六条　公社必须继续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土壤、普及良种、繁殖耕畜、防治病虫害、合理地密植、深耕细作，保证农业生产的继续高涨，公社必须积极地改良农具，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电力化。

公社必须尽快地发展工业，首先是建立开采矿产、冶炼钢铁、制造滚珠轴承、加工农产品、制造农具、制造肥料、制造建筑材料、修理机器、水力发电、利用沼气以及其他的工厂和矿场。

公社必须有计划地兴修道路，疏浚河道，改善交通工具，安装电话，逐步建立现代化的交通网。每个大队要设一个至两个邮递员，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为社员服务不另收费。

第七条　公社要建立供销部，它是国营商业的基层机构。供销部的资金由上级国营商业机关拨给，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供销部的盈余应当上缴给国营商业机关，但公社可以提取一定的比例。公社必须保证供销部完成国家的统购、统一收购任务，执行上级国营商业机关的计划和制度，同时有权对供销部进行具体的业务领导。

供销部要在各大队建立分部，并且在各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建立门市部，在开饭的时间营业，做到普遍地便利群众。供销分部单独核算，盈亏由供销部统一负责。供销分部的资金，先由社员过去所交纳的供销社股金抵充，如果不够，再由供销部设法补足，这些股金不再分红。

供销部参加县供销合作社为社员。

第八条　公社要建立信用部，信用部是人民银行的营业所。信用部的资金，由上级人民银行拨给，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信用部的盈余应该上缴给上级人民银行，但公社可以提取一定的比例。公社必须保证信用部执行上级人民银行的计划和制度，同时有权对信用部进行具体的业务领导。

信用部应当在各大队建立分部，并且在各生产队设立服务站，做到普遍地便利群众。信用分部单独核算，盈亏由信用部统一负责。信用分部的资金，先由社员过去所交纳的信用社股金抵充，如果不够，再由信用部设法补足。

信用部和各个分部是公社和各个大队的金库，成宗的现金出纳，都应当经过信用部和各个分部办理。信用部办理公社与其他经济单位之间，以及公社内部各核算单位之间的非现金结算，对社员不实行非现金结算。

第九条　公社要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

公社实行与劳动密切结合的普遍义务教育。要普遍地设立小学和业余的补习学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够入学，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小程度。要逐步做到每一个大队建立一个业余农业中学，使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中程度。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学校或者大学。在将来生产高度发展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减少社员劳动的时间，增加他们学习的时间。

公社要鼓励和帮助社员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工作，首先是进行培养良种、改良土壤、栽培林木、繁殖牲畜、消灭病虫害、改进耕作技术和改良工具的研究和试验。

第十条　公社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壮年和复员退伍军人应该编成民兵，经常进

行军事训练，并且担负国家所分配的任务，民兵在受训和执行任务期间，工资照发。

公社要负责动员兵员和安置复员军人的工作。烈士家属、残废军人和在役军人，他们的家庭缺乏劳力的，由公社给予适当的优待。

第十一条　公社按照乡的范围建立，一乡一社。为了便利工作，实行乡社结合，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乡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任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乡长兼任社长，副乡长兼任副社长，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兼任乡人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第十二条　公社的最高管理机关是社员代表大会，公社的重大事务，由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社员代表大会应当包括各个生产队和各个方面（例如妇女、青年、老年、文化教育人员、医务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工业人员、商业人员、少数民族等）的代表人物。

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社务。管理委员会由社长一人、副社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下设若干部或者委员会（例如农业、水利、林业、畜牧、工业交通、财政粮食、商业、文化教育、内务劳动、武装保卫、计划、科学研究等），分别掌握有关的工作，各部和委员会的人选，由管理委员会提名，社员代表大会通过。管理委员会可以推选出常务委员，处理日常工作。

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监察委员会监察社务。监察委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在工作上接受国家监察机关的领导。

社员代表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任期均为两年。对于极不称职的个别人员，在任期未满以前，原选举单位可以撤销他的职务。

第十三条　公社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以便实现生产当中的责任制。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将全社划分为若干生产大队，每一大队又划分为若干生产队，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在保证完成全社总计划的条件下，生产大队有具体组织生产和基本建设、具体支配生产开支和奖励工资的一定限度的机动权。大队和生产队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或者节约了生产开支，公社和大队应当适当地拨给奖励工资。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候，以大队为单位建立拖拉机工作队。工厂、矿场、林场、牧场等，规模较大的由公社直接管理，规模较小的可以交给大队管理。小型的机器和设备（例如缝纫机、沼气池、制造颗粒肥料的设备等）可以交生产队管理。

大队设立社员代表会议，由本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大队社员代表会议选举大队长一人、副大队长若干人及委员若干人组成大队管理委员会　选举监察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监察委员会，任期均为一年。

生产队由队社员大会选举队长一人、副队长若干人组成队务委员会领导工作。

第十四条　公社在收入稳定、资金充足、社员能够自觉地巩固劳动纪律的情况下，实行工资制。按照每个劳动力所参加工作的繁重和复杂程度，以及本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劳动态度好坏，由群众评定他们的工资等级，按月发给不同的一定的工资，有特殊技术的，可以另加技术津贴。逐月所发的工资可以有多有少。在公社收入较多和社员需要较大的月份，工资可以多发，其余的月份可以少发。遇到特大的灾害，可以酌情少发工资。

在实行工资制以后，应当定期评比各个单位和各个人的劳动情况，对于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很好的，应该发给奖励工资；对于工作消极、没有完成任务的，可以扣发工资，作为处罚。全社全年的奖励工资，最多可以占到基本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一。奖励工资分为三部分，分别

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掌握。分配工作任务和评比劳动情况，要以平均先进定额为依据。

实行工资制以后，旷工照扣工资，但每人每月可以请假两天，妇女可以请假三天，工资照发，妇女生孩子可以休假一个月，工资按半数发给。因公负伤的，在休养期间，工资照发。因为久病旷工影响生活的，用公益金给予补助。

在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的时候，可以先实行计件工资制，规定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每月按照社员实做劳动日多少，发给一部分或全部劳动报酬。

公社的管理机构要厉行精简，全部管理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全社工资总数的百分之一，各种会议也应当加以精简，尽量使它不侵占生产劳动的时间。

第十五条 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必须使家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

对于个别不好好劳动并且屡劝不改的懒汉，经过社员公议，可以监督他们从事劳动，加以改造。

第十六条 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的基础是全体社员"各尽所能"。每个社员都应该自觉地遵守以下的劳动纪律：（一）积极参加劳动；（二）爱护公共财产；（三）保证工作质量；（四）服从指挥调动；（五）自动进行协作。

公社要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依靠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开展共产主义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评比，逐步使"各尽所能"成为每个社员的自觉行动。

第十七条 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参加食堂的，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所收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公共食堂要经营菜地，喂猪喂鸡，不断地改善伙食。

第十八条 公社要逐步建立和健全医疗机构，逐步做到：社有中心医院，能够收容一般重病号；大队有门诊所，能够诊治轻病号；生产队有保健员和接生员，能够进行预防疾病，看护病人和为产妇接生的工作；在有条件的时候，公社要建立疗养院。

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社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合作医疗费，就诊不另交费。中心医院对无法治疗的特殊重病号，应该介绍到适当的医院治疗，并负责开支旅费和医药费，但对衰老病和慢性病的人，暂时不作介绍。在经济充足的时候，公社实行公费医疗。

第十九条 公社对于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废的社员，要在生产上和生活上负责加以安排和照顾，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必要的保证。公社要组织幸福院收容没有儿女的老年人，组织他们参加轻微的劳动，给予必要的供给，使他们愉快地渡过晚年。

公社要建立公墓。在生产和建设需要的时候，经过坟主同意，可以迁移现有的坟墓。

第二十条 公社要逐步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对全社居民点的安排和住宅的建设，做出通盘的、长期的规划，并且逐步付诸实施，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小的居民点可以适当地、逐步地合并。

按照规划新建住宅，由公社统一备料派工。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租金要相当于维持修理所需要的费

用。

第二十一条　公社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培养身心健全的共产主义公民。要逐步做到社有图书馆、剧场和电影放映队，大队有俱乐部、业余剧团、歌咏团和球队，生产队有小型的书报阅览室和收听广播的设备。

第二十二条　公社每年的全部收入，应该按照以下的项目进行分配：

一、扣除当年度消耗的生产费。

二、扣除公共财产的折旧。

三、向国家纳税。

四、支付社员的口粮。

五、支付社员的基本工资和奖励工资。

六、留下公益金，用于教育、卫生、文化及其他福利事业。公益金一般不超过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

七、其余部分，全部作为公积金，用于储备和扩大再生产（包括交通建设）。公社应该逐步做到有够用一年至二年的粮食储备和必要的工资基金。

收益分配工作以保证高速度地扩大再生产为原则。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应当逐年提高，但工资提高的速度必须低于生产增加的速度。在社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包括粮食供给）达到富裕中农生活水平以后，工资提高的速度应当放慢，以保证尽快地发展工业，保证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电力化。

第二十三条　公社实行计划管理，根据国家的经济计划和本社的具体情况，制订长期的建设规划和年度的计划。公社对各生产大队、工厂、矿场、牧场、林场，生产大队对各生产队要分别规定具体的产量计划、技术措施计划、生产开支计划和劳动力使用计划，以便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合理地执行奖惩制度。

制订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产品交售计划、商品流转计划、机器设备采购计划、金融计划和工资计划，必须经过国家计划机关及有关部门审核平衡，然后付诸实施。

第二十四条　公社实行民主管理。公社、大队、生产队、工厂、矿场、林场、牧场、拖拉机工作队、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食堂和民兵组织，都必须建立活泼的、经常的民主生活。各个核算单位的财务收支账目，和奖励工资的分配清单，必须按时公布。一切管理人员都必须尽可能地参加生产劳动。要发动群众运用大字报进行批评、自我批评、表扬和建议，以便不断地克服工作当中的各种缺点。

第二十五条　公社必须实行勤俭办社的原则，要发动社员勤劳生产，充分利用公社本身的力量，克服各种困难。要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各种非生产的设备和建筑，可以从简的应该尽量因陋就简。

第二十六条　公社必须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各个核算单位都必须及时制订财务收支预算，都必须遵守使用现金的制度和手续，都必须按时清结账目。

一切公共财产都必须有专人负责保管。对于不负责任造成公共财产的损失的，公社应该给以批评或者处分。对于贪污、盗窃、破坏公共财产的，应该严肃处理；对于情节严重的，要请上级司法机关法办。

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

毛主席在八月上旬视察了河北省徐水、安国和定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等随同毛主席进行视察。

毛主席在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农业社的粮食加工厂和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接着又在社干部的陪同下参观了这个农业社的幼儿园和供养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的"幸福院"。在"幸福院"里，毛主席同老人们亲切地握手致意。毛主席还视察了这个农业社的食堂，并且到田间视察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回到县里，毛主席又看了县办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毛主席对徐水县人民的干劲表示满意。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问张国忠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哩！"毛主席指示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又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毛主席在定县和安国县的农村视察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对农业社社员们生产大跃进的成就表示高兴。在安国县流村红星农业社的丰产田里，毛主席和正在那里劳动的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王长锁亲切握手。毛主席还到一块高粱地里观看了高粱的生产情况，并且和围拢上来的社员们握手谈话。社员们向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在徐水、安国等地视察的时候，毛主席都关切地询问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并且同群众作了亲切的交谈。

毛主席在徐水等地的视察和对群众的关怀，大大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徐水县委在当天夜里召开了全县的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保证一定要使今年的粮食和工业等各个战线上都获得大丰收。全县十一万多名农民经过两天一夜的苦战，就积肥三十一万四千六百多车，大秋作物追肥六万六千六百多亩，除草八万多亩。中共定县县委在毛主席离开的当天晚上也召开了三百多负责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全县在两天时间内除大搞积肥追肥外，并新建起化肥厂两千三百二十座。安国县决定今年全县粮食产量力争达到亩产四千五百斤，为保证实现明年亩产小麦二千斤的计划，决定每亩施底肥十五万斤，全县乡乡社社都召开了跃进大会，形成了一个新的生产高潮。

（转自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同志视察河南农村

（一九五八年八月）

毛泽东主席在八月六日到八日视察了河南农村。

毛主席在河南省视察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和棉田；襄城县梁庄、薛元等农业社种植的烟叶和谷子；长葛县“五四”农业社的玉米田和商丘县道口乡中华农业社种植的红薯和稻子。当毛主席在这些地方视察的时候，干部和群众都向毛主席热烈欢呼，并且争着向毛主席报告农业社发展、巩固的情况和农业大丰收的情况。毛主席在视察时同群众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陪同毛主席进行视察的有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吴芝圃，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史向生以及有关地、县、乡的党委负责同志。

六日下午，毛主席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乡。这里的人民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道路，已经在全乡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七里营人民公社。毛主席询问了这个公社的情况，并且参观了这个公社的托儿所、“幸福院”、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又到田间观看了棉花的生长情况。毛主席和在“幸福院”里过着晚年幸福生活的老年人握手，并且谈了话。在滚珠轴承厂里，毛主席详细地观看了用土法生产滚珠轴承的过程，他对这个小工厂在两天时间里就生产出五千多滚珠极为称赞。毛主席对于田间一望无际长得特别好的棉花感到特别高兴。毛主席走到正在棉花地里喷射杀虫药剂的女社员面前提议说：“作作给我看看”，六个女社员兴高采烈地给毛主席作了表演。毛主席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棉花的果枝上棉桃成串，他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毛主席从棉花地里走出来向社干部说：“象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笑着向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象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主席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主席在襄城县的梁庄农业社、十里铺乡薛元农业社等地观看了烟叶和谷子生长的情况。这里种的云南多叶烟，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每棵有七十多个叶，每亩计划产三万斤。毛主席高兴地走到烟叶地里，仔细地观看了烟叶的生长情况，并向梁庄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张富德等详细询问了烟叶的种植和收获等方面的问题。

在长葛县“五四”农业社，毛主席观看了长得很好的麦茬玉米。这里有四十亩密植麦茬玉米，已经长到六尺多高，计划亩产两万斤，附近的另一块干部玉米试验田长得更好，计划亩产两万五千斤。毛主席称赞了这些生长良好的玉米。毛主席问县委书记吕炳光今年的产量，吕炳光说：“保证一千五百斤，争取两千斤。”毛主席笑着问：“能达到吗？”吕炳光满怀信心地说：“一定达到，秋后到北京给主席报喜。”

在商丘县道口乡中华农业社“七一”试验站，毛主席看到了架秧和不架秧的两种试验红薯以及这个社第一次试种的水稻，并且对这些作物生长的情况表示满意。毛主席看到高

粱的时候，就问："有没有种多头高粱？"商丘地委第二书记任秀铎回答说，有许多地方种了这种高粱。毛主席说："这种高粱产量高。"

毛主席在河南农村视察了三天后已经离开河南。毛主席这次视察给河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无比的力量，各地人民决心以更大的成就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视察过的农业社都修订了生产计划，决心争取更大的丰收。

（1958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

（一九五八年八月）

毛主席在八月九日到山东省进行了视察。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毛主席汇报了山东省各项工作的情况。毛主席就各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特别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毛主席还一再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毛主席还指出了办大社的优越性。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主席在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了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在去北园农业社的路上，毛主席看到路旁秆粗穗大的谷子时，接连向陪同他参观的谭启龙、裴孟飞和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等同志赞扬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孬嘛，我看群众干劲不小！"到了北园社。毛主席和前来迎接的乡、社干部一一握手，接着就视察藕田和丰产稻田。这个社有二千五百多亩藕田和二千一百多亩稻田。在视察稻田的时候，一群青年小伙子在田旁列队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这是社里的"青年卫星队"，他们正准备在稻田里锄草。毛主席亲切地握了每个队员沾满泥巴的手，还同小队员韩茂林谈了话。

这里的水稻生长得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主席还询问了这个社妇女参加生产的情况。

接着，毛主席视察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毛主席问这个所的副所长秦杰是什么专家，秦杰回答说是研究棉花的。毛主席详细察看了中共山东省委负责同志和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在这里合种的棉花试验田。这块田里的棉花有一人高，长得象棉花树一样，估计每亩能收五千斤籽棉。毛主席亲手剥开棉壳，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一株棉花的棉桃，这一棵已长棉桃六十四个。数完以后，毛主席微笑地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秦杰说，

过去搞得不大好，只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后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毛主席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当秦杰汇报说棉花容易落桃时，毛主席说："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毛主席还问秦杰："你们行还是农民行？"秦杰说："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就没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赶过农民。"毛主席鼓励秦杰说："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视察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后，毛主席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陪同，和这个部队正在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见了面并合影留念。在和代表们见面的时候，毛主席还和长征时期曾做过他警卫员的陈昌奉上校作了亲切的谈话。

在济南期间，毛主席还会见了来济南参观全省小麦丰产评比展览馆的著名劳动模范、农业社干部吕鸿宾、刘秀印、刘洪章、徐建春、刘廷茂、厉月举、张式瑞等人，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并且勉励他们说："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在到达济南以前，毛主席还分别在滋阳、泰安等地，听取了中共济宁、泰安地委负责人和中共滕县、滋阳、泰安县委负责人的汇报。

毛主席的视察，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无限的力量，北园农业社的中共总支委员会当晚就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全体社员，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实现丰产水稻和各项作物的计划产量，还要大量培植各种"卫星"田；同时决定把毛主席来农业社视察的情况写成喜报，送给全县所有的农业社，使全县人民共享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并且和全县各农业社携手并进，决心为实现双千斤县而奋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全体干部，在毛主席参观以后更加鼓足了干劲。副所长秦杰表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科学研究跟农民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并且把解决棉花落桃问题当作一项重要课题来解决。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刘　西　瑞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

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半尺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象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

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需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6.6%，田间管理占10.8%，收获入仓占12%，而运肥、施肥就要占64%，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20%—30%。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8月27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

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现在就应该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作合理的布局。

社的规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三、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

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并大社，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社规模的大小，并大社，转公社进度的快慢，以及做法和步骤，都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但是，无论在秋前秋后或者今冬明春合并，都应该从现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连起来，共同商量，统一规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设，统一安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

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的问题

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

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暂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

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转自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近十个月来农业生产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夏季大丰收和即将取得的秋季更大的丰收，已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是作好一切工作，完成一切任务的基本保证。五亿农民在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总路线宣传教育运动等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政治觉悟愈来愈高。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个人主义或只顾本队、本社、本乡、本县的本位主义，已经大大削弱了；城乡协作，工农业协作，大公无私，互相支援的可歌可颂的共产主义行动，已经大大发展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可珍贵的精神力

量和物质基础。为着及时地总结经验，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保证一九五九年夏季和全年全面的更大丰收；为着就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分配问题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进行鸣放辩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必要的。

（二）这个运动的内容应当是：总结和宣传一年来农业生产大丰收的成绩，具体生动地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胜利，总结和宣传从去年冬季以来的农田基本建设，水、肥、土、种、密，和田间管理等各项农业增产措施的经验，总结一年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经验，以及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经验，广泛宣传这些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要宣传工业、文教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空前大跃进，宣传丰衣足食的规划，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幸福的前景。

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并且，引导群众回忆三年来"马鞍形"的历史教训，彻底批判"靠天吃饭"的"条件论"和"照着前人脚印走路"的"习惯论"，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大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不仅在大丰收的事实面前哑口无言，而且在思想上彻底破产。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三）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合理分配？如何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农村中人人关心的两大问题。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时候，应该发动所有的农民，就这两个问题展开鸣放辩论，并且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今年的农业生产大发展，农业社的收入大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一般也应该略有增加，但是不宜增加过多，主要是增加社的公共积累。公共积累要有一部分用来发展集体的文化，福利事业，但是，首先应该用于农业和社办工业的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社的公共积累，除了用来发展本社的生产事业和福利事业以外，还应该有一部分交由县以上的机关统筹举办地方性的和全民性的生产事业和福利事业。应该通过鸣放辩论，发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

工农商学兵合一，乡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应该通过鸣放辩论，使广大农民充分了解人民公社比原有的农业社具有更伟大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把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并且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来解决与转为人民公社有关的各种经济问题，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四）在广泛宣传大跃进、大丰收、大胜利，群情兴奋，干劲冲天的局面中，结合进行党员团员的整风工作和整社工作，扩大农业社和生产队的规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坚持干部种试验田、同社员一起劳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制度，广泛吸收社员参加社务管理，特别是田间作业管理，在办社工作中更加发扬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大大表扬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成批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把其中的优秀人物选拔到各个领导岗位上来，组织一支坚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队伍，并且吸收其中的先进部分到党内来，增加党的新鲜血液。至于个别地方，少数乡社，整风反右不彻底，"五气"还没有扫除，则必须认真整顿，对屡教不改有严重右倾保守思想还居于领导地位的，必须坚决撤换，保证全面大跃进。这样做，

比孤立地整风整社，更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也更有利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运动的积极作用.

（五）运动自始至终，都应该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场会、展览会等等形式，做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 应该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觉悟提高、干劲更足的基础上，在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特别是夏季更大丰收的增产计划，以及水、肥、土、种、密、工具改良、田间管理等项增产措施的实施计划，制定出比较长期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全面的远景规划. 通过这一切，掀起一个比一九五七年冬季以来更大的冬季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九年夏季更大的丰收，争取一九五九全年粮、棉、油全面跃进，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修改稿)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到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并且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一九五九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 同时对于一九五九年若干指标作了调整. 会议的决定如下：

（一）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全党全民努力贯彻执行了"三大并举"的方针，大大的发扬了全党全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更突出的，是农业战线上的胜利. 这些胜利，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的更大跃进和第二个五年的宏伟计划准备了顺利的条件.

（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机床产量达到三十万台，发电量达到五百五十亿度，煤产量达到三亿七千万吨，石油产量达到八百万吨，棉纱产量达到一千万件，新建铁路一万零四百公里. 为了实现这些指标，并且为一九六〇年的建设作准备，一九五九年的财政收入七二二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拟定为五百亿元；地方和企业的自筹资金在外.

实现一九五九年这个计划，我国的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以外，都将超过英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和棉花的指标，都将提前八年超额完成.

（三）在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基础上，准备在一九六〇年使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科学上基本上掌握原子能和喷气等尖端技术，经过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的苦战，再加上此后两年的继续努力，即到一九六二年

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就是说，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建立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各协作区都应当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应当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全国和各地方在建设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合理地分布工业生产力，按照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在目前多建中小型企业的方针，使企业的布置适当分散，以适应国防安全，特别是适应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全国走向平衡发展的共产主义要求。

（五）计划必须统一，代表全民的利益，集中全民的意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继续按照"三个并举"的方针，实行分级管理，加强协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地方的、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乡、社的经济和文化的建设，统一由县负责规划；专区、县的经济和文化的建设，统一由省、市、自治区负责规划；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建设，经协作区综合平衡后，由中央统一规划。重要的原材料和设备，由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当地生产和建设的需要，统一分配，统一调拨，同时给地方留出适当的机动数，并且规定超产部分的分成比例。在实行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的"大包干"制度以后，在确保国家规定的生产指标、新增生产能力和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各协作区和各省、市、自治区有权对本地区内的建设项目、企业规模、投资分配和物资使用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和适当调整。

（六）各级党委必须抓紧今后四个月的工作，特别是要保证在今年内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和冶金设备、发电设备、机床的生产任务。各地方、各部门和各企业应当继续鼓足干劲，把一切在目前条件下能够挖掘出来的潜在力量都挖掘出来，更好地超额完成一九五八年的跃进指标。

（七）在保证今后农业继续跃进的条件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立即把主要力量转到工业战线上，全民全党办工业，由第一书记挂帅，抓紧工业的生产和建设的工作，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采取能够迅速发挥作用的措施，推动工业的技术革命，开展评比、竞赛运动，交流经验，以便在尽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掀起一个工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八）为了加强经济建设的组织工作，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都要有计划委员会、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分别管理有关计划、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三个方面的工作。

（九）各省、市、自治区应当以这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计划草案为依据，在本年十月二十日以前编制出本地区的全面的计划草案，分年分省主要指标由各协作区加以平衡，报送中央。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修正稿)

中央、主席：

最近我们根据中央和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指示，参照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形势和一九五九年计划安排的情况，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又作了一次研究，现在提出以下的意见，提请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

（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工业现代化的主要的要求是：全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美国。

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的要求是：农业劳动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凡有条件的农村基本上实现电气化；农作物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实现水利化；全部耕地深翻一次。

发展科学文化的主要的要求是：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在主要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上先进的水平；普及中等教育；大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

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的要求是：全体人民丰衣食足，进一步改进居住条件，同时消减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

（二）根据上述目标和要求，我们对一九六二年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初步的计算，详见附表。现在简要说明于后：

第一、在重工业方面，是以钢为纲来进行安排的。一九六二年如果生产钢八千万吨，则相应的主要指标为：发电量三千亿度，原煤九亿吨，原油五千万吨，铜九十万吨，铝一百四十万到一百五十万吨，化学肥料六千万吨，塑料八十万吨，人造橡胶七十万吨，金属切削机床五十万台，汽车五十万辆，拖拉机三十万台，海洋船舶五十三万吨（载重量），原木一亿三千万到一亿五千万立方公尺，水泥九千万吨。

第二、在轻工业方面，一九六二年生产棉纱二千六百万件，纸一千万吨，糖一千万吨，食用植物油一千万吨。

第三、在农业方面，一九六二年的粮食产量，将在达到一万五千亿斤的基数上根据需要增产，并且适当调整产品品种；棉花生产一亿五千万担；猪达到七亿头；其他的经济作物和牲畜也应当予以充分注意，争取有更大的发展。

第四、在交通运输方面，以铁路运输为主，实行各种运输工具的综合利用，并且使水运将有较快的发展；一九二六年铁路货运量将达到十九亿至二十亿吨；五年合计，新建铁路五万五千公里到六万公里。

按照上述主要指标推算，一九六二年的工业总产值约为五千七百亿元，将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七点四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三左右（比一九五八年预计数增长四点三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左右）。一九六二年农业总产值约为二千四百亿元左右，将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倍半到二点八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比一九五八年预计数增长一点二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七左右）。在一九六二年工农业的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为了实现上述指标，第二个五年必须进行巨大规模的建设。初步估算，第二个五年合计的基本建设投资约需三千八百五十亿元，比第一个五年增长六点八倍左右。由于投资定额比第一个五年大大降低，一般是一个钱办两个钱甚至更多的事，因此实际的建设规模比投资表现的要大得多。

第二个五年工业方面的重大建设项目，初步安排了一千个以上（过去曾提出八百个左右，包括不全），这里面还没有全部包括为第三个五年的建设所必需的、要在一九六二年底以前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因此，重大建设项目实际上将会更多一些。至于中小型的建设项目，将由各省、市、自治区在编制计划的时候，根据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具体安排。

粗略计算，第二个五年内需要增加职工二千八百万人左右，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约二百二十万人左右，这一方面，也必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加以妥善安排。

如果要在一九六二年争取钢的产量达到一亿吨，那末，各项有关的指标都还要相应提高，各项有关的工作也要相应地加以部署，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制造能力在一九六〇年以后还应有所增长。现在看来，只要我们抓紧前三年的工作，在一九六二年生产一亿吨钢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将在上述以八千万吨钢为纲所安排的各项主要指标的基础上，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安排（初步估算数字，见附表第二方案），争取一亿吨钢的方案实现。

上述生产指标和建设任务实现之后，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将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一，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工业上做到独立自主。一九六二年前后，可以每年提供年产二千万吨到二千五百万吨钢的冶金设备和三千万瓩左右的全套发电设备，可以提供象一万二千吨以至更大的水压机、三十万瓩的水力发电机组、直径一千一百五十公厘的大型轧钢机等各种重型设备，以及大型座标搪床、光学仪器、各种精密仪器等。

第二，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保证全国有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的耕地采用机器耕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实现水利化，全国每亩耕地平均施用化学肥料六十斤以上，从而大大增强农业战线上征服自然的力量。

第三，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可以掌握原子能、喷气、无线电电子学等"尖端"的科学技术，在工业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同时，农业和医学将完成中国特有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工作，而居于世界上最先进的地位。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到一九六二年每人平均的消费量可以达到：粮食五百五十到六百斤，肉类一百斤，食用植物油二十五斤，食糖二十三斤，各种布一百尺。城市职工和乡村农民消费水平之间的距离将大大缩小。同时，由于大力普及教育，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将显著地提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日益缩小。

第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空前提高，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人民公社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基层的主要形式。

上述这些变化说明：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们将建成社会主义，并且为第三个

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物质的和思想的某些条件。

（三）对第二个五年建设的部署，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三个并举”方针的条件下，首先必须苦战三年，突破重点。主要抓三个“元帅”和两个“先行”。在一九六〇年，粮食产量要达到每人二千斤，使我国的建设事业能够在生活资料充分供应的条件下顺利进行；钢产量要达到五千万吨，并且在品种方面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冶金设备、发电设备和重型机床的制造能力要增长上去，做到自力更生。同时，铜和铝，电力、煤炭和石油，水泥和木材，化学工业特别是基本化学工业，都应当有相应的增长。运输方面也必须有适当的安排。

在集中主要力量抓重点的时候，又应当注意其他经济部门的相应发展，以便为后两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面跃进，为人民生活的更大改善，创造顺利的条件。总之，应当全面安排，重点突破，有步骤地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时地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第二、把保证速度和合理布局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为了保证速度，某些原来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在工业上进行适当的扩建改建是需要的，但是为了促进全国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必须积极地建设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应当积极支援经济落后地区，沿海工业基地应当积极支援内地。所有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考虑国家规定的外调任务和协作任务以外，应当根据本区的需要来合理安排。

为了适应国防安全的要求，特别是适应逐步消灭城乡界限、全国经济走向均衡发展的共产主义要求，企业的布置应当适当分散，并且利用现有的中小城市和集镇；先从事生产再逐步进行城市建设；企业的规模除必要的骨干项目以外，应当多采取中小型。

现有的大城市除了安排必要的大型企业、高级的精密的械械工厂、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和试验机构外，应当尽可能地少安排一般的企业。

第三、科学技术上抓两头，带动中间，即抓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和“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基本建设，带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改造。采取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土法和洋法相结合的方针。土法固然要一步步提高，洋法也要不断改进，使之适合于我国情况和符合于多快好省的要求。

群众的创造发明和各种科学研究成果，应当及时总结和推广，这是使科学技术迅速地为生产服务的关键性措施。

第四、采取“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加强协作、共同负责、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计划方法和管理方法，使计划性和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各方面的积极性应当纳入计划，在加强计划性的条件下应当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各级的计划都应当是全国统一计划的一部分，全国的计划由中央、省市（自治区）、县三级分别管理，共同负责，保证完成。重要的原材料和设备由中央有关部门统一分配，以便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点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各有关部门在分配的时候，应当给地方留出一定的机动数，并且规定超产部分的分成比例，由地方支配。实行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的“大包干”制度。各地区在保证完成国家的生产指标、重点项目、新增生产能力和财政收入的条件下，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按照多快好省的要求，对生产、建设事业进行统筹安排。

（四）考虑到今年的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今后四个月各地方和各部门将把主要力量放在抓今年的工业生产、建设和编制明年计划方面，因此提议正式编制第二个五年

附：　　第二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初步意见（一）

指标	计算单位	1957年 实际	1958年 预计	1962年 第一方案	1962年 第二方案	1962年为1957年的倍数	备考
(一) 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	1,338	2,090—2,240	8,000—8,200	9,000	6—6.1—6.7	每年平均速度43—43.7—46.4%
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	〃	682	1,080	5,700	6,500	8.4—9.5	每年平均速度52.9—57%
其中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产值	〃	99	220	1,500	1,800	15.2—18.2	
农业和农副业产值	〃	656	1,010—1,160	2,300—2,500	2,500	3.5—3.81	每年平均速度28.5—30.7%
(二)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钢	万吨	535	1,100	8,000	10,000	14.9—18.7	
发电量	亿度	193	280	3,000	3,500	15.5—18.1	
原煤	万吨	13,073	21,000	90,000	110,000	6.9—8.4	
原油	〃	146	210	5,000	6,000	34.2—41.2	
生铁	〃	586	1,700	9,000	11,000	15.4—19	
铜	〃	5.3	8—10	90	100	16.9—18.8	
铝	〃	2.9	5	140—150	200	48.3—51.7—69	
镍	吨	50	90	25,000	30,000	500—600	
钼精矿	万吨	0.5	0.8	1.3	1.5	2.6—3	
铬砂	〃	—	—	15	20	—	
化学肥料	〃	80	160	6,000	6,000	74.8	
其中：氮肥	〃	68	116.5	3,000	3,500	41.1—51.5	
塑料	〃	1.3	2.6	80	100	61.5—77	
人造橡胶	〃	—	0.3	70	90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2.83	7.73	50	60	17.7—21.2	
发电设备（成套）	万瓩	19.8	90	2,500	3,600	126.2—181.8	
重型机械设备	万吨			400	500	—	
其中：冶金设备	〃	0.5	10	60	80	120—160	
汽车	万辆	0.75	2.20	50	80	65.5—106.4	

第二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初步意见（二）

指标	计算单位	1957年	1958年	1962年		1962年为1957年的倍数	备考
		实际	预计	第一方案	第二方案		
拖拉机	万台(混合台)	—	1.85	30	35	—	
干线机车	台	167	353	4,500	6,500—7,000	26.9—38.9—41.9	
海洋船舶	万载重吨		1	53	60	—	
原木	万立方公尺	2,787	3,500	13,000—15,000	15,000	4.7—5.4	
水泥	万吨	686	1,000	9,000	11,000	13.1—16	
棉纱	万件	465	632	2,600	2,600	5.6	
棉布	亿公尺	50.5	62.8	260	260	5.1	
纸（包括机制纸和手工纸）	万吨	122	184	1,000	1,200	8.2—9.5	
糖	〃	86	139	1,000	1,000	11.6	
盐	〃	828	1,020	4,000	4,000	4.8	
食用植物油	〃	145	200	1,000	1,000	6.9	
(三) 主要农业产品产量							
粮食	亿斤	3,700	6,000—8,000	13,000—15,000	15,000	3.5—4.1	
大豆	亿斤	200	210	540	540	2.7	
棉花	万担	3,280	5,500—7,000	15,000	15,000	4.6	
花生	万担	5,602.7	9,724	40,000	40,000	7.1	
芝麻	万担	624.6	950	5,400	5,400	8.6	
油菜籽	万担	1,792.5	2,749.2	16,800	16,800	9.4	
猪	万头	14,590	29,000	70,000	70,000	4.5	
(四) 铁路货运量	亿吨	2.74	3.70	19—20	22—24	8.9—7.3 8—8.7	
(五) 基本建设投资（五年合计）	亿元	493		3,850	4,300	7.8—8.7	
(六) 财政收入（五年合计）	亿元	1,350		5,200	5,600—5,800	36—4.1—4.3	

注：一、重工业产品指标，第一方案以8千万吨钢为纲安排；第二方案以1亿吨钢为纲安排。

二、原来1962年生产6,000万吨钢的方案，全国的财政收入估算为4,200亿元，全部投资为3,000亿元。

三、塑料和人造橡胶的指标，还要进一步根据需要计算。

计划的工作，推迟到明年四、五月间进行（某些必需进行的研究工作，应当指定专人继续进行）。编制的方法，可以以各协作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参照我们这次提出的指标，并联系第三个五年的设想，提出计划草案，然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中央各部进行综合平衡，争取在明年第三季度提出全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和第三个五年规划的轮廓草案；也可以考虑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规划合并起来，制订出十年工业发展的"四十条"。

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从八月十七日到八月三十日在河北省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和其他问题。

会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一千斤左右；棉花将达到七千万担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以上。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

会议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按照今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六百二十万吨，比去年增产八十五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五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八百万吨至八百五十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会议初步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会议指出，一九五九年是全国人

民苦战三年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一九五九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一九五八年的速度或者比一九五八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最短期间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且在最短期间根本改变我国的工业落后状态。

高速度的、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要求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严格保持全国范围的建设事业的计划性、纪律性。会议认为：计划工作应该分级管理，各级地方组织应该保有适当的机动权；但是各级的计划都必须是统一的全国计划的组成部分，各级地方组织都必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对国家计划共同负责，共同努力。会议讨论了以深耕为中心的关于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并且作出了决定。

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会议指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建立必须是在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必须通过群众的鸣放辩论。

会议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和教育工作的方针，并且分别作出了决定。会议还对加强民兵工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继续开展除四害运动等问题作出了决定。

从八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中央同时召集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在工业生产会议上，具体讨论了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业生产的领导和检查，加强各方面的协作，保证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生产计划，保证完成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重型机床的生产计划，大力加强铜铝的生产，实行全民炼铜、全民炼铝等项任务。

（转自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之下，发表声明，公然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围，进行战争挑衅，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这个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使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此，我受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如下：

一、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已经由日本的一度侵占归还了中国。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美国政府自己也曾经正式声明不在台湾地区卷入中国的内争。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后来背弃自己的声明进行了武装干涉，台湾和澎湖列岛早已获得解放，早

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管辖之下。这是全世界一切公正舆论所一致承认的、不可抹煞的事实。

二、美国支持盘据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早已被全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并且直接用武力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是同联合国宪章和一切国际法准则直接冲突的。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任何所谓条约和美国国会通过的任何有关的决议，对于中国人民是完全无效的，他们决不能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更不能成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侵略范围的借口。

三、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之下，长期以来就以逼近厦门的金门和逼近福州的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为前哨据点，对中国大陆进行种种骚扰和破坏活动。最近，在美国对于阿拉伯国家发动武装干涉以后，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的骚扰和破坏也更为猖獗。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据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但是，美国为了转移世界人民对于美国在中东继续侵略、拖延自黎巴嫩撤兵的注意，竟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在台湾海峡地区大量集结武装力量，公开威胁要把它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这是对六万万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是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四、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象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地，只会激起六万万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美国在黎巴嫩的侵略军还没有撤走，马上就又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新的战争危险，这就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更加认清了美国侵略者蓄意破坏和平的蛮横面目，更加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切民族独立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

五、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按照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并且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尽管美国以武力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粗暴地破坏了国际关系中最起码的准则，中国政府仍然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和消除。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方面曾经多次建议，双方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发表声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互不诉诸威胁或武力。但是，同杜勒斯在九月四日的声明中所宣称的相反，恰恰是美国拒绝发表这样的声明，到后来连会谈本身也被美国片面中断了。在今年七月中国政府要求限期恢复会谈以后，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及时答复，但是终于指派了大使级代表。现在，美国政府又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但是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所造成的战争危险并未因此减轻。鉴于美国政府往往行不顾言，并且往往用和平谈判的烟幕掩盖它不断扩大侵略的实际行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决不能丝毫放松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威胁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六、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美国一贯企图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

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新华社）

（9月7日《人民日报》）

附：　杜勒斯发表好战声明，公然威胁要扩大对我国的侵略范围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九月四日在罗德岛新港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以后，在艾森豪威尔授权之下，发表了一篇公然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对我国的侵略范围、进行战争挑衅、从而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严重地威胁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声明，声明的全文如下：

我已经同总统仔细地研究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福摩萨）海峡地区侵略性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

总统已授权我发表下述声明。

一、台湾（福摩萨）和金门、马祖各岛从来没有处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管辖之下。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十三年多的时期内——它们一直处于自由中国、即中华民国的管辖之下。

二、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福摩萨）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象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

三、中国共产党人方面现在要夺取这些阵地或其中任何阵地的任何尝试，都将是粗暴地破坏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的原则，即：任何国家不应使用武装力量来夺取新的领土。

四、中国共产党人大约两周以来一直使金门受到猛烈炮轰，而且他们一直利用炮火和小型海军舰只来扰乱金门各岛共约十二万五千军民的正常供应。北平官方电台一再宣布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要用武装力量攻取台湾（福摩萨），也要攻取金门和马祖。在差不多北平的每一次广播中，都把台湾（福摩萨）和沿海岛屿联系在一起作为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标。

五、但是，不管中国共产党人说什么和至今做了什么，还不能肯定，他们的目的事实上是要倾全力以武力征服台湾和沿海岛屿。也看不出，象现在正在进行的或者可能进行的这种努力，是中华民国部队，在象美国正在提供的那样大量后勤支持下，无法以英勇的和纯粹防御性的努力加以遏制的。

六、上面提到的国会联合决议中判定，“由友好政府巩固地掌握西太平洋岛屿锁链（福摩萨就是其中一部分），对于美国以及太平洋中和太平洋沿海一切友好国家的切身利益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决议还授权总统可以不仅用美国武装部队来保护福摩萨，而且可以用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他认为是保证保卫福摩萨所必需或适当的、现在在朋友手中的该地区有关阵地和领土，并且来采取他认为是保证保卫福摩萨所必需或适当的其他措施。”鉴于上面一段所说明的局势，总统还没有根据该决议判定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是保证保卫福摩萨所必需或适当的。但是如果总统断定为了完成联合决议的宗旨按照情况有此必要，

总统就会毫不犹豫作出这种判定。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实在说，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

七、总统和我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政权不会再象在朝鲜表现的那样蔑视作为世界秩序所依靠的基本原则，即不应当用武装力量来实现领土野心。任何这种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行动将引起一个远远超过沿海岛屿、甚至远远超过台湾（福摩萨）安全的这些范围以外的问题。这将预示在远东广泛地使用武力，从而危及自由世界的极为重要的阵地和美国的安全。默然接受这种情况，就会威胁一切地方的和平。我们相信，文明世界大家庭决不会把公然的军事征服宽恕成为合法的政策工具。

八、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希望：北平不至于蔑视人类要求和平的意愿。这并不要求它放弃它的要求，不管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多么缺乏根据。我回想到，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代表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之间在日内瓦进行的持续很久的谈判中，美国做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希望能够特别在台湾地区方面获得一项宣布除非在自卫的情况下共同和相互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但是，这项声明并不会妨碍以和平方法来奉行政策。中国共产党人拒绝发表任何这样的声明。但是，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行动方针是唯一文明和可以接受的程序。就美国来说，它打算奉行这项方针，除非和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使我们除了起来保卫一切爱好和平政府所信奉的原则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新华社）

（9月7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八日上午继续举行。

在今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讲了话。

毛泽东主席说，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在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毛主席指出：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毛泽东主席又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毛主席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毛泽东主席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指出：经过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毛主席说，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毛主席又说，农业和农村工作不能放松，明年农业生产还要继续大发展。关于目前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毛主席说，必须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

毛主席对于中美两国在华沙即将开始的大使级代表的谈判寄予希望。他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

（转自《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

（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政治战线上和想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已经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必须“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文化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这主要表现在全国扫盲运动、教育事业和各种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正确地领导教育工作，坚持党的教育工作的方针，反对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

（二）全国解放九年以来，我国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

是：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的学校；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和特务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中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干部。在教育工作岗位上，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努力执行了党的指示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经犯过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九年的工作，使我们得到了经验，并且使我们有可能更加明确地和系统地提出党和国家的教育工作方针，以便团结全党和一切可能团结的教育工作者，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而奋斗。

（三）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设想的。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教育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所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正确地解释了“全面发展”的涵意。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全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同“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和“教育只能由专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

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同个人主义观点进行斗争），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同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心劳力分离的观点进行斗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斗争）。必须改变政治教育中脱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脱离具体教育对象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评判学生学习成绩的时候，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轻视政治思想工作，和拒绝在学校中设政治课，不论用什么借口，都是错误的。

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现在勤工俭学的运动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事实证明，只要领导得好，参加生产劳动对学生来说，不论在德育、智育或体育方面都有好处，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一条正确道路。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可以自已办，也可以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生可以在学校自办的工厂和农场中劳动，也可以到校外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去参加劳动。学校办工厂和农场，要尽可能注意同教学结合。学校也要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开办学校。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当把学校所办的工厂和

农场，纳入地方的生产计划和商业销售计划，对它们供给原料和推销它们的产品，派技术工人去传授生产技术，并注意指导和组织他们的生产。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可以训练工厂和农业合作社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也应该为其他工业部门或农业部门训练人才；应该注意办技术学校，也应该注意办普通学校来提高所有人员的文化水平，因为这是实现文化革命所必需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必需的。这种学校也应该纳入地方的教育计划，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注意领导这种学校，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师资方面的困难，特别是解决基础课程的师资的困难。在缺乏劳动的学校里强调劳动，在缺乏基础课程的学校里强调基础课程，使两种学校都向自己所缺乏的方面发展，逐步向理论与实际的更完善的结合前进。为了训练大量称职的师资，县以上的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都必须发展师范教育。

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党委应该注意在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和青年团的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所属的学校，在政治上应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员去领导级和班的工作、配备党员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行政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党委书记和委员力求担任政治课的教学、研究工作。学校党委应当在教师中经常注意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思想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一切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也应该放在党委的领导之下。为了加强党在教育事业中的领导，各级党委要输送一批干部到教育机关和学校中去。

（四）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

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全国统一的，违反这个统一性，就破坏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但是，在这个统一的目标下，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即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这就是说，全国将有三类主要的学校：第一类是全日制的学校，第二类是半工半读的学校，第三类是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的学校。

乙、三类学校中，有一部分要担负提高的任务。这部分学校必须有完备的课程，注意提高自己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提高各门学科的水平。这些学校应该在不损害原有水平的情况下，努力帮助建设新校的工作，但降低这些学校的水平，对整个教育事业来说是不利的。为了很快地普及教育，应当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术学校和半工半读的学校，因为这种学校可以全部或者大部解决自己的经费，很少需要或者不需要政府的帮助，因为这种学校可以按照“能者为师”的原则就地找到师资。现在用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术学校和半工半读的学校的形式来普及教育，对于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学校将要逐渐成为在课程、设备、师资等方面日益完备的学校。业余学校在将来有远大的前途，随着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劳动时间将会缩短，这时候，业余学校和半工半读的学校就没有区别

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公共积累的增多，收费的学校也将变为免费的学校。我们的原则，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是"两条腿走路"，不是"一条腿走路"。

丙、为了在教育工作中既能发挥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又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全部的小学中学和大部分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已经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仍属中央各部的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也应当由各部下放给各部所直接领导的厂矿、企业、农场管理。

各大协作区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各省、市、自治区有责任满足中央各部所属学校的招生任务，教育事业发达的地区有帮助教育事业落后的地区的责任，教育事业落后的地区要尽力在三年至五年内做到不向别的省、市、自治区招生。中央教育部负责全国教育事业的综合规划和平衡。

现行的学制是需要积极地和妥当地加以改革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有权对新的学制积极进行典型试验，并报告中央教育部。经过典型试验取得充分的经验之后，应当规定全国通行的新学制。

高等学校的教材，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认真予以修订。中小学教科书，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力量编写，编写时应当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中央教育部应召开各种教材的专门会议，交流经验，推荐较好的教材，确定全国应该通用的那一部分教材，确定各类学校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的科目。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的日期，是七月下半月和八月上半月。在这个统一规定下，各省、市、自治区有权依照当地的情况规定本地区的学历，报告中央教育部。废除全国统一的学历。

地方党委应当组织学校同工业、农业、商业、文化事业、科学研究事业等各方面的协作。

关于职权下放后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协作问题，依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办理。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中的特殊问题，由省、市、自治区作出决定，报告中央教育部。

（五）教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教育事业的。办教育需要依靠专门的队伍，没有强大的专门队伍是不行的。但是，教育工作的专门的队伍必须与群众结合，办教育更必须依靠群众。把教育工作神秘化，以为只有专家才能办教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学生不能批评先生"，那就是错误的。这种迷信，只能妨碍教育成为人民群众的事业，妨碍教育工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而也妨碍教育工作的发展和进步。办教育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贯彻全党全民办学。

在学校内部，在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研究工作等方面，也应该贯彻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1.大鸣大放，大字报，应当成为一切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提高师生政治觉悟、改进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师生团结的普遍和经常采用的方法。

2.制定学校教育计划，制定教学大纲的时候，应当采取党委领导之下教师与学生结合的

方法。

3.对学生进行鉴定、评定学生助学金等的时候，也应当采取在党委领导下，师生结合的方法。

4.教授课程必须贯彻执行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尽可能采取聘请有实际经验的人（干部、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土）专家）同专业教师共同授课的方法。

5.学校领导人员要尽可能在生活和劳动中同学生打成一片。党和团的工作者、政治课教师，应当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学校的财政、建设计划等，应该向全体师生员工公开，使师生员工能参加管理工作。

6.应当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教师应该接近学生，经常了解学生的情况，针对实际情况施行教育，要把"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结合起来。

科学研究，应当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各系的高年级中，应当设立一些介绍或批判资产阶级学说的课程，树立对立面。

必须坚持勤俭办学的原则。把学校的经费用于教学，用于生产，尽量减少用于对改善教学工作和增加与生产无关的项目的经费。

（六）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体教育工作者，为完成这个文化革命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划。

（新华社）

（9月20日《人民日报》）

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曾经在二十日的社论里说过，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九月下旬的钢的日产量必须达到六万吨，生铁日产量必须达到十万吨；十月份，在全国已建成的三十几万座土小高炉中，应该有65%投入生产，其中又有65%能够正常生产，全国还应该有三十个到五十个日产千吨铁的县。现在，除了河南已创造了日产生铁万吨的纪录以外，又有安徽、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山东等六个省已经决定力争在九月底以前达到日产生铁万吨的目标。同时，我们还得到消息说，许多省都在积极准备创造许多个日产生铁千吨的

县．这些都是钢铁战线上一日千里的喜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完成上述的目标大有希望。要使钢铁产量猛烈上涨，关键在于在全国范围内认真贯彻办钢铁工业的群众路线，真正形成一个全民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河南、湖南、贵州等省生铁生产的大跃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拿河南省来说吧：这个省在九月上旬，每天平均只产生铁七百八十多吨，而九月十五日的日产量就跳到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吨。河南省创造这个奇迹的主要经验，就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个有三百六十万人参加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因而能够创造出生铁高产的新纪录。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毛泽东同志说："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现在，六亿人民干劲冲天，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切实有效地把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昂扬的斗志组织起来，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地前进。今年以来我国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工业战线上也是这样，谁发动群众最彻底，群众运动的声势最大，谁就能飞得最快，跳得最远，奇迹也就出现最多。湖南省的邵阳专区，是一个生铁生产发展很快的地区。邵阳专区是怎样组织生铁生产大跃进的呢？最主要的，也就是彻底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们组织了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使"为什么要发展钢铁生产、如何发展钢铁生产"的道理家喻户晓，从而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干部、九十三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七万多人找到一百二十处铁矿和五十一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二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六千多吨焦煤，当群众发动到这样的程度，奇迹就一定会出现．河北省武安县所以能在三天之内使生铁产量从一百多吨提高到一千多吨，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组织了十二万人投入钢铁战线．山东等省为什么敢于提出万吨省的目标？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因而满怀信心．

群众运动也就是革命运动．搞群众运动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必须打倒所谓"正规化"的思想．不打倒"正规化"的思想，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在工业部门中，有一些人一味迷信所谓"正规化"．他们认为，只有用"正规化"的方法才能办工业．他们从没有想过，办工业居然还会有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种办法．他们藐视搞群众运动的方法。他们说这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用来搞农业、搞政治还可以，用来领导具有高度科学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就吃不开了。当然，我们是需要正规化的，但这种正规化必须是革命的正规化，它的标志就是能够最充分地动员群众的力量，能够最多最快最好最省地进行建设！通过群众运动来办工业，这就是我们的正规化．河南、湖南、贵州等省大办土高炉，都完全打破了过去办工业的一套"正规化"的做法，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这就是：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组织战役，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昼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纪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丰收等等．这一套革命的领导方法是同所谓"正规化"对立的方法，没有这种革命的领导方法，不敢向"正规化"挑战，就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高速度。

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怎样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通通调动起来呢？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大办土高炉最能把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最能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目前我们有三种高炉：一种是大的洋高炉．这种炉子设备先

进，产量很高，是我国钢铁工业的骨干。

我们过去已经建设了一批这样的大高炉，今后还要建设更大的技术上更先进的大高炉，以便把我国的钢铁生产逐步转移到先进的技术基础上。但这种炉子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设备，而且建设时间较长，不能解决燃眉之急。一种是小的洋高炉，或者小的土洋结合的高炉，通称小高炉。这种炉子性能比土高炉好，产量比土高炉高，它的好处是肯定的，今后要加以提倡；但这种炉子需要一些机械设备，有“依赖性”，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建设，马上也不容易普及。靠这种炉子来争取时间，争取速度，目前也是比较困难的。这就是说，以上这两种高炉虽然从技术上说是先进的和比较先进的，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起许多这样的近代化的大高炉和小高炉，以保证在今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所需要的全部生铁。在目前情况下，唯一能够及时满足这种需要的是土高炉。现在遍地开花的也就是这种炉子。因为土高炉没有任何“依赖性”，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只要自己动手几天内就可以建造成功，因而能够使广大的群众插进手来，形成一个全民办钢铁的运动，使生铁生产高速度地发展。

因此，大高炉、洋高炉只能少办、少数人办，而且办得慢，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只能“望洋兴叹”，插不上手，英雄无用武之地。土高炉则能多办，绝大多数人可以办，而且办得快，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都可以插上手，英雄有用武之地。由此看来，要增加生铁生产，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小、土、群”，这就是大办小的土高炉，依靠广大群众来办，这样就可以迅速增加生铁的产量；另一种做法是“大、洋、专”，这就是只搞大的洋高炉，只依靠专门技术人员来办，这样做的结果，就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大量地增加生铁的产量。因此，前一种做法，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切实有效的办法。九月一日到二十日生产出的全部生铁中有50%左右都是土高炉生产的，这个比重还可能提高。可见土高炉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许多地方九月份的生铁生产上升得比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抓紧了土高炉。广大的群众，不管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不管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出一份力量，因而出现了男女老少一齐动手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几万座土高炉铁水齐流的兴旺局面。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有人以为叫土高炉出铁不象叫洋高炉出铁那样有把握，几次出渣不出铁，就对土高炉发生动摇。是的，土高炉不象洋高炉那样有严格的科学设计，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一些在洋高炉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土高炉还是严重的问题。从这方面说，土高炉比洋高炉难搞。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土高炉的全部建造过程都是群众自己动手的，群众的智慧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经验，叫土高炉大量出铁、正常出铁。现在已经出现的千吨县的事例都说明了：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善于及时总结群众的经验，和迅速推广先进者的经验，土高炉的技术关是完全可以突破的。

有人认为土高炉耗费的劳动力太多，生产成本太高，不经济，不合算，是的，搞土高炉必须要动员很多人，生产成本是比较高。但是，问题在于速度，在于争取时间，就是说必须保证今年拿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而土高炉由于建造简单，能够发动群众普遍地搞、大量地搞，因而是唯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大量出铁的炉子，舍此别无他途。况且，土高炉的生产成本也不是不能降低的。现在有的土高炉每吨铁的生产成本三百元，有的只七十元，可见潜力很大，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就不难降低生产成本。更何况，真要算账的话，首先应该算的是人的账。经过土高炉遍地开花，广大群众都学到了炼铁的本领，在这个

基础上加以提高，将为我国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钢铁大军，这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如果要算钱的账，也首先要算建设成本的账。洋高炉不投入十万、百万本钱不能动工，土高炉是"无本生意"，完全可以白手起家。权衡利弊，何去何从，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九月十日到二十日的生铁生产，比前一旬有较大的增长，情况是逐步好转的，预计九月下旬许多地方将创造更高的纪录。九月很快就要过去，十月就要到来，这是一个决定性战斗的月份。我们必须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到钢铁战线上来，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使绝大部分的土高炉都能铁水常流，产量猛增，保证今年拿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这是钢铁生产中的当务之急。

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一九五八年九月）

九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长惠浴宇同志，书记陈光同志，农村工作部部长孙加诺同志以及各地、市委负责同志的分别陪同下，在江苏省视察工作。视察期间，刘少奇同志对工业、农业、水利、教育和劳动制度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在南京视察期间，听取了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书记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同志等的工作汇报，接见了驻南京部队、军事学院的首长和省级机关的负责干部。

在十天的视察期间，刘少奇同志走遍了江苏长江南北的许多城市和乡村，途经徐州、淮阴、扬州、南通、苏州等专区，视察了徐州、新海连、新沂、沭阳、淮阴、高邮、扬州、南通、常熟、苏州、无锡、南京等市县，连续行程达数千里。在这次视察中，少奇同志广泛地接触了各级干部和工农群众，除听取了全省七个专区和两个市的地、市委书记汇报外，并接见了各专区的大部分县委书记，沿途还看了好几个人民公社和钢铁厂、机厂、丝绸厂，在南京访问了南京工学院，在丰产试验田和高炉旁边和工人、农民作了亲切的谈话。在淮阴的丁集人民公社，少奇同志还亲自和社员们一起参加了深翻土地的劳动。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在江苏省的这一切活动，给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给江苏省四千万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少奇同志关于如何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关于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以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的提示，给大家打开了广阔的眼界，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种得少、种得好，收得多，是农业经济一个根本问题

在视察中，刘少奇同志了解江苏省农业生产的情况，他非常仔细地观看了各地中稻、晚稻和山芋的丰产试验田。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

打些。”他在和淮阴地委的同志们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的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他又说："种得少，种得好，但是收得多，这是农业经济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账，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江苏省的水利工程，刘少奇同志也非常关心。在淮阴专区，他一连看了三个水闸工程——二河闸、三河闸和苏北灌溉总渠的高良涧进水闸。并且仔细研究了淮阴专区的水利规划总体图。他一再问淮阴地委第一书记孙振华同志，三河闸能不能利用来发电？能不能搞航运？他说："水能为患，也能成利，我们要变水患为水利，把水都充分地利用起来。搞一个水利工程，要考虑怎样把灌溉、防洪、运输、发电等结合起来，这就是最大的节约。"在离开淮阴到杭州去的路上，汽车沿运河堤岸南行，对于即将开始动工疏浚开拓的大运河工程，少奇同志又问："是否可以把内河航运和海洋运输结合起来。如果把运河拖（挖）宽挖深，使五千吨的大船能够由海直接进入运河，这样，江苏的东西就可以直接装船出口，东北来的东西也可以直接入口，不需要再到上海去装卸，这将节省很大一笔运输费用。"

劳力紧张证明我国在大发展，作好五件事使社会风气大变

在各地的汇报中，许多同志都提到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少奇同志说：劳动力紧张虽然给大家的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好事情，在我们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感到了劳动力紧张，证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正在大发展，国民经济正在一日千里地繁荣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做好五件事：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第二、彻底地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很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年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风气、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

少奇同志非常关心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的问题，江苏省不少人民公社在今年秋收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少奇同志在访问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时，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话，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

增加懒人？苏州的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就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列宁曾说过：共产主义的劳动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多更好。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的懒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很没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的劳动。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的消灭懒汉。"

把工厂和学校合起来办，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

在与各地、市、县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同志反复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贯彻这个制度最彻底的办法之一是把工厂和学校合起来办。过去是学校一套，工厂一套，互不相干，以后可以逐步地把两套合成一套。新办一个工厂，也就是新办一个学校，由劳动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招收新成员，既是招工人，又是招学生。入厂后，先训练三、四个月，上机器操作，每天作四小时或六小时工作，读四小时或三小时书，半工半读，可以从初中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实行这种办法，将使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化的过程能够大大缩短，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能够更快消除；这样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将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刘少奇同志还强调指出，我们的工厂在生产钢铁、机器、电力等等物质产品的同时，还应该负责培养有文化知识有劳动本领的新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工厂里应该出大学生、出技师、出工程师、出干部。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要负起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责任，也要负起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责任。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是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他们搭一个棚子睡在炉子旁边，生活虽很苦，干劲却很大，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

（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截至本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七月份开始发展，八月份普遍规划、试办，九月份进入全面高潮，高潮时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有十二个省、市、区百分之百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七个省、区已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四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十月底完成。截止九月二十九日统计：全国共建起人民公社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四个，加入农户一亿一千二百一十七万四千六百五十一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点四，每社平均四千七百九十七户（据十一个省、市、区七千五百八十九个公社统计，五千户以下的五千二百八十七个；五千至一万户的一千七百一十八个；一万至二万户的五百三十三个；二万户以上的五十一个）。河南、吉林等十三个省，已有九十四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

在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各个战线上陆续出现的奇迹如雨后春笋。许多地方成立公社以后，立时大办工厂，遍地小高炉林立，铁水奔流。农村中学、大学、红专学校遍地开花。普遍地建立了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劳动效率倍增。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一昼夜或几天之内就实现了。随着公社化的实现，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日见普及，大量的妇女劳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据江西、陕西、河北、福建四省不完全统计，共建立公共食堂五十六万三千三百七十三处，托儿所、幼儿园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三十一个。老年幸福院、妇产院、澡塘等组织都有很大发展。河南、江西仅举办公共食堂，即解放了八百四十六万个妇女劳动力，它给目前大搞钢铁、深翻土地、秋收秋种等繁忙的生产运动，增加了大批的新生力量。

在已公社化的地区，都在本月中、下旬先后召开了省、专、县的农村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思想教育、生产规划、经营管理、分配制度、经济政策、生活福利、财贸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至此，公社化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进入全面加强和巩固阶段。

在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中，农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更深入了一步，因而各阶层的思想情况暴露得愈加深刻，思想斗争愈加尖锐，真理也愈辩愈明。据若干典型调查：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占百分之八十多，其中主要是贫农、下中农，他们的反映是：“决心办公社，意志坚如钢，把心交给党，把人交给社”。基本拥护，但有若干思想顾虑或误解的占百分之十左右。抵触不满的占百分之五左右，其中主要是部分富裕中农。这部分富裕中农，在思想教

育越深入，越接近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更加鲜明。在处理残存的生产资料上，少数富裕中农对私有制度留恋不舍，千方百计的隐瞒、分散财产，想"留一手"、"捞一把"，甚至大肆挥霍浪费。安徽省舒城县舒茶公社富裕中农到处宣传，"办了公社明年茶树就不是我们的了，今年秋茶要多捞一把，把它摘得枝叶不留"。有的富裕中农，鼓动干部分公共财产、私分粮食、少报收入、多报开支。表现在分配上，是"多积累，少消费"与"多消费，少积累"的斗争。广大贫农、下中农在共产主义的前途鼓舞下，一致主张今年少分红，多积累。而少数富裕中农，则到处宣传"多收多分""产量翻一番，生活大改善"，并积极主张按小社分配。他们认为大社分配是"酸菜煮猪肉，油水都被酸菜沾去了"。表现在集体生活上，是"多集中，少自由"和"多自由，少集中"的斗争。广大贫农、下中农坚决要求多办公共福利事业。而少数富裕中农，则到处散布"不自由""不习惯"等论调。目前各地，正就以上种种思想，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结果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资本主义受到了深刻的批判，广大群众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高。据各地反映，凡是抓紧了政治挂帅，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一工作方法的地方，在处理各项经济问题时，都做到又快、又好、又顺利，达到大家满意，增强团结。反之单纯忙于处理经济问题，结果是越处理问题越多，纠缠不清，影响了生产，影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继续解决体制问题，健全经营管理工作，是巩固人民公社运动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有的地方在建立公社以后，旧的秩序打乱了，新的秩序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在生产管理上曾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公社体制问题上，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社、大队（作业区）、生产队的分工范围和职权问题。如有的地方实行三级核算，有的实行两级核算。在工业和学校的管理上，那些归社，那些归队等等。其次是国营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与公社合并问题。这一问题，各地的办法不尽一样。有的实行了体制下放，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对国家只是代购、代销、代办和纳税的关系。其中有的对国家实行财政包干。有的则仍为国营的基层机构，由公社统一管理，盈余除由公社提取一定比例外，全部上缴。这些问题都需进一步试验和研究。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由于社、队规模的扩大，生产项目的增多，分配制度的改变，军事化，战斗化，大协作的实行，原有的包工包产，评工记分等办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新形势。在这方面，各地在原来的基础上，已创造了一些新的办法。如有的社对大队，大队对生产队实行"投资包干，计划生产，超产奖励"的办法。据说这种办法，简便易行，更能发挥生产队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对于原来农业社经营管理上一些成功的经验，如计划管理（算用工账、出工账、劳动出勤率等），定额管理（定工、定时、定质、定量），劳动考核，固定责任制，验收制，奖惩制等等，必须把它继续肯定下来，加以运用。

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将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形式。河南、广西等十二个省，都计划今年或明年一月普遍推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其它各地也都在重点试验，准备推广。很多公社，今年已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粮，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吃饭不要钱。少数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群众反映是"一有盼头"（共产主义），"五不操心"（吃、穿、零花、孩子、工分）。更加鼓舞了人们的干劲，增强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年的分配中，各地都强调了在扩大公共积累，保证生产建设和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的前提下，适当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预计今年的公共积累的增长比例，将大大超过生产增长

的比例。据吉林估算今年全省可积累三亿元以上，比去年三千五百万元增加将近十倍。许多地方在实现公社化以后，陆续购买了大批的拖拉机、汽车和各种机器，很多地方，只要有机器，一年的积累，就足够机械化、电气化所需要的资金。

其它经济政策处理，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的发展，都进行得很顺利。各地预计，人民公社的制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巩固起来。在这一基础上农村将出现崭新的面貌。

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时

（新华社）

（10月6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起草的命令。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张　春　桥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着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

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着共产主义性质和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着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着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上，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

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着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地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Q只因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

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着人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附：对于"资产阶级法权"一语译法的意见

张　仲　实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一语的译法问题，最近我们又作了研究，认为此语改译做"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比较符合原意。

近来习用的"资产阶级法权"一语是根据马克思著《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文译本中下面这句话而提出的，即："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22页）。这句话在德文原文里边，"平等的权利"是"das gleiche Recht"，"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das bürgerliche Recht"；在俄文译本里边，"平等的权利"是"равное право"，"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буржуазноэправо"。德文中的"Recht"和俄文中的"право"这个字都有好几个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是权利；又有一个意思是国家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的总称，过去有的译做"法"，有的译做"法权"。

《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文译本对Recht（俄文право）这个字的译法是不统一的。在前述那句话的上半句里把它译做“权利”，下半句里却译成了“法权”。其次，在马克思的这句话的上下文里，这个字出现了十多次，所有其他地方都译成了“权利”，而在“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一句中却译成了“法权”。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文译本中，对此语的译法也有同样的情形。

从《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第一章第1、2、3节的内容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解释看来，把Recht（Право）这同一个字在同一句话里解释成两个意思，是不妥当的；统通译做“权利”，比较确切。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是从权利的角度，从是否公平、平等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问题的，而不是从法律规章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的。《哥达纲领》中主张：在社会主义之下实行“公平的分配”，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这是拉萨尔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谬论，马克思就是驳斥这种谬论的。马克思根据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原理，在深入地分析了拉萨尔的错误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情况以后，指出：在社会主义之下，虽然在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方面已经消灭了不平等，消灭了剥削制度，对于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一律平等地按照他提供给社会的劳动进行分配；但是，由于社会成员各人的具体情况（能力、身体、家庭负担等）不同，因而，人们所享有的物质资料仍有不平等现象。因此，马克思说，“这里的平等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权利”。

而这两本书的英文和日文译本，也都把这句话译做“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英文译本把“Recht(Право)译做“right”，即权利的意思，不是译做“iaw”，即“法”“法律”的意思。日文里对于Recht（право）一词也有两种译法，一种是在法律的意义上译做“法”或“法律”；另一种译为“权利”。而在这两本书的日文译本中都译为“权利”。可见，英、日文译本的译者也都是把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所用的Recht（право)一词理解为“权利”的意思。

早在一九三九年何思敬、徐冰同志在延安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是这样翻译的，他们把马克思的那句话译成：“所以此地，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者的权利。”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本和《列宁文选》（两卷集）本才把此语改译做“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去年我们在翻译“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内有《国家与革命》一书）时，没有仔细推敲，就沿用了这个译法。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种不应有的疏忽。

据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将马克思著《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两书中文译本中凡译“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或“资产阶级的法权”的地方，都改译为“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比较恰当。这样改译，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基本理解，而且还可以免除一些混乱和误解。最近在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报告的翻译中就已经用了“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这个译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一九五八年早稻生产公报

（一九五八年十月）

今年早稻获得了大丰收。全国一亿四千六百多万亩早稻，平均亩产五百九十六斤。总产稻谷八百七十多亿斤。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七年的三百二十七斤，增加二百六十九斤，即增长82%。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三百八十七亿斤，增加四百八十多亿斤，即增长126%。今年早稻增产数，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稻谷产量逐年递增总数多一百二十多亿斤。

今年全国早稻亩产千斤以上的共有一千五百多万亩。占早稻播种面积10%以上。其中三千斤到五千斤的有十四万亩左右，五千斤到一万斤的有二万五千亩左右。千斤省市有四个。江苏省二百六十四万亩，平均亩产一千零四十斤。湖北省四百六十二万多亩，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三斤。上海市四万九千四百亩，平均亩产一千零一十九斤。安徽省六百一十二万九千多亩，平均亩产一千零五斤。早稻亩产千斤以上的县（市）共有一百一十五个，计：湖北省三十个，江苏省二十一个，安徽省二十个，浙江省十四个，四川省十二个，云南省十一个，湖南省四个，贵州省二个，广西省一个。亩产量最高的是湖北省孝感县，全县三十万二千多亩早稻，平均亩产一千八百五十五斤。其次是江苏省涟水县，三万四千七百亩早稻，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安徽省桐城县四十五万三千亩早稻，平均亩产一千四百八十五斤。安徽省郎溪县幸福乡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亩早稻，平均亩产三千零八斤，仅一季早稻，全乡每人平均即达五千一百零四斤粮食。

今年早稻亩产万斤以上的高额丰产田，有三百多亩。湖北省麻城县平清乡第二农业社一亩零一厘试验田，亩产一万六千二百六十斤。安徽省枞阳县高丰社一亩零四厘二毫试验田，平均亩产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七斤。湖南省醴陵县鳌仙社一亩四分五厘试验田，平均亩产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五斤。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一亩零一厘六毫早稻，采用并秧办法，平均亩产干谷达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今年早稻大丰收，是贯彻执行了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结果；是经过全民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胆革新技术和向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结果；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敢想、敢说、敢干、发扬共产主义新风格的结果。

今年早稻丰收，和其他作物一样，不是由于风调雨顺。今年南方早稻地区一般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干旱，云南省出现六十年来未有的干旱。四川省泸州专区干旱一百八十天。不少地区，从开春起，就进行了抗旱播种，抗旱插秧。插秧后，各地又批判了“靠天等雨”思想，提出了“人定胜天”“无雨也要保丰收”的口号，集中劳力，歇人不歇车，拦河打坝，开泉引水，千方百计，日夜苦干，终于战胜了干旱。六、七月间稻瘟病、稻飞虱、浮尘子，

普遍发生，各地都采取了土洋结合的办法及时消灭了病虫为害。

今年各地早稻在贯彻农业增产措施上，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去冬今春扩大了灌溉面积，改善了灌溉设备。积肥数量，比去年增加了几倍，甚至几十倍。在耕作栽培方面，主要抓住了深耕、密植、早播、早插和一系列田间管理的技术，耕深比过去增加了一到二寸，插秧比过去增加了一到二万兜，并且适当增加了每兜插秧株数，打破了过去小株密植靠分蘖吃饭的论调，创造了多种多样插秧形式和密植方法，找出了密植增产的规律。在深耕多肥精细整地的条件下，均匀直播也是一种高度密植的方法，在适宜的播种时期，只要田里没有庄稼，就可以采用。有些单位部分稻田采用并秧办法，实行高度密植。这种办法，在旱情严重时，可以移苗就水；也可以腾出土地，多种一季。只要移苗时间适当，移植密度适当，并加强培育管理，是可以增产的，有些没有经验的单位，进行这方面的试验，也是有科学价值的。但对晚熟水稻抽穗以后，在自然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普遍提倡并秧，需要进一步研究。

今年早稻播种插秧，一般均比去年提早一个节令。由于提早了播种时期，许多地方都采用了温床育苗，冷床育苗，油纸育苗，尼龙育苗等方法，普遍采用了湿润秧田，及时抢晴播种，防风防霜，达到防止烂秧培育壮秧的目的。在水稻生长期间，开展了以早稻密植为中心的田间管理工作，采用早追肥、早灌水、早除草和多次施肥灌水的方法，充分发挥了早播密植增产作用。

明年早稻面积要比今年扩大，单位产量要大大提高，各地要认真总结今年早稻丰产经验，做出明年早稻生产规划，为争取明年更大跃进而斗争。

（新华社）

（10月13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一九五八年春小麦生产公报

（一九五八年十月）

继冬小麦丰收之后，今年春小麦也获得空前丰收。播种面积四千三百一十九万亩。单位面积产量二百三十三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百零六斤，增长83%，总产量一百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三十九亿多斤，增长63%，比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中估产九十亿斤提高了十亿多斤，其他麦类未计。

今年春小麦亩产千斤以上的面积，据初步统计有一百二十四万多亩。其中亩产二千斤到三千斤的有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亩，亩产三千斤到四千斤的有四十一亩，亩产四千斤到五千斤以上的有三十八亩。以县为单位亩产千斤以上的有甘肃省的和政县和敦煌县。亩产七百斤到九百斤的有甘肃省的张掖、武威、高台、临夏县、临夏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忠市等六个

县市。亩产五百斤到七百斤的有甘肃省的玉门、康乐、古浪、永昌、山丹、民乐、广河、渭源、临潭县、兰州、玉门市，宁夏地区的中卫、中宁、宁朔、永宁县、银川市，青海省的贵德县，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乌鲁木齐等十八个县市。亩产四百斤以上，五百斤以下的有三十个县市，其中甘肃省十二个，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七个，宁夏地区六个，青海省五个。

青海省蹇什克农场一点零五九亩试验田，平均亩产八千五百六十五斤。甘肃省古浪县土门乡温泉农业社十七生产队一点二二亩试验田平均亩产六千零二十九点五斤。宁夏地区中卫县东方红农业社第一生产队一点零八亩试验田，平均亩产五千八百零一斤。

今年各地春小麦获得丰收的主要原因是深入贯彻执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不断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做什么，想什么，插红旗，拔白旗，扫除了跃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召开现场会议，观摩评比，表扬先进，克服落后，充分发动群众，贯彻了增产措施，战胜了自然灾害。

在去冬今春大搞水利、肥料的基础上，各地普遍地推广了水、肥、土、种、密等基本措施，特别抓住了春小麦生长期较短、发育较快的特点，提早了播种期，加强了田间管理。播种期一般比往年提早了十天到半月，普遍进行了种子处理，结合早播施用种肥，早追肥，早浇水。推行了指标、措施、工分、管理人员四到田的制度，开展了五查（查苗补苗、查锄草、查灌水、查追肥、查病虫害），五防（防病虫、防霜冻、防雹洪、防倒伏、防糟踏）运动，做到了锄草、浇水、追肥、防治自然灾害四及时，不断变二、三类田为一类田，变一类田为丰产田，变丰产田为高产田。这是取得今年春小麦丰收的关键。

今年春小麦虽然丰收，但各地生产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即在那些高产地区，增产潜力也还很大。以亩产千斤的敦煌县为例，今年麦田还只耕了六寸深，小麦生长期间只浇到二次水，平均每亩施肥量仅施用牲畜粪一万二千斤，每亩种植密度还不到五千万穗，所种的品种"白大头"品种混杂，并且还有倒伏的缺点。亩产千斤的和政县，小麦锈病还很严重，如果再进一步采取措施，产量还可以大大提高。

增产小麦已成为粮食生产战线上重要任务之一，在春小麦地区必须大力发展春小麦生产。各地必须认真总结今年春小麦增产经验，制定明年春小麦种植计划和丰产规划，提前做好准备，力争明年春小麦更大丰收。

（新华社）

（10月13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一九五八年油菜生产公报

（一九五八年十月）

今年油菜生产取得伟大的成就，开始改变了油料生产落后的情况。全国油菜播种面积三

千七百九十二万亩，总产量达二千七百多万担，比一九五七年油菜增产约一千万担，即增长56.5%。

单位面积产量全国每亩平均七十三斤，比去年增加41.5%，平均亩产在一百斤以上的有六个省市．计：上海市每亩平均二百斤，甘肃县一百五十五斤，青海省一百三十斤，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一百二十五斤，江苏省一百一十七斤、四川省一百零二斤．

大面积丰产事例到处都有：江苏省的南汇、兴化、太仓，四川省的忠县等县平均亩产都在二百斤以上，南汇亩产平均达二百五十二斤．忠县亩产平均达二百三十一斤，陕西省南郑县亩产平均达一百七十六斤。亩产平均达一百五十斤以上的浙江省有慈溪等五个县，湖北省有松滋等六个县。

全国亩产最高纪录已突破千斤。湖北省麻城闽集乡第一农业社二亩一分油菜，亩产一千一百四十六斤。云南省富源县雨汪乡第一社有三亩油菜，亩产一千零五十斤。湖北省应城陈北乡先锋社有三亩丰产油菜，亩产八百六十斤。安徽省合肥市郊区高潮社三亩丰产油菜，亩产七百五十八斤．青海省德令哈农场一点三〇二亩春油菜，亩千二千一百六十一斤．今年还有不少地方发现油菜王，安徽省发现一棵有一万二千个荚；江苏省发现一棵有一万四千个荚；四川省发现一棵有六万个荚（一般每株二百到三百个荚）。

今年油菜丰收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不断地加强了对油菜生产的领导，贯彻了粮、棉、油全面跃进的方针，战胜了自然灾害，加强了油菜田间管理，各级领导实行分工，层层负责，不少县、乡、社建立了油菜试验田，开展丰产竞赛，组织参观评比，鼓舞了广大群众增产热情，推动了油菜生产的高潮。

今年各地油菜每亩施肥量，基肥约增加50%至一倍。追肥一般都比往年多施了一、二次．湖北省松滋县采取了"六施二补"（即施底肥、提苗肥、壮苗肥、保温肥、苔肥和花肥、补落后、补平衡），少吃多餐的均匀施肥方法，江苏省兴化县全县在施用底肥的基础上进行四次追肥，一交稳根，二交发杈，三交开花到顶，四交结子象鱼眼睛．全国约有半数以上的油菜田，追施了苔肥和花肥。

今年油菜良种种植面积达二千万亩，比去年增加一千多万亩．陕西省南郑县全县种油菜四万六千余亩，优良品种扩大一万七千五百余亩，良种比当地种增产45%，共可增产三十七万余斤。湖北省松滋全县种胜利油菜三万余亩，平均亩产达二百五十斤，比本地油菜增产120%．其他如湖北省浠水油菜白，江苏省兴化油菜、湖南省洞口甜油菜、四川省拱宸桥油菜等，均系早熟丰产的地方良种、播种面积均大有增加。江苏省兴化县全县良种已经基本普及。

在战胜自然灾害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冬播的油菜，在去年播种阶段，湖北江西等省都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抗旱播种运动，战胜了去年的长期干旱，去冬今春在油菜主要产区，又遭到多次寒流袭击，江苏省兴化县二月中旬的一次寒流，温度降至摄氏零下十度以下，河港封冻达十余天。华中一带也出现"倒春寒"，在三月上旬来了一次大风雪，但是，广大农民并没有向灾害低头，浙江省在2月间发出寒潮预报以后，各地连夜进入了防御冻害，在寒潮来时采用熏烟，清除积雪和浇水粪溶雪等办法。其他各省市也实行了追施腊肥或盖湖草，打扫花苔上积雪，及时进行开沟排水等工作。由于抓得快，干劲大，大部地区油菜未受到冻害损失。

但今年油菜生产还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在播种前未能作好准备，深耕密植还不够，有很多地方仍然是耕作粗放，有的秧苗很多，没有认真进行查苗补栽，废弃面积还相当多。如果

从去年起贯彻深耕密植，加强油菜前期田间管理，今年产量还可大大超过。

为了继续鼓励农民增产油料，争取明年油菜更大的丰收，必须大抓油菜生产，把各省单位面积产量分别提到二百到三百斤以上。为达到这个目的，各地应该在总结今年油菜丰产经验的基础上，制订明年油菜生产跃进计划，加强对油菜生产领导，实行分工分业专人管理，抓紧当前冬油菜的播种工作，保证种一亩收一亩，不要把油菜作绿肥。从播种到收获，从头到尾加强培育管理，大搞水、肥、土、良种、密植和工具改革，坚决战胜水旱霜冻病虫灾害，每一段都不要放松，培养大面积丰产田，消灭二百斤以下的落后田，力争油菜更大丰收。

（新华社）

（10月13日《人民日报》）

〔附〕 今年农产品高产纪录统计表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

编者按：这份统计表只根据报纸（9月25日止）发表的材料编成，所以是不完全统计，仅供参考。

一、水稻（南方早稻、中稻，北方水稻）亩产30,000斤以上高产纪录

稻别	创造单位	高产地面积(亩)	总收获量（斤）	折合每亩产量(斤)	材料来源
早稻	湖北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1.016	37,547	36,956	8.13.人民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	1.075	140,217斤4两	130,434斤10两4钱	9.18.人民日报
中稻	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	1.08	89,127	82,525	9.18.人民日报
中稻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卫星人民公社	1.0014	60,567斤3两3钱	60,479斤6两3钱	9.9.云南日报
中稻	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	1.073	64,849斤2两6钱	60,437	9.5.人民日报
中稻	湖北合城黄畈乡新农村一社	2.4	126,379斤3两	52,658	9.1.湖北日报
中稻	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	1.017	53,493	52,599	9.1.人民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	0.238	11,921斤8两	50,090	9.4.广西日报
中稻	安徽安庆菱湖社	1.11		44,951斤5两	9.2.今日新闻
中稻	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	1.01	44,308斤13两	43,869斤4两	8.30.人民日报
中稻	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	1.03	44,367斤13两	43,075斤9两	8.22.人民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川山区洛阳乡	0.78	29,095斤3两	37,315	9.4.广西日报
中稻	云南漾濞平坡乡平坡社	1 067	35,736斤4两	33,492斤4两2钱	9.6.云南日报
中稻	安徽巢县夏阁乡沿河社	1.06	32,451斤3两	30,614斤5两	8.25.今日新闻
水稻	河南信阳鸡公山乡人民公社	6.63	324,375斤8两	48,925斤7两	9.9.河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坂生产大队	1.5		34,178	9.25.河北日报号外
水稻	河南光山钢铁人民公社新民大队	1.15	35,997斤8两	31,302斤2两	9.20.河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坂生产大队	1		30,216	9.25.河北日报号外
水稻	河南商城余集乡跃进人民公社第四大队第三中队	1.2	36,011斤8两	30,009斤8两	8.30.河南日报

二、小麦亩产5000斤以上高产纪录

创造单位	高产地面积（亩）	总收获量（斤）	折合每亩产量（斤）	材料来源
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	1.059		8,585斤6两	9.22.人民日报
河南西平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	2	14,640	7,320	7.12.人民日报
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	1.721	12,393	7,201	7.18.人民日报
河南邓县都司乡岁营农业社小河流生产队	1.49		6,541	7.18.人民日报
河南西峡回车乡先锋社	0.37	2,403	6,494	7. 3.河南日报
宁夏中卫城关镇东方红农业社第一生产队	1,08	6,265	5,801	8.10.今日新闻
青海都兰县德令哈农场第五作业站	1.07	5,836斤7两	5,548	9.14.青海日报
湖北谷城庙滩乡新气象五社	1.5	8,200斤8两	5,467	7. 2.人民日报
宁夏中卫大板槽社			5,464	8.10.今日新闻
宁夏中卫新中社			5,284	8.10.今日新闻
河北安国南娄底乡卓头村社	1.7	8,675斤2两	5,103	6.30.人民日报

三、其他农产品高产纪录

作物名称	亩产量（斤）	创造单位	材料来源
玉米	35,393	河南商丘王楼人民公社第八生产队	9.17.人民日报
高粱	22,720	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庄大队第六生产队	9.22.人民日报
大麦	5,702斤6两	山西介休联福农业社第六生产队	7.7.人民日报
莜麦	3,012	河北张北东方红人民公社中鲫道大队一小队	9.12.河北日报
谷子	27,733斤15两	河南商丘宋集人民公社田集大队王桥小队	9.20.河南日报
青稞	5,195斤4两	青海都兰县德令哈农场	9.14.青海日报
马铃薯	106,378斤8两	甘肃康县窑坪乡和平农业社	8.26.人民日报
春收甘薯	23,000	广东海丰公平山区平联社	7.20.人民日报
大豆	4,517斤12两	山东临沂涑河乡南光明二社	9.17.人民日报
花生	26,968斤12两	福建晋江金井鳌乡集力社塘边村欧自强生产队	9.22.人民日报
芝麻	7,239斤1两	河南西平盆窑乡东风人民公社第三大队第六生产队	9.20.河南日报
春油菜籽	6,051	甘肃武山三岔乡新光社	8.26.人民日报
大麻	2,016	安徽金寨开顺乡红星一社	8.26.人民日报
黄麻	12,207斤12两	江西赣县火箭人民公社武陵二区	9.16.江西日报
苎麻	1,325.8	湖北阳新红光一社	7.27.人民日报
胡麻	647	宁夏中卫宣和乡宣和农业社第四生产队	8.12.人民日报
西红柿	45,660	焦作市郊区新店蔬菜社"七一"青年试验场	8.26.人民日报
茄子	52,500	山东黄县中村乡光明社	9.15.今日新闻
芋头	31,400	福建建瓯吉阳社老年队	9.15.今日新闻
黄瓜	20,140	北京昌平镇卫星农业社南关第三生产队	8. 1.人民日报
葱头	18,430	北京丰台区东铁匠营农业社	8. 1.人民日报
南瓜	202,735	河南息县包信乡张大庄农业社关庄生产队	8. 9.人民日报
蚕豆	2,606	河北张北东方红人民公社战海大队第四分队	9.12.河北日报
冬瓜	75,853	福建建阳县副县长赵存旺和"卫星"一社青年蔬菜试验队	9.15.今日新闻
葡萄	26,115斤5两	山西清徐红旗人民公社	9.23.山西日报
梨	90,007	河北交河王庄村	9.15.河北日报号外
苹果	14,716	四川蓬溪县园艺场	8.23.人民日报
茶叶	1,635斤15两	福建崇安黄柏乡高峰农业社	9.17.人民日报

《新华半月刊》资料室
（原载《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9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八年概述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唆使李承晚集团发动了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接着美国军队也参加了这一进攻。与此同时，美国武装侵占了我国台湾。

美国侵略者妄图一举灭亡朝鲜，并进一步侵犯我国，作为它们称霸全世界野心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一侵略野心，它们不甘心最初在朝鲜人民军打击下所遭受的失败，竟纠集他们自己和仆从国家可以投入战争的优势兵力，在仁川大举登陆，扩大侵朝战争，使战争形势发生了对朝鲜人民军严重不利的变化。他们并且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关于美国武装力量退出台湾，迅速停止侵朝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严正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和图们江，严重威胁了我国安全。

中国人民不能容忍这样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纷纷起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一道，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

五战五捷把敌人赶回三八线

一九五〇军十月二十五日，志愿军打响出国第一仗。经过十二昼夜激战，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在西线云山地区予李伪军第六师以歼灭性打击，予李伪军第八师、美军骑兵第一师以严重打击，将敌人驱逐至清川江以南，并在东线黄草岭一带粉碎了李伪军第三师的进攻，阻止了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前进。这一战役，歼灭敌人一万五千余人，取得序战胜利，稳定了朝鲜战局。

敌人遭我第一次沉重打击后，仍迷信其“空海优势”。因此，又集中其精锐兵力二十万人，发动了所谓“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我军利用了敌人的骄狂心理，诱敌深入到预定地点后，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突然展开强大的战役反击。西线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乘胜追击，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东线在长津湖地区向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美军第七师发起猛攻。敌遭我痛歼以后，由海上狼狈逃窜。这一仗，历时一个月，歼敌三万六千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扭转了朝鲜战局，振奋了世界人心，配合了我国代表在联大安理会会议上的斗争。

敌人退到三八线，利用原有工事建立防线，并玩弄“停火”阴谋，企图争取时间整顿残部，待机卷土重来。一九五〇年除夕，中朝人民部队主力乘敌人立脚未稳，发起新年攻势，一举突破敌人防线，解放汉城，歼敌一万九千余人，将战线推至三十七度线。

遭我三次打击的敌人慌作一团，内部争吵激烈。我国周恩来总理又重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使美帝国主义更陷于孤立。敌人为挽救败局，镇定它内部的恐慌情绪，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全线向我发起进攻。开初，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汉江南岸展开英勇阻

击，并在横城地区对突出之敌进行反击。随后，为了大量消耗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便停止反击，转为机动防御，奋战八十八天，敌人每天平均爬进了不到一公里半，却损兵七万八千余人，最后被我阻止在开城——杆城一线。

为了粉碎敌人"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即在我侧后平壤至元山一线登陆）的阴谋，大量歼灭敌人，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发起了春季反击作战，即第五次战役。历经两个阶段五十余天，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此次战役中朝中人民军队密切协同，并肩作战，创造了在县里地区歼灭李伪军两个师大部的辉煌战绩。

志愿军在五次战役的进军途中，目睹美国侵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城镇夷为废墟，人民流离失所，山林是一片火光，到处是被敌人杀害的朝鲜人民的尸体，而英雄的朝鲜人民却坚贞不屈，英勇斗争。这幅悲惨壮烈的情景，引起志愿军官兵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仇恨敌人，同情友邻，热爱祖国三者汇流一起，更加提高了国际主义思想，认清了保家卫国必须抗美援朝的真理，坚定了杀敌决心，激发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在战斗中，虽然敌我装备优劣悬殊，我军地形不熟，语言不通，供应不及，困难极多。但是，志愿军指战员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支配下，表现了高度的顽强、乐观精神，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党员、干部抢先带头，克服困难。上下一心、同甘共苦。虽然一把炒面一把雪，甚至吃树皮野菜，仍精神饱满，奋力战斗，并出现了抱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而保卫了阵地的杨根思等许多英雄人物。

志愿军初次和现代化的美国侵略军交锋，缺乏经验。中国共产党志愿军委员会提出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口号。全军展开摸敌人"底"的活动。当战士认识到对机械化的敌军，不切断它的交通无法包围聚歼的特点，便不顾天寒地滑，不畏敌机袭扰，大胆穿插，迂回包围，直入敌军心脏，断敌退路，打乱敌人布置，痛歼敌军。当部队摸透敌军攻不猛、守不坚、怕夜战近战等弱点之后，更加积极发挥猛打坚守，夜战近战的威力。敌军掌握制空权，对我军行动、作战极大威胁，部队即展开了对空射击运动。正如广大指战员所说"敌人打机械化，我们打巧妙化"。指挥原则与群众智慧结合起来，指挥决心化为群众自觉行动，就能巧妙地战胜敌人，并且在战争中益发坚定了必胜信心。

经过五个战役，朝中部队共歼敌二十二万多人，把侵略者赶回到三八线，恢复了朝鲜北半部民主基地。从而根本改变了朝鲜战争形势，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被迫接受了苏联政府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所提出的关于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和平建议，与我方开始了朝鲜停战的谈判。

积极防御，为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斗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目的的，是为了反对侵略、保卫和平，求得朝鲜问题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获得和平解决。苏联政府提出关于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建议以后，朝中两国人民和政府迅速响应，并重申了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美国侵略者经我五次打击，虽在"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的情况下，被迫与朝中方面谈判，但毫无和平诚意。他们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破坏谈判的进行；一方面又伺机进犯，对朝中方面施加所谓"军事压力"。由此，战场上出现了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长期对峙，展开了军事与政治相交织的斗争。

谈判开始后，敌人即以各种卑鄙手段，破坏和中断谈判，并极其荒谬地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建立在三八线以北地区内，企图不打一枪，向前推进一万二千平方公里。这一无理要求遭朝中方面严正拒绝后，竟然发出"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的狂妄叫嚣。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敌人向朝鲜人民军阵地发动了所谓"有限度的夏季攻势"。英勇的人民军，奋战一个月，给敌人以沉重杀伤，粉碎了敌人攻势。从此，敌人把人民军驻守的"八五一"高地称为"伤心岭"，敌人在夏季攻势挫败以后，九月二十九日又向志愿军坚守的阵地发动了所谓"秋季攻势"。施展所谓"钢铁战术"。我军依托野战工事，在敌人浓密炮火下，英勇抗击，逐山争夺寸土必争。到十月二十二日，我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这时期，中朝军队共歼敌二十五万人，迫使敌人重新坐下来谈判，放弃了它荒谬的要求，接受了朝中方面提出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此后，我军进行战术性反击，并收复了朝鲜北部沿海岛屿。

美国侵略者在向我们前线发动夏秋攻势同时，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对我后方采取了所谓"绞杀战"。大肆轰炸破坏我后方铁路、桥梁，企图扼杀我军补给线从而破坏我军的防御稳定性。

为了保证作战胜利，后勤战线上的指战员和铁路员工在"以重点对重点，以机动对机动"的方针下，发扬了高度的顽强精神和智慧。在弹片横飞中，在盛暑和严寒中，迎着激流和冰水，日夜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公路桥梁，创造了多种列车运行方法。战争期间，敌人向我铁路线平均每七公尺投下一枚炸弹，但我铁路运输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近三倍。在公路线上由于我工程兵、防空哨和英雄的汽车驾驶员英勇机智的维修与斗争，各种车辆仍然日夜行驶，真正构成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我年轻的空军部队也出而参战，英勇打击空中强盗。美军的所谓空中王牌戴维斯也被我空军击落。至此，敌人空中优势也被粉碎。

一九五二年初，美国侵略者又违背国际公法，施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他们向朝鲜北部大量撒布细菌，企图通过对人、畜、农作物的严重摧毁，从根本上削弱朝中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朝中军队和朝鲜人民一道，紧急动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细菌战的斗争。各部队和朝鲜政府、人民密切合作，组成联合防疫委员会，开展防疫卫生运动，捕打带菌毒虫，灭鼠灭蝇，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同时，我军掌握了大量敌人进行细菌战的确凿证据，进行公开展览，并邀请国际科学委员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进行实地调查，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侵略者的罪行，使美帝国主义在道义上彻底破产。

在转入积极防御阶段时，持久作战的思想已为广大指战员所掌握。一九五一年在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中，群众创造了坑道工事的雏型。经过领导及时总结、推广，逐渐发展完善。在我方阵地上，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史无前例的地下长城。"地下长城"横贯朝鲜半岛三八线附近二百五十余公里。工程极为浩大，相当于从我国西安到连云港挖通一条石质隧道。连接坑道的全部战壕比万里长城还长百多公里。但这一浩大工程，却几乎全部是以人工用简陋工具修筑成的。在我军加强坑道工事、巩固阵地同时，敌人的空、炮轰击更加频繁。为改变这种情况，广大指战员发挥智慧，展开了冷枪冷炮杀敌运动，群众性的敌前小分队活动和地雷大搬家活动，打得敌人嚣张气焰大杀，炮火威力大减。再加我军广泛进行政治宣传攻势，敌军士气更加消沉低落。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二年八月，朝中军队共歼灭敌人十一万人以上。

由于我军阵地日益稳固，敌人的"绞杀战"、细菌战都宣告失败。由于祖国人民展开捐献运动，大力支援，我军愈战愈强，不仅有力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而且可以主动打击敌人，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我军全线开始了有计划的战术反击，历时四十四天进攻敌阵地六十七处，经反复争夺，巩固夺取阵地十七处。歼敌二万七千余人，战线逐渐向南推移。

全世界人民所关心的朝鲜停战谈判，自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敌人被迫接受朝中方面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提议以后，美国侵略者又在其他谈判议程上制造了一系列的借口，阻挠和破坏停战谈判。又经过八个多月的斗争。由于敌人在政治上理屈辞穷，在军事上屡遭失败，于是，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参谋人员，对于停战协定草案的文字细节在实质上取得全部协议。至此，朝鲜停战谈判除遣俘问题外，已全部达成协议。

一九五二年五月，在巨济岛美方战俘营中，朝中方面被俘人员为争取合理待遇和重返祖国的权利，爆发了扣留美方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的事件。朝中被俘人员在美方战俘营中一系列的英勇斗争早已揭穿了美国侵略者所谓"自愿遣返"的骗局。但是美国侵略者为了维持帝国主义阵营盟主的面子，仍然企图在战俘问题上逼迫朝中人民屈服。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美方公然宣布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中断了停战谈判，并在十月十四日向我上甘岭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妄想先夺取上甘岭，以后拿下五圣山，在我战线中央打开一个缺口，分割我防御体系，逼我后退，造成谈判有利形势。

上甘岭战役中，侵略军十分猖狂。它调集兵力六万以上，大炮三百余门，坦克百多辆，出动飞机三千多架次，向我三点七平方公里阵地上，倾泻了炮弹一百九十万发，炸弹五千余颗。以致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公尺，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公尺。虽然敌人使用了世界军事史上空前集中的炮火，但打不破我军的钢铁防线。我坚守上甘岭阵地的部队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反复争夺中，出现了以身体堵塞敌人枪眼、为冲击部队打开道路的特级英雄黄继光，出现了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到最后一口气，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巩固了阵地的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涌现了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和惊天动地的英勇壮烈事迹。有些分队在优势敌人占领表面阵地后，退守坑道工事，与后方失去地面联系，粮弹、饮水得不到接济，几天吃不到饭，喝不到水，许多人嘴舌崩裂，吸石壁泥土的凉气解渴。这时，几个分队的党员组成临时党支部，成为核心领导，团结群众，克服困难坚守坑道，并且还组织小分队每夜主动出击敌人，捕杀敌人哨兵，炸毁敌封锁坑道的碉堡，使敌人不敢接近我坑道口，最后，配合我主力部队反击，收复了阵地。

战役中，我神勇炮兵密切协同步兵，猛轰敌军，给敌大量杀伤；后勤部队冒着敌人炮火封锁，前仆后继地运送粮弹，支援坚守阵地的部队。这样，持续鏖战四十三天，敌人大肆吹嘘的由敌第八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亲自指挥的攻势，终于被我军彻底粉碎。敌被歼二万五千多人，而我阵地屹然未动。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证明了我军能攻能守，证明了我军战线无比巩固。

强大的夏季进攻作战，迫使敌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敌人在上甘岭惨败之后，从正面进攻以打破对峙局面的想法完全破产。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任美国总统，一上台就鼓吹备战和侵略政策，并计划从我军侧后方登陆扩大朝鲜战争。朝中人民识破敌人企图，志愿军、人民军和朝鲜人民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战争动员，并在东西海岸展开了构筑坚固阵地的浩大工程，增修道路，储备物资，准备迎击敌人任何规模的战争。由于我军有了充分准备，严阵以待，敌人在我侧后登陆阴谋不打自破，我军后方空前巩固。一九五三年四月间，由于我方坚定努力，停战谈判对交换伤、病俘问题

达成协议，全面谈判也于四月二十六日恢复.

为了促成停战实现，我军发动了一次比一次规模强大的夏季进攻作战，自五月十三日起，连续给敌以三次打击。第一次每个战斗的目标不超过敌人一个营阵地，战斗二十九次，共歼敌四万多人．第二次为汉江南岸作战，规模大了，突破敌人整营整团阵地．当遣俘问题达成协议，停战签字作具体安排的时候，李承晚集团竟然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下，强迫扣留我方二万七千名战俘．我军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在金城以南予敌人第三次打击．我以强大野战部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向敌人四个师据守的宽二十二公里、纵深五公里的阵地发起进攻．仅仅一个小时战斗，就全线突破，一昼夜之间将敌人全部打垮．整个夏季进攻战役共歼灭敌人十二万余人，扩展阵地二百四十多平方公里．

此次战役前，部队广泛开展了军事民主，发动全体指战员提困难、想办法，反复看地势、摆沙盘，研究进攻敌人坚固阵地的战法，并进行实地演习．因此，创造出很多独特奇妙的战法来．某部为减少攻击时的伤亡，竟突破军事上的惯例，将突击部队三千多人，潜伏在敌人阵地前一昼夜，没有一个人暴露目标，等发起冲锋时犹如神兵天降，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人阵地筑有坑道，并有很强火力，我军指战员也研究出一套打法，把它打得粉碎．攻击战役中，我军部队更发挥了大胆穿插，深入敌阵的战法．某团一个先头侦察班，化装奇袭，深入敌阵二十多华里，直捣李伪军“白老虎团”团部，歼敌指挥机关，打乱敌人指挥，给攻击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人遭我沉重打击之后，更加张慌失措，我进攻作战还在进行中，就急忙催促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于是，举世关怀的朝鲜停战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实现了．

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而斗争

朝鲜停战实现后，国际局势趋向和缓．但美国统治集团却继续千方百计地破坏停战协定，制造朝鲜、远东紧张局势．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十二天即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美国就同李承晚集团签订了侵略性的“共同防御条约”．接着他们又强迫扣留大批朝中方面的战俘，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十一日更用武力劫走朝中方面战俘二万一千多名。十二月十二日美方悍然拒绝了召开政治会议协商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一九五六年五月强迫中立国视察小组撤出南朝鲜．一九五七年六月，又片面宣布废弃停战协定十三项卯款关于不得以增援性武器运入朝鲜的规定，并且向南朝鲜运进原子和火箭武器，将在南朝鲜的美军改编为五群制原子师．因此，志愿军在停战后就担负起与朝鲜人民军并肩维护停战协定，协助朝鲜进行恢复建设，和进行训练的任务．

朝中两国人民军队，严格遵守停战协定，同时，为维护停战协定，我军指战员时刻警惕地严守自己阵地，密切注视着敌人一举一动，及时揭发其阴谋活动．在军事停战委员会内的朝中代表，不断就敌人破坏停战协定事件，向敌人提出严正警告和抗议，揭露其可耻面目，打击其侵略计划．同时，我军积极修筑加固工事，紧张地进行军事、政治和文化训练，以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在非军事区的民警部队，坚守在军事分界线上，不分白昼黑夜，他们在暴风雨里进行巡逻，在大雪中监视敌人，庄严地维护了停战协定，机警地捕捉了敌人派遣来的特务．停战后，到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为止，敌人在非军事区或通过非军事区违反停战协定的挑衅活动达七百九十二起，由于中朝人民军队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敌人的破坏阴谋都一一被我

击破。尽管敌人对这些特务活动多方抵赖，但是通过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及视察小组的多次调查，在人证物证面前美方处于十分狼狈境地。

志愿军积极拥护朝中两国政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一贯主张，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五年十月，志愿军先后分三批从朝鲜撤出了十九个师，为和平事业作出巨大努力。

积极参加朝鲜北部的恢复建设

志愿军从进入朝鲜一天起，就遵循着毛主席“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以崇高国际主义思想，尊重朝鲜政府，团结朝鲜人民，并且抢险救灾，抢救朝鲜人民生命，出现了罗盛教那样国际主义战士。在战斗空隙中，尽一切力量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劳动。战后，志愿军指战员看到朝鲜北部城市和乡村被美国侵略者严重破坏，认识到朝鲜北部每一工厂、村庄的重建和恢复，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都是共同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增强。因此，战争炮火刚一停下，就按照志愿军党委的指示，以建设祖国般的热情，参加到恢复重建朝鲜北半部的工作中去。铁道兵部队与朝鲜人民共同努力，在停战三个月后，就修复了朝鲜北半部的原有铁路，并且新建和修复了大小桥梁一千三百余座。工程兵部队投入平壤、咸兴、元山等英雄城市的重建工程。仅在平壤一地就修建了内阁综合办公厅、医院、大学等各种建筑二十多万平方公尺。他们提出“以建设祖国首都北京的劲头建设平壤”的口号，克服了许多技术困难，节约了大量物资。

各部队参加了恢复建设工作。在前线附近，丧失家园的朝鲜人民回乡时，战士们协助盖房屋、修学校，填平田中的无数炸弹坑，起去敌人埋下的地雷爆炸物，使朝鲜人民安居生产。

在战争中，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炸毁了朝鲜许多水利工程，志愿军则以千百万劳动力协助朝鲜人民进行了修复。到一九五七年底止，先后修复了“见龙”“泰川”等八座水库，修筑堤坝一千三百余条，全长六百二十七华里，修治了南川江等河道七条，长二十二华里。一九五八年志愿军又参加了修筑定州、谷山等水库工程。在这些工程中，志愿军指战员发挥无比的劳动热情，有时与洪水搏斗，有时在冰水中施工。有的战士在协助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中献出了生命。

朝鲜人民在战争中遭受敌人严重摧残，加上一九五四年又受到严重的水旱灾害，生活一度很困难。志愿军指战员节衣缩食，节省出粮食七百多万斤，衣物、用品十万多件捐赠给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渡过灾荒。一九五六年指战员又自动集资购买双轮双铧犁五百部，捐赠给朝鲜农业合作社。此外，志愿军还抽出训练时间帮助朝鲜人民进行耕种、收割、开荒、植树等农业劳动，和排水、打柴、修补房屋等家务劳动。

这一切劳动，体现了国际主义思想，进一步增进了中朝友谊，也教育了部队广大官兵，提高了思想觉悟。

志愿军指战员时刻关怀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祖国每一建设成就又都鼓舞着志愿军奋发前进。停战后，志愿军为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节约运动。停战不久即实现了自给五个月蔬菜、两个月肉食的任务。部队普遍利用村边、营房边的隙地开荒种菜，自养猪羊。同时，厉行节约，爱护祖国供给的一滴汽油、一粒粮食，仅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就节约粮食一千多万斤。除此，全军还踊跃购买公债，年年都超过了预定指标。一九五五

年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志愿军展开了捐献运动，很短时间自动捐款购买拖拉机五十台，建成志愿军拖拉机站，献给祖国人民。志愿军这些生产节约、积极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受到全国人民热烈赞扬。

满载胜利友谊而归

由于社会主义力量胜过了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胜过战争力量，国际形势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新的转折点，和平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有了更大的可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提出了立即从南北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各项建议。我国政府为打开和平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僵局，缓和由美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远东紧张局势，与朝鲜政府磋商后，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全部撤出朝鲜的建议。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热诚赞同我国政府的建议，并决定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发表声明，宣布了志愿军的这一决定。志愿军从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在朝鲜人民欢送声中开始从朝鲜撤军，到十月底全部撤回祖国。志愿军为谋求和平所作的努力，不仅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开辟了新的现实途径，而且也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强大。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的行动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普遍赞扬。而发动侵朝战争、阻挠朝鲜和平统一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却至今盘踞着南朝鲜，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斥责，更加陷于孤立。

志愿军撤出朝鲜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以鲜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按照志愿军党委“不骄不懈、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方针，响应做到撤军“三好”（交好、走好、到好）的号召，掀起一个增进团结友谊的新高潮。各部队根据群众需要，不顾劳累，夜以继日地帮助朝鲜人民修渠、修坝、修房，植树……等许多劳动。许多部队提出“多出一把汗，多留一分友谊”，有的到临行前夕亦不停工。全军在分批撤出的情况下，协助朝鲜人民劳动的出工计划都一再突破，自宣布撤军到撤完为停，已达到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工。

志愿军移交防务给人民军的同时，将营房、营具、大量物资器材和医院的全套设备完整无偿地移交给人民军。所有部队都将伙食单位自养的猪羊、种的蔬菜、自制的生产工具赠给人民军接防部队。交接前，指战员们维修工事，清扫坑道和战壕，粉刷营房，美化环境，修饰俱乐部，增制用具。处处修整得整整齐齐，用意深切。人民军接防时，部队列队欢迎，象亲人般接待人民军战友，认真细致的交待防务。广大指战员拿出最心爱的礼物赠给人民军同志留念。两国军队亲密的战友之间，洋溢着牢固的战斗的深情。

志愿军回国时，得到朝鲜政府和人民热情帮助和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曾专门为此作出决定。据据这个决定，朝鲜全民展开了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上签名运动；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的朝中友好月活动；在平壤建成了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并将沙里院大街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街；普遍给志愿军发了纪念章……。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政领导人，亲临志愿军撤军部队驻地送别勉励。朝鲜人民热情欢送志愿军，临别前夕各地举行欢送大会。有的朝鲜父老携带礼品跋涉数十里，或远从数百里的地方，赶到志愿军部队的驻地送行。志愿军回国途中，所经过的地方，处处旗帜飘扬，鲜花飞舞，锣鼓喧天。朝鲜人民和志愿军互相间，诗一般友谊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热情的眼泪流了一次又一次，送行的人送了一程又一程。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怀着坚定的胜利信念，为共同的胜利

和力量的增强而载歌载舞，但又忍不住依恋之情流下激情的眼泪。白发的朝鲜母亲将她结婚时的戒指送给志愿军战士，嘱咐他们把戒指传诸后代；年迈的朝鲜老大爷将祖传宝剑佩在志愿军干部身边；小学生把作业本捧给志愿军叔叔；人民军战士包一包英雄阵地上的泥土，交给战友带回祖国。千万件礼物带着千万颗朝鲜人民的心，体现着中朝人民深厚友谊。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流露的人间最珍贵、高尚而深厚的友情，显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伟大力量。志愿军这样满载着朝鲜人民的友谊胜利凯旋。

光辉的胜利和力量的源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坚持抗美斗争整整八年时间。经过三年战争，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军一百零九万余人，把侵略者赶回到它们发动进攻的地方——三八线，迫使敌人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祖国的安全，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敌人的经验，打乱了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时间表，捍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志愿军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正义的民族解放的事业必定胜利，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必然惨败。八年来，志愿军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红旗，英勇奋斗，艰苦奋斗，创造了无数功绩，出现了三十余万英雄模范和功臣，三十五万余人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各级勋章、奖章。除彭德怀司令员外，还有胡修道、伍先华、杨春增、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杨根思、许家朋、李家发、杨连第、杨育才等十一位同志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共和国英雄称号，为我国人民获得无尚光荣的国际声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能够战胜在装备上优于自己、号称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侵略军，而且愈战愈强，这是由于战争正义性所决定的。除此，还在于：

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党领导中国人民刚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当友邻朝鲜面临危难、祖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同时，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党和毛主席领导着全国人民，在"边打边建"的方针下，稳步向前奋进。朝鲜战场上的不断胜利，鼓舞、推动祖国建设战线；祖国的建设胜利，又鼓舞、支援了志愿军作战的胜利。祖国在战争中不仅未被削弱，建设事业反而蒸蒸日上。

志愿军在战争中，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作战指针。出国之初，根据朝鲜战场形势，决定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结合"的正确战略方针，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打退了敌人进攻。当五次战役之后，又适时地将战略方针转变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把军事斗争紧密服从于政治斗争，因此能屡战屡胜。志愿军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养下，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继承并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循并发扬了党委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原则；发扬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机智顽强、上下团结一致等传统作风，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因此，才能团结成为钢铁般的整体，战胜千难万苦，战胜强敌。志愿军的胜利，就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

二、祖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六亿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意志奋发，艰苦劳动。在工业战线上，在农业战线上，在各个岗位上，以自己的一切力量建设祖国和全力支援志愿军前线的斗争。祖国优秀儿女纷纷走上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断涌入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坚强的新生力量；志愿军需要的一切武器、弹药、物资、装备，源源从祖国运上前线；抗美援朝捐献运动（捐款可购买飞机三千七百多架），大大改善了志愿军的装

备：无数民工、铁路员工、医疗大队支援志愿军作战。祖国人民称志愿军为"最可爱的人"，多次派代表团、文工团到朝鲜慰问；对志愿军家属给予深切的关怀和照顾，在精神上予志愿军以极大鼓舞。这一切，成为志愿军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源泉。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斗争，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抗美援朝战争实质是全民之战。战争的胜利，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三、中朝两国人民及其军队的国际主义紧密团结。志愿军在朝鲜八年中，朝鲜劳动党、共和国政府和金日成首相，给予深切的关怀。对志愿军作战有功人员，授予勋章奖章；经常派代表团、艺术团慰问志愿军部队。为志愿军出版了中文报纸。金日成首相数次亲临志愿军作亲切的勉励。在朝鲜劳动党、共和国政府和金日成首相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在抗美战争时期虽然处于深重的灾难中，却尽一切可能支援志愿军。他们为志愿军运送粮弹、救护伤员；宁愿自己忍受饥寒，将粮食送给志愿军；把房屋让志愿军住；出现了无数舍身掩护志愿军伤员的朴在根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和无数热爱志愿军的"志愿军妈妈"。志愿军与人民军并肩作战，同生死、共患难，密切协同，互相支援，共同完成战斗任务，结成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由于这一切，志愿军才能顺利完成抗美援朝任务。抗美战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伟大胜利。

四、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力量的强大，和对抗美战争的声援和支持。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力量日益强大，遏止了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企图。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展开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的运动，有力支援了中朝人民的正义斗争，增强了志愿军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信心和力量。

在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支人民军队，进行正义的战争，受到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这就是志愿军八年斗争中取得光辉胜利的力量的源泉。

（新华社）

（10月25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

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么？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　德　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新华社）

（10月26日《人民日报》）

关 于 读 书 的 建 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那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那些说的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谈 话 记 录）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毛 泽 东

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化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什么？如何过渡？结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好好议一议这些问题．

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1—2〕（92）*

这一段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这种说法，有两个缺点：第一，对党和群众在认识规律上的主观能动作用阐明得不够；第二，没有说出依据工人阶级的意志创造出来的、由政府颁布的法律，要能够正确，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2〕（92）

斯大林这里说："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这个论点不对．他没有从发展看问题．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现在认识不到的，将来可以认识；现在改造不了的，将来能够改造．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的这样一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将摆脱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而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3—4〕（93—94）

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说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会议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主观客观条件不许可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办．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看来还灵．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觔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

---

* 仿体字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话；方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是该书（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的页码，圆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是《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第六分册的页码。下同。

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甚至更长。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是被人怀疑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三大敌人被打倒了，证明我们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胜利后搞合作化、公私合营，工农业都增了产，又证明我们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多搞了一点，晓得明年如何？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如果农业无人负责，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这不好。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为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该首先抓。这些也是成都会议提的。这一回山西人提出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是他们的一个创造。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搞试验田是湖北人提的，现在变成了全国的口号。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

我们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呢？还要检验，还要研究，能够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能象以往的革命那样，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而必须消灭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
>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4〕（94—95）

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在创造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方面，任务困难和复杂，我们与苏联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用处就不多了。

>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经济规律。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

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

〔5—6〕（96）

这一段是第一章的中心。

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又说："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

斯大林在这里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斯大林指出："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说没有"完全反映"，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是基本上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的。

他们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为什么他们不两条腿走路？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重工业内部的关系，他们说钢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把这些平列起来，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运用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呢？我们搞过计划，也有经验教训。当然，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但是缺点也确实不少。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是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只计委、经委是计划机关。计划要靠全党来搞，靠大家来搞。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象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

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又提出，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没有钢，就没有机器。有了钢，就能够有机器；有了钢，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就都好办了。

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是有一个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的。

有成绩和缺点的比较，有正确和错误的比较，有中国和苏联的比较，促使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十大关系，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建设社会主义两种方法的问题，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接着出现了一个跃进。不久发生了反"冒进"。经过整风反右，一九五七年底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大跃进。经过曲折，得到了"马鞍形"的教训，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找到了一条路，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是大家动脑筋想出来的。实行过程中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

说不灵，归根到底还是灵，正在逐步实现。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反映得比较完全，还是反映得不够好呢？看来，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是比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人们对客观过程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提高的。客观过程中的矛盾，不发展到一定时候，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还不能完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因此人们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它，理解它。例如，我们工业搞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辩证法也是最近才摸到的，过去是不认识、不理解的。大中小并举以大为纲，中央和地方并举以中央为纲，大和中央，是这两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一元论，不是多元论，多种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中又抓住了主要方面，或者说抓住了主导方面，就能够把一切带动起来。

>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的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规律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规律。〔6〕（96）

斯大林说，消灭、创造规律的提法是不对的。之所以不对，是把客观规律和法律混为一谈；把客观规律和计划混为一谈。他们不懂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资本主义那里无政府，在社会主义这里有政府。

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7〕（97）

第二、三章讲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

>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而且，他们也还引证了恩格斯的如下的话：
>
>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
>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
>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这样了解，也可以那样了解。〔7—8〕（97—98）

这一段分析得对。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8〕(98)

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确的。斯大林说，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我们的人民公社，现在是集体所有制，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或是两者都要扩大？

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有条件实行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提倡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

在十九世纪末叶，在《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英国，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都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而对外贸易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极为巨大的。我认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英国的商品生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的命运问题。〔8〕（98—99）

这里所说的"命运"问题，就是废除不废除商品生产问题。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问题，仍有保留，他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没有作出结论。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9—10〕（100）

斯大林在这里说，在苏联有"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象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九百三十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闹得很厉害，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一九五五年征购数字定为八百三十亿斤粮食，比上一年减少七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我们减少购粮数目的是章乃器。怪得很，资本家这样"革命"，原来是阴谋，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

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籽、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10〕（100）

我们已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政权。

（二）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10〕（100）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对前者采取没收政策，对后者采取赎买政策。

（三）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10〕（100）

我们的集体化，经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了人民公社。同他们的集体农庄相比，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

（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10〕（100）

发展工业，加强农庄，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

（五）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10〕（100）

列宁的五条都是正确的，我们都作了，而且有所发展。

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

斯大林概括列宁的回答的第五条说："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个意见，我们过去曾经大吹大擂地宣传过。斯大林说：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一九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只是购得过头了一点，农民也反对。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我认为这是好事。穷，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有些老根据地，由于过去没有搞不断革命，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了停顿不前的情绪。他们对高级合作化有抵触，对人民公社更有抵触。说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又说什么："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头"。这些话出自山西老根据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任务完

成以后，要接着提出新的任务，引导农民进行不断革命。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10〕（100—101）

斯大林这里说的发展道路是对全世界讲的，是正确的。

有人说，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否则，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料已经不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10—11〕（101—102）

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一九五七年生产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三十亿斤卖给国

家，商品粮还不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茶、丝、麻、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货币收入很少，很难有钱分给社员。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除吃饭外还能分点钱。能够给社员分钱的又有几种，有的分得很少。因此，每个公社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发展其他能卖钱的东西，要发展商品生产。

斯大林这句话说得正确："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些勉强。奴隶时代商品生产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确实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情况不同了，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产生出来，虽然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母胎中，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作为这个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了。

斯大林说："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这个话说得对。我们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我们又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时间达六年之久，经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这样三个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也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好好讨论。

>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11〕(102)

把书中的"我国"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籽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象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11—12〕（102）

书里面的"现今"，指的是一九五二年，就是十月革命后的三十五年。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才有九年。

书里面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象要啥拿啥，实际上痛心得很。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象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象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北戴河会议的决议中，曾经设想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实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是按劳分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设想的时间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了的时候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够象鞍钢一样？什么时候能够把农业劳动变成工厂化劳动？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要调拨的东西，必须无条件的调拨，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就不能丰富，就不可能直接调拨，也就不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拿鞍钢的生产水平来说，平均一个工人一年的劳动产值是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的原材料、折旧外，还有一万零八百元是国

民收入。分为两部分，工资八百元，其他的都是国家的收入。很显然，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达到这种程度，需要经过很大努力。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象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时间内，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第一个过渡。还有第二个过渡，就是从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九五九年三月，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一九六一年九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基本核算单位和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不是大队。）

我们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才取得全国的胜利，我们曾经耐心地等待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勒斯、蒋介石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佬就是要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的做法不了解，我看要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只警告了三十多次，美国人不搞了，事实上承认了我们规定的十二海浬国界线，可见得还是灵。

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吧！

>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着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成分呢？是让国营成分干脆吞没集体农庄成分（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

初有权计算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特殊问题。〔12〕（102—103）

这段里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

可是，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13〕（103）

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

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13〕（104）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改变了。经过整风反右后，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大为改变，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

3．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14〕（104）

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照斯大林的说法，是没有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斯大林在给雅罗申柯的信中说，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们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认为苏联的当时已经是共产主义，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苏还只搞了九年，则差得更远。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规律在我国也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发生作用的广阔的场所。价值规律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必须这样说。无疑地，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代

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要求制定的。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16〕（106—107）

斯大林这里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这说得很对。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批转山西省委一个文件中说：平调的"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例如，粮、棉、油、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难道能说不是由计划来调节而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吗？至于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则是完全由国家计划来进行安排的，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要进行建设。这种赔钱，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经验，要化学费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从长远利益看，一个时候赔钱也是值得的。

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商品所有者在出售商品之后，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不但不会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41〕（131）

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

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

…………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53—54〕（143—144页）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说，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条线很难划。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三个先决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

1、必须确实保证“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这是基本的。我们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产品。

2、“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不愿意划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我们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为此，需要减少劳动时间，实行综合技术教育，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说“自由地选择职业”，我不太懂，搞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挖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学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搞得没有饭吃。

斯大林提的三个决定条件是对的，主要是第一条。这几条的基本点，就是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发展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提倡共产主义的因素，割裂重工业和轻工业，不重视农业，片面地、过分地强调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不足够重视消费资料的增长，没有按照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政策来缩小三大差别，反而是扩大了三大差别。

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毛 泽 东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具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

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要点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一）六中全会作出这个决议很重要，很适时。

几个月来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情况是很好的。因为这是我国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然的结果，它反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得到了他们的热烈的欢迎。

目前国内外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怀疑的，他们怀疑人民公社能否成功。杜勒斯之流更希望人民公社垮台，希望我们栽斤斗。毛主席在十月初接见兄弟国家代表团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的运动肯定是成功的，他们的希望肯定是落空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人民公社是一个新问题，不能疏忽大意，要不断总结经验，加强领导，目前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参差不齐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做法也有一些不一致，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这是难于完全避免的现象。但是有必要及时地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端正做法，使人民公社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二）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甚么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根据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的讨论，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内容：

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电气化、机械化、钢的年产量至少在一亿吨以上。

彻底解决衣食住问题，达到郑州会议所设想的基本生活资料消费水平，建立居民点，解决住宅问题。

实现六小时工作制。

普及中等教育，使有条件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

基本上消灭了阶级。

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大大提高。

上述标准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这是高标准，这种标准同苏联一九三六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消灭剥削、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有差别。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短（从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六共十九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时间长(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五八共二十二年，除去战争和恢复八年，还有十四年，再加十二年，共二十六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高，时间长（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八共九年，再加十五年至二十年，共二十四至二十九年）。实际上，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就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了。当然，即使在将来我们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时，也应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应当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这样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利。而且要看到，苏联现有的物质基础比我们雄厚得多，他们有比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

这样的高标准使全国人民感到有奔头，比较有利。决议草案没有明白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为的是避免同苏联的提法不一致；但草案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见草案第五页）所谈到的任务，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三）关于划线问题

决议草案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级论者。马、恩、列从来就是主张革命要分阶段进行的。我们党和毛主席发展了马、恩、列的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我们的革命历史说明，在一个大的革命阶段中又分为若干小的阶段，我们党和毛主席总是把各个阶段中的质的规定弄得清清楚楚，据以制定不同阶段的战略和策略，因而既能防止“左”倾，又能防止右倾，使革命得以不断前进和不断胜利。我们还善于在一个阶段中既继续解决前一阶段的遗留问题，又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

根据同样的原则，毛主席告诉我们，要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划清楚，确定目前公社还基本是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大集体小全民），并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来制定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政策。也要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划清楚，确定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期内，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并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来制定目前阶段的方针和政策。这样才会使我们既不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又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社会主义是高标准的，共产主义的标准更高，北戴河决议提出的五条共产主义标准是很高的标准。目前的人民公社还不能说是全民所有制，只是含有全民所有制的若干成分；目前的供给制，还不能说是共产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萌芽。

这次决议草案，同郑州会议所起的草案比较，在提法上有些变化。这就是把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同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的过程，加以分开。既把三、四年或五、六年能够做到的事情，和十五——二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分开。过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不以实现高度的工业化和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为前提，当然必须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如兴办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有更多的产品可以交换，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有更大的积累，这样才能够发工资，保证人民生活稳定的增长。

还要着重说到的，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办法，例如：

人民公社的社会组织形式；公社工业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等等。这些办法的实行，既便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又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苏联很早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最近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中正在进一步地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办法。除了提出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实行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之外，还提出使集体农庄制度同全民所有制趋于接近。报告提纲中说：“……要改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趋于接近。这将表现在：集体农庄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基金的增长；集体农庄公积金的增加和正当使用；集庄体农之间，在共同组织工业企业、建筑企业和其他经济企业，共同建设电站、道路、灌溉系统和排水系统、农产品的加工企业和贮藏企业、学校（特别是寄宿学校）、养老院、医院、俱乐部等方面，扩大生产联系。”看来他们的有些想法同我们是比较接近的。

（四）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这是这次会议中议论很多的问题之一。

决议草案肯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点是很重要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目前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只有增加商品生产，人民公社的收入才能增加，才发得起工资，所以这对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目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在国家经济计划的领导下进行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否继续存在，在讨论中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不再继续存在，有人认为还会继续存在。这个理论问题不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留待以后研究和解决。决议草案中已把有关的文字删去。

（五）关于工资制和供给制。

决议草案中规定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个原则对于现阶段发展生产有利，对于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极有利。

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工资的级差仍然是需要的，但是不要差别过大。目前对于干部的工资，除少数过高者外，一般维持原状。工资的差别是应当逐步缩小的，我们的方针是用提高较低工资的办法，而不是用降低较高工资的办法。目前农村人民公社，由于生产水平还很低，社员收入中供给部分占大部分，工资占小部分；随着生产的发展，应该增加工资部分所占的比重；然后，在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之后，再扩大供给的范围，提高供给的标准。

目前，供给的范围不宜过宽，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包下来，可以先从粮食供给制（特别困难的地方还可以推迟实行粮食供给制）做起，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扩大到伙食供给制。

（六）集体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

集体生活中应当允许个人有适当的自由，也就是大集体、小自由，这个精神体现在决议草案的有关部分中。

凡是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公共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应当用把它办好的方法，吸引群众参加，绝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还可以让群众自带小菜。设立小卖部，亲戚朋友来时还可以自己回家做饭做菜。幼儿园、托儿所可以办全托，也可以办日托，娃娃日托或全托，听凭群众的自愿，等等。总之，有关人民生活的问题，应该让人民在统一规划下有选择的自由。

在兴办公共福利事业的同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点要公开向群众宣布。

湖北省委关于人民生活问题的规定，将由中央批转各地，各地可仿此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规定。

总之，在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七）关于劳动、休息和娱乐。

这是有关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最近一个时期，确有一种只抓生产、不抓生活的现象，劳动强度过高，这不但影响劳动者的健康，而且也会降低劳动的效率。决议草案强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是十分重要的。

特别应该注意妇女和儿童。目前忽视妇女生理上特点的现象，儿童劳动过重、每次劳动时间过长的现象，都应该采取有效办法加以改进。

（八）关于军事化问题。

实行全民皆兵，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新战争的一个根本措施，有了这一条，我们的心也就扎实得多了。同时劳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对于发展生产也是很重要的。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必须同"管理民主化"结合起来，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决议草案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对于军事化的误解、误用，假借军事化实行强迫命令，以及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都是应该纠正的。产生强迫命令的原因是多种

的，不能归之于三化的口号，没有三化的口号，同样会发生强迫命令。

应当把民兵组织和生产组织加以适当区分，行政（生产）领导人员不兼任民兵的指挥员。

民兵的训练方法和时间应该有一个大体统一的规定，这个问题由中央另发指示。

（九）关于作风问题。

应该肯定，整风以来干部作风有很大改进。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目前的强迫命令、虚夸、作假等不良作风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小指头，不是主流。夸大这种现象是不对的。

但是，对于作风上的这些缺点，不能忽视，要严肃认真对待。因为这种现象确有相当发展，如不纠正，不但会脱离群众，搞坏工作，而且要坏一些干部。这点应引起我们领导干部的注意。

在纠正这些缺点时，只要说清道理，区别错误的性质，处理方法适当，不会泼冷水，只会扶正气。

产生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少数干部作风不好，个别基层组织不纯，是其一。领导机关布置任务过大过重过紧，只抓生产，不抓生活，也是原因之一。除了整顿组织、改进作风等等措施之外，毛主席还在关于云南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很清楚地指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能有丝毫忽略。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如果不注意加强党的领导，也会出现严重问题。今冬明春的整社工作很要紧，各级党委必须抓紧。

作风问题也是思想问题。必须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尊重客观规律。毛主席从成都会议起就再三强调这点，我们必须认真注意。

（十）关于决议草案的修改。

这次会议的大小会上，许多同志对决议草案提出了许多意见。许多意见是好的，已在修改时采纳。也有一些意见没有采纳。有些是因为牵涉较广，都加进决议中会把主题冲淡了。例如，文教卫生方面，只加进了一小段。民族方面，因为全部决议的内容，除西藏外都是共同的，故没有专门写一段，在生活问题部分中已提到了照顾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城市中组织人民公社问题，因缺乏经验，而城市的情况又较为复杂，故只扼要地提出原则。总的精神是从稳从缓。以后再作专门研究，写出专门文件。

郑州会议拟议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纲要四十条"是一个不成熟的文件，其中有些指标缺乏充分根据，需要重新研究。这个文件应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收回。郑州会议所拟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已由这次会议的决议代替了，那个文件也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收回。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通过，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一

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很快。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个情况表明：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

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是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所带来的显著利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统一的安排和调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因而更便于发展生产；工农商学兵各项事业（其中的农又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得到了密切的结合和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成千成万的小工厂在农村中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这就特别使得几千年来屈伏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笑逐颜开；很多公社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的男女农民开始领得自己的工资，而过去经常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酱醋菜的家庭，从此可以“吃饭不要钱”，也就是说，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所有这些，对于农民都是开天辟地的新闻。农民的生活已经得到了改善，而且根据实际的经验和公社发展的远景，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在今后还将大大改善。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这一切都证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根据群众的创造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人民公社现在在各民族农村中（除西藏和某些个别地区以外）已经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在城市中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

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但是城市和农村有所不同。一则城市的情况比农村复杂。再则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城市中已经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厂、机关、学校（除一部分职工家属以外）已经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高度组织化了，因而城市的公社化不能不提出一些同农村不同的要求。三则目前城市中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浓厚，他们对于成立公社还有顾虑，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应当有所等待。因此，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由于成立的时间还很短，绝大多数的公社刚一建立，就忙于秋收、秋耕、秋种和全民炼钢铁的紧张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巩固组织，健全制度，系统地解决由于成立公社而发生的关于生产、分配、生活福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新问题。对于如何办好和发展人民公社，大家的经验还不足，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也难免有一些参差不齐。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迅速统一全党全民对于公社的认识，加强对于公社的领导，整顿和巩固公社的组织，确定和健全公社的制度，更好地组织公社的生产和生活。要把已经搭起架子的公社切实充实起来，以便使它们能够日益完满地担负起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前发展的伟大使命。

二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经验，现在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现下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从现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代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复杂的任务。从现有的经验看来，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时间可能早一些，但是也不会很早。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前进的速度较快，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应声虫将说，我们想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这个时间是太短了，我们将不能达到目的。这种调子我们早已听惯了，可以不去管它；因为他们总是要不断地在事实面前认输的。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些人说：这个时间太长了。这是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好心人，只是太性急了，我们把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等等看得非常

容易，把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至实现共产主义看得非常容易。他们认为，农村人民公社现在就已经属于全民所有制性质了，很快就可以甚至现在就可以放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采取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了。因此，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觉得不能理解。这当然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必须消除。

必须指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

首先，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这并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现在全国农村已经公社化了，但是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

不错，人民公社的建立，使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是由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基层政权合而为一；由于农村中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某些其他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由于公社参加兴办某些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工业和其他建设事业；由于许多县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县公社的县联社，县联社有权调度各公社的适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进行全县性的或者超过县的范围的建设事业，并且许多地方已经在着手进行这些事业；等等。但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现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公社集体所有，同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全民所有不同。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但是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合理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包括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却不能作到这一点。认为目前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已经是全民所有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为了逐步促进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各县应当普遍地成立县联社。县联社应当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大力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觉悟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增加公社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逐步增加公社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的部分，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如果不及时地发展和完成这种转变，老是维持集体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员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民觉悟的继续提高，因而是不适当的。但是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其次，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不错，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人民公社实

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结合的方针，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开辟了道路；农村人民公社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将有新的增长；这些都是应当承认的。而且，随着社会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逐步由不丰富到丰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给标准逐步由低到高，以及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全民教育日益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国家政权对内作用逐步缩小，等等，随着这一切，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忽视甚至阻碍这个发展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自然是不适当的。

但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积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的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得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至于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这些目标，就还有一段更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进入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中央政治局关于

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八月决议中曾经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为了澄清目前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一些误解，保证人民公社运动的健康发展，必须认真地用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广泛的反复的宣传教育工作。

三

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同时，它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主动精神。

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应当是：根据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则，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无论在那一方面的生产中和基本建设中，都必须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尽可能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成本，节减开支，增加收入，防止和反对有些公社工作人员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的现象。

在农业生产方面，应该逐步改变浅耕粗作、广种薄收为深耕细作、少种多收，实现耕作园田化和生产过程机械化、电气化，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缩减耕地面积和在农业方面所使用的劳动力。应当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做到每年全国产粮平均每口人能有两千斤至三千斤，即一吨至一吨半。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应当逐步提高棉、麻、蚕丝、大豆、油料、糖料、茶叶、烟叶、药材等工业原料作物在全部农业生产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且极大地注意加速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的发展。总之，如象在工业战线一样，一定要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中来一个全线大革命，彻底改变整个农业战线的面貌。

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样做，一可在农田上大大省水，省肥，省人力，而且将大大增加土壤的肥力；二可大兴山水草木之利，大大发展农林牧副渔的综合经营；三可改造自然环境，美化全中国。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

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

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有计划地发展肥料、农药、农具和农业机械、建筑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制糖、纺织、造纸以及采矿、冶金、电力等轻重工业生产。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在生产技术方面，应当实行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相结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凡是原来有基础而又有发展前途的手工业，一定要继续发展，并且逐步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革。机器工业也必须充分利用土钢铁、土机床和其他各种土原料、土设备、土办法，逐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

人民公社无论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各个公社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国家领导下，同别的公社和国营企业实行必要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各个公社也才能够换回必要的机器和设备，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也才能够换回所需要的消费物资和现金，以便供应社员和发放工资，并使工资逐步增长。为了保证交换计划的实现，要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广泛地实行合同制度。

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四

农村的人民公社应当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在从总收入扣除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和缴纳税款以后，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的比例。但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应当使收入中用于社员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部分（包括用于公共福利、文化教育等事业的部分）逐年有所增加，使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

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是目前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如前面所说，这种分配制度，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但是它的基本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当中，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各占多少，要看各个公社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来决定。目前在确定工资和供给的比例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使劳力强而人口少的户减少收入；一般地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

供给范围目前不宜过宽。实行供给制并不是使人们的生活清一色。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制度下，人们的需要总是大体相同而又各有不同的。因此，无论在目前和将来，在供给的范围内，必须注意尽可能使社员有适当选择的自由。

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必须逐步增长。除供给部分外，目前农村中的工资等级一般可以分为六级至八级。最高工资可以等于最低工资的四倍，或者倍数更多一点，但是不要过于悬殊，因为那样就不符合于目前农村劳动熟练程度高低差别的实际情况。各个地区的工资水平也允许有相当的差别。目前城市中工资的差额要比农村大一些，这是必要的。到了将来，由于生产有了极大的高涨，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来，无论在城市或者农村，这种工资等级的差别就会显得没有必要，而逐步趋于消失，那就是接近共产主义的时代了。

城市的工资水平一般比农村为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城市中的生活费用较高这样一个原因），而且也是一种暂时现象，应当向农民讲清楚。农村中有些社员除自己劳动外，家中还有外出人员（例如某些工人、军人、干部、华侨等）由城市或其他地方寄钱回来，对于这种情形，应当教育其他社员不必斤斤计较。公社在分配的时候，无论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对于这样的社员都应当一视同仁，也不要勉强他们向公社投资，或者捐献。如果他们依靠外出人员维持全部生活，公社也不应当加以干涉，但是可以不另行供给。对于外出上学的学生，除由国家供给或者自己可以供给者外，他们的需要应当由县联社按照学校规定的费用标准，统一负责解决。

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向前发展，社会产品愈是丰富，分配给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也必然愈是丰富。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这是一种误解。应当向群众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多余的房屋，公社在必要时可以征得社员同意借用，但是所有权仍归原主，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人民公社成立以前遗留下来的债务，不论是个人相互间的债务，公社和社员相互间的债务，或者社员欠银行、信用社的贷款，一律不要宣布废除。对于这些债务，凡有条件偿还的应当照旧偿还，没有条件偿还的暂时保留。

五

人民公社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而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党在领导公社工作的时候，必须注意全面地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纠正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群众的干劲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党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劲也会越大。把生产和生活对立起来，认为重视群众生活就会妨害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离开提高觉悟和发展生产，片面地或者过分地强调改善生活，而不提倡为长远利益而艰苦奋斗，也是错误的。

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现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我们目前的紧张劳动，也正是为将来的每天六小时劳动以至更短时间的劳动创造条件。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农忙或者农村其他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工作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一些。但是无论如何，必须保证每天睡眠八小时，吃

饭、休息四小时，共十二小时，这个时间一定不可少。目前劳动力紧张，这是事实，但是要着重在搞好工具改革方面和改善劳动组织方面找出路，而不要指望在延长劳动时间方面找出路。必须着重注意安全生产，尽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力求减少和避免工伤事故。一定要保证妇女在产前产后的充分的休息，在月经期内也一定要让妇女得到必要的休息，不做重活、不下冷水、不熬夜。

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坊、粉坊、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含热量和营养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

要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使每一个孩子比在家里生活得好、教育得好，使孩子们愿意留在那里，父母也愿意把孩子放在那里。父母可以决定孩子是否需要寄宿，并且可以随时把孩子领回。为了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公社必须大量培养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合格的保育员和教师。

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

公社还必须负责办好小学、中学和成人教育。要在全国农村中普及小学教育，办好全日制的中学和半日制的农业中学，或者其他中等职业学校，逐步做到普及中等教育。在成人中要认真地扫除文盲，组织各种业余学校，进行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间实行普及教育，并且逐步提高教育水平，这是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一个重大步骤，必须认真进行。此外，各公社还必须选送一部分青年去投考城市中的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以便为国家和公社培养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工作人员。无论那一种学校，都必须贯彻执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九岁以上的儿童可以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以便自幼养成劳动习惯，促进身心发育；但是必须充分照顾到儿童的健康，分配以适合儿童体力和兴趣的轻微的、短时间的劳动。

要加强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小学校、卫生院、俱乐部、商店等方面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且积极指导社会舆论，使整个社会和整个公社把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其他集体生活福利事业，作好服务性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批判和纠正那种轻视群众生活福利工作、轻视服务性劳动的剥削阶级观点。

要逐步改造现有的旧式房屋，分期分批地建设新型的园林化的乡镇和村的居民点，包括住宅、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工厂、禾场、畜舍、商店、邮电所、仓库、学校、医院、俱乐部、电影院、体育场、浴室、厕所等。乡镇和村居民点住宅的建设规划，要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我们主张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发展民主团结的家庭生活。这种主张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在住宅建筑方面，必须注意使房屋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现在世界上有一大堆蠢人，下死劲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其中就有美国的杜勒斯先生。这个杜勒斯，对于我国的事情，啥也不懂，却要装作一个中国通，疯狂地反对人民公社。特别使他伤心的是，据说，我们破坏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好得不得了的家庭制度。不错，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长制。须知这种家长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早已没有了，这是资本

主义的一个进步。我们却更进一步，建立了民主团结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也是少有的。只有在将来，在那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这样的家庭才有可能普遍出现。至于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里的工人食堂，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先有。不过，在那里，凡是由资产阶级举办的这类事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目的在于便利资本家剥削男女劳动者。而我们所举办的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儿童教养得更好些，因而得到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

六

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无论在生产管理方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员生活福利工作方面，以及一切其他工作方面，都必须贯彻执行这个原则。

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应当使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组织生产和基本建设、管理财务、管理生活福利事业等方面，有必要的权力，以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县联社和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学会在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之间，在经常性生产任务、突击性生产任务、服务性任务之间，合理地分配和调度劳动力，避免这里有事无人做、那里有人无事做的现象。必须不断地改进劳动组织工作，在生产任务和其他任务中继续执行和巩固分层包干的责任制，健全劳动检查和评奖的制度，切实保证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

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中必须既有纪律，又有民主。所谓组织军事化，也就是组织工厂化，就是说公社的劳动组织应当象工厂、象军队那样地有组织有纪律，这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队伍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队伍一样，是一支产业军。近代的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组织的，一个工厂就等于一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产业军，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产业军，去掉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在工人阶级内部实行了生动活泼的自觉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村，这样就建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剥削、也脱离了小生产状态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农业产业军。

在人民公社的各级生产组织中，应当相应地建立民兵组织。民兵组织和生产组织的领导机构应当是两套，各级民兵组织的指挥员，即团长、营长、连长等，原则上不由公社的主任、管理区主任(大队长)、队长等兼任。这些指挥员应当参加公社的同级管理机构作为成员之一，受同级管理机构和上级民兵指挥机关的双重领导。民兵组织应当根据需要配备武器，武器由地方自办兵工厂生产。基干民兵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普通民兵也要在劳动间隙进行适当的训练，以便为实行全民皆兵准备条件。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

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人民公社的一切组织，包括民兵的组织在内，都应当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公社不但要组织人民的生产，而且要组织人民的生活。为了把工作作好，一定要实行高度的民主，一定要有事同群众商量，忠实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志。因此，公社必须在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同时，充分地实行管理民主化。决不允许借口组织军事化，或者利用对付敌人的民兵制度，而使公社和民兵组织的民主生活受到丝毫的削弱。公社是我国基层政权的组织，只有充分保证公社的民主化，才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七

办好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行政治挂帅，才能在干部和社员中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某些人认为有了公社就可以不要党，就可以实行所谓"党社合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党在人民公社的工作中，除了必须保证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以外，还必须注意教育公社的工作人员发扬优良的作风，首先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经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运动，党的群众路线已经获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就是这一胜利的两个标志。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没有群众路线，没有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没有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涨，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社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彻底执行群众路线。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对于社员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资产阶级作风来对待群众。由于生产的大跃进，由于公社化的胜利，某些干部开始冲昏头脑，对人民群众不愿意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而表现某种粗暴态度。这种现象虽然只是个别的，但是必须引起严重的警惕。

党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创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空前胜利，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这个胜利的意义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有了大的成绩就忽视小的缺点。相反，成绩愈大，我们愈需要提醒干部保持冷镇的头脑，不要在一片胜利声中变得飘飘然起来以，至看不到，甚至不愿意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现我们的计划。

八

为了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为了保证一九五九年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根据本决议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抓紧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间，紧密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的工作，即整社的工作。

在进行整社的时候，首先要求领导干部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贴大字报，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思想坏作风，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开展一个深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在进行整社的时候，要对公社的生产规划、分配状况、生活福利、经营管理、财务工作、组织领导，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同时，要切实整顿党的组织和公社的组织，保证党和公社的各级领导成员必须是忠实于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积极分子，并且吸收在大跃进运动和公社化运动中受过考验、合乎党员标准的优秀分子入党。

对于党员、干部作风中的问题，要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鸣放加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于混入公社领导机构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极少数作风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把他们从领导机构里清除出去。

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要教育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公社中过去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是否可以作社员，或者作非正式社员，或者仍然由公社监督劳动，都应当在整社的过程中，由群众根据他们的表现，分别地加以讨论和做出决定。

整社工作，在每个县的范围内，要首先做好一个或者两个试点，即在一个或者两个人民公社内，帮助那里的同志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做好那里的工作，取得经验，作为榜样，然后全面推广。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组织千人、几千人或者万人左右的检查团，由省、地、县三级党委的第一书记挂帅，领导整社工作。检查团要在专区和专区之间、县和县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开展参观评比，召集现场会议，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鼓干劲，想办法，具体地解决当前的问题，及时地推广成功的经验。总之，必须通过这一次整顿，使全国的人民公社的工作普遍地提高一步。

（原载195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关于一九五九年
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一）

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全国人民苦战一年的成果，根据现在的预计，粮食、棉花、钢铁、煤炭、机械等主要产品都将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或一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将增长百分之七十左右。财政收入，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一百三十四亿元，一九五八年一年将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百四十亿元左右。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预计可以完成二百二十亿元以上，接近于第一个五年投资总额四百九十二亿元的一半。经过一九五八年一年全党全民的努力，我国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都大为改观。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这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党的反对保守、破除迷信和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通过这个胜利，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对于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的任务，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迅速赶上和超过英国的任务，获得了坚强的信心。我国在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这个胜利又出现在一个六亿人民的大国，出现在一个经济和文化本来很落后的国家，这就不能不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我国所取得的胜利是同苏联和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般的援助分不开的，这个胜利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八年我国的跃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跃进，以及苏联最近公布的七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同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情况，大大鼓舞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大大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中的地位。

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证明了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一九五八年我国农业的飞跃发展，打破了农业不可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农业的跃进和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推动了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工业的跃进，又必然带动农业的更大跃进。实行工农业并举，以及同工农业并举相联系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并举，总之，"用两条腿走路"，是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工业战线上的胜利，证明了党在目前时期提出的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一九五八年夏季，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执行这个方针的结果，使得钢的产量迅速地增长上去，同时带动了机械、煤炭、电力等工业部门以及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以钢为纲来安排整个工业建设，而不是把各个工业部门机械地平列起来，这就使我们的工业发展有了带动全局的中心。在工业内部，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只有抓住重点，才能带动全盘。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工业战线上的胜利，也证明了办工业必须全党动手和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各级党委加强了对于工业的领导，贯彻执行了全党办工业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出现了轰轰烈烈、遍地开花的新形势。既有大型企业、大型设备、洋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大洋群”），又有小型企业、小型设备、土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小土群”），这两方面的群众运动同时并举，互相结合，这就打破了只靠少数人办工业的冷冷清清的局面，加快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发动群众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大闹技术革命，不仅使现代化企业的工人群众运动深入了一步，而且对农村和普通城市居民中的几千万人民普遍进行了工业教育和技术训练，使技术革命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有了进一步的结合。此外，广大群众的炼钢炼铁运动，同时还起了“炼人”的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还给了我们另一方面的经验。首先，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超过这个可能性的计划就不能变为现实。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将达到一千一百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长了一倍以上。在这个数字中，能轧成各种类型钢材的一类钢（所谓“洋钢”）占九百万吨左右，能制造各种农具、土机械、土钢轨等的二类钢（所谓“土钢”）占二百万吨左右。这是一个伟大的跃进。一类钢的增产没有象预期的那样顺利，是由于一千另七十万吨的钢产计划实际上在九月分才开始执行，时间很短，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解决土高炉、小高炉和转炉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以及采矿、采煤、洗煤、炼焦、运输等方面的困难，缺乏经验的原故。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奇怪的。但是应当使广大干部由此认识到：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指标，不仅需要充分的革命干劲，而且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缺少和忽视革命干劲，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物质技术条件绝对化，就会犯保守主义的错误；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地反对保守主义，但是我们决不应当因此而否认或者忽视物质技术条件的重要意义。只有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取得胜利的充分保证。

其次，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有纲就要有目，因此，在整个工业建设中以钢为纲，既要求突出重点，也要求全面安排。产钢必先产铁，产铁必先采矿采煤，有了铁矿石和煤还必须运输，而无论炼钢炼铁采矿采煤运输，都需要相当的动力。同时有了钢，必须制成钢材，要制成钢材，又需要有足够的轧钢设备。这就是说，为了保证钢铁生产的正常进行和迅速发展，必须有全面的安排。不仅钢铁生产本身如此，为了保证整个工业和全部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重工业各个部门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之间，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生产和流通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也都要有全面的安排。只有注意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按比例的发展，才能最充分地、最合理地和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当看到，在一九五八年工业生产大跃进中间，在有些方面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比例失调的现象，例如煤、铁、钢、钢材的生产还不能互相适应；很多设备的制造和供应还不能配套；电力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赶不上钢铁生产和

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在钢铁生产上使用人力和物力过多，工业的其他部门、农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都受到一些影响；等等。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抓紧钢铁工业生产的同时，必须照顾到其他方面，纲目之间必须有适当安排，否则不仅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也会使钢铁工业本身的发展遇到困难。

同样，在农业生产方面，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在农业和农村工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之间，也必须注意适当的安排，以便加强油料作物、副食品生产和其他薄弱环节，并且使农村的人民公社通过商品交换得到适当的现金收入。

一九五八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是一个伟大的实践。通过这个实践，我们不但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且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使得我们不但有可能在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而且有可能跃进得更好。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正是在总结了一九五八年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一个更伟大的和更好的跃进计划。

（二）

一九五九年是我国苦战三年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一九五八年伟大胜利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贯彻执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和有关的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工业中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和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时，需要努力使计划的指标具有充分的客观根据，并且使各项指标相互保持适当的比例。

根据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使全国的经济面貌有一个很大改变的要求，根据目前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并且根据最近几个月的情况和经验，中央全会决定把一九五九年的钢（一类钢）产量定为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以二千万吨为计算其他指标的根据）；与此相适应，铁产量定为二千九百万吨，钢材定为一千四百万吨。以此为纲，审查和修改了一九五八年八月所拟议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初步方案，决定了新的指标。一九五九年各项主要产品产量的指标、这些指标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的速度和一九五八年同一产品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的速度表列如下：

	单位	1959年计划	1958年预计	1959年较1958年增长%	1957年实绩	1958年较1957年增长%	附：英国1957年产量
钢	万吨	2,000	1,000（包括土钢）	82	535	106	2,200
铁	万吨	2,900	1,580（包括土铁）	83	586	170	1,450
钢材	万吨	1,400	612	128	436	40	1,580
煤炭	亿吨	4.2	2.7	56	1.3	107	2.2
原油	万吨	420	210	100	146	44	
发电量	亿度	530—550	275	92—100	193	42	1,050
发电设备	万瓩	800—900	100	700—800	19.8	405	320
铜	万吨	18	7	157	5.3	32	20.7
铝	万吨	22	4.8	358	2.9	65	13.3
机床	万台	13	9	44	2.8	222	12
重型设备	万吨	155	80	94			
汽车	万辆	6.5	1.45	348	0.75	93	105
机车	台	2,100	280	650	167	68	1,155 •
货车	万辆	7.5	1.1	582	0.73	50	7 •
铁路货运量	亿吨	6.5—7	3.8	71—84	2.7	36	
铁路建设里程	公里	9,400—10,400	1,800	410—468			
水泥	万吨	1,800	900	100	686	31	1,220
木材	万立方公尺	5,500	3,300	67	2,787	19	300
化肥	万吨	250	101	147	63	60	320
棉纱	万件	1,100	666	65	465	43	185
纸	万吨	300	170	76	122	39	
糖	万吨	220	132	67	86	53	
粮食	亿斤	10,500	7,500	40	3,700	102	
棉花	万担	10,000	6,700	49	3,280	104	
油料折油	万吨	600	350	71			
麻类	万担	3,000	900	233			
财政收入	亿元	610—620	450	35—38	310	45	
基本建设投资	亿元	360	220	64	126	74	

• 英国机车和货车的产量是一九五六年数字。

很明显，这是一个宏伟的跃进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多数产品一九五九年的增长速度比一九五八年的增长速度更大，而增长速度减小的工业产品，一九五九年增长的绝对数也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的绝对数大或者大得很多。一类钢的产量，要从一九五八年的九百万吨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煤炭要增加一亿五千多万吨；许多机器产品要成倍地增长。实现这个计划，我国就将在钢、铁、铜、铝、机床、发电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煤炭一九五八年已经超过）。

这个计划是可以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的，因为一般说来，这个计划的制定是较多地研究了客观可能性的。以钢产量为例，按比较可靠的生产能力计算，一九五九年十八个重点企业的炼钢能力可以达到一千六百万吨左右，正在建设的二十四个中型钢厂的炼钢能力和现有主要机械厂的炼钢能力可以达到六百万吨左右，其他小炼钢炉的能力还未计算在内。同样，生铁产量从设备能力看，由于一九五八年内投入生产的一万座大、中、小高炉炼铁能力可以达到二千七百万吨左右，加上正在建设的几千座大中小高炉炼铁能力，一九五九年产铁二千九百万吨是比较有把握的。生铁所需矿石一亿吨，现有十三个大型机械化铁矿基地经过扩建以后可以供应六千万到七千万吨，其余依靠中小型矿山（可以逐步机械化）解决，需要的劳动力可以逐步减少以至大大减少。钢和铁需要的焦炭四千二百万吨，洗煤六千万吨，耐火材料五百万吨，铁合金四十万吨，在增加必需的设备以后，也都可以努力解决。二千万吨钢可以轧制的钢材为一千四百万吨，现有轧钢设备能力为九百万吨，一九五八年正在制造和安装的轧钢设备有二百六十一套，设计能力为六百万吨左右，加上安排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制造的轧钢设备能力，生产这些钢材是可能的。

其余的生产指标，也都经过了同样的计算。除煤产量包括一部分小窑煤以外，其余的产量都没有包括土法生产的产量在内。

这个计划也考虑到各项生产指标相互间的适当的比例，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和其他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如果说钢铁和机械是工业战线的两个“元帅”，铁路和电力就是两个“先行官”；他们不能先行，不但元帅难于“升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要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因此，一九五九年的机车货车的产量和铁路货运量，发电量，发电设备的产量和发电设备所需要的铜铝产量，都有了较快的增长。此外，考虑到人民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对于一九五九年的轻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织和造纸）以及轻工业机械、轻工业基本建设的发展也给了相当的注意。

在农业方面，这个计划要求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量达到一亿担。这两项产量的增长都大体同一九五八年增长的数量相近。一九五九年的计划要求大大加强油料作物、麻类、其他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的生产，要求它们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一九五八年。这是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上的重大任务，关系整个农村经济和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全国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同完成粮食、棉花的增产计划一样地努力保证完成。在全国农民总结一九五八年农业跃进的经验，在一九五九年作更好的努力的条件下，实现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是完全可能的。

适应一九五九年工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需要相应地积极发展国内外贸易。同时，需要继续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文教卫生事业，继续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人民生活需要逐步有所改善。工人农民的实际收入在一九五九年都应当有适当的增加。所有这些，在编制一九五九年年度计划的时候，都应当作出适当的规定。

以上所说，就是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轮廓。当然，实践中所要遇到的情况总是要比计划的编制复杂得多。因此，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修正。

（三）

如上所说，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可以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的。但是，它既然是一个比一九五八年更伟大的跃进计划，在实现的过程中也就不能不遇到很多的困难，需要全党全民作极大的努力加以克服。

摆在我们面前的具体困难是什么呢？有那些关键问题需要特别抓紧解决呢？

在工业战线方面：

第一，是钢铁工业过关的问题。一九五九年生产二千万吨钢、二千九百万吨铁，必须铁是好铁，钢是好钢，钢要成材，材要多种。因此，需要过好钢铁的质量关和轧钢关。要提高铁和钢的质量，掌握新建高炉、转炉的技术。要继续抓紧轧钢机的制造和安装运转的工作，保证一九五九年生产出来的钢都能轧制成材。对一九五九年已经制成的炼铁、炼钢设备，各地应当根据钢铁基地的规划进行调整、建设，并且把与炼钢、炼铁生产相应的采矿、采煤、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等设备能力迅速地增长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钢铁工业生产体系。

第二，是机械工业的生产安排和设备配套问题。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机械设备的需要很大，机械工业在原材料不足和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对生产任务进行妥善安排。应当把武装"元帅"和"先行"作为重点，首先保证轧钢设备、采矿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站设备和机床的生产。同时，对其他方面所必需的机械设备也应当合理安排，予以一定的保证。

一九五八年设备制造和供应中的互不配套现象，必须加以改进。既要抓紧主要设备的生产，又要抓紧配套设备的生产，以便使用的部门能够武装齐全地投入战斗，迅速发挥生产效果。对重要的成套设备生产任务，应当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有计划地统一安排，组织各企业分工协作制造。各大协作区和省、市、自治区必须划出为生产配套、配件和各种零件所必需的机械力量，并且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组织成套设备的设计、生产和供应工作。在一个省、市、自治区内无法完成的成套设备，由大协作区组织其他省、市、自治区协作制造。大协作区之间的生产协作任务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的配套产品，由第一机械部负责平衡。

第三，是交通运输、电力和其他工业跟上来的问题。交通运输和电力是当前大跃进中两个薄弱环节。适应工农业跃进和商品流转扩大的需要，一九五九年交通运输的任务将比一九五八年更为繁重。铁路货运量将达六亿五千万吨到七亿吨，主要集中在原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一九五九年铁路建设主要是加强原有干线，积极改建现有运输能力不足的线路和车站，其次才是建设必要的新线和支线（包括专用线）。各地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利用土铁、土钢和球墨铸铁修筑一部分土铁路。各地还应注意修筑公路，改善航道，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大力发展地方运输事业和邮电事业。同时，必须抓紧机车、货车、汽车、船舶、汽车零件和其他零件的生产。

在一九五九年计划中，对增加发电设备已作了适当的安排。一九五九年新安装的发电设备可达八百万瓩，加上原有设备，全年发电量可达五百三十到五百五十亿度，电力供需之间从全国全年的数量上看大体上接近平衡。但是，上半年缺电情况还不可能缓和，有些地区缺

电还很严重。因此，除了尽量发挥原有设备能力，采取调整负荷、节约用电等措施以外，还必须大家动手，利用各种动力资源，多搞中小型自备电站和动力设备，以补电力之不足。同时，为了保证一九五九年发电设备的制造任务，必须抓紧铜铝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各地应当象重视钢铁那样地重视铜铝的生产。

一九五九年在石油、基本化学产品和建筑材料等方面，供应还是不足的。除了现有企业需要努力发挥潜力以外，必须依靠群众，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建设小型的厂矿，大力增产。

一九五九年轻工业的生产，在人民购买力日益增长和许多轻工业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必须有较大的发展。现有轻工业企业应当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县和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具体条件，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大办各种轻工业。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除纺织、造纸由国家统一安排以外，其他要依靠地方设法解决。

第四，是基本建设的安排和领导问题。一九五九年钢铁、机械、铁路、电站等企业的建设规模，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和还要大得多，不少工业产品的生产任务，约有三分之一左右要靠新建、扩建企业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来担负；而它们所需要的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建筑材料品种不齐，供应不能及时，设备前少后多，安装工作挤在三、四季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一九五九年艰巨的建设任务，必须做好这几件事：（1）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保证一九五九年生产任务、照顾长远发展的原则下，各地方、各部门应当对一九五八年八月间拟议的一九五九年建设项目坚决加以合理调整。在调整项目的时候，要注意合理布局，适当分散，避免过多地把企业集中布置在少数大、中城市；要注意贯彻执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方针，为了争取速度，应当多建设中、小型企业；要注意足以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2）基本建设项目施工先后，必须严格排队，使每一项目同材料、设备的供应基本上相适应；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排队先后，对于材料、设备和施工力量，集中使用，统一调度。（3）在设计工作和施工工作方面，必需进一步提高设计工作的水平，审查和鉴定已经完成了的设计。要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方针，尽可能采用简易设备，利用当地的土材料和创造施工的土机具，以保证基本建设的多、快、好、省。（4）在建筑安装工作中，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作业，大力减少伤亡事故，特别是要力争消灭重大的伤亡事故。

第五，是各地区的建设部署和协作问题。目前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改变。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必须首先保证现有工业基地的生产，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使它提供更多的材料和设备，以便支援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建设。新的建设项目，必须在“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下，考虑到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布局。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协作，特别是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帮助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是保证共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各地区都应当相互支援，努力完成对外区的协作任务；而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则应当力求自己解决。各地方各部门在执行国家物资调拨计划时，应当按照先全国、后地方的原则，首先保证外调任务。

在农业战线方面，一九五九年必须争取粮食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达到一亿担，争取其他主要农产品全面增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使人民公社在生产进一步高涨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在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的同时，各级党委必须继续抓紧农业生产。

一九五九年粮食和棉花的增产速度比一九五八年低一些，这是为了可以腾出必要的劳动力用在其他方面，以利于整个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合理发展，而一年增产三千亿斤粮食和三千三百万担棉花，这个数目也已经不低了。粮食产量要在一九五九年实现全国每口人平均占有一千五百斤以上，并且增加稻麦的比重而减少薯类的比重，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开展大面积高额丰产运动，改变浅耕粗作、广种薄收为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是争取一九五九年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作物大量增产的一项主要措施，是"水（水利）、肥（肥料）、土（深耕、改良土壤）、种（改良种子）、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工（改良工具）、管（田间管理）"的"农业八字宪法"的集中表现，必须认真做好，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按照各地具体条件，逐步实现耕作的"三三制"。

一九五八年的油料作物、麻类作物、畜牧业的生产还没有"过关"，丝、茶的生产还没有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必须大力加强这些薄弱环节，使这几种作物的生产基本"过关"。必须通过这些和其他商品性作物的生产，通过发展副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社办工业，增加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的收入。肉类、蔬菜等副食品的供应在最近时期比较紧张；必须大力加强猪、羊、鸡、鸭、鱼类的生产和供应，并且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播种蔬菜面积和供应城市蔬菜的数量，采用"分片包干、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和对外地进行必要支援"的办法，认真保证一九五九年全国副食品的需要。

为了保证一九五九年工农业的跃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加强商业工作，实现商品的购、销、调、存计划，克服目前供求关系中的某些严重脱节的现象。各级党委在一九五九年的工作安排中应当给商业工作以应有的地位，使应当收购的农产品和工业品都能按计划及时收购起来，应当和可能供应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能及时供应，国家出口的计划都能如期如数地完成。农村财贸机构下放到人民公社以后，应当及时建立必要的制度，以保证农村财贸工作能够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顺利地进行。

为了全面地实现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合理地安排和使用劳动力。各地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分别规定用在农业、副业、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方面的劳动力的适当比例。同时，要努力改善劳动组织，改进工具，提高技术，逐步实现笨重体力劳动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以便提高效率，节约人力，减轻劳动力紧张状况和劳动强度。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都应当加强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的培训工作。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是繁重的，而第一季度在材料供应、设备配套、交通运输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因此全党必须立即动手，争取时间，抓好第一季度的工作。在工业上要开展一个以增产钢材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搞好第一批"小土群"钢铁生产的改组整顿工作，完成机械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在第一季度的迫切任务。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妥善安排施工顺序，首先保证重点项目和收效最快的中小项目第一批开工，并且积极进行下一批工程的准备工作。在农村中，要抓紧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的时间整顿人民公社，作好冬麦、油菜等越冬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同时积极兴修水利，积肥造肥，改良农具，准备好一九五九年的春耕春播，争取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丰收。

（四）

毛泽东同志很久以来就告诉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初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掀起了敢想敢说敢做、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

群众运动，并且跟着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的组织工作，苦战了一年，终于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这个伟大的胜利，正是全党全民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结果。当我们讨论和决定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告诉我们："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工作。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慢慢热起来。"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制定，是一个既反对太冷又反对太热的过程。它是一个跃进计划，是一个苦战计划。非跃进、非苦战，我们的国家不能较快地改变面貌。它又是一个比较有根据的计划，它的指标比一九五八年八月拟议的一般要低，因为不作这种调整，就缺少实现的客观可能性。

现在这个计划，这个需要我们在一九五九年内领导全国人民为其实现而奋斗的伟大纲领，是定下来了。在实现这个计划的时候，仍然要求我们要热又要冷。我们一定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当前的任何困难，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对于那些企图利用我们调整指标的机会出来怀疑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怀疑大跃进、怀疑以钢为纲和在工业中发展群众运动的观潮派、算帐派，以及那种对于一九五九年计划片面地强调困难而畏缩不前的情绪，必须给以坚决的批判。而与此同时，我们一定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认真提倡实干苦干巧干，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的精神，提倡切实的计算、安排和检查，反对浮夸，反对借口破除迷信而否认科学，反对谎报成绩、隐瞒缺点。经济工作一定要愈作愈细致，一定要尽可能地接近或者符合实际；经济工作人员不但要红，一定要逐步地、真正地做到又红又专。

为了完成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必须继续坚持政治挂帅，依靠群众。应当把一九五九年的任务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为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钢、一千四百万吨钢材、一万零五百亿斤粮食和其他一系列伟大的目标而奋斗，为一九五九年钢、铁、铜、铝、机床、发电设备等产品的产量接近赶上或超过英国而奋斗。钢铁战线上的"小土群"转向"小洋群"，这是群众运动的必然的前进过程；但是土铁、土钢、土钢材、土机械、土铁路等等，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特别是在地方工业、公社工业中，仍将起重大的作用，千万不可以小看了它们的作用，小看了就会犯错误。同时，工业战线上的小型、土法的群众运动，还必须在炼铜、炼铝、采煤、发电、化工、建筑材料和轻工等方面继续发展。同志们须知：一万年还会有跟大企业并行的中小企业的，还会有那时的"小土群"和"小洋群"，还会有"土洋结合"这种事情。不过那时所谓"小土"的内容和形式，跟现在大不相同吧了。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多样化的宇宙，这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一条法则。在大型企业中，目前群众运动一般还进行得不深不透，在一九五九年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号召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来完成生产、建设、运输各方面的艰巨任务。"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规章制度，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工人互相结合）的办法在许多企业中已经收到显著成效，必须在工业战线上全面推广。必须在全党坚持发扬整风运动的成果，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时刻关心人民生活，及时地纠正任何脱离群众和压制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

实现一九五九年的伟大计划，必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的努力。全国的计划是统

一的，无论公社、县、专区、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建设计划，都必须在分级综合平衡以后由中央综合平衡，并且纳入统一的国家计划之中。毫无疑问，由于执行工农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的方针，全国各地方的经济在一九五九年都将得到新的发展。但是一切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从协作区到公社，都必须为统一的国家计划而奋斗，都必须首先保证重点企业的需要，因为这些重点企业的生产建设计划是全国计划的骨干，它们的计划完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才能有基本的保证，从而各个地方的经济高涨也才有了统一的前提。这个道理，应当在各地方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讲清楚。

中央全会号召全党全民团结一致，沿着一九五八年的胜利道路英勇奋斗，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使我国在苦战三年的决定性的一年中，实现比一九五八年更伟大的跃进。全会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新华社）

（12月18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

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中央委员八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二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列席了会议。

在六中全会之前，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同志曾在郑州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随后又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为这次全会作了准备。

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不提名毛泽东同志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全会经过小组会议和全体会议的充分的深入的讨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于过去几个月中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决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有关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的问题。决议对于人民公社的正确发展方针，对于公社的生产方针，对于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对于组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抓紧今年十二月至明年四月的五个月时间，紧密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和巩固的工作。

八届六中全会总结了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提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全会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根据现在对一九五八年全年工农业产品产量的预计，钢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吨左右，煤炭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一亿三千万吨增加到二亿七千万吨左右，机床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二万八千台增加到九万台左右，粮食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加到七千五百亿斤左右，棉花将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加到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其他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巨大的增长。工农业总产值，一九五八年预计比一九五七年增长

百分之七十左右，而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才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财政收入，一九五八年预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百四十亿元左右，而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才增加了一百三十四亿元；基本建设投资，一九五八年预计可以完成二百二十亿元以上，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总额四百九十二亿元的一半。

全会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大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同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援助分不开的。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及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必须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句话，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不是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针，这样的一整套方针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是一个伟大的实践，通过这个实践。我们不但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且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就使得我们不但有可能在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并且有可能跃进得更好。

全会指出，在一九五八年伟大胜利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九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需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继续实行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并举的方针，在工业中继续实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时，需要努力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并且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努力使各项指标相互保持适当的比例。中央全会根据这些方针和原则，提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左右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增加到一亿担左右。全会责成主管部门根据这些主要指标，根据一九五九年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编制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提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根据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出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全会指出，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我们一定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认真提倡实干苦干巧干，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提倡切实的计算、安排和检查，反对浮夸，反对隐瞒缺点。经济工作一定要愈作愈细致，一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实际或者符合实际。

全会还指出，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必须继续坚持政治挂帅、依靠群众，在建设工作中继续采取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必须一致努力，一切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全会认为，根据上述主要指标制订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将是一个宏伟的跃进计划。全会号召全党全民团结一致，沿着一九五八年的胜利道路英勇奋斗，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一

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使我国在苦战三年的决定性的一年中，实现比一九五八年更伟大的跃进。全会相信，我国人民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全会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指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

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将在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之后，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

八届六中全会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全会指出，最近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和平的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大于反动的力量，进一步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主张和平共处、不愿意战争的人们，而使战争的制造者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重重，他们的所谓“团结”，正在处于逐步走向反面即逐步走向四分五裂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还相当长，但是总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强大的和平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和民族革命力量，帝国主义者正在大起恐慌。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说的，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全会指出，过去一年中，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解放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正在继续高涨中。最近法国和其他某些国家的反动政变，决不是表示反动派的强大，而是表示了他们的腐朽和脆弱。他们正在充当人民的“反面教员”，用他们的反动行为使人民得到教训，使人民不能不进一步觉悟和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战争狂人和反动派的冒险和挣扎，都不可能挽救他们的最后的灭亡。美帝国主义想赖在台湾不走是不行的；如果美国侵略军不自己撤走的话，那么，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终将团结起来把它赶走。同样，美帝国主义想赖在南朝鲜、越南、日本、菲律宾、西柏林、西德、西欧、北非、中东以及其他外国的军事基地不走，是不行的；如果美国侵略军不自己撤走的话，那么，同样，各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把它赶走。

全会满意地指出，在过去一年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壮大了，团结得更加巩固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挑拨、咒骂和破坏，都注定要失败。全会对苏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感到兴奋，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它代表着进步人类的崇高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它的实现将大大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人类制止战争的和平事业。全会深信，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过资本主义。

（转自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现将毛泽东同志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及该文原件，发给你们。望印发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卫生部门、各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医院、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委、支委阅读并讨论，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向

毛主席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教研组党总支检查了物理教研组支部的工作，并组织党员讨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讨论中暴露出以下问题：

（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

（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

（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认为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

（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就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

由于这些错误的认识，他们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该教研组主任刘绍唐（中左），一贯表现较好，但支部却认为他只能起反面教员的作用。编教学大纲时，让他带了几个落后助教编，党团员背着他又另编了一个，准备唱对台戏。刘表现非常积极，开夜车将教材编出来了，无可批判，党员却将他编的大纲丢在一边，只把党团员编的大纲交给群众讨论。

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时，党团员在小组会上说：“现在不搞共产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的退却”。“校长说不降薪，是迁就高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有觉悟，应自觉自愿降薪”，“这些人再不改造，应当送他们到养老院去！”

教研组的工作都由党支部包办了，根本不和教研组主任商量。党总支提出要调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这个支部想不通，认为如果不把这些人的威风打下去，党团员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党总支提出应发动群众总结贯彻教育方针的经验，支部也不愿意，说：“为什么要和革命对象一起总结经验？”

清华大学党委最近已检查纠正了这种错误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5%；钢、铁、煤炭、粮食、棉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比上年增长了一倍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我国农村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已经胜利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国农村原有的七十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户数达到一亿二千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

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出现了工厂、公社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农场的新气象。

在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基础上，全国就业人数极大增加，失业现象已经消除，农民群众在公社化的条件下，生活有了可靠的保证。

一、工　业

一九五八年钢产量（包括一部分土钢）达到1,108万吨，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即增加573万吨。生铁产量（包括一部分土铁）达到1,369万吨，比上年增长1.31倍，即增加775万吨。钢铁产量在这一年实现翻一番的伟大成就，是经过全国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而取得的。

在钢铁工业的带动下，一九五八年整个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超过了解放以来的任何一年。工业（包括手工业，下同）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66%。

在工业生产高速度的发展中，生产资料生产有了更迅速的增长，与上年比较，生产资料增长103%，生活资料增长34%。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比重为57%。

在工业大跃进的运动中，全国广大农村办起了许多用土办法或者半洋半土的办法进行生产的小型的炼铁厂、煤矿、炼油厂、发电站、水泥厂、肥料厂、农具制造修配厂、食品加工厂等类厂（场）矿。这些厂矿的产品，例如土机床、土铁、土钢、土化肥、土水泥以及某些日用品，在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和供应人民生活需要方面开始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整风运动以后，很多企业实行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办法，改革了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广了企业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互相结合进行技术改革的经验，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例如，大型的和用洋法生产的高炉每立方公尺有效容积每昼夜产铁一点四九吨，比上年提高12%；平炉每平方公尺炉底面积每昼夜产钢七点七八吨，比上年提高8%；原煤生产工人平均每人每日采煤一点四五吨，比上年提高25%。

一九五八年试制成功了许多新产品，其中有：多种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复合不锈钢板、高度550公厘的大型工字钢、容积1,513立方公尺的高炉、2,300公厘中板轧机、容量25,000瓩的火力发电设备、载重量5,000吨海轮、2,500吨的锻造水压机、高级绝缘材料有机硅树脂等。

一九五八年中央各工业部直属工业企业的产品成本比上年降低12.5%。

二、基本建设

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67亿元，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总额的一半，其中通过国家预算的基本建设投资21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147%，比一九五七年增长70%。此外，人民公社还进行了一些基本建设。

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投资较多地集中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工业建设占65%，农林水利建设占10%，交通运输建设占13%，其他建设占12%。

一九五八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共有1,000多个，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约有700个，其中在苏联援助下的重大建设项目有45个。全部投入生产的重要建设项目有：武汉钢铁公司的一号高炉、鞍山钢铁公司的四号和五号大平炉、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矿山机器厂第一期工程、哈尔滨汽轮机厂第二期工程、双鸭山洗煤厂、淮南谢家集洗煤厂、阜新新丘立井、洛阳热电站、本溪电厂、兰州西固热电站第一期工程、兰州炼油厂第一期工程、华

1958年32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如下：

	1957年产量	1958年产量	1958年比1957年增长的百分比（%）
钢	535万吨	1,108万吨	107
生铁	594万吨	1,369万吨	131
发电量	193亿度	275亿度	42
煤炭	1.3亿吨	2.7亿吨	108
原油	146万吨	226万吨	55
水泥	686万吨	930万吨	36
木材	2,787万立方公尺	3,500万立方公尺	26
硫酸	63.2万吨	74万吨	17
纯碱	50.6万吨	64万吨	26
烧碱	19.8万吨	27万吨	36
化学肥料（不包括硝酸铵）	63.1万吨	81.1万吨	29
抗菌素	34.6吨	145吨	319
发电设备	19.8万瓩	80万瓩	304
金属切削机床（不包括简易机床）	2.8万台	5万台	79
机车	167台	350台	110
货车	7,300辆	11,000辆	51
汽车	7,500辆	16,000辆	113
民用船舶	5.4万载重量吨	9万载重量吨	67
拖拉机	—	957台	—
谷物联合收割机	124台	545台	340
机动脱粒机	—	740台	—
动力机械（注）	69万马力	200万马力	190
棉纺机	48.4万锭	100万锭	107
造纸设备	0.7万吨	1.5万吨	114
制糖设备	0.9万吨	1.5万吨	67
棉纱	465万件	610万件	31
棉布	50.5亿公尺	57亿公尺	13
纸	122万吨	163万吨	34
食用植物油	110万吨	125万吨	14
糖	86.4万吨	90万吨	4
原盐	827.7万吨	1,040万吨	26
卷烟	446万箱	475万箱	7

注　动力机械是柴油机、汽油机、煤气机和锅驼机的总称。

侨糖厂、桂平糖厂、南平造纸厂第一期工程、邯郸第二和第四棉纺织厂、郑州国棉六厂等。

一九五八年建筑工业在首先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原则下，开展了多快好省的快速施工方法，大大缩短了工期，节约了投资。武汉钢铁公司日产2,000吨铁的高炉原计划两年建成，经过快速施工，只用了十四个月即建成投入了生产。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平炉经过快速施工只用了五个多月即建成投入生产。很多钢铁联合企业、电站、矿井等建设投资都比过去节约。一九五八年有很多建设单位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的包干制度，开始收到了节约国家投资、扩大建设规模、加快建设速度的效果。

许多设计单位简化了设计程序，缩短了设计时间，基本上扭转了过去设计赶不上施工的现象。

一九五八年在地质勘探工作方面，掀起了群众找矿运动，在整个地质工作战线上，获得了巨大的战果。全国共找到了大小矿点16万多处，其中已有许多矿点经过检查证实是大型矿床。过去有些被认为缺乏矿产的地区，也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矿产地。全国完成机械岩心钻探工作量740多万公尺，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石油深钻井进尺118万公尺，比上年增加近二倍。对于主要矿产储藏情况，一九五八年已经探明的数量比上年都有很大的增长，例如：已经探明的煤矿C1级以上的数量比上年增加60%，铁、铜、铝等矿C1级以上的数量比上年都有很大的增加。

三、农　业

一九五八年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高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7,500亿斤，比上年增长了一倍。棉花总产量达到6,638万担，比上年也增长了一倍。其它主要农作物产量比上年增长的百分比是：大豆24，花生56，油菜籽24，甜菜93，甘蔗30，烤烟115，黄洋麻8。

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平均每亩产量（按播种面积计算）为412斤，棉花平均每亩产量为77斤。

按耕地面积计算：一九五八年全国已有许多的县市提前实现了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每亩年产量分别达到400斤、500斤、800斤的指标，许多产棉地区也提前达到了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每亩年产棉花60斤、80斤、100斤的要求。

一九五八年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勇敢勤劳的五亿多农民，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向自然界的英勇进军，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到一九五八年九月的一年之间，在兴修农田水利方面，完成土石方580亿公方，扩大灌溉面积四点八亿亩；水土保持初步控制面积约达32万平方公里。这些水利工程使遭受严重干旱威胁的四点七亿亩耕地，有三点八亿亩未成灾，已成灾的耕地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减轻了损失；同时，还大大减轻了夏季特大暴雨的为害程度。

一年来，各地正确地执行了关于土（土壤）、肥（肥料）、水（水利）、种（种子）、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等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产丰收。

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国共有牛、马、驴、骡、骆驼等大家畜8,506万头，比上年有底略增加。小家畜28,886万头，其中，生猪一点八亿头，山、绵羊10,886万头，都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一九五八年茶叶产量比上年增加26%，家蚕茧产量比上年增加24%。

一九五八年春秋两季群众造林面积共达四亿亩，比上年增长五倍。

一九五八年全国气象台、气象站比上年增加67%。群众性的气象组织也有很大发展。

四、交通运输和邮电

在一九五八年有55条新的铁路线先后施工，29条原有线路进行复线建设或改建，加上企业专用线，全年铁路铺轨里程共达3,564公里，比上年增长一倍多，其中复线为900多公里。全年新建公路（包括简易公路）15万公里，比上年增长七倍多。全年整治和新增的内河航道达1万公里，贯通五大水系，淤塞了一百多年的南北大运河的疏浚和改建工程，已在山东、江苏两省分段施工。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31,193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到40多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达到15万多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长度达到三点三万公里。

在一九五八年秋冬两季，在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各地广泛地组织了社会上的运输力量，有力地援助了钢铁生产。各地运输企业积极开展了合理的多拉、多载、快装、快卸和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大大提高了车、船的运输效率，铁路机车平均牵引总重比上年提高12%，货运汽车平均年运量比上年增长55%。一九五八年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比上年都有很大的增长，其中：铁路货运量增长39%，货物周转量增长38%；交通部直属企业货运量增长20%，货物周转量增长28%。

一九五八年全国邮电业务量比上年增长41%。

五、国内外商业

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和劳动就业人数的增加，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的购买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全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加16%。主要消费品的零售量与上年比较，粮食增加16%，棉布增加17%，针织品增加45%，胶鞋增加52%，机制纸增加55%，暖水瓶增加29%，收音机增加一点六倍，搪瓷器皿、火柴、肥皂、自行车、缝纫机、钟、钢笔、金笔等都有显著的增加。商业部门对农村的生产资料供应有了特别迅速的增加，全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额达67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其中：化学肥料增加39%，农药增加二点二倍，动力机械增加三倍。

一九五八年国营及合作社商业收购的农副产品总额比上年增加26%，其中：粮食增加17%，棉花增加36%，烤烟增加24%。

一九五八年市场物价始终保持稳定。

一九五八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上年增加23%。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为了支援我国的建设，不仅按照计划供应了定货，而且还提前和补充供应了很多重要工业设备。我国对亚非国家的贸易，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发展了相互间的贸易，加强了友好关系。我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有一些增加。

六、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一九五八年全国职工平均人数达到3,200多万人，比上年增加了约800万人，职工队伍空前扩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已经消灭。同时，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由于家务劳动的

社会化，全国约有几千万妇女劳动力，从繁琐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参加了社会劳动，大大增强了劳动战线。

在全国职工总数中，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农林水利等部门职工人数所占的比重由上年的73%上升到一九五八年的85%，而国家机关的职工则比上年有所减少。物质生产部门的职工的迅速增加保证了生产建设的飞跃发展。

由于全国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技术革新运动的开展，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在原有工业企业中职工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苦战三年的第一年，全国人民进一步发扬了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但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大量增加，生产部门的职工在年终又普遍得到了一次跃进奖金，职工家庭的收入比上年增加了。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普遍地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妇产院等。

我国多数县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小学生人数达到8,600万人，学龄儿童85%已经入学。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达到66万人，比上年增加50%以上；中等学校学生达到1,200万人，比上年增加70%。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的学生为7万人，比上年增加28%；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为19万人，比上年增加30%。许多人民公社和厂矿企业自办了各种业余学校。各级各类学校在执行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方面，开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九五八年科学研究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县市设立了初级的程度不等的科学研究机构。我国已经建成了重水型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迴旋加速器。

一九五八年摄制艺术影片103部，新闻、纪录片900多本，比上年都增加了一点六倍。各种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活动也有极大的发展。出版物增加很多。

一九五八年除四害讲卫生的群众运动有很大的开展。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及其他害虫已经大大减少，城乡卫生面貌进一步改观。流行在长江以北的黑热病已经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也在部分流行地区基本上消灭。

医疗机构增加很多，全国病床已达44万张，比上年增加20%。在中西医团结合作下，我国的医学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群众性的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创造了举重、游泳、跳伞等8项次世界纪录和840项次全国纪录。

• • •

上述公报说明了我国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在大跃进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是全国人民努力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英勇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援助分不开的。在一九五八年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努力争取一九五九年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大跃进的新胜利。

（转自1959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22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编
页数=611
SS号=10273524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